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第 十 八 卷

1908 年



人 民 大 学 社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郭值京、谭金云、高叔屏、崔松龄、罗焚。

参加资料编写工作的有：张瑞亭、刘方潜、刘彦章、王锦文、毕世良。

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杨祝华、江显藩、许易森、李桂兰、林海京、李京州。

全卷译文由陆梅林、顾锦屏审订。

在本卷译文校订过程中复旦大学的陈桂茹、劳修齐、樊莘森、周瑞荷、邓刚忠、王克千和中央党校的徐小英等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谨向他们深表谢意。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第 十 八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875印张 408,000字

1988年10月第2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600

ISBN 7-01-000301-7/A·10 定价 8.20元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 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 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前 言

本卷刊载的是列宁在1908年2—10月所写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为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观点而写的著名提纲《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沙皇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警察制度，疯狂地迫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各种反动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十分猖獗。面对反动派的进攻，革命的一些“同路人”陷入悲观和动摇，甚至叛变革命。革命的失败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反动、背叛、动摇，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倒退、混乱。这一时期，正象列宁所说，“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8页）。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时髦。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寻神说”，他们把革命的失败归于“上帝的惩罚”，宣称俄国人民“失去了上帝”，现在的任务是要把上帝“找回来”。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以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为代表的一些人宣扬“造神说”，主张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俄国知识界出现了一批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他们中既有弗·维·列谢维奇、维·米·切尔诺夫这样一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公开敌人，也有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亚·亚·波格丹

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经验批判主义是由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哲学家恩·马赫和德国的哲学家理·阿芬那留斯创立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这种哲学是实证论的变种，它在批判地研究经验的幌子下阉割经验中包含的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内容，标榜自己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唯一科学的”哲学。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把经验批判主义奉为至宝，利用它向辩证唯物主义展开进攻。特别是波格丹诺夫等人，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企图用马赫主义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歪曲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连篇累牍地宣扬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俄国马赫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反映。伯恩施坦在哲学上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企图用新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考茨基和阿德勒主张用马赫主义的认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政论家札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成果，先后创立了电子论，发现了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和放射性元素镭等等。这些新发现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使人类认识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微观世界。这些新发现打破了传统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和特性的旧观念，缩小了经典物理学某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动摇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机械自然观，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新的科学论据。可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却歪曲这些新发现的哲学意义，利用它们来宣扬唯心

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某些科学家也从这些新发现中作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结论。他们宣扬“物质在消失”，否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他们夸大认识的相对性，把科学规律说成是人们为了“方便”和“思维经济”“任意”制定的，从而否定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否定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面对自然科学中的这些伟大发现和唯心主义对这些发现的歪曲，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必须澄清唯心主义者制造的思想混乱，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了批判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揭露哲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从哲学上总结和概括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重要著作。为了写这部著作，列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为了准确地把握论敌的观点，他阅读了大量马赫主义者及其唯心主义理论前辈的著作。为了掌握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第一手材料，他特地从日内瓦前往伦敦，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埋头钻研有关新文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出色地完成了当时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它回击了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澄清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它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在总结当时革命斗争新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着重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些重要原则。这部著作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阶段的代表作之一。

全书由《代绪论》、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和《结论》构成。列宁在《代绪论》中考察了近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通过历史考证，揭露了俄国马赫主义者用来攻击唯物主义的论据同贝克莱攻击唯物主义的论据如出一辙；说明了俄国马赫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马赫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是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斗争的继续；证明了俄国哲学修正主义者作为“最新哲学”来标榜的马赫主义，不过是贝克莱主义的翻版。

列宁在前三章中着重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对立，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一章中，列宁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物质和意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分析了经验批判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本前提。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是：感觉是本原，是第一性的，物是“感觉的复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是：物质是本原，是第一性的，感觉、意识来源于物质，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列宁从两种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揭示出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义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本卷第35页）这样就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赫主义的界限。在第二章中，列宁着重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这一方面来分析和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进一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对立，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列宁在这里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发

挥了恩格斯的反映论思想，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结论：第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第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第三，“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本卷第 100、101 页）列宁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论述了真理的客观性，阐明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人的认识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发展的过程；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因此，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本卷第 137 页）。列宁还着重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本卷第 144 页）列宁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实践标准，它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了它，没有任何东西能检验认识的真实性，因此它是“确定的”。这样可以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但是实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实践不可能完全地证实或推翻人的认识，因此它是“不确定的”。这样可以防止人的认识僵化，变成绝对。

在第三章中，列宁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否定世界的物质性，否定物质世界内在规律和时间空间的客观性等唯心主义观点，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列宁在第二章和本章中，在总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历史和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给物质下了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本卷第130页）这一定义概括了一切事物的最一般的特性，强调了它们是客观实在，是认识的源泉；它们能为我们的感觉、意识所反映。这一定义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它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列宁还阐明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本卷第150页）。列宁对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思想作了发挥，阐明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的意志自由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人在没有认识自然规律以前，是“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人认识了自然规律，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

列宁在第四章中主要考察了马赫主义的历史发展，马赫主义同康德主义、休谟主义、内在论哲学的联系。通过对比研究，揭露了马赫主义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确定了它在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第五章中列宁从哲学上概括和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认为“物质在消失”的谬论，指出所谓物理学危机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危机，是唯心主义利用物理学的新发现，利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弱点来反对和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指出，某些物理学家所以陷入唯心主义，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本卷第274页）。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当时物理学的新发现，指出：这些新发现“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本卷第275页）。列宁的这个科学预言为后来自然科学在认识微观结构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所证实。列宁正确地阐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认为自然科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基础，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不但没有驳倒辩证唯物主义，相反地不断地证实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强调自然科学家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他预言，不管道路多么曲折，现代物理学必然要走向“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本卷第327页）

列宁在第六章中揭露马赫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揭穿马赫主义者想用“社会唯能论”以及生物学的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规律来代替社会发展规律的反科学企图。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者的唯心史观过程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首先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揭露了马赫主义宣称自己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无党性”的伪装，论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指出“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本卷第375页）。

本卷《附录》中刊载了弗·伊·涅夫斯基的一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的论文。涅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对波格丹诺夫后来的一些著作进行了批判。1920年列宁在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文第2版时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我们也将这篇文章译出，附在卷末，供读者参考。

本卷正文部分是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译校的。书中的引文有些是列宁译成俄文的，有些是列宁引用当时的俄译本的。译校这些引文时我们原则上是以俄文为依据，同时也参考了这本书的一些外文版本和部分原著，个别地方作了脚注。

目 录

第十八卷說明	XI—XII
第四届杜馬选举运动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5
反党的取消派	6—8
紀念赫尔岑	9—16
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17—20
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	21—28
一	21
二	23
三	26
論俄国各政党	29—40
关于大資本組織的調查	41—57
一	41
二	44
三	46
四	50
五	53
六	55
“俄国土地問題”的实質	58—62
关于选举前动员情况的几点总结	63—68
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	69—76

移民問題	77—87
革命的高漲	88—95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會議的 口号和五月运动	96—101
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102—103
“联合者”	104—108
我們同自由派論战的性質和意义	109—115
資本主义和“議會”	116—118
选举和反对派	119—123
彼得堡选举的意义	124—130
斯托雷平的土地綱領和民粹派的土地綱領的比較	131—13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	138—145
一	138
二	141
三	144
答取消派	146—147
在瑞士	148—150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151—157
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158—160
俄國的“言論自由”	161—162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163—175
一	163
二	168
半年工作總結	176—191
一	176

二	182
三	185
四	189
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192—210
給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
1912年1月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	193
至今中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所謂組織委员会 采取什么态度?	194
第三届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197
关于取消派的影响同党的影响的对比的可以正式 审查的材料	199
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公开的 可以审查的材料	201
結論	204
附言	209
“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的附言初稿	211—214
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費	215—217
自由派和教权派	218—219
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	220—221
自由派的进攻	222—223
陆海軍中的起义	224—227
第四届杜馬选举的前夜	228—232
“結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嗎?	233—235
給瑞士工人的信	236
一些原則問題	237—238
最后一个汽門	239—244

小小的考証	245—246
俄国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	247—248
罢工斗争和工資	249—250
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	251—252
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	253—260
在英国	261—262
俄国的生产积聚	263—264
飞黄騰达之路	265—266
致社会主义国际局書記处	267—268
立宪民主党和土地問題	269—278
斃脚的辯解	279—280
取消派和“統一”	281—282
談談“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283—290
工人和“真理报”	291—293
从前和現在	294—295
国际法官代表大会	296—298
在瑞士	299—301
僧侶和政治	302—303
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	304—316
一	304
二	307
三	309
四	312
五	314
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派的一致	316—318

論恩·斯·波梁斯基来信	319—320
論政治路綫	321—327
美国工人的胜利	328—329
意土战争的結局	330—331
孤注一擲	332—333
选举中的僧侶和僧侶气的选举	334—337
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場”	338—339
彼得堡工人代表	340—341
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	342—343
論狐狸和鷄窩	344—346
可耻的決議	347—348
两种烏托邦	349—353
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爭論	354—360
立宪民主党的教授	361—362
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	363—364
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者	365—366
战争的慘状	367—368
立宪民主党人和大资产阶级	369—370
地道的俄国习气	371—372
改良派的綱領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綱領	373—381
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	382—391
一	383
二	385
三	388
四	389

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勝利的社會意義	392—394
新生的中國	395—396
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和意義	397—399
我們黨的“迫切問題”“取消派”問題和“民族”問題	400—407
一	400
二	402
三	404
四	406
關於工人代表的某些發言問題	408—414
關於杜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們的宣言問題	415—418
關於 11 月 15 日事件問題 (沒有發表的演說)	419—421
給約·維·斯大林的信	422—424
給約·維·斯大林的信	425—426
改良主義病	427—429
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化	430—431
工人階級及其“議會”代表團	432—433
民族主義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的“調和”	434—435
民族主義自由派	436—438
關於對取消主義的態度和關於統一 (提綱)	439—440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和黨的工作者會議	
的通報和決議	441—458
通報	441
決議	448
革命高潮、罷工和黨的任务	448
秘密組織的建設	450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	451
关于秘密書刊	453
关于保险运动	453
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統一	454
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組織	457
1912年英国的工人运动	459—460
写晚了总比不写强	461—463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	464—471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一文的附言初稿	472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473—478
关于布尔什維主义	479—481
彭加勒当选的意义	482—483
坦率	484—485
布利安內閣	486—487
选举总结	488—515
一、“制造”选举	488
二、新杜馬	490
三、六三政制內部的变化	493
四、选举斗争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	497
五、现实生活对选举口号的檢驗	501
六、对立宪民主党的幻想的“結束”	506
七、关于威勝到“貴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險”	509
八、掩盖失败	511
生活在教导人們	516—518
新民主派	519—520
論民粹主义	521—525

.....	521
二	523
告社会民主党人	526—529
工人群众和地下組織	526
在阿捷夫之流中間	530—531
資产階級和改良主义	532—533
論公开党	534—536
农民土地的轉移	537—538
談談罢工	539—540
俄罗斯人和黑人	541—542
一个发现	543—544
英国工党代表大会	545—546
立宪幻想的破灭	547—548
感謝坦率	549—550
統一問題	551—552
民粹派內部和农村中的景况如何?	553—559
日益增长的矛盾 政論家的評論	560—578
一	560
二	561
三	562
四	564
五	565
六	567
七	568
八	569
九	572

十	574
“土地规划”的某些结果	579—580
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	581—584
一	581
二	582
三	583
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	585—586
虛伪的論調	587—588
“任务的焦点”	589—591
自由派粉飾农奴制的勾当	592—593
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	594—595
我們的“成就”	596—597
妥协还是分裂？（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意見分歧問題）	598—601
“节余現金”	602—604
注释	605—628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629—640

插 图

1912年7月1日“涅瓦明星报”第15号第1版，这里 刊載了列宁的文章“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和“斯托 雷平的土地綱領和民粹派的土地綱領的比較”	125
1912年8月1日“真理报”第80号第1版，这里刊 載了列宁的“半年工作总结”一文的一部分	177

列宁“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手稿第 1 页 (1912 年 11 月).....	409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 者会议的‘通报’”手稿第 1 页 (1913 年 1 月)	443

第四届杜馬选举运动和 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連納屠杀事件引起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明俄国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正在发展。这种革命气氛的日益浓厚，使党的任务和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变得更加明显了。

危机正在新的局势下发展。黑帮杜馬就是这种局势下的必然产物。它使地主得到了政权，使资产阶级得到了进行各种勾当的场所，使无产阶级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讲台。为了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我们需要这个讲台，需要选举运动。无论是在塔夫利达宫，在喀山广场，在工人群众的集会上，在罢工的时候，在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区的会议上，或是在工会公开的会议上，为了总的领导这全部的工作，我们需要一个秘密的政党。只有不可救药的瞎子才会在今天还看不见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这些反革命胜利时期分崩离析状况下的产物是多么荒谬，对工人阶级有多大的危害。民粹派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劳动派”以及“俄国财富”杂志¹和“同时代人”杂志²的合法著作家的取消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召回主义，落得了多么可耻的下场。

现在我们把选举前各种政治力量动员后所表明的情況，做一个一般的总结。三个阵营的表现都很清楚：（1）右派，从普利什凱維奇到古契柯夫，都拥护政府。黑帮地主和守旧商人拼命拥护政

府。(2)自由派資產者(“进步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各种“民族主义者”的团体)既反对政府,又反对革命。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性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誰看不到“有文化的”資產階級的这种反革命性,誰就是什么都忘掉了,什么也沒有学到,白白叫做民主主义者,更談不上什么社会主义者。而劳动派和“我們的”取消派就是看不清这一点,就是不大懂得这一点! (3)民主派陣营,在这个陣营里,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取消派才團結一致地、有組織地、坚定地、鮮明地展开了自己的革命旗帜。劳动派和我們的取消派則在自由主义和民主派之間,在合法的反对派和革命之間搖擺不定。

第一个陣营同第二个陣营在階級根源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但是,关于第二个陣营同第三个陣营在階級根源上的区别,有許多人,从沃多沃佐夫到唐恩,都被自由派弄糊塗了。自由派的“战略”并不怎么奥妙,布兰克在“生活需要”杂志³上天真地泄露出来了:立宪民主党人是反对派的中心,是轅馬;还有两匹边馬(“側翼”)——进步派在右,劳动派和取消派在左。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們就想坐在这輛“三馬馬車”上,扮演“主要反对派”的角色,“走向胜利”。

如果俄国解放运动的領導权落在自由派手里,那無論过去或将来,都表明运动的失敗。自由派在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君主制和工农的革命之間看风使舵,每到严重关头,总是出卖革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自由派同政府的斗争,同时防止自由派的动摇和叛变。

一方面用革命来恐吓,以达到同普利什凱維奇、罗曼諾夫瓜分政权的目的,同时又鎮压革命,这就是自由派的政策。这种政策是

由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因此，立宪民主党人才会玩弄廉价的“民主主义”，才会实际上同叶弗列莫夫、李沃夫、列布申斯基之流的最温和的“进步派”合流。

为了开展、加强和巩固群众的革命攻击，推翻君主制，彻底消灭普利什凯维奇和罗曼诺夫之流，就必须利用自由派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的斗争，同时又绝对不要在人民当中造成对自由派的“信任”，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在选举时要团结民主派，反对右派和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同时在重新选举时，在报刊上，在会议上要“利用”自由派同右派的斗争。因此，必须制定一个立刻越出“合法”范围的革命政纲。因此，必须提出共和国的口号，以反对自由派所玩弄的“立宪”口号，反对“拉斯普庭-特列申科夫宪法”的口号。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工作的形式如何，不管在什么活动场所，不管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的叛变或危机的延续等等会使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周折，我们的任务始终都是准备革命战士的大军。

请看一看劳动派。他们是 sans phrases^①民粹主义的取消派。沃多沃佐夫先生“暗示说”：我们是革命者。他接着又补充说：但是……不能违反第 129 条⁴。在赫尔岑诞生 100 年之后，千百万农民的“政党”甚至还不违反第 129 条去印胶印传单！！劳动派很想“首先”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但是不会清楚地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不会去开始建立一个共和派的农民政党。而 1905—1907 年和 1908—1911 年的教训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或者为共和国而奋斗，或者跪在普利什凯维奇的脚下，躺在地上听憑

① 一一地地道道的。——编者注

馬尔柯夫和羅曼諾夫用鞭子抽打。農民是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的。

請看一看取消派。不管馬尔丁諾夫和馬尔托夫之流怎樣支吾搪塞，怎樣兜圈子，任何一個正直的、頭腦清醒的讀者都會認為羅一柯夫⁵的話正好總結了他們的看法，他說：“不要抱幻想，因為極端溫和的資產階級進步主義就要勝利了。”這句很妙的話的客觀意思就是說：革命是幻想；支持“進步派”才是現實。唐恩之流和馬尔托夫之流所講的也正是這個意思，只不過話稍微有點不同，比如，他們提出了“把杜馬（第四屆杜馬，地主的杜馬）從反動派手中奪取過來”的口號，他們幾百次地墮落到主張兩個陣營，他們高喊“不要破壞”自由派資產者的進步性工作，他們拚命反對“左派聯盟”，他們在“活的事業報”⁶上洋洋自得地蔑視“沒有人看的國外著作”，他們實際上滿足於合法的政綱，滿足於合法地破壞組織，他們成立了取消派的“倡導小組”⁷，而同革命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決裂，這一切，只要不是故意閉起眼睛，難道現在還看不到嗎？列維茨基之流從哲學上發揮了為爭取權利而奮鬥的自由派思想，涅維多姆斯基之流企圖重新“修正”杜勃羅留波夫的思想，從民主主義倒退到自由主義，斯米爾諾夫之流向“進步主義”頻送秋波，所有這些人以及“我們的曙光”雜誌⁸和“活的事業報”的所有其他勇士們，都是唱的那個調子，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實際上民主派和社會民主黨人即使想妨礙，也永遠不能“妨礙”“進步派”在地主和資產者當中取得勝利！這完全是空話。重大的分歧不在這裡。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政策的區別不在這裡。“支持”進步派，把他們的“勝利”看成是“有文化的資產者快要取得政權”，這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我們社会民主党人認為进步派的“胜利”間接反映了民主高潮的到来。应当利用进步派同右派的斗争，光提一个支持进步派的口号是不适当的。我們的任务是推进民主的高潮，培养正在新的俄国以新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新的革命民主派。如果这个革命民主派不能违反自由派的意願而得到巩固和胜利，那末，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任何“胜利”都不能使俄国的局势在实际有任何重大的改变。

民主高潮已經来到了，这是无可爭辯的。这个高潮的来到比我們所希望的要困难一些，慢一些，复杂一些，但是已經来到了。应当通过选举和其他各种工作来“支持”和推进这个高潮。組織革命民主派，——通过对民粹派的取消主义和对民粹派的召回主义进行无情的批評，締造一个共和派的农民政党，——而首先最应当做的是清洗“自己家里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加强在无产阶级中間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巩固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这就是我們的任务。正在发展着的革命危机将如何結局，这不取决于我們，而取决于千百种原因，取决于亚洲的革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但是，坚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却要依靠我們，也只有这种工作永远不会白做。

載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反党的取消派

各种色彩的取消派在俄国合法的报刊上攻击党的代表会议，这种攻击的极端无耻，連布尔加林和布勒宁之流⁹都会自叹不如。“活的事业报”上的文章公开質問代表們是誰派来的，并且在書报检查机关的保护下，攻击那些无法在合法报刊上捍卫的东西。这些文章是忘記起碼的写作誠实原則的标本，它們不仅会引起代表会议拥护者的反对，而且会遭到所有正直的政治家的鄙視。而《Vorwärts》¹⁰上匿名报道人的文章却有一股厚着脸皮吹嘘和用空話騙人的气味，毫無疑問，这些文章是取消派向一位老手預約的^①。

然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取消派的团体和小组不仅仅限于对党大肆誣蔑。他們企图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当然，他們用尽了种种办法，要把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組委会¹¹打扮成有“党性”、“非派別活动”和“团结”的样子。因为用这些話来叫所有因某些緣故而对党代表会议不滿的人上取消派的当……那是太方便了。他們委托托洛茨基来歌頌組委会和即将举行的取消派代表会议的种种德行：除了“职业的团结家”以外，还有誰可以委托呢？于是托洛茨基就歌頌起来……用了維也納印刷所里所有的鉛字：“前进派、呼

① 为了讓德国同志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真相，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出版了一本德文的小册子，其中順便揭露了《Vorwärts》的匿名作者所用的手法（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77—489頁）。——編者注

声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所谓取消派和无派别分子（俄国国内的和国外的）都坚决支持”组委会的“工作”……（“真理报”¹²第24号）

可怜的人兒又在……撒謊，而且又打錯了算盤。为了反对1912年的代表會議而张罗起来的以取消派为领导的联盟，現在已經土崩瓦解，因为取消派的尾巴露得太明显了。波兰人拒絕参加組委会。普列汉諾夫同組委会的代表通信以后，弄清了几个有趣的細节：（1）代表會議預定为“成立性的”會議，就是說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會議，而是一个新党的代表會議，（2）作为召开这次會議的基础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則，（3）“代表會議由取消派召开”。在普列汉諾夫同志弄清了这些情况以后，我們对于所謂布尔什维克（?!）調和派鼓起勇气，决定揭露托洛茨基，說他……把他們算做組委会的拥护者是在撒謊等等，已經不感到奇怪了。“这个組委会現在的成員，有一种很明显的趋向，硬要全党采取組委会对取消派所采取的态度，他們所确定的补充組委会成員的原則，是組織上的无政府主义原則，这个組委会絲毫也不能保証召开一个真正全党的代表會議”——我們那些鼓起勇气的“护党分子”現在是这样評論組委会了。我們那些左派当中的左派，前进派，过去急急忙忙地表示自己同情組委会，他們現在到哪里去了，我們不知道，但这也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組委会所召开的代表會議的取消派性質，已被普列汉諾夫万分清楚地确定了，“調和派”这些国家的要人們應該在这个事实面前低头了。剩下的还有誰呢？明显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

这个联盟的基础很清楚：取消派有充分的自由“依旧”在“活的事业报”和“我們的曙光”杂志上推行自己的路綫，托洛茨基則从国

外用非常革命的詞句来掩护他們，而这些詞句他講起来既不費什么气力，对取消派又无任何約束力。

国外那些为統一而唉声叹气、最近办起巴黎小报“护党报”¹³的人們，从这个事件里可以吸取一个小小的教訓。要建設党，光会叫喊“統一”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政治綱領，政治行动的綱領。取消派、托洛茨基、前进派、波兰人、布尔什維克(?)护党派、巴黎的孟什維克等等的联盟是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敗的，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則、虛伪、說空話上面的。那些唉声叹气的人倒不妨給自己解答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問題：他們希望同誰統一？如果是同取消派，那为什么不直率地講出来；如果他們反对同取消派統一，那又为了什么样的統一叹气呢？

一月代表會議和它所选出的机构，是目前能够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的全体工作人員真正团結起来的唯一机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外，剩下的只是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要召开組委会的取消派代表會議的諾言，以及被取消派灌醉了、酒醒以后正在头痛的“調和派”。

載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紀念赫爾岑

赫爾岑誕生一百周年了。全俄國的自由派都在紀念他，可是又小心翼翼地迴避嚴重的社會主義問題，費盡心機地掩蓋革命家赫爾岑與自由主義者的不同之處。右派報刊也在悼念赫爾岑，但是撒謊騙人，硬說赫爾岑晚年背棄了革命。至於僑外的自由派和民粹派紀念赫爾岑的言論，則滿篇都是些花言巧語。

工人的政黨應當紀念赫爾岑，當然不是為了講些庸俗的頌詞，而是為了闡明自己的任務，為了闡明這位在俄國革命的準備時期起了偉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歷史地位。

赫爾岑是屬於19世紀前半期貴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國貴族中間產生了比朗和阿拉克切也夫之流，產生了無數“酗酒的軍官，暴徒，賭徒，鬧集市的好漢，養獵犬的闊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想入非非的馬尼洛夫之流。“但是在他們中間，——赫爾岑寫道，——也出現了12月14日的人物，出現了象羅穆爾和烈姆那樣由乳養大的一大群英雄……這是一些從頭到腳用純鋼鑄成的英雄，是一些奮勇的戰士，他們自覺地赴湯蹈火，力求喚醒年輕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淨在劊子手和奴才中間生長起來的子弟身上的污垢。”¹⁴

赫爾岑就是這些子弟中的一個。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喚醒了他，並且把他“洗淨”了。他在19世紀40年代農奴制的俄國，竟能

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領会了黑格尔的辯証法。他懂得辯証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費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第一封“自然研究通信”——“經驗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現代經驗論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現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經走到辯証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敗之后就陷入了精神破产的状态。赫尔岑当时已經离开俄国，直接观察过这次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資产階級民主派以及尙未脫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們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美妙詞句和善良願望。

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破产，他的深厚的怀疑論和悲觀論，是表明資产階級的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資产階級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階級的革命性尙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現在那些用花言巧語宣揚赫尔岑的怀疑論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的俄国自由主义空談家中的騎士們沒有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1905年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伟大称号的騎士們那里，怀疑論就是从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到趋炎附勢、卑鄙齷齪、穷凶极恶的自由主义的轉化形式，这种自由主义在1848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毀的皇朝，向拿破仑第

三鼓过掌，正是这种自由主义遭到过赫爾岑的咒罵，尽管他还没有識破它的階級本質。

在赫爾岑那里，怀疑論是从“超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階級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階級斗争的轉化形式。赫爾岑在1869年即逝世前一年写給巴枯宁的几封“致老友書”就是証明。赫爾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了。誠然，赫爾岑把这种决裂还只是看作策略上的意見分歧，而不是看作相信本階級定会胜利的无产者的世界觀同絕望的小資產者的世界觀之間的一道鴻沟。誠然，赫爾岑在这里又重复了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詞句，說什么应当“同样地向工人和雇主、农夫和小市民宣传”社会主义。但是，赫爾岑与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視綫并不是轉向自由主义，而是轉向国际，轉向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轉向已經开始“集合”无产階級“队伍”、团結“抛弃了不劳而获者的世界”的那个“劳工世界”的国际！¹⁵

赫爾岑既然沒有了解1848年全部运动以及馬克思以前各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民主实質，也就更加不能了解俄国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赫爾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創始人。赫爾岑把农民連帶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發揮了无数次。

其实，赫爾岑的这一学說，也象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現时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沒有絲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象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农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性的美妙

詞句和善良願望。1861年农民得到的土地愈多，得到的土地愈便宜，农奴主地主的权力也就会破坏得愈厉害，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也就会愈迅速，愈自由，愈广泛。“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願望的表现而已。

1905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农民（“劳动派”和“农民协会”）力求用各种方式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直到“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正是以业主资格，以小企业家资格进行斗争的。

现在争论什么地权的“社会主义性”等等，这只能模糊和掩盖真正重要而严肃的历史问题，即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的差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这次革命中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义倾向的问题。如果我们看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看词句，如果我们把阶级斗争当作“理论”和学说的基础来研究，而不是相反的话，那末，赫尔岑的“钟声”杂志¹⁶所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¹⁷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上写给绞手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留波夫、謝尔

諾-索洛維也維奇是新一代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們責備赫爾岑從民主主義向自由主義的這種退却，這是萬分正確的。可是，平心而論，赫爾岑雖然常在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動搖不定，民主主義畢竟還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風。

有一個極其卑鄙無恥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卡維林，他先前由於“鐘聲”雜誌帶有自由主義傾向而大加贊賞，但是後來他反對憲法，攻擊革命鼓動，反對“暴力”，反對號召使用暴力，開始宣傳忍耐，這時候赫爾岑就同這位自由主義的哲人決裂了。赫爾岑抨擊了卡維林為了“替玩弄自由主義手腕的政府暗中策劃”而寫的那篇“空洞的、荒謬的、有害的雜文”，抨擊了卡維林硬說“俄國人民蠢如牛，政府則聰明絕頂”的那些“充滿政治感傷的警句”。“鐘聲”發表過一篇以“祭文”為題的文章，這篇文章痛斥了“那些力圖用自己高傲而淺薄的思想迷惑青年的教授，那些一度表現仁慈寬厚、後來看見健全的青年不會同情他們的腐敗思想就勃然大怒的退職教授”。卡維林一讀到這篇文章，就知道是說的自己。

當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時，卑鄙的自由主義者卡維林寫道：“逮捕並不使我感到憤慨……革命政黨認為可以採取一切手段來推翻政府，政府也就採取一切手段來自衛。”赫爾岑在談到審判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時候，正好答復了這位立憲民主黨人：“這裡有一些可憐的人，草木一樣的人，軟體動物一樣的人，却說不應當咒罵這一伙統治我們的強盜和敗類。”

當自由主義者屠格涅夫私人上書亞歷山大二世，表示忠於皇朝，並且捐了兩個金幣來慰勞那些因鎮壓波蘭起義而受傷的兵士時，“鐘聲”雜誌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聖女瑪格達琳娜（男性）上書皇上，陳訴她夜不成眠，焦慮皇上不知道她誠

心忏悔”。屠格涅夫一看就知道是說的自己。

当所有俄国的自由派狐群狗党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辯护而紛紛离开他时，当整个“上流社会”弃絕了“鐘声”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仍然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劊子手、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給屠格涅夫說，“我們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大多数的奴才們的非难。”

当有消息說一个农奴打死了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赫尔岑就在“鐘声”杂志上补充說：“干得好！”听说沙皇政府准备派遣軍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就会登上罗曼諾夫皇朝的宝座。”当雷帖尔恩上校不願做劊子手的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1860年），赫尔岑写道：“如果真要开枪，那就应该对准那些命令枪杀手无寸鉄的人的將軍們开枪。”当別茲得納村的50个农民被杀死，而他們的首領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极刑的时候（1861年4月12日），赫尔岑在“鐘声”杂志上写道：

“呵，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願我的話能够传入你們的耳鼓！……我要教导你們鄙視彼得堡的圣教局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們的那些牧师…… 你們恨地主，恨官吏，怕他們，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們还相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們吧。沙皇是跟他們一道的，他們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們現在認識他了，你們是別茲得納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們是平茲城被杀老人的子弟…… 你們的首領也同你們一样无知，也同你們一样貧穷…… 为了你們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別茲得納村的安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們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四十八种奇迹，向他們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們时刻紀念着他們，这就能創造出一种奇迹——获得解放。”

由此可見，那些藏身于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主義者，只頌揚赫爾岑的弱點而隱瞞他的優點，這種對赫爾岑的誣蔑該是多麼卑鄙無恥。赫爾岑不能在40年代的俄國內部看見革命的人民，這並不是他的過錯，而是他的不幸。當他在60年代看見了革命的人民時，他就無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來反對自由主義了。他進行鬥爭是為了使人民戰勝沙皇制度，而不是為了使自由資產階級去勾結地主沙皇。他舉起了革命的旗幟。

我們紀念赫爾岑時，清楚地看到先後在俄國革命中活動的三代人物、三個階級。起初是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狹小的。他們同人民的距離非常遠。但是，他們的事業沒有落空。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赫爾岑。赫爾岑展開了革命鼓動。

響應、擴大、鞏固和加強了這種革命鼓動的，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從車爾尼雪夫斯基到“民意黨”的英雄。戰士的圈子擴大了，他們同人民的聯繫密切起來了。赫爾岑稱他們是“未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但是，這還不是風暴本身。

風暴是群眾自身的運動。無產階級這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起來領導群眾了，並且第一次喚起了千百萬農民進行公開的革命鬥爭。第一次風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風暴正在我們眼前開始增長。

無產階級紀念赫爾岑時，以他為榜樣來學習了解革命理論的偉大意義；學習了解，對革命的無限忠心和向人民進行的革命宣傳，即使在播種與收穫相隔幾十年的時候也決不會白費；學習判定各階級在俄國革命和國際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這些教訓的無產

階級，一定会給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帝制这个蠢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自由的俄罗斯言論向群众号召、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蠢贼的第一人。

載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3 000 万农民的飢荒，把俄国农民状况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通常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人们往往忽略了主要的东西，即大地主（主要是贵族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同农民状况的对比关系。我们现在想请读者注意的正是这个主要的东西。

1907 年内务部公布了“1905 年土地占有统计”。根据这个无论怎样也不会被认为是偏袒农民的官方材料，可以相当确切地了解到飢荒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府的统计确定欧俄 50 个省的土地共有 39 500 万俄亩。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真实的情况，因为其中包括极北部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奥洛涅茨省及沃洛果达省的 1 亿俄亩以上的官地在内。这些土地大部分不适于农业；这些都是极北部地区的苔原和森林地带。通常把这些土地计算在内，只是为了掩盖适于农业的土地的实际分配情况。

减去这部分土地后，可耕地总数为 28 000 万俄亩（按整数计算）。其中私有地占 10 100 万俄亩，份地占 13 900 万俄亩。应该把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分开。

关于大地产，政府统计作了如下的报道：

欧俄个人私有的地产

占有面积	占有者	土地面积 (单位俄亩)	每个占有者的 平均占有数 (单位俄亩)
500—2 000 俄亩	21 748	20 590 708	947
2 000—10 000 俄亩	5 386	20 602 109	3 825
10 000 俄亩以上	699	20 798 504	29 754
总 计	27 833	61 991 321	2 227

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因为其中既不包括皇室土地，也不包括大商业公司等等的土地。但是，我们从这些材料中仍然能够知道俄国地主占有土地的主要情况。700个地主拥有土地2100万俄亩，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地主平均有3万俄亩。

不到28000个地主，却拥有土地6200万俄亩，也就是说，每个地主平均拥有2200俄亩。这里必须加上皇室土地——共计600万俄亩以上。其次，350多万俄亩土地属于272个“工商业、工厂及其他”团体。这无疑是大地产，——其主要部分集中在皮尔姆省；在这里，差不多有150万俄亩土地（确数是1448902俄亩）属于9个这样的团体。

因此，总计起来，属于最大地主的土地决不会少于7000万俄亩，而一定会多于7000万俄亩。这种大地主，为数不到3万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根据政府的统计材料，份地最少的农民拥有份地的情况如下：

份 地			
份地面积	农 户	土地面积 (单位俄亩)	每个农户的 平均占有数 (单位俄亩)
5 俄亩以下.....	2 857 650	9 030 333	3.1
5—8 俄亩.....	3 317 601	21 706 550	6.5
8—15 俄亩.....	3 932 485	42 182 923	10.7
总 计	10 107 736	72 919 806	7.0

可見，1 000 萬農戶（在將近 1 300 萬農戶總數中）只有 7 300 萬俄畝土地。平均每戶 7 俄畝。這裡應當加上小的私有地產：10 俄畝以下的土地占有者為 409 864 戶，他們共有土地 1 625 226 俄畝，每戶不到 4 俄畝。因此，將近 1 050 萬農戶只有土地 7 500 萬俄畝。

現在我們可以把在討論農民問題時常常被忘記或了解得不正確的這些基本材料綜合起來：

大地主的土地占有情況是：3 萬個地主擁有 7 000 萬俄畝土地。

小農的土地占有情況是：1 050 萬戶小農擁有 7 500 萬俄畝土地。

當然，這是总的材料。為了更詳細地研究農民的狀況和大地產的意義，應該收集不同的地區的材料，有時甚至要收集個別省份的材料。然而，無論政府的或自由派的經濟學家，甚至一部分民粹派的經濟學家，往往總是拿個別地區或問題的個別方面來掩蓋土地問題的實質。為了弄清楚土地問題和農民狀況問題的根本意義，就不應該忽視上述基本材料，也不容許以局部的東西來掩蓋基本的東西。

我們將在下面一篇文章^①里援引一些這種掩蓋問題實質的實例。現在我們可以作出第一個基本結論。歐俄的土地分配情況如下：擁有 500 俄畝土地以上的最大地主共有 7 000 萬俄畝土地，而他們的人數卻不到 3 萬人。

絕大多數農民，即 1 300 萬農戶總數中的 1 050 萬戶，一共只

^① 見本卷第 58—62 頁。——編者注

有 7 500 万俄亩土地。

每个最大地主的地产平均为 2 200 俄亩。每户小农的土地平均为 7 俄亩。

如果 3 万个最大地主的土地转到 1 000 万农户手中，那末这些农户的土地就几乎可以增加一倍。

这种土地分配情况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形成怎样的经济关系，我们下次再谈。

载于 1912 年 5 月 6 日

“涅瓦明星报”第 3 号

署名：尔·西林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

第四届杜馬的选举运动带来了一些活跃景象，并且提高了人們对政治问题的兴趣。連納事件所激起的广泛运动使这种活跃景象更加明显，使这种兴趣更加浓厚。現在我們来討論劳动派即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的关系问题，比任何时候都要适宜一些。

沃多沃佐夫先生为了回答我在“明星报”¹⁸上发表的文章“自由主义和民主派”^①，他在“劳动团和工人政党”（“生活需要”杂志第17期）一文中阐述了劳动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爭論涉及到代表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利益的两个政治派別的本質。因此，一切民主派分子都应该最密切地注意这次爭論的问题。

工人民主派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雇佣工人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固定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状况与小业主、农民阶级的状况根本不同。因此談不到把二者結成一个政党。

工人的目的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来废除雇佣奴隶制。农民的目的是要实现民主要求，这些要求能够消灭农奴制及其一切社会基础和表现，但是根本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的統治。

^①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510—518頁。——編者注

工人和农民的共同任务正在使目前俄国的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互相接近起来，他們虽然不能不分道揚鑣，但是为了取得胜利，是能够采取也应该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一切违反民主主义的现象的。如果这种一致行动或共同行动不能实现，如果农民民主派不能摆脱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监护，那就谈不上俄国真正的民主改革。

这就是我在以“自由主义和民主派”为题的两篇文章中阐述的工人民主派即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劳动派想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沃多沃佐夫先生闡明了他們的观点。按照他們的信念，一个政党“完全可以为三个社会阶级的利益服务”，这三个阶级就是农民、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

我說，这种“信念”违反（1）經濟科学的全部真理，（2）经历过俄国現時这样的时期的国家的一切經驗，（3）俄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时期——1905年的經驗。我嘲笑了真正立宪民主党人的“包罗”各个阶级的野心，同时提起了立宪民主党人把馬克拉柯夫之流的先生們称做“劳动知识分子”的事。

沃多沃佐夫先生把我的論据断章取义，企图鑽空子反駁。例如，他反駁第1条論据說：“农民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群众；他們的利益就是劳动的利益，因此，他們組成了劳动大軍的一支队伍，正象工人組成了劳动大軍的另一支队伍一样。”

这不是馬克思主义的經濟科学，而是资产阶级的經濟科学，因为在这里小业主同雇佣工人的状况的根本差别，被所謂劳动利益的空話掩盖了。工人沒有任何生产資料，他們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双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农民有生产資料——农具、牲畜、自

己的或租佃的土地，并且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他们是小业主、小企业家、小资产者。

俄国农民现在至少雇用 200 万农业雇佣工人为自己干活。如果全部地主土地无偿地转归农民所有，农民就会雇用更多的工人。

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是全体农民、全体雇佣工人、全体民主派的共同利益，因为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地主政权的基础，是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第二和其他“第三届杜马代表”、民族主义党人、十月党人等等使俄国深深体会到的那种地主政权的基础。

由此可见，农民和工人现在的共同目的，丝毫也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与不学无术的黑帮分子、有时也与自由派分子的意见相反的。他们的共同目的只是实现民主要求。达到了这个目的，俄国就获得了自由，但是还消灭不了雇佣奴隶制。

为了认真安排不同阶级的一致行动，为了使这种行动取得真正巩固的成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在哪些地方是一致的，在哪些地方是分歧的。这方面的任何错误、“误解”以及用空话掩盖事实的一切做法，不能不带来极大的危害，不能不破坏我们的成就。

二

“农业劳动和工厂劳动不同；但是，工厂劳动和小店铺里的店员的劳动也不同，而‘明星报’却竭力向店员证明，他们跟工人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应该把社会民主党看做自己的代表……”

沃多沃佐夫先生就是这样来反驳小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这个论据的！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议论在这里也充满了通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臭味。小土地占有者同工厂

主、小手工业主或小商人属于一个阶级；他们的差别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别。农业雇佣工人同工厂或商业的雇佣工人属于一个阶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起码的真理。沃多沃佐夫先生以为，只要他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极端简单化的”，他就可以掩盖问题的实质，掩盖劳动派常常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转向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迷误。他的这种想法只是妄想而已。

沃多沃佐夫先生试图用有时几个政党代表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代表几个阶级的说法来驳倒我所引证的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关于小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他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糊涂观点。在欧洲，工人有时跟着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走，跟着教权派走，等等。地主有时也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政党里。

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除了阶级的差别以外，还有宗教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差别影响着各个政党的组成。

这个事实不错。但是，它同我们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呢？沃多沃佐夫先生是否指出了俄国除了阶级差别之外还有哪些宗教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特殊历史条件同我们现在的争论有关呢？

沃多沃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指出而且也不可能指出这样的条件。争论仅仅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为三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超阶级的”政党（同时把“劳动知识分子”看做一个阶级也是可笑的）。

理论对这个问题的作了明确的回答：不可能！1905年的经验也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1905年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极重要的转变时

期，当时一切阶级的、集团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差别，都通过极公开极广泛的行动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出来。1905年的经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证明了在俄国建立农民和工人的统一政党是不可能的。

所有三届杜马也证明了这一点。

借口说欧洲各国有时是一个阶级分成几个政党或者是几个阶级在一个政党领导下联合起来，这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沃多沃佐夫先生只是想用这个借口回避（并且企图使读者回避）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俄国民主派要想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力量，冷静地观察局势的发展，明确地知道自己能够依靠哪些阶级。迷恋于幻想，用空话掩盖阶级差别，靠善良的愿望逃避阶级差别，这都是极端有害的。

应该坦白承认，俄国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纠纷，这种纠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市場統治的范围内是无法避免的。应该坦白承认，目前他们的利益在哪些方面是一致的。应该联合每个阶级，团结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意识，从而确定这个共同任务。

组织一个“激进的”（我引用了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说法，虽然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农民政党是有益的，必要的。

企图建立一个“超阶级的”政党，企图使农民和工人结成一个政党，企图把并不存在的所谓“劳动知识分子”看做一个单独的阶级，对于争取俄国的自由是极端不利、极端有害的，因为这些企图除了使人悲观失望、丧失力量、认识模糊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我们完全同意建立一个彻底民主的农民政党，我们必须同上

述种种企图进行斗争。工人还必须起来反对自由派对民主的农民的影响。

三

关于自由派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对劳动派的关系，劳动派代表会议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说明¹⁹。劳动派显然不懂得，1905—1906年的解放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民主的农民依附了自由派，他们也不懂得，如果农民的广大领导阶层不了解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不摆脱自由派的监护和统治，这次解放运动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沃多沃佐夫先生谈到了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但是谈得极其肤浅，不能令人满意。他说，“立宪民主党主要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对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根源和政治作用做出这样的论断是根本不恰当的。

立宪民主党是保皇派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党。这个党的社会基础（同“进步派”一样）是经济上比较进步的（同十月党人比较）一些资产阶级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现在还追随着这个政党，只是由于他们的传统（即简单的习惯、盲目的因循）以及直接接受了自由派的欺骗。

立宪民主党人自称民主派，这是在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的自由派。

俄国的全部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和1905—1906年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路标”文集²⁰尤其明确、清楚、彻底地表明了这一点，揭穿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的外交家们无论怎样为“路标”提供“附带说明”，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即 20 世紀的头 10 年表明，广大群众虽然倾向于民主派，但是还没有充分的觉悟，还弄不清自由主义同民主主义的區別，还屈从于自由派的领导。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改变。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谈不上什么俄国的民主改革，因为这都是空谈。

沃多沃佐夫先生是怎样来反驳我的文章所依据的前提呢？他写道：“劳动派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过多地谈论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是非常不机智的(!!)……”

你看，这同“机智”有什么关系呢？这同“过多”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确实是反革命的自由派，那就应该说实话。至于谈论反革命的右派和反革命的自由派时，应该多谈还是少谈，这并不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一个政论家每当谈到右派和自由派的时候，他必须说实话。关于右派，劳动派说了实话。因此我们称赞他们。关于自由派，劳动派自己已经谈起来了，但是还没有清清楚楚地把实话谈出来！

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责备劳动派。

谈的“过多”还是过少，这丝毫没有关系。即使劳动派关于右派谈了一千行字，而关于自由派只谈了五行字，我们也不反对。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反对劳动派的。我们反对的是，在这“五行”字里（——埋怨你自己吧，沃多沃佐夫先生！因为是你争辩中提出“过多”这个不恰当的字眼的）关于自由派什么实话也没有谈。

沃多沃佐夫先生实际上躲避回答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

劳动派回避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错误，这说明一部分民主派和

一部分从前的馬克思主义者 实际上 还没有 摆脱 自由主义。

这个問题是 20 世紀头 10 年的全部历史必然要提出来的。

目前，在俄国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中，新的 民主主义因素正在普遍增长。这是事实。应该在这些因素增长的时候，把它们培养成 彻底的 民主主义。如果不揭露自由派的真正本質，这种培养就无法进行。因为自由派掌握了几百个机关报刊和 100 个杜馬代表的席位，常常用 虛伪的 民主主义傾向影响一些人，这些人的数目比我們的宣传所能影响的要多得多。

民主派应当把自己的力量团結起来。我們会始終称贊劳动派在談到右派时所发表的民主言論。但是，如果他們談到自由派时，不用无愧于民主派的語言，而用 自由派的口吻，那末，他們的民主主义就是不彻底的。

参加竞选斗争的不是两个陣营而是三个陣营。劳动派的先生們，不要把第二个（自由派的）陣营同第三个（民主派的）陣营混淆起来。不要把它們之間的差別掩盖起来——对于这件恶劣的事情，自由派分子是关心得“过多”了。

載于 1912 年 5 月 8 日和 9 日

“真理报”第 13 号和第 14 号

署名：普·普·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論 俄 國 各 政 黨

國家杜馬的選舉迫使各政黨加強鼓動，集合力量，以求“自己的”黨的代表能夠多多當選。

同時，在我國，也象在其他各國一樣，極不體面的廣告式的競選活動正在開展。各資產階級政黨，即那些保護資本家經濟特權的政黨，極力吹噓自己的黨，正如各個資本家吹噓自己的商品一樣。只要看一下任何一張報紙的商業廣告，你就可以看到，資本家為自己的商品想出了種種最“動聽”、最響亮、最時髦的名稱，他們厚著臉皮，不惜百般撒謊捏造來大吹特吹自己的商品的優良。

人們，至少是各大城市和各商業地區的人們，早已看慣了這種商業廣告，知道它的價值。可惜，政治廣告能迷惑更多的人民，揭穿它要困難得多，這裡的欺騙要巧妙得多。政黨選擇名稱，無論在歐洲或在我國，常常直接抱著廣告目的，政黨制定“綱領”，也往往專門為了欺騙群眾。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政治自由愈多，民主程度即人民和人民代表的權力愈大，政黨的廣告式的宣傳也往往愈恬不知恥。

在這種情況下，怎樣來辨明政黨鬥爭中的是非呢？這種帶有廣告欺騙性質的鬥爭，是否說明代議機關、議會、人民代表大會根本無益而且有害，象頑固的反動分子、代議制的敵人極力要人們相信的那樣呢？否。沒有代議機關，欺騙、政治訛詐和各種騙人的勾

当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騙局、探尋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

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說的話，而是研究它們的行動，研究它們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問題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

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愈多，它的代議机关愈健全、愈民主化，人民群众就愈容易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愈便于学习政治，即愈便于揭穿騙局和探尋真相。

任何一个社会分化成各种政党的情形，都是在震动全国的深刻危机发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政府不得不在社会各阶级中寻找支柱；严重的斗争会扫除各种空話以及一切細微末节和偶然成分；各政党会竭尽全力向人民群众表白，而有公开斗争經驗的群众则会根据正确的本能，跟着代表这个或那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走。

这种危机时代总是决定着—国社会力量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間的党派分化情形。例如在德国，这种危机是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在俄国，这种危机是1905年的事变。不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事变，就不能了解我国各政党的实质，就不能認清俄国各政党代表的是哪些阶级。

在这篇簡述俄国各政党的文章中，我們先从最右的政党說起。

我們看到在极右翼方面的是俄罗斯人民同盟。

这个党的綱領在亚·伊·杜勃洛文所出版的俄罗斯人民同盟公报“俄罗斯旗帜报”上是这样說明的：

“俄罗斯人民同盟遵奉皇上1907年6月3日圣諭，应成为皇朝忠实的支

柱，在遵守法律秩序方面應處處成為可供大家效法的榜樣，茲特宣布，為了實現皇上的意旨，必須：（1）充分發揮與按教規建立的俄國正教會血肉相連的沙皇專制制度的權力；（2）保證俄羅斯族不僅在內地而且在邊遠地區占統治地位；（3）保證純粹由俄羅斯人組成的國家杜馬的存在並使之成為皇上在從事國家建設方面的主要助手；（4）完全遵循俄羅斯人民同盟對待猶太人的基本原則；（5）革除一切反對沙皇專制政權的官吏的職務。”

我們把右派這篇莊嚴的宣言一字不改地照抄下來，一方面是為了使讀者能直接看到原文，另一方面是因為這裡所闡述的基本主張，正是在第二屆杜馬中占多数的各個政黨即“民族主義黨人”和十月黨人所擁護的。這從以下的說明中可以看出來。

俄羅斯人民同盟的綱領，實際上重復着農奴制時代的舊口號——正教主義、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在談到通常用來區別俄羅斯人民同盟與跟着它走的各個政黨的那個問題，即承認還是否認在俄國國家制度中必須實行“立憲”原則時，必須特別指出，俄羅斯人民同盟絲毫不反對一般代議機關。從上面所引的綱領中可以看出，俄羅斯人民同盟是主張國家杜馬作為“助手”而存在的。

杜勃洛文分子說明了俄國所謂“立憲”的特點，而且說得很正確，即與實際情況相符合。無論民族主義黨人或十月黨人，他們在實際政策方面都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的。這些政黨在“立憲”問題上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字面上的爭論；“右派”並不反對杜馬，只是特別強調它應當成為“助手”，而絲毫不確定它的權利；民族主義黨人和十月黨人也不堅持任何嚴格規定的權利，更不想有實現權利的實際保障。所以十月黨內的“立憲派”也就在六三憲制的基础上同“反立憲派”相處得很融洽。

在黑幫派的綱領中，赤裸裸地、明確地規定了摧殘一般異族人特別是猶太人的政策。他們在這裡也象平常一樣，把其他政府黨

多少“羞羞答答”不敢宣揚出来或是用外交手腕隱藏起来的事情更粗暴地、更无顧忌地、更横蛮地直說了出来。

其实，凡是多少了解一点第三届杜馬的活动，多少了解一点“新时报”、“光明报”和“莫斯科呼声报”²¹一类报刊的人，都知道民族主义党人和十月党人也一样参与执行摧残异族人的政策。

試問，右派政党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哪个阶级？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回到农奴制的口号上去，捍卫俄国生活中一切中世紀的旧东西，完全滿足于六三宪制即地主宪制，保护貴族和官吏的特权，——这一切都对本問題作了明确的回答。右派是农奴主地主的政党，是貴族联合会的政党。所以这个联合会也就在解散第二届杜馬、修改选举法以及在六三政变中起了很重大的作用，甚至起了领导的作用。

为了說明这个阶级在俄国拥有的經濟实力，只須举出由政府当局即內务部公布的1905年土地統計表中的数字所証实了的一件基本事实。

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人数不到3万的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份地最少的1000万个农户的全部土地也只有这样多。每个大地主平均約有2300俄亩土地；而每个貧苦农户只有7俄亩土地。

农民靠这种“份地”决不能維持生活，只会逐漸死亡，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每次歉收，都有千百万人忍飢挨餓（比如今年的飢荒），这使俄国农民經濟不断遭到破坏。农民只得以各种工役形式向地主租佃土地。农民用自己的馬匹和农具替地主干活，作为租地的代价。这仍然是徭役制，不过不正式称为农奴制罢了。

地主的 2 300 俄亩土地，大部分只能用盤剝方式，用工役即徭役方式經營，只有很少一部分才雇工經營。

其次，國家絕大多數高級和中級官吏都出身于這個貴族地主階級。俄國官吏的特權是地主貴族的特權和土地權力的另一方面。由此可見，貴族聯合會和“右派”各政黨堅持農奴制舊傳統的政策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並不是出于個人的“惡意”，而是由一個極強大的階級的利益所驅使。舊的當權階級，即地主余孽，仍然是當權階級，並且建立了相應的政黨。這個黨就是“俄羅斯人民同盟”或國家杜馬和國家參議院中的“右派”。

但是，既然有代議機關存在，既然群眾已公開走上政治舞台，象他們在 1905 年所作的那樣，每個政黨也就必須在某種限度內向人民表白。而右派各黨又能向人民表白些什麼呢？

當然，公開說保護地主利益是不行的。于是就說什麼保存一般舊東西，拚命燃起不信任異族人特別是猶太人的心理，引誘那些最不開展最愚昧的人去蹂躪、摧殘“猶太佬”，竭力用俄羅斯人受異族人“壓迫”的說法來掩蓋貴族、官僚和地主的特權。

“右派”政黨的情形就是如此。它的黨員普利什凱維奇，第三屆杜馬中最著名的右派演說家，煞費苦心而且很有成效地向人民表明了右派所要求的是什麼，他們怎樣活動，他們為誰服務。普利什凱維奇真是一個天才的鼓動員。

與在第三屆杜馬中占 46 席的“右派”並列的，是占 91 席的“民族主義黨人”。他們同右派的差異很小，實質上，這並不是兩個政黨，而是在攻擊異族人、“立憲民主黨人”（自由派）和民主派等方面分“工”合作的一個政黨。他們干着同樣的事情，不過作法粗細略有不同罷了。讓那些慣于干各種丑事和暴行，慣于殺害格爾岑施

坦、約洛斯和卡拉瓦也夫們的“極”右派站開一點，讓他們好象是從右面來“批評”政府，這對政府是有利的…… 右派和民族主義黨人的區別，並不能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十月黨人在第三屆杜馬中占 181 席，其中當然包括“右派十月黨人”。十月黨人的現行政策與右派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他們與右派不同的地方，在於這個黨不僅為地主服務，而且還為大資本家、守舊的商人，為因工人和農民覺醒過來要求獨立生活而惶恐不安以至完全轉到捍衛舊制度的立場上去的資產階級服務。俄國有不少資本家，他們完全象地主對待先前的農奴那樣對待工人；他們把工人和店員當作下賤的奴仆看待。誰也不能比右派政黨、民族主義黨人和十月黨人更會保護這種舊制度了。還有一些資本家，他們雖然在 1904 年和 1905 年舉行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代表大會上要求“立憲”，但是他們為了反對工人，總是甘願維持六三憲制。

十月黨是地主和資本家的主要反革命政黨。這是第三屆杜馬的領導黨：181 個十月黨人與 137 個右派分子和民族主義黨人合在一起，就組成了第三屆杜馬中的相當大的多數。

1907 年 6 月 3 日的選舉法保證了地主和大資本家在杜馬中占多數；在選舉杜馬代表的一切省選舉大會上，都是地主和第一城市選民團（即大資本家選民團）的復選代表占多數。在 28 个省選舉大會上，甚至地主復選代表独占多數。六三政府的全部政策都是在十月黨幫助下實行的，第三屆杜馬的一切罪惡都應由該黨負責。

在口頭上，在自己的綱領中，十月黨人主張“立憲”，甚至主張有……種種自由！在實際上，這個黨擁護一切反對工人（例如保險

法案，——請回憶一下杜馬工人問題委員會主席齊仁高金男爵當時的態度吧！）、反對農民以及反對限制專橫壓迫的措施。十月黨人和民族主義黨人一樣，都是政府黨。這種情況並不因為十月黨人有時（特別是在選舉以前！）發表“反政府的”言論而有絲毫改變。凡是有議會的地方，老早就已經看到而且現在也經常看到資產階級政黨玩弄這種反政府的把戲，這種把戲對於他們沒有害處，因為任何政府都不會認真看待它，而且有時在需要用反政府的態度加以“籠絡”的選舉人面前，這種把戲還不無益處呢。

但是，玩弄反政府把戲的專家和能手却是第三屆杜馬中的主要反對派政黨即立憲“民主黨人”，也就是“人民自由”黨。

這個黨的名稱就是一種把戲，其實它根本不是民主黨，也絕對不是人民黨；它不是主張自由的黨，而是主張半自由的黨，甚至是主張四分之一自由的黨。

其實，這個黨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害怕人民運動遠遠超過害怕反動勢力。

民主派相信人民，相信群眾運動，極力幫助群眾運動，雖然他們往往錯誤地理解這種運動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的意義（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勞動派就是如此）。民主派想擺脫一切中世紀制度的願望比較真誠。

自由派害怕群眾運動，阻礙群眾運動，自覺地捍衛某些中世紀制度，而且是主要的中世紀制度，以求獲得反對群眾尤其是反對工人的靠山。自由派力求達到的目的是與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分掌政權，而決不是鏟除普利什凱維奇政權的全部基礎。民主派小資產者（包括農民和勞動派分子在內）則主張一切為人民，一切通過人民，他們真正想鏟除普利什凱維奇制度的全部基礎，但是他們不

懂得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意义。与此相反，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真正目的，则是要与普利什凯维奇分掌统治工人和统治小业主的政权。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多数或占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玩弄无聊而可耻的把戏：向右边表示忠诚，表示愿意组阁（他们说，我们能够和平解决一切矛盾，既不会使农夫品行败坏，又不会得罪普利什凯维奇），向左边表示拥护民主主义。由于玩弄这种把戏，立宪民主党人从右边终于遭到脚踢，从左边则获得人民自由事业叛徒这一公正的称号。在前两届杜马中，他们不仅一直同工人民主派作斗争，而且一直同劳动派作斗争。例如，立宪民主党人破坏了劳动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计划，破坏了那个起码的民主主义计划、初步的民主主义计划，维护了地主官僚在土地规划委员会内对农民的支配地位！

在第三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玩弄“负责反对派”即御用反对派的把戏。为了玩弄这一把戏，他们屡次投票赞成政府预算（好一个“民主派”！），他们向十月党人解释说，他们所主张的“强迫”（强迫农民）贖买的办法是没有危险的，没有害处的（请回想一下别列佐夫斯基第一所说的话），他们派卡拉乌洛夫上台去发表“虔诚的”演说，他们背弃群众运动，求告“上层”而压制下层（立宪民主党人在讨论工人保险问题时反对工人代表），等等。

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自由主义的政党。由于它野心勃勃地想充当“负责反对派”，即充当政府认可的、合法的、被准许去与十月党人竞争的反对派，不是反对六三制度而是承认六三制度的反对派，结果就把自己的“民主党人”的称号完全葬送了。罗扎诺夫和

安東尼·沃倫斯基所崇拜的立憲民主黨思想家司徒盧威和伊茲哥也夫一流先生們無耻地鼓吹路標主義思想，以及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三屆杜馬中充當“負責反對派”，這實際上是一件事物的兩面。普利什凱維奇之流認為可以容忍的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很想同普利什凱維奇并肩坐在一起。

立憲民主黨人同“進步黨人”在現今第四屆杜馬選舉時結成聯盟，這再一次証實了立憲民主黨人十足的反革命性。進步黨人一點也不想做民主派，一句話也沒有說要反對整個六三制度，根本沒有想到要什麼“普選權”。這是一個溫和的自由派，他們並不掩飾他們與十月黨人的親密關係。立憲民主黨人同進步黨人結成聯盟，應該使那些最不清醒的“立憲民主黨應聲蟲”也能看清立憲民主黨的本質。

代表俄國民主資產階級的，是具有各種色彩的民粹派，從最左的社會革命黨人起，直到人民社會黨人和勞動派止。他們都愛講“社會主義”詞句，但是覺悟的工人對於這些詞句的意義是會上當的。其實，什麼“地權”，什麼土地“平分”，什麼“土地社會化”，其中是不包含絲毫社會主義成分的。在廢除土地私有制和重新分配土地甚至最“公平地”分配土地的情況下，商品生產，市場、貨幣和資本的權力不但不會受到傷害，反而會更加擴大。凡是懂得這種道理的人，都一定明白上面這一點。

但是，關於“勞動原則”和“民粹社會主義”的詞句，也表明民主主義者深信（並且真誠地希望）能夠消滅而且必須消滅土地所有制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中世紀特權。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力圖與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分享政權和政治特權，而民粹派在目前則力求消滅而且應當力求消滅土地所有制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

一切特权，也正因为如此，民粹派才是民主主义者。

俄国极大多数农民所处的地位，使他們根本不可能設想与普利什凱維奇之流作任何妥协（在自由派看来，妥协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办到而且切实可行的）。因此，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有群众基础的，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良，普利什凱維奇执行的这种摧残农民的资产阶级政策，直到現在，除了……使 8 000 万农民挨餓以外，并没有作出任何成績来！

千百万挨餓的小业主不能不力求另一种土地改良，即民主主义的土地改良，这种改良虽然不能跳出资本主义范围，不能消灭雇佣奴隶制度，但是它能够消灭俄国一切中世纪制度。

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馬中虽然非常軟弱，但是他們代表着群众。由于小业主的阶级地位，劳动派必然在立宪民主党与工人民主派之間动搖不定，同时，由于团结、組織和教育小业主特別困难，劳动派在党性方面也就显得极端涣散。因此，劳动派在左派民粹主义者那种愚蠢的“召回主义”帮助下，就呈现出自己是个被取消了的政党的悲惨景象。

劳动派与我們的那些冒充馬克思主义者的取消派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由于軟弱而成为取消派，后者是由于居心險恶而成为取消派。工人民主派的任务，就是帮助軟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他們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团结民主派陣营去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而不仅仅反对右派分子。

关于这个在第三届杜馬中拥有自己党团的工人民主派，我們在这里只能稍微談一談。

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各地都已經建立起来，它們力求掙脫一般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学会把雇佣工人反对資本的斗争同反对

封建主义的斗争区别开来，而这样做也正是为了加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摆脱一切动摇和畏缩。在俄国，工人民主派已经完全与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划清界限，这对一般民主运动事业有莫大的益处。

工人民主派内的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活的事业报”）也具有劳动派那样的弱点，它赞美涣散性，力图做一个“被容许的”反对派，它背弃了工人领导权思想，只是空谈“公开的”组织（责骂不公开的组织），鼓吹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这一派显然是同反革命时代的那种无解状态和悲观失望情绪联系着的，它背离工人民主派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觉悟的工人什么也不会取消，他们不顾自由派的影响而团结起来，建立坚强的阶级组织，尽量发展工会以及其他各种团结形式，代表雇佣劳动去反对资本，代表彻底的民主派去反对俄国整个旧制度，反对向旧制度作任何让步。

现在我们借用 1912 年正式公布的杜马“一览”中的材料，制成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党派成分的如下图表。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党派成分

地 主：

右派	46
民族主义党人	74
独立民族主义党人	17
右派十月党人	11
十月党人	120
<hr/>	
各政府党总计	268

资产阶级:

进步党人	36
立宪民主党人	52
波兰政党联盟	11
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	7
穆斯林集团	9
<hr/>	
自由派总计	115

资产阶级民主派:

劳动团	14
-----------	----

工人民主派:

社会民主党人	13
<hr/>	
民主派总计	27
无党派人士	27
<hr/>	
总 共	437

在第三届国家杜馬中有两个多数:(1)右派和十月党人在 437 个席位中占 268 席;(2)十月党人和自由派在 437 个席位中占 235 席(120+115)。这两个多数都是反革命的。

载于 1912 年 5 月 10 日

“涅瓦明星报”第 5 号

署名:弗·伊林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关于大資本組織的調查²²

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工业經濟处作了一次关于“俄国工商业階級的社会組織”的調查——說得更确切一些，即关于大資本組織的調查。这次調查的結果，在古什卡先生²³的“俄国工商业階級的代表組織”一書(1912年圣彼得堡版)里已有說明。這本書中提供的材料以及作者所作的相当肯定的結論，都值得特別注意。

技术协会的調查其实是在資本家的“代表”組織中进行的，这种“代表”組織約占全部資本家組織的80%。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約占15%；雇主联合会約占5%；其他为証券委员会及代表大会委员会等等。后面这些組織最喜欢把自己叫做“代表”組織。它們的任务是影响政权机关。

根据古什卡先生的意見，雇主联合会同雇佣工人进行“直接的”階級斗争，代表組織則进行“間接的”階級斗争，“通过对国家政权和社会輿論施加压力的办法同其他階級进行斗争”。

这个术语当然是不正确的。我們从这个术语可以馬上发现古什卡先生以及“教授式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多数代表們所共同有的一个基本缺点。表面看来，仿佛階級斗争的概念被接受了，仿佛这一概念已被作为調查研究的基础。而实际上，这一概念被

縮小了，被歪曲了。的確，古什卡先生所得的結論就是：資本家同僱傭工人在現存政治制度範圍內所進行的鬥爭是“直接的”階級鬥爭，而為政治制度本身所進行的鬥爭却是“間接的”階級鬥爭！那末，為奪取“國家政權”所進行的鬥爭應該屬於哪一類呢？

然而關於古什卡先生“世界觀”方面的這一基本糊塗論點，我們只有找到適當機會時再談。他的著作的意義並不在於理論，而在於匯總了事實。這種包括了最主要的一類組織的材料，無論如何都是極為有趣的。

1910年俄國大資本的“代表”組織的總數為148個。其中有71個是證券協會和它們的委員會。其次是14個商業和工場手工業委員會，3個商業局，51個“聯合性”組織（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委員會、諮詢辦事處等等）及4個不固定性組織。對調查作了答復的組織共計62個，即不到一半。在51個最有趣的“聯合性”組織中，對調查作了答復的只有22個。

關於這些組織產生的時期的材料很有意思。在經過調查的32個證券委員會中，在1800到1900年的100年間產生的有9個；在1901—1904年的4年間產生的有5個；在1905—1906年的兩個革命年頭內產生的有9個；從1907到1910年產生的有9個。

古什卡先生寫道：“這裡十分明顯地表明，1905年蓬勃的社會運動，推動了資本代表自我組織的進程。”

在22個聯合性組織中，1870到1900年間產生的只有7個；1901到1904年間產生的有2個；在1905—1906年的兩個革命年頭內產生的有8個；從1907到1910年產生的有5個。所有這些由一般工業代表、採礦工業資本家、石油工業資本家等等組成的“代表大會委員會”，主要是革命時期和反革命時期的產物。

按照工业部門划分，这些組織各有如下特点。在証券委員會一类中，混合部門占优势；这些委員會通常把当地工商业的一切部門都联合起来。在商业和工場手工业委員會一类中，紡織业占第一位。在最主要的联合性組織中，差不多有一半屬於工业，而不是商业，即屬於采矿业和冶金业。

頗爰以“崇高的笔調”來說明自己所研究的事物的古什卡先生写道：“这类部門(矿厂工业和金屬工业)恰恰构成了俄国現代工业‘近卫軍’組織的經濟基础。”

这类組織的一切工商业部門的流轉額或生产額，已能确定的只有一部分組織。总計为 157 000 万卢布，其中屬於組織成員的为 131 900 万卢布。也就是說，組織起来的占 84%。8 134 个組織成員的流轉額为 112 100 万卢布，每个組織成員平均为 358 000 卢布。685 个組織成員的工人人数約为 219 000 名(作者在第 111 頁中錯誤地計算为 319 000 名)，即平均一个組織成員有工人 300 名以上。

显然，这里講的正是大資本的組織，更确切些說，甚至是最大資本的組織。古什卡先生十分明确地意識到了这点，例如，他指出，証券委員會會員以及商业和工場手工业委員會會員都是一些大的和最大的工商业者；工商业代表大會的組織，也是由“最大的”資本主义企业組成的。

因此，作者在該書書名上标明“俄国工商业階級”的組織是毫无根据的。这是不对的。这又是把階級概念縮小了。事实上，古什卡先生这里所談的是阶层，而不是階級。誠然，最大資本家阶层当然在經濟上統治着所有其余的阶层，必然用自己的流轉額来压制这些阶层；这一切都是用不着怀疑的。然而这毕竟是阶层，而

不是階級。例如，这个阶层的代表組織的政治作用同这个阶层的政治統治就有很大区别，这个阶层的政治統治同工商业階級的政治統治又有很大区别。

因此，应当指出古什卡先生的下列議論。他写道：“在俄国我們习惯于使用大的比例尺度来确定什么是大企业或小企业，因为大家知道，我国資本非常积聚，甚至超过德国資本的积聚……”

同德国比較是不对的。例如，在我国烏拉尔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中，沒有小企业或者很少有小企业是由于完全特殊的原因，——由于工业沒有充分自由，由于有中世紀残余存在。而我国官方（或者民粹派，反正都是一样）划分工厂工业和“手工业”工业的办法，难道不是使我国的工业統計完全无法同德国的工业統計相比較嗎？难道这样的划分沒有掩盖大量农民小企业的“非常”分散的真相而使这位說俄国資本“非常积聚”的觀察家彻底上当嗎？

二

指出关于最大資本代表組織活动的某些調查材料是很有趣的。例如，作者把有关这些組織的預算材料作了綜合。22个联合性組織的預算收入为 395 万卢布，而所有組織的收入，总計为 725 万卢布。古什卡先生写道：“如果把我們尚未調查的其他組織的財政报告也包括进去的話，我国 56 个組織的这个 725 万的年度預算，大概会增加到 1.5—2 倍。”

然而，这一預算的一大半，即 450 万卢布是用在經濟和慈善事业方面的。56 个組織在純粹代表性工作方面花費了 270 万卢布。“絕大多数答案或財政报告都把雇用職員的費用列为代表費項下的第一大宗，其次就是房租。同时有 64.4% 的組織把极大部分开

支用作雇用職員的費用，有 26.7% 的組織把極大部分開支用作房租。”

在經過調查的資本家組織擁有 131 900 萬盧布流轉額的情況下，這些數字只能說明這方面的支出極其微薄，因此古什卡先生的言過其實的結論——支出預算是“俄國工商業資產階級代表組織的財政實力的指標（着重號是作者加的）”！——只能又一次表明這位作者過分地愛說“大話”。

作者在自己的書的第 9 章里專門介紹了“第三種成分”，即為資本家組織服務的知識分子。結果是，在 29 個證券委員會中，第三種成分，即在這些委員會中供職的職員，有 77 人；其次，在 22 個聯合性組織中這樣的職員有 180 人。材料表明，每個組織中有 2—4 個第三種成分的組織占多數。由於資本家組織常常縮小這類資料，作者認為可以得出結論：“在資本家代表組織中服務並擔任要職的知識分子大軍（!!）為數不下千人”，這就是秘書、會計員、統計員、法律顧問等等。

古什卡先生的“大軍”，是不需要很多人的。

資本家組織的出版事業可以從下列數字得到說明。除調查表項中所填的以外，還有 228 冊根本不會出賣的藏書——代表大會匯編、總結報告、條例、報告書等。

有 9 個組織出版定期刊物：“采礦工廠事業”、“石油事業”、“工商業”、“俄國釀酒廠主協會消息報”等等。根據作者統計，已出版各期刊物的總數為 2 624 “冊”，再加上 452 冊“匯編”、年度總結報告等等以及 333 冊不定期刊物，共計 3 409 “冊”，古什卡先生認為這個數字“相當可觀”。各種出版物總數大概為 4 000—5 000 冊。

古什卡先生贊嘆說：“在這套書刊中——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埋藏着

全部宝藏，埋藏着研究俄国大资产阶级解剖学和生理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不研究这一有价值的材料，就不可能对俄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的比重，特别是对1905年前后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古什卡先生经常对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和作用问题发表类似的谬论。由于这一问题特别重要，由于这位无限夸大事实因而才赶忙发誓说“毫不夸大”的作者把这个问题乱加歪曲，所以对他这些谬论就需要单独加以考查。

三

古什卡先生写道：“被调查的组织既然是代表性组织，即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的组织，它们的活动的重心，自然就在于表述这个阶级的代表在涉及它的利益的各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以及用各种方法来维护这种立场。”

毫无疑问，“重心”正是在这里。在调查表中非常注意资本家组织讨论了哪些问题以及提出了哪些申请。作者综合了已有的资料，列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一般性问题”的长长的单子。几类最重要的问题如下：（一）工人保险、节日休假等等；（二）所得税、手工业税等等；（三）关税政策；（四）交通；（五）股份公司、信贷等等；（六）驻外领事馆、统计工作、矿业部门的组织；（七）商人参加地方自治机关、参加国家参议院、参加政府立法预审工作等等。

古什卡先生关于这点作出的结论是：“从上述列举的各类问题和申请中可以看出，无论如何，我国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是很广泛的……”读了这样的结论，你会不由得停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偶然漏掉了一个“不”字。因为很明显，作者引述的活动范围是很不广泛的。然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失言，而在于作者的根本“思路”。他认为“很难举出国家社会生活的某一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不包括

資本代表組織的活动的”。

这种論断是料想不到的，然而这是事实：古什卡先生十分認真地說出了这种令人憤慨的謊話，并用几十种不同的調子重复它！

“很难举出……” 可是，选举法呢？土地問題呢？难道这都不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嗎？

古什卡先生是以商人立場的一孔之見来观察“社会政治生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他的独特的叙述决不是証明他的見解广闊，而是恰恰証明他的見解狹隘。商人們提出的問題一般都很狹隘，因为这些問題只涉及到商人。資本家还没有达到过問一般政治問題的程度。“容許工商业代表”参加这些或那些地方机关或中央机关，——这就是他們所提出的申請的“勇敢”限度。至于一般应当怎样組織这些机关，他們是不善于思考的。他們只会坐享其成，苦苦哀求在按別人指使所組成的机关里謀得一个席位。他們奴顏婢膝地爬上不是由本階級建立的国家基地，并在这一基地上来“申請”自己等級、自己集团、自己阶层的利益，甚至在这里也沒有达到广泛理解整个階級利益的地步。

古什卡先生恣意歪曲事情真相，最后竟干脆变成了頌揚口吻。他写道：“坚决而頑強地对政权机关施加压力”，“我們的組織”“本身非常清楚地(11)了解这点……”“大資本的組織已变成真正的預备杜馬，它对立法的影响实际上恐怕比国家杜馬的影响还大，况且”——作者俏皮地說——“第 87 条²⁴不适用于資本家的議會，資本組織从来還沒有被有意地解散过三天……”

这种俏皮話极其明显地証明了工业大王先生們及其吹噓者古什卡的主动精神无限狹隘。一件小事情，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被忽略了；杜馬作为全国性的机关，提出有关整个国家管理問題以及

有关一切階級的問題，可是商业大王的組織却認為 仅仅 提出商人問題，仅仅 提出商人的权利問題才算是表現勇敢。

古什卡先生竟然引录了烏发省証券委员会 1905—1906 年的报告中的話：“政府本身在根本改革証券机关的同时就选定了……**得力的助手**”，并認為这种說法是“正确的”，特別用着重号把它标明，还說这是“同政府的生动的积极的合作”。

讀了这些东西，你会不禁想起一个德文字 Lobhudelei ——意思是阿諛的奉承或奉承的阿諛。在 1905—1906 年，作者竟然洋洋得意地大談起“証券机关的根本改革”来了！可是要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奴仆观点，老爷只是讓奴仆去同厨师“商量”准备午餐之类的事情，并且只在这时才把他們称为“得力的助手”。

古什卡先生的观点究竟同这种观点接近到什么程度，从該書第 15 章关于各資本組織申請的結果那一节中可以看 得出来。这一节的标题是“失败的障地”。在这里我們讀道：“不能否認，有这样几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資本代表的申請和要求，的确遭到了政府方面的反对。”依次举例如下：（1）官办森林方面；官方自己即林业資本家；（2）铁路运費率方面；官方自己即企业主；（3）关于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权問題；（4）关于国家杜馬和国家參議院中的代表权問題。关于最后两点，作者說：“在这两种場合，官僚机构同另一个統治階級即地主階級的亲密关系当然发生了作用。”

洋洋得意的古什卡先生繼續說：“然而，如果把这里指出的为数不多的問題放在一边，那就不得不說，在其余一切方面……我們的調查材料所描述的工商业階級的障地都是胜利的障地……”

您看，这真是妙論！失败的障地是森林、铁路、地方自治局和議會。“然而，如果把这里指出的为数不多的問題放在一边”，那就

都是胜利的障地！

在自己的書的“結尾”部分，古什卡先生在拚命反对認為工商业階級低下无权的“传统偏見”时，可以說，达到了惊人的阿諛奉承的地步：

“工商业資產階級并不是作为低下无权的階級来参加俄国的国筵的，它是以一位受人欢迎的贵宾和合作者，以国家政权的‘得力的助手’的資格出現的，无论是根据已有的习惯，无论是根据法律和成文法，它都占据显著地位，同时也不是从昨天才这样的。”

这完全可以作为某某克利斯托夫尼科夫、阿夫达科夫、齐仁高金之流在款待部长的筵席上用的一篇正式講稿。正是这些話，正是这种書面語言，所有俄国人都很熟悉。試問，象这样妄图把重要的調查加以“科学”探討，而把奴顏婢膝的商人們的席間致詞作为“調查的結論”写入著作的人，怎么能称做“学者”呢？

古什卡先生繼續說：“从很久以来，我們就接受了一种象偏見那样根深蒂固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在資本主义的俄国还可以看到一种矛盾，即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受奴役的地位。我們的調查的全部材料在这一传统概念上打开了一个重大缺口。”

古什卡先生在任意玩弄馬克思主义名詞，只有把馬克思主义无限庸俗化，才可以認為关于資本家組織的調查能够提供出有关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受专制制度和地主奴役的問題的材料。对这一問題能够提供实际答复的材料，作者几乎不曾涉及到，只要是停留在这次調查的範圍內，也就不能涉及到。

这次調查由于只涉及到我国資產階級生活的一个方面，反而証實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受奴役的地位。調查表明，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前进的，資產階級单独的私人的权利扩大了，它的組織正

在成长为階級，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增强了。但是，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两方面的矛盾，即一方面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权保持在专制制度和地主手中和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日益加强的矛盾，才变得更加深刻起来。

古什卡先生虽然在玩弄馬克思主义名詞，事实上却贊同庸俗的社会自由主义的观点。用馬克思主义詞句来粉飾这种自由主义，是俄国的一个特点，或者可以說，是俄国的一种病态。古什卡先生由于抱着自由主义观点来談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質問題，甚至不能大致地了解这一問題的全部范围和全部意义。

俄国国家政权的階級本質在1905年后起了重大变化。这是向資產階級方面发展的变化。第三屆杜馬，“路标派”自由主义，一系列的其他特征，都証明我国旧政权“在向資產階級君主制轉变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然而，即使在这一新的道路上又走了一步，政权却仍然是旧的，而政治矛盾的总数倒因此增加了。古什卡先生碰到这个重大問題，也就暴露了他对这个問題完全无知。

四

在研究十分專門的調查材料时，古什卡先生还涉及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則性問題，关于这个問題，應該特別談一談。这就是关于“1905年的作用”問題，古什卡先生書中第18章的一节的标题就是这样写的。

調查表的第41个問題，也即关于最近每5年中各組織的执行机关举行會議的次数問題，是为了弄清各組織在1905年活动的加强程度。根据調查所得的材料，按照古什卡先生的說法，“在我們組織生活中並沒有发现这种現象”，即活动显著加强的現象。

古什卡先生指明說：“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究竟他是怎样来解释这种現象的呢？

他議論說：由于罢工斗争的加强，“雇主”的联合組織在1905年本应加强自己的活动。

古什卡先生繼續說：“純粹代表性的組織当时处于某种程度的对立状况：它們的主要訂約人——政权——正是在1905年的过程中处于最不相信自己，同时也不能取得別人信任的妨碍状况。在那‘上司已下台’的‘混乱’年份中，所有的人，包括工业家在内，都觉得（特别是在年底）旧的‘上司’再不会回来了。

所以，資本的代表組織，当时就无从加强自己在政权机关面前的代表作用的积极性。”

这种解释是完全要不得的。如果“上司”真的“下台了”，那末，旧的政治上司的下台必然会加强新的經濟上司的积极性，把它变成新的政治上司。如果政权主要是实行自卫，那末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这是古什卡先生对工商业資產阶级所下的評語）怎能不加强自己的活动来保护这个政权和自己本身呢？我們的作者完全没有考虑一下他所說的話，只是把最流行的、最习惯用的說法拼凑起来。他也許感到，这里談的是一个极重要的問題，这个問題的解决对回答資產阶级的政治作用这个更一般的問題有决定意义或者有密切关系，——可是他好象是害怕認真接触这个重要問題，好象是在逃避这个重要問題。

請考虑一下作者下面一段同是关于1905年作用的議論：

“……資本組織对于常常聚在一起商討它們对当时激蕩全国的社会政治問題的态度并不感到有什么急切願望，因为它們被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抛向后面，宁願暂时观望等待，直到周圍沸騰的斗争有个水落石出；即至最后当‘上司’明确地表現了重新‘登台’的願望的时候，——工商业阶级的組織才开始逐渐地恢复了自己代表活动的通常形式和紧张程度。”

“資本組織被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抛向后面……”好极了！不过古什卡先生又没有思考一下他所講的东西。‘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是为了反对誰呢？是为了反对旧政权。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怎么会被抛向后面呢？他如果真正是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他的不依賴旧的政权組織的經濟力量越是强大，他就應該越是努力向前。

旧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怎么会陷于“宁願观望等待”的状况呢？

古什卡先生本打算反对那种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却处在受奴役地位的理論，但是从一开头他就把自己弄糊塗了！其实，他所要破坏的那种“理論”，反而被1905年事变的进程証实了。

無論是工商业的大資本家，無論是俄国自由主义的資產階級，在1905年不仅是“观望等待”，而且采取了极其明确的反革命立場。事实証明了这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毫無疑問，同专制制度和地主階級的力量相比較，最大的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抛向了后面”。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人民运动的浪潮”极其高涨，反而使資產階級大大后退，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这种情况是能够发生的，因为只有把“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完全曲解了，才会認為，資產階級一經退出，資產階級革命就削弱了。这种情况是应当发生的，因为在資產階級动搖的情况下，俄国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无產階級和农民。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受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奴役，可是另一方面，它在工人运动加强时却采取反革命的立場。这就产生了資產階級的动搖，产生了資產階

級的“向后”退却。它既反对旧制度，又拥护旧制度。它願意帮助旧制度反对工人，然而在沒有任何地主和旧政治制度的任何残余的情况下，它又完全能够“自行安排”，甚至能够加强和扩大自己的統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經驗，就清楚地說明了这一点。

从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人民运动巨大浪潮”的极其高涨以及旧政权的极度削弱，却能使工商业資產階級加紧“向后”退却。这正是新制度同旧制度的斗争中，在民主制度同中世紀制度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中立的階級；因为这个階級一方面感到自己同旧制度在一起比較习惯些，安靜些，方便些，同时只有在新的制度完全胜利的时候它才能取得統治地位。

五

談到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的調查，便不能不談到取消派的“我們的曙光”杂志第1—2期和第3期上发表的阿·叶尔曼斯基先生的文章。叶尔曼斯基先生非常詳細地轉述了古什卡先生的著作，然而，从来沒有附带說明自己不同意他的意見！正是这样一位把自己算作馬克思主义者的人，才能够支持工商业大王頌揚者的軟弱无力的自由主义！

叶尔曼斯基先生 à la^①布倫坦諾和桑巴特，在用馬克思主义色彩稍加粉飾的社会自由主义方面，甚至比古什卡先生走得更远些。

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代表性的組織，是在全国範圍內（甚至部分地是在国际範圍內）进行大規模的階級斗争的組織。調查材料描繪了这些組織所討論的問題的範圍几乎是无边无际的。我們

① 类似。——編者注

的組織活動，正如叶加特林諾斯拉夫証券委員會正確指出的那樣幾乎涉及到具有全國意義的一切任務。”這就是叶爾曼斯基先生在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雜誌上發表的議論！這種議論是徹頭徹尾的、明目張膽的捏造。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概念在這裡被偷偷換成了自由主義的階級鬥爭概念。這裡所宣稱的全民性的和全國性的東西恰恰缺乏全民性的和全國性的東西的基本特徵：國家政權的組織以及全部“全國性”管理和全國性政策等。

請看一下，叶爾曼斯基先生的蠻干使他達到了怎樣荒謬絕倫的地步。在反駁“俄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他想說的是工商業大資產階級）是軟弱的、不大發展的等等的看法時，他在尋找能夠表明“俄國大資產階級實際狀況”的“現代公式”。

結果怎樣呢？叶爾曼斯基先生把阿夫達科夫在采礦業會議爭論（請聽吧！）關於過渡到有選任主席的采礦業代表大會的新組織時所講的話，當作了這種公式。阿夫達科夫說：實際情況（俄國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到目前為止，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方面都沒有限制我們”。

叶爾曼斯基先生寫道：“這就是最適合於現代生活的公式。”

噫！可不是麼。在采礦業代表大會組織中愚蠢而馴服地忍受地主的國家特權壓迫的商人沒有受到限制！叶爾曼斯基先生不去譏笑那位言詞誇張的基特·基特奇·阿夫達科夫，卻拚命要人相信阿夫達科夫不是基特·基特奇，是他提出了表明“俄國大資產階級實際狀況”的“現代公式”！基特·基特奇·阿夫達科夫卻完全象一個吃得肥胖的奴仆，他根本不敢想代替老爺成為真正的主人，他由於老爺容許他這個奴才同侍女、廚師等商量事情而深受感動。

叶爾曼斯基先生文章中下面一段冗長議論表明，他恰恰不想

了解奴仆地位和老爷地位之間的这一区别：

他写道：“在这里作一番比較并不是多余的：大家都記得，人們曾經多么坚决地、可以說全民一致地把地方自治派‘参加国内管理事务’的願望称做‘荒謬的幻想’；另一方面，彼得堡証券委员会还在立宪以前宣称‘尽可能广泛地扩大証券协会（注意这点！）参加管理事务的权利’的必要性的同时，就曾有充分根据地补充說：‘証券协会的这种权利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証券协会已經部分地在行使这种权利了。’对其他人是‘荒謬的幻想’的东西，对大資本代表来講并不是幻想，而是现实，是实际的宪法的一个因素。”

叶尔曼斯基先生，驢头不对馬嘴！你的“比較”暴露出你不能或者不願把两种意图，即地主階級自己要成为真正老爷的意图和发了財的管家費吉卡或万卡同老爷的其他仆人商量事情的意图区别开来。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

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結論在精神上和拉林的完全一样，是十分自然的。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大資本的代表“在俄国早已名副其实地占据了統治階級的地位”。

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里他既忘記了专制制度，也忘記了政权和收入仍旧是在地主和农奴主手里。叶尔曼斯基先生毫无根据地以为：“只有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国的专制制度“才不再成为独特的农奴制度。”同尼古拉一世时代相比較，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已經沒有这种“独特性”了。然而，把失掉独特的农奴制性質而向資產階級君主制前进的农奴制度同“大資本代表的全部統治”混为一談，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六

“我們的曙光”杂志編輯部照例給叶尔曼斯基先生的文章加了一个“附帶說明”：作者“过低估計了直接参加政权对于它（大資產

階級)的意義”。

這種加附帶說明的做法，給取消派作了牢固的巢穴。叶尔曼斯基在他的好多篇文章里，不厌其詳地以自由派的精神來發展階級鬥爭的觀點。這個雜誌的宣傳全是自由派的宣傳…… 只是在兩行注釋之中伏了一筆對馬克思主義“美好日子的回憶”！“我們的曙光”雜誌用暗中替換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精神熏陶讀者，而它的編輯部却用附帶說明“為自己打掩護”，這種做法和立憲民主黨的“言論報”²⁵的做法完全一樣。

事情決不僅僅在於叶尔曼斯基先生“過低估計了”問題的某一方面，而在於他對階級鬥爭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確的。事情在於他對專制制度的社會結構的估計是根本錯誤的。我們早已指出，並且還要不倦地指出，對於“1908年的答復”（或1912年）等等無論採取什麼冷笑態度都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只要是一篇比較認真的政論，那就不能躲過這個問題。

叶尔曼斯基和拉林同“我們的曙光”雜誌編輯部之間的分歧，是坦率的和自以為誠實的取消派同外交家的取消派之間的分歧。關於這一點，不應該抱有任何幻想。

拉林寫道：我們的政權已經成為資產階級的政權。因此，工人應當組織起來，不是等待革命（也不是“為了革命”，——他補充說），而是為了參加憲政來復興國家。叶尔曼斯基從另一方面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實質上是重復了拉林的第一個前提，並且暗示了他的結論，只是沒有直說罷了。

馬爾托夫“修正”拉林的話，正象“我們的曙光”雜誌編輯部修正叶尔曼斯基的話一樣；據說，政權還不是資產階級的，工人只要抓住立憲主義和專制制度的矛盾“就夠了”。

可見在結論上，馬尔托夫（以及“我們的曙光”杂志編輯部）同拉林—叶尔曼斯基之間的意見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也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他們对工人政策都采取自由派的观点，也就是說他們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

我們却依旧認為，这种观点是根本不正确的。事情不在于叶尔曼斯基“过低估計”或馬尔托夫“过高估計”古契柯夫和列布申斯基之流的“左傾”。事情也不在于叶尔曼斯基“过低估計”或馬尔托夫“过高估計”“直接参加政权对资产阶级的意义”。事情在于，他們两人不仅“过低估計”，而且簡直不了解“直接参加政权”对于工人阶级以及对于摆脱了目前的自由主义动摇而跟着工人阶级走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义！他們两人所考虑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忘記了另一个政权。

他們两人只向上看而不向下看。但是，如果十个列布申斯基和一百个米留可夫都嘟嘟囔囔地、自由主义地发泄不滿，这就是說，千百万小资产者和一切“小人物”都感到自己是忍无可忍了。这千百万人也可能是“政权”的来源。只有这种民主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右派，摆脱自由派的动摇，才能“解决”历史在20世紀初期向俄国提出的問題。

載于1912年4—6月

“启蒙”杂志第5—7期

署名：弗·伊林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俄国土地問題”的实質

“土地問題”——如果使用这个通常流行的名詞——是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的。然而在俄国除了一般資本主义的土地問題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真正俄国的”土地問題。为了簡短扼要地說明这两种土地問題的区别，我們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資本主义国家，都看不到小土地所有者为了把大土地占有制的土地轉到自己手中而展开比較广泛的民主运动的

情形。在俄国就有这样的运动。因此，除了俄国，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馬克思主义者都沒有提出和支持把土地轉归小土地所有者的要求。俄国土地問題必然使所有馬克思主义者承認这种要求，尽管对于如何組織轉手土地的占有和支配有各种不同的意見(分配、市有、国有)。

“欧洲”和俄国之間的不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这种不同难道不是由于俄国发展的独特性，不是由于俄国沒有資本主义或我国資本主义特別沒有发展前途而产生的嗎？形形色色的民粹派正是这样想的。但这种观点根本不对，现实生活早已駁斥了这种观点。

“欧洲”和俄国之間的不同是由于俄国极端落后产生的。在西欧，資产階級土地制度已經完全建立，农奴制早已消灭，农奴制残

余微不足道，起不了什么重大作用。西欧农业方面的主要社会关系是雇佣工人对企业主，对农场主或土地所有者的关系。小农在那里处于中間状态，一方面向被雇用者即劳动力出卖者阶级过渡（农民的所謂副业或外活有多种形式），而另一方面向雇主阶级过渡（小农雇用的工人人数比人們通常所想象的要多得多）。

毫無疑問，在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也已經确立，并且在不断发展。地主經濟和农民經濟正向这方面进化。但是純资本主义关系在我国还在广大范围内受到农奴制关系的压制。居民群众，首先是一般农民群众正在同这种关系作斗争——这就是俄国土地問題的特点所在。在西欧，这样的“問題”当时曾普遍存在，但早已解决了。在俄国，这个問題迟迟沒有解决，1861年的土地“改革”沒有解决这个問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目前条件下也不可能解决这个問題。

在“歐俄土地占有情况”一文中（載于“涅瓦明星报”²⁶第3号）^①，我們援引了闡明現代俄国土地問題實質的最主要材料。

3万个最大的地主約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1000万农户大致也有这么多土地——这就是一幅图画的主要背景。这幅图画說明了什么样的經濟关系呢？

3万个最大的地主主要是旧貴族阶级和旧农奴制經濟的代表。在27833个有500俄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中，就有18102个貴族，即將近 $\frac{2}{3}$ 。他們手中最大的地產（这些最大的地主平均每人有土地2000俄亩以上），是不能用土地所有者的农具和雇佣工人来耕耘的。在这种情况下，旧徭役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

^① 見本卷第17—20頁。——編者注

的，也就是說存在着小規模耕作、大地产上的小經濟，用小农的农具来耕耘地主的土地。

大家知道，正是这种徭役制在古俄罗斯地方的欧俄中部各省，即在我国农业的心脏流行得特别广。所謂工役无非是徭役經濟的直接繼續和残余。象冬季雇用制、为割地而劳动、“循环耕作”等等非常厉害的奴役經濟方式，也都是徭役制。在这种經濟制度下，农民的“份地”是保証地主有劳动力的方法，而且不仅是保証有劳动力，也是保証有农具的方法，尽管这种农具少得可怜，仍然可以用来耕耘地主的土地。

这种情况的結果就是：束縛在自己的份地上而又不能靠它为生的农民群众极端貧困，农业技术极其簡陋，工业的国内市場极不发达。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仍未改变，現在有 8 000 万农民正在挨餓，就是最明显的証明。在农业技术迅速发展并且具有較高水平（在发达的資本主义經濟中）的时代，只有广大受奴役的小业主受农奴制的压抑，被遺弃，无倚无靠，才会造成許多人挨餓这样可怕的情景。

造成西欧农民从中世紀以来所未曾見过的这种可怕的灾难的根本矛盾，就是在我国工业中高度发展并在我国农业中也有很大发展的資本主义和仍旧是中世紀的、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之間的矛盾。不急遽破坏旧的土地占有制，就不能摆脱这种状况。

不但地主的土地占有是农奴制的，而且农民的土地占有也是农奴制的。前者很明显，不会引起什么怀疑。我們仅仅指出，消灭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譬如說，消灭 500 俄亩以上的經濟，并不会破坏农业大生产，反而会加速它的发展。因为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是奴役性小农业的支柱，决不是大生产的支柱。在 500 俄亩以

上的大片土地上，用地主的农具和自由雇佣劳动来进行大规模經營，来耕耘全部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俄国大部分地区是极为困难的。縮小这种占有范围，是奴役性小农业消灭和向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大生产过渡的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俄国农民的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紀的，农奴制的。問題不仅仅在于这种占有制的法律形式由于村社遭到极粗暴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建立而現在有所改变，——問題还在于这种占有制的实际面貌是无论怎样破坏村社都不能触动的。

农民的大量碎小和极碎小的、多半是地界交錯的“小块土地”都是一些土質极坏的土地（这是 1861 年在农奴主地主主持下給农民划地界的结果，也是地力耗尽的结果）。这种实际情况必然使农民处于受世袭的大地产占有者、旧的“老爷”奴役的地位。

請具体想想这样一种情景吧：3 万个大地产占有者各有 2 000 俄亩土地，而 1 000 万农户“平均”每户才有 7 俄亩土地。显然，无论怎样破坏村社，怎样建立土地私有制，都还不能改变奴役、工役、徭役、农奴制貧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奴制依存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土地問題”是消灭严重地阻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残余的問題。俄国的土地問題は急速破坏旧的、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制即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份地占有制的問題，由于这种土地占有制极端落后，由于这种土地占有制与已經成为资本主义的国民經济的整个制度极不适应，这种破坏已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破坏應該是急速的，因为不适应的情形太严重了，因为旧的太旧了，“病耽誤得太久了”。在任何情况下不論通过任何形式进行破坏，就其內容來說，都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俄国整个經济

生活已經資產階級化了，土地占有制也必定要服從整個經濟生活，必定要受市場支配，要受我國現社會中主宰一切的資本的支配。

既然破壞不能不是急遽的，不能不是資產階級性的，那就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也就是說在地主和農民這兩個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階級中，究竟應該由哪個階級來進行這種改造，或者指導這種改造，確定這種改造的形式。這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要在下文“斯托雷平的土地綱領和民粹派的土地綱領的比較”^①中來說明。

載于1912年5月22日

“涅瓦明星報”第6號

署名：爾·西·

按“涅瓦明星報”原文刊印

^① 見本卷第131—137頁。——編者注

关于选举前动员情况 的几点总结

参加国家杜馬选举的各种政治力量，差不多已經完全組織起来了。不管怎样，各个政党基本的結合情况已經十分明确，不会再有什么重大的本質的改变。

政府早就开始了选举运动。右派、民族主义党人、十月党人在行政当局公然的帮助下“进行活动”。最近“言論报”公布的和許多报纸轉載的省长給各警察局长关于采取“措施”，不准“左派”候选人竞选初选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和复选代表的指令，把内务部选举机器上面遮盖的帷幕稍稍拉开了一点。政府方面无疑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措施来反对反对派。首相科科夫措夫在对莫斯科商人講話的时候，那样強調“反对派对于反对派”的危害，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如果对政府和警察局的热心可以不必怀疑，那同样不必怀疑的，就是选民的情緒已經发生而且还在发生普遍“向左”的轉变。政府的任何詭計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相反地，詭計和“措施”只能加深不滿。不难了解，如果这种不滿在大资产階級那里表现为舒宾斯基发表“反对派”的言論，列布申斯基“謹慎地”暗示希望有一个“文明的管理方式”，或者立宪民主党的“言論报”对政府进行辛辣的諷刺，那末，依赖于列布申斯基、戈洛文等等的广大“小人

物”的不滿就要尖銳得多、嚴重得多了。

在政治上表現出這種不滿的對立派的陣營里，已經形成了哪些政治集團呢？已經形成了由立憲民主黨人和進步派組成的“負責”對立派即自由主義保皇派對立派。他們的聯盟清楚地說明立憲民主黨人比他們平時看來要“右”得多。

已經形成了工人民主派，它的任務不是“支持”立憲民主黨人和進步派的對立派，而是利用他們同右派（包括民族主義黨人和十月黨人）的衝突，來教育和組織民主派。最後還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勞動派的代表會議上，它主張“首先同社會民主黨”成立協定，同時又不提出任何同立憲民主黨人的反革命自由主義鬥爭的明確口號，也就是說，實際上依舊動搖於兩者之間。

從這次各黨選舉前的“政治動員”情況可以總結出一些什麼呢？第一個，也是基本的一個總結，是工人民主派早就指出了的，就是在鬥爭中有三個陣營，而不是兩個陣營。自由派盡量想把事情說成是實質上只有兩個陣營在鬥爭，而取消派呢，正象多次指出的那樣，他們也經常墮落到同意這種看法。贊成立憲還是反對立憲？——立憲民主黨人就是這樣來說明兩個陣營的分歧點的。實際上這種說法等於什麼也沒有確定，因為連十月黨人也硬說自己是主張立憲的，其實，根本不應當去談什麼可以叫做立憲，什麼不能這樣叫，而應當談自由派或民主派的某些要求的确切內容。

這三個陣營正是根據它們的要求的內容，它們在階級趨向上的實際區別而確定的，即：右派陣營或政府的陣營；自由派陣營或站在反革命基礎上的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陣營；以及民主派陣營。這裡的問題倒不在於在這種選舉制下面的“機會”如何，——不，問題要深刻得多，它所涉及的是關於選舉時期的政治宣傳的整個性

質，关于选举运动的整个政治思想內容。

自由派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战略”是每天都在企图夺取“整个”反对派运动的领导权。自由派的“生活需要”杂志泄露了“言論报”小心隐瞒起来的这个战略的“秘密”。尔·布·先生²⁷在“生活需要”杂志第13期上写道：“进步派以一个很有希望的步骤（！）开始了自己的运动，它們組成了一个所謂‘非党的进步联盟’，这个联盟从最初的几天起就显示出它对于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反对派政治集团有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劳动团的“选举綱領虽然曖昧不明，也許部分地正是由于曖昧不明，才符合于广大民主知識界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劳动团能够充当比立宪民主党人較左的角色，正如进步派集团在充当比立宪民主党人較右的角色一样。于是，反对派的陣綫可能是由流动的、动摇的、但是很灵活的側翼和不动的、但是很坚强的中心所組成，从战略上来说，这在政治斗争中也有其有利的方面。”

米留可夫和盛加路夫之流脑子里想什么，尔·布·嘴里就说什么！立宪民主党人正好需要两个“灵活的”側翼：利用进步派来籠絡拥护六三宪法的资产階級选民，利用“曖昧不明的”民主派来籠絡有民主情緒的公众。这个“战略”真是出于立宪民主党的本性。这个政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它用欺騙方式使得一些民主阶层如店員、小職員等等跟着它走。这样的党正好需要“非党的进步派”来做真正的階級支柱，需要曖昧不明的民主派来做时髦的招牌。

地主叶弗列莫夫和百万富翁列布申斯基可說是进步派的典型。民粹主义陣营的劳动派和馬克思主义陣营的取消派可說是曖昧不明的民主派的典型。翻开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你就可以

看出，这个政党的行动始終是：口头上說的是民主主义，实际上做的是“适合于列布申斯基的叶弗列莫夫式的”自由主义。即使从1906年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计划失败的时候起，到第三届杜馬里投票贊成預算或米留可夫提出的“倫敦”口号²⁸等等为止，我們看到的正是立宪民主党的这种本性和虛伪的民主外衣。

“生活需要”杂志的尔·布·先生真是太笨了，他竟在无意之中說出了自由派竭力对民主派隱瞞、故意弄得糊里糊塗的真相。他承認說：进步派的綱領“把問題摆在了坚定而现实的基础上面”！可是在这个綱領里，除了純粹十月党人式的泛泛的空話（例如，全部实现10月17日的宣言）之外，什么也沒有。他們所謂的坚定而现实的基础，是指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以至那种温和的、唯命是听的、軟弱无力的东西，对这种东西，如果还抱什么希望，那就太可笑了。那些在1907年曾是“和平革新党人”的人，那些在第三届杜馬里站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間的人，就是所謂坚定而现实的基础！

百万富翁列布申斯基是进步派。这些进步派或这类进步派的机关报是“俄国晨报”。不是別人，正是同进步派結成联盟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言論报”写道：“莫斯科工业家的机关报‘俄国晨报’比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对科科夫措夫的話）……‘俄国晨报’响应克列斯托夫尼科夫說：‘工商界的莫斯科有权認为自己已經滿意了。’”“言論报”补充說：“既然这取决于‘莫斯科呼声报’和‘俄国晨报’，那他們就准备不推行任何路綫了，他們已經感到滿意了。”

試問，哪里有材料能够証明叶弗列莫夫或别的进步派有“路綫”呢？这种材料沒有。这种进步主义，不管叫做进步主义或立宪

民主主义都是一样，只要对它支持，就等于民主派放弃了阵地。而利用资产阶级同地主之间、自由派同右派之间的冲突，却是另一回事，民主派只能这样提出自己的任务。

必需明确地认识到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的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对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于叶弗列莫夫和列布申斯基之流的极为广大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劳动派和取消派所共同有的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缺乏这种明确的认识。劳动派对于自由主义根本缺乏阶级分析，取消派则讲些什么“把杜马从反动派手里夺取过来”，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快要取得政权，他们完成了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工作等空话（见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言论），所有这些总括起来，也不过是起了尔·布·所十分满意的立宪民主党“侧翼”的作用。

劳动派和取消派的主观愿望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主观的计划，而在于社会力量的客观结合。尽管有人认为只有两个阵营，尽管有人幸灾乐祸地叫喊工人民主派的瓦解（见尔·布·的同一篇文章），但这种结合却清楚地表明第三个阵营已经形成。它的路线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且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工人反取消派执行这条路线，团结所有的民主派，既反对右派，又反对自由主义。工人对于软弱无力的、在所有根本问题上拜倒在反动派面前的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不抱任何幻想，而要利用它同反动派的冲突，以壮大自己，壮大自己的阶级组织，壮大自己的民主派，这个民主派正在那些被叶弗列莫夫和列布申斯基奴役的人民群众中悄悄地成长起来。

这个“反对派”并不羡慕那个并不光彩的“负责”反对派的称号，由于工人实行反取消主义的策略，右派同“负责”反对派的斗

爭,对于这个“反对派”的覺悟的提高和独立的組織发展,應該有所帮助和一定有所帮助。

載于 1912 年 5 月 22 日

“涅瓦明星报”第 6 号

署名:勃·格·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

从 1905 年起，工商部的官方罷工統計表上，經常把罷工分为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两类。他們这样分类，是因为生活中产生了罷工运动的特殊形式。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的結合，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主要特点。現在，罷工运动正在活跃，对事变应当进行科学分析，采取自觉态度，这就要求工人們要仔細注意俄国罷工运动的这个特点。

首先讓我們从政府的罷工統計表上借用几个主要的数字。在 1905—1907 这三年中，俄国的罷工运动达到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高峰。政府的統計表只是計算了工厂的罷工，而矿业、铁路、建筑工程和許多其他雇佣劳动部門的罷工并未計算在內。但是，就是单算工厂罷工的人数，1905 年就有 2 868 000 人，即将近 300 万之多；1906 年有 1 108 000 人，1907 年有 740 000 人。而从 1894 至 1908 所有这 15 年当中，即在歐洲已开始有系統地編制罷工統計表的年份內，一年之內罷工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也只有 660 000 人。

可見，是俄国工人第一次在世界上开展了象 1905—1907 年这样大規模的罷工斗争。現在英国工人在經濟罷工方面又給了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俄国工人所以起了先进作用，并不是因为自己比西欧的工人更强大、更有組織、更成熟，而是因为西欧还没有发生有无产階級群众独立参加的全国性的大危机。将来这些

危机到来时，欧洲群众性的罢工会比 1905 年的俄国还要强烈。

这个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对比的情况怎样呢？政府的统计对这一点作了回答：

罢工人数(单位：千人)			
	1905	1906	1907
经济罢工.....	1 439	458	200
政治罢工.....	1 424	650	540
总 计	2 863	1 108	740

由此可见两种罢工有紧密不可分的联系。1905 年的运动最为高涨，其特点是斗争有最广泛的经济基础：这一年的政治罢工是以坚实牢固的经济罢工为基础的。经济罢工的人数超过了政治罢工的人数。

随着运动的低落，1906 和 1907 年，经济的基础削弱了：经济罢工的人数 1906 年降低到罢工总人数的 $\frac{4}{10}$ ，1907 年降低到 $\frac{3}{10}$ 。可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是相互支持的，相互提供力量的。没有这两种罢工的紧密联系，真正广泛的、大规模的、而且具有全民意义的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在运动初期，经济罢工往往带有一种唤起和推动落后、综合运动、把运动提到更高阶段的性质。

例如，在 1905 年的第一季，经济罢工显然超过了政治罢工，经济罢工有 604 000 人，政治罢工只有 206 000 人。而在 1905 年最末一季，情况就相反了：经济罢工有 430 000 人，而政治罢工有 847 000 人。这就是说，在运动初期，许多工人把经济斗争放在第一位，而到了最高涨的时候，情况就相反了。但是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联系，一直都是存在的。再说一遍，没有这种联系，便不可

能产生能够实现伟大目的的真正伟大的运动。

在政治罢工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作为全民的先进阶级出现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单纯起着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阶级的作用，而且起着领导者、先进者、领袖的作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具有全民的性质，也就是说触动了全国政治生活的根本的最深刻的条件。正如所有对1905—1907年这个时期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所指出的，政治罢工的这种性质，使得所有的阶级、当然特别是居民中最广大的、人数众多的民主阶层即农民等等卷到运动中来。

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想象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对伟大事业表现出坚定不移，忠心耿耿。否则情况就不会是这样，因为工人“平”日的生活艰苦到了极点。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在道德上、精神上、政治上也成长起来了，变得更能够实现自己伟大的解放目的了。

工商部公布的统计表，完全证实了工人在全面活跃时期的经济斗争的这种巨大意义。工人的进攻愈是猛烈，他们就愈能争得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同情”和生活的改善都是斗争高度发展的结果。如果自由派（和取消派）对工人说：“社会”上同情你们，你们就强大了，那末，马克思主义者则对工人说：你们强大了，“社会”上就会同情你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居民当中的各种民主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农民、同工人生活接近的知识分子、职员等等。

1905年的罢工运动规模最大。结果怎样呢？我们看到，正好

是这一年，工人爭取到的生活改善最多。政府的統計表明，1905年，100个罢工者当中，只有29人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就是說完全失败了。而从1895到1904这10年当中，100个罢工者中間有52人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就是說，运动的群众性使斗争的成功性大大地提高了，几乎提高了一倍。

当运动开始减弱时，斗争的成功性也就开始降低：1906年，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的，确切些說，失败了的，100个罢工者当中有33人，在1907年有58人，1908年甚至达到69人！！

可見，許多年来的科学統計資料完全証實了每个自覺的工人的亲身体驗和观察：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須結合起来，而在真正广泛的全民的运动中，这种結合也是必然的趋势。

現在罢工运动的浪潮也同样地完全証實了这个結論。1911年罢工的人数比1910年增加了1倍（10万比5万）。但是这个数目毕竟是非常小；純粹的經濟罢工在当时依然是一种比較“狭小”的事情，还不帶有全民的意义。相反地，現在每个人都看得清楚，在今年著名的四月事件以后，罢工运动正好具有了这种意义。

因此，极为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对自由派和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力图对运动性質作的歪曲进行反击。自由派謝韦里亚宁先生在“俄罗斯新聞”²⁹上刊載了一篇文章，反对把經濟“要求”或“其他什么”（居然說出这种話来！）“要求”同五一罢工“攪在一起”，而立宪民主党的“言論报”同情地轉載了这篇文章的主要之点。

这位自由派先生写道：“把这种罢工偏偏同五一联系起来，也就往往沒有根据……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求把制造某种粗布的工資增加10%，更是有点奇怪。”（“言論报”第132号）

工人完全明白的東西，自由派却感到“奇怪”。只有資產階級及其大批利潤的捍衛者才會嘲笑“增資”的要求。而工人卻知道，正是這種增資的要求的廣泛性，正是罷工的全面性，最能吸引大量新的參加者，最能保證進攻的力量並取得社會的同情，最能保證工人本身的成功和工人運動的全民意義。因此，應當堅決反對謝韋里亞寧先生、“俄羅斯新聞”和“言論報”所散布的自由派的歪曲，要盡一切力量不讓工人上這種劣等參謀的當。

取消派符·叶若夫先生在取消派報紙“涅瓦呼聲報”³⁰的創刊號上也散布了同樣的純粹自由派的歪曲，雖然他是從另一個稍微不同的方面來談這個問題的。符·叶若夫先生特別談到了五一罰款所引起的罷工。作者指出了工人的組織性不夠，這是對的，但是他從這個正確的指責作出了最錯誤的、也是對工人最有害的結論。叶若夫先生認為一個工廠單純為了抗議而罷工，而另一個工廠又把經濟要求結合起來等等，這就是沒有組織性。實際上罷工形式的多種多樣，根本不是什麼沒有組織性：一定要形式千篇一律才算有組織性，那就未免太笨了！沒有組織性根本不在叶若夫先生要找的地方。

但是他的結論就更糟糕得多了：

“因此”（就是說，因為有各種各樣的罷工以及經濟和政治相結合的各種不同形式）“在相當多的場合下，抗議的原則性（要知道，不是為了25個戈比而罷工）模糊了，被經濟要求弄複雜了……”

這真是可惡的徹頭徹尾虛偽的、徹頭徹尾自由派的議論！以為“25個戈比”的要求會“模糊”抗議的原則性，那就是降低到立憲民主黨人的水平。恰恰相反，叶若夫先生，25個戈比的要求並不值得嘲笑，而是應該完全贊同！恰恰相反，叶若夫先生，這種要求

不仅不会“模糊”，反而会加强“抗議的原則性”！第一，改善生活的問題也是一个原則性問題，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原則性問題，第二，如果我們所反对的不是一种，而是两三种以上的压迫的表现，这并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我的抗議。

每一个工人都会憤怒地唾弃叶若夫先生对事实进行的这种可恶的自由派的歪曲。

叶若夫先生决不是說錯了話。他后面写的东西就更可恶了：

“亲身的經驗会提醒工人，用經濟要求把自己的抗議弄复杂化，正如用原則性的要求把平常的罢工弄复杂化一样，是不适当的。”

不对，一千个不对！“涅瓦呼声报”刊登了这种言論，真是可耻。叶若夫先生觉得不适当的，倒是十分适当。每个工人亲身的經驗和俄国相当大一部分工人最近的經驗所說明的，正好同叶若夫先生的教导完全相反。

只有自由派才会反对用“原則性的要求”来把最“平常的”罢工弄“复杂化”；这是第一。第二，我們的取消派用“平常的”罢工的尺度来衡量现在的运动，是大錯而特錯了。

叶若夫先生企图打着別人的旗帜来掩护自己的自由派的走私行为，真是枉費心机，他把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相結合的問題同这两种罢工的准备問題混为一談，也是白費力气。当然要准备，而且要准备得尽量坚实一些、齐心一些、团結一些、周密一些、坚定一些，这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可爭論的。但是，应当准备的，同叶若夫先生的看法相反，正好是把这两种罢工結合起来。

叶若夫先生写道：“摆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經濟罢工的时代。如果把經濟罢工同工人的政治行动交織在一起，那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錯誤。这样混在一起，对工人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有害的。”

看来沒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一个取消派降低到一个普通自由派的水平，从这些话里看得最清楚了。每一句话都有错！每一句话都要改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理！

說摆在我們面前的是經濟罷工的时代，这不对。正好相反。当前不仅是經濟罷工的时代，而且是政治罷工的时代。叶若夫先生，事实胜过你們自由派的歪曲，如果你們能够看到工商部所收集的罷工統計卡片，那末，就連这种政府的統計也会完全把你們駁倒。

說“交織在一起”是錯誤，这不对。正好相反。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交織在一起”的整个特殊性，整个意义，整个必要性，整个在原則上的重要性，那才是无法挽回的錯誤。幸好工人們很懂得这一点，他們輕蔑地抛开了自由派工人政客的宣传。

最后，說这样混在一起对两种形式的罷工“都有害”，这也不对。正好相反。这样混在一起，对两种形式的罷工都有利，会使这两种形式的罷工都得到加强。

叶若夫先生对他所发现的某些“激烈人物”教訓起来了。請听：

“必須在組織上巩固工人群众的情緒”……（顛扑不破的真理！）……“必須加强拥护工会的宣传，为工会征求新的會員……”

完全对，但是……叶若夫先生，但是把“組織上的巩固”仅仅归结为壮大工会，那就太荒謬啦！取消派先生，这一点要記住！

“……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工人当中現在有不少激烈人物热中于群众性的运动，在群众集会上反对工会，好象工会是无益的，不必要的。”

这是自由派对工人的誹謗。工人并不是“反对工会”，从工人那里吃到苦头的，并且今后还会繼續吃到苦头的是取消派。工人所反对的是叶若夫先生在上面那段話里說得很清楚的把組織上的

巩固仅仅归结为壮大“工会”。

工人并不是“反对工会”，而是反对叶若夫先生全篇文章中充满的对工人斗争的性质的歪曲。

俄国工人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懂得自己的运动的伟大的全民意义。俄国工人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懂得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虚伪和贫乏，永远会轻蔑地抛弃这种政策。

载于1912年5月31日

“涅瓦明星报”第10号

署名：伊·彼得罗夫

按报纸原文刊印；并根据
191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派”
文集第2册原文做过校订

移民問題

大家知道，政府和各反革命政党对于迁移农民曾經寄予很大希望。在一切反革命分子想来，迁移农民即使不能彻底解决土地問題，至少也能使土地問題大大緩和一下，而不致为害。这就是为什么正是在欧俄农民运动即将展开和发展的情况下移民事业受到大肆鼓吹和百般鼓励的原因。

政府的代表和比較有远見的政治家，如十月党人的政治家所想的，却被庫尔斯克的死硬派馬尔柯夫第二这样一些露骨的反动派說了出來。这位代表在杜馬討論移民問題时，公开地、非常直率地說：“是的，政府正需要用移民办法来解决土地問題。”（在第一次常会上的发言）

毫無疑問，如果正确地組織移民工作，那是会对俄国的經濟发展起一定的作用的。当然，这个作用不應該过高估計，即使現在，当农民不堪忍受的处境迫使俄国庄稼汉不仅下决心逃往西伯利亚，而且下决心逃到天涯海角的时候，即使現在为了摆脱少地和无地农民对地主大地产的垂涎而竭力鼓励他們移居和迁出，11月9日法令³¹特别有助于移民清除其本地的經濟残余的时候，即使現在这个时候，也不應該过高估計，而这也是人口自然增加的辯護士不得不承認的，因为只有在迁出者比例数最高的几个省份（南方、西方和俄国中部黑土地帶），移民人数才等于人口自然增加額，或

者稍微超过一些。

但是，在西伯利亚还有大量适于移民耕种的空地。不过，由于过去统计工作做得很少，要确定一个近似的数字也不易办到。还是在1896年，庫洛姆津曾把可以开垦的土地蕴藏量确定为13万人的份額。从那时起，已經分配出去10倍于这个数額的土地，但蕴藏量还没有用尽。相反，根据移民管理局的统计，到1900年，适于移民的土地的現有蕴藏量就有300万人的份額，可供600万移民使用。我們看到，这些数字的差别很大，其波动的幅度也很大。

无论怎样，即使把后一数字中的一定比例作为官僚主义常有的夸大部分抛开不谈，西伯利亚无疑还是有可垦的土地的，因此，只要把移民工作合理地加以組織，則向那里移民，无论对西伯利亚还是对全俄国來說，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就連这个 *conditio sine qua non*^① 現政府也不能实现。現在的移民事务办理情况再一次表明和証明，我国的“旧制度”絕對不能滿足居民最起碼的經濟要求；不适当的移民办法再一次証明，現在当权的老爷們是沒有能力对国家的經濟发展做一点好事的。

社会民主党代表每年在討論移民管理局預算时所作的发言，也都是为了使人弄清移民政策的方針、性質和执行情况。

政府在迁移农民这件事情上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決定其他一切問題的基本問題，因为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整个性質取決于这一政策的目的。

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馬第二次常会上发言的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是这样說明政府在迁移农民这件事情上給自己提出的

① 必要的条件。——編者注

任务的。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說：“移民政策是政府整个土地政策的一个环节。地主需要貧弱的农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政府曾經极力阻止迁移，使各地保有多余的人口。但这还不够，政府还加紧反对擅自迁移，竭力关闭这一安全閥；但是当时人口的自然增加在繼續进行，时代已經改变了；无产階級和飢餓农民以及由于飢餓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威胁象烏云般地卷来。政府和地主赶忙抓住移民問題，把它和 11 月 9 日法令共同作为自己土地政策的基础，但是在执行 11 月 9 日法令时所注意的是殷实的农民，是要剝夺貧弱农民的土地并把它交給殷实的农民，而这里所談的則是尽量把貧弱农民排挤到西伯利亚去；尽管最近富裕移民的平均水平有提高的趋势，但是，主要群众——用斯托雷平的術語來說——仍舊是貧弱农民。土地规划委员会也参与了，或者說是被吸引来参加这种加紧排挤的活动。

土地规划委员会負責分給移民土地，并进行登記，从而結束从前的土地混乱現象。可見，先生們，11 月 9 日的法令、拚命鼓吹移民、加紧排挤弱者到西伯利亚去以及成立土地规划委员会，乃是同一个問題、同一个政策的两个紧密相联的方面。不难看出，11 月 9 日法令的实施，可以使殷实的农民靠牺牲貧弱农民而定居在份地上，从而可以把这些弱者，这些在殖民方面不太适宜分子赶到他們陌生的边远地方。無論在村社方面还是在移民方面，政府的移民政策都只是根据一小撮农奴地主地主的利益，总的說，是根据压迫工人群众和劳动农民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制定的。政府根本不了解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国民經济的需要。”（第 2 次常会，第 77 次會議）

齐赫澤代表在国家杜馬第二次常会上的演說中最充分地揭露了事情的这个方面，他詳細地描述了移民政策在高加索执行的

情况。

社会民主党发言人首先用事实和数字证明，关于高加索的空地的所有官方报道，都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符。我们要特别着重指出，齐赫泽代表为了避免说他偏袒和歪曲起见，总是利用官方材料和政府官员的报告。根据前国家产业大臣早在80年代搜集的材料，“仅仅在高加索官地上定居的国家农民中间，在南高加索四个省里，完全没有土地的计22 000人，每人有份地不满1俄亩的计66 000人，有份地1—2俄亩的计254 000人，有份地2—4俄亩的计5 013人，——份地少于在高加索定居的移民的最低分配定额的共约100万人。在庫泰依斯省29 977户中，无地和份地不满1俄亩的计2 541户，1—2俄亩的计4 227户，2—3俄亩的计4 016户，3—5俄亩的计5 321户。根据最近的报告，南高加索四个省完全没有官地或官地很少的村落约占46%，而庫泰依斯省无地农户约占83%。从巴庫农业生产需要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知道，这些土地很少的村落中还有一些无地的农民，他们迁移到拥有大量份地的农民近旁去住，因而长年处于这种依存地位。而参政员庫兹明斯基在其奏折中说：‘可以看出，移民成分有时是由于放弃耕作和把为了殖民目的而获得的土地租给同村人和邻村土著农民的人构成的。’可见，早在25年以前，南高加索就有数十万本应比其他各类农民更有保证的国家农民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作雇农了。早在25年以前，当地农民就不得不租佃交给移民的土地”。

根据这些材料就可以判断高加索国家农民的土地保证情况。

发言人继续说：“至于所谓临时义务农民，根据规约可以看出，梯弗里斯省完全没有土地的就有1 444户，甚至连宅地都没有的就有386户。这占梯弗里斯省地主的农民总数的13%。庫泰依斯省在改革时无地的农民还更多。

即使拿梯弗里斯省农奴总数来比，在庫泰依斯省就有 5 590 戶或 25 000 个在高加索农民解放时期連一小块土地也沒得到的农奴。”报告的作者繼而談到义务关系的解除时說：“改革后經過了 20 年，到 1895 年，叶里薩維特波尔省的无地农民有 5 308 戶或男女 25 000 人。巴庫省的无地农民有 3 906 戶或男女 11 709 人。下面是关于那些沒有贖买自己的份地但也进行某种經營的临时义务农民拥有土地情况的材料。梯弗里斯省每人平均为 0.9 俄亩，庫泰依斯省为 0.6 俄亩。梯弗里斯省贖回份地的农民每人平均为 1.7 俄亩，庫泰依斯省为 0.7 俄亩。这就是那些进行某种經營的农民在土地方面所得到的保証的情况。庫泰依斯省农业生产需要委员会的报告对高加索农民經濟状况作了总的描繪。根据从各种官方調查中得来的材料，庫泰依斯省极端貧困的农民人数达 70%。不仅如此，这里也提到，庫泰依斯省有 25% 的貴族也很穷。”

报告中繼續談道：“这些土地所有者只有在找到其他賺錢門路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自己的經濟独立，他們完全沒有可能花錢进行土地改良、購買农具和肥料。大量的需求不能不影响到租佃份地的代价，它在实行对分制的情况下往往达到总收入的 60%，在必須繳納一定数量的土地产物的情况下，年景不好时往往超过总收入。采用貨幣地租的很少，租金每俄亩每年达 30 卢布。这是庫泰依斯省的情况。下面是关于叶里薩維特波尔省四个县的农民拥有土地情况的材料。根据有关一切靠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的資料，我們看到，在叶里薩維特波尔省的四个县，即季布拉伊里县、贊格祖尔县、舒申斯克县和哲万施尔县，平均每人有地 0.6 俄亩。根据參政員庫茲明斯基的統計，巴庫省連科兰县在地主土地上落戶的移民每个男人平均有份地 0.5 俄亩。在庫宾县为 0.9 俄亩。”发言人最后說：“先生們，这就是南高加索农民拥有土地的情况。”

如果說在缺少土地方面高加索农民的状况与俄国农民的状况沒有多大区别，試問，高加索的垦殖土地能从哪里找到呢，为什么还要向那里迁入而不把当地农民加以分散呢？

移民用的土地是靠疯狂地損害土著居民的地权而得来的，从俄罗斯向外移民則完全为了貫徹“边区俄罗斯化”这一民族主义原則。

齊赫澤代表引用了許多也是來自官方的材料，說明為了準備墾殖土地，怎樣把整村整村的土著居民從他們的故土趕走，為了替剝奪山民土地的行為辯護，怎樣暗中安排了一系列審判案（見貴族代表策烈鐵里公爵向內務大臣作的關於庫泰依斯縣基克納韋列齊山村情況的報告），等等。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罕有的例外的事實，而是正如參政員庫茲明斯基所確認的“典型的事件”。

結果在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間形成了直接敵對的關係。例如，當阿拉爾人從他們的土地上被趕走，象參政員庫茲明斯基所說的那樣，“被遷出去而得不到土地保證，只好聽天由命”的時候，掠奪他們土地的移民卻靠國庫的開支武裝起來；當地縣官接到命令“要設法供給穆干草原上重新建立的村莊的農民（其中包括從波克羅夫斯克來的人）以武器——每100戶10支步槍”。這是說明現行政策的“民族主義方針”的重要例證。

雖然如此，國家杜馬的右翼代表們還是洋洋得意地指出，據高加索總督報道，可以移民的土地有170萬俄畝。但是，也正如這個總督所證明的那樣，幾乎有一半這樣的土地已經被移民占去，而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仍如這個總督所確認的那樣，是在那些不習慣這種地方的莊稼人在體力上根本不能進行經營的地方。

齊赫澤代表還講了政府如何安置各地新移民的情況。“根據總督的報告，主要是南高加索東部地區，移民土地上的供水和灌溉非常缺乏，這是使已定居在那裡的移民又遷出去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移民從黑海沿岸地區紛紛逃走，因為不但在每個居民點之間，而且在移民地區本身範圍內，都沒有適於車輛通行的道路。關於這點，應該再補充一下：移民們所不習慣的惡劣的氣候條件，在高加索許多地區發生了損害人畜的瘧疾病，這種惡劣的氣候條件，至少

也象沒有道路一樣，迫使還沒怎麼安頓下來的移民紛紛逃出邊區。在上述原因的影響下，接連不斷地發現移民從葉里薩維特波爾省、巴庫省和達格斯坦地區以及從梯弗里斯省和黑海省遷出的現象。”

因此，這位總督便對向高加索移民的結果作了評價。總督說：“至今對高加索居民的土地問題所採取的態度已經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為這種態度對於農村居民的革命情緒，無疑是起了頗為重要的作用。”

政府和統治階級在遷移農民到西伯利亞去時提出了完全類似的任務；由於追求政治目的，他們在這裡同樣是既不考慮移民的利益，也不考慮老住戶的權利。

在遷出地，即在俄羅斯，移民事宜現在由土地規劃委員會、地方官和省長掌管。土地規劃委員會最關心的是怎樣疏散當地少地和无地的農民，它們根據大土地所有制的需要把一部分這樣的農民留在當地（作為僱傭勞動力的供給者），同時卻用大力把貧農“遷出”，以至引起了移民管理局的怨言。有一個移民官抗議說：“土地規劃委員會組織了一批一貧如洗的人，他們需要旅費補助金，需要貸款，但不是為了安家，而是為了糊口；即令有個別的移民帶了一些錢，但一路上也都吃用光了。”

這些被“把希望寄托在強者身上”的土地政策所遺棄的“弱者”，被裝在運牲畜的車廂里，老人、孩子和孕婦擠得滿滿地，一群一群地被運到西伯利亞去。移民們就在這些運牲畜的車廂（寫着“40個人，8匹馬”的顯著字樣）里做飯，洗衣服；在這裡往往還躺着患傳染病的人，移民們總是把他們藏起來，因為他們害怕被攆下車去而掉隊。在車站和終點，移民下車了，碰得巧，可以在專門設

置的帐篷下呆一呆，碰不巧，就得在露天下受日晒雨淋。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在杜馬中說，他本人在斯烈琴卡地方就看到过一些患伤寒病的人露天躺在雨地上，毫无遮盖。就是上面所引的这样一些移民旅行条件，两位大臣（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还認為“并不算坏”。他們向皇上奏稟道：“移民在路上的卫生条件并不算坏，有許多人在旅途上甚至非常舒服。”官僚主义的寬宏大量真是无边无际！

貧困不堪的移民虽然在“到天国去”的道路上受尽了千辛万苦，但他們在西伯利亚并没有找到幸福。例如，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就曾經引用官方报告来描述他們在新区的生活状况。

有一位官員（移民管理局的特派員）写道：“大多数移民区分散在針叶树林地带，缺水，缺少耕地，缺少牧場。”另一位官員补充說：“貸款完全失掉了作为安家費用的性質；貸款数目对于安家來說本來就太少。所实行的貸款制度把貸款这件事情变成了純粹的慈善事业，因为两年左右靠 150 个卢布的貸款是不可能安家糊口的。”

請看，下面就是这些官方报告中对新移住者的卫生状况的描写。

一位官員写道^①：“在伤寒病之后，这里又有坏血病流行；几乎在所有村落和农舍里都有患这种病的或者将要患这种病的人。往往在一家农舍里躺着患这两种病的人。在奥庫尔-沙斯克移民区，我曾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的男主人患伤寒病正在脫皮期，他那怀孕的妻子因营养不良而极端虚弱，兒子是个 12 岁左右的孩子，淋巴腺肿胀，并且患着坏血病；他的妻妹也患坏血病，不能行走，她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她有个 10 岁的男孩子也患坏血病，鼻子流血，双腿发軟，只有她的丈夫是全家中唯一健康的人。

^① “报告”第 8 頁。

随着坏血病和伤寒而来的是夜盲症。有的村落簡直可以說所有移民一无例外地都是瞎子。叶姆納河沿岸有許多地区是一片密密的針叶林，这里既沒有耕地，也沒有割草場，两三年来新移民勉勉强强地耕耘自己宅旁的土地，盖起簡陋的小茅舍。根本談不到粮食自給，完全靠借貸为生。借来的錢用完了，就感到粮食特別缺乏；許多人确实是在挨饿。不仅粮食缺乏，而且飲水也缺乏。”

这样的报告比比皆是。不管这些官方报告怎样駭人听闻，显然，还是沒有完全道出真相，这样也就粉飾了现实。例如，曾訪問过远东的地方自治总局的全权代表李沃夫公爵，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見解温和的人，就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殖民情况作了如下的描写：

“与世隔絕，如在荒島，周围是密林沼地，河谷山嶺也到处都是沼澤，这样荒涼的生活、劳动和养育条件，自然会对那些意志薄弱的貧困移民有很大压力。他們为了安置簡陋的住所，刚开始同严酷的自然作斗争就耗尽了自已仅有的一点点精力，因而变得冷漠无情。坏血病和伤寒病侵袭着疲憊不堪的机体并将它拖进坟墓。1907年，許多村落的死亡率簡直难以置信，竟达25—30%。这些村落里有多少戶人家就有多少十字架，不少村落的居民注定要全体迁往新的地区，不然就得进入坟場。不幸的家庭里不知流了多少悲痛的眼泪，在遙远的边疆，不但沒有殖民，反而靠公費举行了昂貴的葬礼！被去年的移民浪潮卷到大森林中来的残存者并不是很快就能站稳脚跟。許多人还会死亡，許多人还会逃走，回到俄罗斯，訴說自己的灾难，詛咒这个地区，使人不敢再来，为今后的移民工作造成障碍。难怪今年在沿海地区发生了空前規模的移民倒流，而流入这个地区的移民也减少了 $\frac{1}{6}$ 。”

生活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特別是在西伯利亚道路阻塞的情況下，移民被隔离和被遺弃的情况使得李沃夫公爵也大吃一惊，这不是沒有道理的。可以想象，現在那里正在怎样轟轟烈烈地进行着各个独立农庄經濟的安排和独立田庄地段的划分，因为那些土

地政策的指导者已经宣布：“必须坚决改变(!)西伯利亚的土地政策”，“建立和巩固私有制”，“根据1906年11月9日法令确保个体农民的土地”，“尽可能进行土地的分配，把移民区变成独立田庄”^①，等等。

很自然，在这种殖民条件下，根据移民管理局的材料，在1908—1905年已安置好的移民中，一头耕畜也没有的占10%，只有一头耕畜的占12%，没有乳牛的占15%，没有犁杖的占25%（引自盖达罗夫代表在第一次常会上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所作的发言）。因此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依据这些官方报告，有充分权利对1906—1908年的移民政策做出如下的结论：

“在1906、1907和1908这三年的过程中，就有1 552 439个男女被迁往烏拉尔以东地区，其中有一半是穷人，他们听信了政府的宣传，来到这陌生的边区，听憑命运的摆布。按照移民管理局所写的材料，其中已安居下来的有564 041人，已返回的男女有284 984人。这就是说，根据移民管理局的报告，有下落的为849 025人，那末其余的人到哪儿去了呢？那703 414人究竟在哪儿呢？先生们，政府分明知道他们的悲惨命运，但它就是不說；其中一部分人已加入老居民村，另一部分补充了西伯利亚无产阶级的行列，到处行乞。

但是有一大部分人政府给举行了昂贵的葬礼，这就是政府关于这些人闭口不提的原因。”

馬尔柯夫第二用移民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就是这样实现的。在这些事实面前，就连大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移民工作的缺陷”。早在举行第一次常会时，十月党人就表示了自己的愿望（而且杜馬也接受了这种愿望），即“改变和改善移民旅途条件”，“在定居地区创造发展这些地区的文化经济所必需的

^① “报告”第60、61、62页。

条件”，“在給移民划分土地和安置他們时要尊重当地农民和异族居民的利益和权利”。自然，这些小心翼翼表达出来的和有意弄得模稜两可的愿望迄今仍是“曠野的呼声”。十月党的啄木鳥年复一年耐心地重复着这种老調……

載于1912年6月3日

“涅瓦明星報”第11号

署名：弗·伊·

按“涅瓦明星報”原文刊印

革命的高漲³²

全俄无产阶级的轟轟烈烈的五月罢工，以及与罢工相連的游行示威、革命宣言和向工人群众发表的革命演說，都清楚地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漲时期。

这次高漲决不象晴天霹靂那样突如其来。不，它早已由俄国生活的一切条件准备好了。由連納慘案和紀念五一所引起的群众性罢工，只不过最終确定了这次高漲的到来。反革命的暂时胜利原是与工人群众斗争的低落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参加罢工的人数，使我們对于这一斗争的規模有了一个近似的但是絕對客观而真实的概念。

革命以前的10年，即1895—1904年，罢工人数每年平均为43 000人（按整数計算）。1905年为275万人；1906年为100万人；1907年为75万人。三年的革命时期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高漲到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地步。这一斗争的低落，开始于1906年和1907年，到1908年就已非常明显；罢工人数只有175 000人。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恢复了与黑帮地主和工商界巨头的杜馬相勾結的沙皇专制制度，这次政变是群众革命毅力衰退的必然結果。

1908—1910年这三年，是黑帮反革命势力猖獗、自由资产阶级背叛以及无产阶级消沉瓦解的时期。罢工人数日益减少，1909年

減到6萬人，1910年減到5萬人。

但从1910年末起，又开始了很明显的转变。因自由派分子穆罗姆策夫和托尔斯泰的逝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及学生运动，清楚地表明风向已经转变，民主群众的情绪有了一定的转变。1911年，工人群众渐渐转为进攻；罢工人数达到10万人。当时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因反革命的胜利而产生的疲惫麻木状态日益消失，群众又趋向于革命。1912年1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总结它对时局的估计时指出，“广大的民主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政治上已开始活跃起来。1910—1911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学生罢课）的展开等等，都表现出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日益增长。”（见代表会议的“通报”第18页^①）

到今年第二季度，这种情绪已经大大增长，进而表现为群众的行动并造成革命的高涨。最近一年半来的事变进程，清楚地表明这次高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合乎规律，由俄国先前的全部发展过程必然引起的。

連納慘案是群众的革命情绪转为群众革命运动高涨的导火线。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真理报”上跟着取消派重复自由派的谎言，说什么“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是連納慘案和它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应的基础”，——这真是再虚假不过的说法。在連納罢工中，根本没有提出结社自由作为特殊的或主要的要求。在連納慘案中暴露出来的，并不是缺乏结社自由，而是缺乏反对挑拨手段、反对一般无权状况、反对专横暴虐的制度……的自由。

^①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18頁。——編者注

正如我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³³第26号上所說明的，連納慘案是整个六三帝制最确切的反映。連納事件的特点决不表現在群众想爭取某种权利，即使这种权利是无产階級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利。这次事件所表明的突出事实，是在一切方面都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法制。連納事件表明奸細、偵探、特务以及沙皇的奴仆走上了沒有任何政治理由而大批枪杀人民的道路。在連納事件中表現得非常明显而把群众革命热情点燃起来的，正是俄国生活中的这种一般无权状况，正是爭取某种权利的絕无希望和絕不可能，正是沙皇帝制及其全部制度的无可救药。

自由派总是拚命想証明連納事件和五月罢工帶有工会运动和爭取“权利”的性質，但凡是沒有被自由派的（和取消派的）爭論所蒙蔽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群众性罢工的革命性質是很明显的，五一节前夜彼得堡各社会民主党小組（甚至还有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組！）共同发表的宣言，就特別強調了这种性質；我們把全篇宣言轉載在紀事栏里，这篇宣言重复了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口号。

而且連納罢工和五月罢工具有革命性質的主要証据还不在口号上。口号只不过是种种事实的归納。群众性罢工从一个区域蔓延到另一个区域，罢工大大发展和迅速蔓延，工人表現出勇敢精神，群众大会和革命演說增多，要求取消庆祝五一的罰款，我們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所熟悉的那种政治罢工和經濟罢工的互相配合，——所有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运动的真正性質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

我們来回顧一下1905年的經驗。事变告訴我們，工人还保持着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传统，而且迅速发揚了这种传统。1906年掀

起的那種世界上從未見過的罷工高潮，使最初三個月的罷工人數達到 81 萬人，最後三個月達到 1 277 000 人，而且當時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互相配合。根據大致的計算，為抗議連納事件而參加罷工的人數達 30 萬人，參加五月罷工的人數達 40 萬人，而且罷工運動還在不斷發展。每一天的報紙，甚至包括自由派的報紙在內，都登載有罷工火焰不斷擴大的消息。現在，1912 年的第二季度還沒有完全過去，但是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事實，就是 1912 年革命高潮開始時罷工運動的規模比 1905 年革命高潮開始時的規模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

俄國革命第一次大規模地發展了這一無產階級的鼓動、激勵、團結和吸引群眾參加鬥爭的方法。現在無產階級又來運用，而且更堅決地來運用這種方法了。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運用這種方法所實現的事情。一個幅員遼闊，擁有 15 000 萬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散居各地，彼此分离，备受压迫，沒有权利，愚昧无知，被一大群官吏、警察和偵探重重包围而不能自由接受“不良影响”，——現在这个国家 整个 都动起来了。工农中的最落后阶层也都直接間接地与罢工者发生了关系。一下子就有数十万个革命鼓動員出現在舞台上，他們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因为他們与下层群众有密切联系，他們始終生活在群众中間，他們为一切工人家庭最迫切的需求进行斗争，并且把政治抗議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同这种直接爭取實現迫切經濟要求的斗争結合起来。由于反革命已經使数百万、数千万群众切齿痛恨君主制，使他們对君主制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現在首都先进工人提出的口号——民主共和国万岁！——就随着每次罢工，通过成千条沟渠流到了落后阶层中去，流到了穷乡僻壤，流到了“民間”，流到

了“俄国深处”。

自由派謝韦里亚宁对于罢工問題的議論值得特別注意。他的这种議論受到“俄罗斯新聞”的热烈欢迎，“言論报”也抱着同情的态度予以轉載。

謝韦里亚宁先生問道：“工人們是否有什么理由把經濟要求或其他什么(!)要求同五一罢工攪在一起呢？”接着他自己答道：“我敢断言，他們是沒有这种理由的。任何一次經濟罢工，只有在認真估量到胜利的希望之后，才能够开始，才应当开始…… 所以把这种罢工偏偏同五一联系起来，也就往往沒有根据…… 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求把制造某种粗布的工資增加10%，更是有点奇怪。”

这就是自由派的議論！可是那些企图自命为民主主义报纸的“最好的”自由主义报纸，却抱着同情的态度接受了这种卑鄙透頂、下流恶毒的議論！

資产者最鄙陋的私欲，反革命分子最卑劣的胆怯心理，这就是这位自由派的漂亮言論中所隱藏的东西。他想保全主人的錢袋。他想有一种拥护“結社自由”的“客客气气的”和“毫无害处的”游行示威！但无产阶级並沒有这样作，而是吸引群众参加把政治和經濟密切联系起来 的 革命 罢工，这种罢工可以通过立刻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的胜利来吸引最落后阶层，同时可以喚醒人民去反对沙皇君主制。

是的，1905年的經驗創立了深刻而伟大的群众罢工传统。而且决不应忘記，这种罢工在俄国会造成什么样的結果。在我国，群众性的持久罢工是和武装起义密切联系着的。

請不要曲解我这段話的意思。这里說的决不是号召起义。在目前号召起义是极不明智的。这里是要考察俄国罢工和起义之

間的联系。

1905年的起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第一、群众性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使群众与軍警間的冲突日益增多。第二、群众性罢工激发农民去举行許多次局部性的、零散的和半自发的起义。第三、群众性罢工非常迅速地蔓延到陆海軍中去，在那里引起基于經濟要求的冲突（“豌豆暴动”等等），甚至引起起义。第四、反革命自己用残杀、毒打民主分子等方法来挑起內战。

1905年的革命所以遭到失敗，决不是因为它跑得“太远”，决不是因为十二月起义是“人工造成的”，象自由派叛徒們所設想的那样。恰恰相反，它遭受失敗的原因，是起义跑得不够远，是起义的必要性的思想在革命階級中間还没有广泛传播和被充分領会，是起义还不是步調一致、坚决果断、組織严密、同时发动和有进无退的。

現在我們来看看，目前是否有起义成长的征兆呢？为了不陷于革命狂热，我們且拿十月党人作証人。彼得堡的德意志十月党人协会大半是所謂“左派”和“立宪派”十月党人，他們是立宪民主党人最喜爱的人物，并且最能（与其他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相比較）“客观地”观察事件，而不抱有以革命恐吓上司的目的。

这些十月党人的机关报《St.-Petersburger Zeitung》^①在5月6日（19日）的每周政治評論上写道：

“五月到了。不管天气怎样，五月对于首都居民通常总是不很愉快的，因为五月的头一天就是无产阶级的‘节日’。今年工人还留着連納示威运动的印象，所以5月1日这天特别危險。在充滿着各种各样罢工和示威的謠言

^① 即“圣彼得堡报”。——編者注

的首都空气中，可以嗅到一种火药味。我們忠实的警察机关显然很着急，赶忙进行搜查和逮捕某些人，并派出了大批巡邏队以防止游行示威。警察机关除了搜查工人报館的編輯部和逮捕它們的編輯以外，并没有想出其他妙法，这証明它对于那些牵引工人木偶大队的綫索知道得并不很深刻。而这种綫索是有的。罢工的紀律性以及其他許多情况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这次五月罢工非常可怕，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各大小工厂的10万以至15万工人。这还只是一次和平的检閱，但是这支大軍的团結性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何况与不久以前的工人怒潮同时发生的还有其他許多令人惊惶的現象。在我国海軍的各种軍艦上，有些水兵因进行革命宣传而被捕。根据报刊上所透露的消息看来，我們本来为数不多的軍艦上的情形是不很妙的…… 铁路工人也使人感到惊惶不安。固然，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举行罢工的嘗試，但是一連串的逮捕事件，特别是象逮捕尼古拉铁路副站长阿·阿·烏沙可夫这样惹人注目的事件，表明鉄路上也相当危险。

幼稚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嘗試，对于杜馬选举运动的結局，当然只能产生有害的影响。这种嘗試是最輕率的举动，何况……沙皇已經委任了馬努兴，国家参議院已經通过了工人保险法！”

这就是德意志十月党人的議論。我們要指出，关于水兵的問題，我們已經从各地得到許多确凿的消息，証明“新时报”夸大事实。暗探机关显然在干着挑拨的“工作”。过早的起义嘗試是极不明智的。工人先鋒队应当明白，在俄国举行适时的即胜利的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就是民主农民起来支援工人阶级，以及軍队积极参加起义。

革命时代的群众性罢工有其客觀的邏輯。它把几十万、几百万点火星散布到各方面去，而周围則布滿着引火物：极度的怨恨，空前的飢荒折磨，暗无天日的专橫暴虐，对“穷人”、“农夫”和士兵的橫加凌辱。再加上黑帮肆无忌惮地蹂躪犹太人的暴行，而这种暴行則是由接近昏庸暴虐的尼古拉·罗曼諾夫的宮廷党徒暗中策

划和指揮的……“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³⁴——大臣馬卡罗夫的这句话，竟反过来成了对他自己和他的阶级以及他的地主皇帝的预言！

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漲，給一切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切忠实的民主主义者加添了伟大而艰巨的责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这些责任就是：“从各方面支援正在开始的群众运动（现在已经应该说：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群众运动），并且在彻底实现党所提出的口号的旗帜下扩展这种运动。”党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应成为整个民主运动的口号，人民革命的口号。

为了支援和扩大群众运动，最必要的就是組織。沒有秘密的党，就不可能进行这种工作；空談这种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在支援和扩大群众的攻击时，必須仔細考虑到 1905 年的經驗，既要說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要預防和阻止过早的起义嘗試。群众性罢工运动增长的情况，吸引其他阶级参加斗争的情形，組織状况，群众的情绪，——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表明，在什么时候一切力量应当联合起来向沙皇君主制进行步調一致、坚决果断、有进无退和勇往直前的革命攻击。

沒有胜利的革命，俄国就不会有自由。

沒有工农起义来推翻沙皇君主制，俄国就不会有胜利的革命。

載于 1912 年 6 月 17 日（4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7 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国代表會議的口号和五月运动

在本号报纸的另一个地方，讀者可以找到彼得堡工人在从此聞名的五一游行之前印发的宣言全文。这个宣言很值得談一談，因为它是俄国工人运动史和我們党史上的一个极重要的文件。

宣言反映了首都社会民主党处在某种程度上的組織瓦解状态，因为宣言上署名的不是彼得堡委员会，而是各个社会民主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在俄国大部分地区，我們党的状况正是这样：领导委员会和领导中心經常被破坏，但是也經常重新产生，因为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工厂的、工会的、分区的和区的社会民主党小组，还存在始終遭到自由派和取消派痛恨的“支部”。在这些先生出版的最近一期杂志（“我們的曙光”，1912年第4期）上，讀者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弗·列維茨基先生是多么切齿痛恨和罵不絕口，反对所謂“通过人为地复活政治上已經僵化的支部的办法来恢复党”。

这个宣言所以显得特別突出和特別重要，正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由于彼得堡委员会被破坏，因警察迫害而脱离了取消派仇視的“领导中心”的支部也就不得不登上舞台。由于这种对每个革命者說来都很悲慘的情况，各支部的独立生活也就表現出来了。在警察大肆迫害下（五一前簡直是疯狂到了极点），各支部不得不匆

匆集聚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联系，恢复“地下組織”。在宣言上签署的小組、代表等等，都正是自由派和取消派所痛恨的地下組織。当这个取消派領袖列維茨基先生以“我們的曙光”杂志和“活的事业报”的名义，口沫四濺地猛烈攻击“崇拜地下組織”（見同期杂志第33頁）的时候，我們得到了彼得堡的宣言这样一个确切而完整的文件，这个文件使我們看到了这种地下組織的存在，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它的活动内容 和它的作用。

彼得堡委员会被摧毁了，于是立刻就可以看到，地下支部的情形究竟怎样，他們在做些什么和能够做些什么，什么思想他們真正接受了和領会了，而不是仅仅从党的上級机关机械搬来，也就是說，什么思想得到了工人的真心拥护。

从宣言中可以看到各支部所做的事情：它們在繼續进行暂时被破坏（这使得一切形形色色反对地下組織的人称心滿意）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它們在繼續准备五一游行。它們在尽快恢复各种秘密社会民主党小組之間的联系。它們也吸引社会革命党工人，清楚地懂得在实际的革命事业中无产阶级实行联合的意义。它們用明确的斗争口号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党小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組”团结在一起。这就正好說明了运动的真正性質，說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情緒，說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真正力量。

由于逮捕，那种按照上下級关系可以决定提出一定口号的机关已經不存在了。也就是說，只有提出真正为群众接受的口号，只有提出不是靠“上級命令”（象煽动者和取消派所說的那样）而是靠革命工人的信念获得力量的口号，才能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把社会民主党工人，甚至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

而結果究竟怎样呢？

結果是：在彼得堡委員會被破壞之後，在它不可能立即恢復的情況下，在一個工人小組不是從組織上而是完全從思想上去影響另一個工人小組的條件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國代表會議提出的口號被人們接受了。這次會議是於1912年1月召開的，它引起了自由派、取消派、李伯爾、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簡直是瘋狂的仇恨！

彼得堡工人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我們的口號應當是：召開立憲會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接着，他們在宣言里高呼：“打倒沙皇政府！廢除六三專制憲法！民主共和國萬歲！社會主義萬歲！”

我們從這個頗有教益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全部口號都為彼得堡無產階級接受了，這些口號表明新的俄國革命已開始邁開了腳步。所有誹謗和指責一月代表會議的人可以任意繼續干自己的骯髒勾當，但是彼得堡的革命無產階級是會給他們反擊的。儘管警察當局經常橫加迫害，儘管五一節前革命者被大肆追捕，儘管自由派和取消派報刊上謠言和謾罵層出不窮，革命社會民主黨在這次代表會議召開前就已長期進行的工作，即號召無產階級要在人民革命中擔任領袖的工作，還是開花結果了。

為數幾十萬的彼得堡無產階級，還有俄國各個角落的工人跟在他們後面，相繼舉行了罷工和遊行示威，但他們並不是以資產階級社會的單獨一個階級的身分出現的，而是以領導者的身分出現的，他們並不是僅僅提出“自己的”工會的口號，而是為了全體人民、代表全體人民、為了喚醒和吸引一切需要自由和能夠取得自

由的阶级投入斗争而高举起革命的旗帜。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升到了高级阶段。如果说1905年的运动是从群众罢工和加邦请愿阴谋开始的，那末在1912年，尽管我们党的许多组织被警察摧毁了，但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了群众罢工的方式，并举起了共和国的旗帜！尽管环境非常艰苦，各个“支部”，分散于各处的工人“小组”，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五月委员会”，提出负有解放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使命的阶级所应有的革命纲领投入了斗争。

五月运动还向我们表明，另一种关于“联合”的言论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工人的联合实际上又是怎样实现的。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在巴黎布尔采夫的“未来报”³⁵上写道：“应当指出这次五一游行的下列特点：在预备会上，彼得堡工人拒绝承认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现有的划分；……达成协议的趋向占了压倒优势。”我们所转载的宣言清楚地表明，这种结论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就是：已失掉领导中心的社会民主党各支部，恢复了同所有一切小组的联系，吸引了具有各种不同思想方式的工人并向他们所有的人宣传自己的党的口号。正因为党的这些口号正确，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包括了全民革命的任务，所以才为全体工人所接受。

联合得到实现，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抛弃了拉拢国外小组的无聊作法，不再对革命党的取消派作无益的追求，并及时提出了明确的斗争口号。无产阶级能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同非无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并不是由于同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取消派成立协定，而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工作人员团结一

致，由于他們正确地估計了当前的任务。

这对那些一味听信崩得自由派和維也納托洛茨基派的空談，从而还相信可以同……取消派“联合”的人，是个很好的教訓。李伯尔、托洛茨基及取消派的臭名远揚的“組織委员会”大肆宣揚“联合”，但实际上它沒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真正能把工人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的口号。取消派提出了自己的非革命的口号，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口号，——但运动却不顧他們而向前发展。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空喊“联合”的实质所在！

4月28日（5月6日），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对天发誓，說他主张“联合”，同时百般咒罵代表會議，要好心人相信，“爭取結社自由的斗争是”連納事件及其反应的“基础”（11），“实现这种要求，不論現在或将来，都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任务（11）”。可是只經過那么一个星期，取消派应声虫的这些可耻言論就象灰尘一样，被“圣彼得堡所有組織起来的工人的代表”，“社会民主党‘联合’小組”、“社会民主党城市中心小組”、“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組”及“五月委员会代表”一扫而光了。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开始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不应当是为爭取一种权利，哪怕是对工人阶级來說最主要最重要的权利，而应当是为爭取全体人民的自由。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他們应当使要求集中，而不应当使要求分散；共和国包含結社自由，而不是相反，必須击中要害，扑灭祸根，摧毁沙皇黑帮俄国的整个体系、整个制度。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对尼古拉·罗曼諾夫，对黑帮杜馬提出結社自由的要求，是可笑而愚蠢的，認為可以把俄国現存国家制度，把我們的“六三专制宪法”同結社自由联系起

来，也是可笑而愚蠢的；他們懂得在这个普遍完全无权的国家里，在这个政府当局横行霸道、大肆挑拨离間的国家里，在这个甚至对千百万飢民进行一般救济的“自由”都沒有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自由派空談家和自由派工人政客才会把結社自由当作“革命动員的中心任务”。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階級懂得这一切，并且高举起共和国的旗帜，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認為只有这样，才能保証革命具有真正民主性質。

載于1912年6月17日(4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当我们收到取消派的“涅瓦呼声报”创刊号的时候，本期的社论已送去付印。“我们的曙光”杂志的著名取消派符·叶若夫竟然在这个新办的机关报上立即发表了如此妙论，也真出人意料！不信请看：

“因此”（就是说，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罢工，有的罢工只是为了对五一游行罚款表示抗议，有的罢工则在这种抗议之外又加上经济要求等等）“在相当多的场合下，抗议的原则性（要知道，不是为了25个戈比而罢工）模糊了（！??！），被经济要求弄复杂了……”

亲身的经验会提醒工人，用经济要求把自己的抗议弄复杂化，正如用原则性的要求把平常的罢工弄复杂化（！?）一样，是不适当的（！！）。

必须在组织上巩固工人群众的情绪。必须加强拥护工会的宣传，为工会征求新的会员。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工人当中现在有不少激烈人物热衷于群众性的运动，在群众集会上反对工会，好象工会是无益的，不必要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经济”（仅仅是经济吗？）“罢工的时代。如果把经济罢工同工人的政治行动交织在一起，那就犯了无法纠正的错误（！！！）。这样混在一起，对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有害的（！！??）。”

这些话完全是这位取消派从自由派谢韦里亚宁先生那里抄袭来的！他根本不了解，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必须既包含经济罢工，也包含政治罢工；他思想狭隘，对高涨的革命性质恣意歪曲，企图用“平常的罢工”尺度来衡量它；他提出“不要”用经济把政治“弄复杂化”，不要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这个极反动的主张；他就象司徒

卢威和馬克拉柯夫一样，在公开的刊物上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进行攻击，說他們这些“激烈人物”“反对工会”！

自由派只能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理解成是“反对工会”的。可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工人当然不会“反对工会”，而是反对叶若夫先生之流所干的用自由主义口号偷偷代替革命口号的勾当。工人說，我們的口号不是結社自由，不是单单或者主要用“工会”就可以“在組織上巩固”我們的运动。我們的口号是建立共和国（見彼得堡工人的宣言），我們要建立能領導群众向沙皇君主制进行革命袭击的秘密党。这就是工人在群众大会上所講的話。

而李伯尔和托洛茨基之流的先生們却硬要工人相信，好象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階級及其政党竟可能同叶若夫、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的自由派“联合起来”！

載于1912年6月17日(4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联合者”

取消派正在竭力“联合起来”。最近他們几乎要同所謂“左派”的波兰社会党人³⁶“联合起来了”。波兰社会党“左派”是波兰社会民族主义派别之一。

波兰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的社会民族主义进行了10多年的斗争。结果，一部分波兰社会党人（“左派”）的许多民族主义偏见被消除了。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波兰工人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同波兰社会党的这个派别在組織上联合起来，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害。“左派”中的某些个别的工人和个别的团体，由于不愿意仅仅停留于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原则作不彻底的修正，现在正脱离“左派”而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我們的取消派就是在这个时候偷偷地要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的！

这就等于，比方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避开崩得而要同所謂“錫安社会主义者”“联合”，或者避开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党而要同所謂“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党人同盟”（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人同盟）“联合”……

我們已經不談問題的形式方面。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波兰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订了一項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波兰的任何团体只要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組織，就可以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1908年12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

国代表会议，甚至以压倒多数否决了讨论同“左派”联合的问题³⁷。

非常明显，托洛茨基和他的伙伴取消派虽然经常叫喊“联合”，实际上却在加深波兰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幸运的是，这伙取消派分子和跟着他们走的“调和派”，实际上根本无力干出什么事情，这在波兰也是如此。不然，取消派同波兰社会党“联合”，自然就会造成波兰的严重分裂。

取消派为什么要公然冒险呢？这显然不是“由于生活得好”，而是由于他们需要同某些人联合，需要建立某种“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社会民主党人而抓住与我党毫无共同之点的波兰社会党人。俄国城市中我们的一些老的党组织没有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支部而抓住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点的所谓取消派“倡导小组”。

“生活得好，就不会去飞”……取消派先生们，现在是否到了你们也该同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取消派？）“联合”的时候了。要知道，这些先生也拼命想“联合”。那时你们就能建立一个“大”党。拉林本人就会感到满意了……

* *
*

现在取消派正在同“列强”“联合”，他们同“调和派”在这个取消派-调和派阵营的“联合”条件问题上还在讨价还价。弗·列维茨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告“各派别”的宣言性文章，表示同意跟不久前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进行斗争。

列維茨基先生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擁護聯合，反對分裂”。請看，有哪一點不象托洛茨基呢？自從護黨派在工作的各方面給了取消派以強有力的回擊以後，列維茨基之流已經非常熟練地掌握了“調和派的”語言。看啊，他們完全擁護“統一”。他們只不過提出了以下4個最起碼的“聯合”條件：

(1) 同團結了全體社會民主黨人（一小部分動搖分子除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會議進行鬥爭。

(2) 建立一個代替黨的“中央倡導小組”（着重號是列維茨基先生加的，見“我們的曙光”雜誌第4期第31頁）。（關於什麼是取消派“倡導”小組，不久前普列漢諾夫在他的“社會民主黨人日誌”³⁸第16期上有解釋。崩得和托洛茨基為了替取消派效勞，都對讀者隱瞞了普列漢諾夫的解釋。先生們，你們是隱瞞不住的！）

(3) 不要復活那些“政治上已經僵化的支部”（同上第38頁）。

(4) 承認“反對崇拜地下組織”的口號（同上第38頁）。

綱領已經草擬好了，雖然不象過去那樣露骨和有信心，但是仍然相當清楚。列維茨基也在这里極其詳盡地向所有托洛茨基分子表白：先生們，要知道，你們是沒有選擇的余地的。接受我們的條件吧，這樣，我們（列維茨基之流）也樂意同意；你們（托洛茨基之流），為了“自慰”可以說，不是你們投靠取消派，而是取消派投靠你們。

在同一期“我們的曙光”雜誌上，馬爾托夫事先威脅未來的第四屆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說，如果它也象它的狡猾的前輩一樣反對取消派，那末“類似別洛烏索夫的事件³⁹，就不會只是一種例外，而會成為慣例”，簡單說來，就是取消派必將分裂杜馬黨團。取消

派先生們，梦是够可怕的……假如你們有力量，你們早就組成了你們自己的取消派杜馬党团……

“联合”的事业是有把握的——这没有什么可說的……

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演出的这出可耻的“联合”滑稽剧，連那些最不喜欢挑剔的人都感到厌恶。联合正在实现，不过不是同取消派联合，而是反对他們。

* * *

我們認為，对于那些願意按照文件严肃認真地来检查爭論的問題而不願意輕信空話的讀者，只須指出下列事实，就足以証明托洛茨基、李伯尔（“崩得”）和取消派及其臭名远揚的“組織委员会”的极端虛伪性：

1911年6月，即在李伯尔和伊哥列夫退出中央委員的會議以后，在巴黎成立了国外組織委员会。国外組織委员会在俄国找到的第一个組織是基輔組織。甚至托洛茨基也承認这个組織。1911年10月，在基輔組織参加下成立了俄国組織委员会。1912年1月，該委员会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會議。

1912年1月，崩得、拉脫維亞中央委员会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这3个都是取消派集团）也举行了會議。波兰人認為所有企图都是取消派的企图，他們宣布了自己的看法以后便立即离去。接着“調和派”和普列汉諾夫也拒絕参加會議，普列汉諾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上声明，这次代表會議是取消派召开的。直到現在——1912年6月，除了呼声派和前进派以外，崩得和托洛茨基沒有“联合住”任何人，沒有吸引住任何一个在俄国被公認為重要的組織，他們既沒有認真回答普列汉諾夫一句話，也沒

有絲毫改变取消派在“我們的曙光”杂志和其他刊物上的宣传！
关于“联合”的空談和吹噓却没有个完。

載于1912年6月17日(4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我們同自由派論战的性質和意義

修正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著名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維奇先生，在“俄罗斯新聞”上发表了一篇題为“面临危險”的文章。这位政治家認為，危險在于第四届杜馬的选举一定会被县警察局长操縱。防止这种危險的办法就是：“把国内一切立宪分子联合起来”，也就是說，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統統联合起来。

右派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聞”編輯部特地写了一篇評論，对普罗柯波維奇先生的文章表示“滿意”。报纸上写道：“我們現在認為，反对派力量的这种联合，是当前的迫切需要。”

正式的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論报”，在引述普罗柯波維奇先生文章的内容和“俄罗斯新聞”的評論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要是讀一讀社会民主派的报刊，看到它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就未必會認為这种号召（即“联合”号召）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此，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关于竞选策略及工人对自由派的态度这个重要問題。一次又一次地迫使人們相信，自由派并不象严肃的政治家，而是象媒婆那样提出这个問題的。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弄清真相，而是竭力掩盖真相。

的确，請想一想下面的这种情况吧。自由派所說的“联合”是

不是指各党派的合并呢？绝对不是。不论普罗柯波維奇先生，“俄罗斯新聞”或“言論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是。

那就是說，他們所說的联合，是指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普利什凱維奇以至古契柯夫等右派了？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試問，“左派”中有沒有人否定这种一致行动呢？

誰也沒有否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同自由派成立協議投票反对右派，这也就是民主派和自由派在选举时的“联合”。自由派究竟有什么不滿意呢？为什么他們避而不談“左派”已极其明确而肯定地承認協議了呢？为什么他們羞羞答答地迴避正是自由派絲毫沒有明确地、肯定地、正式地說到同左派、民主派、馬克思主义者达成協議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他們在談竞选策略的时候，却对認為可以同“左派十月党人”結成联盟的立宪民主党代表會議的有名決議只字不提呢？

先生們，事实俱在，任何的支吾搪塞都无济于事。正是左派，正是馬克思主义者才明确而正式地主张同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达成協議去反对右派。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对待左派的問題上避而不作十分确切而正式的答复！

普罗柯波維奇先生对这些事实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对他的歪曲事情真相，也就是說对他所采取的对馬克思主义者明确的决定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支吾搪塞故作沉默的态度，就绝对不能原諒。

这种沉默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从上面援引的“言論报”說的似乎我們“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的話，可以看得很清楚。

根据“言論报”这句话就必然会得出下面的結論：为了同自由派联合，民主派就不应当“把一切力量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先

生們，請把這說得明白些！明確地、正式地提出你們的條件！糟糕的是你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即使你們試圖提出這種條件，也會引起人們哈哈大笑。你們提出這種條件就等於自己反駁自己，因為你們都一致承認自由派同民主派（更不用說同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有着“很大的意見分歧”。

既然有意見分歧，既然意見分歧很大，那怎麼可以避免鬥爭呢？

自由主義的虛偽性在於：一方面拒絕合併，認為有很大的意見分歧，強調不可能使“每個政黨放棄綱領中的基本論點”（“俄羅斯新聞”），另一方面卻又抱怨“同反對派進行鬥爭”！！

可是我們再進一步看看這個問題。第一、“言論報”說某些報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來同反對派作鬥爭，這是不是事實呢？不，這完全不是事實。自由派舉不出任何一個問題來說明民主派沒有把全部力量主要用來同右派作鬥爭！！誰要想檢驗一下這些話是否正確，那不妨做個試驗。比方，請隨便拿一種馬克思主義者的報紙，從中任意挑出相連的三號，然後提出三個你要檢驗的政治問題，對照一下文件材料，看看根據你所選的報紙和你所選的問題，究竟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主要是“用來”反對誰的！

自由派先生們，你們是不會去做這種誰都能做的簡單試驗的，因為任何這種試驗，都會證明你們是錯誤的。

不僅如此。第二點，也是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更能證明你們是錯誤的。民主派，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是怎樣同自由派作鬥爭的呢？他們是這樣鬥爭而且僅僅是這樣鬥爭的：他們對自由派的每一次責備或責難，本身一定包含着對右派更堅決、更嚴厲的責備或責難。

这就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關鍵！下面几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說明我們的見解。

我們指責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請你們指出，我們的这种責難有 哪一次 不是更沉重地落在右派头上。

我們指責自由派是“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請你們指出，我們的这种責難有 哪一次 不是更厉害地指向右派。

我們指責自由派，說他們害怕群众运动。怎么？你們能在我們的報紙上找到，我們不是用这种責難的話去反对右派的嗎？

我們指責自由派，說他們維護“某些”能够用来“反对”工人的中世紀制度。这样 指責自由派，也就是 同样指責，并且是更厉害地指責一切右派。

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你們随时随地都会看到，工人民主派指責自由派只是因为他們接近右派，因為他們反右派的斗争不坚决，甚至 虚伪，因為他們不彻底，然而 对右派的指責就不是什么“罪有一半”，而是“罪恶十足”。

民主派和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的斗争”比 同右派的斗争更加深刻，更加彻底，更加富有内容，更加能够教育群众和团结群众。先生們，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为了在这方面不致产生丝毫怀疑，为了防止粗暴歪曲我們同自由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为了防止出現“一律是反动家伙”的荒唐理論（即把自由派同右派混为一个政治概念，把他們看做一个反动联盟，都是反动家伙），我們在自己的正式声明里，每逢提到同右派的斗争时，在說法上总是与談到同自由派的斗争 有所不同。

普罗柯波維奇先生象任何有教养的自由派一样，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他知道，我們在确定各个政党的社会本質、阶级本

質的時候，總是強調指出，右派是中世紀性的，自由派是資產階級性的。這是“兩個很大的區別”。中世紀性可以（而且應當）消滅，哪怕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可是，資產階級性在這種範圍內就無法消滅，但可以（而且應當）“呼喚”資產階級農民，而不是資產階級地主；呼喚資產階級民主派，而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呼喚資產階級的完全自由，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半自由。我們對俄國當前自由主義的批評，即我們根據當前迫切任務所提出的批評，正是這種呼喚，而且僅僅是這種呼喚。

請看普羅柯波維奇先生下面的一句話：“為人民群眾創造正常的政治生活條件，這就是目前既能把左派也能把反對派聯合起來的最近的目标。”

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句話更無內容，更空洞，更虛幻了。十月黨人和狡猾的“民族主義黨人”都會同意這句話，因為它沒有任何明確的內容。這只不過是一種諾言，唱唱高調，用外交手法來掩蓋自己的思想。可是，既然普羅柯波維奇先生象其他許多自由派一樣長舌頭是為了掩蓋自己的思想，那我們就要試試來完成我們的任務，把這裡所掩蓋的東西揭露出來。為了慎重起見，我們來舉一個淺顯的例子。

兩院制是不是政治生活的正常條件呢？我們認為不是。進步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卻認為是。由於自由派有這種看法，我們指責他們是反民主主義和反革命的。而當我們對自由派提出這種責難的時候，我們也就更嚴厲地指責了一切右派。

再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左派和反對派的聯合”會不會發生問題呢？是不是由於這種意見分歧，我們就拒絕同自由派聯合起來反對右派呢？不，我們決不會拒絕。自由派在這個問題上，以及在

一切类似的、重要得多的政治自由問題上的反动看法，我們早在1905年或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了，可是我們在1912年还一再說：不論在重新选举时或在选举的第二阶段，都容許同自由派达成協議去反对右派。因为保皇派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尽管不彻底，但它絕不同于农奴制反动派。不利用这种区别，那就是非常糟糕的工人政策。

再进一步看。如何利用呢？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左派和反对派联合”呢？自由派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要是左派同反对派作坚决斗争，那就談不上什么联合了。而且自由派还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这样的解释：要求愈低，贊同的人就愈多，联合的面就愈广，能够实现这种要求的力量就愈大；如果实行两院制（以及对民主主义还有其他……怎样才說得輕一些呢？……小小违背）的“普通”宪制，一切民主派和一切自由派都会拥护；这样就不錯了；如果坚持“純粹的”民主主义，进步派就会离开，你还会把許多立宪民主党人“推开”，結果就会使“立宪分子”分裂和变得軟弱无力。

这就是自由派的論点。而我們的論点不同。沒有群众的覺悟，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轉。这是我們的基本前提。自由派向上层看，而我們向“下层”看。如果不去說明两院制的害处，或者哪怕是稍微削弱同对这个問題的一切反民主观点所作的“斗争”，那我們就会把自由派的地主、商人、律师、教授“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而他們都是普利什凱維奇的亲兄弟，他們是决不会真正反对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吸引”他們，我們就会推开群众，这就是說，在群众看来，民主主义并不是外交手腕，不是一句漂亮話，而是件休戚相关的事情，是个有关生死存亡的問題，他們定会丧失对两院制拥护者的信任；这也就是說，对两院制的攻击一削弱，就表示群众的覺

悟程度不够，而如果群众沒有覺悟，死气沉沉，不坚决行动，那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轉。

立宪民主党人和普罗柯波維奇之流的先生們對我們說，你們同自由派論战，使得左派和反对派分离了。我們回答說，彻底的民主派就是要推开那一小撮最动摇不定、最不可靠、对普利什凱維奇主义最能容忍的自由派，而吸引千百万正在覺醒的、向往新的生活、向往“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群众，同时我們对“正常的政治生活”这个詞的了解，也远不象，完全不象普罗柯波維奇先生所了解的那样。

除了两院制，还可以以土地规划委员会的成分为例：是應該象立宪民主党人所認為的那样，給地主、农民、官僚各三分之一的权力呢，还是應該在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权的情况下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請問，普罗柯波維奇先生，关于这一点，应怎样理解“人民群众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呢？我們在这个問題上实行彻底民主主义会推开誰和吸引誰呢？

請“俄罗斯新聞”不要忙着反駁我們，說“綱領中現在压倒其他各条的是一切进步政党所共同的一条，即要求实现政治自由”。正因为这一条压倒一切——这完全是无可爭辯的鉄的事实——才必須使最广大的群众，使千千万万的人民分清半自由和自由，并了解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同土地改革中的民主主义有不可分离的联系。

要是群众漠不关心，沒有覺悟，缺乏朝气，不积极，不坚决，不独立自主，那無論在任何方面都将一事无成。

載于1912年6月10日

“涅瓦明星报”第12号

署名：弗·伊·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資本主义和“議會”

我們認為，民主主义的真理不应当掩盖常常被資產階級民主派忽略的一种情况：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代議机关必然会产生資本影响国家政权的种种特殊形式。我国沒有議會，但是自由派中間的議會痴和資產階級代表中間的議會腐化現象比比皆是。

工人們如果想学会利用代議机关来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加强工人階級的團結和發揮工人階級的真正作用，就應該很好地懂得这个道理。一切敌視无產階級的社会力量——“官僚”、地主和資本家——都利用这些代議机关来对付工人。我們應該了解他們是怎样对付工人的，以便学会保卫工人階級的自身利益和它的独立发展。

第三届杜馬决定給本国的机器制造商发奖金。所謂本国的机器制造商是指誰呢？是指在俄国“工作的”！

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我們就会发现，这里指的正是那些把自己的工厂搬到俄国来的外国資本家。关税虽高，利潤很大，因此外国資本就流入俄国。例如，美国的一家托拉斯（拥有百万財富的資本家集团）在莫斯科附近的柳别尔采建立了一个大型农业机器厂。資本家美尔哥捷和約翰·格里耶夫斯也分別在哈尔科夫和別尔疆斯克制造农业机器。在这些企业主中，不是有不少“真正的俄国人”、“本国人”嗎？

當然，沒有俄國資本家的全面援助，他們絕對不可能在俄國活動。這是狼狽為奸。美、英、德三國的資本家靠俄國資本家的幫助攫取利潤，而俄國資本家也從中分得很優厚的一部分。例如拿連納金礦或烏拉爾採礦工業企業來說，那里就有千百萬的利潤被外國和俄國的資本家瓜分了！

杜馬在這方面對企業家先生們很有用處。在杜馬里也象在國家參議院里一樣，除了地主、資本家也有自己相當數量的代表，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資本什麼也談不到。資本家和地主依靠杜馬這個現成的機關來通過“獎勵”法（自己獎勵自己）、關稅保護法（自己獎勵自己的另一種形式）、租賃法（自己獎勵自己的第三種形式）等等數不完的法律。

自由主義“懷疑論者”在自由派的“言論報”上關於這一點寫得很不壞。他這樣充滿感情地寫文章反對“民族主義黨人”（因為民族主義黨人為了鼓勵格里耶夫斯、美爾哥捷和厄爾沃爾提諸位先生以及其他公司的“本國”機器製造業，決定自己發給自己“獎金”），連我也有些受到懷疑論的影響了。

的確，自由主義“懷疑論者”先生巧妙地揭穿了“民族主義黨人”。但是他為什麼不揭露立憲民主黨人呢？例如戈洛文獲得承租權，難道不是他的杜馬代表和前任杜馬主席的地位幫他取得這個有利可圖的有益職業的嗎？

馬克拉柯夫接受“塔吉也夫的”酬金，難道不是他的杜馬代表的地位使他便於接受如此“賺錢的”事情的嗎？

此外，又有多少立憲民主黨的地主、商人、資本家、金融家、律師以及實業家，利用代表的身分和這種身分所給予的好處和方便，擴大了他們的交易，鞏固了他們的“聯繫”，完成了他們的“事業”？

如果对杜馬代表的經濟活动进行一次調查，并且在杜馬代表参加下进行調查，是不是很好呢？

很好，但是在所有資本主义国家內，总是采取各种措施保守“商业秘密”，使任何一个“議會”都无法进行这种調查。

然而工人代表显然对这个問題知道得很多，如果他們化点工夫，想想办法，去搜集情报，汇集材料，查报纸，向交易所查問等等，他們自己也能够对杜馬代表的商业活动以及有这些代表参加的商业活动进行很有教育意义和很有益处的“調查”。

在欧洲各国議會中，这种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工人們也經常指名揭露这些实业家的面目来教育人民。

載于1912年6月17日

“涅瓦明星报”第13号

署名：非自由主义怀疑論者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选举和反对派

馬克思主义者早已在原則上确定了自己对选举的态度。从普利什凱維奇到古契柯夫的右派政党、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立宪民主党和进步派)和民主派(工人民主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劳动派)——这就是竞选中的三个基本陣营。这三个陣营之間的主要区别是:它們代表着不同的階級,各有各的綱領和策略。只有清楚地了解每个陣营的政策的原則基础,才能对竞选运动作出正确的实际結論。

約在半年前,馬克思主义者就完全确定了这些論点^①,从那时以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言行特別明显地証明了这些論点是正确的。我們“右面的邻居和敌人”虽然决不同意我們的观点,但是他們以值得称贊的勤奋为我們更好地証实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立宪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观点愈加发展,就愈能有力地証实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可以說是一条規律。換句話說,当立宪民主党人一开口,那就可以相信,他們在反駁自由派工人政客的观点方面决不会亚于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工人們如能仔細看一看立宪民主党的政策,那就会得到双重好处:首先,会認識清楚自由派資產者,其次可以学会

^①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328—332頁。——編者注

更清楚地看出其他工人階級擁護者的錯誤。

不久以前，“言論報”就“俄羅斯新聞”登載的一些有關競選的重要聲明所發表的言論，大概就會帶來這種雙重好處。這是一位舊“經濟派”，即1897—1902年的機會主義者阿基莫夫先生（弗拉·馬赫諾韋茨）的聲明。這些聲明直接擁護“進步派聯盟”，竭力想自命為社會民主黨人的阿基莫夫先生，認為這個聯盟的“綱領”（順便說一下，這個綱領還沒有公布！）“可以完全為社會民主黨所接受”。

許多政治上的嬰兒（從巴黎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和老練的外交家（從維也納到維爾納）⁴⁰ 一直對我們說，自由派工人政策是“稻草人”。可尊敬的論敵，請你們看一看阿基莫夫先生吧！你們這裡大概不能否認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真面目的。你們也不能說，阿基莫夫是“稀有之物”，即孤苦伶仃，独一无二，無與倫比的人。因為，儘管阿基莫夫先生有很多無與倫比的品質，但他並不是孤苦伶仃的；這種說法完全是不對的。他是在普羅柯波維奇先生之後出來講話，並且表示同普羅柯波維奇意見一致。他給自己找到了一個廣泛發行的自由派機關報——便於把自己的言論傳至遠處的講壇。他在自由派新聞工作者中間找到了“高明的報紙”。看，他並不是孤苦伶仃的。儘管他早已不屬於任何集團，儘管他完全沒有權利取得社會民主黨人的稱號，他却是一種政治路線的代表人物，這種路線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它雖然常常隱蔽不見，但在政治稍一活躍時就一定要露出頭來。

“言論報”認為阿基莫夫先生的說法的“冷靜的現實主義完全公正”，並且特別有好感地強調了他的如下意見，即“社會民主黨人目前應當提出能夠得到相當廣大的、政治上強有力的人民集團的

支持的那一部分政治任务”。

当然，“言論报”是不能不为此高兴的！“我們的曙光”杂志說話时尽量吞吞吐吐，支吾搪塞，左是一个預先声明，右是一个附带說明，一面消灭痕迹，一面用早就过时的似乎是馬克思主义的字眼来炫耀点綴，而阿基莫夫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极其粗暴地、愚蠢地、幼稚地……把这一切一口气吐了出来。

表面看来，“我們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当然完全可以对阿基莫夫先生的話不負任何責任。但实际上，不了解細情，同时也对这些細情不感兴趣的广大讀者，从这些取消派报刊上接受的恰恰是，并且也只能是“阿基莫夫精神”。馬尔托夫写道：“不要破坏”进步派的活动。阿基莫夫写道：“提出”能够得到进步派支持的“那一部分任务”。他自然要附带說明，进步派由于无党性，使任何政党都易于（在紙面上）保全独立性。如果提出大于进步派感到愉快的那一部分任务，也就等于“破坏”他們的活动，这就是实际政治斗争以及阿基莫夫所能完全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对馬尔托夫的口号所作的解释。

阿基莫夫深信，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是“广大的、政治上强有力的人民集团”。这正是犯了自由派的錯誤，“涅瓦明星报”不久前发表的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論战的性質和意义的文章^①中已談到这一点。其实，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等等在内的整个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級，远远不是广大的和政治上强有力的人民集团。

资产阶級永远不会成为人民中的广大集团。它可能在政治上

^① 見本卷第109—115頁。——編者注

是强大的，在許多资本主义国家里也确是这样，但在普魯士不是这样，在俄国不是这样。这里资产階級政治上的軟弱无能是惊人的，是駭人听聞的，是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这完全是由于资产階級害怕革命更甚于害怕反动派。由此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軟弱无能。所以，一切有关资产階級的“政治力量”的議論，由于迴避了俄国現狀的这个基本特点，就根本不符合事实，因而是完全不对的。

阿基莫夫先生是最露骨的温和的自由派，因为他說：立宪民主党和进步派的先生們，我們認為你們是强有力的，我們完全承認你們的政綱（虽然这个政綱还没有制定出来！），目前我們自己提出的是能够得到你們支持的那一部分任务，我們对你們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也把社会民主党人列入（进步派）联盟的名单。”阿基莫夫就是这样写的，的确是这样，一字不差！一切我都同意，只要列入自由派名单！

“言論报”簡直太不寬宏大量，連这样不高的要求也拒絕了。要知道談的問題是关于六三选民，——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提醒阿基莫夫說。但社会民主党人在他們中間算是什么呢？是零——“大城市除外，可是談的并不是大城市”。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也以寬容的口吻教訓唯命是从的阿基莫夫說：“除开边区，他們（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到处都不打算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只是想使进步派联盟战胜压迫人民的黑帮联盟。”

自由派对自由派工人政客卑躬屈节地伸出的手根本置之不理！这就是拒絕在大城市进行战争所应得的奖賞。立宪民主党人說，大城市是屬於我們的，因為我們强有力，而俄国其他地区也屬於我們，因为六三分子及其保證我們处于反对派的壟断地位的六

三选举法强有力。

回答得不错。阿基莫夫得到的教训是沉痛的,但却是有益的。

载于1912年6月24日

“涅瓦明星报”第14号

署名:克·弗·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彼得堡选举的意义

据各家报纸报道，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日期和选举时期问题，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许多疑难。有些人主张把国家杜马召开日期延到1月，又有些人主张在10月召开。现在，据说问题已按照第二种意见解决。

这就是说，选举已近在眼前，离现在只有7至9个星期。因此必须考虑如何鼓足十倍干劲去进行全部竞选工作。

我想在本文中谈谈对工人民主派有极其普遍重大意义的一个专门性的问题。这就是彼得堡选举的作用问题。

彼得堡第二城市选民团的选举，是第四届国家杜马整个竞选运动的中心。

只有在彼得堡有那么一家勉强能办得下去的工人报纸，这家报纸在经常遭受疯狂迫害、罚款、编委被捕的情况下，在地位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在书报检查机关的控制下，总算能够稍稍反映了工人民主派的观点。

如果没有一种日报，选举仍旧会是黑暗勾当，它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作用就会减少一半，甚至减少得更多。

因此，彼得堡的选举就具有了工人民主派在俄国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竞选运动的示范作用。工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进行什么家喻户晓的出色竞选运动。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当然有极

Годъ издания первый.

Всего издано 1912 года 36 номеров. В каждом номере 24 страницы. В год выходит 864 страницы. За 1912 год вышло 3176 страниц. Всего вышло 15880 страниц. За 1912 год вышло 3176 страниц.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Издатель: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Печать: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Звезда"

№ 15. Воскресенье 1-го июля 1912 г. 74 16

Поступило из продажи

"Спутникъ Избирателя"

ВРАЩЕВАЯ
Содержит: 1.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 1912 года. 2.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Земские собрания. 3.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Уездные земские собрания. 4.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Уездные земские школы. 5.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Уездные земские больницы. 6.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Уездные земские тюрьмы. 7.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Уездные земские больницы. 8.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Уездные земские тюрьмы. 9.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Уездные земские больницы. 10. Сведения о выборах в Уездные земские тюрьмы.

Значение выборов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как и в других городах, выборы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ым событием. Они определяют будущее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аждый гражданин должен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ть за ходом выборов и активно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них. Только так мы сможем обеспечить справедливое и честное избр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ласти.

Средства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важ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различные средства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ы.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листовки, плакат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в собраниях и на митингах. Необходимо ясно и убедительно излагать свои взгляды и требования, чтобы при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Завтра

Завтра ожидается ясная погода с легким бризом.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воздуха будет колебаться между 15 и 20 градусами. Рекомендуется носить легкую одежду.

Вопросы дня

Вопросы дня: Как улучшить условия жизни рабочих? Как повысить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труда? Как обеспечить социальную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Эти вопросы требуют немедлен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и принятия конкретных мер.

Уроки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Уроки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ым двигателем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креплять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бороться за свои интересы. Только так мы сможем достичь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Далее следу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татьи о выборах и агитации, а также другие заметки 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я из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Далее следу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татьи о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а также другие заметки 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я.

1912年7月1日“涅瓦明星报”第15号第1版，
这里刊载了列宁的文章“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和“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比较”
(制版缩小的)



其重大的意义，但工人在这里不能同属于其他阶级的居民接触，因而不能相当广泛地阐明先进的无产阶级民主派为领导整个民主运动而提出的全民性要求和对总的政治任务的看法。

在彼得堡是进行直接选举的。因此，这里的竞选斗争能比其他地方展开得更加明确，更加具有党性。其他各大城市象彼得堡一样，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但各省的行政压力还是比首都大得多，因此工人民主派很难替自己打开道路，使人们倾听自己的意见。

此外，彼得堡的斗争一定会在第二选民团中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开展起来。立宪民主党认为第二选民团是自己的财富。代表彼得堡的是米留可夫、罗迪切夫和库特列尔。

不用说，由自由派能代表相当广泛的民主选民群众的这种情况，决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第二届杜马选举表明，立宪民主党在民主城市选民中的“统治地位”远远不是巩固的。而在彼得堡，如果当时孟什维克如唐恩之流不分裂工人的竞选运动，没有因此而民粹派中间产生对顺利进行工作极为有害的动摇不定的现象，那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左派联盟”，即工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联盟，不仅能够取得胜利，甚至一定会取得胜利。只要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甚至“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直到最后时刻还是跟着孟什维克走，还是拥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

根据目前选举法的规定，可以进行重选，因此在第一阶段就不需要也不容许有任何联盟。

彼得堡的斗争将是在工人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进行的。民粹派未必能独立进行活动，因为他们遵照我们取消派的路线，已经不

遺余力地“取消了”自己。因此，資產階級民主派（劳动派和民粹派）大概一定会支持工人民主派，如果不是在选举第一阶段支持，那无论如何也会在重选时支持。

自由派在彼得堡有自己的領袖米留可夫先生。直到如今极大多数人都拥护他們。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供給他們經費。有两种日报作为宣传工具，还有一个实际上被允許存在的、几乎 de facto^①公开的組織，——这一切都使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巨大优势。

在工人方面則有工人群众，彻底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还有极大的干劲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事业的耿耿忠心。依靠这些力量，再加上拥有工人日报，工人就能够取得胜利。工人爭取彼得堡代表席位的斗争，无疑会在整个第四届杜馬竞选运动中具有巨大的全俄的意义。

一切愛談所有反对派“團結一致”的人——从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开始，到小心謹慎、支吾搪塞的取消派馬尔托夫和愚蠢幼稚的普罗柯波維奇和阿基莫夫止——都竭力迴避或掩盖彼得堡的选举問題。他們繞过政治中心，而情願鑽进所謂政治的穷乡僻壤。他們对选举第二阶段，即竞选运动的基本的、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已結束时应当做些什么工作談得很多，很热烈，很动听；可是他們对被立宪民主党人霸占而必須从他們手中夺回交还民主派的彼得堡却“絕口不談”。

不論 1905 年 12 月 11 日的法律⁴¹，或是 1907 年 6 月 3 日的法律⁴²，都規定彼得堡沒有民主派的代表，因此，交还两字似乎是用得不恰当的。但是，从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来看，彼得

^① 实际上，——編者注

堡是属于民主派的，而在发展的某个阶段，甚至連六三选举法这条奇高的拦河壩也挡不住“民主洪流”的冲击。

第二选民团的大多数选民无疑都是居民中的民主阶层。立宪民主党人公然欺騙他們，把自己这个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政党打扮成民主派，使他們跟着自己走。在各种議會选举时，世界上一切自由派一直都在耍这种騙局。因此，各国工人党衡量自己胜利的尺度之一，就是看他們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摆脱自由派的影响。

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给自己明确而肯定地提出这项任务。因此，他們在自己著名的一月決議中公开指出，由于显然沒有黑帮的危险，在各大城市只能允許同民主派联合起来对付自由派^①。这项決議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对竞选策略的一个最重要問題作了直接回答，确定了整个竞选运动的精神、方向和性質。

爱談立宪民主党人是“城市民主派”的“代表”的取消派，却犯了大錯誤。这种說法歪曲了事实，因为这样就是把自由派对民主派的竞选胜利、对民主选民所玩弄的竞选騙局，錯認成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的証据。只要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尤其是社会民主派，还没有使各种民主阶层摆脱性質同它們完全相反的政党的影响，这些民主阶层就会受反对民主的政党多年的摆布，这种例子在欧洲不知有多少。

彼得堡的竞选斗争，是自由派和工人民主派在俄国整个解放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①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21頁。——編者注

彼得堡选举所起的这种极重要的作用，可以使我們作出两个实际的結論。多得者应当多予。彼得堡工人势必代表全俄整个工人民主派进行彼得堡第二城市选民团的竞选运动。他們的双肩担负着伟大的艰巨的事业。他們要树立榜样。他們应当发挥最大限度的主动精神、坚毅精神以及始終不渝的精神。他們在办工人日报方面已經做到了这一点。他們应当在选举中繼續进行已經轟轟烈烈开始了的事业。

整个俄国都注視着彼得堡的竞选斗争。整个俄国也应当竭力支援这里。如果没有全俄各地对彼得堡工人的各方面的支援，单枪匹马是无法打败“敌人”的。

載于1912年7月1日

“涅瓦明星报”第15号

署名：弗·弗·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斯托雷平的土地綱領和 民粹派的土地綱領的比較

在前兩篇文章里（見“涅瓦明星報”第3號和第6號）^①，我們援引了歐俄土地占有情況的基本材料，闡述了俄國土地問題的實質。消滅土地占有制的中世紀性——這就是這個問題的實質所在。

在全世界及我們俄國都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制度同地主及份地農民的中世紀土地占有制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舊的中世紀土地占有制必須破壞；這種破壞愈是堅決、無情和果斷，對於俄國的整個發展就愈有好处，對於除了受資本主義蹂躪和壓迫以外，還受無數中世紀殘余蹂躪和壓迫的工人和農民也就愈有好处。

那末，在這種情況下，怎能將斯托雷平的土地綱領和民粹派的土地綱領加以比較呢？這兩個土地綱領不是完全對立的嗎？

是的，但這種對立並不排斥兩者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共同點。這就是兩者都承認必須破壞舊的土地占有制。斯托雷平的“土地規劃”人員說：必須破壞舊的東西，而且要儘快地，要更加堅決地破壞，但是要使這種破壞所帶來的一切重荷落在大多數極端貧困

^① 見本卷第17—20頁和第58—62頁。——編者注

和备受压迫的农民身上。地主不应有丝毫损失。如果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失掉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公平的”价格随意出让自己的土地。富裕农民应得到支持，广大“弱者”的破产则不必考虑。

这就是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的实质。授意斯托雷平制定这个纲领的贵族联合会，是并非清谈家而是实践家的反动派的真正代表。贵族联合会把希望寄托在强者身上，是完全忠于本阶级的利益的。的确，在1905年以后事情已很明显，单靠警察机关、官僚机关来防范农民是不够的。

贵族联合会究竟在哪儿还能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呢？只能在为数极少的富裕农民、“富农”、“寄生虫”中间找到。它在农村里不可能再找到别的同盟者。为了把“新地主”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反动派竟不惜把所有农村交给他们，任他们去洗劫。

既然破坏不可避免，那就让我们按照有利于我们和有利于新地主的办法来破坏份地占有制，——这就是贵族联合会授意斯托雷平执行的土地政策的实质。

但是，从纯理论上来说，必须承认从另一方面同样坚决地甚至更加坚决地来进行破坏也是有可能的。问题有两个方面。比方说，假如3万个地主的7000万俄亩土地转入1000万农户手中，再加上他们的7500万俄亩土地，假如把这些土地合在一起，然后在富裕农民和中农中进行分配（贫农反正是不能进行土地的耕耘、播种、施肥和保养的），那末这样改造的结果会怎样呢？

如果从纯经济观点来提出这个问题，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原则上的可能性，那就可以看出，上面设想的那种改造的结果，将是使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遭到比斯托

雷平綱領中所談的更徹底、更堅決、更無情的破壞。

為什麼要破壞的正是和僅僅是中世紀土地占有制呢？因為，就問題的本質來說，土地無論怎樣轉手，甚至所有土地都轉入國家手里（即政治經濟學中所謂的土地“國有化”），資本主義的土地占有制還是不會消滅的。資本主義土地占有制就是那些擁有資本並最能適應市場的人的土地占有制。土地不論歸誰所有，歸舊的地主、國家或是份地農民所有，反正它是逃不出隨時可以租用它的業主之手的。租佃制在存在着各種各樣土地占有形式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在日益發展。既然市場支配整個社會生產，也就是說，既然這種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則任何禁令也不能阻止這些擁有資本和熟悉市場情況的資本家把土地攬為己有。

不僅如此，土地租佃制比土地私有制甚至更便於發展純粹的資本主義，更便於最充分地、自由地、“理想地”適應市場。為什麼？因為土地私有制妨礙土地的轉手，使土地的使用不能順利地適應市場的情況，把土地固定在某家族或個人及其繼承人的手里，而不管這些人在經營上是多麼糟糕。租佃制是一種比較靈活的形式，採取這種形式就能最簡單地、最容易地、最迅速地使土地的使用適應市場。

因此，正如馬克思在批判洛貝爾圖斯時所指出的那樣⁴³，就連英國也不例外，只不過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它的土地制度比起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來是最完善的而已。英國土地制度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舊的土地占有制，即大地主占有制，和新的、自由的、純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同時并存。

假如這種大地主占有制存在而沒有大地主，也就是說，假如土地不歸大地主所有，而歸國家所有呢？那末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

看，这种土地制度就更加完善了，土地的使用就更加自由地适应于市场，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就更加容易转移，一切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所固有的阶级斗争就更能自由地、广泛地、明确地展开。

可见，一个国家愈是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愈是急需赶上邻国，愈是“耽误了”自己的“疾病”——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受奴役的小经济的疾病，愈是急需从根本上破坏其一切土地占有关系及其整个农业生活，各种各样的土地国有化思想和方案也就愈能自然而然地在这个国家的农业居民中产生和广泛传播。

1905年和前两届杜马都非常明显地证明了，第三届杜马通过它的“农民”（地主的筛子筛过的农民）代表也间接地证实了：各种各样的土地国有化思想和方案已在俄国农业居民中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在表示赞同或者反对这些思想以前，应该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思想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它们是由什么样的经济必然性所引起的？

单从这些思想内在的严整完备性或理论的正确性来批判它们是不够的。必须从这些思想所反映的经济必然性的角度来批判，不管这种反映有时是多么“多变”，不正确，“歪曲”。

20世纪初在俄国农民中产生土地国有化思想的经济必然性，就是急遽破坏旧土地占有制的必然性。“平分”全部土地的思想是一种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思想是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时所必然产生的，而在3万“农奴主余孽”有7000万俄亩土地，而1000万受奴役的农民只有7500万俄亩土地的情况下，这种平等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土地问题上来。

把前一类土地变为后一类土地，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到后一类所有者的手中，这丝毫也不是空想。在市场支配一切的情况下，幻

想土地經營主之間的平等，或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幻想全体“男女公民”（包括不獨自經營者）的“地權”，才是空想。但我們不應該因這些思想的不切實際而忘掉這些思想實際包含的東西的最真實的、最切合需要的現實性。

消滅各種中世紀土地占有制——地主土地占有制、份地占有制等等，這絲毫也不是空想。與一切舊的土地關係決裂也絲毫不是空想。相反地，正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迫不及待的要求這種決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平分”土地或使土地“社會化”都是不可能的。這是空想。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土地國有化從經濟上看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即不論是怎樣實行的，由誰實行的，在什麼條件下實行的，是鞏固的和長期的還是不鞏固的和短期的，——不管怎樣，它對於最大限度地消滅俄國土地占有制中和俄國農業生活中一切中世紀殘余，對於使新的土地使用制和占有制最自由地適應世界市場的新情況來說，都是有實際意義的。

假定左翼民粹派的全体男女公民平分全部土地的計劃實現了，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是極其荒謬的。這種情況連一年也不會維持，而且也不可能維持。但這是不是說這樣做的結果等於零或者負數呢？

絕對不是！這樣做會大有好處，——不過根本不是左翼民粹派所期待的好處，而是最實際的好處。這個好處就是：現有各種階層的和等級的土地占有形式之間的任何差別都要被消滅。這對整個國民經濟、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都是極其有利的，因為對俄國的發展來說，我國現在舊的土地占有制是最有害不過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份地占有制完全是農奴制的土地占有形式。

民粹派的土地平分是不能持久的，但要恢复旧的也是不可能的！地界既已被破坏，无论怎样也“修复”不了！世界上任何政治力量都不能阻碍那些符合市场新要求的新的地界、界限和土地使用形式的确立。

記得在第二屆杜馬中有一位左翼民粹派說過“划分土地”。他以为这样就能做到“平均使用土地”。他錯了。但他的話——这是历史的諷刺！——代表了最彻底、最勇敢、最激进的资产者的情緒，因为他们感到我国“份地的”、“貴族的”、“教会的”以及其他等等土地占有制的旧的、中世紀的“划分”是不合理的，必須打破这一切分界，以便实行新的土地分配。只是不会象民粹派所幻想的那样“按人”分配，而是象市场所迫使的那样按資本分配。

民粹派的建設方案是一种空想。但其中含有对中世紀制度的破坏性因素。这种因素决不是空想。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不論从資本主义或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彻底最进步的现实。

讓我們把我們的观点簡略地概括一下。斯托雷平的土地綱領和民粹派的土地綱領的一个实际共同的地方，就是两个綱領都要从根本上破坏旧的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制。这点非常可貴。这种土地占有制也只有破坏，沒有別的办法。“言論报”和“俄罗斯新聞”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最反动，也就表現在他們不去証明必須更彻底更坚决地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而斥責斯托雷平不該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我們將从下面一篇文章中看到，斯托雷平的破坏不能消灭奴役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的破坏却能够做到这一点①。

① 見本卷第 239—244 頁。——編者注

我們暫且指出一点：斯托雷平的破坏所产生的唯一完全现实的后果就是 8 000 万人挨餓。斯托雷平的破坏能不能教会俄国人民应当怎样进行更坚决的破坏，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破坏正在这样教导却是沒有疑問的。能不能教会呢，——过一个时期便見分晓。

載于 1912 年 7 月 1 日

“涅瓦明星报”第 15 号

署名：尔·西·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 和党的最近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度过了反革命猖獗横行的空前艰难年代，现在已经走上了恢复自己的组织、增强自己的力量、加强对俄国无产阶级的领导的正确道路。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曾给予专制制度以沉重打击，在未来的革命中它将摧毁这种制度。

1908—1911年这些艰苦的年代是分裂的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现在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是在1906年加入我们党的，曾经和我们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过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

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评价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行为。因此我很愿意接受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建议，在“工人报”⁴⁴上简要地说明党内分裂的原因和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所起的令人痛心的作用，并指出全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

—

波兰工人同志们都知道1905年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杰出代表，如罗莎·卢森堡，最初，在1904年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但是革命

很快地表明孟什維克是錯誤的，清楚地証明孟什維克是机会主义者。

1908—1911年的反革命使俄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新阶段。旧的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又迈进了一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杜馬产生了。沙皇制度还没有失去农奴制的性质，但已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使千百万农民遭到前所未有的破产与毁灭来尽快地培植土地私有制。资产阶级自由派急速地轉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他們为庆賀背叛而縱情狂欢。

在知識分子中間一般表现出前所未見的分裂与涣散。沙皇制度向革命进行报复，它的迫害以及叛变者的誹謗浊流猛烈地打击着无产阶级。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就是：保存工人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党，适应新的工作条件。

在最初解决这项任务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暴露出一些新的反无产阶级流派，这些流派在破坏党的本身存在。它們是在我国反革命猖獗的历史形势下产生的。这些资产阶级流派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

取消派被资产阶级逃跑主义的浪潮所袭击而背弃了革命。他們对秘密的党表示絕望，在6月3日(16日)的所謂“立宪”政体中为自己寻找唯一合法的根据，鼓吹这个政体的立宪革新。他們的政策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公开的工人政党”和实现立宪改良的口号。这不是社会主义党的政策，而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显然，把取消派和西欧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等同起来(象在梯什科影响下現在的总执行委员会所作的那样)是非常可笑的。我們的取消派不承認秘密的党即現在的党，而要建立一个

新的合法政党。这不是在党内闹派别斗争，而是背离党。取消派这种公然背离党和破坏党的行为，引起了孟什维克本身的猛烈攻击。在俄国，孟什维克工人没有跟着取消派走，而在国外，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则领导了孟什维克“护党派”（反取消派）。普列汉诺夫现在在报刊上已公开、明确地承认取消派正在建立新的政党。

为了使波兰工人了解情况，我们再补充一点。取消派的主要机关刊物在国外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⁴⁵（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呼声派”），在俄国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和切列万宁等）。“召回派”（因要求从第三届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代表而得名）抵制第三届杜马，不了解社会民主党为了进行革命工作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和一切“合法机会”。他们把1905年的革命策略口号变成了空洞的词句。经验很快地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愚蠢的，这甚至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抵制分子的愿望相违背，使他们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1907年夏季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但是1908年春季他们已经接受了经验教训，并且给了“召回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鼓动以极沉重的打击。召回派在俄国遭到这种彻底失败以后，他们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就苟安于国外，形成了一个毫无力量的“前进”派小集团（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等）。

由于俄国大多数组织软弱无力，由于国外的一些集团脱离俄国的工作，这些集团的大多数就充分“自由地”破坏和瓦解党，它们根本不承认任何纪律，没有受俄国任何一个组织的委托而私自领导机关刊物、刊印小册子和宣言，这一切都无须赘述。除了这些在原则问题上持有种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以外，照例还产生了一些毫无原则的小集团，它们作掮客，耍卑鄙的外交手腕，在“调解”

党内糾紛和促进党内“团结”的幌子下施展阴谋詭計，力图从中取得政治資本。这方面的能手就是托洛茨基和他在維也納出版的“真理报”，梯什科和他的总执行委员会。

二

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前的是怎样恢复党的問題。

显然，不能和那些想取消党的人一起来恢复党，也不能和那些抵制杜馬和一切合法机会的人一起来恢复党。要就是奉行资产階級政策的国外小集团放弃这种政策来服从俄国絕大多数組織、团体和小组；要就是俄国組織不顧这些国外小集团自己来恢复党。

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在这次會議上曾试图挽救背离社会民主党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引导他們走上为党工作的道路。但由于这两种傾向太荒謬，它們的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質太明显，以致誰也不願意为它們辯护。会上一致認為，这是资产階級思潮，只有排除这种思潮，才能創造恢复党的条件。

但是仅仅一致通过決議还不够，因为会后仍然沒有一致的行动。取消派和召回派不顧中央全会的決議，不但沒有放松反而加強了他們的破坏活动。事实証明，一年半以来(1910年1月—1911年6月)为党进行斗争的是在布尔什維克和某些波兰人領導下的党中央机关，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也竭力帮助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和崩得分子竭尽全力地进行反党的工作。拉脫維亞人則动搖不定，常常站到取消派方面去。

取消派的破坏活动竟把党中央委员会摧毁了！全会决定恢复俄国中央委员会，补选新的委员，但是取消派连一次会议也不愿出席，竟宣布秘密的党和秘密的中央委员会是“有害的”。既然如此，把取消派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等同起来，除了是一种阴谋诡计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党没有了中央委员会。党的瓦解已不可避免。只有俄国的组织，即在俄国活动的组织，才能恢复党。梯什科的充满阴谋诡计的虚伪政策也就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他在总执行委员会孤立和压制较有原则的政策奉行者的政策，使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它处于党与党的取消派之间。

为了理解这种给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带来危害的政策，让我们首先举一件我们党内思想斗争方面的事实。

象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央全会一致斥责了取消派。但是在极其重要的决议中，有一部分（即所谓它的第一条）被删改得与原意完全相反；这部分就变得对取消派有利。在这一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即在反革命时期，第一次充分运用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方法。这种为叛徒的理论留后路的意见是由梯什科提出的，他企图在取消派和党之间投机取巧。自然，取消派热烈赞同这一条，帮助梯什科“取得胜利”；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即所谓“调和派”集团（实际上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也滚到取消派方面去了。

在全会以后，普列汉诺夫用绝妙的话狠狠地嘲笑了这一条（他并不知道这一条是谁提出的），认为这一条是“华而不实”、含糊不清、笼统统统。我继普列汉诺夫之后发表意见，陈述了我对梯什科与“调和派”、取消派的联盟进行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没有收到

成效^①。

两年来总执行委员会中的许许多多作家没有一个人写过一句话为这一条辩护。

梯什科这种投机取巧的伎俩只能使他用取消主义来歪曲党的观点。

在组织问题上，这种政策的结局是更悲惨的。

中央委员会已不存在。只有召开俄国组织的代表会议才能恢复党。但是怎样召开代表会议呢？显然，不能和那些企图取消党的人共同召开，而只能不要他们。

梯什科采取中间立场，看风转舵，玩弄使党和企图取消党的人“团结”的把戏。最初，梯什科和“调和派”小集团（这是一个毫无力量的国外小集团，在整整一年內没有一个俄国组织订过一份他们的刊物）靠攏布尔什维克，担负监督召开代表会议的责任，资助召集代表会议的代表，遣送这些代表到各地去，并且断言，他们是在使党“团结”起来（这一断言引得取消派和我们都大笑不止）。

这些代表从基辅出发到各地去，而基辅的组织那时无疑是孟什维克的组织，这一点连我们顽固的敌人托洛茨基和拉脱维亚人也在报刊上承认。由于取消派向我们的代表会议进行了猖狂进攻，因此波兰工人必须知道，正是在上述组织参与下才成立了（1911年10月）召开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而且正是这个（基辅）组织的代表担任了代表会议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

显然，俄国组织委员会内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孟什维克“护党分子”（即孟什维克中的反取消派）占大多数。其中没有其他小集

^①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222—228页。——编者注

团的代表，因为那只是些与俄国没有什么联系的有名无实的国外组织。

这时梯什科感到悲观失望，因为已没有可能充当调停人，进行阴谋活动和玩弄团结取消派的把戏了。他退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不顾再三邀请拒不出席代表会议。

就在这时他竟参加了取消派关于召开另一次代表会议（取消派的代表会议）的会议⁴⁶，又……退出了会议，声称那里有取消派！！这样的“调停人”不是很滑稽吗？^①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团结了国内大部分组织——彼得堡、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南部和西部边区等地的组织。代表会议肯定地认为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派）已置身于党外。代表会议声言对那些进行瓦解党的活动的国外小集团不负任何责任。

代表会议在前后 23 次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一切策略问题，通过了与过去四年内中央机关报及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工作精神相一致的的各项决议。会上确定代表会议是党的最高机关，并选出了中央委员会。

取消派以及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一切软弱无力的国外小集团口沫飞溅地攻击党代表会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代表会议斥责了他们。任何一个被判定有罪的人都有权在 24 小时内咒骂他的

① 在“前进报”上总执行委员会说托洛茨基是取消派的代理人，在“红旗”杂志上则证明不但不能与波兰社会党左派取消主义者团结，而且不能与波兰的崩得取消主义者团结！！但梯什科却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取消派团结。

裁判者。

但是在俄国没有另外一个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另外一个社会民主党。梯什科及其总执行委员会回避这次代表会议，硬要波兰工人相信，在某些中间人参与下可能使党和取消派“团结”起来，这是对工人的欺骗。这种欺骗使波兰工人在4、5月间革命高涨以及第四届杜马进行选举那样极其紧要的关头，失去与俄国同志互相磋商和一起讨论策略及口号的机会。

显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在日益增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前正在解决的迫切任务就是：促使革命情绪进一步增长，巩固秘密组织，给运动提出正确的革命口号，给要求合法化的取消派的机会主义以回击，使合法组织浸透反取消主义的精神，并依据这种方针来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全俄一月代表会议已为这些任务确定了理论根据。

波兰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工作方向上是和我们一道前进的。因此，最后让我表示我的信念：不管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在原则上怎样动摇，波兰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够在组织上和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起来。

载于1912年7月16日

“工人报”第15—16号

署名：尼·列宁

根据报纸原文(波兰文)

译成俄文刊印

答取消派⁴⁷

取消派在“涅瓦呼声报”上竭力破坏彼得堡工人选举的统一。这是他们办不到的。假惺惺地要求“统一”等等的叫喊……（出自取消派之口！！），是谁也欺骗不了的。

工人民主派的统一是有保证的。

取消派想取消工人民主派，只允许由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公开的“政党”来代替它……但是工人并没有跟着他们走。觉悟的工人所要求的是工人群众的统一，而不是同从事分裂活动的取消派知识分子集团“妥协”，来损害这种统一。“真理报”⁴⁸就是按照这个口号行动的。

取消派公然问道，到哪里去“寻找”不赞美“公开”的东西呢……取消派这种恬不知耻的狂妄言论，是迷惑不了我们的。先生们，走开吧，去草拟你们的“公开的”纲领吧，去建立你们新的“公开的”政党吧！

P. S.① 我坚持要求马上或尽快回答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不应该保持缄默。如果对此保持缄默，就会把一切弄糟，就会遭到工人从左面来的抗议。必须给取消派以回击。把为谁进行选举（是

① —— Postscriptum —— 附言。—— 编者注

为取消派嗎?)掩飾起来,就不能进行选举。假如你們不願意把一切弄得很“左”,即弄得很紧张很混乱,就請你們刊載这篇文章。如果不刊載,請立即退还給我。这对我是很重要的。

写于1912年7月

1933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25卷

按手稿刊印

在 瑞 士

瑞士的社会主义者把瑞士叫做“奴仆的共和国”。旅馆业早已成为该国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这个小资产阶级国家过多地依靠了那些每年夏天到这里来游山玩水的挥金如土的财主寄生虫。在游客财主面前卑躬屈膝的小业主——这就是长期以来瑞士资产者的典型。

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瑞士的大型工业有了发展。直接利用瀑布和山水发电，大大地推动了这种工业的发展。人们往往把这种代替工业用的煤炭的水力称做“白煤”。

瑞士的工业化，即瑞士的工业、大型工业的发展，结束了工人运动先前的停滞状态。资本同劳动的斗争日趋尖锐。以往常常笼罩着一些瑞士工会的那种萎靡不振的市侩习气正在消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的、觉悟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抬头了。

瑞士工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共和国是维护雇佣奴隶制度（在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着这种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瑞士工人真正学会了利用共和制度的自由来教育和组织广大的工人群众。

7月12日（旧历6月29日）苏黎世总罢工时明显地表现出了这项工作的成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苏黎世的油漆工和钳工罢工了几个星

期，要求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厂主被激怒了，决定打击顽强的罢工者。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为了向资本家献殷勤，就来帮助厂主，开始把外籍罢工工人（在瑞士做工的有許多外籍工人，特别是意大利工人）驅逐出境！但是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济于事。工人更紧密地团結起来。

这时资本家就使用了下面这种手段。在德国汉堡有一个专门提供工贼的路德維希·科赫公司。苏黎世的资本家（請不要笑，他們是爱国者、共和主义分子！）通过該公司招募了一些工贼，其中显然有在德国犯誘奸罪、毆打罪等而被控告的形形色色的刑事犯。资本家把手枪供給这些流氓或无賴汉（流氓无产者）。这些厚顏无耻的工贼匪徒分头在工人区的一些飯店里进行駭人听聞的捣乱活动。当工人們集合起来赶走这些流氓时，其中就有人向罢工工人开枪。

工人忍无可忍，毆打了凶手，并决定就流氓的暴行問題向苏黎世市議會提出質問。由于市政局袒护资本家，禁止罢工糾察队活动，工人决定举行一天总罢工表示抗議。

所有工会一致同意罢工。只有一些印刷工人是可悲的例外，他們反对罢工。苏黎世所有工人組織的 425 位代表的會議憤怒地斥責了印刷工人的这种决定，高呼这种决定“可耻！”。虽然一些政治組織的領袖反对罢工（这是瑞士庸俗的机会主义者領袖的老风气！），罢工还是决定举行。

工人們看到资本家和行政当局力图破坏和平罢工，于是就按照“既然是战争，就要象个战争的样子”这句格言行动。在战争中一方不会把进攻的时刻告訴敌人。工人們故意在星期四宣布，罢工将在下星期二或星期三举行，但实际上确定在本星期五举行。

結果給資本家和政府來了個措手不及。

罷工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從清晨起共散發了30 000張德文和意大利文傳單。大約有2 000個罷工者佔領了電車場。一切都停頓了。全城的正常生活停止了。本來蘇黎世每逢星期五是集日，但是這一天全城卻死一樣的寂靜。罷工委員會禁止飲各種酒類，工人都嚴格遵守了這項決定。

下午2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遊行示威。演說完畢以後，隊伍靜靜地解散了。

政府和資本家本來想引誘工人使用暴力，現在眼看自己遭到失敗，簡直象發了瘋那樣狂暴起來。政府發布了一道特別命令，在全蘇黎世州內不但禁止罷工糾察隊活動，而且禁止公開集會和遊行示威。警察佔領了蘇黎世人民文化館，並逮捕了許多工人領袖。資本家為了對總罷工進行報復，宣布同盟歇業三天。

工人們沉着應戰，嚴格地遵守不飲酒的決定進行抵制，並且說：“有錢人整年休息，工人為什麼不能在一年內休息三天呢。”

載于1912年7月12日

“真理報”第63號

署名：勃·日·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论文^①（我們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Le Peuple》^②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这位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問題。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議論。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他們在基本思想和許多看法上是完全相同的。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綱領（孙中山的論文正是这样的綱領），迫使我們（同时也給了我們一个良好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問題。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代面临的最重大問題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綱領中，特

① 指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这篇文章的譯稿与列宁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涅瓦明星报”上。——譯者注

② 即“人民报”。——編者注

別是把這個綱領同俄國、土耳其、波斯和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僅俄國面臨這個問題，整個亞洲也面臨這個問題。俄國在許多重要方面無疑是一個亞洲國家，而且是一個最野蠻、最中世紀式、最落后可恥的亞洲國家。

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從它的最早的和唯一的先驅者貴族赫爾岑起到它的群眾性的代表——1905年農民協會會員和1906—1912年前三屆杜馬的勞動團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現在我們看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樣的民粹主義色彩。這裡我們試就孫中山的例子來考察一下，目前已經完全卷入全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的幾萬萬人的深刻革命運動所產生的思想的“社會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

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鬥的、真實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它直接提出群眾生活狀況及群眾鬥爭問題，熱烈地同情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

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這樣的人民不僅會為自己歷來的奴隸地位而痛心，不僅會嚮往自由和平等，而且會同中國歷來的壓迫者作鬥爭。

人們自然可以把亞洲這個野蠻的、死氣沉沉的中國的臨時大總統與歐美各先進文明國家的總統比較一下。那裡的共和國總統都是資產階級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裡的資產階級則已經腐朽透頂，從頭到腳都沾滿了臟污和鮮血——不是皇帝們的鮮血，而是為了進步和文明在罷工中被槍殺的工人的鮮血。那裡的總統是資

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娼妓化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怎么？这是不是說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說，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还有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們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

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正是后面这两种政治思想倾向使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 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因此，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50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截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往往停留在 这里。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经济革命”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不会带来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主义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财

产”，也就是說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或者說使土地國有化。

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實行這種改革有沒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純粹、最徹底、最完善的資本主義。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了這一點，在“資本論”第3卷中詳盡地證明了這一點，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與洛貝爾圖斯論戰時非常清楚地發揮了這一點⁴⁹。

土地國有能夠消滅絕對地租，只保留級差地租。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土地國有就是：盡量鏟除農業中的中世紀壟斷和中世紀關係，使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使農業有最大的可能適應市場。歷史的諷刺在於：民粹主義為了“反對”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竟然實行能夠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得到最迅速發展的土地綱領。

在亞洲一個最落後的農民國家中，是什麼經濟必要性使得最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土地綱領能夠被人接受呢？這是因為必須摧毀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封建主義。

中國愈落在歐洲和日本的後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只有革命人民群眾的英雄主義才能“復興”中國，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以保證資本主義最迅速的發展。

能不能做到這一點，能做到什麼程度，——這是另一個問題。各國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所實現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義，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是極其複雜的。這要看國際形勢和中國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而定。看來皇帝一定要把封建主、官僚、僧侶聯合起來，準備復辟。剛剛從自由保皇派變成自由共和派（能長久嗎？）的資產階級代表袁世凱，將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間實行隨風

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载于1912年7月15日

“涅瓦明星报”第17号

署名：弗·伊林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最近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艾米利亚省列德日奥城閉幕了。

近几年来，意大利社会党内部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的形式。最初有两个主要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坚持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倾向，即调和思想、同资产阶级妥协、否认工人运动的最終目的（社会主义），等等。阶级斗争是这一派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基础。

改良派在争取改良即争取局部改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时，常常忘记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同资产阶级结成集团和联盟，直到允许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抛弃彻底的共和主义信念（在君主制的意大利，宣传共和主义并不是违法的），为“殖民政策”，即侵占殖民地、压迫、掠夺和屠杀当地居民的政策辩护，等等。

这两个主要派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各国社会党中，但在意大利还分化出了两个极端派，它们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因而走上了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道路。非社会主义的极端派之一就是工团主义，这种思潮曾一度在意大利“流行”。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沉溺于革命空谈，破坏工人斗争的纪律，放弃社会党人利用议会讲坛的机会或为此进行辩护。

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的影响是很小的，所以工人运动很快就

摆脱了这种倾向。

以阿尔土洛·拉布里奥拉为首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目前已被摈弃于社会党之外。他们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意大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象其他国家的一样，对瓦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和倾向毫不姑息。

极右改良派由于陷入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泥潭，最后一定会投向自由派营垒，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改良派对这种极右改良派的态度却不大稳定。因此，没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改良主义者的极尖锐的斗争，就往往不可能把这些出卖工人事业的叛徒清洗出社会党。比如在法国，当机会主义者改良派分子米勒兰最后终于走上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时，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那里的改良派分裂为左倾改良派（以屠拉梯为首）和右倾改良派（以比索拉蒂为首）。列德日奥-爱米利亚代表大会标志着这次分裂的收场。

在代表大会上有三派：（1）革命派（按党内拥护他们的人数计算，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大约拥有 12 500 张票）；（2）左倾改良派（大约拥有 9 000 张票）；（3）右倾改良派（大约拥有 2 000 张票）。革命派提议把比索拉蒂和其他三个极右改良派分子开除出党。左倾改良派有 $\frac{1}{3}$ 的人同意开除，但所举的理由比较“温和”；有 $\frac{2}{3}$ 的人反对开除，主张给予一般的谴责。

从上面所举的数字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占多数，所以他们取得了胜利，比索拉蒂之流被开除了。

究竟比索拉蒂有什么思想和行为使党非开除他不可呢？原来比索拉蒂屡次违反党的决议，竟大力支持资产阶级内阁，使自己几

乎变成一个“不管部部长”(这就是說，他虽然没有当部长，但他的行为却表明他是资产阶级內閣的伙伴和成員)。

比索拉蒂抛弃意大利社会党人所始終坚持的共和主义信念，到克維里納尔去覲見国王，并同他进行談判！比索拉蒂甚至为目前意大利同土耳其的战争辯护，虽然全党严厉地譴責这次战争，認為这次战争是资产阶级可耻的掠夺行为，是利用現代杀人武器屠杀的黎波里非洲土著的卑鄙勾当。

比索拉蒂之流被开除以后，所有右傾改良派分子都退出社会党，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們把这个政党叫做“改良社会党”。实际上在这块招牌后面隱藏着一个自由君主派“工人”政客的“政党”。

分裂是一件沉痛的事情。但是有时它是必需的，在必須分裂时，一切軟弱、一切“温情”(我国同胞巴拉巴諾娃在列德日奧所用的詞句)都是犯罪。工人領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們犯了錯誤，党就去糾正这些錯誤。德国工人党甚至曾去糾正象倍倍尔这样伟大的領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錯誤。

但是，如果他們坚持錯誤，如果他們为了維護錯誤而組織集團，踐踏党的一切決議和无产阶级軍队的全部紀律，那末分裂就有必要。因此，意大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把工团主义者和右傾改良派分子从自己队伍中清洗出去，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載于1912年7月15日

“真理报”第66号

署名：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俄国的“言論自由”

“听憑吩咐报”(这是人們对“新时报”的通俗叫法)轉載了一篇自己情投意合的同道“彼得堡新聞”来自伊万諾夫-沃茲涅先斯克省的通訊。

这篇写給报纸的通訊說：“在我們的工厂城市，街头巷尾充滿污言秽語，听不到人的言語。工厂的工人們破口謾罵；馬車夫、衣冠端正的人和执行公务的警察也都滿口不干不淨。”

“新时报”就对这样描写下的风气評論起来：

“工人的城市是幸福的，在那里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大胆的願望，即沒有任何束縛的言論自由，实现了。”

这种誹謗中伤的手段不是也能給人很大教益嗎？

效忠政府的报纸的編輯先生們，有誰不知道，正是那些最亲近政府的第三屆杜馬中的右翼政党“实现了”污言秽語的言論自由呢？有誰不知道，普利什凱維奇、馬尔柯夫先生之流和他們的同伙以此而臭名远揚于全俄国呢？

“新时报”的行動太不小心了，的确，太不小心了！它本来能够更巧妙地完成自己的奴才作用……可是在这家死心踏地忠于政府的报纸上却突然提醒人們：普利什凱維奇和他們的同伙实行的是什么样的“言論自由”，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实行的又是什么样的言論自由。

地主杜馬中的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言論自由和工人大会上的言論自由……“新时报”在大肆誹謗时粗手粗脚地碰上了这么好的一个竞选題目！

載于1912年7月15日

“真理报”第66号

署名：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是 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一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注定要在馬克思主义者中間的机会主义流派的发展上起独特作用。例如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主张就曾轰动一时。他的鼓吹曾經吸引了并迷惑了一部分工人。但是这种鼓吹散布得愈广泛，問題离实际解决愈接近，全盘計謀的捏造性質就愈明显。計謀是不攻自破了。經驗証实了布尔什維克不止一次的論断：阿克雪里罗得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知識分子的空想，是企图“迴避”严酷的階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幻想。

目前，提出工人出版社和“无派别性的”工人报纸的主张，恰恰是这类事件的重演。彼得堡的工人有誰不記得，取消派就在前不久还是如何醉心于这种主张？他們是如何用“迴避”工人民主派內部斗争的幻想来迷惑工人？对“明星报”所作的解释，即不能迴避自由派工人政策問題（請回忆一下面包师工会的決議⁵⁰）以及談論工人監督无派别性的报纸只不过是一种蠱惑宣传，他們曾是如何令人可笑地大为不滿？

可是現在阿克雪里罗得在取消派的“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非常出色地揭露了（他不得不揭露）自己知心朋友的蠱惑宣传。蠱惑宣传，就是許下一大串不能兌現的諾言。所謂扩大的工人代表大

会、公开的工人出版社、无派别性的工人报纸这些主张，是够迷惑人的。但是，全部实质在于，如果不先展开争取一般的政治自由、争取马克思主义在工人民主派内部的胜利等等的顽强和艰巨的斗争，这些迷人的东西就不能实现。许下蛊惑人心的诺言是轻而易举的，可是生活会很快指出它们是不可能实现的和揭露充满“玫瑰色的幻想”的机会主义。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说了许许多多动听的空话，例如他担保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党的进步代表”，而对方是“反动代表”。自然，阿克雪里罗得非常乐意这样想，取消派也非常乐意这样刊登。不过这种动听言词太没有价值了！自己吹嘘自己的“进步性”……要是说明一下意见分歧的实质和意义不是更好吗？

“主张办无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折不扣的真正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且是客观上同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旗帜下争取党的政治发展和组织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空想。你把空气赶出门外，它还是会从窗口和缝隙中进来的。”

阿克雪里罗得就是这样写的。这是非常不坏的见解。这种见解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这表明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取消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昨天还在向工人群众灌输就是阿克雪里罗得现在所谴责的主张。只是我们不能认为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有什么“进步性”……

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在我国，组织上确定的派别可以说还没有，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小集团，其中有一些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政治、策略和组织观点，另外一些则摇摆不定，絆前者的脚。”

前一段话不完全正确。阿克雪里罗得知道得很清楚，某种组

織上完全确定(根据目前的可能)的东西是存在的。但是,后一段話是正确的,的确有許多搖擺不定的絆脚的小集团。阿克雪里罗得道出这个为事变发展进程所逼出的真情,也就再一次揭露了自己的朋友們。有誰不知道,恰恰是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們現在所炫耀的正是搖擺不定的小集团的装模作样的紙上的“联合”呢?不也就是在“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他們許下空头諾言,說要把所有取消派同所有搖擺不定的小集团“联合”起来嗎?

阿克雪里罗得繼續写道:“爭执的焦点和主要的根源是,一方面,党内不同的集团对新的、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抱着不同态度”,(可爱的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对公开的党嗎?不应当歪曲意見分歧的实质!)“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意見分歧。正是現在,当新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了的时候,这两方面的問題才变得特別迫切和不容拖延。正是在这些問題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主要陣营。試問,正在筹办的工人机关报能够在这两个对立的陣营之間采取中立立場嗎?在原則上能够容許这种立場嗎?显然不能……”

完全正确的結論。阿克雪里罗得不仅狠狠地打击了昨天还在叫喊无派别性的中立机关报的自己那帮朋友,而且也狠狠地打击了今天还在耍天真的人們相信他們同中立集团的“一致”、“联合”、团结等等的那些人。

主要陣营确实有两个。其中一个組織上是完全确定的。它对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各种問題的回答是非常正式、非常明确的,是同某些著作家所写的杂乱无章、矛盾百出的所謂論文不同的。而另一个陣营,即阿克雪里罗得所屬的取消派陣营显然沒有什么組織上的确定性(代替这种确定性的只是一些关于公开的工人政党的諾言,只是一些关于比1906—1907年的工人代表大会更不可能实现的各种公开的工人政治团体的言論),也沒有对阿克雪里罗

得自己所列举的問題做出什么明确的回答（代替这种明确回答的只是叶若夫、列維茨基、克列諾夫、查茨基等人的作文練習）。

“……只要出版界和著作界的工人团体决定发表一定的行动綱領，决定在一些問題上，譬如說即使是同选举运动有關的問題上采取一定的立場，决定向工人提出这个运动的某些任务和口号以及主张对不同政党采取某种策略，只要——我說——出版协会——有賦予自己的出版物原則上是无产階級政治机关报性質的願望，它就会面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动荡不安和四分五裂的最棘手的問題和分歧意見。这时，协会本身甚至也可能变成这种爭執的新策源地，如果它的成員不能預先商議好，不能就這些問題取得彼此一致的意見的話。”

阿克雪里罗得非常正确地、非常有力地駁斥了取消派。“协会”需要的东西，“我們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就更需要。那它們为什么不能就棘手問題和分歧意見商議好呢？它們为什么不能确切地回答即使是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最重要問題（对各种不同政党的态度，任务，口号，策略）呢？

“医生，先治好自己吧。”阿克雪里罗得向工人解释必須明确地回答“棘手問題”时講得如此头头是道，“我們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也許不限于涅瓦……）的著作家們真應該細心地听一听阿克雪里罗得的話。对“棘手問題”不作出明确的回答是不行的，不能只限于著文空談——这是小組习气！需要有明确的、正式的、周密考虑过的决定。难怪阿克雪里罗得要談論——談得又多么好啊！——什么一定的行动綱領，什么任务和口号等等了。

順便說一下，取消派所以称为取消派，是因为他們抛弃旧的，但是提不出新的来。什么公开的党是有好处的，而公开的政治团体又是必需的，这类話所有取消派都說得我們听膩了。但是要知道光是这样談論是不够的，至于行动，取消派却没有，沒有和沒

有。沒有的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要求工人做的！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下栏的小品文中提出极有力的揭露材料，駁斥取消派在上栏即报纸編輯栏中的文章。你仔細地讀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就会发觉，取消派大叫要有选举綱領的“協議”，要有“統一的”綱領等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明星报的拥护者”在“涅瓦明星报”第16号上已經揭露了这个騙局。但是，阿克雪里罗得的揭露，既然是出自阿克雪里罗得之手，那就更加深刻，更加宝贵了。

我們完全贊成統一的綱領，这种綱領，正如“明星报的拥护者”所公正指出的，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护党派早已通过，并且正在貫徹执行。我們完全贊成統一的选举运动，这种运动必須以这个綱領为基础，必須以这些决定和对所有“棘手問題”的明确的回答为基础。

取消派叫喊“統一”，那是他們企图用响亮的字眼来引誘思想不开展的工人。“統一”非常中听，“无派別性的机关报”更博人同情！但是，即使是讀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它也会叫你明白，无派別性是办不到的，这是空想，因为在工人民主派中有两个陣营，而这两个陣营又是互相对立的。

怎么？取消派莫非想要維護这个“綱領”以掩盖自己的观点嗎？莫非想要維護博得资产階級如此爱慕的外交式的綱領嗎？莫非想要維護对“棘手問題”沒有做任何回答，而滿紙“全是”和“只是”“选入杜馬”的綱領嗎？

如果要維護这个綱領，那就是毫无原則性。工人是絕不会对此表示同意的。这样的綱領不管是怎样“公开”，都是一天也站不住脚的。

不。我們再不要自己騙自己了。應該正視連取消派領袖阿克雪里羅得這次也率直承認了的真情實況了。取消派先生們，如果你們想要堅持“自己的”綱領（雖然你們直到如今並沒有提出來，而我們是不會相信這個在選舉前6周還在擬定的綱領的！），如果你們想要堅持“自己的”策略（雖然你們直到如今並沒有在任何地方確切地、正式地、按照黨的方式說出來！），——那你們就只有責備自己了。這樣做下去，你們就是已經存在的統一的破壞者。這樣做下去，破壞統一的 全部 責任就要落在你們身上。

不。我們再不要自己騙自己了。取消派叫喊“統一”乃是枉費心機的掩人耳目的手法。取消派既然清楚地知道工人是反對他們的，也會同樣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單獨行動將會帶給他們怎樣徹底的毀滅性的失敗。所以他們就準備隨便許下什麼諾言，只要選入杜馬。

這樣做是不行的。只有資產者才這樣做。工人民主派相信的只是選舉前幾年就在貫徹執行而在選舉時只不過是第一百次重申的那些綱領、決定、策略和口號。而誰如果無視這些決定，只是為了迎合選舉，杜撰出空空洞洞的“綱領”，那他就得不到任何信任。

對拆穿掩耳盜鈴的騙局來說，對教訓“新的”、“公開的”、“共同的”綱領的各種各樣的杜撰者來說，阿克雪里羅得的小品文是一篇有益的東西。

二

我們在“涅瓦明星報”第18號上談到的阿克雪里羅得的那篇文章的結尾部分，現在在“我們的曙光”雜誌上出現了。總的來說，

这个结尾部分完全证实了我们所作的评价，因此，我们只是重申一下：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弄清取消主义真正的本质来说，对评价目前在某些集团中如此白白受到重视的臭名远扬的“无派别性”的全部虚幻性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是有益的东西。

阿克雪里罗得极为锋利地和令人信服地驳斥了目前同取消派联合（是不是牢固的呢？）的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得写道：“进步分子”（他把取消派叫做党内进步分子，而把我们叫做党内反动分子来自我安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成独立的派别，在现在的情况下乃是他们不容推诿的责任和不容拖延的任务。”“在党内的这种情况下，把‘无派别性’当作唯一挽救的手段来谈论，就象鸵鸟在危险逼近时把脑袋埋在沙堆里一样，这样的做法就是掩盖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真实情况，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第15页）。

可怜的托洛茨基！站在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地位，这样攻击取消派的忠实朋友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撰稿人，简直是残忍和刻薄。现在我们又会看到什么呢？是托洛茨基出来发表攻击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呢？还是马尔托夫出来按平常那样做法，用一打油膏之类的附带声明把裂痕粘合，来平息调和派分子托洛茨基同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的纠缠呢？

那末，现在可不可以严肃认真地谈论什么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准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同阿克雪里罗得结成的臭名远扬的联盟^①呢？

^① 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刊登于1912年5月17日，即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派分子隆重签定联盟，以便在“无派别性”的旗帜下同反取消派展开斗争的5个月之后！

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个論点是值得認真分析的，即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欧化”問題。但是，在分析这个論点之前，有必要对取消派采取的一种手段說几句话。

在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頁(第 16 頁)滿紙尽是特意挑选的穷凶极恶的毒辣謾罵，来攻击一切反取消派，特别是攻击本文的作者。假如沒有文件資料証明，有一些人专门在利用这种謾罵，另一些人却为此而惶惑不安的話，那就完全不值得理睬这种謾罵(因为处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境地，除了咒罵以外，是别无办法的)。

譬如，切尔諾夫先生在“箴言”杂志⁵¹上对加米涅夫証明他这个“左傾”民粹派領袖正从民主主义滾到自由主义这一点进行答复时，就一边从取消派和反取消派身边收集最激烈的咒罵語句，一边嬉皮笑脸地自鳴得意。切尔諾夫先生的手法非常卑鄙，对于这种手法只可投以輕蔑的眼光，而无需多加理睬。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各个集团間的任何原則斗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沒有一系列个人的爭执和組織的爭执。专门去捕捉“爭执的”詞句，这是小人干的勾当。而对这种爭执感到惶惑不安，采取絕望或輕蔑态度加以迴避，把一切都說成是个人糾紛！——持这种看法的又只能是所謂“同情者”中的神經衰弱的見識浅薄之徒。真正关怀工人运动的人們，即使在研究工人运动的伟大活动家的历史作用时，也要經常学会把思想斗争、派別斗争的“爭执”部分同原則部分加以区别——这点是能够也应当学会的。人总是人，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馬克思同巴枯宁)，盖得派同饒勒斯派，拉薩尔派同爱森納赫派等等的历史上的冲突也不是沒有一点“爭执”和所謂“糾紛”的。

直到現在也还有些小人著作家，他們专门收集“从那些时期以

来”的对大小不計其数的不忠实行为等等的責难。但是，也有严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对于那些在分裂成各个集团的情况下，在流亡国外的生活环境下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傾軋形式的意見分歧的态度，則是去揭示这些分歧的思想根源。

請讀者不要以为，我們想要“吓走”誰，不讓他研究阿克雪里罗得在自己文章的极尽謾罵能事的篇幅中所暗示的——只是暗示——那些資料。完全相反。誰願意全面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們就邀請他来研究这些資料。在国外这些資料是非常完备的，不仅有充滿激情的責难，而且有文件和中立人士的証詞。研究这些文件和这些証詞就可以回答这样的問題，即为什么1910年1月前試圖在取消派和反取消派之間达成完全的和解而沒有成功。

下面是阿克雪里罗得文章中最引人注意的也是最带原則性的段落之一：

“派別的形成和團結是党内改革派，或者更确切地說……”(請听!)“党内革命派不容推諉的責任和不容拖延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他們才能够完成下述任务：把在革命前就形成，并在革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質加以欧化，就是說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使它組織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基础之上。”

这样說来，取消派就是党内革命派了。阿克雪里罗得这个非常少有的真实声明是值得加以指出的，因为痛苦的真情比“抬举我們”的騙局要有益，比外交式的遁詞和声明要珍貴。可爱的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您就請举行党内革命吧！我們要看看，您和您的朋友們能不能比前不久在葡萄牙企图实现“革命”(反对共和国)的那些“革命者”获得更大的成就⁵²。

但是，在上面援引的这段議論中，主要的是臭名远揚的所謂“欧化”，唐恩、馬尔托夫、托洛茨基、列維茨基和一切取消派分子，都在七嘴八舌地談論这种“欧化”。这点是他們机会主义的主要宗旨之一。

“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質加以欧化，就是說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仔細地思考这些話吧。是什么决定一切社会民主党的“性質”和它的根本改变呢？无疑，是該国的一般的經濟和政治条件。无疑，只有在这些条件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根本改变这国人民或那国人民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質。

这都是最起碼的、最不容爭辯的真理。但是，正是这些最起碼的真理暴露了阿克雪里罗得的机会主义錯誤！他的不幸就在于他想用根本改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質”的幻想来迴避为实现还没有完成的俄国政治条件的根本改变而进行的頑强和严酷的斗争。

正象立宪民主党人兴致勃勃地高談欧化（取消派既抄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字眼，也抄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想），用这个曖昧不明的字眼模糊对政治自由的牢固基础的准确概念，并“玩弄”“立宪反对派”的把戏一样，取消派也在玩弄“欧洲式社会民主党”的把戏，虽然在他們玩弄这种把戏而从中取乐的国家里还没有宪法，还没有“欧洲主义”的基础，还面临着爭取实现它們的頑强斗争。

赤身裸体的野人在头上戴一頂大礼帽，就因此而自命为欧洲人，那是够可笑的。資产階級那边的米留可夫，当他在第三屆杜馬断言：“謝天謝地，我国有了宪法”的时候，工人階級这边的阿克雪里罗得，当他在头上戴一頂大礼帽，上面写着“我是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都会使人想起这种野人来。米留可夫也好，阿克

雪里罗得也好，他們俩都天真得令人可笑。他們俩都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們都想用“欧洲主义”的幻想空談，来迴避这样一个艰巨和紧要的問題，即在非欧洲的环境中，这个或那个阶级应当如何行动，以便为争取欧洲主义的基础而进行頑强斗争。

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自己的文章証明了，他是用幻想空談来迴避活生生的紧要問題的。托洛茨基准备了一份完全是欧洲式的草案（确实是完全，完全是欧洲式的草案），要建立“报刊委员会”，作为工人对工人报纸的“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頁）。看来，托洛茨基当时甚至征求过“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見，并得到他們的祝福，对于这份礼品他是特別珍視的。

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托洛茨基的那些論述“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的信件引起一片嗤笑，并且使彼得堡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不胜厌恶，于是，“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最后不得不怜悯起托洛茨基，向他解释道：“报刊委员会”是无意义的，它是不可能实现的，須要用工人同取消派的“活的事业报”的“协议”来代替它（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頁和第19頁）！！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很遺憾，我們只能举这么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非常說明問題。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的“欧洲”计划落了个令人耻笑的下場，現在所有取消派关于“公开的工人政党”或“合法的工人政治团体”以及关于“争取結社自由”的“运动”等等的“欧洲”计划也都要落到这种下場的。

从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亦即关于“所有确定的工人組織”对工人报纸实行监督的那种“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等等的“欧洲”计划所得到的結果只有一个，这就是合法派玩弄“工

人出版社”的把戏帶給了工人特別的教訓，实际上，無論是“报刊委員會”也罷，無論是工人报刊也罷，取消派都沒有搞成！事實就是這樣。

“报刊委員會”是机会主义知識分子的幻想，他為了迴避俄國工人運動所處的困難的、與歐洲不同的情況，編制了一份絕妙的歐洲計劃，並拿編制這樣的計劃向全世界吹噓自己的“歐洲主義”。

取消派這個悲慘的遭遇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他們的“歐洲”計劃一接近實現，就立刻暴露出這套玩藝只是机会主义知識分子的虛幻泡影和憑空捏造。落到這樣下場的還有工人代表大會，有“报刊委員會”，有合法的工人政治團體（馬爾托夫在“我們的曙光”雜誌第5期上為“挽救”這個“計劃”而發表的矛盾百出的聲明，絲毫也沒有使處境好轉），有爭取結社自由的運動。

取消派把歐洲一些主要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在1871年後，即正當資產階級革命的整個歷史時期宣告結束和政治自由的基礎已經牢固地和長遠地形成的時期，進行活動的條件叫做“歐洲主義”。這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的“性質改變”，第一，是在政治條件根本改變之後，即比較徹底鞏固地建立了一定的立憲制度之後出現的；第二，這種改變只是一種暫時的改變，它只適應於一定時期（這個時期恰在目前正接近於結束，這點是歐洲最謹慎的社會民主黨人都一致承認的）。

在這樣一種資產階級立憲主義完全鞏固的條件下，譬如說，爭取結社自由或爭取普選權的運動，爭取一般立憲改革的運動，在一定情況下也能是工人階級的運動，是真正的政治運動，是真正爭取立憲改革的鬥爭。

而我國的机会主义知識分子却把這一類“歐洲的”運動的口號

移植到沒有最起碼的欧洲立宪主义基础的土地上，企图迴避通常是出現在建立这些基础之前的独特的历史发展情况。

我国的阿克雪里罗得和他的朋友們(他們把自己打扮成“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同比索拉蒂(这是真正的欧洲人)的改良主义的区别在于，比索拉蒂牺牲階級斗争的原则，牺牲彻底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和实践的原则，是为了实际上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改革(打了折扣的)。阿克雪里罗得付出与比索拉蒂同样的牺牲代价，却是为了那些軟弱无力的、毫不严肃的、沉溺于幻想的自由派只是口头上空談的改革。

在我們俄国，只有当国家的发展超越自由派的怯懦畏縮，超越他們的調和主义的不彻底的口号的时候，自由派資產階級才会成为一支现实力量。各国过去的情况也都是这样。自由派只有在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而获得胜利的时候才取得了政权。

写于1912年7月末

載于1912年7月22日、29日

“涅瓦明星报”第18号、19号

署名：弗·伊·

按報紙原文刊印；并根据“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第2卷(1914年圣彼得堡版)的原文作过校訂

半年工作总结⁵³

彼得堡工人出版了工人日报，也就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工人民主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已经很巩固，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工人报纸现在经常遭到种种迫害。

但是，不管怎样，“真理报”的创刊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它证明俄国工人有觉悟、有毅力和团结一致。

回顾并总结一下俄国工人半年来在创办自己的报纸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很有益处的。因为恰恰是从今年一月起，彼得堡工人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对创办自己的报纸的兴趣，当时在与工人有关的各种报章杂志上出现了很多谈到工人日报的文章。

一

俄国的工人日报是由谁创办和如何创办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好在是相当完整的。这就是有关向工人日报捐款的材料。

现在我们就从创办“真理报”的捐款谈起。从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的整整半年里，“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都公布了总结材料。由于公布了这些材料，也就保证了内容绝对正确，因为偶然发生的错误已经及时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加以更正。

ПРАВДА

ЕЖЕДНЕВН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

№ 80

Среда, 1 Августа 1912 г.

ЦЕНА 2 коп.

Указом Высочайше повелеваем:
1.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2.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3.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4.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5.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6.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7.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8.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9.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10. Утвердить прилагаемые проекты: а)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б)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ожения о порядке и условиях приема в службу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Всякая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не только для народа, но и д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это основа прогресса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страны. Мы должны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получил доступ к знаниям и культуре. Только так мы сможем построить справедливое и процветающее общество.

„Бюллетень Конторщика“
Ваше изд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для работников конторского персонала. В нем вы найдете полезные советы,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и новости из мира конторского дела. Мы благодарим вас за то, что вы делитесь с нами своим опытом и знаниями.

„Большое место“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Итого полугодовой рабо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шесть месяцев мы достиг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в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Мы выполнили вс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 и добилис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заслугой каждого из нас. Мы должны горди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и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аботать с тем же энтузиазмом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Это сред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эффектив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борьбы с различными заболеваниями, связанными с нарушением кровообращения. Оно помогает укрепить сосуды, улучшить качество крови и повысить иммунитет. Регулярн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дан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общему оздоровлению организма и продлению жизни.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1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2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3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4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5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6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7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8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90 коп.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жидкой кровью	1 руб.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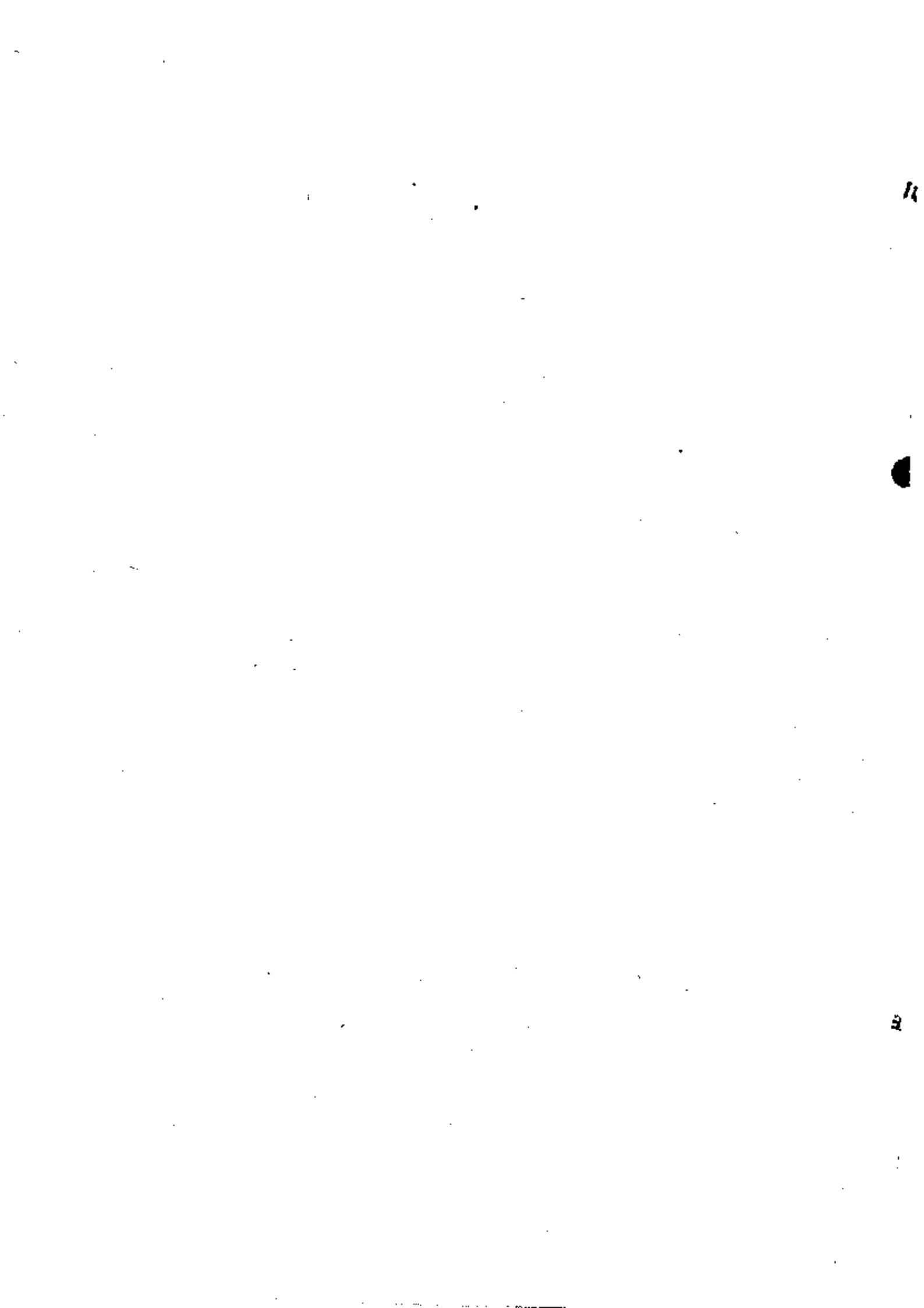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Ваша работа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Мы должны ценить и уважать труд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смож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достичь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вайте ж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ть на благ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а.

1912年8月1日“真理报”第80号第1版, 这里
刊载了列宁的“半年工作总结”一文的一部分
(制版缩小的)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捐款的总额，而是捐款者的成分。譬如“涅瓦明星报”第3号上公布了对工人日报捐款的总额是4288卢布84戈比（从1月开始到5月5日止，其中4月22日“真理报”创刊时直接寄给该报的数额未计算在内），于是在我们面前马上就产生下面一个问题：工人本身和各个工人团体在筹备这笔捐款中起的作用如何？它是由同情者的大笔捐款凑起来的呢，还是工人自己对工人报纸表现了极大的关心，由大量的工人团体捐献了巨款呢？

从工人本身的创举和毅力的观点来看，比方说，30个工人团体所捐献的100卢布要比几十个“同情者”所捐献的1000卢布重要得多。依靠工厂工人的小小团体筹集的许多5个戈比的铜板所创办的报纸，比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同情者捐献的几十个和几百个卢布所创办的报纸要扎实巩固和庄重许多倍，这不论是从财政观点来看，或更重要的从工人民主派的发展来看，都是这样。

为了掌握这一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的精确材料，我们对上述三种报纸所登载的有关捐款的材料作了下面的统计。我们这里只是把工人或职员团体的捐款挑选出来。

目前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工人自己的捐款，而且指的不是单个工人的捐款，因为他们也许是偶而碰上了募捐人，在思想上，也即在观点和信仰上同他并没有联系，也就是说，我们指的是工人团体的捐款，他们都一定预先讨论过应不应当捐款，捐给谁，捐款的目的何在。

“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报道的工人或职员团体向工人日报所作的每次集体捐款，我们把它作为工人自己的一个捐款团体。

那末,在1912年上半年这样的工人捐款团体究竟有多少呢?
有504个捐款团体!

工人团体为创办和支持自己的报纸捐款五百多次,他们有的是拿出一日的工资,有的作定期捐款,有的作不定期捐款。504个工人团体(单个工人和同情者除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创办自己的报纸的事业,这个数目无疑说明了,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自觉地极其关心工人报纸,并且不是什么一般的工人报纸,而是工人民主派的报纸。既然群众有这种自觉性和积极性,任何困难和障碍就都不可怕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是工人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关心所不能克服的。

504个捐款团体的各月分布情况如下:

1912年1月	14
1912年2月	18
1912年3月	76
1912年4月	227
1912年5月	135
1912年6月	34
<hr/>	
半年总数	504

从上面这个小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4、5两月的全部意义,这可以说是个转折点。这是从黑暗到光明,从消极到积极,从个别行动到群众行动的转折点。

在1、2月间,工人团体捐款的次数还很少。显然,事情还只是开始。3月间可以看出已经增加很多。一个月中有76个工人捐款团体,这至少可以说明工人中已掀起了规模巨大的运动,群众不怕任何牺牲,竭力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说明工人群众深信自己的力量,深信全部工作的安排,深信已着手创办的报纸的方向等等。

3月間工人日报还没有创办起来，而工人团体就把錢湊集起来作为所謂信貸交給“明星报”。

4月間馬上大大增加，这起了决定作用。这一个月有227个工人捐款团体，每日平均7个以上！大壩被冲垮了，工人日报得到了保障。工人团体的每次捐款，不仅仅是表明5个10个戈比的总数，更重要的是說明工人团体同心协力以实际行动支持、宣传、指导、创办工人报纸的决心。

可能产生一个问题：4月份的捐款是不是主要集中在4月22日以后，即“真理报”创刊以后呢？不是。“明星报”在4月22日前登載了188个捐款团体材料。而“真理报”从4月22日至月底一共登載了89个。这就是說，4月份的前21天，即在“真理报”创刊前，每日平均有9个捐款团体，而后9天每日平均只有4个。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結論：

第一、工人正是在真理报创刊前尽了最大的努力。工人采用“信貸”办法，信任“明星报”，正是表示决心要实现自己的主张。

第二、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工人在4月間的捐款增多，工人的“真理报”才得以创刊。毫无疑问，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不是以狭隘的行会形式出現的，不是以狭隘的工会形式出現的，而是具有全民規模的运动）同彼得堡工人民主派机关日报的创刊之間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們还缺少职工的刊物，我們需要自己的政治性的报纸——这就是群众在4月間形成的坚定的信念；我們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政治性的工人报纸，而是先进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我們需要创办报纸不仅仅是为了要它帮助我們工人进行斗争，而且是为了要它給全民树立榜样，成为他們的火炬。

在5月，捐款的次数还是很多。捐款团体每日平均4个以上。

一方面,从这里可以看到四五两月的普遍高涨。另一方面,工人群众認識到,工人日报虽已开始发行,但开始时的处境特別困难,因此就特別需要大家的支持。

6月份捐款团体的数目已比3月份减少。显然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工人日报創刊后已出現了另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贊助报纸的形式,这就是訂閱报纸并向自己的同志、熟人、同乡推銷。“真理报”的一切忠实朋友不仅仅是訂閱者,他們还把“真理报”散发介紹到其他的工厂、邻舍和农村等等。遺憾的是,我們无法把这种集体帮助完全統計出来。

二

仔細看看这504个工人捐款团体在各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分布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俄国都是哪些地区的工人响应了創辦工人日报的号召,他們响应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在这方面幸好有說明一切工人捐款团体的材料,“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也都刊登了这些材料。

如果把这些材料汇总在一起,我們首先应当提出彼得堡,因为它在創辦彼得堡工人报纸方面的贡献自然是首屈一指的;其次再提到有一个以上的工人捐款团体的14个城市及工业区,最后是其余的35个城市,这些城市半年来都只有一个工人捐款团体。于是便得出下面的情况:

	捐款团体总数
彼得堡.....	412
各有2—12个捐款团体的14个城市.....	57
各有1个捐款团体的35个城市.....	35
50个城市的总数	504

由此可见，几乎整个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了创办工人日报的事业。如果注意到在外省推销工人民主派报纸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看到半年来有许多城市都响应了彼得堡工人的号召，那是会感到惊奇的。

除首都外，俄国的49个城市^①共有92个工人捐款团体，这至少对于开始来说是个很惊人的数目。这里指的决不是那些偶然的、漠不关心的、消极的捐款者。我们所看到的，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群众的代表，他们虽然分散在俄国各地，但是对于工人民主派的自觉的同情把他们联合起来了。

应当指出，站在省城前列的是基辅，有12个捐款团体；其次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有8个；可是莫斯科却是第4名，只有6个。莫斯科和整个莫斯科区的这种落后现象，可从下列俄国各区的综合材料中看得更清楚：

**1912年1—6月半年中为工人日报
捐款的工人团体的数目**

彼得堡和它的郊区.....	415
南部.....	51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	13
北部和西部.....	12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6
高加索、西伯利亚、芬兰.....	7
全俄总计.....	504

^① 所有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名称如下。圣彼得堡郊区有：喀琅施塔得、科尔皮诺、谢斯特罗列茨克。南部有：哈尔科夫——4个捐款团体，叶加特林诺斯拉夫——8个，阿纳尼也夫——2个，鲁干斯克——3个，赫尔松、顿河岸罗斯托夫、巴甫洛格勒、波尔塔瓦、基辅——12个，阿斯特拉罕——4个，切尔尼果夫、尤佐夫卡——3个，米纳科沃、舍尔宾诺夫卡矿区、李可夫矿区、别尔哥罗德、

这份材料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表明。

从俄国工人民主派重趋活跃的程度来看，无产阶级的彼得堡已经觉醒并走上了自己的光荣岗位。南部正在觉醒。而母亲莫斯科和俄国的其他地区还在沉睡未醒。应当是开始觉醒的时候了。

如果把整个莫斯科区同其他各省区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莫斯科区的落后状态。南部离彼得堡很远，比莫斯科离彼得堡远得多。南部的产业工人也比莫斯科区少，可是工人捐款团体却几乎多3倍。

莫斯科看来甚至比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还落后，因为莫斯科和莫斯科区的工人要比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人多许多倍，而不是多一倍。可是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捐款团体有6个，而莫斯科和莫斯科区总共只有13个。

自然，莫斯科和莫斯科区的落后状态大概受到了两个特殊条件的影响。第一、这里纺织工业占多数。而这方面的情况，即市场情况和多少能活跃生产的条件要比别的工业例如比钢铁工业差些。因此，纺织工人不大参加罢工，不大关心政治和工人民主派。第二、莫斯科区分散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的工厂比较多，因此运进报纸就比大城市困难。

可是不论怎样，我们大家无疑都从上述材料中吸取了教训。

叶利萨维特格勒、叶加特林诺达尔、马林波尔——2个，下德涅泊罗夫斯克、纳希切万。莫斯科区有：罗德尼基——2个，梁赞、土拉——2个，别热茨克——2个。北部有：阿尔汉格尔斯克——5个，沃洛果达。西部有：得文斯克、维尔纳、哥美里、里加、里巴瓦、缪尔格拉宾。乌拉尔有：皮尔姆、克什特姆、米尼亚尔、奥通堡。伏尔加河流域有：索尔莫沃、巴拉科沃村。高加索有：巴库——2个，格罗兹内、梯弗里斯。西伯利亚有：秋明、布拉戈维申斯克。芬兰有：赫尔辛福斯。

必須大力注意在莫斯科推銷工人報紙的工作。不能再讓莫斯科处于落后状态。每个觉悟工人都会了解到，有彼得堡而沒有莫斯科，就象只有一只手而失去了另一只手。

俄国的工厂工人 被大部分 集中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区。据官方統計，1905年这里的工厂工人有567 000人，即占全俄工厂工人(1 660 000人)的 $\frac{1}{3}$ 以上，大大超过彼得堡区(298 000人)。因此，在工人報紙的讀者和拥护者的数目方面，在工人民主派的有觉悟的代表数目方面，莫斯科区本应占第一位。当然，莫斯科一定会訂閱自己的工人日报。

彼得堡暂时还应当帮助莫斯科。“真理报”的讀者每天早上都应当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們說：“工人們，要想到莫斯科人！”

三

从另一种极其重要的实际上非常现实的观点来看，上述材料也应当引起我們的注意。任何人都了解，政治性的報紙是现代社
会一切階級参加国内一般政治生活，特别是参加竞选运动的一个基本条件。

因此，一般來說，特别是为了进行第四届杜馬的选举，工人們是需要創辦報紙的。工人們知道得很清楚，不論第三届杜馬也好，第四届杜馬也好，是不能指望它們做出什么好事来的。但是我們应当参加选举，首先是为了在选举时，即当党派斗争和全部政治生活活跃起来的时候，当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政治的时候，去团
結工人群众，并在政治上教育他們；其次是为了把自己的工人代表选进杜馬。工人代表甚至在最黑暗的完全被地主控制的杜馬里也已經帶給而且仍然能够帶給工人事业不少好处，只要这些代表是

真正的工人民主派，只要他們能够联系群众，而群众也学会指导和監督他們。

在1912年上半年，俄国的一切政党开始了、实际上已經結束了选举前的所謂动員党内力量的工作，动員是个軍事术语，就是說使軍隊做好战斗准备。正象战争前軍隊要进行战斗准备，征集粮草，分发武器和弹药一样，各党派在选举前要总结自己的工作，重申关于本党的观点和口号的决定，聚集自己的力量，准备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斗争。

再說一遍，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經完成了。离选举只剩下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而且应当竭力設法加强对选民、对群众的影响，但如果党本身（每个阶级的政党）半年来还未做好准备，那便无可救药了，它在选举中只能等于零。

这就說明，为什么我們的統計所包括的半年是第四届杜馬选举前大力动員工人力量的半年。这半年是动員工人民主派一切力量的半年，当然不只是为了杜馬斗争，不过我們暂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

这里又产生一个不久前在“涅瓦明星报”第16号和“真理报”第61号上曾經涉及到的問題。这就是关于在彼得堡从1912年1月出版了“活的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的所謂取消派的問題。取消派有了自己单独的报纸，說什么为了在选举中“团结一致”，工人民主派必須同他們取消派“妥协”，不然就要有“双重候选名单”⁵⁴这样的妖怪出現。

这种吓唬人的企图，到現在为止看来很少产生效果。

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被公平地称为取消派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传播者的人，怎么能够認真重視呢？

可是,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也许还有许多工人赞成的吧?那末是不是应当特别注意这些工人呢?目前,我们有客观的、公开的和完全确切的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在1912年的整个上半年,取消派特别激烈地攻击“真理报”、“涅瓦明星报”、“明星报”及一切反对取消派的人。

取消派在工人中间受到了怎样的欢迎呢?这一点可以从取消派的“活的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所登载的对工人日报的捐款中看到。关于日报的必要性,取消派在很早,即在1911年,甚至在1910年就已承认,而且对自己的拥护者大力宣传这种思想。1912年1月20日创刊的“活的事业报”从2月就开始登载它所得到的这方面的捐款材料。

现在我们完全象对非取消派的报纸所做的那样,从这些捐款中(1912年上半年为139卢布27戈比)抽出工人团体的捐款。把所有16号“活的事业报”和5号“涅瓦呼声报”(第6号“涅瓦呼声报”出版时已是7月份了)作一总结,甚至加上对“活的事业报”本身的捐款(虽然我们并没有把非取消派报纸上的这种捐款计算在内),我们就可以得到半年来工人捐款团体的总数:

1912年上半年为工人日报捐款的工人团体的数目

	为非取消派的报纸	为取消派的报纸
1月.....	14	0
2月.....	18	0
3月.....	76	7
4月.....	227	8
5月.....	135	0
6月.....	34	0
总 计.....	504	15

总之，半年来一小撮知识分子取消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共才得到 15 个工人团体的支持！

能够设想比取消派从 1912 年 1 月起遭到的更加彻底的失败吗？能够设想更加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小撮知识分子取消派虽然能够出版半自由派的杂志和报纸，但是完全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稍微重大的支持吗？

下面还有按地区划分的为取消派捐款的工人团体材料：

1912 年上半年为工人日报捐款的工人团体的数目

	为非取消派的报纸	为取消派的报纸
彼得堡和郊区.....	415	10
南部.....	51	1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	13	2
北部和西部.....	12	1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6	0
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芬兰.....	7	1
总 计.....	504	15 ^①

总之，半年来取消派在南方遭到的失败甚至比在彼得堡还要惨。

整整半年来在针锋相对的两派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些工人统计的确切材料，完全解决了“取消主义”的问题。尽可以任意辱骂甚至诬蔑反对取消主义的人，但是关于工人团体捐款的确切材料却是铁证如山。

现在可以完全了解到，为什么“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都不

① 莫斯科——2 个，纳希切万、诺沃尼古拉也夫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各 1 个。

理睬取消派的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威胁。如果理睬那些在半年公开斗争中已经证明自己只是比零稍强的人，那是可笑的。取消主义的一切拥护者都由“活的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联合起来了。而半年来它们总共只把 15 个工人团体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取消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一般说来，“真理报”上关于各种工人捐款的材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材料。我们从这里第一次得到有关工人运动和俄国工人民主派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最确切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我们希望不止一次地再来分析研究。

现在，在概述了工人团体对日报的捐款之后，我们就应当作出一个实际结论。

504 个工人团体为了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向“明星报”和“真理报”捐款。除了创办和支持自己的工人报纸以外，工人们决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正因为这样，单是正确地综合了半年来的这些材料，就会钩出一幅有关俄国工人民主派的生活的极其珍贵的图画。把 5 个或 10 个戈比的铜板聚集起来并标上“某某工厂的工人团体”，就使我们能够判断工人的情绪，判断他们的觉悟程度、团结程度以及对工人事业同情的程度。

正因为这样，必须继续保持、发扬并扩大四五月高潮中养成的这种工人团体捐款的习惯，象“真理报”上经常刊登的这些捐款总结材料，自然也是必需的。

不论从巩固工人报纸的观点出发，或是从工人民主派的共同

利益的观点出发,这种习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須使工人报纸不断发展,日趋巩固。这样就需要钱。只有依靠工人经常不断的大量捐款,再经过顽强的努力,才能把俄国工人报纸象样地办起来。美国有一家工人报纸(“向理智呼吁报”⁵⁵)拥有50多万订户。让我们借用一句常说的口头语,再把它稍微改一下:不想赶上和超过自己的美国同行的俄国工人,是没有出息的人。

但是更重要得多的还不是财政方面,而是另一方面。假定一个工厂各部分的100名工人每人每次领取工资时为工人报纸捐1个戈比,那每月总共不过2个卢布。又假定有10名钱挣得很多的工人,偶然相遇,一下子就湊集了10个卢布。

前者的2个卢布比后者的10个卢布值钱。这一点每个工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是不需要详细说明的。

必須使每个工人养成一种习惯,从每次领取工资中抽出一个戈比捐给工人报。至于报纸的订阅工作,可以按照原来的办法进行,象过去一样,谁能多拿,就多拿一些。但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保持并发扬“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

这种捐款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够不间断地在每次领取工资时进行,在于能够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加入这种经常的捐献工作。捐款报告可以简单地刊印成这样:“多少多少戈比”——这也就表明某某工厂有多少工人捐款给工人报,——而如果有大笔捐款,便可以刊印成这样:“此外,多少工人捐款多少。”

如果养成了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那俄国工人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报纸提到应有的高度。工人报应当更多地提供多种材料,星期日出版副刊等等,在杜马中,在俄国的一切城市及国外各

大城市中都应当有自己的記者。工人报应当經常不断地发展和改进,可是如果没有更多的工人經常为自己的报纸捐款,那就不可能办到这一点。

每月汇报工人捐的戈比的材料,就能使所有人都看到,俄国各地工人是在怎样抛弃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摆脱沉睡未醒的状态,他們是在怎样觉醒过来投入正当的文化生活,当然,这里講的文化生活并不是官方和自由派所理解的那种文化生活。从这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們对工人民主派的关心日益增长的情况,莫斯科及一切大城市都来訂閱自己的工人报纸的日子愈益临近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戈比报”⁵⁶的統治时代应当結束了! 无原则的商人报纸的統治时代应当結束了。彼得堡工人在这短短的半年里表明了,工人的集体捐款能收到多么大的成效。希望他們的榜样和創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希望工人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日益发展和巩固!

写于1912年7月12—14日
(25—27日)

載于1912年7月29日和31日、
8月1日和2日“真理报”
第78、79、80、81等号

署名:統計学家

按报纸原文刊印

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現狀⁵⁷

德国同志們常常談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部斗争激烈和意見根本分歧的消息。可惜这些消息是从个别侨外团体当中传出的；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大多数不是毫不了解俄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有意片面地解释党的政策，使德国同志們产生誤解。每一个这样的侨外团体都独自成为一个“派別”，实际上，它們是由一些同进行斗争的俄国工人政党失去了任何实际联系或者从来就毫无联系的人組成的。遺憾的是，一位这样的“情报員”竟能取得《Vorwärts》^①的信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竟然允許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俄国党发出了接二連三的聞所未聞的誹謗，而这些誹謗都是出自这位情报員的手笔，似乎都有“客观的”根据。

事实上，这些根据是彻头彻尾“主观的”和彻头彻尾捏造的。既然《Vorwärts》不发表我們的事实更正，我們就不得不出版以“《Vorwärts》的匿名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②为題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印了好几百本，并且分发給了所有較大的德国党组织的執行委员会和党的重要报刊的編輯部。

对于这本小册子中的事实材料，《Vorwärts》沒有能够提出任何异議，也就是說加以默認了。

① ——“前进报”。——編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77—489頁。——編者注

为了使我們德国党的同志們能够判断他們听到的某些消息是否可靠，我們在这里援引一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拉脫維亞人建議执行委员会召开十一个“中心”的全体會議，討論物質上支持选举运动的問題，后来，执行委员会曾就这些中心对待这个問題的态度向它們提出詢問。这封信就是中央的回答，全文如下：

給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①

敬爱的同志們：

不久以前，我們收到了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6月24日写給你們的信的副本。我們認為向你們解释这些拉脫維亞人的奇怪的計劃是多余的，因为我們坚信任何一个有見識的人都不会認真看待这个計劃。可是，从7月22日的来信中得悉你們打算接受这个計劃，我們甚为驚訝。为此，我們不得不向你們提出坚决的抗議。执行委员会的用意，客观上无非是企图促使我們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和組織一个与我們敌对的新党。这在整个国际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現在，我們向德国同志們詳細說明这一点。

1912年1月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

1912年1月，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會議，派遣代表出席这次會議的有下列組織：彼得堡黨組織、莫斯科黨組織、莫斯科州黨組織、喀山黨組織、薩拉托夫黨組織、梯弗里斯黨組織、

^① 这里援引的这封信，在文字上略有修改。

巴庫黨組織、尼古拉也夫黨組織、基輔黨組織、叶加特林諾斯拉夫黨組織、維爾納黨組織和德維納黨組織。這次代表會議恢復了黨，選舉了新的中央來代替取消派取消了的中央，同時代表會議不得不宣布這些取消派是置身於黨外的（見送給執行委員會的小冊子“《Vorwärts》的匿名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狀況”，這本小冊子曾談到取消派以及波蘭人、拉脫維亞人、崩得這些民族組織和國外團體的抗議）。

一月份還舉行過一次會議，目的在於建立組織委員會，以便召集新的代表會議，即取消派及其同伙所稱的“全黨代表會議”。

拉脫維亞人在6月24日給執行委員會的信中斷定說，構成這個“組織委員會”的有下列組織和派別：崩得、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高加索區域委員會、孟什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維也納的“真理報”和“前進”集團。

總之，一方面是由國內組織即在俄國工作的組織在代表會議上選出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反對派把它叫做列寧派）；另一方面是要召開“全”黨代表會議的所謂組織委員會。

至今中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對 所謂組織委員會採取什麼態度？

最有名的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堅決反對取消派的滅黨行為，他曾被邀請參加一月的黨代表會議，但沒有出席。1912年4月，他公布了他同組織委員會代表的通信（參看他的“社會民主黨人日誌”第16期）。

普列漢諾夫拒絕參加所謂組織委員會，據他說是因為崩得召開的不是現有黨組織的代表會議，而是一個旨在建立新黨的“成

立大会”。普列汉諾夫断定說，真正支持組織委员会的所謂倡导小組，就是取消派集团，他們并不屬於党，他們是想建立新党。普列汉諾夫在1912年4月写道：“新的代表會議是由取消派召开的。”

7月間，这个組織委员会的“小报”第3号出版了，其中沒有一个字是用来回答普列汉諾夫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断，拉脫維亞人，即那些埋怨“列宁的”中央不回答組織委员会的信的拉脫維亞人，是怎样給执行委员会提供情报的。

党中央，旧党的中央不回答那些組織新党的人（按照至今中立的普列汉諾夫的說法），难道这就是很奇怪的事嗎？

組織委员会首先應該向中立的普列汉諾夫証明，它不組織新党和不消灭旧党。

6月24日，即在取消派的这个組織委员会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反党斗争以后，参加組織委员会的拉脫維亞人在給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本应用事实和文件來說明这一斗争的結果，但是，他們沒有这样做，他們給执行委员会看的是取消派的波将金村^①。

拉脫維亞人曾建議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11个“組織”中心、組織和派別的會議。确是这样，一字不差（參看拉脫維亞人6月24日給执行委员会的信第4頁）。

世界上的政党，从来就是由地方組織組成的，这些地方組織則由一个中央机关統一起来。但是，俄国和拉脫維亞的取消派在1912年却搞出了一个大发明。——从此以后，可以由“中心、組織和派別”来建立一个政党。

^① 波将金村——是指实际上不存在的騙人的东西。典故出自：叶卡特林娜二世到南方出巡，大臣波将金为了显示新并入俄国版图的克里木的繁荣，沿途假造村落，进行欺騙。——譯者注

根据拉脫維亞取消派的最新选举几何学，属于11个組織中心、組織和派別的有：第一，組織委員會；第二，組成这个組織委員會的6个派別或者組織或者中心。在拉脫維亞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第2—7各項均为組織委員會的組成部分。”

这样一来，要取消党的知識分子集团就象腐敗选区的貴族一样取得了三重选举权：

(1)高加索区域委員會——空头組織；

(2)高加索区域委員會——即巴黎“呼声报”，尽管“呼声报”沒有高加索的长期委托書；

(3)高加索区域委員會——即“組織委員會”。

我們肯定地說，俄国工人将以憤怒的心情和蔑視的态度拒絕关于討論双重候选名单問題的意見；即拒絕取消派企图会同国外小集团共謀分裂的意見，尤其是因为这些集团只是一些破坏組織的知識分子。

我們絕對肯定地說，最近半年，無論哪一個反党的国外集团，都沒有从俄国某个組織方面得到辦理自己的机关报或发表自己的宣言的委托書。拉脫維亞人想对执行委員會証明相反的事情；既然如此，就讓他們在俄国报刊上至少指出一个7月22日以前的这样的委托書吧。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并不是俄国某个組織的机关报。

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办的“真理报”也不是俄国某个組織的机关报。三年以前，“真理报”是乌克兰“斯皮尔卡”⁵⁸（南俄）的机关报，但是，斯皮尔卡早就宣布自己的委托書无效了。

无论是“前进派”，无论是普列汉諾夫，无论是“布尔什維克护党派”，都沒有出版任何机关报，作为俄国某个組織的党的机关报。

援引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集團非常容易。登載“表同情的”通訊也不困難。——但是，要在半年以內辦理一個在俄國活動的組織的機關報，就必須有經常的聯繫，必須得到當地工人群眾的完全信任，必須有一致的策略觀點，而這只有在長期的合作以後才能做到。被拉脫維亞和崩得的破壞組織分子策動起來進行反黨的國外小集團，就缺少這一切。

關於 P. P. S.^①，我們簡單地談一談。它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它從來不屬於社會民主工黨。吸收它的理由只有一個：它“答應”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並歸附於取消派！——在破壞組織分子和喜歡搞分裂活動的人看來，這一點當然夠了！既然應該吸收 P. P. S. 來共同討論問題，那末，為什麼不同時吸收參加杜馬選舉的社會革命黨人、錫安社會主義者、拉脫維亞社會革命黨人聯盟以及諸如此類的“派別”呢？

第三屆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

執行委員會把一些國外的小集團都列為組織中心，反而沒有邀請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這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但這是事實。俄國工人能夠知道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是怎樣把我們國外的同志們搞糊塗的，那是有好處的。拉脫維亞人在 6 月 24 日給執行委員會的信中寫道：

“至於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那是不可能以物質支援選舉運動這個問題上充當中間人的，因為杜馬的常會即將結束，杜馬黨團也就會同時失去它的代表資格。”（該信第 2 頁）

① 波蘭社會黨。——編者注

這段話不是有意的欺騙，就是極端的政治無知，布魯塞爾的拉脫維亞人對俄國選舉情況的了解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這種無知。

信是6月24日發出的。6月9日即新曆6月22日，第三屆杜馬已正式宣告無限期休會，而全體代表，其中也包括社會民主黨人，都保留着自己的代表資格。這些社會民主黨人至今還是杜馬代表，——這一點，是俄國任何一個認識字的工人都知道的，可是國外誹謗黨的分子却不知道。

第三屆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成員，正是俄國唯一公開的社會民主黨人，不管他們是在國內什麼地方，他們都構成唯一正式的組織。

所有的取消派都恨這個黨團。取消派的雜誌（“我們的曙光”）咒罵它和中傷它，一切國外的破壞組織的分子都誹謗它。為什麼呢？因為孟什維克護黨派始終占着優勢的黨團的大多數，向來就是堅決反對取消派的，並且曾經幫助黨使彼得堡的取消派完全失去了危害作用。

在“《Vorwärts》的匿名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狀況”這本小冊子中，我們公布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對這個事實誰也沒有能夠說出半句反對的話。只有2個黨團成員為取消派的報紙經常撰稿，而8個黨團成員則為反取消派的報紙經常撰稿^①。

拉脫維亞人和托洛茨基都建議執行委員會把這個保持了統一的全俄唯一的團體從會議中排除出去！——即使拉脫維亞人是一時錯了，在6月24日不知道俄國的一切工人都知道的事情，那末，為什麼他們直到7月22日，即經過整整一個月以後，不努力改正

^①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88頁。——編者注

自己的錯誤呢？有些錯誤，對於犯錯誤的人是很有益處的。

欺騙了執行委員會的拉脫維亞人和取消派的用意在於：不顧俄國黨內大多數人的意志，不顧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黨團大多數人的意志，在虛構的國外小集團聯盟的幫助下，硬要提出取消派的候選人，並且騙取德國工人的錢。——這就是長篇大論（拉脫維亞人、崩得分子、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長篇大論）的簡短意義。

但是，這種欺騙是不會受不到制裁的。

關於取消派的影响同党的影响的 对比的可以正式审查的材料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懂得，關於同情取消派的假想的秘密“組織”的空談，是根本不可信的。

我們肯定地說，取消派在俄國的一切組織都是虛構的。

凡是沒有親自掌握關於俄國社会民主党內部情況的確切材料的人，都難以了解真相。但是，如果根據文件探求真相並審查它們的含義，不相信空話，那仍然是可以了解真相的。我們已經引用了第一個可以審查的眾所周知的事實，這就是取消派和反取消派在社會民主党杜馬黨團中的力量對比。

但是，現在，在取消派同黨鬥爭了半年之後，又有以下一些非常客觀的、更加使人信服的事實。

拉脫維亞人在6月24日的信中（第5、6頁）提到了彼得堡公開的馬克思主義報紙。他們舉出了執行孟什維克路線（“社會革命黨人呼聲報”路線）的“活的事業報”和“涅瓦呼聲報”，並且把它們同“明星報”和彼得堡“真理報”（請不要把它同托洛茨基在維也納辦的取消派“真理報”混為一談）對立起來；拉脫維亞人斷言，後兩

种报纸都是“由列宁派掌握和领导的”。

即令这种断言是不妥当的，但是，拉脱维亚人在这里无意中举出了一个反对取消派的严重事实。

如果说“公开的党”仅仅是取消派的自由主义空谈，那末，在杜马中和报刊上的公开的活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活动了。在这里，而且只是在这里，才能找到客观上证明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力量事实。

除了拉脱维亚人指出的以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全俄政治机关报了。取消派有“活的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反取消派有“明星报”，后来有“涅瓦明星报”和（彼得堡）“真理报”。在俄国，无论是在报刊上，无论是在社会群众团体里，再没有其他什么派别了；拉脱维亚人举出的一切国外集团，完全等于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半年来两派活动的结果。

在这半年中（1912年1—6月），俄国一切政党开始了并且已经结束了选举的准备工作。现在，距选举的期限只有6个或8个星期了。选举名单大部分已经拟定。正是根据这半年的准备，选举的结果事实上已经预先决定了。

赞成取消派的是拉脱维亚人所列举的第1—7“各项”（组织委员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呼声报”、维也纳“真理报”、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前进派”），赞成反取消派的是统一了俄国各个组织即在俄国活动的各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正象取消派所说的清一色的“列宁派”）。

那末，我们来看看这两派都做了些什么。

取消派从1912年1月1日—6月30日（旧历）在彼得堡出了16期“活的事业报”和5期“涅瓦呼声报”，共出了21期。

反取消派在这半年內出了 33 期“明星报”，14 期“涅瓦明星报”和 53 期“真理报”，共出了 100 期。

21 : 100。

取消派和党在俄国的力量对比就是这样。关于报纸的材料是公开的材料，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审查和证明。

报纸的发行数怎样呢？拉脱维亚人说，取消派发行了 3 万份。我们就假定这个数字没有夸大。有人（这个人哈阿兹同志和其他委员见到过）对执行委员会说，反取消派的报纸发行数是 6 万份。这个比数可以得出取消派的影响和党的影响的对比是 1 : 10。

如果说关于发行数字的材料没有发表过，因而可能被认为是夸大的，那末，其他更重要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是发表过的。

这就是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材料。

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 联系的公开的可以审查的材料

关于报纸出版的期数和份数的材料，还没有充分证明党对取消派的优势。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小集团也可以出版报纸。任何“亲近工人的”报纸，或者甚至带有急进派色彩的自由主义报纸，在俄国总是可以找到许多读者的。除了工人以外，自由派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会阅读这些报纸。

然而，还有一些可以更简单更明确地证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事实。

这就是关于出版工人报刊的经费的材料。

为筹募工人报纸出版经费的宣传鼓动，早就在俄国工人中间进行了。大家都了解，没有这样的报纸，要参加选举几乎是空

想。报纸是选举运动的主要工具，是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的主要手段。

但是，从哪里可以得到报纸的经费呢？

必须在工人当中组织捐献。这些捐款就成为基金，并且能证明这个或那个集团的联系力量。这些捐款可以表明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威信、工人对它们的信任以及它们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影响。

1912年初，这种工人报纸捐款便在彼得堡开始了。从1月1日—6月30日的半年时间并不算短。关于捐款的统计数字，公布在上述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一切报纸上。

从这半年的统计数字中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材料，是对取消派同党在俄国的力量对比这个问题所做的公开的、完满的、客观的、彻底的回答。因此，在信的附件中，我们引用了几乎全部上述报纸半年来公布的工人日报捐款报告书。

我们在这里只把总结材料列举出来。

在半年当中，反取消派报纸公布了工人团体的504次捐款总结，并且直接把捐过款的工人团体的名称列举出来。这些捐款是在60个俄国城市和工厂集镇募集的。

在同一时期，即1912年1月1日—6月30日，取消派报纸公布了工人团体的15次捐款的总结。这些捐款是在5个俄国城市募集的^①。

下面就是这些确切的总结。

① 不管取消派怎样散布流言蜚语，可是，正是这些捐款(12 000 马克以上)以及德国同志们以前的资助，构成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报纸的基金。正文提到的半年来各种社会民主党报纸的捐款报告书，已经送交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倍倍尔。

1912年1月1日—6月30日工人团体为
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取消 派报纸	为反取消 派报纸
1月.....	0	14
2月.....	0	18
3月.....	7	76
4月.....	8	227
5月.....	0	135
6月.....	0	34
	15	504
同上;俄国主要地区		
彼得堡.....	10	415
南俄.....	1	51
莫斯科.....	2	13
俄国北部和西部.....	1	12
烏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0	6
高加索、西伯利亚、芬兰.....	1	7
	15	504

在半年的反党斗争之后,取消派完全被击溃了。

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中,取消派完全等于零。任何人都可以审查的上述统计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托洛茨基和取消派怎样吹嘘,而整整半年来俄国的事实就是如此。

必须指出,托洛茨基是“活的事业报”的撰稿人。其次,拉脱维亚人自己在6月24日的信中承认,所有6个集团,包括托洛茨基、孟什维克的“呼声报”、“活的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的领导人在内,组成了所谓组织委员会。因此,我们的统计材料证明,不仅取消派,而且他们所有神气十足的国外朋友,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

工人运动中，都完全等于零。

站在他們方面的，在俄国工人团体中，平均每30个中只有1个。

在这里，我們把彼得堡的一切社会民主党报纸的地址和出版日期也加以注明。

取消派：

1. “活的事业报”。彼得堡莫斯科大街16号。第1号出版于1912年1月20日，第16号即最后一号出版于1912年4月28日（停刊）。

2. “涅瓦呼声报”。彼得堡科洛科尔街3号。第1号出版于1912年5月20日，第5号出版于1912年6月28日（出版至今，即1912年7月29日）。

反取消派：

3. “明星报”。彼得堡拉兹叶什街10号，第14号住宅。第1号（总37号）出版于1912年1月6日，第33号（总69号）出版于1912年4月22日（停刊）。

4. “涅瓦明星报”。彼得堡尼古拉也夫街38号，第57号住宅。第1号出版于1912年2月26日，第2号出版于1912年5月3日，第14号出版于1912年6月24日（出版至今）。

5. “真理报”。彼得堡尼古拉也夫街37号，第18号住宅。第1号出版于1912年4月22日，第53号出版于1912年6月30日（出版至今）。

結 論

在即将举行的杜馬选举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将由

各个地方党组织提名(不分见解和派别)。各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少数,都应服从多数。

臭名远扬的所谓双重候选名单,简直是一种胡说,其目的不过是要吓唬国外同志和骗钱罢了。

要是^有10个臭名远扬的“派别”以提出10个候选名单来吓人,并为每个候选人到国外去骗钱,那就更妙了。

双重候选名单是不会有的。取消派力量太弱,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第二个候选名单来。我们不同一小撮叛党的取消派进行任何谈判。无论是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无论是各地方组织,都没有真正把取消派放在眼里。请注意一下彼得堡最近的事件吧。取消派在“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说,有人同他们(取消派)开过会,讨论如何进行选举运动。而7月21日和23日的“涅瓦明星报”(第16号)和“真理报”(第61号)都报道说,他们没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会议;此外,有一个参加会议的人在“涅瓦明星报”上声明说,全俄国工人将执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的决议。

他声明说:“各个派别的联合”(指取消派而言)“在社会民主党选举运动中是完全不可能的。”(1912年7月8日(21日)“涅瓦明星报”第16号)

世界上任何金钱的帮助,也不能替取消派争得俄国工人的同情。但是,不言而喻,可以用执行委员会的钱在各地方提出虚构的第二个候选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当然要对这个候选名单负责,因为这个候选名单实际上将是德国执行委员会的候选名单。准备拨给没有日报的取消派的钱,将供他们创办竞争的机关报之用。这笔钱将被那些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自己一文不值的人拿去干分裂的勾当,这笔钱将被用作旅费等等,将被用来建立新党。——如果执行委员会现在想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帮助取消派,

那末，我們雖然非常尊重兄弟的德國黨，但是不得不向國際控告。那時候，我們將有根有據地向維也納國際代表大會⁵⁹證明：執行委員會決心用金錢的幫助來促進我們的分裂，促成提出雙重候選名單，使已被粉碎的取消派這具屍體復活。如果德國同志們願意幫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他們就應當把錢交給舊黨中央，而不應當交給組織新黨的人。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1912年7月30日

當執行委員會撤銷了原來打算召開的會議以後，它通知我們說：“不能給予俄國黨內任何一個團體以競選經費，直到所有的團體共同向我們（執行委員會）提供一個得到普遍信任的、有權收納和分配經費的機構為止。”

執行委員會的這種虛假的中立立場，實際上不過是表示它聽了國外集團和取消派的“代表會議”對俄國工人政黨的誣蔑，因而拒絕給俄國工人政黨以支持。

我們認為，除上面提出的意見之外，還應當再作如下的補充。

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針的一切公開發行的俄國報紙，目前已成為向俄國社會民主黨工人羣眾進行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公開喉舌。

現在在國外出版的那些對俄國來說是非法的報紙，實際上是不能指望起到上面所說的那種作用的，儘管它們在從理論上闡明運動這方面所顯示的原則重要性毫無疑問是非常大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報紙是分散在國外的俄國流亡者小集團隨隨便便地、有時甚至是非常輕率地創辦起來的；這些報紙在這些集團中勉強發行，並且幾乎到不了俄國的黨員手中。因此，實際上決不能認為它

們能对俄国党内生活起什么显著的作用。

在反取消派报纸进行了半年斗争(1912年1—6月)以后,“涅瓦呼声报”成了取消派唯一的机关报。该报作为政治机关报几乎已经结束了生命,在一个半月期间(从6—8月中旬)只出版了两号(第6、7号)。十分明显,任何一种这样的报纸如果不从同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中吸取生命力,它是抗拒不了俄国警察对所有工人报纸,甚至对许多完全是温和的自由主义报纸所采取的穷凶极恶的迫害手段的。

在政治上十分重要并且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工人报纸现在有以下两种:“涅瓦明星报”(周报)和“真理报”(日报)。这两种报纸都在彼得堡出版;我们那些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的政敌给这两种报纸起了一个带有轻蔑意义的绰号:“列宁派”的机关报。我们的德国同志从上面引证的永远可以公开审查的客观材料中应当明白,这个“列宁派”事实上包括俄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绝大多数。

由此就可以完全了解,为什么说来自取消派和同情他们的集团和小集团的一切报道,是不值得丝毫信任的。这些小集团,还有那些同俄国运动根本没有直接联系的犹太(崩得)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它们一道,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已经召开或者似乎是正在召开一切“派别”的普遍代表会议⁶⁰,这纯粹是捏造。任何一个这样的代表会议,即使是真正召开了,也不会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起什么重大作用。因此,如果把话说得尖锐一些,这实质上完全是一种骗局。

为了向我们德国党的同志更好地说明同这一问题有关的一些无疑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我们在结尾不妨把取消派的领袖之一阿克雪里罗得最近发表在“我们的曙光”月刊上的文章引证

几段。

阿克雪里罗得写道：

“主张办‘无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且是……同党的政治发展……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空想…… 在我国，組織上确定的派别可以说还没有，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小集团，其中有一些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政治、策略和組織观点；另外一些则摇摆不定，絆前者的脚。党内争执的焦点和主要根源是，一方面，党内不同集团对新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抱着不同态度；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意見分歧。正是現在……这两方面的問題才变得特別迫切和不容拖延…… 正是在这些問題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主要陣营…… 試問，由彼得堡的某些工人和国外的許多知識分子正在筹办的工人机关报能够在这两个对立的陣营之間采取中立立場嗎？在原則上能够容許这种立場嗎？显然不能…… 在党内的这种情況下，把‘无派别性’当作唯一挽救的手段来談論，——这就是……掩盖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真实情况，欺騙自己，也欺騙別人…… 派別的形成和团結是党内改革派，或者更确切地說，是革命派（党内）不容推諉的責任和不容拖延的任务。”

显然，阿克雪里罗得最后的几句话講的是取消派…… 我們只能向我們德国党的同志們建議，如果人們从各方面向他們談到“无派别性”或无派别的代表會議（有取消派參加），为了更好地辨別这些东西，需要把上面引用的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全文翻譯出来，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这样才能对某些謊言有个正确的理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編輯部

——

保 密！ 只发給有組織的社会民主党黨員！

附 言

給“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写的

今天，1912年9月15日，我們收到执行委员会經過巴黎轉来的下面这封信，它一定能够十分清楚地向我們的德国同志表明，我們当时反对执行委员会不負責任的、害怕公开露面的私人“情报員”是完全正确的。

党的执行委员会于本月10日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庫茲涅佐夫同志：

請您告訴我們，关于各社会民主党团体已經达成協議在以下选区参加杜馬选举一事是否屬实：

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哈尔科夫、莫斯科市、莫斯科省、頓河区、敖德薩市。請您尽快地把这些情况函告 克姆尼茨，海·弥勒。

如果我們在9月17日以前收不到任何消息，那我們就認为上述报道屬实。 致

党的敬礼

海·弥勒

1912年9月10日于柏林

我們对該信作了如下的答复：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們：

不言而喻，向执行委员会所作的一切报道都不是根据事实，这一切純粹是取消派的捏造。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只有拉脫維亞人，崩得分子以及不久前刚刚开过“自己的”代表會議并希图把实际上是取消派的代表會議說成是“党的代表會議”的托洛茨基的信徒，才能向执行委员会編造出这样的謊話。为了不引用不可能被証实的东西，为了不引証我們組織內的信件，我們

只限于指出在彼得堡公开发表的一份文件。

1912年8月28日(新历9月10日),在彼得堡的馬克思主义日报“真理报”第102号上刊登了从哈尔科夫一个最大的工厂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专门談杜馬选举情况的。信里直接而公开地說“取消派的候选人的姓名现在还没有公布”,并且說取消派“否認工人政党的必要性”(“真理报”第102号第4版第1栏)。

德国同志单从这封信里就可以看到,拉脫維亞人、崩得分子、托洛茨基的信徒以及所有类似的私人情报員是在如何昧着良心欺騙他們。問題显然在于:他們所有的人,自然还有高加索人,都想借虛构的“組織”的名义騙錢,而这些組織的存在与否,是不可能得到党的执行委员会或其他什么人的証实和查对的。

拥有90家社会民主主义日报的德国党,如果它不希望因为錯誤理解俄国党内問題而損害自己的名誉的話,难道不能够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問題展开一次討論,公开地迫使所有害怕阳光的情报員站出来,讓他們拿出真憑实据并对他們的言論签名負責嗎?

俄国毕竟不象中非洲那么遙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需要費多大力气就可以弄清真相,这样也可以使德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們不再听信私人的无法核对的謠言了。

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尼·列宁

小册子写于1912年7月

附言写于9月

1912年在萊比錫印成德
文单行本

按小册子原文(德文)譯
成俄文刊印

“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現狀” 小册子的附言初稿⁶¹

在写好上面的文章，并且已經送去付排之后，我們收到了在彼得堡出版的旧历 8 月 17 日的“涅瓦呼声报”第 7 号。由此可見，取消派的这家报纸是在休刊一个半月后复刊的（这家周报的上一号，即第 6 号是在旧历 7 月 5 日出版的）。

“涅瓦呼声报”第 7 号上登載的消息，非常有力地証明了我党中央在給 Vorstand^① 信中对俄国取消派的实际意义所作的評价是正确的。

的确，这家报纸在 7 月初就陷于停頓了。不言而喻，取消派和他們的朋友們用尽一切努力来使它复刊。一个半月（7 月一个月和 8 月的半个月）努力的成績，“涅瓦呼声报”自己在第 7 号上作了如下的报道：

“报社收到捐助报纸的款数如下：

7 月份：收到 14 位各捐 25 卢布（伊·弗·，普·，格·，姆·伊·，克·，耳·，克·弗·，耳·，勃·，符什·，李夫·，符耳·，符·普·，經勃·的手从莫斯科轉来）；尔·經手轉来 50 卢布；收到姆—亚· 11 卢布，什赫· 11 卢布；收到 8 位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編者注

各交 10 卢布（厄·，伊·，伊斯·，什·，尔弗·，阿符·，奥勃·，普·奥·）；收到赫·伊· 8 卢布；收到斯· 7 卢布；收到赫· 5 卢布，勃·勃· 5 卢布；收到弗· 6 卢布；姆·勃· 5 卢布；收到从里巴瓦交来的 5 卢布；格姆普· 3 卢布。共計 546 卢布。

8 月份：收到伏尔弗松（苏黎世）10 卢布，又收到他 3 卢布 57 戈比；边吉阿（苏黎世）15 卢布；格—阿亚（基什涅夫）20 卢布；阿兹—夫（阿斯特拉罕）3 卢布；斯普—阿歌（波果罗茨克）15 卢布；符·符· 6 卢布；耶·耶·弗· 59 卢布；从杜别林由斯·經手轉来 20 卢布；收到勃·从莫斯科寄来 25 卢布；收到耶·耳· 10 卢布；耳·耳· 12 卢布；姆·格尔· 3 卢布；收到莫斯科倡导小組 35 卢布；勃·勃· 5 卢布；勃· 5 卢布；收到从圣彼得堡由耳·耳·經手轉来安·康斯· 6 卢布；收到一些朋友从巴黎寄来 8 卢布 54 戈比；收到勃·从巴甫洛格勒寄来 20 卢布。共計 281 卢布 11 戈比。”

这就是取消派自己刊登的总结材料。一个半月来，他們的活動和他們同群众联系的概况如下：

共計收到827 卢布 11 戈比

其 中

莫斯科倡导小組 35 卢布

一些朋友从巴黎寄来 8 卢布 54 戈比

个别人士的私人捐款：

35 位捐款总额708 卢布

15 位捐款总额 75 卢布 57 戈比

总 計827 卢布 11 戈比

大家知道，并且普列汉諾夫还在 1912 年 4 月就在刊物（“社会

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上声明,“倡导小组”就是取消派集团。

这样看来,在取消派的机关报陷于停顿的最困难时刻援助他們的只有

一个俄国取消派集团

一些巴黎朋友

35名平均每人捐款20卢布(每人合40馬克以上)的有钱人。

15名平均每人捐款5卢布(每人合10馬克以上)的个人。

我們党中央断定取消派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完全等于零,难道說得不对嗎?

取消派指望“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可是,在一个半月的時間內,他們連一个高加索工人团体的一笔捐款都沒有募集到。

取消派希望获得崩得和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党組織的援助。可是,在一个半月的時間內,他們連一个崩得分子和拉脫維亞人的工人团体的一笔捐款都沒有募集到。

彼得堡反取消派的每日机关报“真理报”,也是在这一个半月的時間內(7月—8月14日),却发表了从俄国各地收到的41个工人团体捐款的报告,其中包括(捷列克省格罗兹內地区的)采油場工人的捐款(“真理报”第60号)和在里巴瓦工作的犹太工人的捐款(“真理报”第67号)。我們可以認為,工人們的这种援助比“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拉脫維亞人和崩得分子的空話和装腔作势要严肃認真一些。

世界上的任何援助,同拉脫維亞人、崩得分子举行任何“代表會議”以及諸如此类的活动,都不能把取消派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从零变成整数。

讓德国同志們去化費一点还不是过于繁重的劳动来收集关于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状况的文件，并核对它们吧。俄国毕竟不是中非洲，提到它就可以随便讲些什么“猎人故事”。德国同志们是从公开刊印的文件上了解意大利、瑞典和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可是，俄国的社会主义他们却是从私下的传闻和流言来了解的，看来，德国同志们是想结束这种奇怪的 (gclinde gesagt^①) 现象的。

写于1912年8月

第一次发表

按手稿刊印

① ——说得委婉些。——编者注

資本主義和人民的消費

不久以前，法国的“科学評論”⁶²杂志发表了关于各国人造奶油生产的材料。这份材料一次又一次提醒了早已为人发现的事实：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人民的飲食更加恶化了。

大家知道，人造奶油是一种用特种办法加工过的脂油（先从脂油中提出硬脂）。从这种人造奶油油料再制成人造奶油。

在欧洲各主要国家里，人造奶油已达到很高的产量。德国年产1250万普特，英国年产750万普特，等等。

人造奶油比奶油便宜。資本主义各国的极大多数居民买不起奶油。工人收入很少，不得不購買廉价的、劣等的人造奶油。而主要消費者又是工人。工人有几百万，資本家只有几百个。于是，廉价的人造奶油的产量就飞速增长，一小撮百万富翁也就愈来愈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資產階級愈来愈富。无产階級及大量正在破产的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愈来愈貧苦。

奇怪的是，正是在那些以大量出产优质奶油馳名的国家里，人造奶油的消費量最大。要了解人造奶油的消費量究竟多大，就要把一个国家的人造奶油总产量（加上輸入量和減去輸出量）除以居民人数。

按人造奶油的消費量來說，丹麥占世界第一位。每人每年平均為 16.4 公斤（約 1 普特）。其次是挪威，15 磅，德國 7.5 磅，等等。

丹麥是最富產奶油的國家。丹麥的奶油，真正的牛油，是一種質量最好的奶油。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倫敦（連城郊共約 6 百萬人口）寧願以最高的價格購買丹麥的奶油。

丹麥的富裕農民，尤其是丹麥的資本家靠買賣奶油來大發橫財。而丹麥按人造奶油的消費量來說，却是占世界第一位的國家！

這如何解釋呢？

很簡單。因為丹麥的極大多數居民，正象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居民一樣，都是工人和無產農民。他們買不起真奶油。在丹麥，就連中農也由於需要用錢而把自己出產的牛油賣給國外，而自己卻購買廉價的人造奶油。因此，丹麥資本家變得愈來愈富，工農則變得日益貧苦。

我們俄國的情況也是這樣。很久以前，即將近 40 年以前，當建立農村乾酪作坊和組合之風開始盛行的時候，民主主義作家恩格爾加爾特就曾看出，農民由於需要用錢而出賣牛奶和奶油，而自己的兒女卻活活挨餓，以至餓死。

從那時起，人們曾多次看到這種現象。乾酪生產不斷增加，牛奶出售量日益增長，少數富裕農民和商人愈來愈富，窮人卻變得更加貧窮。貧農的兒女因喝不到牛奶而大量死亡。俄國兒童的死亡率高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

農民經常把牛奶賣給乾酪工廠，自己卻取回奶渣作食用。

生產的增長和商業的繁榮帶給富人的是利潤，帶給工農的却

是人造奶油和奶渣。這就是自由主義的以及官方的學者們所竭力掩蓋的資本主義的真相。

載于1912年7月20日

“真理報”第70號

署名：勃·勃·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自由派和教权派

僧侶准备涌入第四届杜馬。

对僧侶登上政治舞台，应该抱什么态度呢？

民主派决不能抱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僧侶不应当参加政治生活。这是最反动的观点。这种观点除了官方所采取的虚伪手段，不会有其他什么结果。把居民的某个集团或某一部分排斥在政治和阶级斗争之外的任何手段，都是决不可能的，也是不能实现的。

我们知道，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主张德国耶稣教徒有宣传的自由。我们反对自由派“禁止”耶稣教徒进行宣传的主张，——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说过。我们并不害怕耶稣教徒。愿耶稣教徒有宣传的完全自由，但也要保证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宣传的完全自由。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

俄国工人民主派反对伪造对地主或僧侶等有利的选举法（和其他一切法律），但决不反对僧侶有参加政治生活的自由。我们抱的是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要求任何阶级、等级、性别、民族、阶层或集团的人都有参与政治的完全自由。

自由派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是不正确的，不民主的。例如，不久以前，特魯別茨科伊公爵就在“言論報”的喝采声中写道：

“要把教会变成政治工具，它的内部就要崩溃。”他把僧侶涌入杜馬的计划称之为“反基督教和反教会的”计划。

这是一派胡言。这是假仁假义。这是反动透顶的观点。

特鲁别茨科伊和其他自由派在同教权派斗争中所持的是不民主的观点。他们是打着僧侣不参加政治斗争的招牌，使僧侣更隐蔽地(因而也就危害更大)参加政治斗争。

工人民主派则主张所有的人，也包括僧侣在内，都有参加政治斗争的自由。我们并不反对僧侣参加选举斗争、参加杜马以及其他活动，而只是反对僧侣的中世纪特权。我们并不害怕教权派，我们倒很愿意同他们到人人都可以自由平等讲话的讲坛上去争辩一番。僧侣一向是隐蔽地参与政治的；僧侣公开参与政治，只会对人民有利，并且大大有利。

献于1912年7月25日

“真理报”第74号

署名：俗人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

“言論報”的社論作者写道：“我們一向以为，馬克思主义者承認立宪民主党具有民主派的性質，尽管前面还加了侮辱人的‘資產階級’字眼”（即資產階級民主派）。

很难想象，研究馬克思主义著作的“有教养的人”，在政治上竟会这样无知。这里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因为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假装无知呢？

从1906年起，我們就曾千百次地說明过，立宪民主党不是民主派，而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每个政治上有教养的人都晓得的、1907年春俄国各地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正式决定，就肯定了这一点，并大声宣布：立宪民主党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政党，他們的民主主义是“虛伪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跟着他們走“只是由于传统的关系（对常見的陈旧的事物的盲目习惯），完全受了自由派的蒙蔽”⁶³。

从那时起，这个思想曾經千百次地重复过，發揮过。

而立宪民主党人却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硬說他們“一向以为”，馬克思主义者承認他們是民主派！真是：充耳不聞比聋子还要誤事。

自由派不同于保守党（黑帮）的，就是他們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資產階級則要求进步和实行經過一定調整的法制，要求遵

守法律和宪法，要求保证一定的政治自由。

但是，这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害怕民主派和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派还要厉害。因此，自由派永远倾向于向旧制度让步，向它妥协，维护旧制度的许多基石。这就使自由派软弱无力，畏缩不前，不彻底，总是摆来摆去。

民主派代表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民主派不怕群众运动，而是信赖群众运动。在俄国，民主派就是劳动派和左翼的“民粹派”。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民主派，决不是为了“侮辱”他们，而是因为任何重分土地和任何朝着民主方向改变国家的措施，都还没有消灭资本的统治和资产阶级制度的统治。

工人民主派的政策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在不可能同民主派一起战胜自由派的地方，才赞成同自由派达成协议，来反对右派。只要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忠实于自己的民主主义，我们就同他们一道进行斗争。

载于1912年7月26日

“真理报”第75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自由派的进攻

自由派动起来了，他们一致对“真理报”施加压力了。立宪民主党“言论报”的社论作者，“生活需要”杂志的无党派进步人士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布兰克先生，都因为工人报纸决定在彼得堡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而向它开火了。

“生活需要”杂志断言：“‘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的一切努力都要落空。它们不要认真指望工人政党的候选人会在彼得堡城市的选民团中获胜，因为彼得堡城市的选民团中，工人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

这就是自由派的典型论断，这就是对还没有消除庸俗习气、还没有树立完全自觉的政治观点的选民进行恫吓的手段。

有一个时期，自由派曾干脆用黑帮会在选举中获胜的话来恫吓人。这套笨拙的谎言如今已经“不中用”了。大家知道，在彼得堡的选举中，无疑任何一点黑帮的危险都不存在。因而就采取了另一种恫吓手法：“不必指望工人会获胜。”

不，自由派先生们，在过去艰难的五年中间，民主派选民，尤其是工人选民，经历了许多事件，反复思考了许多问题，学会了许多东西。你们用这种恫吓的手法是不会捞到什么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工人在大城市开始进行自己的选举运动的时候，没有一些强大的自由党反对他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工人民主派不是经过顽强的斗争，才从自由派手里夺回对小公

务員、店員、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的影响的。

誰反对彼得堡工人現在就开始这个斗争（更确切地說：繼續1906、1907、1909年开始的事业），誰就是空有民主派之名，而事实上还是自由派的奴隶。

成千上万的民主派的新选民現在就要参加彼得堡的选举了。

彼得堡的工人創辦了自己的工人日报，完成了这样一个伟大事业，也就使我們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他們会在选举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成千上万的旧选民都积极地投入了新的更自觉的政治生活，在自己的工人报纸的帮助下，学习如何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培养进行共同的政治活动的习惯，逐步意識到工人民主派正在解决的伟大全民任务。

战胜彼得堡的自由派，是办得到的。自由派的惶惑不安和无端咒罵，他們的恫吓和謾罵，只会使民主派的彼得堡更加相信，它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胜利。

載于1912年7月28日

“真理报”第77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陆海軍中的起义⁶⁴

最近，就連我国的合法报刊都透露了军队中发生革命风潮的一些消息。現在，我們提出三則主要消息來談一談。

黑海艦队的消息。6月27日，塞瓦斯托波尔的海軍軍事法庭对“約翰·茲拉托烏斯特号”装甲艦的电气技术兵捷烈宁案件，进行了秘密审判。他同卡尔皮申和西利亚科夫一起被控犯有起草和散发号召武装起义的传单的罪行。捷烈宁、卡尔皮申和西利亚科夫被判死刑，7月10日被枪决。

7月2日，該法庭又审理了这艘装甲艦的水兵的案件。16名水兵被控犯有煽动夺取这艘装甲艦的罪行。10名被判死刑，5名被判6年苦役。7月4日的官方电訊报道說，10名被判死刑的水兵曾請求赦免。

波罗的海艦队的消息。喀琅施塔得港海軍軍事法庭定于7月16日审讯“德維納号”練習艦、“阿芙乐尔号”巡洋艦和“光荣号”装甲艦的65名水兵的案件。十月党人的“莫斯科呼声报”7月3日接到从圣彼得堡发来的电訊說，那里对这个轟动开来的案件議論紛紛。有人說，这65名水兵被控是社会革命党，是“策划公开起义和杀害軍官的秘密社团”。同一条电訊說，这个案件是从1912年1月22日在“德維納号”上逮捕一个水兵开始的。

接着，誰都知道，在5月里，在赫尔辛福斯，曾几次逮捕波罗的

海艦隊的水兵。

最后，7月1日，在塔什干附近的特罗伊茨科耶村，工兵举行了起义的尝试。波赫維斯涅夫大尉被起义者挑死。这条电讯没有准许发表。直到7月10日，彼得堡才出现从官方的“土耳其斯坦新闻”转载来的消息，承认同起义者发生过战斗。狙击兵和哥薩克兵击溃了一共约有100到130名左右的起义工兵。据官方报道，起义是在晚间开始，第二天早晨结束的。大约有380名工兵被捕，其中“有一半多（政府的报纸这样断定）无疑（??）没有参加”起义。除波赫維斯涅夫外，还有克拉索夫斯基和科舍涅茨两个少尉和两个下士被起义者击毙，5个军官和12个下士受伤。起义者的牺牲人数，政府报纸没有提到。

这就是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枯燥的、显然不完全的、显然被警察当局歪曲和缩小了的消息。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这些事实完全证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1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所指出的，和一个月以前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更详细地阐述了的情况^①。

在俄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从四五月的群众性罢工开始，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转入进攻，既反对资本，也反对沙皇君主制，既要求改善受尽1908—1911年的反革命势力的迫害和压迫的工人的生活，也要求全体人民的自由，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

自由派散布一种毫无意义的调言（“涅瓦呼声报”的取消派也跟着他们宣扬），说什么四五月运动的基础是争取结社自由的斗

^① 見本卷第88—95頁。——編者注

爭。事实駁倒了这种謠言。在奴役制的俄国，不能只为一种政治权利而斗争；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不能为立宪改革而斗争。无产阶级斗争已使罢工浪潮波及全国，这种罢工既有经济罢工，也有政治罢工。无论过去和现在，运动的力量正在于这两种罢工的結合。这不是一般的罢工，而是群众性的革命高潮，是工人群众对沙皇君主制展开进攻的开始。

群众性的罢工不会不到处点起革命的火焰。军队中爆发的起义就证明，火焰已经点起来了，到处都有可燃材料，到处的群众，就连那些受着兵营的严格管制的工人农民，都激起了革命的情绪。

俄国的群众性的罢工同武装起义是紧密联系着的。罢工的发展，也就是起义的发展。

这是本文前面指出的事件证明了的。

这些事件提供的教训，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已经指出了。现在，号召起义是极不适当的。举行起义，还为时过早。只有工人群众、农民和军队中最优秀的部分的联合攻击，才能为举行胜利的即适时的起义创造条件。

因此，先进工人应当尽全力来巩固、恢复、发展工人阶级的秘密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有利用一切合法的宣传手段，通过工人报刊和杜馬的工人代表进行革命鼓动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不致把力量浪费到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零零碎碎的起义上去，而能培养一支无产阶级大军，去举行伟大的胜利的起义。

革命的士兵们和水兵们万岁！

为展开千百万群众的广泛的革命攻击，发展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而团结一致、不屈不挠、坚忍不拔地进行革命工作万岁！俄国

軍隊中的革命部分只有站在千百万人民奋起攻击的最前列，同他們最緊密地不可分离地联合在一起，才能战胜而且一定可以战胜沙皇君主制度！

載于 1912 年 7 月 30 日

(8 月 12 日)65“工人報”

第 9 号

按“工人報”原文刊印

第四届杜馬选举的前夜

尽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受到重重迫害，遭到大規模的逮捕，但在选举以前，还是发表了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鮮明确切的綱領、策略和政綱。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會議总结了在反革命势力猖獗的艰难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思想工作。代表會議的決議对运动的一切迫切問題，都作了充分的回答。选举政綱只是根据这些決議做出的总结。这个政綱由中央在俄国出版，随后一些地方組織又把它重印了⁶⁶。所有的資產階級报刊都登了代表會議的消息，同时引了會議的一些決議。

在代表會議閉幕后的半年中間，在党的刊物上，在几十次的报告中，在工厂小組会上的几百次演講中，在四五月的群众集会上，都解释了貫徹了代表會議的这些決議。成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党的这些口号传遍了整个俄国，并为先进的无产者所接受。群众的革命高潮，从罢工和群众大会到軍隊中的起义，都証明了这些口号的正确和重要。

我們党已經利用了并且广泛利用了选举。警察当局的任何“解释”，对第四届杜馬的任何伪造（不管是牧师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不能抹杀这个成果。严格按照党的指示进行的鼓动已經深入到各个角落，并在整个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中起了指导作用。

各資產階級政党也赶忙起草了“为了竞选的政綱”，来許願，来

欺騙选民。取消派現在也跟在自由派后面，制定了一个合法的“为了竞选的政綱”。取消派在合法的經過当局检查的报刊上大談其政綱，想用四平八穩的、通过当局检查的“竞选政綱”来把自己情緒上的惊慌、組織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空虛掩飾起来。

不是“为了竞选”制定政綱，而是要用竞选来貫徹革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政綱！——工人階級的政党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我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經利用了选举，并且要利用到底，我們甚至利用最反动的沙皇杜馬來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的綱領、策略和政綱。有价值的只是那些能够总结对运动的一切問題已經做了充分回答的长期革命鼓动工作的政綱，而不是象取消派那样，为了堵塞漏洞和大叫大嚷，匆忙編造出来的那些（特别是合法的！）政綱。

党恢复已經有半年了；在这半年中間，各地的领导机关和全国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尽管遭到疯狂迫害，工作經常陷于停頓，党还是克服了諸如此类的难以想象的困难，繼續前进，在群众中展开活动，扩大影响。展开活动的方式是新的，就是把更广泛的合法的馬克思主义宣传同非法的、秘密的、狭小的、比以前更隱蔽的基层組織結合起来。这种在新的条件下，准备革命的新方式的特殊性，是党早就指出和確認了的。

这样，对取消派以“双重候选名单”相要挟的大吵大嚷的論調，我們現在就可以給以充分回答了。誰也吓不倒的毫无意义的恫吓！取消派被打得奄奄一息，动弹不得，任何援助都不能挽救他們。他們对提出“双重候选名单”連想都不敢想；假如取消派真要这样做，他們就会得到寥寥无几的少得可笑的选票。他們知道会是这样，所以不会去做这种試驗。他們叫嚷只是为了轉移視綫，掩飾真相。

我們說“任何援助”。取消派指靠国外的援助。他們的同伙，特別是拉脫維亞人、崩得和托洛茨基，聲明要召集10个“中心、組織和派別”开会！不开玩笑！国外是富裕的，辽阔的，丰饒的。整整“10个中心”呵！！这种手法同政府在第四届杜馬中的手法一模一样，用拼凑代表的办法，把許多零变成耀眼的“多位的整数”。第一个是托洛茨基（在俄国，他是零，不过是“活的事业报”的撰稿人，他的娄罗們不过是取消派“倡导小組”的卫道者）。第二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也就是那些軟弱无能的取消派。第三个是“高加索区域委员会”，也是一个零，不过是第三类。第四个是“組織委员会”，还是那些取消派，不过是第四类。第五个和第六个，拉脫維亞人和崩得，如今完全是取消派的……已經够了！

不用多說，我們党对国外无聊之徒的这种把戏只能一笑置之。他們不会使死尸复活，而俄国的取消派就是一具死尸。

事实就是这样。

半年来，取消派和所有他們的同伙和党展开了疯狂的斗争。有一种公开的馬克思主义报纸。它在狂暴的压制下，对共和国的要求、我們党的情况、起义的消息、沙皇匪帮的罪行，連提都不敢提一下。想通过这份报纸来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是可笑的。

但是，俄国的工人已經不象从前那样了。他們已經成为一种力量。他們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他們有自己的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受到压制，却是他們自己的在理論上捍卫馬克思主义的报纸。

在这个公开的舞台上，誰都会看到取消派在同反取消派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前进派分子斯·沃·67在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办的取消派“真理报”上，就已指出这些成就：他写道，工人的捐款几乎都給了反取消派。可是他自慰地說：这并不是因为工人同情

“列宁派”。

噢，是的，当然“并不是因为”，可爱的取消派朋友！

但，不管怎样，还是看看事实吧。

先来看看为工人日报进行的半年公开斗争。

取消派从1910年起，就一直叫喊为这种报纸捐款。他们成功了吗？从1912年1月1日到7月1日的半年中间，他们的“活的专业报”和“涅瓦呼声报”发表了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募集的15（十五）笔捐款的报表！！半年中间只有15个工人团体捐款！

再看看反取消派的报纸。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在这半年中间，给工人日报的捐款报表。我们来计算一下有多少次工人团体捐款。可以算出共有504次工人团体捐款！

下面就是按月和按国内各地区的精确统计：

1912年上半年工人为工人日报的团体捐款次数		
	反取消派报纸	取消派报纸
1月.....	14	0
2月.....	18	0
3月.....	76	7
4月.....	227	8
5月.....	135	0
6月.....	34	0
总 计.....	504	15
彼得堡及其附近地区.....	415	10
南俄.....	51	1
俄国其他地区.....	38	4
总 计.....	504	15

取消派在俄国工人团体面前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取消派是一具死尸，任何吓人的（噢，可真吓人啊！）国外“集团、中心、派别、流派和倾向的同盟”，都不能使这具死尸复活。

国外任何大吵大嚷的宣言，“倡导小组”同取消派的任何伪造的代表会议，都不能消除也不可能减轻取消派在俄国几百个工人团体面前的彻底失败。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一致有了保证。取得这种保证不是由于向取消派的“妥协”，而是由于对取消派的完全胜利。这些取消派已经扮起他们的本来的角色，也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角色来了。请看社会革命党取消派分子萨文是怎样适时地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还其本来面目的。请看尔·马·68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专页”上，是怎样赞赏那些不止一次地陷于（由于召回主义的醉后昏！）取消派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倡导”的。请想一想，在同一张专页上，著名的社会革命党的“活动家”阿夫克森齐也夫也仿效起普列汉诺夫，这个事实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请回忆一下，所有取消派是怎样亲吻 P. P. S.① 的非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所有政党的取消派，联合起来！

每个人最后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抛掷炸弹的自由派组成的知识分子取消派集团，在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团结起来了。

而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摆脱了要把它取消的那些人的羁绊之后的半年中间，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从上述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载于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

“工人报”第9号

按“工人报”原文刊印

① 波兰社会党。——编者注

“結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 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嗎？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取消派在合法报刊上証明：可以。他們竭力歪曲工人运动的真实性質。但这种企图是徒然的。就要淹死的取消派想要抓住稻草来挽救他們的非正义的事业。

1910年，一些知識分子集团就开始了要求結社自由的請願运动。这是臆想出来的运动。工人群众漠然置之。这种空洞的妄想是不会燃起无产阶级的斗争热情来的。只有自由派才会相信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可以实行政治改革。工人立刻就看出这是一种騙局，因而未加理睬。

工人并不反对要求改革，他們也曾要求制定保險法。他們通过自己的代表在第三届杜馬中，利用了一切机会来达到点滴的改进。但問題也就在于，第三届杜馬和保險法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政治事实。而在罗曼諾夫王朝的六三政制的条件下，要求“結社自由”，就是腐朽的自由派的空洞的諾言。

自由派是革命的敌人。就在現在，他們也在露骨地反对革命，——第三届黑帮杜馬也沒有使他們消除对革命的恐惧。由于害怕革命，他們就把希望寄托在立宪改革上，以此来安慰自己，并对工人宣揚其中一个改革，就是結社自由。

但是，工人在第三届杜馬、普遍无权、橫行霸道的情况下，是不

会相信什么“立宪”这套鬼話的。工人是真正要求結社自由的，正因为如此，他們才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推翻君主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

四五月的罢工实际証明了，无产阶级已經起来进行革命的罢工。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相結合，革命集会，彼得堡工人5月1日提出的成立共和国的口号，——所有这些事实完全証明，革命高潮已經到来。

俄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已經开始了打倒沙皇君主制的群众革命斗争；与这个斗争相呼应，军队中的风潮也在扩大；农民民主派的优秀分子离开自由派，接受了工人先鋒队的领导。

而自由派，这群革命的敌人，却只是坚持“立宪”的道路，搬出在俄国沙皇君主制度下实行“結社自由”的諾言（空洞的虛伪的諾言）来反对革命！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现实的社会力量就是：（1）践踏一切“宪法”的沙皇君主制；（2）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他們由于害怕革命，假装相信“自由”可以同沙皇政权結合起来；（3）革命民主派；他們中間已經涌出了自己的領袖——工人群众，从赫尔辛福斯的水兵到塔什干的士兵都响应了他們的号召。

你看，取消派在这种形势下宣揚“結社自由”是多么愚蠢！这些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能手从所有的“改革”中看中了十足空头諾言的不可能实现的立宪改革，玩弄“欧洲式的”立宪主义。

不！工人要把自由派和自由派工人政策一脚踢开。真正提到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馬的議程上来的一切改革，从保險法到增加公务奴隶的薪水，工人都要支持和发展，并且作为自己运动的内容。

但是，对在专制制度下实行立宪政治改革的空洞的荒謬的

諾言，工人却要报以輕蔑的譏笑。扩大和加强打倒君主制、要求共和国的群众革命斗争万岁！斗争将会証明，在新的革命遭到失敗的情况下，不彻底的立宪改革将会得到什么結果，然而現在，当革命攻击开始的时候，向群众鼓吹非革命的道路，鼓吹和平的立宪改革，就只有“套中人”才可以做得出来。

已經开始的革命攻击要有革命的口号。打倒君主制！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沒收全部地主土地万岁！

載于1912年7月30日

(8月12日)“工人报”

第9号

按“工人报”原文刊印

給瑞士工人的信⁶⁹

亲爱的同志們：

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所有瑞士同志們証实一个事实，就是我党 1912 年 1 月全党代表會議曾在專門的決議中声明，对单独的国外俄国小組不承担任何責任。

此外，我証实，我党中央委员会到現在为止，只批准过唯一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組織，那就是国外組織委员会和它的苏黎世支部。随信附上我党中央机关报出版的一本德文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詳細叙述了侨居国外的从事瓦解組織活动的俄国小組的行动^①。 致

党的敬礼

俄国社会民主党駐社会主义国际局代表

列宁(弗·烏里楊諾夫)

写于 1912 年 7 月

1912 年 8 月用胶印版

印成单頁(德文)

根据单頁(德文)譯成俄文刊印

^① 見本卷第 192—210 頁。——編者注

一些原則問題

选举运动刚刚开始有些活跃，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論报”就談起(終于鼓起了勇气!)它同左派的一些原則分歧了。

“言論报”写道：“我們从来没有打算，現在也不打算同六三政制講和。”

不是这样。你們有过而且現在还有这样的打算，立宪民主党先生們。你們关于“負責的”反对派和御用的反对派的演說就是証明。这不仅是“打算”講和，而且是采取了同六三政制“講和”的政策。

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卡拉烏洛夫要在虔誠的第三届杜馬发表那些虔誠的演說？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要投票贊成預算和它的庞大开支項目？为什么別列佐夫斯基第一要发表那些土地問題的演說？为什么格烈迭斯庫尔最近要发表那些“言論报”上重申的声明？难道所有这些不正是同六三政制的基本原則講和的政策嗎？毫無疑問，正是这样。

“言論报”写道：“五年来，我們沒有发现，社会民主党在杜馬內的策略同其他反对党有什么两样。这里指的当然是在杜馬选举的問題上。”

真堪称为詭辯和歪曲真相的典型！在任何一个問題上，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馬中的策略都是不同于立宪民主党的。它在所有問題上，都有原則上的不同：它不是“講和”的策略，不是自由派

的策略，而一直是民主派的策略，階級鬥爭的策略。

難道“言論報”真的以為，只要都“投反對票”，就可以說是策略相同，而不是表現在杜馬的演說家的演說中，以及在轉入下項議程的議案中，對問題的原則提法的相同嗎？

難道“言論報”真的敢說，在杜馬內說一套，在杜馬外又是一套，是容許的嗎？這是不是為了把立憲民主黨在杜馬外的宣傳的非民主內容問題掩蓋起來呢？

“言論報”寫道：“我們不能否認，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民主派’有權提出獨立的任務和主張。”

不對，有教養的自由派先生們！請把你們對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區別的原則觀點講一下吧。請用英國、法國或德國歷史上的實際例子——即使先把工人的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派放到一邊——來解釋一下這些觀點吧。你們要想否認資產階級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對待舊制度的態度上的區別，是辦不到的。我們將永遠向你們證明，你們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決不是民主派。

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就是各種勞動派和民粹派。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談到立憲民主黨和左派的原則，就認真解釋一下原則吧。只有這樣，才會使競選宣傳多少超出某個警察局長、某個省長或是某個行政當局干了多少非法勾當的問題。

載于 1912 年 7 月 31 日

“真理報”第 79 號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最后一个汽門

我們前面一篇論述俄国目前土地問題的文章（見“涅瓦明星報”第15号），最后是这样几句话：

“斯托雷平的土地綱領和民粹派的土地綱領一个实际共同的地方，就是两个綱領都要从根本上破坏旧的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制。这点非常可貴。这种土地占有制也只有破坏，沒有別的办法。‘言論報’和‘俄罗斯新聞’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最反动，也就表現在，他們不去証明必須更彻底更坚决地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而斥責斯托雷平不該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我們將从下面一篇文章中看到，斯托雷平的破坏不能消灭奴役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的破坏却能做到这一点。

我們暫且指出一点：斯托雷平的破坏所产生的唯一完全现实的后果就是3000万人挨餓。斯托雷平的破坏能不能教会俄国人民应当怎样进行更坚决的破坏，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破坏正在这样教导，却是沒有疑問的。能不能教会呢，——过一个时期便見分晓。”^①

这样，我們现在就面临着一个問題：为什么斯托雷平的破坏中世紀土地占有制不能消灭奴役制和工役制，而农民劳动派或民粹

^① 見本卷第137頁。——編者注

派的破坏却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以前，首先要指出，對這個問題的最流行的論斷，也就是自由派、民粹派的論斷，有一部分是修正主義者（巴·馬斯洛夫）的論斷，其中一個根本錯誤就是抽象提出問題，忽視具體的現實中正在發生的歷史“更替”。在俄國，正在發生一種西方一些先進國家早已發生過的更替，就是農奴制經濟為資本主義經濟所代替。

現在談的是而且也只能是這種更替的形式、條件、速度和環境；其他一切往往放在首要地位的考慮，只是無意識地圍繞着問題的本質，也就是圍繞着這種更替提出來的。

目前俄國農業中主要的農奴制形式是奴役制和工役制。自然經濟還比較大量地保存着，就是說，在一小塊貧瘠土地上，用陳旧的非常簡陋的工具和生產方法從事經營的不能餬口的小農，還存在着，他們在經濟上從屬於鄰近大片土地占有者，后者不僅把他們當雇工（這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初期），並且當小農（這是徭役制的繼續）剝削，——這就是產生奴役制和工役制的條件，或者更確切地說，形成這兩種制度的特征的條件。

在俄國的歐洲部分，最大的地主和最貧困的農戶是3萬與1000萬之比。平均起來大致是一個有2000俄畝以上土地的地主，就有將近300個農戶為他做工，這些農戶每戶大約只有7俄畝貧瘠的壞地，使用的是極落后的原始的（這是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更不用說從美國的角度看了）農具。

一部分富裕農民“出人頭地”，成了小資產階級，靠僱傭勞動來耕種土地。地主的一些土地和一些農活也使用這種勞動，這種地主往往昨天還是貴族農奴主或是他們的兒子。

但是，除了这种資本主义关系，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所有主要省份，还有把这种資本主义关系挤到次要地位的农民使用自己的农具为地主耕种土地的制度，即昨天的徭役制的繼續——工役制，还有“利用”小农（只因为是农民，是小业主）走投无路的貧困状况，叫他們为邻近地主“經濟”“服役”的制度，即奴役制。什么貸款代工，貸放粮食，冬时雇工，出租土地，允許使用道路、水飼場、采草場、放牧場、森林，貸放农具，如此等等，就是目前奴役制的无穷无尽的形式。

事情有时竟荒謬到这样的地步：农民要把自己的肥料上到主人的地上去，“主妇”还要奉送鷄蛋，——而且这不是发生在公元18世紀，而是发生在公元20世紀！

只要把目前俄国农业中的这种中世紀和农奴制的残余問題明确地提出来，就可以看出斯托雷平“改革”的意义。这种“改革”当然是延緩了农奴制的破坏，正象臭名远揚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大加贊揚的1861年的所謂“农民”（实际上是地主的）改革延緩了徭役制的破坏，用另一种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一直到1905年一样。

斯托雷平的改革“延緩了”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就表现在又打开了一个汽門，并且是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汽門。打开了汽門，放出了一些气，就是說，一部分橫遭破产的农民“巩固了”自己份地的私有权，出卖了这些份地，从有份地的无产者变成純粹的无产者；其次，一部分富裕农民巩固了自己份地的私有权，有的还經營起独立田庄，从而使資本主义經濟比以前更加巩固了。

最后，打开了汽門，放出了气，还表现在，有些地方消灭了特別难以容忍的土地另散現象，便于实现資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产生的

农民土地的轉移。

但是，这种延緩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农村的矛盾？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农奴制的大片領地占有制的压迫？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气”的数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后一个答案。

8 000 万人挨餓实际上就証明了，在目前只能是后一个答案。这是小业主挨餓。这仍然是那种旧的、奴役制的、貧困的和受尽农奴制的大片領地占有制的压榨的农民經濟发生的危机的图画。在欧洲，在有大量非农奴制的領地的条件下，在資本主义的大片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就沒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多人挨餓。

除了完全失去自己土地的无产者（他們“巩固”土地私有权是为了把土地卖掉）和极少数富裕农民以外，許多农民都还处于过去的或者甚至更坏的状况。任何巩固土地私有制的办法，任何消灭土地另散現象的措施，都不会使人数众多的貧困农民，使这些守着貧瘠的坏地，使用祖传的已經破烂不堪的农具，养着沒有草料的耕畜和牛羊的农民，变成有点文化的有点家业的业主。

对有 2 000 俄亩土地的地主（馬尔柯夫或普利什凱維奇这一类型的）周围的有 7 俄亩小块土地的农民，無論是把他們分散各处，把他們从村社解放出来，还是“巩固”他們少得可怜的土地的私有权，他們都仍然是受奴役的貧民。

斯托雷平的改革既不会消除对众多的农民的奴役制和工役制，也不会消除他們的飢餓。再有几十年这样的周期性的飢餓，目前大量的农户就会彻底破产，这样，斯托雷平的改革就会“胜利”，就是說，我国农村就会建立起已經确立的一般欧洲式的资产阶級制度。可是，在目前，在斯托雷平的“改革”經過了 6 年的試驗，“巩固土地私有权”的人数 6 年来已有“輝煌”增长以后，已經不

可能有任何怀疑：这种改革沒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危机。

对目前以至于最近将来的俄国來說，无需爭辯的是，摆在我們面前的还是保留許多农奴制残余的經濟的旧的危机，即貧困的、受着馬尔柯夫和普利什凱維奇一类的大片領地占有者奴役的小农业的旧的危机。

我們看到的就是这种由 3 000 万人挨餓的事实鮮明証实了的危机，尽管斯托雷平打开了馬尔柯夫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手里唯一的最后一个汽門。他們(和他們一道的还有貴族联合会)除了想由普利什凱維奇之流自己来推行資产階級政策以外，也想不出^①别的办法，或者一时还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保持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土地和权力。

目前俄国农村的矛盾归結起来就是：过去的农奴主在完全保持他們的土地和权力的条件下，推行資产階級的土地政策。在土地問題上，这也是“轉向資产階級君主制的道路上的一步”^②。

向新制度的这一步，是还保持自己的专权、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特性、自己的处境的旧制度自己走的。这是旧制度能走的唯一的最后一步。这是最后一个汽門。統治資产階級国家的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再沒有也不可能再有别的汽門了。

正因为向新制度的这一步，是还保持自己的专权的旧制度自己走的，这一步就不可能有而且的确沒有什么牢固的結果。相反地，正象目前一切迹象向我們清楚表明的，这一步使旧的危机在俄

① 当然，应当理解“想出”一詞的“實質”：統治階級的“妄想”是受全世界和俄国的資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限制和制約的。在向資本主义发展的俄国的目前階級力量对比情况下，貴族联合会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力，也不会有别的办法。

②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15 卷第 320 頁。——編者注

国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更加加深。

旧的危机在新的环境下，在阶级关系更要明确得多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式加深起来；虽然它在加深，但它的社会经济性质（不仅是经济性质）实际上仍和从前一样。

农村资产阶级经营着极少数优越的独立田庄；与此同时，有份地的无产者日益减少，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还保持着自己的专权，大批受奴役的中农横遭破产，活活饿死，失去份地的无产者日益增加，——这就是今天俄国农村的图画。

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不会消除奴役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指这个词的历史和阶级的意义）的土地纲领却会做到这一点，难道还要证明吗？目前的农村情况使人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土地完全自由转移的条件下，优越的独立田庄一定会立即消除所有中世纪的饥饿现象，消除各式各样的奴役制和工役制，如果这些田庄根据农民的自由选择建立在所有目前还不包括在“土地规划”以内的7000万俄亩的地主土地上的话，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斯托雷平之流的土地措施只适用于“劳动派的”俄国，历史的讽刺难道不是要我们这样说的吗？

载于1912年8月5日

“涅瓦明星报”第20号

署名：尔·西·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小小的考証

我国立宪民主党是民主派还是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問題，在学术上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

我們記得，在這個問題上，就連劳动派（资产阶级民主派）沃多沃佐夫都是动摇不定的。

“真理报”在談到这个問題时，引用了格烈迭斯庫尔先生不久以前发表的“言論报”加以重申的一些声明^①。

“言論报”回答說：“我們不知道，‘真理报’說的是格烈迭斯庫尔先生的哪些声明。”

說得有多好听，不是嗎？“真理报”說得很明确，它說的是“言論报”加以重申的那些声明。这是怎么回事？是“言論报”不知道“言論报”上登了些什么嗎？自由派为了在选举前玩弄民主把戏，很想把自己前不久做的某些事情忘掉，这样的設想不更合情理嗎？

不管怎样，为了把这个重要的学术問題弄清楚，我还是把格烈迭斯庫尔先生在一系列公开演講中說过的和“言論报”第117号（总2071号）加以重申的，編輯部沒有表示任何保留看法的話，引一下：

格烈迭斯庫尔先生写道：“我在我的講演的最后，曾反对‘路标派’的关于

^① 見本卷第237頁。——編者注

俄国解放运动(所谓由于知识分子的过失)没有成功的论断,并把这一论断同那些比彼·别·司徒卢威还要左些,但也认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没有任何成果的人的意见加以对照;与此相反,我认为,相反地,这个运动取得了许多成果,奠定了将来立宪制度的基础,并且奠定得极其深刻极其牢固,奠定在人民群众的最低层。为了批判这两种论断,指出两者截然不同,同时阐明我认为目前在政治上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我就从未来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论断,指出,从前一个论断(即1905—1906年,没有得到任何成果)出发,一切就要从头开始,换句话说,就要组织第二次运动,从后一个论断(即1905—1906年,奠定了俄国立宪的基础)出发,相反地,就用不着第二次人民运动,需要的只是冷静的、顽强的、有信心的立宪工作。

刚说到这里,里巴瓦的(事情发生在里巴瓦)警察局长打断了我的话。看来,里巴瓦的警察当局也反对公开否认在俄国有举行新的革命的必要。”(“言论报”1912年第117号[总2071号])

格烈迭斯库尔先生充分证明,里巴瓦的警察局长先生是错了。但另外,格烈迭斯库尔先生还证明了两件重要的事情:(1)格烈迭斯库尔先生和他的一伙同“路标派”的争论只是装腔作势,毫无意义。实际上,在所有的重大问题,整个立宪民主党都是“路标派”。(2)马克思主义对立宪民主党在学术、经济和政治上的特征的评论,无疑是正确的。

载于1912年8月8日

“真理报”第85号

署名:恩·勃·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俄国工人的工资和 资本家的利润

1908年，对俄国工厂作过一次调查⁷⁰。毫无疑问，这次调查提供的工人工资的数字是夸大了，生产规模和资本家利润的数字是缩小了，因为我国诸如此类的调查都是官方进行的，而且只向资本家了解材料，认为没有必要去向工人了解。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最有利于资本家的统计资料说明了什么。

根据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公布的仅有的初步资料，俄国一共约有2万个工厂（确数是19 983个；我们将用括弧引用确数，正文中增减成整数，以便读的时候，对主要材料有个大致轮廓，容易记忆）。

男女工人的总数是225万人（2 253 787人），其中包括矿工和纳税的生产部门的工人。

所有这些工人的工资总额是5亿多卢布（55 570万）。

要想知道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就要用工人的总数去除工资的总额，结果得出的数字是246卢布。

这样，俄国225万工厂工人1908年每人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20卢布50戈比！

假如我们再考虑到，这点钱还要养活一家人，而且目前房租和粮价这样昂贵，那就不能不说，这点工资实在少得可怜。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資本家得了多少利潤。要得出利潤的數字，就要从生产總額即从所有工厂的总收入減去資本家的总支出。

生产總額是 45 亿多卢布(465 100 万卢布)。資本家的总支出是 40 亿卢布(408 200 万卢布)。

这就是說，資本家的利潤是 5 亿多卢布(56 870 万卢布)。

平均每个工厂的利潤是 297 000 卢布。每个工人平均一年为資本家生产 252 卢布的利潤。

現在，我們再把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比較一下。每个工人平均一年領到工資 246 卢布，而給資本家一年生产的利潤是 252 卢布^①。

由此可见，工人不到半天的時間是为自己工作，而半天多的時間是为資本家工作。假定一个工作日平均为 11 小时，那末工人得到的就只是 5 小时半，甚至还不到 5 小时半的报酬。其余的 5 小时半，工人就白白劳动，得不到任何报酬，工人在这半天生产的全部产品就变成了資本家的利潤。

載于 1912 年 8 月 8 日

“真理报”第 85 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① 每个工人一年创造的全部新价值是 498 卢布。

罢工斗争和工资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 1905 年有名的罢工斗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获得了非常巨大的胜利。现在，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资料⁷¹，就可以对这些胜利的程度，有个相当确切的概念。

根据这些资料，俄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如下：

1901 年.....	201 卢布	1906 年.....	231 卢布
1902 年.....	202 卢布	1907 年.....	241 卢布
1903 年.....	208 卢布	1908 年.....	242 卢布
1904 年.....	213 卢布	1909 年.....	236 卢布
1905 年.....	205 卢布	1910 年.....	242 卢布
5 年平均.....	206 卢布	5 年平均.....	238 卢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905 年是个转折的年度。就在 1905 年以后，一年的工资一下子就从 205 卢布提高到了 231 卢布，增加了 26 卢布，提高了 10% 还多。

至于 1905 年的工资比 1904 年减少了 8 卢布，关于这个情况，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1905 年是经济萧条的年头，即工业衰退的年头；第二、根据商业部的资料，工人这一年由于少领了罢工期间的工资，而损失了 1750 万卢布，即平均每个工人一年损失了 10 多个卢布。

因此，1905 年一年实际应得的工资可以说是 215 卢布，但工

人从这 215 卢布中为 1905 年出色的世界上空前顽强的广泛的罢工斗争献出了 10 个卢布。

总之，我們現在在研究 1901—1910 年整整 10 年的資料的時候，很清楚地看出 革命前的 时期和 革命后的 时期之間的 驚人的 差別。

1905 年以前，俄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資是 206 卢布，1905 年以后，是 238 卢布，每年多了 32 卢布，增加了 15.5%。

这一年工資的提高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以致資本家以后的任何努力（大家知道，資本家接二連三地收回了 1905 年的一切成果）都不会使工人的生活降到从前那样的水平。1905 年把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平时几十年也达不到。

根据官方統計，工人在 1905 年的罢工中，由于少領了罢工期間的工資，而損失了 1 750 万卢布。根据同一統計，1905 年，由于产量减少，資本家少得了 12 780 万卢布。

由于 1905 年以后工資的提高，工人在 5 年中（1906—1910 年），平均每人每年多得 32 卢布，以 180 万工人計算，一年就多得 5 760 万卢布，或者說，5 年一共多得 28 600 万卢布。

載于 1912 年 8 月 9 日

“真理报”第 86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

伊·姆·科兹米内赫-拉宁工程师出了一本关于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和在工作年的长度的著作。

作者搜集的是 1908 年年底以前的材料，包括 218 669 工人，即占莫斯科省工厂工人总数(307 773)的 $\frac{7}{10}$ 强。

作者根据这些材料算出的平均工作日是：成年人和少年人是 9 小时半，幼年人是 7 小时半。

必须指出，这些材料根本没有把额外劳动(关于额外劳动，作者准备出一专著)计算进去，其次，作者的材料完全是根据“企业主和工人的厂内守则”整理的。

这个守则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得到遵守，我们的工程师连提都没有提这个问题。只有工会编制自己的统计资料的时候，才会同时收集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

就单个企业来说，这 9 小时半的工作日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从作者的统计表可以看出，有 33 466 个工人每天工作超过 10 小时！他们占被调查的工人总数的 15% 以上。

13 189 个工人每天工作超过 11 小时，75 个工人每天工作超过 12 小时。受这种无限延长的工作日的压榨的工人，大部分是在纺织工业部门。

如果注意到，将近 $\frac{1}{3}$ 的工人没有列入作者的调查，那就会得

出这样的結論：莫斯科省有 2 万多工厂工人的工作日是长得极不合理的。

最后，科茲米內赫-拉宁工程师的資料表明，連允許实行 11 小时半（III）工作日的 1897 年极陈旧的俄罗斯法令，厂主都沒有遵守。这个法律規定，在两班制的工作中，每个工人的工作時間，按两周計算，一天不得超过 9 小时。

事实上，从作者調查的 88 990 个两班制工人中，有 14 376 人工作超过 9 小时。他們占两班制工人总数的 17%。而做修理和輔助工作的两班制的 3 733 个工人中，就有 2 173 人，即几乎达 $\frac{3}{5}$ 的工人，一天要工作 9 小时以上！即使根据官方的統計数字，也总共要有 16 500 工人的工作日不得不比法律允許的还要长！

1908 年，莫斯科省被調查的所有 219 669 个工人中，只有 4 398 人每天工作 8 小时。这就是說，八小时工作制現在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只要 215 000 工人赶上这 4 000 工人就行了。

載于 1912 年 8 月 11 日

“真理报”第 88 号

署名：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

科茲米內赫-拉寧工程師用這個標題出版的著作（1912年，莫斯科，俄羅斯帝國技術協會莫斯科分會勞動促進陳列館常務委員會出版，定價1盧布75戈比），綜合了1908年年底以前的資料。

這些資料包括219 669工人，即占全省工廠工人總數（807 773）的71.87%。作者說，“材料是他按照每個工廠分別仔細研究過的，綜合進去的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材料。”

按說這樣的統計資料當然是非常有用的了（儘管發表得太晚），如果綜合得象樣的話。但我們不能不表示遺憾，因為科茲米內赫-拉寧先生把統計表編得非常細緻，把許多精力都放到計算各種總數和百分比上去，精力用的不是地方。

豐富的材料好象是把作者的頭都搞昏了。他算了幾百個、幾千個完全多餘的、只會妨礙工作的數字，而幾十個絕對必需的數字，他卻沒有去算，而沒有這些數字，就勾劃不出全貌。

的確，在作者的幾乎布滿全書的主要統計表中，有非常詳細的材料，例如按連續兩周的工時數（109小時到120小時），把每天工作9—10小時的工人分為16類，算出每類工人每天的平均工時數！而且都是算了兩遍：生產工人一遍，輔助工人一遍。

不能不認為，這樣詳細分類，第一、是完全多餘的，是為統計而統計，玩弄數字，有礙澄清全貌，編出研究用的材料。第二、作者十

分精確計算出來的——連 $\frac{1}{100}$ 都不放過——這些“平均數”，十分之九都是白費力氣，因為可以保證，這本書的1 000個讀者（未必會有1 000個讀者）中，未必會有一個感到需要這種“平均數”（即使這個讀者也這樣不走運，他自己也可以把它算出來！）。

同時，一些十分必需的、作者稍微花點氣力就可以做出來的，要想認真介紹調查資料還是非有不可的綜合材料，這本書却一個也沒有。例如：（1）按一班制、兩班制和三班制的工人的生產分類的材料；（2）生產工人和輔助工人的材料；（3）按生產分類的平均工時數的材料；（4）成年工人和童工的總工時數的材料；（5）按工人人數劃分工廠的材料。

我們來談談最後一條。看來，作者是很勤懇的——如果從他已發表的和準備發表的著作目錄來看，他掌握瞭許多重要材料，只要把他的方法批判地分析一下，這些材料就不僅在理論上，而且直接在实践中，都會有所補益。我們已經引過作者的話，他說，搜集的“材料是他按照每個工廠分別仔細研究過的”。

就是說，即使按照我國官方統計材料劃分的工廠類別（20工人以下的，21—50工人的，51—100工人的，101—500工人的，501—1 000工人的，1 000工人以上的），把這個材料綜合一下，是完全可能的。這樣的綜合材料是否需要呢？

無疑是需要的。統計工作不是把數字隨便填到幾個格格里去，而應當是用數字來說明所研究的現象在實際生活中已經充分呈現出來或正在呈現出來的各種社會類型。有50個工人和有500個工人的工廠是我們所研究的現象的兩個極不相同的社會類型，所有文明國家的整個社會發展使這些類型之間的差別擴大，使其中一個把另一個擠掉，這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嗎？

就拿工作日的材料來說。如果我們自己來做一下這本書所沒有做的一些必要的統計工作，我們就可以從作者的總計表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調查過的 22 萬工人中，有 83 000 工人每天工作 10 小時以上，而 22 萬工人的平均工作日是 9.5 小時。試問，受着過長的工作日折磨的工人不是小工廠的嗎？

產生這個問題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決不是隨便提出的。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使我們不能不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小工廠延長工作日是極常見的事情。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使小業主必須延長工作日。

實際上，在作者的材料中，回答這個極重要的問題的資料是有的，只是作者把它綜合掉了！作者在綜合表中給我們劃了很長的不說明任何問題的格格，列了一大堆極詳盡的“平均數”，而沒有按工人人數把工廠作必要的劃分。

對莫斯科省來說，作這樣的劃分比其他地方更需要（如果這裡可以比較的話），因為莫斯科省除了生產大量集中，小工廠的數量也相當大。根據 1910 年的統計，莫斯科省共有 1 440 個工廠，835 190 工人；有一半工人（167 199）集中在 66 個工廠里，同時，有 669 個工廠總共只有 18 277 工人。顯然，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類型，統計資料不把它們區分開來，就會毫無用處。

作者整個身心都全投到連續兩周工作 94、95 小時直到 144 小時的工人數這樣一些數字里去，而完全忽視了工廠的數字。他在這本著作的探討工作年長度的第二部分，提到了這方面的數字，在探討工作日的第一部分，却根本沒有舉出工廠的數字，儘管作者手裡顯然有這樣的材料。

莫斯科省規模最大的工廠，不僅是工廠的獨特類型，而且是具

有特殊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或确切些說,沒有文化)条件的居民的独特类型。把这种工厂划分出来,把按工人人数划分的每类工厂的材料分別加以詳細分析,是进行科学的經濟統計的必要条件。

現在我們根据科茲米內赫-拉宁先生的著作,做出几个最主要的总計。

我們已經說过,作者关于工作日长度的調查包括了莫斯科省 219 669 工厂工人,占全省工厂工人总数的 71.37%,而他的統計所包括的紡織工人要多于其他生产部門的工人。被調查的紡織工人占紡織工人总数的 74.6%,其他生产部門的工人只占 49—71%。看来,小工厂的材料搜集得比較少:一年的工作日数的統計頂多只占工厂总数的 58% (1908 年 1 394 个工厂中的 811 个),工人总数的 75% (307 773 人中的 231 130 人)。显然,这里正是小工厂被忽略了。

作者做出的工作日长度的总計資料,只是把全体工人合在一起計算出来的,得出的平均数——成年工人每天 9.5 小时,童工每天 7.5 小时。必須指出,童工的人数是很少的,只有 1 363 人,成年工人却有 218 306 人。这就使人联想到,是不是特別把童工“藏了”起来,不讓检查員看見呢?

219 669 个工人中,一班制的有 128 628 人(58.56%),两班制的有 88 552 人(40.31%),三班制的有 2 489 人(1.13%)。在紡織工业中,两班制工人多于一班制工人:两班制工人有 75 391 人(都是“生产”工人,也就是沒有輔助工人),一班制工人有 68 604 人。如把修理工人和輔助工人都算在內,两班制工人就有 78 107 人,一班制工人就有 78 321 人。相反地,在五金工人中,一班制工人

(17 821 成年工人)要比两班制工人(7 678 人)多得多。

我們把每天工时数不同的工人总計一下，就可以得出如下的資料：

每天工时数	工人数	
8 小时以下.....	4 398	
8—9 小时.....	87 402	
9—10 小时.....	94 403	
10—11 小时.....	20 202	} 33 466
11—12 小时.....	13 189	
12 小时以上.....	75	
总 計	219 669	

由此可見，俄国每天工作不超过 8 小时的工人是多么少：219 669 人中，只有 4 398 人。相反地，每天工作时间极长的工人却非常多：22 万工人中，就有 33 466 人，也就是說，有 15% 以上的工人每天要工作 10 小时以上！这还没有包括額外工作时间。

其次，从下面的資料可以看出一班制工人和两班制工人的工作日长度的差别；这些資料只包括成年“生产工人”，即不包括占工人总数 8% 的修理工人和輔助工人。

工作日长度	工人(每天做上述工时数工作的工人)的百分数	
	一班制工人	两班制工人
8 小时以下.....	1.3	1.0
8—9 小时.....	13.3	81.9
9—10 小时.....	60.7	14.7
10—11 小时.....	15.2	1.4
11—12 小时.....	9.5	1.0
12 小时以上.....	—	—
总 計	100.0	100.0

由此可見，有 17% 的两班制工人每天工作 9 小时以上，就是說，比拉宁先生公正地認為过分落后的我国 1897 年法律所准許的工时数还要长。这项法律規定，两班制工人每天的工时数不得超过 9 小时，——这是按两周計算的。而拉宁先生的所有計算和表格正是以“連續两周”为期的。

既然連这样明确的法律都被破坏，那末我国工厂法的大部分其余的規定，会給弄成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一班制工人(只包括成年工人和“生产工人”)每天的平均工时数是 9.89 小时，就是說，大多数工人都不折不扣地工作 10 小时，星期六也不例外，額外工作还不在內。不用說，这样长的劳动時間无疑是过长的，不能容忍的。

两班制工人每天的平均工时数是 8.97 小时，就是說，大多数工人实际上都是根据上述法律对这种工人的要求，每天工作 9 小时。把工作日縮短到 8 小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两班制的情況下，所謂“夜間”是从晚上 10 点到第二天早晨 4 点(!!)，就是說，夜間的相当长的一段時間，对工人來說，实际上都成了“白天”。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把夜間变成白天，工人經常夜間工作，——这就是莫斯科省的情景。

我們在結束对科兹米內赫-拉宁先生的資料的評論时要指出，他把工作年的平均长度确定为 270 天。紡織工人少些——268.8 天，五金工人多些——272.3 天。

这些有关工作年的长度的資料，科兹米內赫-拉宁也是整理得极其不能令人滿意的。一方面，完全沒有必要的过分琐碎；我們数了一下，工作年长度的綜合統計表，整整有 130 格！在这里，工厂、工人等等的数字，都是按照每个实际存在的工作日数(一年的)，从

22天到866天,分別列出的。这样的“詳細”分类倒是說明根本“沒有消化”原始材料。

另一方面,这里,一些絕對必需的綜合材料,不管是工厂工人的数字,还是动力不同(手工工厂和机械工厂)的材料,都全沒有。因此,就根本无法了解工作年的长度和各种条件之間的依附关系。作者搜集的极其丰富的材料,由于綜合得不好,都白費了。

即使根据作者的材料,我們只要稍加整理,就可看出(大体上,远不精确!)大生产和小生产之間的差別的意义。現在,我們列举四个按工作年的长短划分的工厂类型:(1)一年工作不到200天的;(2)200—250天的;(3)250—270天的;(4)270天以上的。

我們把每一类的工厂数和男女工人数綜合一下,則得出如下的情况:

工作年长度	一年平均 工作日数	工厂数	工人数	每个工厂的 平均工人数
200天以下	96	74	5 676	76
200—250天.....	236	91	14 400	158
250—270天.....	262	196	58 313	297
270天以上	282	450	152 741	339
总 計	270	811	231 130	285

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工厂越大,工作年就越长(总的来說)。可見,小企业实际上的社会經济意义比这些企业的比如工人数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小得多。这些企业的工作年比大企业短得多,它們的生产量也是微不足道的。此外,这些小工厂在很短的工作年內,不可能培养出无产阶级的固定的骨干,就是說,这里的工人与土地的“联系”比較密切,工資也一定比較少,文化程度也較低,等等。

大工厂加重剝削，把工作年延长到极限，从而形成与农村断絕一切联系的无产阶級。

如果看到，工作年的长短是由于工厂的技术設備（手搖发动机和机械发动机等等），那无疑就会针对居民的生活条件、工人状况、我国資本主义的发展等等，提出极有意义的意見。但是，所有这些問題，作者可以說根本沒有接触到。

他仅仅提供了各种生产部門的工厂工作年的平均长度的数字。总平均数的差数并不很大：从第 9 类（矿物質加工）的一年 246 个工作日到第 12 类（化学生产）的一年 291 个工作日。

正如讀者所看到的，这些差数比一般大小工厂（不管是哪个生产部門）的工作年长度的差数要小得多。

从社会經濟的統計的角度来看，按生产部門的差数沒有按生产規模的差数能够說明問題，这当然不是說，头一种差数就可以忽視，但这說明，一个象样的統計資料，不考虑到第二种差数，就不会有什么意义。

載于 1912 年 8 月 12 日

“涅瓦明星报”第 21 号

署名：弗·伊·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在 英 国

英国的自由派执政已有六年半了。英国的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罢工已经成为群众性的，而且不再是纯粹经济罢工，而成为政治罢工了。

不久以前，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就表现了这种群众斗争的威力；他们的领袖罗伯特·斯麦里宣称，煤矿工人在下一次大战斗中，将要求把煤矿交给国家。而这下一次大战斗一定会到来，因为英国所有煤矿工人都充分地认识到，臭名远扬的最低工资法不可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状况。

这样一来，英国自由派就失去了立足之地，于是，就想出了一个新的战斗号召，使选民群众在一定时期内，重新信任自由派。不欺騙就卖不出去——这是资本家在交易中的口号。不欺騙就得不到议会的资格證書——这是自由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口号。

自由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想出的“时髦”口号，就是要求实行“土地改革”。自由派及其愚弄群众的专家劳合-乔治究竟指的什么，还不清楚。看来，是指增加土地税，别无其他。再征集几百万人去干军事冒险，充实海軍，——这就是用“把土地归还人民”等等冠冕堂皇的詞句掩飾起来的实际内容。

英国的农业完全是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的：资本家-农场主租用大地主(土地占有者)的面积适中的土地，雇用工人耕种。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任何“土地改革”，都絲毫不能改变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英国，贖买地主土地甚至可能成为对无产阶级的更进一步的掠夺，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掌握国家政权，他们可以用高价出卖自己的土地。而出这样的价钱的是納稅人，就是說，还是工人。

自由派在土地問題上的喧嚷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农业工人考虑到必須組織起来。

而当英国农业工人觉醒过来，組成工会的时候，自由派再用“改革”或分給雇农和短工份地等等騙人的“諾言”，就蒙混不过去了。

不久以前，英国一家工人报纸的工作人员訪問了农业工人的老領袖約瑟夫·阿尔奇。阿尔奇做过很多工作，来喚醒农业工人，要他們走向自覺的生活。这个事业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的，阿尔奇的口号也很幼稚——給每个农业工人“3英亩（1英亩合 $\frac{1}{3}$ 俄亩多一些）土地和一头奶牛”，他建立的工会垮了，但是他的事业沒有垮，英国农业工人的組織問題又提上了日程。

阿尔奇現在已經83岁了。他住在他出生的那个乡村，而且是在他出生的那幢房子里。他在与交談者談話中指出，农业工人工会會把每周的工資提高到了15、16、17个先令（1先令約合48个戈比）。但目前，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資又下降了，在阿尔奇所在的諾福克，下降到每周12—18个先令。

截于1912年8月12日

“真理报”第89号

署名：普·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俄国的生产积聚

俄国也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生产正在积聚，就是说，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和最大企业里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企业都完全受市场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越大，越能低价出售产品。大资本家低价购买原料，使用原料节省，使用最好的机器，等等。小业主则遭破产，垮台。生产越来越集中和积聚到少数百万富翁手里。这些百万富翁通常通过股份公司来吸收中业主的资本和“零钱”，从而更加加强自己的力量。

就拿俄国工厂工业 1910 年的资料同 1901 年来比较一下⁷²。

按工人人数 的工厂分类	工厂数		工人数(以千为单位)	
	1901年	1910年	1901年	1910年
50人以下的……	12 740	9 909	244	220
51—100人……	2 428	2 201	171	159
101—500人……	2 288	2 213	492	508
501—1 000人……	403	433	269	303
1 000人以上的……	243	324	526	713
总 计……	18 102	15 080	1 702	1 903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情况就是这样。小工厂的数字逐渐减少；小资产阶级，小业主，遭到破产，垮台，成为职员，有的成为无

产者。

最大企业的数字迅速增加，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增长得更大。

1901年到1910年，有1000工人以上的最大工厂几乎增加了 $\frac{1}{2}$ ，从243个增加到324个。

1901年，这种工厂的工人有50万左右（526000人），即不到工人总数的 $\frac{1}{3}$ ，而到1910年，就超过了70万，即超过了工人总数的 $\frac{1}{3}$ 。

最大的工厂把小工厂挤掉，把生产越来越集中到自己手里。越来越多的工人集中到少数企业里去，但千百万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全部利润却落到一小撮百万富翁手里去了。

载于1912年8月12日

“真理报”第89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飞黄騰达之路

不久以前逝世的百万富翁，“新时报”的发行人，阿·謝·苏沃林，他的一生反映了和表明了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社会一个极重要的历史时期。

他刚刚进入生活的时候，是个貧民，自由派，甚至是民主派，到了生活的末期，却成了百万富翁，成了洋洋得意的恬不知耻的，每逢当权派实行任何政治变革，都要献番殷勤的资产阶级頌揚者。这难道对所謂社会人士中間的大量“有教养的”“有知識的分子”來說，不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嗎？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要成为百万富翁，都能这样极顺利地玩弄背叛把戏，但至少十分之九，如果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話，都是玩弄这种背叛把戏的，就是說，起初是激进派学生，最后得到了某种职务或某种投机活动的“肥缺”。

貧苦学生，由于繳不起学費，沒有进大学；县城中学的教員，職員，貴族首領的秘書，或知名的富有的农奴主的家庭教师；刚刚进入新聞界的自由派的甚至是民主派的新聞工作者，倾向于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仇恨反动派，——苏沃林在19世紀50—60年代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人。

同情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宪法的自由派地主卡特柯夫，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高潮时期（19世紀60年代初），投靠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猖狂的黑帮。

自由派新聞工作者苏沃林,在俄国第二次民主高潮时期(19世紀70年代末),投靠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墮落到向当权派卑躬屈膝的地步。俄土战争帮助这位鑽营家“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使他的“听憑吩咐报”获得大量收入的奴才的途径。

“听憑吩咐报”这个綽号,苏沃林的“新时报”保持了几十年的時間。这份报纸在俄国成了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新时报”成了变节、背叛和吹牛拍馬的代詞。苏沃林的“新时报”是做“零沽零飲”的零活买卖的典型。在这里,他們什么买卖都做,从政治見解一直到色情广告。

而目前,在俄国第三次民主高潮过去以后(20世紀初期),又有这样多的自由派沿着“路标派的”道路,投靠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誣蔑民主派,奉承反动派了!

卡特柯夫——苏沃林——“路标派”,这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从民主派轉向拥护反动派,投靠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几个历史阶段。

觉悟的工人認識到资产阶级的这种轉变,正象劳动群众轉而拥护工人民主派的思想一样,是必然的,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載于1912年8月18日

“真理报”第94号

署名:伊·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致社会主义国际局書記处

尊敬的同志：

您寄来的关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通知該組織已經分裂的第15号(1912年7月)通报,已經收到。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駐社会主义国际局的代表,我不能不对这个通报表示强烈抗議,理由如下：

1. 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宣布,华沙委员会“不屬於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做为自治部分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然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沒有任何权利决定或宣布誰屬於我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現在,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本身就不屬於我們党,因为它在組織上既同我所代表的1912年1月代表會議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沒有联系,也同取消派的相反中心(所謂“組織委员会”)沒有联系。

2. 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声言,分裂是“在国家杜馬选举前突然”发生的,这不符合事实。

据我个人了解,这个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本身在两年前,在同前任委員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发生激烈爭执,并把加涅茨基从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去的时候,就該預見到会发生分裂了。

3. 总执行委员会的声明是虚伪的。

第一、华沙组织，“也和沙皇俄国的其他一切革命组织一样”，鑽进了奸细。

第二、分裂是在“暗探局的积极协助”下发生的，尽管总执行委员会叫不出一个名字，不敢说出一个明确的疑点！

为了从道义上击溃政治上的对手，竟公然无耻地胡说什么“暗探局的协助”，但又沒有足够的勇气，哪怕叫出一个名字，说出一个明确的疑点，这該有多么虚伪呵！

我相信，国际每个委员都会愤怒地駁斥这种駭人听闻的斗争手法。

我知道，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两位前任委员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許多年来都是同华沙委员会公开携手并进的。我恰恰接到了华沙委员会的正式通报，証明了这一事实。

在既成的形势下，我認为自己有责任把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附带寄来的抗議書轉給社会主义国际局。

鉴于总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已分发给社会主义国际局全体委员，我就不得不請您，尊敬的同志，把我的这项声明，連同华沙委员会的抗議書，分发给加入国际的各党代表。 致

党的敬礼

尼·列宁

1912年8月31日

写于1912年8月18日(31日)

第一次載于1912年11月21日

《Gazeta Robotnicza》第19号

署名：尼·列宁

根据波兰文报纸譯成俄文刊印

立宪民主党和土地問題

立宪民主党在反对“真理报”的論战中，尽管費尽心机，也未能迴避他們是民主党还是自由保皇党的問題。

这个問題十分重要。它不仅具有一般原則上的意义，为澄清基本的政治概念提供了材料，而且把妄想指揮一切反政府党派而立宪民主党的实質問題，同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所有根本問題，极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因此，任何人，只要他自觉地对待选举运动，重視这一运动在群众的政治教育中的意义，他就应当十分关心立宪民主党的实質这个問題的爭論。

立宪民主党的“言論报”現在企图抹杀这场爭論，用遁詞和謾罵（“造謠”，“歪曲”等等）来把原則問題掩盖起来，把取消派为了发泄組織上的激烈爭執所激起的私憤而辱罵我們的那些詞句，搬了出来。这都是在原則爭論中无能为力的那些人所采用的人所共知的陈腐不堪的手法。因此，我們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回答应当是把原則問題重新闡述一下。

一般說来，民主派和自由派有哪些区别呢？不論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还是自由派（所有的自由派都是資產階級自由派，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主派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派），都傾向于反对旧制度、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最高等級的特权等等，都傾向于政治自由和立宪的“法”制。这是他們共同的地方。

他們的區別。民主派代表大部分居民。它贊同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偏見，例如以為重新“平均”分配全部土地，不僅可以消滅農奴制的一切殘余（這種想法是有根據的），而且可以摧毀資本主義的基礎（這種想法完全沒有根據，因為任何重分土地的办法，既不能消除市場和貨幣的統治，也不能消除資本的統治和專制）。但，民主派相信群眾運動，相信群眾運動的力量和正義，決不害怕這種運動。民主派堅決主張把一切中世紀特權消滅干淨。

自由派不是代表大部分居民，而是代表少數居民，也就是大中自由資產階級。自由派害怕群眾運動，他們害怕徹底民主派比害怕反動派 還要厲害。自由派不僅不要求完全消滅一切中世紀特權，反而維護某些最重要的特權，竭力由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來瓜分這些特權，而不全部消除。

自由派主張政治自由和立憲，總是有些附帶條件（如兩院制等），而每個附帶條件都是維護農奴主的特權。自由派總是這樣搖擺于農奴主和民主派之間，所以自由派在一切稍微重大的問題上，總是顯得極端軟弱無力，甚至達到難以想象的地步。

俄國的民主派是指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派），各種民粹派和勞動派（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包括在內。俄國的自由派是指立憲民主黨，“進步派”和第三屆杜馬中的大多數民族派也包括在內。

俄國民主派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勝利，俄國自由派沒有取得任何勝利。前者善於鬥爭，它的失敗也總是全國的重大的歷史性的失敗，而且即使遭到失敗，民主派的部分要求總是得到滿足的。后者即自由派不善於鬥爭，在俄國歷史上，除了農奴主總是象老爺指使奴仆一樣指使自由派以外，沒有別的記載。

我們拿立憲民主黨的土地綱領來考察一下這些一般性的論點

和基本的原則看法。“真理报”曾向立宪民主党人指出，他們的非民主性，可以由立宪民主党人別列佐夫斯基第二在第三届杜馬中发表的关于土地問題的演說^①來証明。

立宪民主党的“言論报”在第208号上回答道：“大家知道，別列佐夫斯基第二的演說是立宪民主党的土地問題綱領的証明。”

你看，这个回答支吾得有多厉害！我們說，別列佐夫斯基第一^②的演說是非民主地提出問題的典范。“言論报”很清楚，我們認为的自由派不同于民主派的特征是什么。但它根本不想認真研究問題，不想断定自由派不同于民主派的特征，哪些是它“言論报”認为正确的，并且检查一下別列佐夫斯基第一的演說有沒有这些特征。“言論报”这些都根本沒有做。“言論报”竭力迴避問題，从而暴露了它在原則上的軟弱无力和居心不良。

但是，就連“言論报”也不敢否認整个立宪民主党对別列佐夫斯基的演說应負的責任。它把別列佐夫斯基第一的演說称为“立宪民主党土地問題綱領的証明”，就是承認，而且应当承認它要承担这个責任。

好极了。我們現在就来引一下辛比尔斯克的地主、第三届杜馬的代表亚·叶·別列佐夫斯基的这篇无疑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演說的几个主要地方。我們在分析演講人的論点的时候，就要看一下，他所持的是民主派的观点还是自由派的观点。現在我們就来看一下，立宪民主党先生們在他們庞杂的刊物上或是會議上，能不能駁倒我們。

① 見本卷第237頁。——編者注

② “真理报”和“言論报”所載的別列佐夫斯基第二，都印錯了。那个立宪民主党人是別列佐夫斯基第一，名字是亚历山大·叶利札羅維奇，辛比尔斯克的地主。

1908年10月，亞·叶·別列佐夫斯基在第三屆杜馬中說（我們是根據“俄國報”上的速記記錄引証的）：“我深信，這個草案（立憲民主黨的土地草案）對土地占有者也非常有利”（不僅對農民），“先生們，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熟悉農業，我自己一生就從事的農業，並且占有土地。從建立文明的農業的角度來看，人民自由黨的草案無疑要比現行制度更有益處。不應當把強迫出讓這個赤裸裸的事實擯棄掉，為這一事實感到氣憤，並說這是暴力，而應當研究和考慮一下，我們的草案建議實行的辦法是以什麼形式表現出來的，這種強迫出讓的辦法是怎樣實現的……”

我們把亞·叶·別列佐夫斯基先生的這些真是無上寶貴的話加了着重號；說這些話無上寶貴是因為道出了難得的實話。誰要回顧一下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在第一屆杜馬時期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的講演和文章，或是誰願意現在花點工夫，把這些文章瀏覽一下，他就會承認，1908年的亞·叶·別列佐夫斯基出色地証實了1906年的布爾什維克的論斷是正確的。而且我們可以預見到，任何客觀一些的历史都會証實他們的政策是正確的。

我們在1906年說過：不要听信這種“強迫出讓”的叫喊。全部問題在於：誰強迫誰。如果是地主強迫農民用高價購買壞地，象臭名昭著的1861年的贖買那樣，這種“強迫出讓”就是對地主有利、而使農民破產的地主的改革①。

自由派和立憲民主黨人提出強迫出讓的問題，是在地主與農民之間，黑幫派與民主派之間隨風轉舵。1906年，他們向民主派解釋“強迫出讓”的時候，竭力把這說成是一種民主的要求。到1908年，向第三屆國家杜馬的“死硬派”解釋的時候，又向他們証明，應當研究“這種強迫出讓是以什麼形式表現出來，是怎樣實現的”。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384—386頁。——譯者注

我們來听听立宪民主党的这位正式演講人是怎么說的吧：

亞·叶·別列佐夫斯基說：“就拿第一屆杜馬的42位代表的草案來說。这个草案就只”（一点不錯，別列佐夫斯基先生！）“認為必須首先出讓所有主自己沒有經營的土地。其次，人民自由党主張在各地成立委員會，这些委員會應該在一定时期內，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出讓，哪些不該出讓，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滿足。这些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

亞·叶·別列佐夫斯基先生还有一点沒有說完。誰若想查对一下載于立宪民主党出版的“土地問題”第2卷的庫特列尔（立宪民主党在土地問題上的公認代表）的土地草案，就会看到，这个草案規定，委員會的主席是由政府任命的，就是說，这些主席还是地主的代表。

但，假定亞·叶·別列佐夫斯基比庫特列尔更确切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假定亞·叶·別列佐夫斯基全部說出来了，立宪民主党人真的要求成立沒有階級政府的代表参加的由农民和“非农民”有同等人数組成的委員會，那又怎样呢？是不是就有人敢断定，这样的草案是民主的呢？

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統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說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法，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員會才是民主的委員會。从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起碼的道理出发，无疑会得出这样的論点，这还要我們向立宪民主党人先生們嘮叨，簡直有点离奇。

立宪民主党人在紙上是承認普选权的。而实际上，在俄国解放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土地問題上，他們就不承認普选权了！任何遁詞和詭辯都不能抹杀这个头等重要的事实。

你們也不要以为，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問題上，只是离开了普

选权的原則，离开了民主的原則。不，他們是以另一个原則，新与旧、地主与农民、黑帮与民主派“調和”的原則为依据的。把一半給这部分人，把另一半給另一部分人，——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宣揚的貨色。

这恰恰是动搖不定的保皇派自由資产階級的典型原則。他們要求的不是消除中世紀特权，而是由地主和資产階級来瓜分这种特权。使“非农民”（說穿了就是地主）与占居民 $\frac{7}{10}$ 的农民平等，就是捍卫和确保中世紀特权，难道这真的还有什么可以爭論的嗎？中世紀特权不表現在一个地主在决策时所起的作用等于几百个几千个农民，还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地主和农民的平等，客觀上的必然結果只能是地主和資产階級瓜分特权。1861年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地主把自己千分之一的特权讓給了新兴的資产階級，而农民群众半个世紀（1861+50=1911）以来，一直处于痛苦地位：无权，备受凌辱，慢慢餓死，繳納苛捐杂稅，等等。此外，也不应当忘記，地主在1861年，把自己千分之一的政治特权讓給資产階級（土地改革，城市改革，法律改革，等等）以后，他們自己在經濟上也开始变成了資产階級，开办酿酒厂、甜菜制糖厂，参加股份公司董事业，等等。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亞·叶·別列佐夫斯基先生自己提出的一小撮地主和众多农民的这种“平等”，最終会造成什么样的結果。不过我們还是先来着重談一下別列佐夫斯基下面这些話的全部意义：这些臭名昭著的委员会应当“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出讓，哪些不該出讓，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滿足”。

关于分給农民上地的各种“标准”的一切議論，都不过是些空話；順便說說，我們的民粹派知識分子，极“左派”也不例外，往往用

这种空话来迷惑自己和农民。重要的只有一个問題：应当出讓的是全部土地，还是不是全部土地？如是后者，那由誰来决定，“哪些土地不該”出讓呢？（我就不必說，由誰决定贖金的多少，因为贖买中世紀特权本身就是一种自由资产阶级的制度，但从根本上來說，是一种根本不民主的反民主的制度。）

立宪民主党土地草案的經過仔細归納的、象官样文章那样四平八穩的条款，完全是打官腔。重大的問題是：誰来决定哪些土地应当出讓，在什么条件下出讓？即使一个最理想的法案，如果迴避了这个問題，也只能是一种騙局。

那末，別列佐夫斯基先生是怎样解决这个唯一重大問題的呢？要知道，在农民与“非农民”平等的情形下，显然多半是不会达成什么協議的，况且关于农奴主与昨天的农奴达成的友誼協議，根本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法令。即使不制定什么法令，农奴主任何时候也都会願意同农奴达成“友誼協議”的。

所以，別列佐夫斯基先生向第三届杜馬中的死硬派，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們再听听他下面是怎么講的吧：

“因此，由各地进行了这个一般的具体的工作以后，当然也就弄清楚了‘可以’（請听！）‘出讓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土地’（为什么需要？为服工役嗎？为了这个，农奴主当然永远会贊成的！），‘最后，农民自己就会相信，他們的正义’（哼！哼！上帝保佑，千万别使老爷发怒，不要老爷的爱撫，不要地主的“正义”）‘要求可以满足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一切再提交給国家杜馬以及’（請听，請听！）‘国家参議院，經他們修改以后’（哼！哼！），‘才能最后批准’（即批准法律）。‘进行了这种有计划的工作以后’（这談不上什么“有计划”！），‘居民的真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真正滿足，同时，文明田庄就会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不願意破坏的’。”

理應叫做安定地主情緒黨的“人民自由黨”的代表就是這樣說的。

從這裡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立憲民主黨的所謂“強迫出讓”是地主對農民的強迫。誰要想否認這一點，他就應當證明，在國家參議院裡，是農民比地主占優勢！開頭講地主與農民的“平等”，到最後，如果友誼協定沒有訂立的話，草案要由國家參議院來“修改”。

“人民自由黨除非迫不得已是不願意破壞文明田莊的”；地主亞·叶·別列佐夫斯基先生這樣說，他顯然以為他的田莊是“文明的”。我們要問：由誰來決定，誰的田莊是文明的，哪些部分是“文明的”，什麼時候才是“迫不得已”呢？答案就是：開頭由地主和農民以“同等的人數”組成的委員會決定，然後由國家參議院……

那又怎樣呢？立憲民主黨是民主黨，還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黨呢？是“人民自由”黨，還是安定地主情緒黨呢？

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各種勞動派和民粹派，他們的嚴重過錯就在於，他們以為把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就可以“平均”了，就可以實現“勞動派的原則”了，等等；他們的過錯還在於，他們用空談土地所有制的各種“標準”，來把中世紀土地占有制不應該繼續存在的問題模糊起來，但是，這個民主派還是幫助了新制度排除舊制度，而沒有編造一套使舊制度保持一系列特權的草案。

不，要想否認立憲民主黨不是民主黨，而是反革命的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簡直就是拿眾所周知的事實開玩笑。

最後，我們來簡單談一談其他一些幼稚的立憲民主黨人可能提出的一个问题。既然立憲民主黨的“強迫出讓”是地主對農民的

强迫，那为什么大多数地主又反对这种强迫呢？

米留可夫先生 1908 年 10 月 31 日在第三届国家杜馬中，以历史家的姿态发表的講演中，就不由自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历史家米留可夫不得不承認，1905 年年底以前，政府和地主都認為农民是一种保守力量。在 1905 年 7 月 19—26 日彼得戈弗的會議（这次會議筹备了布里根杜馬）上，未来的貴族联合会的台柱阿·亚·鮑勃凌斯基和納雷什金等人，都主張讓农民在杜馬中占优势。維特当时也認為，专制制度的支柱应当（而且可以）不是貴族，也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农民民主派”^①。

米留可夫先生說：“先生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政府想出了强迫出讓的主意（有人喊：是庫特列尔想出来的）。是的，是庫特列尔，先生們……庫特列尔起草了强迫出讓草案。

……他拟訂了这个草案，先生們；到 1905 年年底以前，起草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不知道。这个工作一直毫无阻碍地繼續到发生众所周知的莫斯科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气氛就有了显著的变化。”

1906 年 1 月 4 日，貴族首領代表大会就开会了。这次大会根据一些傳說和零星报道，推翻了庫特列尔的草案。大会通过了自己的土地綱領（就是后来的“斯托雷平”綱領）。1906 年 2 月，庫特列尔部长辞职。1906 年 3 月 30 日，提出“农民”綱領的維特內閣就为提出“斯托雷平的”貴族資產階級綱領的古尔柯-哥烈梅金的內閣所更迭。

这就是历史家米留可夫不得不承認的事实。

^① 見“人民自由党团在第三届国家杜馬第二次會議期間的演講录”（1909 年圣彼得堡版）第 43 頁。遺憾而且万分遺憾的是，立宪民主党人沒有把別列佐夫斯基的演說編进去……

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結論是很明显的。“立宪民主党的”强迫出讓草案,是維特內閣庫特列尔 部长 幻想依靠农民来維護专制制度的草案! 当农民民主派得势的时候,他們就想用“和平的”、“强迫出讓的”、“第二次解放的”草案,用“地主”“强迫农民”的官方草案,来收买、腐蝕和欺騙这个民主派。

这就是历史事实向我們說明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綱領,是維特內閣的部长“扮演”农民的凱撒皇帝的草案。

农民民主派沒有实现自己的願望。他們表明,而且在第一届国家杜馬时期比在 1905 年更为明显地表明,他們从 1861 年起,就逐漸覺悟了。在这样的农民面前,庫特列尔立宪民主党的草案就成了荒謬的了;农民不仅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受蒙蔽,而且会利用立宪民主党的地方土地委员会,来組織新的进攻。

貴族的首領 1906 年 1 月 4 日正确地决定,自由派地主(庫特列尔之流)的草案只是一张廢紙,并且把它扔掉。国内战争 改变了自由派官僚的空洞計劃。阶级斗争摺弃了“社会和平”的幻想,尖锐地提出了“或是斯托雷平的办法,或是劳动派的办法”的問題。

載于 1912 年 8 月 19 日

“涅瓦明星报”第 22 号

署名:威·弗雷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整脚的辯解

我們在登在8月9日“真理报”第86号上的“罢工斗争和工資”^①一文中，援引了我国关于俄国工厂工人在20世紀头10年中的平均工資的官方統計材料。

材料証明，工人由于1905年著名的罢工斗争，把自己的工資从206卢布（一个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資）提高到了238卢布，增加了32卢布，也就是增加了15.5%。

官方的“俄国报”⁷³不大喜欢我們这个結論。該报8月15日发表了一篇社論，詳細轉述了我們援引的統計材料（但不知为什么沒有明确指出，这些材料是从哪种报纸轉述来的），企图推翻我們的結論。

“俄国报”写道：“工人的工資1906年急剧上升，这当然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在同一时期內，所有物价也驟然上涨，这也是事实……”接着，“俄国报”計算了一下，按它的算法，工資增加了20%，物价涨了24%。“俄国报”的算法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錯誤的。实际上，工資並沒有提高那么多，而物价涨得还要多些。

但，現在，我們不來糾正“俄国报”的錯誤。我們还是来看一下它的数字。

^① 見本卷第249—250頁。——編者注

“俄国报”写道：“……这些数字根本没有证明工人赢得了什么。而且从他们往往抱怨日子艰苦来看，倒要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未必赢得了什么。”

你看，“俄国报”的论断多么离奇！既然工资没有日用品价格提高得多，那就是说，还要大大提高工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而工人不进行经济斗争，不举行罢工，又怎么能够提高工资呢？“俄国报”难道见过这样的资本家，在日用品涨价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向工人提议提高他们的工资吗？

“俄国报”承认，工资在1906年有了急剧的上升，就是说，由于广泛的、大规模的、世界上空前顽强的罢工斗争，而有了急剧的上升。但是，物价在1905年以前就涨了。譬如，从1903年起，粮价就未下降过，而一直是上涨的。从1901年起，畜产品的价格就未下降过，而一直是上涨的。

这就是说，工人只是通过罢工斗争才使工资随着粮价和其他物价的上涨也开始有所提高。如果说工资提得还不够高，“俄国报”也承认这一点，那就需要继续提高。

载于1912年8月21日

“真理报”第96号

署名：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取消派和“統一”⁷⁴

最近出版的“涅瓦呼声报”第7号，只能說是疯狂叫囂。几乎有两頁的篇幅，本来應該登載工人的新聞，却用来对“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进行恶毒謾罵。可笑的是，这种謾罵是在高喊工人階級的“統一”和选举运动的“統一”的口号下进行的。

我們要回答取消派說：先生們，工人階級的統一是一个伟大的原則。但象你們那样，一面叫喊“統一”，一面又把自由知識分子取消派集团的政綱和候选人强加到工人階級头上，真是可笑极了。

“真理报”用确切的数字証明，“取消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在自由派知識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真理报”1912年8月1日第80号^①）。現在，8月17日出版的“涅瓦呼声报”第7号，就咒罵“真理报”的这些文章，說这些文章是“小品文式的”、“赫列斯塔柯夫式的”，等等。不过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連“涅瓦呼声报”也不打算否認，那就是“真理报”在半年內募集了604次工人集体捐款，而取消派報紙总共才募集到15次。

从这里，除了証明呼喊、叫囂、咒罵和宣揚統一，都不过是为了掩盖取消派在工人階級中軟弱到了极点以外，难道还可以得出别的結論来嗎？

^① 見本卷第185—189頁。——編者注

不管“涅瓦呼声报”怎样咒罵我們，我們还是要心平气和地向工人指出确凿的事实。請看“涅瓦呼声报”第7号上列举的七八两月“为增加报纸經費”（直截了当地說，是为了恢复由于得不到工人群众的支持而停刊的取消派报纸）募集的捐款。这些捐款的报表載明：募集52次，共827卢布11戈比。其中仅有两次是集体捐款：一次是“莫斯科倡导小组”，35卢布，另一次是“巴黎的一些朋友”，8卢布54戈比。其余的50次个人捐款，有35次共708卢布，就是說，每次平均捐款20多个卢布。

讓“涅瓦呼声报”去老羞成怒，破口大罵吧，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倡导小组”是从工人阶级政党分裂出去的取消派集团，这是人所共知的。就連普列汉諾夫在1912年4月，也公开地直截了当地承認过。

分裂出去的取消派集团用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捐款，恢复了自己的报纸，来同工人报纸展开斗争了！！这个集团还叫喊什么“統一”。这怎能不使人好笑呢！

載于1912年8月24日

“真理报”第99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談談“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对于布兰克、科罗勃卡、庫斯柯娃之流先生們攻击工人报纸的自由派的卑劣的謾言，給了严厉的但完全是应得的反击。

尽管对“抵制工人的先生們”的答复已經十分完备，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則問題須要探討一下。布兰克和庫斯柯娃之流先生們极力用愚蠢的謊言来抹杀和模糊這個問題。但我們不允許掩飾原則問題，我們要揭示出这些問題的全部意义，把每个觉悟工人都关心的意見分歧的根源，从布兰克和庫斯柯娃之流的大量歪曲、誹謗和咒罵中挖掘出来。

其中一个根源可以用“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語来表达。你們只要听听取消派的孤独的但又坚定的声音，听听在党派关系上不十分明确的公众的意見，你們往往就会看到，他們对“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的“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即使不是譴責，也要搖一搖頭，不以为然。

我們就来研究一下“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这个原則問題。

对“真理报”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指責，首先和主要是由于这样两个情况：(1)不了解在选举运动和目前一般政治运动中的“两个和三个陣营”的問題的實質；(2)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义报纸即工人民主派的报纸現在所处的特殊条件。

我們先談談第一個問題。

所有的自由派都主張兩個陣營的論點：擁護立憲和反對立憲。從米留可夫到伊茲哥也夫，從普羅柯波維奇到馬·馬·柯瓦列夫斯基，都同意這種觀點。不能不看到，兩個陣營的論點是由我們整個自由派的階級本質必然產生的。

從經濟上來看，這種本質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自由派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資產階級是害怕農民群眾的運動，尤其是害怕工人運動的，因為這種運動會限制（在目前，在最近的將來，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還未改變的情況下，就會限制）資產階級的經濟特權的範圍和形式。而資產階級的經濟特權就是在俄國帶來比歐洲多一兩倍利潤的資本所有權。

為了保持這種“俄國式的”超額利潤，就不能允許第三個陣營獨立存在。

例如，資產階級在八小時工作制的條件下，也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統治。而且那時，資產階級的統治甚至會比在十到十一小時工作制的條件下，更徹底，更純粹，更廣泛，更加隨心所欲。但，階級鬥爭的辯證法也就在於，除非萬不得已，出於無奈，資產階級是決不會用八小時工作制來代替穩妥可靠的、習以為常的和可以獲得大量利潤的（奧勃洛摩夫式的獲利）十小時工作制的。

對八小時工作制的態度，也可以說明對上院、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的態度。

資產階級是不會放棄俄國舊有的、穩妥可靠的、習以為常的和可以獲得大量利潤的剝削形式，而完全代之以歐洲式的，也就是完全代之以民主的（因為民主制——請“箴言”雜誌的肝火旺盛的英雄們不要動氣——也是一種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形式的；我

們說，除非萬不得已，出于無奈，他們是不會放棄的。

只有群眾運動達到了一定的規模，發揮了一定的威力，才會形成這種萬不得已的局面。而資產階級為了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極力反對這種運動，也就是反對第三個陣營獨立存在。

從政治上來看，自由派的階級實質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害怕上述社會階層的運動，因為這種運動會斷送資產階級所珍惜的政治特權。自由派害怕民主派比害怕反動派還要厲害。這是1905、1906和1907年的事實一再證明了的。

為了捍衛某一方面的政治特權，就不能容許第三個陣營獨立存在，就要把一切反對派限制在主張立憲或者反對立憲這個公式所反映的這個立場上，而且只能在這個立場上。

這個公式所反映的完全是立憲的立場。這個公式並未超出立憲改革的範圍。這個公式的實質，格烈迭斯庫爾先生在“言論報”沒有附加任何保留意見加以重申的，以及前不久“真理報”加以轉載^①的聲明中，就無意中正確地中肯地表述出來了。

這個公式的實質完全是“路標派”的觀點，因為“路標派”需要的也就是這些，他們宣揚的也沒有什麼不同的東西。“路標派”決不反對立憲，也不反對立憲改革。“路標派”“只是”反對民主派和它對各種立憲幻想的批判。

俄國自由派是相當“狡猾的”政客，他們為了同民主派作鬥爭，不許民主派獨立存在，而自稱“民主派”。這也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自由資產階級通常採取的活動方式：打着民主派的招牌迷惑群眾，使他們離開真正民主的理論和真正民主的實踐。

^① 見本卷第245--246頁。——編者注

而世界各國的經驗，也包括俄國的經驗在內，無可爭辯地證明，只有這樣的實踐才會取得真正的進步，而自由派由於害怕民主派，由於遵循路標派和格烈迭斯庫爾之流的理論，必然會一籌莫展，就象 1861—1904 年的俄國自由派和 1849—1912 年的德國自由派一籌莫展一樣。

第三個陣營民主派陣營，了解到自由派的局限性，沒有他們那種不徹底性和不果斷性，不象他們那樣動搖不定和畏首畏尾，這個陣營如不經常地、一貫地、接連不斷地對自由派進行批判，就不會形成，也不會存在下去。

如對這種批判採取輕視的或敵對的態度，把這種批判說成是“吃掉立憲民主黨人”，這就正是有意無意地宣揚自由派的觀點。因為實際上，從問題的提法就可以看出，對立憲民主黨的整個批判本身，就是對反動派的批判，對右派的批判。“涅瓦明星報”第 12 號^①說得十分正確：我們同自由派的論戰“是比同右派的鬥爭更為深刻的更有內容的鬥爭”^②。

事實上，俄國平均一百種自由派報紙，未必會有一種馬克思主義報紙，因此說我們“夸大了”對立憲民主黨人的批判，簡直可笑；為了用明確的自覺的反自由派的民主派情緒來代替社會上和人民

① 見本卷第 112 頁。——編者注

② “言論報”反對這種說法：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右派還情願援引“真理報”來反對“言論報”呢？“言論報”在這裡，把意思曲解了，如果右派給“真理報”的自由比給“言論報”還多，那就正是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重大理由了。但誰都知道，事情恰恰相反。我們報紙的自由比“言論報”要少百倍，穩固性要差千倍，“憲法”保護要少萬倍。任何一個有點文化的人都清楚，“俄國報”和“新時報”拿“真理報”來奚落“言論報”，而他們對“真理報”是要扼殺，對“言論報”只是埋怨和謾罵而已。這是“兩個重大的差別”。

中間占主導地位的“一般反對派”的情緒，我們連要做的百分之一都還沒有做。

沒有這種“更替”，在俄國，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麼明智的有益的結果。

對“吃掉立憲民主黨人”的譴責，或對“吃掉立憲民主黨人”報以輕蔑的冷笑，都不過是 *façon de parler*^①，宣揚自由派觀點的一種方式，至於向工人談論這些或談論工人的時候，那就恰恰是宣揚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觀點的一種手法。

如果從多少徹底的、經過考慮的取消派的觀點來看，對“吃掉立憲民主黨人”的譴責是可以理解的，並且是必然的。這種譴責恰恰反映了取消派的本質。

只要看看取消派的一切觀點，這些觀點的內在邏輯，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和互相依賴關係，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些觀點就是：“結社自由”是立憲改革；“政治活躍”（如此而已！）與經濟罷工相結合；把富有遠見的競選政綱說成是“發瘋”；把任務表述成為黨的公開而鬥爭，也還是爭取立憲改革；把俄國的政權說成已經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拉林），說工商業資產階級已經是統治階級；對工人說，“只要”抓住專制制度與立憲制度的矛盾就行了（馬爾托夫）。

整個說來，這就是改良主義，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一套觀點。問題決不會因為張三或李四在維護這些觀點（其中某一部分，因為取消派正處在“日益增加的任務的增加過程中”）的同時，又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有所改變。

問題不在於他們的善良願望（如果他們有這種願望的話），而

① 玩弄辭藻的一種手法。——編者注

在于他們的政策客觀上起的作用，即在于这个政策 *cui prodest* (对誰有利)，实际上帮助誰。

这是在自由派同右派进行“斗争”(或者爭吵)的基础上，来捍卫工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建立民主派的反自由派的削弱右派的基础而斗争。取消派站在工人一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把工人利益理解成在自由派答应建立的这个俄国范围内，而不是在民主派不顧自由派而在昨天已經建立的和明天(今天也在用看不见的方式建立)将要建立的那个俄国范围内，来捍卫这些利益的。

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新俄国还没有，还没有建立起来。工人是在米留可夫与普利什凱維奇之流正在建立的这个俄国，建立自己“阶级的”(其实是行会的)障地，还是自己动手，按照自己的方式，根本不要普利什凱維奇之流，不顧米留可夫之流，来建立新俄国呢。

这个新俄国不管怎样都是资产阶级的，但从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政策(土地政策和非土地政策)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政策，是有“相当可观的距离”的。

俄国目前这个时期的全部实质，就是确定这个距离的长度。

我們說“不顧米留可夫之流”。这个“不顧”，也就是“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因此，我們决不害怕这个字眼，我們不論現在和将来都要从原則上“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分鐘也不忘記工人阶级既要反对米留可夫，又要反对孙中山們的特殊任务。

对“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譴責，不过是(有意无意都是一样)要工人在建立新俄国的时候，跟着米留可夫之流跑，而不要率領俄国的小孙中山們去反对米留可夫之流……

我們还要簡單談一下說“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所忽略了

第二個情況。

他們說：為什麼不正面發揮自己的觀點呢？為什麼要過分地進行論戰呢？說這種話的人的論斷似乎是這樣：我們並不反對與立憲民主黨迥然不同的特殊路綫，我們並不反對三個陣營，我們只是反對“用論戰代替政治”，以至於把取消派一位朋友的這個尖酸字眼也搬出來。

要回答說這種話的人並不困難：第一、新的觀點只能通過論戰來發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同自由派的觀點相比，不論是從出現的時間，還是從傳播的範圍來說，都是新的）。第二、“涅瓦明星報”和“真理報”現在活動的這個場所，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場所。如果把這個場所看得超出這個範圍，那就錯了：這僅僅是理論上的《A b c…》^①，起碼常識，理論入門，只是指明工作方針，還不是工作本身。

馬克思主義者由於“某些客觀原因”，在上述場所，不能“從正面”作出自己的實際結論。因此，夸大這一場所的作用，就會犯取消派的錯誤。這裡，頂多也不過是指出方針，並且只能用批判立憲民主黨人的形式指出來。

“新時報”和“庶民報”⁷⁵為了奚落立憲民主黨人，把情況說成這樣：你看，人家要吃掉你們立憲民主黨人了。“言論報”由於某些十分明顯的原因，裝做贊同這種“解說”。科羅勃卡和庫斯柯娃之流，有的由於極端愚蠢，有的由於十足的“立憲民主黨人的奴才氣”，也裝成這個樣子。

但，凡是政治上能夠分辨是非的人都很清楚，從批判立憲民主

^① 拉丁字的頭幾個字母。——編者注

党人的每点都可看出，馬克思主义者“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只是指出另一个“反对派”的方针，如果我可以这个不太恰当的字眼的話。

当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由于卡拉烏洛夫的“拜神派”的演說而“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就不能發揮自己正面的观点。但任何一个有見解的人都会明白：当民主派是拜神派的时候，就不可能是民主派。

当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由于格烈迭斯庫尔的演說而“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他就不能發揮自己正面的观点。但任何一个有見解的人都会明白：当民主派同意格烈迭斯庫尔的观点的时候，就不可能是民主派。

当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們要把我們所以“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所有問題都这样列出来，那永远也沒有个完。仅仅举出这样两个例子，就足以說明我們对第二个情况的論点：对吃掉立宪民主党人的譴責是認為某种場所就等于一切場所这个庸俗的、有害的、恶劣的偏見的表現形式。

可是，我們还是要“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而这也正是为了同这种有害偏見进行斗争。

載于1912年8月26日

“涅瓦明星报”第23号

署名：克·斯一基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工人和“真理报”

“真理报”已经把半年来的活动总结了一下。

这个总结首先并主要表明，只是由于工人自己的努力，由于他们斗争的热情、坚决和顽强精神大大提高，由于四五月的运动，彼得堡的工人报“真理报”才能问世。

“真理报”在这个总结中，开头只是列举了工人为工人日报集体捐款的数字。这些数字向我们说明的只是工人的一小部分援助，从这些数字还看不出工人更宝贵、更困难的援助，也就是精神上的援助，例如亲自参加工作，支持报纸的方针，提供材料，进行讨论，为报纸进行宣传，等等。

但，就是“真理报”掌握的这些有限的材料就已表明，数目相当可观的工人团体与“真理报”有直接的联系。现在，我们来大致看一下这个统计材料：

为“真理报”捐款的工人团体数

1912年1月.....	14
1912年2月.....	18
1912年3月.....	76
1912年4月.....	227
1912年5月.....	155
1912年6月.....	34
1912年7月.....	26
1912年8月(至19日).....	21
总 计.....	551

一共有 551 个工人团体为“真理报”捐了款。

如果把工人许多其他方面的捐款数字统计一下，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真理报”上经常看到为支援某次罢工的捐款报表。我们看到为“受害者”、“连纳受难者”、“真理报”的个别编委捐款的报表，也看到为选举运动以及救济饥民的募捐，等等。

由于这些捐款名目繁多，要在这里做出总结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还很难说，统计数字是不是能把情况反映得令人满意。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名目繁多的捐款显然包括了工人生活的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大部分由于俄国的艰苦生活条件而散居各地的“真理报”读者，如果把工人捐款的报表跟俄国各地职工的来信联系起来观察一下，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各行各业和各个地区的无产者在怎样进行斗争，怎样觉醒起来，捍卫工人民主派的利益。

工人生活新闻一栏在“真理报”上刚刚开始开展和加强。毫无疑问，今后，除了揭露工厂的营私舞弊，报道新的无产阶级阶层的觉醒，报告为工人事业的某一方面的捐款情况的来信以外，工人报纸还会收到有关工人的见解和情绪、选举运动、工人初选代表的选举、工人在读什么以及他们对什么问题特别感到兴趣等等的报道。

工人报纸是工人的讲坛。在这里，要向全国接二连三地提出工人生活中的以及工人民主派的问题。彼得堡的工人开了一个头。俄国无产阶级对彼得堡工人经过灾难深重的年月以后，办起第一个工人日报的努力，应当表示感激。我们一定要继续他们的事业，同心协力地支持和发展首都的这份报纸，因为它是预报工人组织及其创办的工人报纸将要布满全俄罗斯的明媚春天即将来临

的第一只燕子。

我們工人要建立一个俄国，我們一定会建立一个俄国。

載于1912年8月29日

“真理报”第103号

署名：斯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从前和现在

18年前，在1894年，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刚刚开始以崭新的、群众性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光辉照耀的形式出现。

70年代只触动了工人阶级的少数领导者。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当时就已显示出，他们是工人民主派的伟大活动家，但是群众还没有觉醒。只是到了90年代初，群众才开始觉醒，从而整个俄国民主运动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光荣的历史时期。

很遗憾，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小小的对比，谈一下工人运动的一种表现即经济斗争和经济“揭露”的一个方面。

当时，在1894年，只有少数先进工人小组热烈讨论提供揭露工厂内幕的材料的计划。当时，工人自己要向自己同伴说句有分量的话，指出资本家无法无天的罪恶行为，那真是凤毛麟角了。至于公开谈论这些东西，那就更谈不上了。

但是，觉醒过来的工人群众学会了抓住他们了解到的揭露工厂内幕的材料，尽管他们曾经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罢工斗争开展起来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其他更高级的斗争形式之间的联系无法抑止地增多了。俄国民主派的先进部队觉醒了，——才过了10年，它就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俄国正因为有了这支力量，旧的外壳才被冲破。

谁要是还记得彼得堡的先进工人最初在1894年向群众揭露

工厂内幕的材料，并把这些材料同“真理报”的揭露工厂内幕的材料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大有裨益的。对工人斗争的一种表现的这个小小的比较，会鲜明地显示出工人斗争的整个规模的扩大，它的广度、深度及其威力等等的提高。

当时，只有那么五六种揭发工厂内幕的材料，印成几十份，由工人秘密散发。

现在，每天都有几万份“真理报”，有几种属于各种劳动部门的揭露工厂内幕的材料。

当时，只有那么五六个所谓“小组”，在某个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当然是秘密讨论工厂制度，决定须要“公布”的条款。

现在，有千百个自发成立的工人小组，在讨论自己的迫切需要，自动地带着自己的信件，自己的揭发材料，自己的要求反抗和联合的呼吁书，到“真理报”编辑部去。

只不过18个年头，工人就从最初的一线光芒，从极胆怯的开端，走上了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很遗憾，我们只能把揭露工厂的情况比较一下。但是，这种比较就已证明，走过的道路有多么伟大，这条道路要导向什么目标。

18年，对负有解放人类这一最伟大的世界任务的整个阶级来说，是个不长的历史时期。

这条道路的一大半是在摸索中走过的。现在已经找到路了。更勇敢地更协调地前进吧！

载于1912年8月30日

“真理报”第10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国际法官代表大会

現在，在維也納，正在舉行國際法官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德國法學家第三十一次代表大會。

這些身為高官的代表的演說，反動氣焰極為囂張。資產階級的法學家和法官先生們公然反對人民參加審理案件。

現代國家所採取的這種參加的形式主要有兩種：（1）陪審法庭；這種法庭只能判罪；判刑和審理案件，只能由專職法官來決定和領導；（2）陪審員法庭；這種陪審員同我們的“等級代表”一樣，在參與解決一切問題當中，與專職法官有同等的權利。

於是，各立憲國家的“開明”法官就聲色俱厲地發表演說，反對人民代表參加審理案件的一切作法。有一個代表，叫埃爾斯納，他就猛烈抨擊陪審法庭和陪審員法庭，說這種法庭會“在行使法律方面造成無政府狀態”，他主張用法官的不更換制來代替這種法庭。

我們對這一點要指出，這是用自由派的要求來代替民主的要求，把徹底背叛民主的打算掩蓋起來。人民的代表參加法庭，毫無疑問是民主的開端。要把這一開端貫徹到底，首先就不能對陪審員的選舉加以資格限制，就是說，不能用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年限等條件來限制選舉權。

在目前的陪審員中間，由於把工人排擠出去，往往大部分都是特別反動的小市民。醫治這種不良現象的辦法，就是發揚民主，採

取彻底的完整的民主形式，而决不是卑鄙地背叛民主。大家知道，在建立法庭方面，实行彻底民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一切文明国家所公認的法官民选制。

各个国家以及我們俄国的自由资产者这样热中的法官不更换制，不过是由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农奴主和资产阶级来瓜分中世紀的特权。事实上，不更换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况且对不中用的、漫不经心的、恶劣透頂的法官来说，维护这种不更换制，也是荒謬的。在中世紀，法官完全由封建主和专制制度委任。現在，到了资产阶级有很多机会涌进法官界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不更换原則”（由于大多数“有教养的”法学家都是资产阶级，所以委任的法官多半也必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排斥封建主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在主张法官委任制，排斥封建主的同时，也就排斥了民主。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德雷斯頓的法官金斯堡博士演說的下面一段話。他想談談階級司法，即階級压迫和階級斗争在目前审理案件中的表现。

金斯堡博士有所感慨地談道：“誰要以为人民的代表参加法庭会排除階級司法，他就完全錯了……”

說得很对，法官先生！民主决不排斥階級斗争，而只是使階級斗争成为自觉的，自由的，公开的。但这不是反对民主的理由，而是把民主貫徹到底的理由。

薩克森的一个法官（薩克森的法官在德国以严酷判处工人著称）接着談道：“……階級司法无疑是实际存在的，但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了解的那样，袒护富人，虐待穷人。不是的，階級司法恰恰是相反的含义。我碰到过这样一桩案件。我們三个人审判：我，还有两个陪审员。其中一个公开的社

会民主党人，另一个也是那一类人物。一个罢工工人被控告打伤了一个工贼（这是“一个希望工作的工人”——薩克森的这位法官先生一字不错，就是这样说的），抓住了这个工贼的脖子，喊道：‘我们现在可该收拾你了，你这个该死的坏蛋！’

这样的案件，通常要判4—6个月的徒刑，这还是对这种野蛮行为的最轻惩罚。但，当时，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使被告未能获释。陪审员（社会民主党人）说我了解工人的心理。我就回答他说：我非常了解挨打人的心理……”

援引金斯堡法官的演说的德国报纸在这个地方注了“大笑”二字。法学家先生和法官先生们都笑了。老实说，如果我们听到这位薩克森法官的话，也会忍不住笑起来的。

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个东西，是还会有人妄图从学术上（所谓学术上）来反对它的。但是，只要从实际上提出问题，看一看日常的现象，那末（看吧！）就连这个学说的最疯狂的反对者，都会象薩克森的法官金斯堡先生这样，成为阶级斗争的天才的宣传者。

载于1912年8月30日

“真理报”第104号

署名：伊·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在 瑞 士

我們在7月12日的“真理报”第63号^①上，向讀者叙述了苏黎世6月29日（新历7月12日）的总罢工。我們还記得，这次罢工的解决是与政治組織的領袖的主张相反的。主张罢工的苏黎世所有工人組織的425名代表的集会，用“可耻！”的喊声回答了反对罢工的印刷工人的声明。

現在，报刊上出現了揭穿这种机会主义的材料。

看来，瑞士工人的政治領袖的机会主义已經到了直接背叛党的地步。瑞士和德国工人的优秀刊物正是用这种尖銳的却是公正的字眼來說明現任苏黎世市政局（市政管理局）委員的那些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的。苏黎世市政局为了維護資本家，禁止了罢工糾察队的活动（当时，工人决定用举行一天总罢工来表示抗議）。

苏黎世市政局有9个委員，其中4个是社会民主党人：爱利斯曼，普弗呂格，福格尔贊格尔，克勒提。

这样，現在就很清楚，禁止糾察队活动是市政局一致通过的，也就是說，爱利斯曼和他的三个社会民主党同事也投了贊成票!!!

^① 見本卷第148—150頁。——編者注

苏黎世邦政府要求市政局禁止所有糾察队活动，而四个所謂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的机灵的梭子魚，提出了只禁止已經停工的两个机械作坊附近的糾察队的“調和”建議。

当然，事实上，这种部分禁止糾察队的办法也正是資产階級所要求的；于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建議就被市政局資产階級多数通过了！

不仅如此，不久以前，苏黎世市政局还发表了与总罢工有关的事件的报告。資本家为了进行报复，宣布同盟歇业3天。苏黎世市政局在4个社会民主党委員全都参加下，一致通过一个决定：为了維持秩序，必須召喚軍隊来支援警察。

这还不够，資产階級的苏黎世市政局还对曾經参加罢工的城市企业的职工，进行了一系列的疯狂迫害。市政局开除了13个工人，給116个工人以紀律处分（降职减薪）。市政局的这些决定也是在爱利斯曼及其两个同事的参加下，一致通过的。

爱利斯曼及其同伙的行为也只能說是叛党。

假如瑞士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要在工人面前，批判把机会主义叛徒保留在自己队伍里面的社会党，并且取得一定的成就，就没有什么奇怪了。爱利斯曼之流的叛变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就是因为他們的叛变向我们鮮明地表明了，工人运动内部分裂的危險是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的。

爱利斯曼之流决不是通常投到敌人方面去的普通逃兵，他們不过是平庸的市民，是滿脑子立宪民主幻想的、习惯于議会的“鷄毛蒜皮”的机会主义者。階級斗争的紧急关头到来了，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国”的幻想都立即化为泡影，担任市政局委員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些庸夫俗子就张皇失措，滾到泥潭里去了。

觉悟的工人从这个可悲的事例可以看到，在工人政党中散布机会主义思想会得到什么结果。

载于1912年8月31日

“真理报”第105号

署名：普·普·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僧侶和政治

大家知道，目前，政府正在作最后的努力，在这次选举中，把整个僧侶阶层推到第四届国家杜馬里去，把他們組成完整的黑帮势力。

最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不論是执政的十月党人资产阶级，还是反对派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都激憤地竭力揭露和譴責政府的这个計劃。

俄国商人和自由派地主（更确切些說，自由主义化的）担心无恶不作的政府会由于“物色”到百般順从的老爷們的选票而有所加强。不言而喻，民主派在这一点上的反对派立場（說得婉轉些，不那末确切），要比自由派坚决得多。

我們已經在“真理报”上指出了自由派对僧侶問題的非民主的提法；他們不是为僧侶“不干預”政治的反动透頂的理論公开辯护，就是同这一理論妥协^①。

对选举法和选举的最小的伪造，民主派都要无条件地表示反对，但他无条件地主张直接地公开地吸引各种宗教的最广泛的僧侶群众参与政治。僧侶不参加政治斗争，是危害最大的騙局。事实上，僧侶总是秘密参与政治的，僧侶轉为公开参与政治，对人民

^① 見本卷第218—219頁。——編者注

只会有利。

最近在“言論报”上发表的前主教米哈伊尔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这位作者的观点十分可笑；比如他说，“俄国的教权派对（我们）俄国来说，是陌生的”，革命前，它（僧侶）的事情只是天国的事情，等等。

但是，这位看来知識渊博的人士对一些事件的实际估价是很有裨益的。

米哈伊尔主教写道：“……选举的胜利不会是教权派的，这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了。联合起来的（虽然是人为地）同时当然由于对自己的选票和良心的这种控制而受到侮辱的僧侶，要处于两大势力之間……因此，就必然要发生轉折、危机，又同人民成立自然联合。如果教权派这个反动派別……自己能够巩固和成熟起来，也許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现在，当僧侶还带着过去叛乱的余孽动起来的时候，他們就会繼續自己的历史。而僧侶的民主是这个历史的必然的最后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同僧侶争取自己地位的斗争联系着的。”

实际上，不應該說“重新成立自然联合”，象作者可笑地認為的那樣，而應該說在进行斗争的各个階級之間的實力分配。吸收僧侶参与政治，一定会使这一分配明确起来，广泛起来，有自覺性。

这些知識渊博的觀察家承認，就連僧侶这样一个俄国社会阶层，都有“过去叛乱的余孽”，而且富于生命力，还相当牢固，——这一事实就特別值得注意。

載于1912年9月1日

“真理报”第106号

署名：伊·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

臭名昭著的“路标”文集，在一心想要叛变的自由资产阶级人士中间，受到了热烈欢迎，而在民主派中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还没有得到深刻的评论。

这一部分是由于“路标”文集受欢迎的时候正好是民主派的“公开”报纸几乎完全被封闭的时候。

现在，舍彼帖夫先生在“俄国思想”杂志⁷⁶（8月份）上又发表了“路标主义”的再版。这从由叛徒的首领彼·别·司徒卢威先生担任主编的路标派刊物来说，是很自然的。但从民主派，特别是从工人民主派来说，如果他们现在把欠“路标派”的债，哪怕只偿还一小部分，也是很自然的。

舍彼帖夫先生以普通的“法国来信”的形式，谈了侨居巴黎的俄国人。但这个普通形式所包含的实际上是对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及对俄国民主派的完全明确的“讨论”。

这个路标派分子写道：“大家都还记得这个人心惶惶的（原来这样！是谁感到人心惶惶，可敬的自由派先生？）、动荡不安的、混乱不堪的1905年……”

“动荡不安，混乱不堪”！一个人要有多么卑鄙肮脏的心灵，才

会写出这样的词句。德国 1848 年革命的敌人把这一年誣蔑为“不理智的”一年。“俄国思想”杂志的这位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所反映的也正是这种思想，或者更确切说，也正是这种愚蠢的卑鄙的惊慌情绪。

我们只需举出几个最客观最“普通”的事实，就可以驳斥这个立宪民主党人。这一年，工人的工资比任何一年都增加的多。地租下降。工人（一直到仆役）的各种组织形式空前增多。几百万种廉价的政问题刊物，在俄国，从来没有为人民、群众、大众、“下等人”这样贪婪地阅读过。

涅克拉索夫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所感慨地写道：

……这样的时辰会不会到来？
（快来吧，快来吧，期望的时辰！）
那时候，人民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将不是布鲁赫尔的画像^①，
也不是描写愚蠢贵族的小说，
而是别林斯基和果戈里的作品⁷⁷。

一个俄国旧民主主义者所期望的“时辰”终于来到了。商人不再做燕麦生意，而开始做更能赚钱的买卖——出售民主派的便宜小册子了。民主派的书刊成了市场上的货品。别林斯基和果戈里之所以博得涅克拉索夫和俄罗斯每个正派人的敬重的那些思想，这种市场上的新作品全都具备……

……多么“动荡不定”呵！——当这位自命为有教养的，而实际上是肮脏的、丑恶的、肥胖的、自鸣得意的自由派猪獃，真的看到

^① 布鲁赫尔是普鲁士的将军，参加过 1815 年滑铁卢大战。他的画像在俄国流传很久。——译者注

这些“人民”从市場上买回……別林斯基給果戈里的信的时候，就这样叫喊道。

老实說，这不过是一封“知識分子的”信，——“路标”文集在新时派罗扎諾夫和安东尼-沃倫斯基雷鳴般的掌声中这样宣称。

这是多么可耻的行为呵！——优秀的民粹派中的一个民主派这样說道。这是多么有意义的行为呵！我們这样补充說。这种行为对多情善感地看待民主派問題的人是多好的提醒，它使民主派的一切有生气有力量的东西受到了多好的鍛炼，它把腐朽的奥勃洛摩夫老爷式的幻想打扫得多么干淨！

对自由派失望，这对曾經迷恋过自由派的人來說，是很有好处的。誰只要回顧一下俄国自由派从前的历史，他就会看到，自由派卡維林对待民主派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就是自由资产者的立宪民主党对待俄国民主派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之最恰当的前兆。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已經找到了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說，找到了自己的尾巴。那末現在，俄国民主派难道还不應該赶快找到自己的脑袋嗎？

特別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象舍彼帖夫、司徒卢威、格烈迭斯庫尔和伊茲哥也夫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这帮立宪民主党的家伙們，經常抓住涅克拉索夫和謝德林等人的片言只字来大做文章。涅克拉索夫本人是很軟弱的，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間搖擺不定，但他是完全同情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涅克拉索夫也正由于自己的軟弱，向自由派弹了一些阿諛逢迎的調子，但他也由于自己犯的“罪过”而深深痛恨自己，并且公开表示忏悔：

我没有用竖琴做过买卖，但有时候，
由于执拗的厄运的威胁，

我的手在豎琴上弹出了
不正确的音响……

“不正确的音响”——涅克拉索夫自己就是这样說他对自由派的阿諛逢迎的罪过的。而謝德林是无情地嘲笑自由派，經常用“迎合卑鄙”⁷⁸一語来咒罵他們。

这个短語用到舍彼帖夫、格烈迭斯庫尔之流以及其他^①路标派身上，是过时了！現在，問題根本不是这些先生迎合卑鄙。何止于此！他們是自己發揮自己的首創精神，采用自己的方法，从新康德主义和其他一些时髦的“欧洲”理論出发，創立了自己的“卑鄙”理論。

二

“混乱不堪的 1905 年”，——舍彼帖夫先生这样写道。“一切都是乱七八糟和毫无秩序。”

对这一点，我們也只能从理論上提出几点意見。我們認為，評价历史事件，应当根据群众以及各个階級的运动，而不能根据个别人和集团的情緒。

俄国的絕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和工人。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些居民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和毫无秩序”的呢？完全相反，客觀事实无可辯駁地証明，正是大部分居民进行了空前广泛的卓有成效的整頓，才永远結束了“乱七八糟和毫无秩序”的局面。

在此以前，在“平民”中，受宗法制压抑的分子和民主派分子确实是“乱七八糟和毫无秩序”的。祖巴托夫阴谋和“加邦請願”这些

① 也許有人会反駁說：格烈迭斯庫尔以及米留可夫之流同“路标派”是有爭論的。是的，但即使有爭論，他們也还是路标派。这可參看“真理报”第 85 号（見本卷第 245—246 頁。——編者注）。

客觀事實就証明了這一點。

正是 1905 年一下子就永遠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在俄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能夠這樣十分明確地，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澄清了由於長期的停滯和長期的農奴制殘余而弄得一團混亂的關係。沒有一個時期，能夠這樣清楚“明白”地劃分了階級，顯示了人民群眾，通過千百萬人的行動檢驗了“知識分子”的理論和綱領。

為什麼這些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一到“俄國思想”雜誌的有教養的自由派作家的腦子裡，就遭到這樣的歪曲呢？原因十分簡單：這位路標派要把自己的主觀情緒強加到全體人民頭上。他個人以及他的整個集團——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時完全陷入了“毫無秩序”和“完全混亂”的狀況。他把由於這種毫無秩序以及群眾揭發自由派的一切劣根性而自然產生的不滿，都轉嫁到群眾頭上，嫁禍於人。

自由派在 1905 年 6 月的時候；在 8 月 6 日以後，當他們呼喚人民參加布里根杜馬，而人民實際上沒有理睬杜馬，超出杜馬範圍的時候；在 1905 年 10 月，當自由派不得不“跟着跑”，並宣稱罷工是“光榮”（雖然他們昨天還在反對罷工）的時候；在 1905 年 11 月，當司徒盧威訪問維特這個十分鮮明的事實把自由派的一副軟弱無能的可憐相暴露出來的時候，——在這些時候，自由派的狀況難道實際上不就是毫無秩序的嗎？

如果路標派分子舍彼帖夫願意讀一讀路標派分子伊茲哥也夫關於斯托雷平的著作，他就會看到，伊茲哥也夫也不得不承認，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一屆和第二屆國家杜馬“左右為難”的地位就是“毫無秩序”的。而自由派的這種“毫無秩序”和軟弱無能是必然

的，因為他們無論是在資產階級的上層，或是在農民的下層，都得不到群眾的支持。

舍彼帖夫先生以下面這段高見結束了他對俄國革命歷史的議論：

“但是，這種混亂局面沒有繼續多久，上層人士就慢慢解脫了控制他們的几乎是極度恐懼的情緒，得出了一個並不複雜的結論——一連精銳的士兵比所有革命辭藻都要管用，於是，就進行了‘討伐’，實行了就地正法的法令。戰果完全出乎意料。只有那末兩三年的時間，革命就被消滅得干乾淨淨，以至某些暗探性質的機構都不得不成為偽裝革命的所在……”

對作者的上述論斷，我們即使可以從理論上做些說明，現在也不能做了。我們只能把這些赫赫有名的論斷牢牢地高高地釘到柱子上去，以便永遠可以看到，很遠就可以看到……

可是，我們還可以問一下讀者：十月黨的“莫斯科呼聲報”以及民族主義猶大什克的“新時報”引証舍彼帖夫的高見，並且高興得喘不過氣來，難道還有什麼奇怪嗎？對“立憲民主黨”的雜誌的“歷史”評價，與對上述兩種報紙的評價，難道還有什麼區別嗎？

三

舍彼帖夫先生這封信絕大部分是描述僑民生活的。要想找到類似的特寫，就要到卡特柯夫時期的“俄羅斯通報”⁷⁹里去挖掘，從那里可以找到描寫高貴的貴族首領，心地善良的心滿意足的農夫、貪得無厭的惡棍、壞蛋以及革命怪物等等的小說。

舍彼帖夫先生是以一個仇恨民主派的庸人的眼光來觀察（如果觀察了的話）巴黎的；當大量的民主派書刊在俄國剛一出現時，這種庸人只能看到“動蕩不定”。

誰都知道，每個人在國外都可以看到他要看的东西。或者是每個人在新的環境中看到自己本身。黑幫分子在國外看到的是最好的地主、將軍和外交官。密探在那里看到的是最高尚的警官。俄國的這位自由派叛徒在巴黎看到的是心地善良的女看門人和“能干的”^①店鋪掌櫃，他們在教導這位俄國革命家說，他們的“人道主義和利他主義情感”“已把個人要求過分壓抑下去，並往往使我們全國的普遍進步和文化發展受到損失”^②。

一個仆役最感興趣的自然是在仆役間的造謠誹謗和大吵大鬧的氣氛。在巴黎的講演會上和巴黎的俄文報刊上所探討的各種思想問題，店鋪掌櫃和看門仆役當然不會去注意。他怎麼會看到例如這種報刊1908年就提出了六三政制的社會實質問題，民主運動中的新流派的階級根源問題，等等^③，而在很久以後，這些問題在加強的暗探機關“所保護的”報刊上被大肆歪曲（截頭去尾）了呢？

一個店鋪掌櫃和仆役，不管他穿上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服裝，只要是這樣的心灵，就不會發現和理解這些問題。即使這個仆役自稱是自由派雜誌的“政論家”，這位“政論家”也要以沉默的態度迴避這些除了巴黎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公開明確提出的重大思想問題。可是，這位“政論家”會把他所熟悉的仆役間的东西，詳細告訴你的。

最高尚的司徒盧威先生所辦的雜誌的這位高尚的立憲民主黨人會告訴你說：從“一個在巴黎很有名望的女革命家的房間”，“在並不是沒有警察的協助下”，攆走了一個不幸的外僑妓女；在為救

① 舍彼帖夫先生的文章第139頁（“俄國思想”雜誌1912年第8期）。

② 同上，第153頁。

③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5卷第243—255頁。——編者注

济举行的舞会上，“失业者”又吵了起来；一个抄写員在舍彼帖夫先生熟悉的一幢房子里，“預支了一大笔錢，以后就玩忽职守了”；侨民“都是十二点起床，夜里两三点鐘才睡，整天都是接待客人，吵吵嚷嚷，爭論不休，烏七八糟”。

所有这些情况，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先生的仆役杂志，可以給你講得非常詳細，列举事例，添油加醋，头头是道，講得决不比“新时报”的緬施科夫和罗扎諾夫差。

“拿錢来，不然就賞你一个嘴巴，——上等侨民和下等侨民之間的关系已經采取了这样截然分明的敌对形式。誠然，这种說法还没有流传开来，‘低层的极端派’”（这位有学問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司徒卢威先生的杂志上就是这么写的！）“总共才有一二十个极可疑的分子，就是这些人，也可能是受了巧手的指使……”

讀者，請你研究一下这个論調，考虑一下普通仆役和仆役政論家还有什么不同。普通仆役——当然是其中的大多数，少数已經有了階級观点，正在想法摆脱仆役地位的觉悟分子除外——是幼稚的，缺乏教养，大部分是文盲，不开化；由于他有喜欢唠叨的幼稚怪癖，如果他总是叨咕他最容易吸收，最容易理解和接近的东西，那还情有可原。仆役政論家却是“有教养的”人，是被当做贵宾接待的人物。他知道，刑事敲詐分子在侨民中是为数不多的（几千个侨民才有“一二十”个）。他甚至知道，这些敲詐分子“可能是”受了“巧手的指使”，受了俄罗斯人民同盟的茶社的指使。

仆役政論家知道这些，于是，他就“以有教养的姿态”行动起来。你看，他是很会消灭痕迹，給人好看的看的！他不是黑帮的卖身投靠的作家，根本不是。他甚至“自己”指出，可能有人在指使10几个敲詐分子，但同时，他講的也正是这些敲詐分子、吵架以及

玩忽职守的抄写員等类事情!

新时派对“俄国思想”杂志的“作者”的教育并不是徒然的。新时派分子苏沃林吹嘘說,他从来沒有領过津貼,——他只是“自己会”說好听的。

“俄国思想”杂志沒有領取津貼——老天在上!它只是“自己会”說新时派和古契柯夫式的“干才”喜欢听的东西。

四

是的,侨民是有很多苦衷的。在灾难深重和暂时沉寂的年代,正是在他們中間,而且只是在他們中間,提出了整个俄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他們比其他人要艰苦一些,貧困一些。在他們中間,自杀的比重特別大,神經完全錯乱的人的比重真是大得惊人。受尽折磨的人怎会不是这样的呢?

侨居国外的不同的人,他們的兴趣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感兴趣的是公开提出一些最重要的原則性的政治問題,有些人感兴趣的是議論舞会上的丑聞,不好好工作的抄写員,女看門人和仆役如何不滿意侨外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喜好。

可是,如果你能尝尝痛苦的、使人厌倦的神經失常的侨外生活的味道,再来考虑一下舍彼帖夫、司徒卢威、戈洛文、伊茲哥也夫之流先生們的生活,你就不禁会說:我們沒有加入这个“正派人”的社会——如果有人加入这个社会,他們是会双手欢迎的——該是多么幸运呵!

在这个“正派的社会”里,大概是不会有什么丑聞的。妓女差点沒有闖进这些先生的房間,成为他們的同道。不会的,她們住在别的房間。

失业者是不会到这些人士的舞会上去鬧的。他們的舞会秩序井然。他們是分开来的：失业者中的妓女在一个房間，舞会在另一个房間。即使他們雇用抄写員，也絕不会鬧出抄写員預支一笔錢，甚至于玩忽职守这样荒唐的事来。

他們决不会为錢鬧起来。他們的周围沒有人挨餓，痛苦，神經失常，打算自杀。即使百万金錢，今天同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科学界”，明天同戈洛文先生之流的代表头衔，后天又同馬克拉柯夫先生之流的代表头衔和辯护师头衔⁸⁰，“握手言欢”，这又有什么丑聞可談呢??

这一切都好极了。即使是司徒卢威、格烈迭斯庫尔、舍彼帖夫之流先生們的反民主派作品，使列布申斯基等人感到滿意，那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司徒卢威是沒有領取津貼，他是“自己”說好听的話的！誰也不能說，“俄国思想”杂志是列布申斯基之流先生們的姘头。誰也不会想到要把布列申斯基之流先生們从某些“政論家”那里得到的滿足，同从前的地主讓农奴的女兒給自己捏脚所得到的滿足来加以比較。

的确，即使是司徒卢威先生或是格烈迭斯庫尔、舍彼帖夫等先生反映了自己信念的文章和言論，給仇恨俄国革命的商人和地主捏了脚，那又有什么不对呢？

即使是前任代表戈洛文先生办了获利的租讓企业，那有什么不好呢？他是已經辞去了代表职务的啊！！就是說，在他当代表的时候，租讓企业还未建立，刚在筹备。当他接收租讓企业以后，就不当代表了。这事情很干淨，这不是很明显嗎？

只有誹謗分子才会公然指責馬克拉柯夫，这不是很明显嗎？因为正象他自己在“言論报”上的信中宣称的那样，他为塔吉也夫

辯護，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辦事的！毫無疑問，任何一個巴黎的女看門人，任何一個巴黎的店鋪掌櫃，都決不會從這些可敬的立憲民主黨人士的生活方式和行動中，發現什麼而且根本不會發現什麼不體面的不象話的丑事來的。

五

舍彼帖夫先生的一般原則性的論斷，值得全部摘錄下來：

“直到目前，特別是在搞革命工作的人中間，人道主義和利他主義的情感已經把個人要求過分壓抑下去，並且往往使我們全國的普遍進步和文化發展受到損失。對‘社會利益’和‘全民福利’的嚮往，使人過分忘掉自己，忘掉自己個人的需要和要求，以至於社會情感和嚮往本身也不能通過真正（!!）創造性的完全自覺的工作得到實現，結果必然採取自我犧牲的消極形式。而且不僅在這方面，就在最平常的關係方面，個人要求也往往受到各種壓抑，這一方面是由於‘病態良心’常使渴望立功和自我犧牲的心情達到頂峰，另一方面是由於對我國極低的文化水平所決定的生活本身不夠重視。結果，往往產生雙重人格，經常感到自己生活得不對頭，甚至覺得是‘犯罪’，總想犧牲自己、去幫助無產者和受壓迫的人、最後進入‘死亡者的行列’——這一事實在我國著作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非常鮮明的反映。

這些東西，在法國人民的觀點和習俗中，是看不到的……”

這就是對“言論報”毫無保留意見加以刊登的，而當“言論報”想要忘掉的時候，“真理報”（第85號）又加以提醒的格烈迭斯庫爾先生的那些政治性的綱領性的聲明的說明。

這就是“路標”文集的續編和再版。通過這個論斷，可以而且應該一再深信：“路標派”只是表面上向“知識分子”開火，而實際上是向民主派開火，完全背叛民主派。

現在，在選舉期間，應當特別強調“路標派”、格烈迭斯庫爾和“言論報”的一致，因為立憲民主黨人正在竭力玩弄民主，企圖掩蓋

和抹杀政治上的一切真正重大的根本原则性的问题。民主派的一个当前实际任务,就是在选举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向尽量广泛的群众说明舍彼帖夫之流先生们以及所有路标派分子的言论的内容和意义;“言论报”和米留可夫之流企图推脱自己对“俄国思想”杂志应负的责任(尽管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是立宪民主党党员),那就揭穿他们的虚伪。

格烈迭斯库尔和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同路标派进行“争吵”、“论战”,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是把整个立宪民主党同“路标派”的根本原则上的一致掩盖起来的圈套。难道在上列引文的基本论点,真的能够发生“争吵”吗?难道对这样宣扬坚决背叛一切民主派的基本原则不负任何责任,能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留在一个党内吗?

谁要愿意 à la^①“路标”派这样,用“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等等针锋相对的术语提出问题,他就把问题模糊了起来。这些话的政治含意十分清楚:这是转到反对民主派的方面去,转到反革命的自由派方面去。

应当了解,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从这里就应该就明确划分民主派和自由派的界线问题,从政治上作出必要的结论。不懂得这些道理,不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这些道理,就根本不能真正前进一步。

载于1912年9月2日和9日

“涅瓦明星报”第24、25号

署名:弗·伊·

按“涅瓦明星报”原文刊印

① 象。——编者注

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派的一致

在我国，人们总爱把选举运动看作是争代表，即争杜马席位的斗争。

在有觉悟的工人看来，这个运动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为了宣传原则即宣传基本观点和政治信念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群众面前进行，并且能够把群众吸引到政治生活中来，这就是代议制的一个主要优点。

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在回答我们提出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和平”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这些原则问题的时候，回避对实质的争论，总是到处埋怨我们似乎“吃掉立宪民主党人”。

然而，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派对俄国生活的最重要问题的看法，在原则上是非常一致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已经出版。这份杂志是由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主编的，撰稿的有立宪民主党人伊兹哥也夫、谢韦里亚宁、加利奇和其他许多人。

阿·舍彼帖夫先生在这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以“在巴黎的俄国人”为题的诽谤革命和革命者的卑鄙的黑帮文章。“新时报”立刻跟着“俄国思想”杂志唱起来，摘引其中许多“妙论”，并且乐得喘不过气来，光喊：“瞧，这些可怜的人类的代表（即“俄国思想”杂

志笔下的革命者)居然想当俄国生活的革新家。”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报纸“言论报”对我们是怎样说的呢？是说这与选举也就是与争席位的斗争“无关”呢？还是说它对“俄国思想”杂志“不负责”，也就是说党对自己的党员，任何一次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都没有谴责过的党员不负责呢？

让“言论报”去支吾搪塞吧，让无原则无骨气的家伙怀疑我们“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吧，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对俄国公民们说，当“立宪民主党人”诬蔑民主派时，请深切注意立宪民主党人的原则而不要那样漠不关心。

请看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舍彼帖夫先生文章中一段不长的、但是最突出的、同时是有原则的而不是造谣中伤的话：

“直到目前，特别是在搞革命工作的人中间，人道主义（即博爱）和利他主义（不顾个人生命的大公无私）的情感已经把个人要求过分压抑下去，并且往往使我们全国的普遍进步和文化发展受到损失。对‘社会利益’和‘全民福利’（讽刺性的引号是“俄国思想”杂志加的）的向往，使人过分忘掉自己，忘掉自己个人的需要和要求……结果，往往产生双重人格，经常感到自己生活得不对头，甚至觉得是‘犯罪’，总想牺牲自己、去帮助无产者和受压迫的人、最后进入‘死亡者的行列’——这一事实在我国著作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非常鲜明的反映。”（“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第152—153页）

自命为民主派的党，竟容忍这些诬蔑整个民主派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前提、信念和原则的先生们在自己队伍中存在，该多么可鄙。

自由派资产阶级憎恨民主派——“路标”文集过去证明了这一

点，“俄国思想”月刊现在证明了这一点，卡拉烏洛夫之流和格烈迭斯庫尔之流过去也证明了这一点。

自由派本身在自己和民主派中間划了一条界限。

載于1912年9月5日

“真理报”第109号

署名：伊·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論恩·斯·波梁斯基來信

這一號“真理報”上登載的恩·斯·波梁斯基的農村來信，提出了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希望，農民自己能夠更經常地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

我們認為必須指出以下幾點。

恩·斯·波梁斯基說得十分正確，只有“二流子”才會認為鄉會是胡鬧。只有農民自己才能够決定在什麼地方採用什麼樣的土地使用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比較合適。法律和行政當局對農民自由支配土地的任何干涉，都是農奴制的殘余。這種干涉只能使事情受到損害，使農民受到凌辱。

農民出身的工人在“真理報”第38號上發表的信中卓越地指出，這種干涉是多麼荒謬的官僚習氣。

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數千萬長期勞動和長期受剝削的人們應當怎樣看待選擇獨立田莊還是村社的問題。

這些人應當考慮的根本不是選擇獨立田莊還是村社的問題。他們應當考慮的是誰剝削他們，怎樣減輕這種剝削和消滅這種剝削。

例如，在俄國歐洲部分，3萬大地主擁有7000萬俄畝土地，而1000萬貧苦農民也只擁有同樣多的土地。這些農民無論是呆在獨立田莊，還是呆在村社，他們的貧困生活都不會因此有絲毫改

变。如果我一家只有7俄亩坏地，而近邻的地主有2000俄亩好地，那末独立田庄也好，村社也好，结果几乎同农奴制下一样。

有人用独立田庄还是村社、面饼还是菜饼这些话来转移挨饿的人们的视线。而我们现在吃的是水草，住的是沼池或沙滩，还要为使用饮畜场、牧场、耕地而给人服劳役。

有人为了保护大地主想通过独立田庄培养“小地主”。然而千百万元的农民从这里得到的只会更加挨饿。

在西欧，只有 一切农奴制压迫的残余都被彻底消灭的地方，农业才得到真正迅速的顺利的发展。

在农业搞得很好的真正自由的国家，只有一种压迫农民和工人的势力，那就是资本的势力。只有雇佣工人和破产农民结成自由的联盟才会有助于反对这一势力。使耕地、精良的机器、蒸汽和电力为改善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服务，而不是为一小撮百万富翁发财致富的新社会制度，正从这种联盟中产生出来。

载于1912年9月15日

“真理报”第118号

署名：弗尔·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論 政 治 路 綫

“涅瓦明星報”和“真理報”確實具有十分固定的面貌；由於黑幫分子、十月黨人（“俄國報”、“新時報”、“莫斯科呼聲報”等等）和自由派（“言論報”、“生活需要”雜誌等等）對“真理報”和“涅瓦明星報”進行了攻擊，現在不僅工人，而且俄國的所有政黨都已經熟悉了這個面貌。

從選舉運動的角度來看，對上述報紙執行的政治路綫的評價，是有特別意義的，因為根據這種評價必然檢驗出對基本的原則的問題的各種看法。因此，我們想談一下尼·尼科林在“涅瓦呼聲報”第9號上論述“真理報”和“涅瓦明星報”的路綫的文章。正如讀者看到的，這篇文章有不少火氣十足的用語，但是鑒於作者企圖接觸一些重要問題的實質，這一點可以（而且應當）不予介意。

尼·尼科林寫道：“我應當承認，‘真理報’在許多方面令人十分滿意地執行了反映俄國無產階級的願望、需要、要求和利益的任務。可惜，由於對政治現實作了完全盲目的、極不真實的和後果極端有害的描述，它大大降低了自己這個有益工作的意義。”

我們把火氣話撇開不談，只談一談主要的，即對政治現實的描述問題。作者這樣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而且真正是從根本上提出問題，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原諒他的火氣。讓我們就問題的實質展開爭論吧。的確，如果對我國的“政治現實”究竟怎樣的問題沒

有肯定的看法，在实际工作方面就寸步难行。

尼·尼科林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以后，对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真理报’在这方面模仿‘涅瓦明星报’，硬要自己的读者相信，工人阶级应当不顾自由派而建立新俄国。这种呼声当然很神气，但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谁也不能建立新俄国，它是在各种利益互相斗争的复杂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着重号是尼·尼科林自己加的），因此，工人阶级的任务不是拟定那种为了其他人或不顾所有这些其他人而建立新俄国的空想计划，而是在新俄国的范围内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这里，我们可以原谅作者的“火气”，原谅他的不可压抑的怒火，因为他在试图抓住主要的东西。尼·尼科林在这里比许多取消派都公开、坦白、周密地谈到了造成我们深意见分歧的一个最深刻的原因。

“……谁也不能建立新俄国，它是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从这种出色的议论中，谁还听不到全部取消派（甚至广泛些说是全部机会主义者）的音乐的基本的不变的旋律呢？

我们来比较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些议论吧。

如果新俄国是在各种不同利益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阶级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建立新俄国。这真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尼·尼科林的“谁也不能建立新俄国，它是在……建立起来的”这种对比说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从最基本的逻辑来看，这是废话。

但是这种废话有自己的逻辑，即机会主义的逻辑；机会主义企图“按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立场，必然（而不是偶然）犯尼科林的错误。因此也应当谈一谈这种机会主义的逻辑。

誰說某些階級在建立新俄國，誰就是非常牢固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因此不僅尼·尼科林的气話，甚至……甚至“統一的取消派”代表會議，或者不管代表會議怎樣“怒喝”，都不能使他發生動搖。

誰說“誰也不能建立新俄國，它是在……建立起來的”，誰就是從階級鬥爭的客觀主義（即從馬克思主義）滾到資產階級的為現實辯護的“客觀主義”。尼·尼科林從馬克思主義墮落為（他本人並沒有覺察到這一點）機會主義的根源正在這裡。

如果我說，應當根據真理、正義、勞動平均制等等這樣來建立新俄國，這將是一種使我陷入空想的主觀主義。其實，建立新俄國是由階級鬥爭，而不是由我的最良好的願望決定的。我的建立新俄國的理想，只要代表真正存在的、根據生活條件而在一定方面進行活動的階級的利益，就不是空想。既然我站在這種階級鬥爭的客觀主義立場上，就決不為現實辯護，相反地，要指出這個現實本身就包含着改造它的最深刻的（雖則初看起來是不明顯的）原因和力量。

如果我說，“誰也不能建立新俄國，它是在各種利益互相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我就是把某些階級互相鬥爭的明晰圖畫一下子蒙上一層遮布，我就是向那些只看到統治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表面活動的人讓步。我就是不自覺地陷入為資產階級辯護，把最明顯的或者獲得暫時勝利的資產階級方向當做標準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客觀主義。

現在，我們舉歷史上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新德國（19世紀後半期的德國）已在各種利益互相鬥爭的過程中“建立起來”。任何一個有教養的資產者都不反駁這一點，也只限于不反駁這一點。

請看馬克思在建立新德国的最“危急”的时期是怎样說的。

馬克思在1848年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資產階級，同反动派訂立了攻守同盟。”“1789年的法国資產階級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資產階級知道：它的統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創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階級。1848年的德国資產階級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連，沒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貴族。保存封建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結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⁸¹

从馬克思的話中可以立刻看到那些建立了新德国的活生生的階級。

假借“客观主义”而为现实辯护的資產階級学者說，俾斯麦战胜了馬克思，俾斯麦考虑到了“新德国已在各种利益互相斗争的复杂过程中建立起来”。但是，馬克思却“提出了”不願自由派而依靠工人和民主的（不同反动派勾結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来“建立”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空想計劃”。

資產階級学者談得唇焦舌烂的正是这一点。我們如果单从理論方面考察問題，問問自己：他們錯在哪里？他們錯在掩盖和抹杀階級斗争，錯在他們（用了似乎經過深思熟慮的說法：德国已在……过程中建立起来）抹杀真相：俾斯麦的德国是由那个因为“叛变和出卖”而“无力反对貴族”的資產階級建立的。

馬克思根据階級斗争的客观主义异常深刻地正确地了解政治现实，絕不为它辯护，相反地，正是指出了其中那些建立民主德国的階級，指出这些階級甚至在十分有利于俾斯麦的形势下，能够成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柱。

馬克思對政治現實的了解這樣正確這樣深刻，以至在 1848 年，即半世紀前，就對俾斯麥的德國的實質作了這樣的評價：這是“無力反對貴族”的資產階級的德國。在 1912 年選舉時，即在馬克思做了這種評價後 64 年，自由派的行為完全証實了這種評價。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1848 年以來同自由派進行无情的、空前尖銳的、引起自由派一片吠聲的（親愛的尼科林，恕我措詞尖刻！）鬥爭，他們一貫堅持建立大德意志民主國家的“計劃”，然而絕不是什麼“空想”者。

相反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在堅持這個“計劃”、不斷宣傳這個“計劃”、抨擊背叛這個“計劃”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時候，正是培養了孕育“新德國”的新生力量的階級，這個階級由於馬克思一貫的、忠誠的、堅定的宣傳，現在已充分準備發揮自己的歷史作用：不僅當俾斯麥資產階級的掘墓人，而且當一切資產階級的掘墓人。

* * *

德國的史例向我們說明了尼科林觀點中的機會主義的邏輯，他所以怒罵我們“狠狠吃掉立憲民主黨人”，是因為他沒有看到自己怎樣陷到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取消派思想中去了。

尼·尼科林（而且不止他一個！）愈冒火，愈逃避問題，我們作為政論家就要愈清楚愈仔細地向他反復說明，我們同立憲民主黨和取消派鬥爭所根據的理由是經過深思熟慮並且在 5 年多（确切些說是 10 年多）的時間內，一再在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正式決議中確定下來的。尼·尼科林和他所維護的取消派的不幸，就在於他們不能用什么即使是稍微固定的、明確的東西來反對早已做出的這許多確切的、正式的策略決議。

至于說到“工人应当不顧自由派而建立新俄国”，这根本不是什么“傲慢的”空話。尼·尼科林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主张在多数馬克思主义者所承認的許多策略決議中都提出过，实际上，这至少是近10年的俄国政治經驗的簡單总结。在最近10年，俄国的工人階級一直“不顧自由派”而建立新俄国，这是无可爭辯的历史事实。不管俄国那些以俾斯麦自居的人物取得多少暫时的“胜利”，这种“建立”的工作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俄国的曖昧不明的、象游蛇似的机会主义，正如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一样，不能把自己的观点明确地說出来，正式地說工人階級不应当不顧自由派而建立新俄国，而应当做什么做什么。机会主义如果能够做出明白的公开的回答，也就不成其为机会主义了。但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滿工人的政策，表明自己傾向資產階級，机会主义說：“誰也不能建立新俄国，它是在各种利益互相斗爭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然而，从建立起来的东西里面，最明显、最引人注意的，最能获得暫时胜利和“人群”尊敬的，是經過自由派修改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建設”。“由什么階級建立、怎样建立，这还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呢，这是空想；应当分析的是什么呢在建立起来”，——这就是尼科林的議論的真正用意，这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的邏輯”。

这也就是忘記了階級斗爭。这也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原則基础。正是这种“邏輯”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即真正的、彻底的、无私的民主派的領導者的作用貶为自由派的小工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我們俄国人十分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認无產階級政党也要有“独立”路綫，尼科林当然也承認要有“独立”路綫。实际上，他所捍卫的正是不独立的路綫，是

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路綫。

尼科林向我們解釋并指出，宣布工人階級的獨立性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涅瓦呼聲報”第8號上登載的取消派的政綱也宣布過獨立性，尼科林本人也宣布過獨立性，但是就在宣布“獨立性”的同時，他却宣傳起不獨立的政策來了。

尼科林否認工人階級在目前政策上，在民主主義的一切問題上不願自由派而實行自己的路綫（或者說“建立新俄國”），實際上就是號召工人階級做自由派的尾巴。

這就是問題的實質。這就是“機會主義的邏輯”。至于說什麼不應該使工人階級“孤立”，“爭取政治自由的担子不應當放在工人肩上”，需要“統一力量，而不要分散力量”等等，這一切全是空洞的漂亮話。實際上，這一切都是敘述和解釋下面的意思：不要孤立起來（不要脫離自由派），“要統一自己的力量”（根據自由派的政策），承認自由派政策是真正要求政治自由而不是要求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勾結等等。

我們沒有詳細研究這些漂亮話，因為要爭論實質問題，就要抓住真正的要點、意見分歧的根源，而不是抓住粉飾基本上不正確的路綫的漂亮話。

截于1912年9月16日

“涅瓦明星報”第26號

署名：姆·姆·

按：“涅瓦明星報”原文刊印

美国工人的胜利

在欧洲收到的最近一期美国工人周报“向理智呼吁报”說，該报发行量已达 984 000 份。編輯部写道（新历 9 月 7 日总第 875 号），从各地的来信和提出的要求来看，可以肯定，我們的发行量在最近几个星期就要超过 100 万份。

受到美国法院的无耻攻击和迫害并在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社会党报纸发行到 100 万份，这个数字要比什么长篇大論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即将发生怎样的变革。

不久前，阿諛奉承的报纸，即卖身投靠的文人的机关报“新时报”談到美国的“金錢势力”，幸灾乐祸地叙述了塔夫脫、罗斯福、威尔逊等资产阶级政党的所有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龌龊透頂的賄买事实。俄国的卖身投靠的报纸唠叨說：你們看，这就是自由的民主共和国。

对这一点，觉悟的工人会冷靜地和驕傲地回答說：我們絲毫不會弄錯广泛民主的意义。世界上任何民主都不能消灭阶级斗争和金錢万能。民主的意义和好处根本不在这里。民主的意义在于它使阶级斗争成为广泛的、公开的和有觉悟的斗争。而这一点不是猜想，也不是願望，而是事实。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已经达到 97 万人的时候，当美国社会党周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 984 000 份的时候，任何人只要眼睛

能看，就会承認：单个无产者是无能为力的，上百万的无产者是万能的。

載于1912年9月18日

“真理报”第120号

署名：姆·恩·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意土战争的結局

大家从电訊中知道，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权代表已經簽訂了預备和約条款。

意大利“战胜了”。一年以前，它悍然发动了掠夺土耳其在非洲的屬地的战争，今后，的黎波里就要屬意大利了。我們不妨来考察一下 20 世紀“文明”国家的这场典型的殖民战争。

这场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由意大利的財政寡头和資本家的貪婪引起的，因为他們需要新的市場，需要意大利帝国主义不断扩张。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是一场完善的文明的人类大屠杀，是用“最新式的”武器对付阿拉伯人的大杀戮。

阿拉伯人拚命地进行了抵抗。战争一开始，当意大利的海軍將軍們貿然派遣 1 200 名水兵登陸时，阿拉伯人袭击了他們，打死了将近 600 人。于是，“为了懲罰”，屠杀了将近 3 000 名阿拉伯人，許多家庭被洗劫一空，妇女和兒童也惨遭杀害。意大利人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的立宪制的民族。

約有 1 000 名阿拉伯人被絞死。

意大利損失了两万多人；其中患病的 17 428 人，失踪的 600 人，被击毙的 1 405 人。

意大利人为这场战争耗費了 8 亿多里拉，合 32 000 万卢布以

上。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失业现象和工业停滞。

阿拉伯人被杀了 14 800 人左右。尽管签订了“和约”，战争实际上还将继续下去，因为远离海岸的、处在非洲大陆内部的阿拉伯部落没有屈服，他们还要长期被人用刺刀、枪弹、绳索、奸淫、烧杀来“开化”。

意大利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当然不好也不坏。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同样受资产阶级的控制，而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新的利润来源，是不惜进行任何屠杀的。

载于 1912 年 9 月 28 日

“真理报”第 129 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孤注一擲

“新时报”完全揭露了俄国民族主义者的計劃。只要讀一讀这份在民族主义者以及十月党人中間“有威信的”报纸，就能清楚地看到他們坚决实行的掠夺土耳其的計劃。

按照慣例，实行沙文主义和侵占他人土地的政策，首先就要唆使公众攻击奥地利。“新时报”写道，“巴尔干各国人民为独立而进行了神圣的斗争。奥地利外交官伺机掠夺巴尔干各国人民”。

奥地利割走了一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意大利也割走了一块（的黎波里），現在該輪到我們捞一把了，——这就是“新时报”的政策。“为独立而进行神圣的斗争”不过是騙騙头脑简单的人的話，因为在我們俄国，誰都沒有象民族主义者和十月党人那样践踏一切民族的真正独立的真正民主原則。

为什么民族主义者認為現在是实行掠夺政策的良机呢？这一点从“新时报”上看得很清楚。它說：意大利不会打，奥地利有千百万同巴尔干斯拉夫人有血統关系的居民，对巴尔干斯拉夫人开战有些冒险，德国由于土耳其被击潰也不会去进行欧洲的战争。

民族主义者的打算真是露骨和无耻透頂了。他們講些“为了”各国人民的“独立而进行神圣的斗争”的冠冕堂皇的話，自己却冷酷无比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当兒戏，为了一小撮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潤唆使各国人民互相屠杀。

三国同盟(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目前削弱了,因为意大利在同土耳其人战争中花掉了8亿法郎,而意大利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利益”又不一致。意大利还想夺一块土地——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则不容许。我国的民族主义者估计到这种情况,又满以为有三国协约的两大国(英国和法国)的力量和财富作后盾,并且“欧洲”不愿意为了海峡问题或者为了我们侵占亚洲土耳其以求“我国”领土“完整”这一点而发动全面战争,于是他们就不惜孤注一掷。

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中,每个商人,每个老板都在下赌注:“不是我破产,就是我发财而使人家破产。”每年都有几百资本家破产,也有几百万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下同样的赌注,以千百万人的鲜血下赌注,把他们今天派到这里明天派到那里,去为侵占他人土地和掠夺弱小邻国进行屠杀。

载于1912年10月4日

“真理报”第13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举中的僧侣和僧侣气的选举

根据报纸报道，俄国欧洲部分 46 省小土地所有者和教长的代表大会选出了 7 990 个初选人，其中 6 516 个是神甫，占 82%。

50 个省的全部结果不大会改变这个结果。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选举的意义。

按照法律规定，小土地所有者和教区选出一个有完全选举资格的初选人参加土地所有者代表大会。就是说，初选人的人数应当同选民的土地数量成正比。

根据 1905 年的统计，俄国欧洲部分 50 省的材料如下：

教会土地.....	190 万俄亩
僧侣的私有地.....	30 万俄亩
<hr/>	
僧侣土地总数.....	220 万俄亩
小市民私有地.....	370 万俄亩
农民私有地.....	1 320 万俄亩
其他人私有地.....	220 万俄亩
<hr/>	
“世俗”的小地产总数	1 910 万俄亩

这里，小地产的计算可能不如僧侣土地完全。但是依旧可以看出，私有小地产的总数为 2 130 万俄亩，其中僧侣占有 220 万俄亩，即占 $\frac{1}{10}$ 强！而僧侣初选人却占 $\frac{8}{10}$ 以上！！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的呢？原因非常简单。小土地所有者参加

选举的很少，因为没有钱，又没有多大兴趣，还有重重的警察障碍阻挠选举自由。而神甫则全被“授意”去参加选举。

神甫将投政府合意的候选人的票。正因为如此，甚至地主（更不用说资产阶级了）也满腹牢骚。十月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也都满腹牢骚。大家都责备政府，说它“制造”选举。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自己也想制造选举。

于是，专制制度同地主和资产阶级巨头之间发生了冲突。政府原想依靠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上层；大家知道，1907年6月3日的全部法令就是依靠他们确立的。

看来，甚至政府同十月党人也不能和睦共处了。甚至封建资产阶级君主制也不能具有使这些阶级“满意的”性质了。

这个失败无疑被政府实际上承认了，因为政府开始安排属下的僧侶作为自己的亲信官了！

在历史学上，政府这种保存专制制度主要特点的方法被称为拿破仑主义，这就是不依靠一定的阶级，或者不光依靠一定阶级，主要不依靠它们，而是依靠经过人为选择的、主要是从各个依附阶层中挑选出来的分子。

从“社会学”来说，即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原因在于，敌对的或者相互竞争的阶级势均力敌。例如，如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同古契柯夫之流和列布申斯基之流竞争，那末政府在这些对手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就比其中有一个阶级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更多的独立性（当然是在某些十分狭小的范围内）。如果这个政府由于传统等等关系，同专制制度特别“明显的”各种形式有着历史的联系，如果国内在委任法官和官吏方面的

贖武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傳統很深，那末这种独立性的范围就要更广泛，它的表現就更……露骨，“挑选”选民和根据命令投票的复选人的方法就更粗暴，横行霸道就更厉害。

現代俄国也有某些相似的情况。“在向資產階級君主制轉变的道路上前进一步”^① 由于仿效拿破仑主义的方法而复杂起来。在法国，資產階級君主制和拿破仑帝国彼此的区别很清楚很明显，而在德国，俾斯麦已經提供了把两者结合起来并具有那些被馬克思称为“軍事专制”⁸² 的异常突出的特点的典范，更不用說拿破仑主义了。

据說，鯽魚喜欢在酸奶油中受煎熬。不知道居民是喜欢在資產階級君主制中、在旧的农奴制专制制度中、在“最新的”拿破仑主义中“受煎熬”呢，还是喜欢在軍事专制制度中，或者在所有这些“方法”的某种混合体中“受煎熬”。不过从居民的观点和从所謂“法制”，即从純法律的、形式上立宪的观点来看，区别可能很小，但从階級斗爭的观点来看，这里的区别是重大的。

如果居民認識到有人不仅用旧的方式、而且在用新的方式打击他，也不見得轻松吧。但是，压迫居民的制度的巩固性，这个制度的发展条件和瓦解条件，这个制度能否迅速……垮台——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們面前是一定階級的相当明显的、公开的、稳固的、直接的統治形式，还是这种統治的各种間接的、不稳定的形式。

階級統治的消灭比浸透着頹废情緒的旧关系，不稳定的、受到挑选出来的“选民”支持的上层建筑的形式消灭要困难些。

①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5卷第320頁。——編者注

薩勃列尔和馬卡罗夫在第四届杜馬选举中“組織”僧侶的試驗，無論就“社会学”或就实际政治來說，都是值得每个人重視的。

載于1912年10月5日

“涅瓦明星報”第27号

按“涅瓦明星報”原文刊印

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場”

立宪民主党的領袖在三棵松树中間迷了路。他写了緬施科夫式的冗长的論“三个立場”、“一个立場”的文章，而且他写得愈多，就愈使人明白，原来他是要对讀者进行疲劳轟炸，用枯燥无味的空話来把問題的实質掩盖起来。

可怜的博学的历史学家！他不得不装做不懂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區別。先生們，問題的实質就在这个區別上！不論在杜馬投票中，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在表决預算上，或者在“議會外的策略”問題上，不同的形式所表現出来的是同一个实質即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同民主派之間深刻的區別。

現在我們第一千零一次簡單地告訴“不懂”的米留可夫之流先生們这种區別在哪里。

自由派——維護一系列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權（第二院，等等）。民主派——同一切特權作不調和的斗争。

自由派——同社会生活中的旧势力妥协。民主派——实行消灭这些势力的策略。

自由派——害怕群众的独立自主的活动，不信任它，否定它。民主派——同情、信任、支持和发展这种独立自主的活动。

暫且举这些就够了。

难道米留可夫先生真的“不懂”这种甚至从历史教科書上就能

知道的區別嗎？

難道他“不懂”，立憲民主黨的綱領早已不是民主派的綱領，而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綱領；只有自由派（而且是糟糕的自由派）才会在第三屆杜馬中投票贊成預算，才会宣布自己是忠誠的反对派嗎？等等。

米留可夫先生很懂得这一点，并且“支吾搪塞”，装做他忘記了自由派同民主派的起碼區別。

为了在报刊上指出立憲民主党人这种可鄙的支吾搪塞的行为，我們要向米留可夫先生說明，在社会民主党（当然不包括取消派，这些人我們宁願奉送給米留可夫先生）的一切正式报刊上，在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的一切決議上，在第三屆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整个路綫上，我們总是看到以千百种形式捍卫米留可夫先生所說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已經抛弃了的旧策略。

这是无可爭辯的历史事实，博学的历史学家先生！

如果立憲民主党人試圖在这样基本的并且为俄国各个政党的历史所确定的問題上欺騙群众，我們就必須在报刊上指出立憲民主党人多么下流。

最后，为了总结并簡短地重复一下前面講的話，我們对米留可夫先生提出一个小小的問題：当你們立憲民主党人先生們贊成取消沃伊洛什尼科夫参加 5 次會議的权利⁸³的时候，你們的行动象自由派呢，还是象民主派？

載于 1912 年 10 月 6 日

“真理报”第 136 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彼得堡工人代表

首都的无产阶级要派一个代表参加黑帮的、地主的和神甫的杜馬。这个代表将要站在光荣的崗位上。他应当代表千百万人发言和行动，他应当高举伟大的旗帜，他应当表达馬克思主义和工人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多年正式地、明确地表达过的观点。

选举一个人到这个崗位上去，这件事情是这样重要，如果害怕直截了当地談論它，害怕“得罪”某人或者某个小組等等，就是謹小慎微，胆怯可耻。

选举应当符合大多数有觉悟的工人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这是很显然的。这是誰也不敢公开否認的。

大家知道，自1908年到1912年，彼得堡工人中間的反取消派和取消派，在千百次的會議上、爭論中、談話中，在各种机关刊物上，进行了斗争。有人象笨鳥那样徒劳无益地把头藏到翅膀下面，企图“忘掉”这个事实。

現在，在选举一个代表的問題上叫喊“統一”的那些人把事情搞乱了，所以說把事情搞乱了，是因为他們偷換問題，用叫喊来弄乱問題的实质。

既然应当选举一个代表，并且大家都同意他应当表达多数有觉悟的工人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这同“統一”又有什么相干呢??

取消派不敢公开說他們想选举取消派分子或者“无派別分子”

(即动摇分子),不敢公开捍卫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们叫喊“统一”,用欺騙的方法来偷运这些观点。

我们的义务就是澄清这种混乱。如果有觉悟的工人多数是取消派,那末世界上谁也不会阻挠他们选举取消派。应当尽可能准确地、冷静地、坚定地、慎重地、真实地确定多数究竟站在哪一边,不要被那些为了掩盖自己的观点,而在5年斗争以后宣传(在选举前的几天!)“统一”的人们的叫嚷弄得惶惑不安。

工人不是小孩子,竟会相信这种童话。只能从下面三个决定中取其一:(1)选举取消派;(2)选举反取消派;(3)选举动摇分子。在1908—1912年5年中,社会民主党中间再也没有另外一类人,就是现在也没有!

工人如果想成为成熟的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就不应当允许他们中间有政治上的工贼。工人应当使人尊重和执行大多数有觉悟的工人的意志。

工人需要能够表达多数人的意志并且深知自己在杜馬內和杜馬外将进行什么工作的代表。

多数人的意志都已经表明了,而且彼得堡的代表应当成为坚决的反取消派,成为彻底的工人民主派的拥护者。

載于1912年10月16日

“真理报”第144号

署名: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

現在，巴尔干問題引起了普遍的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整个东欧，人民自己自由、坚定地表示意見的时刻可能已經来到了。現在，已經沒有資產階級“列強”和它們那些極盡陰謀陷害和互相傾軋之能事的外交家們玩弄把戲的余地了。

巴尔干人民會說出往日我國農奴常說的那句話：“老爺發怒也罷，老爺愛憐也罷，都是最可怕的災難，可千萬別落到我們頭上。”⁸⁴的確，歐洲“列強”充滿敵意的干涉也罷，貌似友好的干涉也罷，對巴尔干的農民和工人來說，都只意味着資本主義剝削的一般條件再加上各種阻撓自由發展的桎梏。

因此，我們既要反對政府當局的“外交”，也要反對自由派的“外交”。例如，“言論報”的議論就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它前幾天竟然請求“俄國社會”（即資產階級）記住英國內閣機關報的話，說什麼歐洲不能容許在巴尔干出現“惡劣的統治”！“言論報”大聲疾呼：“我們的外交不要袖手旁觀。”

我們回答說，即使是真正“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歐洲，除了支持腐朽勢力和停滯現象以外，除了對自由增添官僚主義的障礙以外，什麼也不會帶給巴尔干。正是“歐洲”在阻礙巴尔干聯邦共和國的建立。

巴尔干的先進工人和巴尔干的整個民主派只有把希望寄托在

群众的觉悟程度、民主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增长上，而不是寄托在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阴谋诡计上，不管他们用什么自由主义词句来装饰自己！

载于1912年10月16日

“真理报”第144号

署名：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論狐狸和鷄窩

巴尔干战争問題和“欧洲”对待这个战争的态度問題，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最迫切的問題。对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对工人阶级來說，弄清楚各个政党在这个問題上代表什么阶级利益，是很重要的。

十月党人、民族主义者、无党派“爱国人士”，从“新时报”到“俄罗斯語言报”，他們的政策都是簡單明了的。攻击奥地利，唆使人們同它开战，叫喊俄国負有“斯拉夫人的任务”——所有这一切都是想轉移人們对俄国内政問題的注意力、想“夺取”土耳其“一块土地”的欲盖弥彰的企图。对内支持反动派，对外支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这就是这个粗暴的“爱国主义的”“斯拉夫的”政策的实質。

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裝飾得比較圓滑巧妙，但是他們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大国政策。了解这一点是特別重要的，因为自由派狡猾地用民主詞句来掩盖自己的观点。

請看一看“言論报”吧。起初(直到米留可夫同薩宗諾夫“亲切的会晤”⁸⁵)有人責备薩宗諾夫“温順”，責备民族主义者冲淡了占領君士坦丁堡的“伟大思想”。現在，在会晤以后，“言論报”同意“俄国报”的意見，痛罵“新时报”“糊塗的好斗”。

那末，“言論报”现在的政策是怎样的呢？

不应当首先提出傲慢的要求，因为这样一来我們就会失去支持(法国和英国的支持)，“最后甚至会被迫得不到应得之数”(第278号)!!

因而，“言論报”反对沙文主义者，是因为他們“最后会得不到应得之数”。就是說，你們沙文主义者大吹大擂而实惠不多，我們則主张在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心平气和地、悶声不响地捞取巨款!

“言論报”写道：“为了我們巴尔干的被保护者的利益，我們需要支持(三国协約的支持)。”請注意这一点：“言論报”也主张由俄国来“庇护”(保护)斯拉夫人，主张由狐狸来保护鷄窩，不过主张更狡猾的保护!

“言論报”說，“凡是可爭得的一切都靠这个唯一的方法——欧洲外交的协作”。

問題很清楚：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的实質同“新时报”的政策一样，是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只不过更狡猾，更巧妙罢了。“新时报”粗暴地愚蠢地进行战争威胁，用的是俄国一国的名义。“言論报”“狡猾地巧妙地”也进行战争威胁，不过是用三个协約国的名义，因为說“不應該得不到应得之数”正是以战争相威胁。“新时报”主张由俄国来庇护斯拉夫人，“言論报”主张由三个协約国来庇护斯拉夫人，就是說“新时报”主张鷄窝里只有我們一只狐狸，而“言論报”主张三只狐狸协商。

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反对由狐狸和狼来对斯拉夫人进行任何“庇护”，主张各国人民完全自决，主张完全的民主，主张斯拉夫人摆脱“大国”的任何庇护。

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正在爭論欧洲资产阶级掠夺和奴役巴尔

于各国人民的不同方法。只有工人才能实行真正民主的政策——
要求到处有自由民主，彻底反对各种“庇护”、掠夺和干涉！

载于1912年10月18日

“真理报”第146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可耻的决議

彼得堡市杜馬 10 月 10 日的决議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决議談的是巴尔干战争——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事件。决議是由权威的(资产階級中的权威)公共机关做出的。决議由臭名昭彰的反动派和自由派一致通过。

几乎是“民主派”(！?)的自由派兼立宪民主党人法尔博尔克在“热情的演說”中証明了这种决議的必要性，并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也参加了投票。

这个决議是资产階級沙文主义的典型，是资产階級无耻地向“当权派”卑躬屈膝的典型，是资产階級支持把人民变成炮灰的政策

的典型。

在致巴尔干各交战国首都的决議中这样說道：“彼得堡同你們一起，对你們流血牺牲以爭取的、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自由的光明未来充滿希望。”

請看，沙文主义用怎样的詞句来掩飾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被压迫人民都不是靠甲国人民对乙国人民进行战争来获得“自由”的。各国人民間的战争，只会使人民更受奴役。巴尔干的斯拉夫农民和土耳其农民的真正自由，只有在每个国家内部有了充分的自由以及各个彻底民主的国家建立了联邦，才能得到保証。

巴尔干的斯拉夫农民和土耳其农民都是同受本国地主和本国政府“压迫”的兄弟。

这就是真正的压迫，这就是真正阻挠“独立”和“自由”的障碍。

反动的和自由派的沙文主义者在彼得堡市杜馬中公开联合起来（正如他们在报纸上暗中联合起来一样，因为“言论报”和“新时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实质上都一样，不同的只是声调和细节）——这些沙文主义者在鼓吹把人民变成炮灰！

载于1912年10月18日

“真理报”第146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两种烏托邦

烏托邦是一个希腊字，按照希腊文的意思，“烏”是“沒有”，“托邦斯”是地方。烏托邦是一个沒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虛构和童話。

政治上的烏托邦就是無論現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一种願望，是不依靠社会力量，也不依靠階級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的一种願望。

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階級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烏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現代俄国，有两种政治烏托邦最牢固，并且由于有誘惑力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烏托邦和民粹派的烏托邦。

自由派的烏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撤销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职务，不經過激烈的彻底的階級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劳动民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妄想自由俄国能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平共处的烏托邦。

民粹派的烏托邦就是民粹派的知識分子和劳动派的农民所抱的幻想，他們以为可以用公平合理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資本的权力和統治，消除雇佣奴隶制，或者以为在資本統治下，在

金錢權力下，在商品生產下，也可以維持“公平的”、“均等的”土地分配制度。

這兩種烏托邦是怎樣產生的呢？為什麼在現代俄國保持得相當牢固呢？

這兩種烏托邦的產生反映了這樣一些階級的利益，它們進行着反對舊制度，反對農奴制，反對政治壓迫，一句話，“反對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鬥爭，而在這種鬥爭中，它們又沒有取得獨立的地位。烏托邦、幻想，是由于這種不獨立和軟弱性而產生的。幻想是弱者的命運。

一般自由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為沒有自由和法制，資產階級的統治就不徹底，不完整，無保證。但是資產階級害怕群眾運動比害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現出一種驚人的、不可思議的軟弱性和十足的無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都是模稜兩可、虛偽不堪、假仁假義、躲躲閃閃的，他們必須玩弄民主的把戲才能把群眾爭取到自己方面來，同時他們又極端反對民主，極端仇視群眾運動，仇視他們的首倡精神，仇視他們“震撼天地”的氣魄，如馬克思形容19世紀一次歐洲群眾運動時所說的那樣⁸⁶。

自由派的烏托邦是在俄國政治解放事業中表現軟弱無力的烏托邦，是那些想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平”瓜分特權，而把這種崇高的願望冒充為俄國民主派的“和平”勝利論的營利自肥的富豪的烏托邦。自由派的烏托邦就是一種既要戰勝普利什凱維奇之流而又不使他們失敗，既要摧毀他們而又不使他們痛苦的幻想。很明顯，這種烏托邦之所以有害，不僅由於它是烏托邦，而且由於它腐蝕群眾的民主主義意識。相信這種烏托邦的群眾，永遠也不會爭

得自由；这样的群众不配享受自由；这样的群众完全应该受普利什凱維奇之流作践。

民粹派和劳动派的烏托邦，是站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中间的小业主的一种不用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当经济解放问题也如现时政治解放问题这样成为俄国当前的迫切问题的时候，民粹派烏托邦的害处就不亚于自由派的烏托邦了。

但是，现在俄国所处的时代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性的改革时代；彻底成熟了的不是无产阶级经济解放问题而是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民粹派的烏托邦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烏托邦对于重分土地应有（和将有）什么经济结果的问题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是农民群众，即在资产阶级农奴制的现代俄国占人口多数的群众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高涨的伴侣和象征（在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也象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样，农民是不会占人口多数的）。

自由派的烏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烏托邦虽然也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是它是群众民主运动高涨的伴侣和象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

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民粹派和劳动派在俄国土地问题方面，提出并执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把它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土地重分的“平均制”是烏托邦，但是土地重分必须与一切旧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占有制完全断绝关系这一点，却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方向上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办法。

應該記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可能是正確的。”⁸⁷

恩格斯的這個深刻原理是針對空想社會主義說的：這種社會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這種社會主義所以是“錯誤的”，因為它認為從交換規律的觀點來看，剩餘價值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家反對這種社會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則是正確的，因為由交換規律產生剩餘價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上是正確的，因為它是由資本主義產生的那個階級的象徵、表現和先聲；現在，在 20 世紀初，這個階級已成長為能夠消滅資本主義並且不可遏止地向這方面前進的巨大力量。

在評價俄國現代民粹派或勞動派的烏托邦的時候，必須記住恩格斯的這個深刻原理（也許不僅俄國一國，在 20 世紀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許多亞洲國家都應當這樣）。

民粹派的民主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而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這種民主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烏托邦是錯誤的，但是，作為農民群眾的特殊的、有歷史局限性的民主主義鬥爭的表現，卻是正確的，這種鬥爭是資產階級改革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時是這一改革獲得全勝的條件。

自由派的烏托邦教農民群眾放棄鬥爭。民粹派的烏托邦則反映了農民群眾鬥爭的願望，答應勝利以後讓他們享到千萬種福利，儘管這種勝利實際上只能給他們一百種福利。但是，長期處在曠古未聞的黑暗、匱乏、貧困、骯髒、孤苦、閉塞的境遇中的勇於鬥爭的千

百万民众，把可能胜利的果实夸大十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自由派的烏托邦是新剝削者企图与旧剝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飾品。民粹派的烏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剝削者的願望的反映和“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剝削者的幻想。

很明显，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烏托邦，应当坚持本阶级的独立性，这个阶级正因为絲毫沒有“陷入”那种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主，而且往往同封建主結成联盟的私有制的“深渊”，所以能够奋不顾身地反对封建制度。农民陷入小商品生产的深渊；他們在順利的历史情况下，能够做到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但是他們必然而不是偶然地永远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間，自由主义与馬克思主义之間动搖不定。

很明显，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烏托邦的外壳細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誠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

从19世紀80年代老的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辨别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的一貫趋向。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統地研究这种趋向，并且考察出这种趋向同20世紀头10年內被称为“布尔什維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写于1912年10月

1924年第一次載于
“生活”杂志第1期

署名：弗·伊·

接手稿刊印

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爭論

大家知道，英国有两个工人政党，一个是現在称做“英国社会党”的社会民主党，另一个是所謂“独立工党”。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出現这种分裂不是偶然的。它有远因，也就是由于英国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最早，它在很长时间内曾經是世界“工厂”。这种特殊的、垄断地位为英国的工人贵族，即少数受过訓練、收入高的工人創造了比較不錯的生活条件。

因此，在这种工人贵族中就产生了市儈的、行会的习气，他們脱离了本阶级，跟着自由派走，嘲笑社会主义是“空想”。“独立工党”也就是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党。說公道話，这个党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則非常依賴。

最近，英国的垄断地位彻底垮台了。早先比較不錯的生活条件由于物价上涨变得极端貧困。阶级斗争大大尖銳起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銳化，机会主义的基础日漸崩潰，过去使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得到散布的基础也在崩潰。

当很大部分的英国工人还有这些思想的时候就談不上消除工人的分裂。当社会民主党反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斗争还没有結束的时候，靠空話和願望是不能建立統一的。但是現在，这种統一一开始真正成为可能的了，因为就在“独立工党”本身，反对自由派

工人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我們手头有一份該党关于它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即1912年5月27日至28日在默瑟尔(Merthyr)召开的“20次年会”的正式报告。这份报告中关于“議會政策”問題的辯論非常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是关于更加深刻的問題，即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辯論，虽則发言人沒有这样提。

在代表大会上首先开始辯論的是議會議員乔威特。他提出了反对支持自由派的提案(关于这个提案，我們馬上会詳細談到)，而支持他的提案的同道康內坦率地說，“普通工人总是提出这样的問題：工党在議會中有沒有自己的独立路綫？”工人愈来愈怀疑工党成了自由派的“俘虏”。“國內日益流传着这样的看法：工党只不过是自由党的一翼”。应当指出，議會中的“工党”不仅由“独立工党”議員，而且由工会选出的議員組成。后者自称工人議員和“工党”黨員，但又不加入“独立工党”。英国的机会主义者做了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者非常爱做的事情：把机会主义的“社会党”議員同所謂无党派的工会議員联合在一起。我国某些孟什維克在1906—1907年講过的臭名远揚的“兼容并包的工党”在英国实现了，并且只有在英国才能实现。

为了切实表达自己的观点，乔威特提出了提案。这个提案純粹是“英国式”的，即沒有任何共同原則(英国人是以“实际主义”和“不爱共同原則自豪的；这也就是工人运动中的行会精神的表現)。提案要求下院的工人党团不去理会(不去注意)自由派內閣可能由于只有少数票的支持，而不得不提出辞职的各种危險，要求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on the merits of the questions)坚定地(steadfastly)对每个問題进行投票。

乔威特的提案“击中要害了”。英国的自由派內閣和整个自由党竭力慫恿工人說，应当把力量因結起来反对反动派（即反对保守党）；应当保住自由派的多数，如果工人不同自由派一起投票，自由派的多数就会失去了；工人不应当孤立起来，他們应当支持自由派。于是，乔威特就明确地提出了問題：“坚定地”投票，不要考虑自由派內閣垮台的危險，不要根据自由党利益，而要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投票，用馬克思主义的語言來說，就是要实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

（在“独立工党”的队伍中，馬克思主义在原則上不被接受，因此，馬克思主义的語言是根本不用的。）

在党内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立刻就攻击乔威特。而且——也算一个特点！——他們攻击时正象机会主义者那样躲躲閃閃，支吾搪塞。他們不願意直截了当地說他們支持自由派。他們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只是泛泛地議論，而且必然提到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瞧，这完全象我国取消派，我国取消派在实际上准备用自由派工人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独立性的时候，总是大嚷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机会主义的多数的代表梅雷提出了“修正案”即反提案，内容如下：

“代表會議認為，为了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工党还是应当估計到自己策略的一切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和間接后果，一分鐘也不能忘記，工党的決議应当只以它本身作为一个政党的利益以及謀求增加适当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願望为轉移。”

請把两个提案比較一下。乔威特的提案明确地要求同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决裂，梅雷的提案則是空洞无物、冠冕堂皇、乍看起来

无可爭辯、而实际上恰恰是掩盖其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如果梅雷認識馬克思，并且在尊敬馬克思主义的人士面前发表演說，他就会毫不費力地用馬克思主义的詞句来美化他的机会主义，說什么馬克思主义要求估計到每一个事件的一切具体情况，什么不要作茧自縛，什么我們在保持自己独立性时要“利用冲突”、“抓住”現存制度的“矛盾的可乘之隙”等等。

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說的術語，也包括馬克思主义的術語来表达。俄国“馬克思主义的遭遇”的全部特点在于，不仅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而且自由派政党的机会主义（如伊茲哥也夫之流）都爱用馬克思主义的“術語”把自己打扮起来；但这些術語是打了引号的。我們还是回过来談談默瑟尔的 20 次年会吧。

麦克-劳赫朗同意乔威特的話。

他說：“政党的利益是什么呢？是否只保住下院的議員席位呢？如果真是考虑党的利益，那就应当象重視議會內的議員一样，重視議會外的男女工人。我們是社会主义的組織。我們应当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貫徹自己的原則。”

麦克-劳赫朗援引了关于赫斯威尔監獄事件（獄中的一个小孩被打致死）的投票情况。議會中有人提出質問。自由派內閣面临垮台的危險，因为英国不是普魯士，內閣如果只得到少数票支持就要提出辞职。于是工党議員为了挽救內閣，投票承認迫害者无罪。

麦克-劳赫朗說，工党老是考虑到它的票会对政府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他說，內閣垮台——議會解散——重新选举，这都没有什么可怕。內閣垮台和重新选举的結果，将会是两个資产階級政党联合起来（麦克-劳赫朗光說“两个政党”，沒有用“資产階級”的

字样：英国人不喜欢馬克思主义的术语！）。然而，这两个党联合得愈快，对我们的运动就愈有好处。我們宣传員所說的，也就是我們在議會中的議員應該貫徹的。否則，工人保守黨員就永远不相信自由党和工党有什么区别。我們即使失去議會中的全部席位，只要我們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則就比为了取得自由派政府的讓步而对它竭力奉承，要有利得多。

該党領袖，議會議員凱爾·哈第躲躲閃閃地說……

“我們議會中真正搖擺不定的情况是沒有的：自由派同爱尔兰人的联盟比保守黨員和工人的联盟强……我在赫斯威尔監獄拷打事件上投政府的票，是因为确信这样投票實質上是正确的，而不是为了支持政府。拷打当然是事实，因此我們大家去議會时本来是决心投票反对政府的。但是，我們在議會中听到了反面意見，看来，虽則監獄长这样残忍是有过錯的，但是一般說来，这个監獄还是王国里比較好的監獄。在这种情况下，投票反对政府就会不正确了……（請看，英国的机会主义者把工党搞成什么样子了；对領袖这种言論沒有噓一声，反而泰然地听着！）……

过錯不在‘独立工党’黨員身上。煤矿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工党，而矿工議員加入工党党团时，暴露出他們是自由派。他們还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們只是名义上加入了工党……

乔威特的提案是把自己的全套議會主义变成了无稽之談。每次投票的后果都是必須估計到的。

……我本要建議暫緩討論提案和修正案”（!!!）。

兰斯柏利支持乔威特的提案說：

“凱爾·哈第毫无根据地企图把提案說成是愚蠢可笑的，似乎它只建議对个别問題进行投票，而不必考虑一切情况。提案建議不要仅仅考虑到投票对政府的稳定性会产生什么后果。我贊同社会主义，因而厌恶那些依靠議員的非正式會議和‘幕后操縱’而掌握下院的政客手腕。而我自己的經驗向我表明，过去对每一个提出来的問題都是从这次投票对政府的命运会有什么

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討論的。

工党几乎完全不能使自己同自由党划清界限。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什么立法問題上工党曾經同自由派划清了界限。我們作为一个党，过去一直是政府在工人保險問題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党过去一向投票贊成政府和政府的計劃。

在赫斯威尔感化院問題上的投票情况，使我感到慚愧。事实是兒童受拷打，兒童被打致死，我們却投票贊成政府，認為拷打者无罪！我們的‘督察員’（«Whips» 監督自己党团投票的指揮者或全权代表）在整个議會中到处奔走，拉攏工党議員，使政府不致遭到失敗……使人們习惯于昧着良心投票，就是對我們祖國的民主制的未來的致命打击……”

議會議員，十足机会主义者之一菲力浦·斯諾頓象游蛇那样圓滑，他說：

“我的斗争本能使我投票贊成提案，但是我的良知、我的理智、我的經驗提醒我投反对票。我同意，現在的議會制对那些抱了理想主义和政治热情进入議會的人产生了腐蝕作用，但我不認為通过了乔威特的提案就会产生根本的变化。討論問題的實質，决不能只限于考虑这一事件的情况。有些問題对工党比起它們任何投票后果对政府更重要，例如关于妇女的选举权問題就是这样，然而是否可以忽視任何小問題的投票后果呢？这种政策就会造成必須經常举行普遍选举，而对公众來說，沒有比这更討厭的了…… 政策就是妥协。”

投票贊成提案的有 73 票，反对 提案的有 195 票。

机会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在英国“独立工党”这样的机会主义政党中，这是不足为奇的。而机会主义使这个党的队伍中产生了反对派，这是現在完全肯定的事实。

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們的做法，比他們的德国同志經常采取的做法要正确得多，因为后者維護那些同机会主义者妥协的腐朽行径。由于公开提出自己的提案，引起了一場极端重要的原則爭論，

而这场争论对英国的工人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由派工人政策表现出机会主义领袖们的传统习惯、因循守旧和狡诈圆滑，但是这个政策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破产是势所必然的。

写于1912年10月

第一次载于1913年4月

“启蒙”杂志第4期

署名：W.

按杂志原文刊印

立宪民主党的教授

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之一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教授先生屬於这样一类的俄国經濟学家,这些人年輕时是准馬克思主义者,后来很快就“变聪明了”,用片片断断的資产階級理論来“修正”馬克思主义,并且依靠变节的汗馬功劳保全了自己的大学講席,以便在学术上愚弄学生。

由馬克思主义者变成自由派的杜岡先生,前几天在“言論报”上就物价高涨这个迫切問題发表了下面的議論:

“在我(?)看来,物价高涨的主要(原来如此!)原因是十分清楚的。这是由于人口,而且主要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原故。人口的增加使耕作更加集約化,这样,根据著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日漸降低的規律,单位产品的劳动价值就提高了。”

杜岡先生爱襲“我”,“我的”。其实,他不过是重复早被馬克思駁斥过的資产階級学說的片言只語。

“著名的劳动生产率日漸降低的規律”是資产階級的陈腔濫調,被資产階級的不学无术之徒和雇佣学者用来为資本主义辯护。馬克思早就駁斥过这种把罪过推在自然界身上的“規律”(据說,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是势所必然的!),实际上,罪过在于資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农业劳动生产率日漸降低的規律”是資产階級的謊話。在資

本主义制度下，地租即土地占有者的收入的增加的规律倒是事实。

物价高涨的原因之一，是土地的垄断，即土地的私人占有。因此，土地占有者从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获得愈来愈多的贡税。只有把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物价高涨的现象。

唯有象立宪民主党人杜冈先生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奴仆，才会替农业劳动生产率日渐降低的“规律”这种童话辩护。

载于1912年10月19日

“真理报”第147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

全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从反动的自私自利的目的出发，主张在巴尔干维持臭名远扬的 *status quo*（原来的不变的状况），可是现在就连它们也一致承认，世界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章。

土耳其的溃败是毫无疑问的。结成四国同盟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希腊）的胜利是巨大的。这四个国家结成同盟已成事实。“巴尔干属于巴尔干人民”——这一口号已经实现。

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在东欧（奥地利、巴尔干、俄国），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成长的顽强的中世纪残余至今还未消灭。这些残余就是专制制度（极权的专制政权）、封建制度（农奴主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特权）和民族压迫。

巴尔干各国的觉悟工人首先提出了用彻底民主的办法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现在巴尔干各国的民主阶级软弱无力（无产阶级的人数少，农民闭塞、分散、没有文化），使得经济上和政治上必然的联盟变成了巴尔干君主国的联盟。

巴尔干民族问题的解决有了重大的进展。在整个东欧，现在只有一个俄国是最落后的国家了。

尽管在巴尔干建立的是君主国的联盟，而不是共和国的联盟，尽管这个联盟的形成是由于战争，而不是由于革命，——尽管如此，在摧毁整个东欧的中世纪残余方面，还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民族主义者先生们，你们不要高兴太早！这一步是反对你们的，因为俄国的中世纪残余最多！

而在西欧，无产阶级更加有力地宣布了这样的口号：反对任何干涉！巴尔干属于巴尔干人民！

载于1912年10月21日

“真理报”第149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者

我們曾經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就其基本观点来看，是民族主义自由派，他們根本不从民主主义的立場提出民族問題，当时，“言論报”气冲冲地狂妄地回答了我們，責备我們茫然无知，歪曲事实。

下面是許多文件中的一个。請讀者和选民去判断吧。

10月18日，在馬·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家里举行了“斯拉夫問題关心者小組”的第二次會議。我們讀到了由叶·阿尼奇科夫、卡列也夫、洛·潘帖列也夫（曾經是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亨·法尔博尔克，当然还有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签署的告社会書。

“言論报”是不是想不对卡列也夫、潘帖列也夫之流負責呢？

自由派的告社会書的内容归結起来就是：

“由于对斯拉夫人的同情，由于希望俄国的民族自觉有助于保証他們的胜利果实，俄国的心普遍热烈……跳动。”

这同“新时报”之流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只是戴上了白手套，講得更加委婉。但是，戴上白手套也好，講得非常文雅也好，沙文主义总是丑恶的。

当旁边（和在上面！）站着千方百計压迫許多民族的俄国民族主义者的时候，民主派决不会說“普遍热烈”。

当斯拉夫和土耳其的农民應該一起对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地

主和杀人强盗的时候，民主派决不容许斯拉夫人随便同土耳其人对立起来。

当波兰人、犹太人、一切“异族人”受到压迫和蹂躏的时候，民主派决不容许用“俄国的民族自觉”来偷换一切民族中拥护自由和反对压迫的人们的自觉。

任何正直的民主派人士，任何忠诚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人们都不应当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

载于1912年10月24日

“真理报”第151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战争的惨状

交战双方都竭力对“局外人”也就是对全世界隐瞒巴尔干发生的情况。记者受到欺騙、阻挠，只有在战役结束后好久，才被允许进入战场。

因此，只有绝无仅有的机会才能偶而打听到战争的真相。大概，这种绝无仅有的机会帮了英国《Daily Chronicle》报^①记者唐納賀厄先生的忙。他有机会随土耳其军队目睹柳列布尔加斯战役；之后，他乘汽车到达君士坦丁堡，从那里取道黑海到康斯坦察（罗马尼亚）。从康斯坦察，他可以自由地向伦敦拍发电讯。

土耳其人遭到了惨败。他们牺牲了将近4万(1)人。这一次灾难不下于沈阳那一次——英国人写道。土耳其人的 $\frac{3}{4}$ 的大炮被保加利亚人缴获。保加利亚人让土耳其人迫近，让他们开始肉搏，之后很快就撤退，并且……机关枪打死了成百成千的土耳其人。

当时，土耳其人的退却变成一群失魂落魄、饥饿不堪、精疲力竭的人们的乱窜。记者的汽车陷入逃窜的人群当中。饥饿的土耳其人向他要吃的。他们不得不自己裹伤，医生很少，敷料没有，食物缺乏。英国人写道，我亲身目睹过许多次进攻，但是这样惨重的灾难，这样大批大批地杀戮安那托里亚（亚洲土耳其）的受飢挨餓、

^① “每日新聞報”。——編者注

受尽折磨、精疲力竭、束手无策的农民的情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象到的。

载于1912年10月28日

“真理报”第155号

署名：弗·弗尔·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立宪民主党人和大资产阶级

立宪民主党人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第一城市选民团中的胜利；后来他们在选举工业方面的国家参议院代表的胜利；加上反动分子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凿事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的一切阶级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社会民主党人1907年关于立宪民主党的实质的主要决议：“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各党派以及其中主要的党派立宪民主党，现在肯定已经离开了革命，并且力求同反革命勾结起来中止革命；这些党派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中经济上较进步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还跟着这些党派走，只是由于传统（盲目的习惯势力）的关系和直接受自由派的蒙蔽。”⁸⁸

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完全被事件证实了。民主派正把立宪民主党人从第二城市选民团（其中有許多民主派选民）排挤出去。立宪民主党人则把十月党人从第一城市选民团排挤出去。

反动派愈猖獗，选举舞弊愈露骨，大资本就愈倒向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在1906年和1907年指出的立宪民主党的阶级实质，现在清楚地展示在群众面前了。

那些把立宪民主党看成是城市民主派的政党的人的錯誤，现在已很明显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反动分子的勾结已经逐渐由秘密

轉为公开：反动分子唆使立宪民主党人曼司列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普列德卡林，唆使立宪民主党人尼古拉也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波克罗夫斯基。

社会民主党政策所以有力量和不可战胜，正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愈来愈証实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正确。立宪民主党人同大资产阶级勾结起来了（后者由于自己的全部反动性，是不会满足的）。民主派则离开立宪民主党向左轉。

載于1912年11月1日

“真理报”第157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地道的俄国习气

前几天，“庶民报”在刊登普利什凯维奇的诗的同时，登载了一篇论述“俄国报”的“著名”（今后是不带引号的著名）御用政论家古里也夫的文章。“庶民报”断定这是一位“带有犹太自由派色彩的政论家”。奇怪！难道官方的“俄国报”也是犹太自由派的机关报吗？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彼得堡纺织厂的股东大会一致决定免去古里也夫担任的该厂董事的职务。此外，还决定请检察长对古里也夫的不正当行为进行审讯。

原来，古里也夫缴了1000卢布就得到了分 $\frac{1}{3}$ 的利润的权利，可是两个厂主股东要缴10万卢布才行！资本家为什么对古里也夫这样慷慨呢？

因为此人乃是四等文官，官方“俄国报”的撰稿人，等等。他是维特的私人秘书，他有“特殊的联系”。他许诺过……政府的津贴！

可见，资本家先生们对政府的“联系”“估价”甚高，等于49000卢布。你出货，我们出钱。你有“政府的联系”，能弄到津贴，我们有钱。这是一笔买卖。“政府的联系”值几千卢布，给津贴的诺言值多少钱，在官方的“俄国报”撰稿值多少钱，古里也夫先生，请收下吧！

古里也夫收了钱，又骗了人。诺言没有兑现，却要求 $\frac{1}{3}$ 以上

的利潤，还进行敲詐，用停发企业貸款来威胁、勒索。

这是很說明問題的事情，典型的事例，生活的現象。它說明了这样一个題目：政府的联系和津貼同資本之間的关系。

不过，“庶民报”先生們，这与“犹太自由派色彩”有什么相干呢？这是地道的俄国色彩，地道的保守色彩！你們不要过分謙虛了，普利什凱維奇的朋友們！

載于1912年11月4日

“真理报”第160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改良派的綱領和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的綱領

1912年上半年，俄国革命显然进入高潮。据厂主的統計，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在五个月內达到 515 000 人。至于这些罢工工人的口号是什么，他們的要求是什么，他們举行的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等等的政治內容是什么，这都可以由中央机关报第 27 号全文轉載的一个极重要的文件，即彼得堡工人的五月宣言来証明。

在这些值得紀念的日子里，彼得堡工人提出的不是改良派的口号，而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召开立宪會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推翻沙皇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

土耳其斯坦、波罗的海艦队和黑海陆海軍士兵的起义和起义尝试，再一次客觀地証明，在俄国，經過了多年反革命猖獗和工人运动低落以后，革命又开始进入高潮。

这次高潮到来的时候，第四届国家杜馬正进行选举，所有政党、所有政派都不得不 对政治形势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总的估計。因此，如果我們想把我們的政治任务作为工人阶级的任务，而不是作为某些集团的善良願望来認真分析一下，如果我們想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各个綱領和政綱檢驗一下，把它們同群众斗争和目前社会的一切阶级的活动对照一下，我們就应当用这次群众革命高潮的試金石来試驗和檢驗各个选举綱領。因为在社会民主党

看来，选举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活动，不是靠任何诺言或声明来攫取当选证书的活动，而只是宣传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和政治世界观的原理的特殊机会。

所有的执政党，从黑帮到古契柯夫，他們的綱領和政綱是非常明确的。它們的反革命性是显而易見的。大家都知道，这些政党不但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甚至在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都得不到稍微有分量的支持。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几乎完全离开了十月党人。

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的綱領和政綱一部分几乎是正式公布了（穆斯林集团的綱領），另一部分从“大的”政治性报刊上，也可以完全确切地知道了（“进步派”、立宪民主党人的綱領）。信口雌黄的立宪民主党人格烈迭斯庫尔，在“言論报”轉載的、后来又由馬克思主义报刊引証的声明中，独到地說出了这一切綱領和政綱的实质。

“公开否認 俄国 必須 进行新的革命”——这就是格烈迭斯庫尔先生說明自己观点的一句話（參閱“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第3版）；而且他还以自由派（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真正的綱領，即“需要的只是沉着的、頑强的、有信心的立宪工作”来反对革命者。

我們所以把真正的綱領这几个字加上着重号，是因为俄国也象其他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一样，大多数綱領都是虛伪的。

問題的实质正是格烈迭斯庫尔先生在他真情偶然流露时所承認的那样。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反对进行新的革命，仅仅主张立宪改革。

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都主张“必須”进行新的革命，宣传这种主张，但是前者是坚定的，后者是动摇的。群众

斗争的高潮已经开始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竭力使高潮更加壮阔，使它向更高阶段发展，向革命的阶段发展。改良派则仅仅把高潮看作“活跃”，他们的政策就是要求立宪让步，要求立宪改革。因此，在俄国的这一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开始了争取“人民”、争取群众的斗争。谁也不能预见斗争的结局，但同样谁也不能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个斗争中应占什么地位。

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评价党的选举綱領和取消派的代表会议选出的“組織委员会”最近公布的选举綱領。

中央委员会在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公布的党的选举綱領是在四五月事件以前拟定的。这些事件证实綱領是正确的。整个綱領都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批判在目前俄国实行立宪改革的毫无希望的空想，宣传革命。綱領的口号正是十分明确地反映了革命的任务，并使这些任务与立宪改革的诺言截然分清。党的綱領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数十万政治罢工者和上百万农民军队的先进分子的公开宣言，就是向他们解释起义的任务。除了五月罢工和六七月武装起义尝试这种对党的解释工作的直接反应以外，革命党再也想象不出什么能使自己的綱領得到更好的检验和更有力的证实。

请看一下取消派的綱領。这个綱領的取消主义实质，用托洛茨基的革命词句巧妙地掩盖起来。这种掩盖的手法有时会迷惑那些幼稚的毫无经验的人，甚至使人觉得取消派同党“调和”了。但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很快就会否定了这种自欺的想法。

取消派的綱領是在五月罢工和夏季起义尝试以后起草的。为了找到对这个綱領的实质问题的确切答案，我们首先要问：这个綱領对这些罢工和起义尝试是怎样评价的？

“經濟高涨”……“无产階級罢工运动的日益增长表明新的社会高潮即将到来”……“无产階級声势浩大的四月运动要求結社自由”——这就是取消派綱領中对四五月罢工所說的一切。

然而这都是謊話！这是不可容忍的歪曲！这里抹杀了主要的东西即政治罢工的革命性質：政治罢工恰恰不是为了爭取某种立宪改革，而是为了推翻政府，为了革命。

在滿篇“紅色”詞句的秘密的革命宣言中，怎么会有这种謊話呢？这是必然的，因为自由派和取消派就是这样看的。他們从罢工中看到他們願意看到的東西——爭取立宪改革。他們看不到他們不願意看到的東西，这就是革命高潮。我們自由派願为改革而斗争，但不願为革命而斗争——这就是取消派的謊話中反映出来的真实的階級立場。

关于起义嘗試，他們說：“……暴力、侮辱和飢餓使軍營中的士兵激起絕望的抗議，但枪弹、絞索又把他們鎮压下去了……”

这是自由派的評價。我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則認為起义嘗試是群众起义的开始，虽然是不順利的、不适时的、不正确的开始，但是我們知道，只有吸取失敗的經驗，群众才能学会举行胜利的起义，正象俄国工人从1901—1904年許多次不順利的、有时甚至失敗的政治罢工中，学会了在1905年10月举行胜利的罢工一样。我們說，备受軍营压制的工农开始起义了。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直接的結論：必須向他們解釋，为了什么和应当怎样准备胜利的起义。

自由派的判断却不同。他們說：“使”士兵“激起絕望的抗議”。在自由派看来，起义的士兵不是革命的主体，不是起义群众的先驅，而是政府摧殘的客体（“使士兵絕望”），表現这种摧殘的客体。

自由派說：瞧，我們的政府多么糟糕，它使士兵絕望，又用枪彈鎮壓他們（結論是：要是我們自由派執政，就不會有士兵起義）。

社会民主党人則說：瞧，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多足，連受着严厉的軍營紀律压制的陆海軍士兵都举行起義了，而且从失败的起義中，学习举行胜利的起義。

你們看到，取消派对春夏两季的俄国革命高潮已經作了“解释”（参议院式的解释）。

接着他們又来“解释”我党的綱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綱領写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的宪法要保障（1）人民专制……”——接着列举了各种“自由”和“权利”。

看来，这段話是不难了解的。“最近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保障各种自由的共和国。

取消派把这段話完全改头换面了。

他們的綱領写道：“社会民主党号召人民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为了达到这个只有通过革命、人民才能达到的目标，社会民主党在目前的选举运动中（請注意！）号召劳动群众在下列迫切的要求下团结起来：（1）在国家杜馬选举中实行普遍的……选举制……”

社会革命党取消派分子彼舍霍諾夫先生在1906年秋創建“公开党”时（差一点要建成了……只是警察妨碍了他，抓他进了监牢！）写道：共和国是一种“遙远的理想”，“对共和国問題应当非常慎重”，目前迫切的要求是改革。

不过，这位社会革命党取消派分子的确幼稚、愚蠢和笨拙，而且說話也不拐弯。难道“西欧”机会主义者都是这样的嗎？不，他

們要狡猾得多，巧妙得多，有策略得多……

他們不放棄建立共和國的口號，——說放棄，簡直是誹謗！他們不過用每個小市民都可以明白的道理適當地“解釋”這個口號。革命會不會發生，這還是一個問題，——小市民隨便說說，而托洛茨基却在“我們的曙光”雜誌（第5期第21頁）上拿它大做文章。共和國“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建立，而“在目前的選舉運動中”，“迫切的”是立憲改革！

真是面面光：既承認共和國，又把它推到遙遠的未來。說了一大堆革革革……命的話，而事實上，“在目前的選舉運動中”（全部綱領都只是为了這個目前的運動而寫的！）“迫切的”却是要求改革。

是的是的，在取消派的代表會議上是坐着一些大“外交專家”……但是這些專家又多么渺小！小集團外交家可以被他們弄得得意忘形，頭腦簡單的“調和分子”可以被他們弄得糊里糊塗，而馬克思主義者對他們的回答則截然不同。

小市民滿足于那種無可爭辯的、顛扑不破的、空洞的真理：革命會不會發生，預先不能知道。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滿足這一點；他說，我們的宣傳和一切社會民主黨工人的宣傳是決定革命會不會發生的因素之一。幾十萬政治罷工者，各種部队的先進分子，都問我們，問我們黨：他們的目標是什麼，為什麼要起義，要求的是什麼，把已經開始的高潮推向革命呢還是導向為改革而鬥爭？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對於這些比市儈的托洛茨基式的“推測”（革命會不會發生，又有誰知道？）有意思一些、重要一些的問題都作了回答。

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的：批判立憲改革的空想，說明期望改革是

一种妄想,尽量从各方面促使革命高涨,并利用选举运动来达到这一点。革命会不会发生——这不仅仅取决于我們。我們一定完成我們的事業,这个事業是决不会落空的。这个事業把民主主义和无产階級独立性的种子深深地撒到群众中去,这些种子一定会在明天的民主革命中或者在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发芽成长。

誰向群众宣揚知識分子那种陈腐的、崩得-托洛茨基式的怀疑主义(“革命会不会发生,不得而知,但‘迫切’的是改革”),誰就是已經在腐蝕群众,向群众宣揚自由派的空想。

他們进行选举运动时不是結合目前“真正的”实际政治形势,即50万工人举行革命罢工,农民軍隊中的先进分子枪杀貴族軍官等等,而是以那种所謂“欧洲人的”(在我国,他們就是这样的欧洲人,这样的欧洲人就是这些取消派!)“議會式的”考虑来撇开这种实际形势(其中“欧洲的”东西很少,“中国的”东西,即民主革命的东西却很多),并且他們用几句无关紧要的話抹杀这种形势后,把改良主义的运动称做真正的选举运动!

社会民主党所以需要第四届杜馬选举綱領,是为了要利用选举,要利用选举的机会,要利用关于选举的爭論,再一次向群众解释革命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必然性。

他們取消派所以需要綱領,是“为了”选举,也就是說,为了轉弯抹角地擱置革命,把革命当作一种渺茫的前途;把选举运动看作“真正的”运动,以便把种种立宪改革办法列举出来。

社会民主党想利用选举不断推动群众去考虑革命的必要性,去考虑已經开始的革命高潮。因此,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綱領中簡單明了地对第四届杜馬的选民說:不要立宪改革,要共和国;不要改良,要革命。

取消派利用第四届杜馬选举来鼓吹立宪改革，冲淡主张革命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他們就把士兵的起义說成是“使”士兵“激起絕望的抗議”，而不把它看成是群众性起义的开始。这种起义是壮大起来还是枯萎下去，則取决于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是否立刻用全部力量，全付精力，滿腔热忱来支援它。

为了这个目的，他們把五月罢工由革命的“解释”成改良的。

为了这个目的，他們“解释”党的綱領的时候，不是把建立保障自由的共和国作为“最近”任务，硬說“在目前的选举运动中”迫切的（別开玩笑，这是对第四届国家杜馬說的！）是要求各种自由。

在俄国生活中，有这么多旧中国的习气！在俄国沙皇制度中，有这么多旧中国的习气！在我国取消派中有这么多旧中国的习气，他們竟企图把議会斗争和改良主义的“礼节”用到上有普利什凱維奇和特列申科夫之流，下有群众革命尝试的环境中去！在知識分子的这些挣扎中，有这么多旧中国的习气，他們竟拿出麦克唐納和饒勒斯、比索拉蒂和伯恩斯坦、科尔布和弗兰克等人的介紹信来防御赫沃斯托夫和馬卡罗夫之流的攻击！

在取消派的代表會議上，托洛茨基替取消派的观点和党的观点作了外交式的“調和”，而实际上什么也沒有“調和”。这种調和消灭不了决定当前俄国全部社会政治形势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改良派的綱領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之間的斗争；这就是资产阶级以它的政党的自由派領袖为代表否定俄国进行新的革命的必要性，主张純粹进行立宪“工作”，而几十万无产者則相反地举行革命罢工，号召群众真正为自由而斗争。

向改良派鞠一个躬，再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鞠一个躬，这并不等于消灭了这种客观的政治事件，并不等于多少冲淡了这种事件

的意义和作用。想消除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意見分歧的各种善良願望(即使这种願望真是完全“善良的”真挚的),是无力改变由反革命的整个环境所造成的极端仇視革命的政治趋向。

无产阶级已經举起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并且在第四届黑帮杜馬产生的前夜,它决不会在自由派面前放下这面旗帜,决不会为了迎合改良派而卷起这面旗帜,决不会为了迁就小集团外交家而修改或推翻自己的綱領。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反对改良派的綱領——五月罢工过去是在这个标志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現在又在这个标志下参加地主僧侶杜馬的选举,党在杜馬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中間的全部工作将来也在这个标志下进行。

載于1912年11月5日(18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的问题，是党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革命后的整个时期，一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心问题，在党内引起最激烈的斗争。

取消派同反取消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而这个斗争之所以激烈，完全是因为它涉及了我们老的、秘密的党是否要存在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痛斥了取消派，在专门的决议中明确了党对组织问题的观点：党是由各个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支部组成的，这些支部应当“在群众中”建立“工作据点”，也就是尽量广泛的和分散各地的各种合法工人团体网。

而1910年1月的中央全会和1912年1月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肯定了党的这个观点。对于这个十分明确的坚定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同志最近一期的“日志”（1912年4月第16期）说得最清楚了。我们说最清楚，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当时正是采取了中派立场（在关于一月代表会议的意义的问题上）。他虽站在中派立场上，却完全肯定了党的这个既定观点，他说，如果没有秘密支部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专门决定，不能认为从党组织中分裂出去，或从党组织中逃跑，或在党组织之外建立的所谓“倡导小组”是党的组织。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让“倡导小组”自己决定它们

是否隶属于党，这在原则上就是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上就是支持取消派并使他们合法化。

看来，党很多次完全肯定地解决了的这个問題经过中派普列汉诺夫上面的解释，应当认为不再有問題的了。但是，由于取消派最近一次代表会议的決議，又要把已經澄清的明显的問題搞乱，就不得不再回到这个問題上来。“涅瓦呼声报”（第9号）大罵反取消派，宣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不是取消派代表会议。但是，代表会议关于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这个最重要問題的決議，十二分清楚地証明代表会议是彻头彻尾的取消派代表会议。

因而，必須詳細地分析一下这个決議，为此必須援引決議的全文。

一

取消派代表会议的決議称做“关于党的建設的組織形式”，而事实上，決議的第一項就表明談的不是建設的“形式”，而是要“建設”什么党，是老党还是新党的問題。下面就是这个決議的第一項：

“代表会议討論了党的建設的形式和方法問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1. 要把社会民主党改組为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自治組織，只有使社会民主党組織在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形成起来。”

这样，关于党的建設的決議的头几个字就断然認為必須改組党。这至少是奇怪的。当然，每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改組”党，但是承認不承認老党的話分明已經談了4年！这又有誰不知道呢？

党的決議（1908年12月）十分明确地談到斥責取消派想以新

党“代替”老党的問題。普列汉諾夫在 1912 年 4 月質問那些維持召集(已經召开了)取消派代表會議的“倡导小組”的人們,直截了当地質問他們:“我們老党存在不存在?”(1912 年 4 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 16 期第 8 頁)

這個問題是迴避不了的。這個問題是在 4 年斗争中提出来的。所謂党内“危机”十分尖銳就表現在這個問題上。

当有人对这种問題这样来回答我們:“要把社会民主党改組为……只有使……”,我們立刻就看出这不是回答,而是支吾搪塞。

老党党员可以談改組党。而先生們,你們迴避老党是否存在的問題并且径直用命令規定(在非党的“倡导小組”的参加下)“改組”,只能完全証实你們是站在取消派的立場上! 当決議(在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自治組織”这种毫无內容的漂亮辞藻之后)把事情归結为“改組……”“只有使社会民主党組織在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形成起来”(我們就不必談那种可笑的、夸张的和糊塗的措詞了)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奇怪決議的起草人是否把罢工和游行示威叫做“吸引群众参加公开的”……生活呢? 从邏輯上看,是这样的! 既然如此,決議就完全是空話,因为每个人都清楚知道,“組織”就是不經過罢工和游行示威也能“形成起来”。聪明透頂的先生們,組織是經常存在的,而群众的公开发动只是偶然的。

取消派先生們說的“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人們竟然运用这种恰好是 30 年前“俄罗斯新聞”上的御用自由派的文风!)是指工人运动的合法形式,而决不是罢工、游行示威等等。妙极了。既然如此,決議就是一篇空話,因为我們的組織根本不是“只有”在吸

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形成起来”和形成了的。我們在許多不允許任何合法运动的形式存在的地方都有組織。

因此，決議的主要一項（“只有”……組織……形成起来）就毫无用处。簡直是乱七八糟。

但是从这样乱七八糟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取消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才能改組——这就是第1項文字的真正内容。而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

我們的組織是由外围有尽量多的合法团体网的秘密支部組成的，这些话，党已經說了4年。

取消派否認自己是取消派也否認了4年，而且关于只有在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的过程中才能改組的話也重复了4年。至于對我們党是由什么組成的和这个老党是怎样的党的問題則避而不談，正如合法派所需要的那样避而不談。談來談去还是老一套。普列汉諾夫在1912年4月問道：我們老党存在不存在？取消派代表會議回答說：“只有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才能改組！”

这是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回答，他們昨天神气十足，玩弄了党，而今天（遭受失败以后）变得胆怯了，靠花言巧語来詭辯。

二

決議的第2項写道：

“2. 由于同革命前相比，社会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現有的和新建的秘密的党組織应当适应公开的工人运动的新形式和新方法。”

又是絕妙的邏輯。原来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只決定組織形式的改变，而对这种改变的方向，決議未作任何論証。

決議为什么要說“社会政治条件发生变化”这样的話呢？显然是为了証明、論証并得出自己的实际結論：秘密組織应当适应合法运动。但是从上面的話根本得不出这种結論。“由于条件发生变化”；合法运动应当适应秘密組織——这种結論才是合理的！

取消派为什么会这样糊塗呢？

原来是他們害怕道出真相，尽量脚踏两只船。

而真相在于取消派是从取消派（列維茨基、拉林、叶若夫等等）对“时局”的估計出发，因为說明“社会政治条件”怎样“发生变化”，这也就是对时局的估計。

但是，他們害怕直接談出这种估計。他們的代表會議甚至不敢提出对时局的估計問題。代表會議偷偷摸摸地販运这种观点：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秘密組織需要“适应”合法运动。

这种观点同立宪民主党的观点毫无区别，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立宪民主党人完全承認，他們“的”党“整个被迫处于秘密状态”（見取消派的決議第3項），由于条件发生变化，秘密的党应当适应合法的运动。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这已經够了。在他們看来，他們的党被取締、他們的党处于秘密状态都是一种偶然的、“不正常的”和残存的現象，而主要的、本質的和基本的是他們的合法工作。他們这个观点的邏輯根据，是格烈迭斯庫尔先生所作的“对时局的估計”：不需要新的革命，只需要“立宪工作”。

立宪民主党处于秘密状态是偶然的，是“立宪工作”总体系中的例外情况。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是，秘密組織应当“适应合法运动”。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也就是这样。

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則不同。从我們党对时局的估計中得出的主要結論是：革命是需要的，并且即将到来。导向革命的发展形式虽然有了改变，但革命的旧任务依然如故。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組織形式应当改变，“支部”的形式应当灵活，发展支部不要經常靠发展支部本身，而要靠发展它的合法的“外围組織”，等等。所有这些在党的決議中已經講过多次了。

但是，秘密組織形式的这种改变，絕不等于使秘密組織“适应”合法运动的这种公式，完全不等！合法組織是把秘密支部的思想貫徹到群众中去的据点。就是說，我們改变发生影响的形式，是为了使早先的影响循着秘密的方向前进。

就組織形式來說，是秘密“适应”合法。就我們党的工作的內容來說，是合法行动“适应”秘密思想。（順便指出，“革命的孟什維主义”反对取消派的整个斗争就是从这里引起的。）

你們想想看，我們的取消派承認第一个前提（工作的形式），而忘了第二个前提（工作的內容），他們多么深思熟慮啊！！他們讓自己的立宪民主党的思想表現在关于党的建設的組織形式的議論上，于是，他們发出以下的議論：

“应当这样来建設党：通过吸引群众参加合法运动来改組（党），使秘密組織适应合法运动。”

試問，这象党的回答呢？——（建設党就是巩固和发展秘密支部，在秘密支部周圍建立合法据点。）

——还是象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思想，而使取消派的遁辞合法化呢？——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諾夫先生在1906年8月建立“公开党”的时候，正是維護这种思想；見1906年“俄国財富”杂志第8期和“无产者报”第4号“社会革命党孟什維

克”一文^①。

三

決議第3項写道：

“3. 目前，当社会民主党組織整个被迫处于秘密状态的时候，就应当竭力使个别部分公开进行党的工作，竭力为此建立相应的机关。”

我們已經指出，这段話从头到尾不折不扣地描写了立宪民主党的真情实况。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字眼放在这里是不对头了。

的确，立宪民主党“整个”“被迫”处于秘密状态，的确，他們在目前（目前，謝天謝地，我們已經有了宪法……）“就”竭力使自己个别部分公开进行党的工作。

在这个取消派決議的字里行間貫穿着的隱諱的前提，正是認為“立宪工作”是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持久的、基本的工作。

这是根本錯誤的。这也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無論“整个”也好，每个支部也好，或者——最主要的——宣传革命和准备革命的工作的全部内容也好，都是秘密的。因此，不能認為社会民主党的最公开的支部的最公开的工作是“公开进行的党的工作”。

例如，在1907—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公开的”支部是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它能够比一切組織都“公开地”談問題。它是唯一合法的，它能够公开談很多問題。

但不能談一切問題！不仅一般地“不能公开談一切問題”，甚至“不能公开談”自己的党、自己的党的工作的“一切問題”和最主

^①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1卷第170—179頁。——編者注

要的問題。因此，甚至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來說，我們也不能同意取消派決議的第3項。至于党的其他“个别部分”就更不用說了。

取消派是“公开的”、合法的党的拥护者。他們現在害怕(工人們迫使他們害怕，托洛茨基劝告他們害怕)直接說出这一点。但是他們开始吞吞吐吐地談論这一点。他們閉口不談党的合法化。他們却鼓吹党的局部合法化！

中派的普列汉諾夫在1912年4月对取消派說，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倡导小組”是反党的。取消派的代表會議回答說，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合法派的“倡导小組”也就是个别部分公开进行“党的工作”，也就是秘密的党应当“适应”的“公开运动”，也就是“公开的生活”，而“参加”这种生活是党进行必要“改組”的准繩和保證。

如果取消派所說的托洛茨基召来的“反取消派”贊同这些观点符合事实，那末取消派碰上的該是头脑多么简单的对手！

四

決議的最后一項写道：

“4. 社会民主党組織由于处于秘密状态，不可能把自己影响的对象即广大的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的范围中来，因此应当同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积极的阶层取得联系，通过它們同群众取得联系，其方法就是建立各种比較固定的合法的或秘密的政治組織，各种合法的外围团体（如选举委员会、根据3月4日法令建立的政治团体、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組織、反对物价上涨的团体等等），以及使自己的行动适应非政治性的工人組織。”

这里，关于合法外围团体的不容爭辯的議論不仅掩飾了可以

爭辯的內容，而且掩飾了簡直是取消主義的內容。

建立合法的政治組織，這也就是列維茨基和尼·羅一柯夫所鼓吹的內容，這也就是黨的局部合法化。

我們對取消派已經這樣講了一年多：說夠了，你們建立“工人階級利益保障協會”等等之類的“合法政治團體”吧。說夠了，你們行動吧！

但是他們行動不起來，因為現在的俄國不能實現自由派的空想。他們只能用這種掩飾的手法維護自己的“倡導小組”，讓這個小組針對“合法政治組織”高談闊論、相互鼓勵、提出建議和意見。

他們維護自己的“倡導小組”，在決議中正式宣稱秘密組織應當“同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積極的階層取得聯繫，通過它們同群眾取得聯繫”!!! 就是說，在支部之外還有“政治上積極的階層”！這難道不是簡單地重復人所共知的所謂一切積極分子都從“僵化的黨”逃到“倡導小組”去的叫囂嗎？

“我們的曙光”雜誌和“生活事業”雜誌咒罵秘密的黨而直截了當地說出的話，托洛茨基同被開除出黨的取消派則說得“委婉一些”：在狹隘的秘密的黨以外，似乎還有更“積極的”分子，應當同他們“取得聯繫”。我們——從黨內分裂出去的取消派，是積極分子；“黨”應當通過我們同群眾取得聯繫。

黨十分明確地說過，在領導經濟鬥爭中，社會民主黨的支部必須同工會、同工會中的社會民主黨小組、同工會運動的各個活動家合作。或者，在選舉杜馬的選舉運動中，使工會同黨的步調一致。這是很明確很清楚的。取消派却不這樣看，他們鼓吹整個黨的工作糊里糊塗地適應“非政治性的”即非黨的工會。

巴·波·阿克雪里羅得把取消派的思想授給了托洛茨基。當

阿克雪里罗得在“我們的曙光”杂志上遭到惨败后，托洛茨基就劝他用他們自己也被搞糊塗了的詞句来掩飾这种思想。

这种伎俩是誰也欺騙不了的。取消派代表會議一定教会工人更严格地探究模稜两可的話。除了这种可怜的、毫无意义的，但在資产階級社会中不无用途的“科学”以外，这次代表會議不会使工人得到什么。

我們透过列維茨基的便服研究了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思想，透过托洛茨基的五光十色的华丽外衣也不难看出这种思想。

党的关于秘密組織和它的合法工作的思想，比所有这些虛假伪善的詞句越来越显得有力。

載于1912年11月5日(18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 勝利的社会意义

“对馬其頓來說，它被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征服，意味着資產階級革命，意味着它自己的 1789 年或 1848 年”，——奧地利的馬克思主义者奧托·鮑威爾的這些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現在巴爾干發生的事變的主要實質。

1789 年的法國革命，1848 年的德國革命和其他國家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因為這些國家廢除專制制度和地主、農奴主的特權，實際上是使資本得到自由發展。但是，不言而喻，這種革命正是工人階級的利益所迫切要求的，就連那些“非黨的”、還沒有組成階級的 1789 年和 1848 年的工人，也成了法國和德國革命的先進戰士。

馬其頓同所有的巴爾干國家一樣，經濟上非常落后，在那里，還保留着大量農奴制、中世紀農民對地主封建主的依附關係的殘余。這些殘余包括：農民向地主繳納代役租（貨幣或實物），其次是分成制（在分成制的情況下，馬其頓的農民通常把收成的 $\frac{1}{3}$ 交給地主，比俄國少些），等等。

馬其頓的地主（所謂斯帕吉）是土耳其人，伊斯蘭教徒，農民則是斯拉夫人，基督教徒。因此，階級矛盾由於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而更加尖銳。

因此，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的勝利，意味着馬其頓封建統治的垮台，意味着農民土地占有者這一比較自由的階級的形成，意味着巴爾干各國曾經受到專制制度和農奴制關係阻礙的整個社會的發展得到保證。

各種資產階級報紙，從“新時報”到“言論報”，都在談論巴爾干的民族解放，却避而不談經濟解放。而實際上，後者恰恰是主要的。

只有徹底擺脫地主和專制制度的壓迫，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決的充分自由才會必然到來。相反地，如果地主和巴爾干君主制對人民的壓迫仍然存在，民族壓迫也就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繼續存在。

如果馬其頓的解放是通過革命，即通過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農民共同反對所有民族的地主（以及反對巴爾干各國的地主政府）的鬥爭而實現的，那末巴爾干人民為爭取解放獻出的生命，大約只有在現在戰爭中所犧牲的1%。這樣，為爭取解放而付出的代價會輕得多，解放也會徹底得多。

試問，究竟是哪些歷史原因使得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通過戰爭而不是通過革命的呢？主要的歷史原因是：巴爾干各國的農民群眾軟弱、分散、落后和愚昧，以及工人數量太少，雖然後者對形勢了解得很清楚，並且提出了建立巴爾干聯邦（聯盟）共和國的要求。

由此可以明顯看出，歐洲的資產階級和歐洲的工人對待巴爾干問題的態度根本不同。資產階級，甚至象我國的立憲民主黨人這樣的自由資產階級都大喊“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這就是直接歪曲了現在巴爾干發生的事變的真相和歷史意義，給巴爾干各國人民的真正解放事業增添了困難。這就是贊成在某種程度上

保存地主特权、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

工人民主派则相反，只有它才坚决主张巴尔干各国人民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只有使巴尔干各民族的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彻底解放，才能根本消除一切民族压迫。

載于1912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162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新生的中国

先进的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 $\frac{1}{4}$ 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文明的欧洲却不加理会。直到现在，法兰西共和国甚至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法国众议院内，不久将就这一点提出质询。

为什么欧洲这样冷淡呢？因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已经腐烂了四分之三，准备为了取得对付工人的“严厉”办法或1卢布多赚5戈比利润而把自己的全部“文明”出卖给任何一个冒险家。在这个阶级眼里，中国不过是一块肥肉。现在，当俄国“亲密地拥抱了”蒙古以后，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等都想来争尝这块肥肉。

但是，中国还是日新月异地前进着。目前，正在开始选举国会——专制制度推翻以后的第一届国会。众议院将由600名议员组成，“参议院”将由274名议员组成。

采用的选举制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直接的。只有年满21岁、在选区内居住两年以上、缴纳2元左右的直接税或有500元左右财产的人才享有选举权。首先选出复选当选人，再由复选当选人选举议员。

这样的选举制就已经说明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

而无产阶级沒有参加或者根本沒有力量。

中国政党的性質也表明了这种情况。主要的政党有三个：

(1)“激进社会”党。这个党实际上同我国的“人民社会党”和 $\frac{9}{10}$ 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絲毫沒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它的主要要求是：爭取全国的政治統一，“在社会方向下”（这种用語同我國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慣用的“劳动原則”和“平均制”一样含糊不清）发展工商业，維持和平。

(2)第二个政党是自由党。它与“激进社会”党联合，共同組成“国民党”。这个党很可能在中国第一届国会中占多数。它的領袖就是人所共知的孙逸仙博士。現在他正忙于制訂大規模的铁路网計劃（告訴俄国民粹派：孙逸仙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的命运！）。

(3)第三个政党叫做“共和派联盟”。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招搖撞騙的典型！事实上它是保守党，主要依靠中国北方也就是中国最落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資产者。“国民”党主要依靠中国工业較发展、較先进、較发达的南方。

“国民党”的主要支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它的一些領袖是曾在外国留学的知識分子。

农民民主派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使中国爭得了自由。沒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究竟能否坚持民主主义立場对付那些伺机向右轉的自由党人，——这在不久的将来便見分晓。

載于1912年11月8日

“真理报”第163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

“民主党人”威尔逊当选了北美合众国总统。他得了600多万张选票，罗斯福（新的“民族进步党”）得了400多万张选票，塔夫脱（“共和党”）得了300多万张选票，社会党人尤金·德布兹得了80万张选票。

美国选举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社会党的选票激增；美国选举的意义还在于资产阶级政党经受最大的危机，在于它们急剧地瓦解；最后，选举的意义在于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持有资本主义观点的政党即资产阶级政党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而且政治自由愈多，资产阶级政党就愈稳固。

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因此，在这里，在1860—1865年由于奴隶占有制爆发内战以后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十分稳固和强大。原先奴隶主的政党，就是所谓“民主党”；赞成黑人解放的资本家政党则发展为“共和党”。

在黑人解放以后，两个政党之间的区别愈来愈小。这两个政党的斗争主要是在关税率高低的問題上。这种斗争对人民群众没有多大意义。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

美国和英国推行的这个所謂“两党制”，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但是，就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两党制也遭到破产！为什么会遭到破产呢？

这是由于工人运动的力量，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是面向过去，而向解放黑人的时代。新的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进步党”则面向未来。它的全部綱領圍繞着资本主义的存亡的問題，即圍繞着工人保护的的問題和“托拉斯”（美国对资本家同盟的称呼）問題。

老的政党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任务是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各个政党的斗争归结为如何更好地加速和促进这种发展。

新的政党是现代的产物，它提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存亡問題。在最自由最先进的国家美国，这个問題最明显最广泛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綱領、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圍繞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

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老的欧洲是作为自由主义教授的空談出現的，而在自由的美国一下子就作为拥有 400 万选票的政党出現了。这是美国方式。

这个党說道，我們用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我們要制定最先进的工厂法。我們要对全部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在美国，这就是对全部工业实行监督！）。我們要对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是为了消灭貧困，大家都得到“合理的”工資。我們要确定“社会公平和工业公平”。我們要发誓实行一切改良……我們就只不愿意实行一种“改良”——剝夺资本家！

在美国，现在全部国民财富是 1 200 亿美元，合 2 400 亿卢布左右。其中 $\frac{1}{3}$ 左右即 800 亿卢布属于洛克菲勒和摩尔根两家托拉斯，或者受这两家托拉斯控制！组成这两家托拉斯的不到 4 万个家庭是 8 000 万名雇佣奴隶的领主。

显然，只要这些现代奴隶主存在，一切“改良”都是无聊的骗局。罗斯福明明是被狡猾的百万富翁雇来宣传这种骗局的。他所许诺的“国家监督”，在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反对罢工和镇压罢工的手段。

但是，美国无产者已经觉醒了，并且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用有力的讽刺来回答罗斯福的成就：亲爱的无赖罗斯福，你想用改良主义的诺言来诱惑 400 万人吗？妙极了！明天，这 400 万人就会看出，你的诺言原来是骗局，这 400 万人现在所以跟着你走，只是因为感到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

载于 1912 年 11 月 9 日

“真理报”第 164 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我們党的“迫切問題”

“取消派”問題和“民族”問題

1912年8月，波兰和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召开了波兰社会民主党“边区代表會議”。大家知道，这个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現在是一个沒有党的执行委员会。在波兰的首都华沙，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組織痛斥了总执行委员会的瓦解組織的政策，而总执行委员会为了回答这一点，采取了卑鄙的匿名的方法来控訴人家挑拨离間，建立假的华沙組織，赶紧召开“自己的”經過处心积虑謀划出来的边区代表會議。

后来，华沙工人选民团的国家杜馬选举，完全証明了所謂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是虛构的：66个初选人中有34个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只有3个（而且还不一定）是拥护总执行委员会的。

所以要預先这样說明，是为了使讀者把我們打算談的波兰和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党边区代表會議的決議，只看做梯什科总执行委员会的決議，而决不要看做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決議。

—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迫切的。因此，梯什科代表會議关于这个問題的決議值得比較仔細地研究，尽管这个決議很难認真对待。

謾罵滿篇的梯什科決議之所以很難認真對待，這至少是由于這個決議對一個主要問題，即取消派問題所採取的態度。

這是1908—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主要問題。黨受到了反革命的嚴重破壞。黨竭力恢復自己的組織。在反革命猖獗的整整四年當中，黨同社會民主黨中要取消黨的集團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因此，誰不明确地解決取消派的問題的人，要自稱黨員是枉然的，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梯什科代表會議在關於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態度的決議中，談得最多的是取消派問題。代表會議承認，取消派是“阻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發展的最大障礙，對黨的存在本身是嚴重的威脅”。

決議寫道，“公開的徹底的取消派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是勢不兩立的”。

由此可見，梯什科之流大胆地堅定地提出了問題——卻又避而不答！

到底誰是“公開的徹底的”取消派？同取消派四年鬥爭的經驗得出了什麼實際結論呢？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2年一月代表會議對這些自然的必然的問題做了明確和肯定的回答：取消派，這就是“我們的曙光”雜誌和“活的事業報”集團。這個集團把自己置於黨外。

可以認為這個回答是正確，或是不正確，但是不能不承認這個回答是明確的，也不能不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場！

而梯什科代表會議正是企圖迴避問題，躲躲閃閃，象個小偷。如果我們在1912年1月明白指出的“我們的曙光”雜誌是公開的徹底的取消派不符合事實，為什麼梯什科之流在1912年8月不在

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面前揭露我們的錯誤呢？如果說“我們的曙光”杂志把自己置于党外不符合事实，如果你們，梯什科、罗莎·卢森堡、瓦尔斯基先生們都認為它是在党内，你們为什么不干脆說出来呢？要知道，这是你們对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直接义务啊！

尽管你們对1912年一月“列宁的”代表會議尽量地責罵、詛咒、謾罵，但是，你們这些叫囂除了甘願受騙的以外，是誰也騙不了的。因为在一月代表會議以后，对于“我們的曙光”杂志是不是取消派、这个集团在什么地方、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这样的問題，不明确地加以回答，就不能算是有觉悟的忠誠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不能談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

二

梯什科代表會議对“列宁派”进行大量的、各式各样、一連串的謾罵，总起来无非是責备我們搞分裂。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會議認為，站在党外的只有“我們的曙光”杂志集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就連梯什科和他的朋友們也能得出这样一个簡單明了的結論：責备我們搞分裂，就是承認“我們的曙光”杂志集团有党性。

就連小孩子也懂得必然会得出这个結論，何况梯什科及其同伙早已成年了……

誰責备我們搞分裂，至少应当有这么一些起碼的勇气、起碼的老实来直截了当地說：“‘我們的曙光’杂志集团不是取消派”，“它不應該在党外，而應該在党内”，“它是党内的合法流派”，等等。

問題的全部實質恰恰在于責备我們搞分裂的梯什科先生之流是偷偷摸摸地、羞羞答答地、轉弯抹角地談論这一点（因为这一点

很自然地表現在关于分裂的叫囂中)，而不敢直說！

要說明和證明“我們的曙光”杂志應該在党内，是不容易的。誰这样說，誰就負有解决一定的原則問題、公开維護取消派头子的一定責任。这种人可以（并且应当）說是取消派的拥护者，但是至少在取消派的某些集团有无党性这个狹隘的問題上，不能不認為他是有信念的人，不能不承認他有政治上的忠誠。

如果整个边区的整个組織（姑妄稱之）或所有組織轉弯抹角地、偷偷摸摸地、羞羞答答地和吞吞吐吐地維護取消派，責备那些把取消派开除出党的人搞分裂，而不敢直說“这个取消派集团應該在党内”，那末必然得出这样的結論：在我們面前的不是持有某些观点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組織，而是力图“利用”取消派同反取消派的斗争撈取一小笔政治資本的阴谋家集团。

对于了解1907年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情况的人来说，梯什科及其同伙跟着崩得分子走（这是社会民主党人中通常称为“天平上的馬克思主义者”、“騎墙派”的这些阴谋家的典型），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梯什科也同某些崩得分子一样，他們在党内的整个“立場”的基础是在取消派和反取消派之間耍把戏，做調停人，利用“天平砝碼”撈一把，因为沒有这个砝碼，不論取消派还是反取消派，都得不到多数！

1911年秋天，当梯什科耍的这个大家厌恶的老“把戏”使他垮台的时候，两个对立的派別——取消派或反取消派的机关报都在报刊上公开称他是阴谋家。

其实，只要从“天平砝碼”的角度来看，梯什科代表會議的不合邏輯的、孩子般天真的、軟弱无力到可笑程度的決議就可以完全了解。阴谋家这样說，也正应当这样說：我譴責取消派……但我不

直說誰是公开的彻底的取消派！我承認取消派对党的存在本身是威胁……但我不直說这个集团应当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我在任何情况下总 能从这种“立場”得到好处，捞到“政治資本”，因为 沒有我，反取消派不能战胜取消派，沒有我，取消派就不能在党内得到可靠地位！！

“梯什科”的政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現象。在分裂时，一般說来，在各个派別展开残酷的斗争时，必然会出现这样的集团，它們存在的基础就是不停地从这一边跑向那一边，施展小小的阴谋詭計。这是我們党的生活的可悲的、不愉快的特点，它由于国外革命工作的条件而更加突出。阴谋集团，某些同国内联系特別差的集团的政策阴谋特点，——这是一种現象，为了使自已不受蒙蔽，不做各种“誤解”的牺牲品，应当了解这种現象。

三

当然，“統一”的口号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深受欢迎”，因为他們不知道应当同誰統一，这种統一意味着对某个集团作 哪些讓步，根据什么原則 規定吸收取消派入党或开除他們出党的政策。

当然，煽动性地利用这种对事情实質 不了解 来叫喊“分裂”是最容易不过的了。用“統一”永远分离了的派別的要求来掩飾小集团的外交手腕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不管“統一”的口号在沒有覺悟的人們中間受到多大的“欢迎”，不管現在各种各样的煽动家、阴谋家、小集团的外交家用这个口号进行掩飾多么方便，我們还是要求每个有覺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2 年一月代表會議解决的問題做出明确的回答。

1912年8月召开的取消派代表會議清楚地表明，一切爭論的中心正是关于取消派的問題，关于取消派集团有无党性（甚至反党性）的問題。誰迴避這個問題的實質，誰就是自欺欺人。

但是要知道，空談一月代表會議的“派別性”等等，正是迴避問題的實質。好吧，先生們，可以这样回答空談家們：就算一月代表會議是帶有极端的派別性，分裂性，是无权代表的，等等。但是要知道，你們这样“危言聳听”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不要管是哪一部分）在一月說，“我們的曙光”杂志是站在党外的反党的取消派。这个意見在根据党的四年历史做出的詳尽的、說明理由的決議中得到了論証。

誰要真心闡明并駁斥这些所謂“一月”社会民主党人的錯誤，誰就应当分析并推翻这个決議，說明和証明：“我們的曙光”杂志应当在党内，它的思想对党沒有危害，应当对这个集团做某些讓步，应当要求它履行某些义务，履行这些义务的保証应当是什么什么，这个集团在党内的影响的大小应当如何如何确定。

这样提問題，才是老老实实在地駁斥一月社会民主党人的信念，才是向工人闡明那种你所認為不正确的东西。但是問題的實質在于：在現在廉价地叫喊分裂的人中間，沒有一個人設法这样提出問題。

因此，我們鄙夷地撇开了煽动家和阴謀家，泰然地重复說：我們关于开除取消派的決議是不能推翻的，也是难以推翻的。新的事实，例如同托洛茨基用語近似的取消派的“光綫报”⁸⁹的出版，只有百倍地增加了我們決議的力量。五月发动，成百的工人团体团結在反取消派报纸的周围，工人选民团对第四届国家杜馬的选举等事实，彻底証明了我們反对取消派的立場是正确的。

“分裂”的叫囂不会动摇这个信念，因为这样叫囂就是用虛伪的手法胆怯地、隱蔽地 维护 取消派。

四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2 年一月代表會議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原則問題，即关于我們党在民族方面的結構問題。由于篇幅不够，我只簡短地談談这个問題。

是完全的联邦制还是不完全的联邦制，是“最坏形式的联邦制”还是完全的統一？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摆着。

梯什科代表會議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也光用謾罵和叫喊，什么“捏造”、“歪曲事实”等等。他們——这位梯什科及其随从，是多么无聊的空喊家呵！

拉脫維亞、波兰、犹太（崩得）社会民主党人彼此有隔閡，这是事实。每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在波兰，同崩得过去沒有而且現在也沒有任何統一。俄国人同崩得的情况也是如此。“各民族”有自己单独的組織、自己的中央机关、代表大会，等等。俄国人却沒有这些，而且沒有互相斗争的和不熟悉俄国情况的崩得分子、波兰人、拉脫維亞人参加，俄国人的中央委员会就不能解决俄国人的問題。

这是事实。你怎样謾罵都不能推翻这个事实。1907 年以来，我們党内的全体同志都看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感到这种情况不正常。我們的代表會議甚至把它称为“最坏形式的联邦”^①。

忠誠老实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應該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提法。

^①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17 卷第 415—416 頁。——編者注

八月代表會議最明確地証實了這種提法的正確性，連普列漢諾夫也承認這個代表會議是用它的臭名遠揚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決議來使“社會主義遷就民族主義”。

崩得和梯什科總執行委員會都同樣對神發誓，說他們贊成統一，但是在華沙、洛茲等地，他們之間却是最徹底的分裂！！

“取消派問題”同“民族問題”的聯繫不是我們杜撰出來的，而是生活本身暴露出來的。

讓一切認真思考的社會民主黨人也來提出和討論“民族問題”吧。是聯邦還是統一？是“各民族”有單獨的中央而俄國人沒有單獨中央的聯邦，還是完全的統一？是各地崩得的名義上的統一和實際上的分裂（或破裂），還是從下到上的實際上的統一？

誰認為可以迴避這些問題，誰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誰指望簡單地恢復1907—1911年的“最壞形式的聯邦”，誰就是自欺欺人。這個聯邦已經不可能恢復了。這個雜種已經不能復活了。黨已經永遠離開它了。

黨到哪里去了呢？是實行“奧地利”聯邦⁹⁹，還是完全拒絕聯邦而實行實際上的統一？我們贊成後者。我們反對“使社會主義遷就民族主義”。

請大家全面地考慮一下，並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

寫於1912年11月

第一次載於1913年8月《Pismo Dyskusyjne》（“爭論專頁”）雜誌第1期

署名：尼·列寧

根據雜誌原文（波蘭文）譯成俄文刊印

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問題⁹¹

杜馬中的工人发言人的第一次发言应当以哪些根本思想为基础呢？

当然，工人们都会十分焦急地、十分关心地等待第一次发言。当然，他们希望正是从第一次发言中听到集中叙述的关于大家特别关心的、在国内一般政治中尤其是在工人运动（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的实践中居于特别显著地位的那些問題的主要的、根本的意见。

以下各点就是这样的問題：

(1) 第四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的繼承性。所謂繼承性，应该理解为保持同以前几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不可割裂的联系，同时要特别強調同第二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联系，因为它曾經受到人所共知的反革命的攻击。

強調繼承性很重要，因为工人民主派同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它把自己在第一、二、三、四届杜馬中的工作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允許因为事变的任何曲折（或者象六三政变这样的任何政变）而放弃自己的任务，不去追求自己坚定不移的目的。

(2) 工人代表的第一次发言必需講的第二点是社会主义。其实这里包括两个題目。一个題目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大軍中的一支队伍。波克罗夫斯基在第三届杜馬也



曾这样說过（見他的声明，官方出版的1907年11月16日第7次會議速記記錄第328頁）。說明这一点显然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在現在，說明另一点也是极端重要的。就是說明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現狀和任务。社会主义运动的現狀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争极端尖銳（生活費用高涨，群众性的罢工，各大国的帝国主义，它們为爭夺市場而进行疯狂竞争，它們走向战争）；（二）社会主义即将实现。全世界工人階級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使自己的組織社会主义政党的权利得到承認，而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在杜馬講坛上談論这一点，告訴俄国工人欧洲和美洲爭取社会主义的伟大战斗已經开始、社会主义在文明世界即将胜利（必然会胜利），是极端重要的。

（3）第三点是关于巴尔干战争、国际形势和俄国的对外政策。

这个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題目决不能避而不談。这个題目包括下列几个問題：

（一）巴尔干战争。俄国工人代表也应该宣布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反对斯拉夫人同土耳其人互相仇視。爭取巴尔干一切民族的自由和平等。

（二）反对其他强国干涉巴尔干战争。必須响应巴塞尔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⁹²召开时举行的那种維持和平的游行示威。以战争对付战争！反对一切干涉！保卫和平！这就是工人的口号。

（三）反对俄国政府的整个对外政策，要特別提到渴望侵占（并且已經开始侵占）博斯普魯斯海峽、土耳其屬阿尔明尼亚、波斯、蒙古的“野心”。

（四）反对政府的民族主义，同时指出芬兰、波兰、乌克兰、犹太等是被压迫民族。为了抵制一切不彻底的提法（例如单单提出

“平等”)，确切地說明一切民族的政治自决的口号是极端重要的。

(五)反对自由派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不那么粗暴，但是由于它的虛伪、由于它对人民进行“巧妙的”欺騙而特別有害。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种自由派（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呢？从关于“斯拉夫人”的任务的沙文主义言論，从关于俄国的“大国任务”的言論，从主张俄国为了掠夺其他国家而同英国和法国达成協議的言論可以看出来。

(4)第四点是俄国的政治形势。在这个题目下主要是描繪无法无天、专横暴虐的情形，說明政治自由的极端必要性。

这里应该特別指出：

(一)必須提到庫托馬尔和阿尔加契等地監獄的事件⁹³。

(二)指出选举舞弊，拿破仑主义的手法，甚至六三政变所依靠的那些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也不信任政府了。

强迫神甫昧着良心投票。

杜馬向右轉，全国人民向左轉。

(三)特別重要的是正确說明取消派臭名远揚的“結社自由”的口号同一般政治自由的任务之間的关系。指出下面这一点也极端重要：出版、結社、集会、罢工自由对工人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正是为了实现这种自由，就应当懂得这种自由同政治自由的一般基础、同整个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的密切联系。不是六三政制下自由派的結社自由的空想，而是为了一般自由、也为了結社自由而同这个制度展开全面的斗争，反对这个制度的基础。

(5)第五点：农民的难以忍受的处境。在1911年有3000万飢民。农村的破产和貧困。政府的“土地规划”只会使情况更加恶化。財政稳定虛有其表，是靠强征賦稅、鼓励人民酗酒取得的表面的穩

定。甚至第三届杜馬的右派农民（“43个农民”）的温和的土地草案⁹⁴也被束之高閣。农民必須摆脫地主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

（6）第六点：第四届杜馬选举时的三个陣营和国内的三个陣营：

（一）政府陣营。軟弱无力。选举舞弊。

（二）自由主义陣营。这里极端重要的是指出（哪怕用一两句话指出）自由派的反革命性，他們反对新的革命。可以一字不改地援引“真理报”第85号（8月8日）轉載的格烈迭斯庫尔的話^①：“用不着第二次人民运动（即第二次革命），需要的只是冷靜的、頑強的、有信心的立宪工作。”格烈迭斯庫尔就是这样說的，“言論报”也就把这些話发表出来了。

自由派希望在保存現存制度的基础上，不經過广大的人民运动就实行立宪改革，这是空想。

（三）第三个陣营是民主派。它以工人阶级为首。以第三者的口吻談論过去，可以談談連“莫斯科呼声报”也講过的話，即工人阶级是在下面三个口号下参加选举的：（1）建立民主共和国；（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3）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还农民。

（7）第七点：指出1912年的政治运动和罢工。

（一）极端重要的是指出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达到了一百万。整个解放运动的活跃情形。

（二）极端重要的是指出工人的政治罢工具有全民的目的，它提出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民的任务。

（三）必須指出，正是政治罢工和經濟罢工相結合使运动具有

^① 見本卷第245—246頁。——編者注

了蓬勃的力量。

(四)指出工人抗議判处水兵死刑。

(8)第八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它是由上述各点产生的,并且同上述各点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他的领袖作用。他领导全体人民,领导整个民主派。他要求自由并且领导群众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举出例子和典型。鼓舞人心。造成新的情绪。

(9)第九点也是最后一点,进行简短地重复和综合。以第三者的口吻谈论有觉悟的工人,应当指出他们“坚定不移地忠于”下面三个原则:第一是社会主义;第二是“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原则”,工人们都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事实应当谈一谈;第三是工人忠于“自己的共和制的信念”。这里指的不是号召,不是口号,而是忠实于信念。(在英国、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等许多君主制的国家中都有公开的共和党。)

附言。可能还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专门提出“结社自由”的必要性的问题。应当指出,取消派常常在这个幌子下提出在毫不触动六三政制基础的条件下实行立宪改革的自由主义的要求^①

写于1912年11月

1930年第一次载于“列宁全集”

第2、3版第16卷

按手稿刊印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关于杜馬中的工人代表 和他們的宣言問題⁹⁵

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第四届国家杜馬的講坛上发言时，要声明自己的活动同历届国家杜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有不可割裂的繼承联系，特别是同受到反革命史无前例的政治报复的第二届国家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有不可割裂的繼承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伟大的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解放大軍中的一支队伍。現在，这支解放大軍在全世界特別迅速地发展着；生活費用普遍高涨，联合成同盟、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的資本的压迫和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使工人群众的处境愈来愈难以忍受，使資本同劳动的斗争愈来愈尖銳；資本主义的末日快要来到了，千百万团结一致的无产者不久就会建立一种不再有群众的貧困、不再有人剝削人的現象的社会制度。

社会民主党党团要响应在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战争的全世界工人的呼声。工人要求和平。工人反对任何干涉巴尔干事件的行动。只有巴尔干各国人民得到充分的自由和完全的独立，只有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才能够保証通过最好的办法来摆脱現在的危机，以及通过承認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和有政治自决的絕對权利的办法来真正解决民族問題。

第四届国家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別反对俄国政府的对外政

策。它痛斥我們國家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土耳其屬阿尔明尼亞、波斯、中國強占別人的土地來擴張領土的企圖；痛斥強占蒙古這種破壞我國同偉大的兄弟之邦中華民國的友好關係的行為。

一切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不論是鎮壓和摧殘芬蘭、波蘭、烏克蘭、猶太和一切非大俄羅斯民族的粗暴野蠻的政府的民族主義，或者是準備替俄國的大國任務和俄國同其他大國締結的掠奪他人土地的協議加以解釋的自由派和立憲民主黨人的虛偽地掩飾起來的精緻的民族主義，都會受到社會民主黨黨團無情的反對。

統治階級拚命用民族主義的叫囂吸引人民的注意力，使人民不再注意不堪忍受的俄國內部狀況，這是枉費心機。第四屆杜馬選舉的空前舞弊，很象冒險主義者拿破侖第三的拿破侖主義手法，它千百次表明了政府沒有居民中的任何一個階級可以依靠了。政府就連同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聯盟也不能保持了，而1907年6月3日正是為了這個聯盟才實行政變的。杜馬在全國向左轉的時候向右轉了。

整個俄國在無法無天、專橫暴虐的壓迫下呻吟。整個文明世界聽到專門折磨我國優秀人物的庫托馬爾、阿尔加契等監獄中拷問和虐待政治犯的情形都感到無比憤怒。俄國正象人需要空氣一樣需要政治自由。沒有出版、集會、結社和罷工的自由，俄國就不能生存和發展，首先和特別需要這些自由的是無產階級，因為俄國無權的生活束縛住它的手腳，使它不能進行它必需的爭取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日和改善生活的鬥爭。特別是資本的壓迫、生活費用的高漲、城市中的失業和農村的貧困，使工人必須聯合成工會並且進行爭取生存權利的鬥爭，而沒有政治自由，就會使工人處於奴隸或農奴的地位。工人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將不惜任何犧牲，因為

他們清楚地知道，只有根本改变俄国生活的一切政治条件，只有充分保証政治自由的基础，才能保障工人的反对資本的自由。

第四届杜馬的选举和有将近一百万工人参加的 1912 年群众性的工人政治罢工表明，工人重新领导整个民主派爭取自由的日子就要到来。三个陣营在选举斗争中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执政的反革命陣营十分軟弱无力，甚至在按六三法令进行的选举中也要舞弊，强迫受压制的农村神甫昧着良心，违背信仰地投票。自由派陣营愈来愈从民主派轉向大資產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在里加、叶加特林諾达尔、科斯特羅馬和彼得堡的第一选民团中同黑帮結成联盟反对社会民主党，証明了自己的反革命性。自由派想在保存現存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經過强大的人民运动就实行立宪改革，这种空想在民主派中間愈来愈失去基础。自由派的口号是：“用不着第二次革命，需要的只是立宪工作。”而工人阶级認識到这种口号的虛假性，把整个民主派的力量团結在自己的周围，在选举中进行了自己的斗争。

大家知道，甚至官方报刊也說，工人阶级是在下面三个口号下参加选举运动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还农民。

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确信，这三个要求是实现一切民主主义者都同意的普选权，出版、集会、結社和罢工自由，由人民选举法官和官吏，取消常备軍和設立民警制，教会同国家分立和学校同教会分立等等要求所必需的基础。

在俄国，农民群众的处境愈来愈使人难以忍受。政府的所謂“土地规划”只有使大多数人的处境更加恶化，使农村破产，使去年的飢民达到 8 000 万人，使整个农业得不到任何稳定的改善。表面

上的財政穩定是靠強征賦稅、鼓勵人民酗酒來維持的，政府則依靠一筆又一筆的借款推遲自己的破產。甚至第三屆杜馬的48個右派農民的溫和的土地草案也被束之高閣。難怪全部優秀農民愈來愈注視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人民在爭取自由鬥爭中的唯一領袖。難怪整個民主派從同工人階級的經濟運動密切聯繫着的1912年的政治罷工中，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看到了新的、更強大的解放運動的曙光。

第四屆國家杜馬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將捍衛這個運動的利益和需要。它認為自己沒有權利隱瞞俄國一切有覺悟的工人想到的和感覺到的東西，不對第四屆杜馬的多數講出來。有覺悟的工人始終堅定不移地忠實於社會主義。他們始終堅定不移地忠實於在戰鬥中久經考驗的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原則。他們始終堅定不移地為了這些原則而忠實於自己的共和制的信念。

寫於1912年11月中

第一次發表

按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的
抄本刊印

关于 11 月 15 日事件問題

(沒有发表的演說)

11 月 15 日，第四届杜馬開幕了。11 月 15 日，彼得堡发生了工人游行示威⁹⁶。由于有以前的各次政治罢工，这次游行示威在政治罢工的基础上起了巨大历史現象的作用。从罢工向游行示威的过渡已經完成。群众运动已經上升到最高阶段：政治罢工轉变成街头游行示威。这是伟大的前进步驟，无产階級的一切自觉的領導者都应该強調这个步驟并且予以正确的評价。

这个步驟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采取这个步驟正好是在地主的、黑帮的、六三政制的第四届杜馬開幕的时候。游行示威选择的时机真是好极了！用首都街头上的紅旗飞舞来抵制、对照黑帮“議會”的開幕，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階級本能！

用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派的、純工人的真正游行示威（可惜知識分子沒有参加，如果报纸可以憑信的話）来对照諂媚者的、奴隶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在宮廷內举行的“示威”（指罗将柯寥寥几句关于“宪制”的話⁹⁷），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階級本能。

把黑帮杜馬里面的諂媚者关于“宪制”的空話（或者 à la^① 罗将柯的鱒魚加洋姜），同杜馬外面的正在展开的爭取自由和人民代

① 类似。——編者注

議制(不带引号的)、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典范一对比,就可以看出革命群众深厚可靠的本能。

自由派——取消派的“光綫报”提出防止这次游行示威的“警告”,这是与工人事业的叛徒的身分相符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党团怎么可以提出“警告”呢?怎么可以降低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水平,降低到奴隶的水平呢?这个党团的某些成员怎么可以在那里屈服,作出这么可耻的事情呢??

有这样一种推测,有时是“附带”提出来的:是不是曾经担心某一个“号召游行的”团体在进行挑拨?

暂且假定有过这样的推测。但是这种推测能不能替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这一步骤辩护呢?不能。或者更正确些说,这种推测可以替采取这一步骤的个人辩护,但是不能在政治上替这一步骤辩护。这种推测可以替社会民主党党团洗刷背叛工人事业的嫌疑,但是不能证明它在政治上并没有犯错误,因而可以不受谴责。

一个工人代表,一个真正的工人代表,如果一连三天都听到准备举行这种游行示威的消息,只在最后一天听到“这里有没有挑拨行为?”的“謠传”(说不定也是挑拨者散布的!),他究竟会怎么做呢?

工人代表会去找一些有威信的工人。工人代表会明白,在这种时刻他应该同优秀的工人在一起,同工人在一起要比参加杜馬党团的会议重要百倍。工人代表会从优秀的工人那里,从两三个(甚至四五个)首都 有威信的工人那里了解到情况是怎样的,工人是怎样想的,群众的情绪是怎样的。

工人代表会去了解这些情况,他能够了解这些情况,他会知道要举行罢工(据资产阶级报刊报道,有一万五千到五万人参

加!!), 要举行游行示威, 工人并不想使用暴力和进行扰乱, ——也就是说, 关于挑拨的謠传完全是胡說八道。

工人代表会了解这一点, 决不会上卑鄙的“倡导小组”的那些惊慌失措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当。

就假定有过关于挑拨的謠传。难道在加邦請願时不曾有过这样的謠传嗎? 居然不能把加邦請願时群众开始表现的独特的觉醒同挑拨者加邦和慫恿加邦的警察挑拨者区别开来, 真是一个好工人, 一个好工人領袖!!

就假定, 警察和挑拨者插手到11月16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中来了。就假定这样(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証实, 也是不可能的; 关于挑拨的謠传倒很有可能是挑拨者捏造的)。

就假定是这样。那又怎样呢? 在根本談不到采取暴力的时候不应该采取暴力。应该提出防止采取暴力的警告。但是, 在群情沸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提出防止和平罢工的警告呢? 是不是应该提出防止游行示威的警告呢??

整个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犯了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錯誤。如果能知道, 并不是全体都犯了这个錯誤, 許多犯这个錯誤的人都能够認識錯誤而不再重犯, 那該多好!

俄国无产階級运动(不管警察在什么地方搞些什么名堂)已經上升到最高阶段。

写于1912年11月下半月

1930年第一次載于“列宁全集”
第2、3版第16卷

署名: 非代表

按手稿刊印

給約·維·斯大林的信⁹⁸

亲爱的朋友：

波兰各个地方报纸都登载了一个消息，說亚格洛被接受加入党团，但是只給他发言权⁹⁹。如果这是事实，这就是党性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光綫报”进行鼓动，必須（1）在“日报”¹⁰⁰上刊登文章（文章初稿我今天送上）……在委员会¹⁰¹（必須教导他們并且当面教导他們用決議来評論一切重要事件，并且立即把決議副本送到这里来）。这个決議大致的草案如下：“委员会在讀了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报‘真理报’和取消派的‘光綫报’关于接受亚格洛加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文章以后，研究了這個問題的一切情况，考虑了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就這個問題展开的爭論和俄国各个社会民主党組織的意見的某个报告，現在作出如下的决定：承認拒絕接受亚格洛作为有表决权的成員是唯一符合党性的正确办法，因为亚格洛不是社会民主党黨員，他是违反华沙城工人选民团大多数复选代表的意志被选进第四届杜馬的。委员会譴責‘崩得’和取消派进行的主张接受亚格洛加入党团的反党鼓动，同时希望，給亚格洛代表发言权会促使波兰一切有覺悟的工人靠攏波兰社会民主党，并促使他們同各民族的工人完全溶合起来結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統一的組織。”

即使万一取消派取得了胜利，亚格洛終于被接受了，还是有必

要、有加倍的必要作出具有这种内容、同时表示遺憾并且向全党呼吁的決議。

其次，委员会根据大家知道的 11 月 13 日的決議进行“改正”，通过一个新的決議，是极端重要的。新決議大致如下：“委员会研究了有关 11 月 15 日罢工的一切情况后，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彼得堡委员会提出防止罢工的警告，完全是由于部分組織沒有准备好在这一天发动。但是經驗表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运动还是广泛展开了，并且轉为爭取成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的街头游行示威，从而把俄国的整个工人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因此，委员会譴責取消派、他們的……集团和‘光綫报’进行的反对革命罢工的宣传，同时建議工人尽力更广泛地、認真地、同心协力地准备街头游行示威和抗議性的政治罢工，使这种罢工成为时期尽量短的（一日罢工）和同心协力的罢工。委员会尽力开展鼓动工作，号召在 1918 年 1 月 9 日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在奴役俄国和使俄国血流遍野的罗曼諾夫家族 300 周年紀念日提出特別的抗議。”

再有，5 个代表（选民团的）就巴达也夫事件拟訂一項列举理由的決議是极端重要和必要的。決議大致如下：“工人选民团的 5 个代表注意到取消派在‘光綫报’上和彼得堡工人中間对巴达也夫同志进行的攻击，茲决定：（1）不把这个问题提交杜馬党团，因为党团已經接受了巴达也夫，并且在党团内部沒有一个人反对；（2）調查巴达也夫当选的情况，同时在表决这个问题时巴达也夫应弃权；（3）經 5 个代表审查确定的事实如下：（一）具有反取消主义内容的委托书是預先印好的，是在初选人的會議上一致通过的，一切拥护巴达也夫的复选人和初选人都象信仰坚定的志同道合的

人一样，是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要求行动的；（二）在社会民主党初选人的会议上，有 15 票赞成彼得堡委员会的名单，9 票赞成取消派的名单，而在‘光线报’的初选人和复选人中间，不是大家都象取消派的志同道合的人那样行动的，一部分曾经动摇过（苏达柯夫等等）；（三）在选出了 3 个复选人对 3 个复选人的时候，为了不要在资产阶级面前发生争论，巴达也夫的拥护者尽了自己的职责，建议用抽签的办法解决问题；（四）鉴于巴达也夫的拥护者提出这种建议的事实和取消派拒绝研究……波·和馬·¹⁰²（取消派）问题的事实，兹决定：承认巴达也夫确实是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多数选出的，是真正符合彼得堡委员会的要求的候选人，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社会民主党选举发生混乱情形，罪过全在取消派身上，他们知道自己是少数，因此违反多数的意志。取消派拒绝抽签，是工人运动中令人愤慨的和闻所未闻的破坏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职责的行为¹⁰³。委员会决定在报刊上公布这个决议，并且同心协力地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拥护巴达也夫而反对取消派的鼓动。”

这个决议是必要的。关于巴达也夫的问题，国际报刊上已经有了报道。斯切克洛夫在“新时代”杂志上写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但是卑鄙的词句。在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取消派用德文出版的小册子中，鬼知道刊载了一些什么。决不能沉默。正是选民团的代表应当在巴达也夫弃权的情况下审查事实和进行辩护。

写于 1912 年 11 月

第一次发表

按保存在警察司档案中的副本刊印

給約·維·斯大林的信¹⁰⁴

致瓦西里也夫

敬爱的朋友：

关于紀念1月9日，預先考虑好和准备好是极端必要的。应当預先准备好传单，号召举行群众大会，罢工一天和游行示威（这些事情应当在当地决定，在当地要看得清楚些）¹⁰⁵。应当“改正”11月15日的錯誤，当然是反对机会主义者。传单的口号应当是3个基本的革命口号（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并要特別着重指出罗曼諾夫皇朝300周年紀念的“可耻”。如果没有充分的而且是极充分的把握在彼得堡弄好传单，那就必須及时在这里預先准备好再运去。取消派在亚格洛問題上的厚顏无耻是史无前例的。既然我們在工人选民团中一共有6个代表，就决不能默默地服从某些西伯利亚人。既然六人团受到多数的压制，他們就应当提出强硬的抗議，在“日报”上刊登抗議書，声明自己向基层即向各工人組織呼吁。取消派想扩大自己的多数，偷偷地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难道6个工人省份的工人代表要服从斯柯別列夫之流，或者要服从得意的西伯利亚人¹⁰⁶嗎？請常常写信来，写得多一些，詳細一些。

“光綫报”反对罢工的文章是极端卑鄙的。应当秘密地发表尖銳的意見。請快点写信来，在你拟訂的这次发言的几个提綱中，你

用哪一个？ 致

敬礼

又及：請把文件退回，帶着它生活是不方便的，主人可能在彼得堡。

12 月 6 日

1923 年第一次載于“1911—1914 年
‘明星報’和‘真理報’時代”一書第 3 編
按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的抄本刊印

改良主义病

“我們害了什么病？”——在11月15日罢工的影响下写成的一篇以此为題的有教訓意义的小品文的作者不久前在“光綫报”上这样問道。

从以下两段引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答案：

“那些妄想当領袖的人似乎應該明白，只有解除戒严状态和实现結社自由的要求，才是今天和最近将来的斗争任务，而宣言中所說的改变現存制度則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任务决不是玩弄我們現在常看到的罢工所能达到的，而是要进行頑强的有計劃的工作，接連夺取到障地，用出全部力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組織性，不仅把工人阶级而且把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这一斗争中来……

我們要自觉地对待自己的任务，有計劃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忽冷忽热，給我們建立起任何人也不敢干涉的强有力的工会組織和公开政党。”

仅仅根据这两段引文我們就可以对作者說：亲爱的，最好还是問一問“你自己害了什么病”吧。我們可以回答你：你害了改良主义病，这是很明显的。你有一种“固定观念”，即斯托雷平工党的观念。这种病是危险的。“光綫报”的医生們会完全把病治坏的。

作者反对一般政治自由的要求，而十分明确和自觉地宣传“公开政党”。比較以上两段引文，就会对这一点确信无疑。在这里支吾搪塞是徒劳无益的。

我們要問作者：为什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会主义者(1906

年的“人民社会党人”)和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会主义者(1906—1907年及以后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开政党”都已经成了空想,而你的“公开的”工人党就不是空想呢?

你承认(至少选举时的“公开”活动使你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的,他们不是民主派,他们的党不是一般群众的党,而是富裕资产阶级的党,是“第一选民团的”党。可是你,“冷静的、实际的政治家”,“爆发和挥拳”的反对者,却假借工人名义提出这样一种空想的、立宪民主党人也不能达到的“最近的”要求!!你是大空想家,你的空想却是渺小的、浅薄的、微不足道的。

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你感染了灰心、胆怯、绝望、无信心的流行病(现在这种病流行得那么厉害!)。这种病在把你往机会主义泥坑里推,人民社会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因为陷入这种机会主义的泥坑才受到大家嘲笑的。

你认为解除戒严状态和实现结社自由的要求是当前的和实际的、“有计划的”和“自觉的”要求。你和社会民主党是根本背道而驰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知道实现这些改革的一般条件(和重要性)。你同进步党人和十月党人本质上倒是一致的,正因为这些人空谈目前形势下的……改革和“自由”来自欺欺人。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比索拉蒂为了自由派大臣乔利蒂在各个阶级的政党“公开”存在的情况下许诺的改革而背叛了工人阶级。而你是为了就连伊兹哥也夫和布尔加柯夫之流也不能从马卡罗夫那里得到的那些改革而背叛工人阶级!

你用轻蔑的口吻谈到“罢工游戏”。这一点我现在不可能很好地回答你。我只简单地说一句:把深刻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称为“游戏”简直是愚蠢。你也象“新时报”(见11月17日涅兹纳莫夫

的文章)、伊兹哥也夫和布尔加柯夫之流一样,对罢工发怒。你发怒是因为生活无情地粉碎了你的自由主义幻想。工人群众完全承認組織、系統、准备工作、計劃性的必要性,但是对于你的言論他們現在和将来都是会蔑視的。

你害的重病是由散布得很广的杆菌引起的。这种杆菌就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或者叫作取消主义。这种杆菌就在空中飘动。但是不管你对一般事件的进程,特别是对11月15日的事件怎样发怒,事件的进程还是要治死这种杆菌的。

載于1912年11月29日

“真理报”第180号

署名:弗·伊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資本主义社会的貧困化

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者硬說，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的某些机会主义者也跟着他們硬說，資本主义社会沒有发生群众的貧困化。所謂“貧困化理論”是不正确的：群众的物質福利虽然增长很慢，但是在增长着，有产者同无产者之間的鴻沟不是在加深，而是在縮小。

近来，这类論断的全部虛伪性，在大众面前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生活費用不断高涨，甚至在工人进行了最頑强、最順利的罢工斗争的情况下，工人工資的增加也比劳动力必要費用的增加慢得多。与此同时，資本家的财富却在飞速地增长着。

試以德国的某些材料为例。在德国，由于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有罢工和結社的自由，有政治自由，以及由于有几百万工会會員和几百万工人报纸的讀者，所以工人的状况远胜于俄国。

根据資產階級社会政治家从官方得来的材料，德国工人的工資，在最近30年中平均增加了25%。而在同一时期，生活費用至少增加了40%¹¹

食品、衣服、燃料和房子都涨价了。工人的貧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說，他們簡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飽，更要挤在地窖和閣樓里。

但是，工人的相对貧困化，即他們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額的

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较份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

在俄国沒有所得税，沒有关于社会富裕阶级财富增长情况的材料。我国更为悲慘的实际情况被一层帐幔，一层愚昧无知、不敢发言的帐幔遮盖起来了。

在德国有关于有产阶级财富的确切材料。例如普魯士应納稅的共值 100 亿馬克(50 亿卢布)的第一流的财产，在 1902 年属于 1 853 人所有；而在 1908 年則属于 1 108 人所有。

最大富翁的数目减少了，他們的财富却增加了。1902 年，他們每人的平均财产是 500 万馬克(250 万卢布)，而 1908 年是 900 万馬克(450 万卢布)！

人們常談到“1 万个大富翁”。普魯士“21 000 个大富翁”拥有财产 185 亿馬克，而其余 180 万个应納稅的财产所有者拥有的财产是 30 亿馬克。

普魯士 4 个最大的百万富翁(一个侯爵、一个公爵、两个伯爵) 1907 年共有财产 14 900 万馬克；而 1908 年竟达 48 100 万馬克。

資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而工人群众却日益貧困。

載于 1912 年 11 月 30 日

“真理报”第 181 号

署名：符·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工人階級及其“議會”代表團

俄國覺悟的工人已經不是第一次同國家杜馬中的工人階級代表團打交道了。在第二屆、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且不談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抵制的第一屆杜馬）的這種代表團形成的時候，每次都可以看到社會民主黨的多數和社會民主黨的杜馬代表團在意見、觀點和方針上不一致的情形。

我們有說明第二屆國家杜馬的這種不一致情形的確凿的材料。在1907年春天，可以正式地、無可爭辯地確定，在社會民主黨內占優勢的是哪一種觀點、方針、派別或集團，而在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內占優勢的是哪一種觀點、方針、派別或集團。

當時是每500個社會民主黨員工人產生1名代表，因此布爾什維克有105名代表，孟什維克有97名代表，此外還有無派別分子的代表4名¹⁰⁷。

優勢顯然是在布爾什維主義方面。

在“民族的”社會民主黨員中，波蘭人有44名代表，崩得分子有57名代表，拉脫維亞人有29名代表。當時在拉脫維亞人中反對機會主義即反對孟什維克和崩得的人占了極大優勢，因此在“民族主義者”中，各“派別”的對比關係和社會民主黨“俄國”部分各派別的對比關係是一致的。

可是當時在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內，有36個孟什維克和18

个布尔什維克；而在工人选民团的代表中，有 12 个孟什維克和 11 个布尔什維克¹⁰⁸。显然，占优势的是孟什維克。

总之，在社会民主党內和在杜馬党团內，各“派別”的力量的分配情形不是一致的，而是截然相反的。

这是偶然的嗎？

不是的。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的議會代表團照例总要比各工人政党本身具有更多的机会主义成分。不难看出这种現象的原因是：第一、資產階級国家，哪怕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国家的各种选举制度，实际上不是用年齡（俄国要年滿 25 岁），就是用居住和固定工作地点的期限（在俄国半年）等等来限制工人的选举权利。通常最受这种条例限制的正是年輕的最觉悟、最坚决的无产阶级阶层。

第二、工人政党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如工会官僚、小业主、职员，特别是“知識分子”，在資產階級社会的任何选举制度下，都最容易（由于他們的职业，“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精通“議會”职业。

从这个事实應該得出什么結論，第三屆、第四屆杜馬的情形和第二屆杜馬的情形有什么不同，这些問題我們將另写文章論述。

載于 1912 年 12 月 12 日

“真理報”第 191 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民族主义党人和 立宪民主党人的“調和”

杜馬討論政府宣言的最大的政治結果，就是民族主义党人、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动人的联合。我們俄国的所謂“社会人士”太容易相信响亮而廉价的詞句，因此必須特別談談各个政党的发言及其对原則性政治問題的批評的这个实际結果。

民族主义的“新时报”（第13199号）写道：“政党消失了。馬克拉柯夫代表的精彩演說（12月7日會議上的演說）把整个国家杜馬團結起来了，整个国家杜馬都給他鼓掌，忘掉了一切政党糾紛和思想分歧。”

凡是密切关心政治的人，必須記住并且想想民族主义的報紙，專門阿諛奉承、迫害犹太人和异族人的主要机关報紙的这些言論。

十月党人和民族主义党人、古契柯夫派和新时派給馬克拉柯夫鼓掌，并不是由于“忘掉了”政党的思想分歧，而是由于他們正确地認識到自由資產階級和民族主义党人地主之間深刻的思想一致。

馬克拉柯夫在对內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根本問題上，发现了这种思想一致。这位立宪民主党人在民族主义党人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喊道：“俄国不寻求战争，它也不害怕战争。”他們怎么能不鼓掌呢？凡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很清楚，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话表明了他們贊成战争威胁政策，即武装陆海軍、压迫人民群眾、使人民群眾破產的軍国主义政策。

反动派不害怕支持軍国主义的自由派，因为反动派判断得十分正确：支持軍国主义是行动，而自由主义的叫喊是空話，在反动派統治下这种空話是决不可能实现的。“你給我們几百万卢布扩充軍备，我們給你的自由主义詞句鼓掌”，这就是每一个聪明的农奴地主对杜馬中的巴拉萊金之流說的而且一定会說的話。

馬克拉柯夫在对內政策上的主张呢？“言論报”說右派神甫“心滿意足”了，又如“新时报”急急忙忙地轉述馬克拉柯夫的“但願俄国不会分裂为两个陣营——国家和政府”这个“主导思想”，这是偶然的嗎？

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馬克拉柯夫大叫大嚷最好是“調和”，实际上就是附和科科夫措夫。科科夫措夫也是希望“調和”的！

科科夫措夫不希望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馬克拉柯夫絲毫不了解，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和用什么办法才能实现这种变化。“調和”这个詞恰好掩盖了关于这种变化的条件和手段的唯一重要的問題，用一些毫无內容、鈍化群众的公民意識、使群众麻木不仁的迂腐詞句掩盖了这个問題。

給馬克拉柯夫之流的“調和”的演說拚命鼓掌的“社会人士”是可鄙的。

民族主义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竭力不去注意工人代表馬林諾夫斯基在关于內閣宣言的演說中談到的民主派对問題的提法。但是馬林諾夫斯基的演說完完全全不是对这一批听众講的。

載于1912年12月15日

“真理报”第19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民族主义自由派

近几年来，可以明显地看到俄国自由派内部的某种分化。“真正的”资产阶级开始脱离整个自由派的阵营。自由资本在建立自己单独的政党，许多过去与十月党人为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加入（而且正在加入）这个党，另一方面，最温和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即立宪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也在加入这个党。

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中的“进步派”集团以及国家参议院的“进步”集团，很快就会成为这个民族主义自由资产阶级在议会舞台上的正式的党代表。不久前召开的“进步派”代表大会，实质上已经制定了现在“俄国评论报”所宣扬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纲领¹⁰⁹。

所谓“进步派”的希望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把他们叫作民族主义自由派呢？

他们不希望地主和官僚独占支配一切的统治权。他们追求的是（同时他们也直截了当地说）两院制的、有违反民主的选举权的、温和的、受严格限制的宪法。他们希望有一个执行以枪炮替“祖国工业”掠夺新市场的“爱国”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权”。他们希望官僚象器重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那样地器重他们。如果能那样，他们准备不同反动派算“旧账”，而同他们携起手来建设“伟大的”资本主义俄国。

这些人离开十月党，是因为地主分子在这个党内的势力太大，是因为十月党太温顺软弱。他们离开立宪民主党，是因为他们看不惯立宪民主党人蠢惑人心地讨好民主派。在这些“真正的”立宪主义者看来，立宪民主党人关于普选权，关于强迫出讓土地（虽然要付贖金）的虚偽言論，是完全多余的和不能容忍的。

民族主义自由派直截了当地說：不必害怕人們責备我們“縱容反动势力”，必須公开地反对“掠夺地主土地的号召”，反对“挑起对有产阶级的仇恨的煽动”；在“軍事力量”的問題上既不应当有右派，也不应当有左派：

“我們回到了祖国…… 俄国军队是…… 我們的军队…… 俄国的法庭不是舍米雅卡的法庭，而是我們的…… 俄国对外的威力不是官僚好大喜功的怪癖，它是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欢乐。”（見“俄国評論报”綱領性的声明）

民族主义自由派在俄国無疑是有一定的“前途”的。它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純粹的知識分子，即“根基”薄弱的自由派分子仍然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民族主义自由派得到了象司徒卢威、馬克拉柯夫、朴罗托波波夫、柯尼列夫斯基等早就一只脚站在反动陣营里的思想家。最温和的“希波夫”分子即地方自治派地主分子也無疑会和民族主义自由派同流合污，因为他們也贊成受严格限制的宪法，即富人的“宪法”（难怪不久以前，司徒卢威先生那么一往情深地怀念希波夫先生……）。

“进步派”希望有一个执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权”的幻想，在最近时期內当然是不会实现的。赫沃斯托夫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仍然是风云人物。很可能，民族主义自由党在最近还不

会完全形成，可是，他們的報紙就会破产，正象曾經提出基本上相同的目的的“言語报”¹¹⁰在三年前遭到破产一样（可是在杜馬中，“进步派”的力量和立宪民主党人比起来是相对地增强了）。但是，民族主义自由资产阶级的公开的言論至少說明了俄国的阶级矛盾已相当成熟。

工人們应当在自己的組織和自己的阶级自决方面百倍努力，来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自决。

載于 1912 年 12 月 22 日

“真理报”第 200 号

按“真理报”原文印

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統一

(提綱)

1. 4年来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

1908年12月党給取消主义所下的定义。譴責取消主义,不是因为它主张进行合法工作,而是因为它破坏党。1912年反取消派在合法工作中取得的胜利(“真理报”和选举)。

2. 取消派实行分裂。取消派脱离党。他們的倡导小組是分裂的产物和表現。

3. 1912年的八月代表會議是反党分子的會議,甚至調和派分子也不得不承認这一点。

不能容許沒有受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一組織的直接委托,在行动上又不取得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一組織的同意的国外的集团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发表言論。

4. 八月代表會議对运动的各項基本問題,尤其是对完全真誠地承認秘密党这个基本問題的決議,用最客气的說法,都是“耍外交手腕”,即迴避对問題作正面答复。实际上这是取消主义的決議。

5. 代表會議(八月代表會議)后,取消派集团在“我們的曙光”杂志和“光綫报”上的政治态度表明了这个集团彻头彻尾的反党性

質，這表現在：（一）鼓吹公開黨；（二）在合法報刊上嘲笑“地下組織”；（三）反對革命的罷工和一切群眾性的革命鬥爭。

必須同這個反黨集團展開堅決的鬥爭。

6. 在迴避和模糊問題實質，即在迴避和模糊真正承認秘密黨的問題的合法報刊上鼓吹統一，就是欺騙工人。
7. 秘密組織中的一切派別絕對必須統一起來。號召實現這種統一。

寫於 1912 年 12 月

1939 年第一次載於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 1 期

按手稿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和党的工作者会议的 通报和决议¹¹¹

通 报

今年2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到会的有彼得堡(5人)、莫斯科区域(2人)、南方地区(2人)、乌拉尔和高加索的秘密的党组织的代表。各地方的组织不可能选举代表，因此这次会议不能算作代表会议。部分中央委员由于警察的阻挠，未能出席会议。

几乎全体与会者都积极参加了各种合法的工人团体，利用了所谓“合法机会”。因此，会议的成员保证了能正确地反映俄国各主要地区全部党的工作的状况。

会议共举行了11次会议，就下列各项议程制定了决议：(1)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2)秘密组织的建设；(3)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4)党的报刊；(5)保险运动；(6)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关于统一问题；(7)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上述决议，除一个同志对“保险”决议中的两条和另一个同志对“民族”决议中的部分条文弃权外，是一致通过的。

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这次会议的决议，总结了党的经验，就现

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作中的一切最重要問題制定了領導路綫。

* * *

系統地估計 1912 年的經驗是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一年是俄国工人运动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轉变的一年。不仅活跃正在代替低潮和无解。而且工人階級已經轉入对資本家和沙皇君主制进行群众性的进攻。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的浪潮大大高涨，使俄国在罢工方面又走在世界 各国，甚至走在最发达的国家 前面。

当然，这个事实不会使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忘記，自由国家的无产者在群众的組織和群众的階級教育方面是远远超过我們的。但是这个事实表明，俄国已經进入了一个 新革命 高涨的时期。

工人階級所承担的伟大任务是启发一切民主群众的革命意識，在斗争中教育他們，領導他們进行猛烈的冲击，以便推翻罗曼諾夫皇朝，使俄国得到自由和建立共和国。全面支持群众的公开的革命斗争，組織这种斗争，扩大、加深和加强这种斗争，——这就是当前的基本任务。誰意識不到这个任务，誰不在某一个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秘密組織、小組或支部中工作，誰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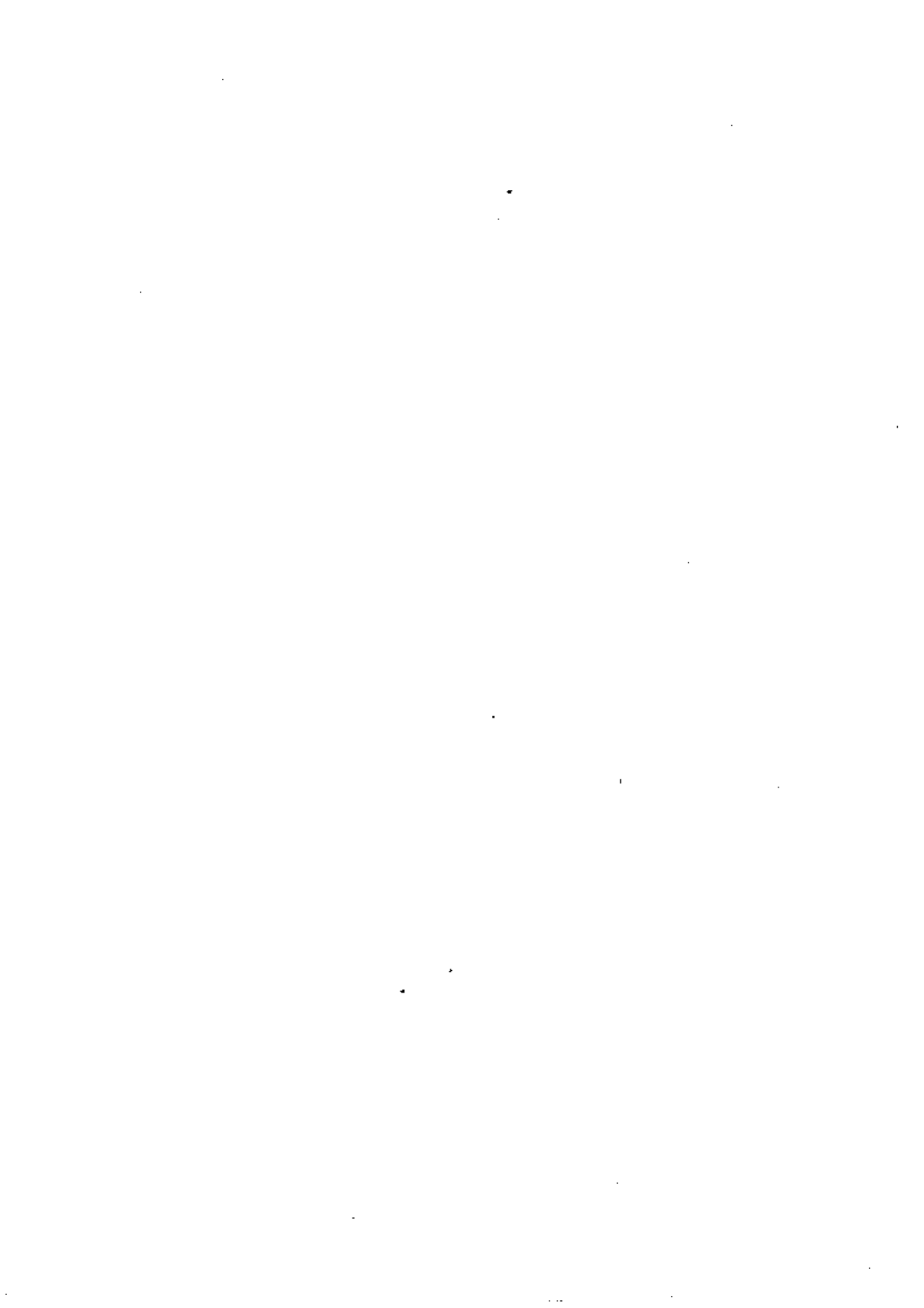
1912 年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是民主派情緒发生公認的变化的基本动力。社会民主党無論在第四屆杜馬选举中，或者在創辦合法的报刊，哪怕是宣传馬克思主义基础理論的工人报刊方面，都取了巨大的胜利。沙皇政府不能阻止这些成就，完全是因为群众的公开的革命斗争已經改变了整个的社会政治状况。俄国社会民

1

Собрание Ц.К. Рос. С.Д. Раб.
России с партийным работником.

В ответ на письмо рода
союзных собраний Ц.К. Рос. С.Д.
Р.П. с партийным работником. В со-
ветском издании изданы также и
сборки,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ому-
дар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Вол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Рос-
сия), Юра (Сибирь), Урали и Кавказа. Про-
исхождение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
会议的‘通报’”手稿第1页(1913年1月)
(制版缩小的)



主工党一方面继续坚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从黑帮杜馬讲坛到任何一个戒酒协会都要加以利用，来进行坚持不懈的有计划的工作；同时一分钟也不会忘记，只有真正按照党的决议的精神，即按照那些不是从六三政制的“合法性”着眼，而是从日益增长的革命着眼通过的考虑周到的决议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一切工作的人，才配得上党员的崇高称号。我们的任务不是迁就1908—1911年这段时期遗留下来的分崩离析的涣散状态，而是反对这种状态。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是随波逐流，高唱混乱的无原则的合法主义，而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把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逐渐聚集在秘密党的周围。我们的口号是决不同那些滥用合法主义来使人们对群众的革命斗争持怀疑态度、冷淡态度，或者甚至滥用合法主义来直接阻挠这种斗争的人讲和。

实现我们的要求的保证，不在于降低这种要求的水平，不在于降低我们的纲领，不在于执行那种高呼在俄国沙皇制度下可以轻而易举地实行某种立宪改革的骗人口号来引诱知识贫乏的人的策略。不是的。保证在于以彻底的民主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使他们认清立宪幻想的虚伪性。保证在于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于群众的伟大的革命热情。

反革命嚣张时期留给我们的后果是：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许多工人运动的中心城市的组织分崩离析，手工业方式，一些人被迫脱党，另一些人对维护革命传统并制定革命策略的“地下组织”抱蔑视的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取消派脱离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另树一帜，许多地方的组织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一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瓦解了，所有这一切使统一的要求显得特别迫切了。

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统一是这个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统一，这个无产阶级也就不可能统一。

从这里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解决秘密的党的必要性问题，那末这个统一问题也就不能得到解决。谁一方面高谈统一，同时又宣传“公开的工人政党”，谁就是欺騙自己，欺騙工人。谁一方面高谈统一，同时又装模作样地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可以澄清，甚至可以仅仅在合法的范围内提出来，谁就是欺騙自己，欺騙工人。

不是的，统一问题不是在合法的刊物上空谈“统一”，同“各有其荒唐想法的”各种知识分子集团妥协，在国外谈判中使用外交手腕所能解决的，只有把各地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体工人都联合起来，真正溶合成一个统一的秘密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统一问题。

工人们自己已经开始从下面十分认真地、十分实事求是地解决统一问题。会议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党员都走上这条道路。

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正在各地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秘密组织，即工厂支部、工厂委员会、区分部、市总部和一切合法机关中的社会民主党党组等等。谁不愿意陷入毫无力量的孤军奋战的处境，就参加这些组织吧。承认秘密的党，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这里是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实现的。

* * *

分崩离析的时期就要过去了。聚集力量的时期已经到来。讓

我們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組織中团結起来吧。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願意在秘密組織中工作，願意帮助无产階級的組織，支援他們反对資本家的斗争和已經开始的对沙皇君主制的革命冲击，这些秘密組織是不会拒絕他的。

俄国全国性的政治危机正慢慢地然而不断地发展着。六三政制是挽救黑帮的沙皇君主制的最后尝试，是勾結资产階級上层分子革新这种君主制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也破产了。新生的民主力量在俄国农民和城市资产階級中間不是每日而是每时地增长、壮大起来。城乡无产者的人数比过去增加得更快，他們的組織性、团結性和被群众性罢工的經驗証实了的他們的必胜信心，也日益提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須把这个无产階級的先进部队組織成一个統一的整体，领导无产階級为实现我們原来的革命要求而进行革命的搏斗。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13年2月

決 議

革命高潮、罷工和党的任务

1. 在 1912 年这一年里，工人运动史和俄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实，是无产階級經濟和政治的罢工斗争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达到 100 万人。

2. 1912 年罢工斗争的性质值得特别注意。在很多情况下工人是同时提出了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此起彼伏，互相交替。为了夺回被反革命剥夺了的 1905 年的胜利果实而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以及生活费用的高涨，唤醒了大批大批工人群众，用最尖锐的形式向他们提出了政治问题。这种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結合、互相交錯的形势，是使运动具有威力，使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得以形成的条件和保证。

3. 海陆軍中不滿情緒和起义的爆发是 1912 年的特点，这种爆发一开始就同工人的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有明显的联系，它表明广大民主阶层，特别是作为主要兵源的农民的激昂憤慨的情緒与日俱增。

4. 所有这些是在全国普遍向左轉的形势下发生的，尽管黑帮沙皇政府十分无耻地伪造了第四届杜馬的选举，但是这次选举还是表明了普遍向左轉的形势，因此这些事实充分証明了俄国又进入了群众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的时期。刚刚开始的新革命是沙皇政府六三政策破产的必然結果。这种政策甚至不能使最会拍馬

的大资产阶级满意。人民群众，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群众处于更难堪的无权地位，又有成百万的农民在挨饿了。

5.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因为这种罢工是克服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冷淡、绝望和涣散的情绪，激发他们的政治主动性，吸引他们参加尽可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声势浩大的革命发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6. 党组织一方面必须扩大和加强为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还农民）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必须把全面支持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发展和组织群众的各种革命发动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地位。要特别提出举行街头的革命游行示威这个迫切任务，或者使街头的革命游行示威同政治罢工结合在一起，或者作为单独的发动。

7. 某些资本家采取同盟歇业（大批解雇）来对付罢工工人，这就使工人阶级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必须仔细地估计每个地区、每个工业部门、每个个别场合的罢工的經濟条件，寻找击退同盟歇业的新的斗争方法（例如意大利式的罢工），并且用革命的群众大会和革命的街头游行示威来代替政治罢工。

8. 某些合法的机关报刊完全不管他们对这次或那次罢工是怎样评价的，都在进行反对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除自由派的报刊外，取消派集团也在“光线报”上违背了这样或那样支持这个报的大部分工人的心愿，进行着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因此，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任务是：（1）同这个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2）有系统地、坚持不懈地、不分派别地向全体工人解释上面所说的这种宣传的全部危害性；（3）团结一切无产阶级力量来

进一步推进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群众的革命发动。

秘密組織的建設

1. 會議總結了 1912 年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認為：

已經开始涌現的群众的革命发动的新浪潮証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通过的关于建党問題的決議（尤其是 1912 年一月代表會議的決議）是完全正确的。1912 年罢工斗争的进程、社会民主党在第四届杜馬选举时进行的竞选运动、保险运动的进程等等，都清楚地表明了当前組織建設的唯一正确形式是秘密的党，它是有許多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圍繞着的无数党支部的总和。

2. 秘密建設的組織形式必須适应地方条件。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掩护秘密的支部，工作形式要有尽可能大的适应地方生活条件的灵活性，这是使秘密組織具有生命力的保証。

3. 目前組織建設方面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在所有的工厂中建立由工人中最积极的分子組成的有純洁的党性的秘密工厂委员会。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涨創造了一种条件，使大部分地区可能恢复党的工厂委员会并巩固現有的党的工厂委员会。

4. 會議指出，現在十分迫切地需要在每个中心建立一个由分散的地方小組組成的領導組織。

例如，彼得堡市領導委员会就是一种突出的全市組織的形式，它是通过各区支部的选举制原则同遴选原则相結合的办法产生的。

这种組織形式能够使領導机关和基层支部之間建立起最密切的直接联系，同时又能够建立一个人員不多、机动灵活、极其秘密、能随时以整个組織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执行机关。會議向各工人运

动的中心推荐这种组织形式，但是要随地方的和生活的条件作相应的改变。

5. 为了建立地方组织同中央委员会的密切联系，同时为了指导和统一党的工作，会议认为绝对必须在工人运动的主要地区建立区域的中心组织。

6. 在建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之间的经常而灵活的联系方面，以及在工人运动的大的中心建立地方工作的灵活的领导形式方面，最重要的实际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委托人制度。委托人必须从担任地方工作的工人领导人员中选拔。只有这些先进的工人才会用自己的力量在各地方和全俄国加强和巩固党的中央机构。

7. 会议希望中央尽可能经常地召开有社会民主党各个工作部门的地方党工作者参加的会议。

8. 会议请大家注意党屡次通过的决议：工人政党只有依靠经常的党费和工人捐款才能存在下去。没有这种捐款，尤其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最俭朴的党的中央的（地方的和全国的）机关也绝对不可能存在下去。

9. (不公布)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1. 会议肯定地认为，尽管政府实行了空前的迫害又伪造了选举，尽管黑帮自由派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在许多地方已经完全形成，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还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几乎各地第二城市选民团中拥护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都有所增加，社会民主党正逐渐把第二城市选民团从自由派手中夺

取过来。而在对我们党说来是主要的工人选民团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照旧保持了绝对的优势，同时工人阶级十分一致地选举选民团中的所有布尔什维克代表，这样就有力地说明了他们是毫不动摇地忠于原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革命传统的。

2. 对于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代表在发表许多杜马演说、提出质询、宣读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主要原则的宣言等方面进行的有力的活动，会议表示欢迎。

3. 会议承认我们党内树立起来的传统是唯一正确的，由于有这个传统，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直是作为一个服从以党的各个中央机构为代表的整个党的机关而存在的，同时会议认为，为了推进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工作和合理安排党的杜马工作，必须注意社会民主党党团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从而实现党对党团的监督。

4. 会议不能不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关于亚格洛的决议，是直接违背了党的义务。这个决议助长了崩得的分裂行动，而崩得勾结了非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反对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违反了占工人复选人多数的所有社会民主党复选代表的意志，选举了非社会民主党人亚格洛。党团通过这一决议就扩大了波兰工人中间的分裂，妨碍了全党的统一事业。

5. 契恒凯里同志以党团的名义，打着“建立每一个民族的自由发展所必要的机关”的旗号，坚持民族文化自治，这是公然违背党纲¹¹²的行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批准党纲时会专门投票否决了本质上与此相似的条文¹¹³。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容许向民族主义情绪，即使是以这种隐蔽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步。

6. 社会民主党党团投票赞成进步党人（实际上是十月党人）就内阁宣言提出的转入下项议程的议案，而没有提出社会民主党

的独立的議案，这是一种失职行为；党必須指出这一点，因为自由主义的报刊正对此进行恶意的解释¹¹⁴。

7、8 和 9（不公布）。¹¹⁵

关于秘密書刊

會議在討論了必須全面发展秘密出版事業的問題并就這個問題擬訂了若干具体指示之后，坚决号召各級地方党組織、一切工人支部和每个工人在运输工作和同中央局取得联系方面發揮更大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以传播秘密書刊。

关于保險运动

會議肯定，工人階級及其政党不顧一切迫害，在实行保險法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来保卫无产階級的利益，同时認為：

1. 必須进行最坚决的、齐心协力的斗争，反对政府和資本家强迫工人不經過工人大会糊里糊涂地选举自己的伤病互助会的初选代表的企图。

2. 各地工人都应当做到用临时通知的办法召开會議，来預先确定工人理想的初选代表候选人。

3. 工人們应当举行革命的群众大会，抗議在实行保險法中所发生的暴力和侮辱行为。

4.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須預先确定工人的初选代表候选人名单，候选人要从最孚众望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中提出来，而且要做到使不能召开任何會議的地方也一致通过这个名单。

5. 會議認為，抵制初选代表的选举是不适当而且有害的。当前資本家正集中主要力量不讓工人掌握著名工厂的无产階級基

層組織，而工人的伤病互助会一定会成为这样的組織。在目前采取分散工人的抵制办法，只会为資本家的上述意图大开方便之門。

6. 爭取合理地选举伤病互助会代表的斗争一分鐘也不应当放松。不讓企业主有一分分鐘認為可以保證生产正常地进行，要采取一切办法、动员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扩大和发展工人的斗争，同时应当排除一切障碍，使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被通过。选举并不排斥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相反地，我們把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选为代表，就能进一步促进爭取合理选举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代表們将尽力帮助工人。

7. 在沒有召开會議就进行了选举的地方，必須采取工人們能够接受的一切方式进行鼓动工作，爭取召开會議，根据真正自由的选举原則重选初选代表。

8. 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必須立即就禁止工人开会进行选举一事再次提出質問。

9. 必須把关于实行保險制度的一切鼓动工作同說明沙皇俄国的一切实际状况的工作密切地結合起来，同时要說明我們的社会主义原則和革命要求。

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統一

1. 四年来党同取消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証明，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全党代表會議所下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決議說：

“一部分党员知識分子企图取消現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組織，而代之以一种不定形的团体，这种团体無論如何要在合法范围

内活动，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来换取合法性。”

由此可见，取消派受到谴责，决不是因为他們提出必须进行合法的工作，而是因为他們脱离秘密的党，破坏秘密的党。

在俄国创办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人日报和在工人选民团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的事实，都彻底证明了我們党在驅逐了取消派之后，是能够掌握合法活动的。

2. 取消派脱离秘密的党，組織脱离地方組織的独立的小集团，这样就制造了分裂，而在許多地方，特别是在彼得堡成立了所謂倡导小組之后，更扩大了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2 年一月代表会议指出：“我們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撰稿人所組成的取消派集团是各倡导小組的核心，是“完全把自己置身于党外”的集团^①，这句话只是肯定了取消派制造了分裂。

3. 1912 年八月代表会议自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組織代表会议”，其实是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因为会议的主要部分和领导部分是脱离党、脱离俄国工人群众的取消派作家集团。

4. 絕大多数的先进工人是忠于秘密的党的，这就使八月代表会议不得不向党性作表面的讓步，表面上承認秘密的党。其实，这次代表会议的一切决议都彻头彻尾貫穿着取消主义，代表会议閉会后，“我們的曙光”杂志和“光綫报”馬上声明贊成八月的决议，更加卖力地展开了取消主义的宣传，内容是：

(一) 主张成立公开的党；

(二) 反对地下組織；

^①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17 卷第 432 頁。——編者注

(三)反对党的綱領(維護民族文化自治,修改第三屆杜馬土地法,把共和国口号挪到次要地位等等);

(四)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五)主张实行改良主义的、純粹合法的策略。

因此,同“我們的曙光”杂志和“光綫报”的取消派集团作坚决斗争,向工人群众解释他們的宣传的严重危害性,仍然是党的任务之一。

5. 取消派在合法刊物上掀起争取“統一”的运动,迴避并且模糊关于参加秘密的党和在党内工作这个主要問題,这样就把工人引入了迷途,因为这个问题在合法报刊上連提一提都是办不到的。实际上取消派照旧在进行分裂活动,彼得堡的选举特別清楚地說明了这一点:在复选代表分成相等的两部分的时候,正是取消派反对了抽签的建議,而当时抽签是唯一能够避免工人在资产階級政党面前发生分裂的办法。

6. 各种派別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在承認并且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組織的条件下实现統一是絕對必要的,是工人运动的一切利益坚决要求的。

在彼得堡納尔瓦区組織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組織内部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則实行联合的。

7. 會議大力支持这样的联合,并建議各地立即自下而上地,即从工厂委员会、区分部等开始实行这样的联合,同时由工人同志認真检查:是不是承認秘密的組織了,有沒有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策略的决心。只有实际建立起这种自下而上的統一,党的无間的团结和全国范围的十分巩固的統一才会实现。

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1. 1912年的经验完全肯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1912年)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①是正确的。崩得违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支持非社会民主党人候选人亚格洛,取消派、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违背党纲、助长民族主义的行为,都十分明显地表明社会民主党建党中的联邦制原则彻底破产了,表明保持“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独特性对于无产阶级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2. 因此,会议坚决号召俄国各民族工人坚决反击反动派的黩武的民族主义,反对劳动群众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表现,号召社会民主党工人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当地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这个组织要象高加索早就实行的那样,用当地无产阶级的每一种语言进行工作,真正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

3. 会议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发生分裂一事表示十分遗憾,因为这种分裂严重地削弱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斗争。会议不得不指出,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现在并不代表波兰无产阶级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多数派,它在反对这个多数派的斗争中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手段(例如毫无根据地猜疑华沙整个组织在挑拨离间)。会议号召一切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触的党组织协助波兰社会民主党建立真正的统一。

4. 会议特别指出崩得最近一次(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中的极端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这次代表会议取消了共和国的口号,把秘

^①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15—416页。——编者注

密工作挪到次要地位，并且沒有提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崩得阻挠各地（在华沙、洛兹和维尔诺等地）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統一，即 1906 年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一再坚持的統一，这种行为也应当受到同样的譴責。

5. 会议欢迎拉脱维亚組織中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不懈地进行的反取消主义的宣传，然而遺憾的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往往支持取消派的反党行动。

6. 会议坚信，已經开始的革命高潮、群众性的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街头示威游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众的公开革命斗争，都将有助于各地社会民主党工人不分民族的、亲密无間的团结和溶合，从而加强对压迫俄国各民族的沙皇制度的冲击，加强反对联合起来的俄国各族资产阶级的斗争。

載于 1913 年 2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单行本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通报”的
手稿和“決議”胶印本作过校訂

1912年英国的工人运动

过去一年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煤矿工人的罢工。如果说1911年铁路工人的罢工已经显示了英国工人的“新精神”的话，那末煤矿工人的罢工简直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时代。

不论统治阶级怎样准备“战争”，不论资产阶级怎样竭力压制不听话的资本奴隶的反抗，罢工还是胜利了。煤矿工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没有出现过工贼。靠士兵或者毫无经验的杂工采煤，是根本谈不到的。因此经过了6个星期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看到，国内整个工业生活停顿了，工人歌曲所说的“只要你的手愿意，一切机轮都会鸦雀无声”¹¹⁶成为事实了……

政府让步了。

“曾经是全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首相，出席了煤矿工业资本家的罢工奴隶的代表们举行的会议，恳求他们妥协。”一位熟悉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斗争时作了这样的描绘。

在改革问题上一向成年累月地给工人开“空头支票”的英国政府，现在也手忙脚乱了。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新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了最低工资，即明文规定了一种工资额，工资下降不得低于这个定额。

诚然，这个法律也象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改革一样，是不足道的、不彻底的，有一部分简直是欺骗工人，因为尽管规定了最低工

資額，業主照旧虐待他們的僱傭奴隸。但是一切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肯定地說，在煤矿工人罢工之后，英国的无产阶级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工人们学会了斗争。他們看到了引导他們走向胜利的道路。他們感覺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們不再是那种长期以来使一切僱傭奴隸制的維護者和歌頌者称心如意的唯命是听的小綿羊了。

英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了用数字无法表明但人人都感覺到的变化。

然而遺憾的是，英国在党的事业方面进展不大。“英国社会党”（前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同“独立”（脱离社会主义的）“工党”还繼續处在分裂状态。“独立工党”的議會議員的机会主义行为照例会在工人中間产生一种工团主义的傾向。好在这种傾向还不严重。

英国工会現在正慢慢地然而不停地轉向社会主义，这是违背工人们选出的許多議會議員的心願的，他們还在頑固地坚持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老办法。但是，这些沒落的代表已經不能再把这些老办法維持下去了！

載于1913年1月1日

“真理报”第1号

署名：W.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写晚了总比不写强

我現在才来駁斥尔·馬尔托夫在“光綫报”(1912年10月28日第37号)上所写的东西是太晚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說謊是容易的。而弄清真相往往需要很多時間。

尔·馬尔托夫在“光綫报”第37号上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話罵我，同时运用了这位作者用慣了的“恶毒的”誹謗伎倆。十年来，我对于尔·馬尔托夫的这种斗争手法已經看慣了，我甚至沒有把他的文章讀完。但是委员会向我指出，尔·馬尔托夫把“列宁欺騙国际”这句话推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員哈阿茲同志身上了。

既然要弄清真相，就应当找到馬尔托夫所說的話的来源。他推說引自某“矿工报”第225号。这份报纸我沒有找到。在《Vorwärts》^①(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上沒有那些話。只有在《Bremer Bürger-Zeitung》^②(社会民主党不来梅机关报)上我才找到那些話。

我不能象尔·馬尔托夫那样草率从事，应当問問哈阿茲本人。

于是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書面的詢問。

① “前进报”。——編者注

② “不来梅市民报”。——編者注

下面就是哈阿茲的复信：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敬爱的同志们：

现在我回答你们的来信，我通知你们，从你们来信中所说的话看来，“光綫报”对我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的发言所作的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会议上曾经讨论过组织委员会是不是可以要求派遣代表驻社会主义国际局的问题。我当时说过，不可以，因为组织委员会甚至自己也声明它不是一个组织，它只想成为一个恢复各组织的统一的集团的联盟。因此我提出了在俄国党的目前情况下，谁有权代表这个党的问题，并且指出，如果认为中央委员会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国际局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末这种称呼就可能引起误解。

可见，在这里根本没有攻击列宁的意思，提出这种意见决没有侮辱的性质。我只想说明同上面提到的看法有关的情况，我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采取措施把俄国和波兰的一切集团联合起来的时刻是不是来到了。列宁没有出席会议，我感到十分遗憾。

为了说得更全面，我要指出，“欺骗”这两个字不是出自我口。 致
同志的敬礼

哈阿茲

1912年12月31日于柏林

由此可见，尔·马尔托夫一再地（跟在某人后面）制造哈阿茲的謠言，只不过是為了千次万次地誹謗我而已。

哈阿茲是反对组织委员会有代表权的，哈阿茲并不反对中央委员会有代表权。

哈阿茲并不认为中央委员会是包括“民族集团”和取消派在内的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而且据我所知道的，中央委员会自己也从未有过要代表他们的想法。

“民族集团”（波兰人、崩得、拉脱维亚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特别代表。

我仅仅根据事实作如上的驳斥……

尼·列宁

写于1913年1月6日(19日)

载于1913年1月11日

“真理报”第8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

1912年是罢工斗争突出发展的一年，这是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指出了的，并且得到一致公認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这种现象，对它作出了正确的估计。

我们就来看一看每年前11个月的政治罢工的统计材料吧。我们得出的总数是：

1905年.....	1 052 000 人
1906年.....	642 000 人
1907年.....	540 000 人
.....
1912年.....	約 900 000 人

前9个月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据十分慎重的统计，是70万人。在彼得堡，参加反对取消初选人而举行的罢工的工人将近5万人，据莫斯科厂主协会的统计，参加抗议塞瓦斯托波尔死刑判决的罢工和11月15日杜马开幕日罢工的有188 000人。这是11月20日以前的统计材料。很明显，90万这个数字是最低的。即使减掉不能同1905—1907年相比的10万人（没有实行工厂检查制度的工厂的），也有80万人。

运动的发展肯定是超过了1906年和1907年，不过稍稍落后于1905年。

这说明了什么呢？

目前时期运动的全民规模当然比 1905 年差得很多。因此，现在革命高潮的开头就比第一次革命前高得多。因此，未来的第二次革命在现在就已經显露出无产阶级储备的雄厚得多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的人数现在至少增加了 20%。无产阶级现在更加集中了。运动的純无产阶级台柱，由于很快地摆脱同土地的联系而加强了。“手工业”和农业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也大大加强了，而这是无法统计的。

最后，先进的民主阶级的觉悟程度、經驗和革命性也提高了。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仔细地考虑由此应得出什么結論。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面对真理，承認摆在我們面前的是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是革命高潮的开始。

指出这一点的，首先是运动的规模，这是基本的、最客观的、最不容許主观地任意解释的事实。如果没有革命的社会环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能在一年內鼓动数十万工人举行若干次各种原因的政治发动。而在我国，这种高潮是自发地来到的，这是因为几千万半无产者和农民把他們滿腔沸騰的激昂情緒傳染到（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他們的先鋒队身上了。

1912 年俄国工人的革命罢工，具有真正的全民性質。所謂全民的运动根本不應該了解为整个资产阶级或者至少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同情这个运动。只有机会主义者才这样了解。不是的。全民运动是反映全国人民的客观要求并沉重地打击阻碍国家发展的敌人的中坚力量的运动。全民运动是絕大多数人民同情的运动。

今年的工人政治运动正是这样的运动，它得到了全体被剝削

劳动者和整个民主派的同情，尽管民主派还很软弱，受压制，而且是分散的和孤立无援的。新的运动的最大优点在于更加明确地划清了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这一点当然是同那些幻想“把杜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的人进行了斗争才达到的）。要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更确切地了解：可以同誰一起战斗，誰是可靠的同盟者，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

所以說，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新革命的公开发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說，共和国的口号恰恰是現在在俄国具有十分特殊的（同欧洲比起来）重要意义，这个口号可以清除願意斗争的民主派意識中那种曾大大削弱 1905 年的冲击力量的保皇幻想（以及“立宪”幻想）。俄国新革命增长的过程中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因素：第一、四五月罢工，当时彼得堡的工人，甚至在他們的領導組織彼得堡委员会的人員被逮捕了的情况下还是提出了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和沒收土地的口号。第二、11 月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見里加和莫斯科的米信¹¹⁷；彼得堡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不过我們的記者全被逮捕了）。这些游行示威的口号不仅有“打倒死刑！打倒战争！”，还有“革命的工人階級和革命的軍隊万岁！”。

在彼得堡、里加、莫斯科的街头上，无产階級伸手援助了农民軍隊中英勇地反对君主制的先进分子。

* *
* *

自由資产階級反对新的革命，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但是自由派并不籠統地反对一般的政治罢工，例如并不反对只是証明“气氛活跃”并且只是支持自由派的立宪改革的口号的罢工。我們的取消派客觀地說来，不論他們的願望如何“善良”，都是反革命資

产阶级的走卒，因为他们在高潮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因素出现的时候“发动”……反对革命罢工！！令人永远难忘的无与伦比的弗·叶若夫曾在1912年5月20日“涅瓦呼声报”创刊号上反对用政治罢工使经济罢工“复杂化”以及用经济罢工使政治罢工“复杂化”的作法，反对把两种罢工“有害地混淆在一起的”作法（参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第4版^①）。

1912年11月，取消派的“光线报”也反对罢工。后来它企图把一些粗心的人“引入迷途”，就借口说社会民主党党团反对过11月15日的罢工。不过谁要是稍微关心事件的意义，就不难看穿“光线报”的捏造伎俩。

不错，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彼得堡委员会曾经认为在11月15日举行罢工不适当。他们曾经警告不要在那一天举行那一次罢工。工人的报刊有义务报道这方面的消息。“光线报”和“真理报”都这样做了。

但是，“光线报”不仅做了这一点。

在11月15日事件发生以后（在一向同孟什维克的关系最密切的维波尔格区罢工罢得最起劲的时候），在运动已经发展为游行示威以后，英明绝顶的“光线报”一连发表了几篇文章（11月17日的社论和第一篇文章，11月21日的小品文），叫嚣反对“危险地浪费力量”，并武断地说“由于经常举行罢工，人们要不同情罢工了”，提出了“爆发(!?!)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此“我们要另找别的办法”的口号，并且大喊大叫反对“玩弄罢工”。

取消派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的那一套“哲学”，彼得堡的工人们

^① 见本卷第102—103页。——编者注

早就从“涅瓦呼声报”上和你們的“倡导小组”成員的言論中領教过了，这套“哲学”激起了彼得堡工人們对你們的正当的憎恨和蔑視。个别的罢工可能遭到失败或者时机选择得不好。但是只有自由派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把使将近百万的无产者行动起来的世界最伟大的一次运动說成是“玩弄罢工”！

經常罢工是会使工人过分疲倦的。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应当号召举行時間比較短的罢工，举行更有准备的游行示威。但是 11 月 15 日事件很明显正是游行示威运动以前的一个新的前进步驟！

你們取消派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因为你們对 11 月 15 日的意义作了十分明显的錯誤估計），反而象厚顏无耻的自由派一样，大談什么革命宣言“缺乏政治常識”，你們是在重复自由派政策的老調子！

取消派既在革命罢工和游行示威誕生和发展的时代反对革命罢工和游行示威，并且在合法的报刊上大肆誹謗秘密的宣言，那末他們大談同党“統一”的阿諛奉承的言論还会有什么价值，这一点讓工人們来判断吧！！

* * *

取消派攻击罢工毕竟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取消派是自由派的奴仆。頑强的革命罢工已經使自由派感到很不高兴。“进步党人”厂主开始憤憤不平，甚至发起疯来。米留可夫之流开始担心他們同罗将柯結成的“联盟”能不能平安无事了。

取消派的政策是讓工人們服从自由派。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把工人提高为农民的領導者。取消派先生們，这个問題不能公开地談，但是一切想成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都应当想到这个

問題，談到這個問題。

在自由的立宪的欧洲，政治罢工現在（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是一种爭取个别改革的斗争。在正在面临下一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奴隶制的、亚洲的沙皇俄国，政治罢工乃是一种推动、激励、喚醒和发动农民和农民军队中的优秀分子参加革命斗争的唯一重要的手段！值得俄国庆幸的是，除了单枪匹马的民粹派英雄再沒有人“到民間去”的时代已經过去了。孤軍奋战的恐怖分子能够用恐怖手段来証明人民的“覺醒”的时代已經过去了。俄国已經渡過这些悲慘的时代前进了。在1905年，革命的无产阶级已經給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到民間去的道路”，另一种吸引群众参加运动的手段。

这种手段就是：頑强的革命罢工，此起彼伏、从这里卷到那里、从边疆卷到边疆的罢工，通过爭取改善經濟条件的斗争喚醒落后的人們走向新生活的罢工，痛斥和抨击沙皇政府一切突出的暴力、专横和罪恶行为的罢工，在首都的街头打着紅旗、发表革命演說、高呼革命口号走到人群中、走到人民群众中去的罢工和游行示威。

人为地制造这样的罢工是办不到的，但是当罢工已經席卷了几十万人的时候，想阻止罢工也是办不到的。

就讓那位因为能坐在罗将柯“本人”身边的沙发椅上因而感激零涕的自由派向工人們这样說吧：“弟兄們！別搞爆发，你們可以另找別的办法，从事和平的工会运动，認真地作好准备以便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公开政党，不要鼓动农民造反，不要把精力浪費在罢工上，否則‘我們’可不同情你們了！”

工人們是会評价这种言論的，是会鉴别这种言論的，尽管这些

言論是用“光綫報”的任何一位撰稿人的“几乎是馬克思主义的”詞句伪装起来了。

工人將集中精力注意有意識地支持、加強、發展、鞏固那種自發地增長起來的革命罷工，為農民和軍隊的起義作好準備。如果罷工使工人過分疲倦，那就應該交替地進行，讓一些人休整，讓另一些經過休整的或“新生的”力量投入鬥爭。應當舉行時間比較短的罷工。有時應當用遊行示威來代替罷工。可是最重要的是，讓罷工、群眾大會、遊行示威不間斷地進行，讓全體農民和整個軍隊都知道工人的頑強鬥爭的情形，讓農村，甚至最偏僻的農村都看到城市里也不平靜，看到“自己人”都行動起來了，正在進行殊死的鬥爭，爭取美好的生活和更高的工資，制止當局專橫暴戾的行為，要求把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推翻沙皇的地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應該做到使工人的革命罷工成為吸引農村中的隱藏着的憤怒和抑制着的怨聲以及兵營中的激奮心情的中心。必須堅持不懈地進行這項工作，將來一定會有這麼一天，無產階級同農民和軍隊一起打倒地主，用人民起義推翻沙皇君主制。

附言。“光綫報”在向前發展：在正直的弗·阿·（第56號）後面，出現了外交家費·唐·118（第65號）。儘管玩弄了“外交手腕”，費·唐·的言論的主旨還是一樣：反對革命罷工！這是一位純粹的自由主義分子，他根本沒有想到罷工正在喚醒農民，引導他們起義，推進群眾中的革命鼓動工作，喚醒軍隊，也沒有想到應當從罷工（因為它使工人過分疲倦）過渡到街頭遊行示威等等。

費·唐·的所謂“爭取組織權”是“迫切的任務”（這是在特列申柯存在的情況下“提到日程上來的”立憲改革¹⁾）的自由主義庸俗

詞句，是“光綫報”反对革命罢工的斗争的唯一的辯护詞。太少了，取消派先生們！

載于 1913 年 1 月 12 日（25 日）

“社会民主党人報”第 30 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報”原文刊印

“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一文的附言初稿¹¹⁹

我們請社会民主党人特別注意費·唐·在“光綫报”上发表的“策略意見”。托洛茨基式的裝門面的調和主义和“联合的”詞句，銷声匿迹得多么快呀！“光綫报”的实际方針——露骨的取消主义，暴露得多么明显呀！

費·唐·在合法的机关报上經常进行笔战，他不仅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至于起义，那就更不用說了)，而且反对在群众中进行任何革命鼓动工作。实际上，費·唐·比弗·阿·(“光綫报”第56号)彻底得多，他暴露出他同崩得的所謂“勾消”革命的主张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請看取消派拒绝对“形势”作公开的、明确的、正式的“估計”造成了怎样的結果。实际上費·唐·采用的正是拉林式的估計，即否定要求工人为了革命、为了吸引一般群众特别是农民参加革命运动而組織起来的客观条件。

关于費·唐·的文章，我們以后还会談到的。

写于1913年1月

第一次发表

按手稿刊印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波兰社会民主党现在的分裂，是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冲突的结果。早在190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总执行委员会同华沙区和达布罗伐区组织之间就有了十分尖锐的矛盾，以致代表大会否决了信任总执行委员会的提案。冲突是关于组织问题的，然而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地方组织要求能够影响党的政治立场，坚决要求让各级组织广泛地讨论党的一切措施。

总执行委员会还是掌握在那些人手里。以不无名气的梯什科为首的总执行委员会多数派，利用了党被削弱的情况、革命的失败和反动形势，不改变自己的策略。梯什科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一切擅自作主，以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进行倾轧活动，根本不执行它的意志。在党的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一个毫无原则的动摇时期，例如在工会问题上，在对待波兰社会党的态度上，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策略上。总执行委员会不允许那些揭发总执行委员会政策中的矛盾现象、要求执行彻底的原则路线的同志说话，不允许在报刊上展开讨论，更糟糕的是，常常答应“最近”举行讨论，而只有一次刊印了同志们反对这个策略的抗议书。这个总执行委员会中的梯什科的反对者，一些全党知名的老工作人员，都一个个地被排挤掉了。有一位早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放弃参加选举，宣布不能同梯什科共事，有一位在

1909 年被排擠出去，有一位在 1911 年拒絕參加總執行委員會。

但是，隨着運動的高漲和自 1911 年初出現的活躍，各地也出現一種不滿情緒。現在為首“造反”的是一個最重要、最有力量、而更主要的是革命態度最堅定的華沙組織，它從 1905 年到今天一直處於波蘭社會民主黨左翼的地位。

當然，總執行委員會焦急不安起來，於是下決心加以“制止”。1911 年 12 月華沙區際代表會議是進攻的信號。這個代表會議竟敢於要求在即將召開的黨的 代表會議上有一個比較有力量的“邊區”代表團，也就是說，進而（真是胆大妄為）削弱總執行委員會在代表會議上的影響。不過這還不算什麼，洛茲代表會議也通過了這樣的決議。華沙組織更大的罪過在於：它表明，要求這樣做並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有政治目的的。它通過了幾項梯什科不滿意的政治決議，其中表示華沙組織不滿意總執行委員會不向它報告自己的工作，要求總執行委員會向党交代自己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活動，要求總執行委員會不得隱瞞“俄國的”政策不讓波蘭工人知道等等。

展開了公開的鬥爭。梯什科散發了許多“通知”和“解釋”。他“解釋”說：（1）華沙組織踐踏了黨章，進行了分裂活動；（2）華沙組織的決議是抵制主義、召回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表現；（3）華沙組織同總執行委員會沒有任何思想分歧，也就是說，分裂毫無政治基礎；（4）華沙組織根本不存在，代表會議是虛假的，因此，不論現在和過去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分裂；（5）華沙組織連一張小報都不能獨立出版，一切報刊工作都由總執行委員會進行；華沙組織建立自己的分裂分子的技术設備和出版自己的小報是非法的。他本人還如數家珍地形容了華沙兩位“進行傾軋活動的知識分子”，說

明是他們在制造分裂，可是他們从来不在組織中工作。

最后，梯什科看到华沙組織坚持自己的立場，于是决定采取……“果断的”办法。他决定召开一个虛假的代表會議，不准許反对派即在边区工作的大多数同志出席这次代表會議。为此，梯什科宣布……“解散”最有力量华沙組織，并由梯什科的两三个代理人另行組成一个分裂主义的“华沙組織”。

但是梯什科“解散”华沙組織的所謂“理由”，是极其荒謬的。梯什科宣布，这个不听他的話的組織无非是警察局挑拨离間的工具。梯什科直到現在还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够証明这一点的、哪怕是很小的重要事实。他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个哪怕是有嫌疑的人的名字。此外，为了給自己留一条退路，梯什科在給国际局的声明中畏畏縮縮地写道，在华沙以及其他一切在目前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組織中，很有可能潜伏着挑拨离間分子。

但是，梯什科認為“解散”华沙組織是有好处的，甚至宣布华沙組織已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外。讀者可以看出，这已經不是派别斗争，簡直是某种犯罪行为了。

不难理解，梯什科这种輕举妄动的行为使人們对他的憤慨加强了十倍。梯什科本人指定的調查挑拨离間事件的委员会也反对他。于是梯什科开除了三位有多年党龄并孚众望的波兰社会民主党活动家，以进行报复。44位老工作人員发表了极强烈的抗議書，反对“总执行委员会”这种侮辱一切革命家的行动。不論在边区或国外，到处都要求“总执行委员会”答复。当然，华沙組織没有为了迎合梯什科而解散，而是繼續进行自己在目前条件下极为困难的工作。在华沙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取得輝煌成績的正是“反对派”。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政党的绝对多

数。在 81 名社会民主党初选代表中，有反对派的拥护者 81 人，动摇分子 2 人，拥护梯什科的只有 1 人。可是在总执行委员会及其拥护者进行“工作”的外省，竞选运动到处都遭到了失败。

应该相信，梯什科的行为引起的不体面的小小的内哄，很快就会成为过去的事情，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会明确地显露出来。波兰社会民主党工人希望在组织上同俄国同志有更密切的联系的愿望，同样会更具体地表现出来。梯什科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行为使总执行委员会完全脱离了全党的生活，使它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没有一个同盟者，双方（取消派和反取消派）都同样地对梯什科及其“总执行委员会”的奇怪的毫无思想性的“策略”感到莫名其妙。

波兰社会民主党现在正经历着困难的时刻。但是结局已经显示出来了。所有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健全分子正在团结起来。波兰社会民主党成为具有自己的原则和策略的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组织，而不是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的时刻，也快要到来了。

我们认为在报道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情形的报告中，还要补充一些关于谴责“挑拨离间”这件事的进一步演变的情况。关于这件事，有人告诉我们说：

罗莎·卢森堡（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国际局委员）给社会主义国际局写了一个文件，说华沙委员会是暗探局控制的分裂分子组成的，并且说不要把这件事公布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梯什科本人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把这种令人作呕的话公布出来了！！

列宁在收到了社会主义国际局書記胡斯曼寄来的梯什科的文件副本之后，当然就給胡斯曼写了回信，說这是“极其奸險的”报复行为，前中央委員馬列茨基和加涅茨基是党内大家都了解的人，梯什科本人所指定的調查委员会也沒有找到任何挑拨离間的事实；公布在政敌中間有人有挑拨离間的行为，而不列出名字，是最卑鄙无耻的事情^①。

总执行委员会用破口大罵来回答。

巴塞尔代表大会举行了。华沙委员会的代表团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体代表，包括取消派分子、拉脫維亞人、前进派分子、崩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一致承認！

在华沙的选举中，有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复选代表、华沙委员会的拥护者、梯什科之流的反对者当选了。

現在已經在大家面前証明了梯什科的平行的組織是虛假的。采取誠实的办法，收回对挑拨离間的譴責，梯什科及其总执行委员会是办不到的。

但是，我們的酷爱“統一”的取消派和他們的組織委员会却比其他一切人做得更妙。正式参加八月代表會議的“光綫报”，两次报道了梯什科的令人作呕的謊話！！

第一次干这种事的是一位用縮写字隱瞞姓名的先生。第二次是奥古斯托夫斯基¹²⁰先生。

多么勇敢的人呵！他們隱藏在总执行委员会的背后，散布令人作呕的謊話。这一切同我們毫无关系，我們用不着答复，我們不散布令人作呕的謊話，我們“只是”把那些用总执行委员会的名义

^① 見本卷第 267—268 頁。——編者注

报道（令人作呕的谎话）的事实告诉人们。

馬尔托夫、托洛茨基、李伯尔、拉脱维亚人之流，隐藏在梯什科的背后，在不能把文件刊登出来的合法的刊物上匿名散布梯什科的令人作呕的谎话！！

載于1913年1月12日(25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关于布尔什維主义¹²¹

布尔什維主义的产生同所謂“經濟主义”(即否定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和它的领导作用的机会主义)在1897—1902年所进行的反对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有密切的联系。旧“火星报”发动的几次著名的运动(1900—1903年在慕尼黑、倫敦和日内瓦)击败了并清除了崩得所支持的經濟主义,并且根据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恢复了社会民主党(它成立于1898年,后来由于逮捕而被破坏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上,火星派发生了分裂;其中多数派拥护旧“火星报”的原则和策略,少数派则轉上了机会主义,得到了“火星报”从前的敌人經濟派和崩得分子的支持。由此产生了布尔什維主义和孟什維主义(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即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名称。在1903—1904年,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孟什維克在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从1904年年底起,策略上的分歧逐漸成为主要的分歧。轉到孟什維克手中的新“火星报”的“地方自治运动的計划”(1904年秋天),拥护“不要恫吓自由派”的策略。在1905年,策略上的分歧彻底形成了(1905年5月在倫敦召开了布尔什維克的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在日内瓦召开了孟什維克的“代表會議”)。孟什維克使工人階級的策略迁就自由主义。布尔什維克提出了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目的:

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领导民主主义的农民，不願自由主义的背叛。两派在实践上的主要分歧如下：1905年秋天，布尔什維克主张抵制布里根杜馬，孟什維克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馬。1906年春天，对維特杜馬的态度也是如此。在第一屆杜馬，孟什維克拥护支持杜馬(立宪民主党)內閣的口号，布尔什維克拥护成立左派(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团)执行委员会的口号，以便通过执行委员会組織群众的直接斗争等等。作更詳細的闡述，只有在国外的刊物上才有可能。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906年)上取得胜利的是孟什維克，在倫敦代表大会(1907年)上取得胜利的是布尔什維克。在1908—1909年，“前进派”(哲学上的馬赫主义和政策上的“召回主义”或抵制第三屆杜馬，有波格丹諾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从布尔什維克分裂出去。在1909—1911年，布尔什維主义同他們进行了斗争(例如弗·伊林“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1909年莫斯科版^①)，同取消派(即否定秘密的党的孟什維克)进行了斗争，而同那些宣布同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的护党派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等人)接近了。布尔什維克机关报有：“前进报”和“无产者报”(1905年日内瓦)、“新生活报”(1905年圣彼得堡)、“浪潮报”、“回声报”等(1906年圣彼得堡)，以及在芬兰(1906—1907年)、日内瓦(1908年)和巴黎(1909年)出版的“无产者报”，在巴黎(1909—1912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弗·伊林某些主要的布尔什維主义的著作已經汇集成“十二年来”文集(1909年圣彼得堡版)，文集中較詳細地談到了各种著作。主要布尔什維克作家有：格·季諾維也夫、弗·伊林、尤·加米涅夫、彼·奧尔洛夫斯基

^① 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編者注

等人。在最近几年,布尔什维克曾是下列报刊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圣彼得堡的“明星报”(1910—1912年)和“真理报”(1912年)、莫斯科的“思想”杂志(1910年)、圣彼得堡的“启蒙”杂志(1911—1913年)。

写于1913年1月上半月

1913年第一次载于尼·亚·鲁巴金
“书林概述”第2卷莫斯科第2版

按该书原文刊印

彭加勒当选的意义

人們正紛紛祝賀法兰西共和国的新總統。請看一看黑帮暴徒的“新时报”和自由派的“言論报”吧：在祝賀彭加勒總統上，在表达他們的称心如意上，那种齐心一致的情形多么令人感动呵！

在对西欧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状况問題的估計上，我国黑帮分子和自由派的深刻的、內在的血緣关系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这两种人祝賀法国大資產階級和封建教权反动派的联盟选出的“全国的”總統彭加勒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清楚地看到，黑帮分子和自由派只是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方法 的看法上有些分歧。

但是，彭加勒当选的意义远比那些热心的“祝賀者”所想到的要大得多。觉悟的工人們周密地考虑了这次选举的意义，指出了三种情况。

第一，彭加勒当选意味着法国面临的阶级斗争还要进一步加剧。彭加勒曾是激进党在議會中占多数的时期的总理。他击败了激进党候选人巴姆斯，当选了總統，他是在封建教权反动派的帮助下当选的，他是由右派联盟选出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法国，掌握政权的是最后的資產階級政党激进党。这个資產階級政党同“反动派”的差别愈来愈小了。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整个資產階級，从激进的到反动的，愈来愈紧密地团结起来，两者之間的界限逐渐消失了。这一点在

彭加勒的当选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这种团结是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可靠标志。

第二，彭加勒的官运亨通很值得注意，这是相继把自己在政治上出卖给一切政党、在政治“之外”出卖给一切富豪的资产阶级市僧的典型的飞黄腾达史。就职业说，彭加勒20岁当律师。26岁当办公厅主任，33岁当部长。各国的富豪和财政巨头很重视这些狡猾的野心家的政治联系。“杰出的”律师兼议员——政治上的狡猾分子，这在“文明”国家中是同义语。

第三，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彭加勒竞选的时候的表示是值得注意的。投票拥护瓦尔扬就是一种纪念公社的表示。瓦尔扬是公社的活的纪念碑。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发白如银的瓦尔扬在讲坛上一出现，巴黎工人们怎样欢迎他就足够了。

请看，就在凡尔塞，在1871年资产阶级法国为了镇压无产阶级起义，曾在这里把祖国出卖给俾斯麦的凡尔塞；就在那个大厅里，在42年前希望自己有一个国王的法国的黑帮地主曾在这里发出野兽般的哀号的大厅里，工人阶级的代表们给巴黎公社的老活动家投了票。

載于1913年1月15日

“真理报”第11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坦 率

我們的報紙已經指出，杜馬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实行地方自治的法令草案在国家参議院里遭到失敗了。尽管这个事实完全无足輕重，也还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事实，还应当一再談到这个事实的意义。

保証封建式的（用俄国話說，就是农奴式的）地主占絕對优势的貴族地方自治局，已經存在了将近 50 年。仅仅在某些省里，如在几乎没有貴族地产的維亚得卡省，地方自治局具有較大的农民性質；然而在这里，地方自治局还被官僚的各种禁令、障碍、限制、解释織成的更密的天罗地网包围着。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就是为了这种看来不足为害的、受到限制的地方自治，已經奋斗了 50 多年了。

可是黑帮的、地主和資產阶级的第三届杜馬的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实行地方自治的決議，被国家参議院否決了。这件“小事”十分清楚地說明了我国“更新了的”制度的实质！这是說明政策的阶级根源的非常成功的一課！

在国家参議院里，反对地方自治的人所持的理由很坦率：原来是那兒沒有貴族。国家参議院的报告人斯提申斯基老爷感叹地說：全省“私有”地产总共才有 2 660 俄亩。

总之，如果没有貴族地主，“人民”就連修道路、办医院的資格

也沒有。既然沒有地主,就应当直接地或間接地安插些地主。

从哪里抽人来安插呢?从地主綽綽有余的俄国中部地区。在黑土带中部地区,农奴制遺留的痕迹最鮮明,保留的“徭役制”(工役制)的成分最多,类似庫尔斯克人的死硬派在独占地統治着、主宰着和管理着这个地方,在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上,只可以依靠这个地方的地主。从这个意义上說,国家参議院对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方自治問題的态度,是說明我国国家組織的最有教益、最生动的一課。

截于1913年1月17日

“真理报”第13号

署名: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布利安內閣

过去曾經作过大革命家和“总罢工”倡导人的著名的叛徒布利安，現在又当上了法国的內閣首脑。他也跟英国的約翰·白恩士一样，背叛了工人階級，賣身給資產階級了。

他的新內閣的成員是值得令人玩味的。在內閣中主宰一切的是三个人：饒納尔—埃蒂耶納—勃丹。这是一些什么人物呢？

請看一看自由派的報紙，例如“言論報”第11号。你們會看到部長們在哪里学习过，在哪里服务过的十分詳細的描写。你們會看到恬不知耻的广告和費尽心机的巴結：饒納尔是爱德华国王的朋友！勃丹是巴黎公社活动家的侄子！

“只叫饒米尼、饒米尼，白酒的事情只字不提。”¹²²至于問題的本質，“言論報”却一声不响。而問題的本質是很簡單的：这三人团是一伙坏透了的恬不知耻的金融投机分子和騙子。埃蒂耶納参加过从巴拿馬运河起的千千万万件肮脏的勾当。他是类似我国的巴什基里亚地区的殖民地的金融业务方面的投机分子…… 饒納尔享有过同样“純洁地”开采烏安察（非洲）富饒的鉄矿的特权。他有好几位亲戚是几家最大的股份公司的董事。勃丹是造船厂資本家、承包商和厂主的管事人。海軍部的职位对他正合适……好就近承包海軍的工程和供应海軍物資！

馬克思說过，資產階級政府是資本家階級的管事人¹²³，法国

的情形最明显不过地証实了这句话。而法国伟大的进步就在于工人阶级剥掉了一切欺騙的外壳，使模糊的东西清楚起来，“摘去了裝飾在鎖鏈上的那些虛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沒有任何乐趣任何憊借的鎖鏈，而是要人扔掉它們，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¹²⁴。

載于1913年1月18日

“真理报”第14号

署名：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举总结

第四届杜馬选举运动証实了馬克思主义者自 1911 年以来对历史形势的估計是正确的。这个估計說：俄国历史中的反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經結束。以资产阶級民主派的“輕部队”的觉醒（学生运动）、工人的进攻性經濟运动特别是非經濟运动等等为特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經濟萧条、反革命坚决进攻、民主派退却和分裂、“进步陣营”中变节者的、“路标派的”、取消派的思想泛滥，——这些就是第一阶段（1907—1911 年）的特点。而第二阶段（1911—1912 年）無論在經濟、政治、思想方面，都具有相反的特点：工业繁荣，反革命不能用以前那样的力量或精力等等繼續进攻，民主派的觉醒使路标主义、投降变节、取消主义的情緒不得不隐藏起来。

这就是正确評价 1912 年的选举运动时所必須注意到的整个的背景。

一、“制造”选举

第四届杜馬选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府有系統地伪造这次选举。我們在这里不打算給“制造的选举”作总结；关于这一点，一切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报刊已经谈得很不少了；立宪民主党人在第四届杜馬提出的詳細質問也說明了这一点；等将来把大量的而且逐漸增多的材料收集起来，也許我們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談这个问题。

現在我們仅談一談制造选举的基本总结和这种“制造”的主要政治意义。

制造 1912 年选举的基本手法就是：动员僧侶反对自由派的和十月党的地主，十倍地加紧迫害和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律来对付城乡资产阶级民主派，试图用同样的手段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走工人选民团。整个这个政策很象拿破仑主义的政策，其目的是要在杜馬中形成一个右派和民族主义党人的多数。大家知道，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我們下面就会看到，政府毕竟还是在我国的（請原諒我用这个說法）議會中“保持了”以前第三届杜馬的状况：在第四届杜馬中仍旧有两个多数，即右派和十月党人的多数以及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

1907 年 6 月 3 日的选举法在农奴主地主同资产阶级上层联盟的基础上“奠立了”国家管理的（并且不仅仅是管理的）制度，同时前一种社会成分在这种联盟中占很大优势，而实际上站在这两种成分之上的是完整的旧政权。現在我們不談农奴制等等的几世紀历史造成的这种政权过去有的和現在仍旧有的特性。但不管怎样，1905 年的变动、旧事物的崩潰、群众和阶级的公开的强大发动，毕竟迫使旧政权去同这种或那种社会力量结成联盟。

1905—1906 年有过的对“土包子”、对庄稼汉的希望（布里根和維特的选举法），已經破灭了。六三政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强者身上”，即寄托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大亨身上。現在，第三届杜馬

总共約 5 年的經歷，已經开始打破这个“希望”！再沒有比 1907—1912 年的十月党人更会拍馬的了，但十月党人还是“沒有拍得上”。本性同他們十分相近的旧政权（所謂“官僚制度”），同他們也不能和睦共处。資產階級在农村中的政策（11 月 9 日的法律）和促进資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措施，都在普利什凱維奇之流掌握之下，其結果是悲慘的。普利什凱維奇主义虽然用新的土地政策和新的代議机关制度整頓、修飾、刷新了一下，但它仍繼續压制着一切，阻碍着发展。

六三政制发生了裂痕。在沒有坚强的、牢固的、受过考驗的、完整的社会支柱的时候，在不得不在各种不同的成分中間随机应变的时候，“制造”选举是不可避免的，正象拿破仑主义的手法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一样。如果民主階級很軟弱，或者被一些暫时的原因大大削弱了，这些手法就可能在許多年中获得“成效”。但是，就連 19 世紀 60 年代俾斯麦或拿破仑第三的“古典”手法也都証明，沒有一些最急遽的轉变（在普魯士是“上层革命”和几次非常成功的战争）是不行的。

二、新杜馬

为了确定选举結果，我們要把說明第四届杜馬党派成分的官方材料拿来，不仅同第三届杜馬末期（1912 年）而且同初期（1908 年）的材料加以比較。我們就会看到这样一种大可注意的情况^①：

^① 这些材料来自以下杜馬出版物：1908 年度“一覽表”，1912 年度“索引”，1912 年 12 月 2 日出版的“国家杜馬（第四届）参考手册” 1912 年第 14 期有关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穆斯林这三个民族集团的 1912 年 12 月 1 日的訂正材料。

	第三届杜馬		第四届杜馬
	1908年	1912年	
右派.....	49	46	65
民族主义党人和温和的右派	95	102	120
十月党人.....	148	120	98
进步党人.....	25	36	48
立宪民主党人.....	53	52	59
三个民族集团.....	26	27	21
劳动团.....	14	14	10
社会民主党人.....	19	13	14
无党派人士.....	—	27	7
总 計.....	429	437	442

从这些材料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在第四届杜馬中仍旧有以前的两个多数：占 288 票 (65 + 120 + 98) 的右派和十月党人的多数以及占 226 票 (98 + 48 + 59 + 21) 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

对于专制政府，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杜馬中“自己的”多数。在这方面，第三届杜馬和第四届杜馬没有多大差别。在第三届杜馬中，右派和十月党人的多数最初占 202 票，最后占 268 票。现在获得的票数是在这两个数字之间，288 票。

由于右派多数从第三届杜馬开始到最后票数大大减少，以致仍旧是专制的政府不能不采取制造选举的紧急措施。这种制造并不象美延多尔夫、馬克拉柯夫之流所喜欢描述的那样，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什么违反制度，而是为了维持“制度”必然要采取的措施。

以馬克拉柯夫之流为首的自由派先生們，你們是說“当局同全

“國調和”（即同資產階級調和）嗎？如果是這樣，那末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們的關於調和的言論不是空話，那你們就應當接受“製造的選舉”，因為這是同實際當局調和的實際條件。你們本來都是那麼愛好“實際政策”的人！或者你們對“製造選舉”的抗議不是空話，那你們就不應該談調和，而應該談同調和完全不同的……

六三政制的第二個多數是十月黨人和自由派的多數，在第三屆杜馬初期占 252 票，末期占 235 票，而在第四屆杜馬中則降到 226 票。可見，政府的“選舉運動”實際上是成功了；政府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一次實際地確立了自己的專制。關於右派和民族主義黨人占多數的叫囂，只不過是作買賣的時候要的虛價而已。實際上政府需要的是兩個都站在反革命立場上的多數。

無論怎樣強調這一點都不為過分，因為自由派為了愚弄民主派正在抹殺這一點，而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由於輕率也在抹殺這一點。立憲民主黨人同十月黨人的聯盟在選舉羅將柯時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言論報”就羅將柯的演說寫出來的不堪入耳的阿諛奉承的詞句，大概更加明顯地說明了這種聯盟的存在），這種聯盟決不只是“技術上的”事情。這種聯盟說明從古契柯夫到米留可夫，整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情緒是一致的；只是由於有這種情緒，這種聯盟才可能實現。

另一方面，政府從六三政制的整個制度出發，也是需要自由派和十月黨人的多數的。因為第三屆（以及第四屆）杜馬決不象那些深深陷在羅普申的心情¹²⁵和“召回派的”空話的泥潭里的“左派”民粹派往往瞎扯的那樣，是什麼“紙糊的”機關。不是的。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是專制制度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發展中的一個階段，是它們經歷了 1905 年的勝利和失敗後企圖真正接近起來的一

次必要的尝试。这次尝试的惨败不仅是斯托雷平和馬卡罗夫的惨败，不仅是馬尔柯夫第二和普利什凱維奇的惨败，而且是“調和者”馬克拉柯夫之流的惨败！

政府需要自由派和十月党人的多数，是打算在保持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无上权力的情况下推动俄国前进。至于約束和緩和自由派和十月党人的急速的、过激的“进步主义”的工具，政府手里有的是，如国家参議院和許多其他的东西……

三、六三政制内部的变化

上面引用的数字是关于反革命时期地主和资产阶级各政党、团体和派别的演变问题的有趣材料。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馬中所占的成分很少，原因很简单：特意搞出一个六三政制就是为了排除民主派。“民族的”政党，即不属于“首要”民族的各政党也受到六三政制同样特殊的压迫和摧残。

因此我們只把右派、十月党人和俄国自由派的政党，这些在六三政制中占有牢靠地位并且受到六三政制保护使之不受民主派侵犯的政党挑出来，看一看这些政党内部的变化。

	第三届杜馬		第四届杜馬	第四届杜馬同第三届杜馬初期相比
	1908年	1912年		
右派……………	144	148	185	+41, 即+28%
十月党人……………	148	120	98	-50, 即-34%
自由派(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 ……	78	88	107	+29, 即+37%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权阶层中的所謂“中派”削弱得多么厉害，而它們的右翼和自由派一翼又增强得多么厉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来伪造有利于右派的选举，但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增强的速度还是比右派快。

有一些人看到这些事实，喜欢講一些什么六三政制的矛盾尖锐化了，什么温和资产阶级的进步主义要获胜了等等冠冕堂皇的話。第一，这些人忘記了，地主中間特别是资产阶级中間自由派人数虽然增加了，但是增加得最快的是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完全建立在同右派“調和”的基础上的自由派右翼。关于这一点我們等一会还要詳細說明。第二，这些人忘記了，轟动一时的所謂“资产阶级向左轉”不过是民主派的真正向左轉的征兆而已，只有民主派才是唯一能够促使政体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第三，这些人忘記了，六三政制是专门用来在非常广大的范围内利用自由资产阶级的对抗性和地主的反动性的，因为他們对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有极其深刻的、共同的反感。

其次，我国的自由派喜欢把事情描写成这样：十月党人的垮台是“制造选举”引起的，是“制造选举”使这个“最后一个听命于政府的党”失去了支持等等。自然，这时自由派本身是以正直的反对派、独立者、甚至“民主派”的姿态出現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馬克拉柯夫同十月党人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我們来看一看第三届杜馬和第四届杜馬之間发生的变化，并且把这个变化同第三届杜馬的初期和末期之間发生的变化比較一下。大家就会看到，在第三届杜馬中十月党减少的代表人数（28）比在第四届杜馬选举时减少的（22）还要多。这当然不是

說沒有进行过“制造选举”的勾当；曾經肆无忌惮地进行过这种勾当，特别是对付民主派。但是这是說，不管怎样制造了选举，甚至不管政府起了怎样的作用和有怎样的一般“政策”，俄国有产階級中間的党派划分过程仍在进行着，反革命派的反动农奴主右翼和同一个反革命派的自由资产階級一翼的划分过程仍在进行着。

右派和十月党人的杜馬多数的各个集团和派別組織(右派、民族主义党人、温和的右派、“中派”、右派十月党人，等等)之間的差別正象十月党人和自由派的多数(左派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內部的差別一样，是不固定的，不明确的，偶然的，往往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現代的特点决不在于依賴政府的十月党人似乎受到了独立的(就是馬克拉柯夫!)立宪民主党人的排挤。这是自由派的蠢話。

現代的特点就是：真正的階級政党的形成过程正在进行，其中，一个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正在显然是反政府的叫囂和关于“当局同全国調和”的甜言蜜語声中偷偷地形成起来。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用全部力量来抹杀这个过程。因此，我們要再一次看看杜馬統計的确切数字。我們將記住，評論政党也象評論个人一样，不是根据他們的言語，而是根据他們的行动。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在一切最重要的問題上都是一致行动的，而他們無論是在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中，或者是在最近結束的选举中(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省，罗将柯同立宪民主党人結成联盟!)，在一系列問題上都是同十月党人一致行动的。

我們来看一看关于这三个政党的材料：

	第三屆杜馬		第四屆 杜馬	第四屆杜馬同 第三屆杜馬初 期比較
	1908年	1912年		
十月黨人.....	148	120	98	-50, 即-34%
進步黨人.....	25	36	48	+23, 即+92%
立憲民主黨人.....	53	52	59	+6, 即+11%

我們看到：十月黨人有明顯的和不斷的減少；立憲民主黨人減少了一些，馬上又增加了一些；進步黨人有明顯的和不斷的增加，他們在5年內幾乎增加了一倍。

如果我們把米留可夫先生公布在1912年“‘言論報’年鑑”第77頁上的1908年的數字拿出來看一看，情況還要明顯得多。據米留可夫先生統計：1908年在第三屆杜馬中有154個十月黨人，23個進步黨人，56個立憲民主黨人。拿這個數字同第四屆杜馬比較起來，那就是立憲民主黨人的人數有微不足道的增加，進步黨的人數則增加了一倍多。

1908年進步黨人不到立憲民主黨人的一半。現在進步黨人的人數是立憲民主黨人人數的80%強。

由此可以看到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即反革命時期（1908—1912年）俄國自由主義的最明顯的特征就是進步主義有了很大的發展。

什麼是進步黨人呢？

按成分和思想體系來說，進步黨人就是十月黨人同立憲民主黨人的混合物。

在第三屆杜馬中，進步黨人當時還被稱作和平革新派，他們的領袖之一反革命貴族李沃夫在第一屆杜馬中曾是立憲民主黨人。

我們看到，在第三届杜馬中进步党人的入数从 25 增加到 36，即增加了 11 个人；在这 11 个代表中，有 9 个来自别的政党，即：1 个来自立宪民主党人，2 个来自温和的右派，1 个来自民族主义党人，5 个来自十月党人。

进步党人在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代表中間的迅速增长和“路标”在“社会”中的胜利，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进步党人在政治实践中实现了“路标”在理論中所宣揚的东西，即侮辱革命，背弃民主派，贊美资产阶級齷齪的牟利行为，把这种行为說成是人間的神圣事业等等。

立宪民主党人馬克拉柯夫談到当局同全国調和时，他所謳歌的只是进步党人所做的事情。

布尔什維克曾經在立宪民主党人完全陶醉于他們的“胜利”的时候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指出了他們的党的真正本質^①，現在这一本質已經被事变的整个进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我們离开 1905 年和 1906 年愈远，就愈清楚地看到当时布尔什維克所說的是多么正确。

俄国民主派如果不坚决地破坏立宪民主党人在群众中的“威信”，任何胜利也不可能取得。反之，立宪民主党人同路标派和进步党人实际上溶合在一起，是民主派在无产阶級领导下团結起来并得到巩固的条件之一和征兆之一。

四、选举斗争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

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关于选举的議論和文章中被推到最次要的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170—247頁。——編者注

地位，甚至被完全抹杀了。然而这是关于选举运动的思想政治内容的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其余一切问题，一切关于“反对派的百分比”的寻常材料等等就会完全失掉价值。

对这个问题的最流行的答案是：斗争是由于要不要宪法而产生的。右派是这样看的。自由派也是这样看的。右派和自由派的一切报刊都贯穿着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进行斗争的是两个阵营，一个赞成宪法，另一个反对宪法。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和该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论报”曾直接提出这种两个阵营的理论，而且是以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来的。

就请从选举结果的角度来看一看这种“理论”吧。它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吗？

新杜马第一步的标志是立宪民主党人在以罗将柯为“立宪派”的候选人的问题上同十月党人（甚至同部分右派）结成联盟，罗将柯的似乎包含立宪纲领的演说，受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热烈欢迎^①。

大家知道，十月党人的领袖罗将柯是右派十月党人，他和“中派”或保守的立宪派的领袖克鲁平斯基一样，都认为自己立宪派。

说斗争是由于宪法而产生的，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马上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宪法？是克鲁平斯基式的宪法？还是罗将柯式的宪法？还是叶弗列莫夫-李沃夫式的宪法？还是

^① 除“言论报”当时的文章外，还可以参看米留可夫先生1912年12月13日在杜马中的声明：“主席（罗将柯）发表了演说……他发表了他的宣言，我们承认这个宣言是我们的”（“言论报”12月14日第343号）！！请看立宪民主党人有怎样的立宪（别开玩笑！）宣言！

馬克拉柯夫-米留可夫式的宪法？接着还会提出更重要的問題，不是关于願望、声明、綱領等等的問題（这些都是紙上的东西），而是关于达到願望的实际手段的問題。

在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严肃的）一点上，格烈迭斯庫尔先生的轉載在1912年“言論报”第117号上的声明是駁不倒的，也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声明談到不需要新的革命，需要的“只是立宪活动”。这个声明从思想政治上使立宪民主党人更紧密地和更深刻地同十月党人团结在一起，任何忠于宪法甚至……忠于民主的保証也不能把他們分开。

在俄国讀到的报纸大概有近90%是十月党人和自由派出版的。所有这些报纸都在向讀者灌輸两个陣营的思想，說其中有一个是贊成宪法的，这样一来也就使群众的政治意識受到了极坏的影响。不妨想一想：整个这一运动是以米留可夫接受罗将柯的“立宪”宣言結束的！

由于这种情况，无论怎样重复政治科学的旧的、許多人已經忘記了的真理，都不为过分。什么是宪法？这才是俄国的迫切問題。

宪法就是旧社会（貴族的、农奴制的、封建的、专制的社会）的历史势力和自由资产階級締結的协定。这一协定的实际条件，旧势力讓步或自由资产階級胜利的程度，都取决于民主派，即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对旧势力取得的胜利。

我国的选举运动能够以米留可夫接受罗将柯的“宣言”而結束，只是因为实际上自由派爭取的并不是取消旧势力的种种特权（經濟的、政治的等等），而是（简单地說）由地主和资产階級瓜分这些特权。自由派害怕民主派的人民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这就是从資本的經濟力量的角度来看自由派在政治

上非常軟弱的原因。

在六三政制中，自由派独占可以容忍的、半合法的反对派的立場，新的政治活跃（用过于温和的和不明确的話來說）的开始使得新的、正在成长的民主派的广大阶层受到这些独占者的影响。因此，現在俄国政治自由問題的 实質 就在于認清互相斗争的不是两个陣营，而是三个陣营，因为只有这后一个被自由派抹杀的陣营才真正具有实现政治自由的力量。

1912年选举时所进行的斗争决不是“由于宪法”而产生的，因为主要的自由派政党、打击并击败十月党人的主要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是同意罗将柯的宣言的。受六三政制的警察压制的这个斗争，是由于独立的、不受自由派的动摇和“十月党人式的同情”的影响的民主派的觉醒、加强和团结而产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說从純“議會”的角度来看选举运动的真正思想政治內容是根本錯誤的。各个党派怎样对待作为1912年的标志的政治罢工运动的問題，要比一切“立宪”綱領和政綱更实际百倍。

要把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有一个最好的檢驗方法，就是看看它們对經濟罢工的态度。一个政党如果在自己的报刊上，在自己的組織內，在自己的議會活动中不是同举行經濟罢工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就是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怎样拿“人民性”、“激进社会主义”等等来賭咒发誓。在俄国，同样应该对那些想叫人家称它是民主主义政党的政党 *mutatis mutandis*（作相应的改变地）說：不要拿你們在紙上写的宪法、普选权、結社自由、各民族平等之类的东西来賭咒发誓，这些話一文不值，讓我們看看你們对1912年的政治罢工运动所采取的行动吧！这个标准虽然还不完全，但它毕竟是实在的标准，而不

是空洞的諾言。

五、现实生活对选举口号的检验

选举运动使一切自觉的政治活动家非常感兴趣，是因为这一运动提供了说明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观点、情绪以及利益的客观材料。在这一方面，代议机关的选举可以比作人口调查；选举提供的是政治统计。当然，这种统计有好的（如果实行普遍等等的选举制），但也有坏的（我国的一——请原谅我用这个说法——议会选举）；当然，这种统计也同其他一切统计一样，应该学会批评它并批判地加以利用。最后，当然，必须把这种统计同一般社会统计联系起来看。例如，在那些没有得议会白痴病的人看来，罢工统计往往要比选举统计严肃和深刻百倍。

尽管作了这些预先说明，但是选举提供的材料是客观的这一点仍旧是无疑的。用计算各个不同阶级居民群众的投票来检验主观愿望、情绪和观点的方法，对一个多少有些象样的政治家说来，始终应该是很宝贵的。各个政党在选民面前展开的实际斗争和选举结果，总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来检验我们对国内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和这些或那些“口号”的意义了解得是不是正确。

我们试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选举的总结。

关于政治统计问题，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主要的一点是：由于极卑鄙地采取了“解释”、镇压、逮捕、流放等等无穷无尽的行政“手段”，这种统计有一大部分显然是无用的。例如，切列万宁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上总结各选民团的数百名复选人的材料时就不得不承认，把第二城市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反对派

复选人百分比的下降(同第三届杜馬选举相比)当作向右轉的証据“是很可笑的”。梅姆列措夫、赫沃斯托夫、托尔馬切夫、穆拉托夫之流不能进行伪造的唯一的选民团,就是第一城市选民团。这个选民团表明“反对派的”复选人人数从56%增加到67%,而十月党人却从20%降到12%,右派从24%降到21%。

即使“解释”使得关于复选人的选举統計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完全被排斥于有特权的六三分子之外的各民主阶级尝到了这些解释的种种好处,自由派对民主派的态度仍然要在选举中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仍然可以得到客观材料,使我們可以根据实际經驗来檢驗各个不同的“流派”在选举前的思想和言論。

自由派对民主派的态度問題决不“仅仅是党的”問題,也就是說,这个問題的重要性决不能只从严格的党的路綫的角度来看。不是的。这个問題对于任何一个追求俄国的政治自由的人說来,都是最重要的問題。这个問題也就是怎样才能达到俄国一切正直誠实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的問題。

1912年的选举运动一开始,馬克思主义者为了与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对立,正是把彻底民主主义口号放在首要地位的。这些口号可以受两方面的檢驗:第一,别的国家的議論和經驗;第二,1912年运动的經驗。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对与不对,現在一定可以从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实际形成的关系看出来。这种檢驗的客观性就在于,檢驗这些口号的不是我們自己,而是群众,而且不仅仅是一般群众,其中也有我們的反对者。

由于选举和选举結果而形成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关系,是象馬克思主义者所預料的那样呢,还是象自由派所預料的那样呢,还是象取消派所預料的那样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忆一下这些“预料”。1912年初，选举问题刚刚提出来，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代表会议上）已经打起统一的反对派（即两个阵营）和允许同左派十月党人联盟的旗帜，这时工人报刊就已经通过马尔托夫和唐恩发表在“活的事业报”（第2、3和8号）上的文章，以及弗·尔—科¹²⁶等人发表在“明星报”（第11号〔总47号〕和24号〔总60号〕）上的文章提出口号问题。

马尔托夫提出的口号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障地中赶出去”；唐恩提出的口号是：“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马尔托夫和唐恩责备“明星报”不该威胁自由派，不该企图向自由派勒索杜马中的席位。

三个立场表露得很明显：

（1）立宪民主党人赞成统一的反对派（即赞成2个阵营）和允许同左派十月党人联盟。

（2）取消派赞成“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的口号，即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取得政权”（“活的事业报”第2号上马尔托夫的话）。不要替民主派向自由派勒索席位。

（3）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的口号，因为这意味着把地主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我们在选举中的实际任务决不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障地中赶出去’，而是加强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明星报”第11号〔总47号〕上弗·尔—科的话）^①。必须威胁自由派，向他们勒索席位，同他们进行战斗，不要怕关于什么黑帮危险的叫嚣的恫吓（同一作

^①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39页。——编者注

者在第 24 号〔总 60 号〕上的話^①。自由派只有当民主派不管自由派的动摇而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

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之間的分歧是极其深刻而且不可調和的，不管那些好心腸的人怎样輕率地認為口头上可以調和不可調和的东西。“把杜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这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一套完整的政策，客观上意味着把領導权交給自由派。“把民主派从自由派手中夺取过来”，这是相反的一套政策，它是以这一論点作基础的；只有摆脱对自由派的依賴性，民主派才能真正打垮反动派。

人們在战斗开始以前就大談特談这次战斗，現在我們来看看这次战斗的实际結果。

我們就把在“我們的曙光”杂志(第 9—10 期)上确定战斗結果的弗·列維茨基先生作为証人，大概任何人也不会怀疑这个証人偏袒“明星报”和“真理报”的路綫吧。

大家知道，第二城市选民团是唯一一个多少有点象“欧洲式的”选举和多少有些可能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遭遇战”进行总结的选民团。現在就讓我們看一看这位証人是怎样确定第二城市选民团的战斗結果的。

据証人統計，社会民主党人共进行了 63 次活动，其中有 5 次不得不放弃候选資格，5 次同其他政党妥协，53 次是独立活动的。这 53 次中，有 4 次是在 4 个大城市里进行的，49 次是在选举复选人时进行的。

在这 49 次中，有 9 次不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同誰斗争；有 3

①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17 卷第 503 頁。——編者注

次是同右派斗争（3次都是社会民主党人胜利）；有1次是同劳动派斗争（社会民主党人胜利）；其余36次是同自由派斗争（社会民主党人胜21次，败15次）。

把俄国的自由派分出来，就会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进行的21次斗争结果如下：

	社会民主党人胜利	社会民主党人的敌人胜利	总次数
社会民主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	7	8	15
社会民主党人对其他自由派①……	4	2	6
总 计	11	10	21

可见，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敌人是自由派（36比3）；使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主要失败的是立宪民主党人。

其次，在妥协的5次中，有2次是反对派一致取得协议来反对右派的，有3次“可以说是反立宪民主党人的左派联盟”（着重号是我加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第98页）。可见，妥协的次数还不及活动总数的 $\frac{1}{10}$ 。60%的妥协是反立宪民主党人的。

最后，4个大城市的投票结果如下：

	投票数(最大数字)			
	圣彼得堡	莫斯科	第一次选举	重新选举
立宪民主党人得票……	19 376	20 310	3 754	5 517
社会民主党人得票……	7 686	9 035	4 583	4 570
十月党人得票……	4 547	2 030	3 674	—
右派得票……	1 990	1 073	272	—
劳动派得票……	1 075	—	—	—

可见，在所有这4个大城市里社会民主党人都同立宪民主党

① 即进步党和同进步党人或劳动派在一起的立宪民主党人。

人进行了斗争，而且立宪民主党人在重新选举中的一次胜利还是在十月党人（“波罗的海沿岸立宪党”的候选人也是十月党人）帮助下获得的。

这个证人的结论是：

“立宪民主党人对城市民主派代表权的独占快要结束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的最近任务就是从自由派那里夺取所有5个有独立代表权的城市的代表权。做到这一点的心理的”（??）“和历史的”（经济的呢？）“前提是民主派选民‘向左转’，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破产和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性再度复活，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了。”（“我们的曙光”杂志同期第97页）

六、对立宪民主党的幻想的“结束”

1. 事实证明，立宪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反对派”或者“两个阵营”的口号的实际意义，在于欺骗民主派，在于自由派用欺骗的手段攫取民主派觉醒的果实，在于自由派使这个唯一能够推动俄国前进的力量的觉醒变得不彻底、钝化、没有力量。

2. 事实证明，唯一一次多少有点象“公开的”、象“欧洲式的”选举斗争，正在于从自由派手中夺取民主派。这个口号是生气勃勃的，它表现了新的民主派走向新的运动的实际觉醒。而取消派的口号“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是自由知识分子集团的腐朽的臆想。

3. 事实证明，只有对立宪民主党人进行“狂暴”斗争，只有“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的下贱的奴仆取消派曾以此责难我们），才表现出真正群众运动的真正要求，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比我们所描绘的还要坏。立宪民主党人是黑帮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普列德卡林和波克罗夫斯基的直接同盟者¹²⁷！

这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黑帮是盲目地仇恨立宪民主党人的，是把立宪民主党人当作主要的敌人的，可是事变的进程终于使他们引导立宪民主党人去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这个似乎是很小的事实，反映了巨大的党的变动，表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互相攻击实际上是表面现象，普利什凯维奇和米留可夫实际上很容易互相谅解，联合一致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

现实生活表明，我们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轻视可能的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在第二阶段等等），而是对这种联盟过于重视了，因为实际上有过很多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很多场合，例如在省的选举会上拒绝（象昨天的某些狂热的召回派及其同伙所要求的那样）利用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的联盟来反对右派。而是说，实际生活证实了，更加巩固了我们的总方针（三个阵营：民主派反对立宪民主党人）。

顺便说一說。列维茨基先生、切列万宁先生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其他撰稿人为我们的选举统计收集了宝贵的材料，他们搞得那么热心，那么努力，是值得大大称赞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和右派结成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盟次数的材料拿出来，他们显然是有这种材料的。

普列德卡林和波克罗夫斯基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省的选举会上有过很多类似的情况。这些情况不应该忘记。对它们应该更加注意。

其次，我们的“证人”是被迫作出上面引证的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结论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结论证实了对立宪民主党的哪一种评价是正确的。是谁把立宪民主党称为城市民主派的政党

的？又是誰從1906年3月或者更早些就証明了這個自由派政黨是靠欺騙民主派選民來維持的？

現在取消派象健忘的伊萬一樣，開始唱道：“立憲民主黨人的獨占快要結束了……”可見，“獨占”是有過的？這意味着什麼？獨占就是排斥競爭。社會民主黨人同立憲民主黨人之間的競爭，是不是在1906—1907年比在1912年被排斥得更厲害呢？

弗·列維茨基先生重復着庸俗的空話，他沒有考慮他所說的話的意思。他“單純地”從這個意義來理解獨占：立憲民主黨人過去占優勢，現在這種情況結束了。但是先生們，既然你們自認為懂得馬克思主義，那就應該思索一下政黨的階級性問題，哪怕稍微思索一下也好，不要這樣漫不經心地對待你們昨天發表的聲明。

如果說立憲民主黨是城市民主派的政黨，那末他們的優勢就不是“獨占”，而是城市民主派的階級利益的結果！如果過兩三年，他們的優勢變成了“獨占”，即出現了從資本主義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規律和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關係的角度來看都是一種偶然的和不正常的現象，那末可見，那些把立憲民主黨看作城市民主派的政黨的人是機會主義者，向暫時的勝利讓步，拜倒在立憲主義顯赫一時的聲勢面前，拋棄了對立憲民主黨人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轉而向立憲民主黨人作自由主義的諂媚逢迎。

弗·列維茨基先生的結論完全地、確實地証實了布爾什維克說明立憲民主黨階級本性的、遭到孟什維克瘋狂反對的1907年倫敦決議。如果說城市民主派跟着立憲民主黨人走，如決議所說，是“由於傳統和直接受到自由派的欺騙”，那末很明顯，1908—1911年的沉痛教訓消除了“立憲幻想”，破壞了“傳統”，揭穿了“欺騙”，從而結束了“獨占”。

现在，有意无意地忘掉过去的东西，极度轻率地对待对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正确的、率直的、明确的答案，对待1905—1907年和1908—1912年的丰富经验检验这些答案的情形，——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对于正在觉醒的民主派说来，没有什么能比这样健忘和这种态度更有害的了。

七、关于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险”

切列万宁先生在总结选举斗争时统计：反对派“纯粹人为地、完全用非常手段取得了49个席位”。在他看来，把这些席位同实际获得的加在一起，就是207个席位，即只比绝对多数少15个。作者得出结论说：“在六三政制的基础上，不必采取太过分的人为手段，也能使贵族农奴主的反动势力在选举中遭到完全的和决定性的(??!)失败。”

作者继续说：“在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这个大危险面前”……僧侣和地主的冲突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同期第85页)。

这就是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这个口号的后果！切列万宁把马尔托夫的口号弄到荒谬不堪的地步，可以说不但肯定了“选举斗争的结果”，而且肯定了取消主义幻想的结果，这样狠狠地惩罚了马尔托夫。

第四届杜马中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是“对贵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险”！真是妙论。

但这并不是说错了，而是自由派和取消派竭力想使选举运动具有的整个思想内容的必然结果。

进步党人的作用比立宪民主党人的作用大大提高，这些进步党人在政策中体现了立宪民主党人所有的变节行为（路标主义），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实际上偷偷地转到进步党人的立场上去，这一切取消派都不愿意看到，因而使他們作出“切列万宁的”妙論。“不要过多地談論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劳动团分子（民粹主义取消派分子）沃多沃佐夫先生曾經这样或大致这样写过。我們的取消派也正是这样看的。

他們甚至忘記了第三屆杜馬的教訓：立宪民主党人別列佐夫斯基在第三屆杜馬中发表正式言論來“解釋”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綱領，并証明这个綱領有利于貴族地主。而現在，在1912年，竟期望“反对派的”地主杜馬、进步党人——这些稍微改装了一下的十月党人会成为“对貴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險”……

切列万宁先生，請听着……你尽可以空想，但要知道分寸！

針對着切列万宁对取消派的策略所作的总结，我們有一个說明选举結果的很好的例証。第四屆杜馬以132票对78票通过了进步党人提出的轉入下項議程的議案。

正式声明这个最庸俗的、最无聊的、好象是十月党人提出的議案完全令人滿意的不是別人，正是十月党人安东諾夫！安东諾夫先生当然是对的。进步党人提出純十月党人的議案。进步党人充当了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間的調停者。

十月党被打垮了，十月党万岁！古契柯夫的十月党“被打垮了”，叶弗列莫夫和李沃夫的十月党万岁^①。

^① 12月16日的“言論报”断言，社会民主党人也投票贊成进步党人提出的卑鄙的議案。这是难以置信的，“真理报”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可能是把那些坐道的（或站起来要退席的？）社会民主党人“算作”投贊成票的了。

八、掩盖失败

我們还要看一看工人选民团这个最重要的选民团的选举结果。

这个选民团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对于这一点任何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怀疑。在这里已经不是同民粹派作斗争；在民粹派中间，已经不再反击民粹派的取消主义（巴黎的“创举”¹²⁸和彼得堡的人民社会党人）和民粹派的召回主义，而没有反击这些没落的思潮，就使得左派民粹派等于零了。

工人选民团中的斗争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人政客即取消派之间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912年1月曾坦率和明确地、公开和毫不隐讳地宣布在工人选民团中（仅仅在工人选民团中）不容许同工人政党的破坏者妥协^①。

这个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也知道，就连调和派分子普列汉诺夫也把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称作“可鄙的”、取消派的会议（不管“我们的曙光”杂志怎样赌咒发誓地否认），把这次会议的决议称作“外交手腕”，更直率地说，就是称作欺骗。

选举的结果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选举的结果是不是提供了说明一月声明和八月声明同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客观材料？工人阶级选出的代表是跟着谁走的？

关于这一点是有最确切的统计材料的，而取消派却竭力（徒劳无益地！）用叫嚷和谩骂来掩盖、抹杀和消灭这种材料。

^①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20页。——编者注

从第二届杜馬开始（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是抵制第一届杜馬的），就有了說明工人选民团的杜馬代表在社会民主党各“派別”之間分配情形的确切統計数字。这些数字如下：

工人选民团选出的国家杜馬代表：

	孟什維克	布尔什維克	后者所占的百分比
第二届杜馬……………(1907年)	12	11	47
第三届杜馬…(1908—1912年)	4	4	50
第四届杜馬……………(1912年)	3	6	67

这些数字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根据正式統計，1907年在党内占多数的是布尔什維克（105名布尔什維克代表，97名孟什維克代表）。也就是說，在工人选民团中占47%（整个党团中有18个布尔什維克+36个孟什維克=54个），相当于在工人政党内占52%。

在1912年，破天荒第一次，选民团所有6个代表都是布尔什維克。大家知道，这6个省份是主要的工业省份。大家知道，这些省份集中了大部分无产者，这是别的省份所不能相比的。由此可见，——而且同1907年相比也完全証明，在工人选民团中占67%也就相当于在工人政党中占70%以上。

在第三届杜馬时期，在知識分子从工人政党中逃跑而取消派为此辯护的时候，工人从取消派那里逃了出来。取消派分子别洛烏索夫从第三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逃走，整个这个党团（有 $\frac{3}{4}$ 是孟什維克）从孟什維主义轉向反取消主义^①，这也是一种征兆

① 取消派分子奧斯卡罗夫令人可笑地承認了这个不容爭辯的事实：布尔什維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最紧要的关头：实际上至少是形式上使党团分裂了”（“我們的曙光”杂志，同期第3頁），就是使第三届杜馬党团分裂了。这里所謂

和可靠的标志，它們說明在工人中进行着同样的过程。而且第四届杜馬的选举也証明了这一点。

因此，奥斯卡罗夫、馬尔托夫、切列万宁、列維茨基等人在“我們的曙光”杂志上大发雷霆，他們对似乎是宗派主义的、似乎是列宁的集团說了許多极象普利什凱維奇說的“恭維話”。

好一个集团和宗派主义！在1908—1912年工人选民团中站在这方面的代表不断地增加，一直增加到在第四届杜馬中占这个选民团的67%！取消派是笨拙的論战家。他們把我們罵得非常厉害^②，結果却成了对我們最大的恭維。

用吶喊、謾罵和毫无根据的断言来解决爭論的問題，正是知識分子集团的一貫手法。工人喜欢用另一种办法，即根据客觀材料。在俄国，在俄国現在的政治形势下，除了工人报刊和杜馬的工人选民团以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衡量这个或那个派別在工人群众中的力量和影响的客觀尺度。

因此，取消派先生們，你們在“我們的曙光”杂志和“光綫报”上吵罵得越厉害，我們就越能放心地向工人提出問題：請你們指出来，除了工人报刊和杜馬中的工人选民团以外，还有什么表明同群众的联系的客觀标志。

的“分裂”，或是指取消派分子別洛烏索夫的逃跑，或是指党团中有2名参加了取消派的报纸，8名参加了反取消派的报纸，其余的中立这一事实。

- ② 取消派对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結果避而不談，却喜欢鬧吵吵地談論彼得堡的选举：他們說，这很可耻！先生們，这当然很可耻！預先发表的、即經組織通过的委托书所要反对的人是可耻的。叫人反对委托书是可耻的。当出現了3对3的情况，反对抽签就更加可耻了。在彼得堡很有名声的“真理派分子”波·曾直接向取消派分子馬·建議抽签，但遭到了他的拒絕！彼得堡选举时的取消派是可耻的！

那些受取消派关于“列宁的”“宗派主义的”“集团”等等的叫嚣所蒙蔽的读者，可以好好地想一想这些关于工人报刊和杜馬的工人选民团的客观材料。这些客观材料表明，取消派吵鬧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完全失敗。

但是，把由于个人的倡議而在选举那天出版的“光綫报”的創刊同“真理报”的創刊比較一下是特別有教益的。四月工人运动浪潮，是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中有历史意义的最大的浪潮之一。甚至据厂主的統計，也有几十万工人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本身产生了“真理报”，作为自己的副产品；起初是加强“明星报”，把它从周刊改为双日刊，后来是提高了工人为“真理报”捐款的次数，从3月的76次提高到4月的227次（仅工人集体捐款）。

这是一次根本沒有改良主义性質的运动的典范，它的副产品是改革，是讓步，是活动范围的扩大等等。

改良主义者背叛工人运动，因为他们针对规模壯闊的工人运动提出改良主义的口号（正象我国取消派所作的那样）。改良主义的反对者不仅忠实于无产阶级的不折不扣的口号，而且他們还是最好的“实践家”；因为正是广大的規模，正是不折不扣的口号保証了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作为副产品提供了讓步、改革、活动范围的扩大、使上层至少必須暂时忍耐令人不愉快的下层的活跃。

取消派在1908—1912年辱罵“地下組織”，替从地下組織“逃跑”的行为辯护，喋喋不休地談論“公开政党”，这时整个工人选民团都离开了他們，可見他們不会利用四五月浪潮的第一次巨大的高涨！

馬尔托夫先生在“我們的曙光”杂志上承認了这种对他說来是可悲的情况，但是他承認的时候采取了特別有趣的形式。他痛罵

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前进派分子的集团，认为这些集团是个零，而取消派自己过去曾不顾我们提出的只重视俄国国内组织的要求，把这些集团说成是“中心”，是派别。马尔托夫痛苦地、怨恨地、以大量恶毒的（布勒宁式恶毒的）字眼承认道，“列宁的”“宗派主义集团”“在完全不同于地下组织的舞台上巩固起来了”，“坚守住了”，“甚至转入了进攻”（“我们的曙光”杂志同期第74页）。

但是马尔托夫承认的时候说的一切话引起了人们的微笑。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当敌人做错了，我们会幸灾乐祸，但敌人做对了，我们有时会孩子般地发怒。

自由主义取消派，感谢你们不得已而对你们说的恭维话！从1908年年底起，我们就坚决主张利用公开的运动形式，到1909年春天，由于这一点我们同许多朋友决裂了¹²⁹。如果说我们在这种“舞台”上已成为一种力量，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了形式而牺牲实质。为了适时地利用形式，为了抓住四月高潮的时机，为了得到马克思主义者所珍视的工人选民团的同情，就必须不抛弃旧的，不背叛旧的，而是要坚定地捍卫原来的思想、原来的传统、原来的物质实体。浸润了四月高潮的正是这些思想，1912年在工人选民团中占主要地位的也正是这些思想，只有那些在各种舞台上和各种形式中都忠实于这些思想的人，才能够同这种高潮和这个选民团处于同等水平。

写于1913年1月

载于1913年1月

“启蒙”杂志第1期

署名：弗·伊林

按杂志原文刊印

生活在教导人們

誰真心誠意地关心我国解放运动的命运，誰就不能不首先关心我国的工人运动。革命高潮时期以及反革命时期，都十分清楚地証明了工人阶级在领导所有的解放力量，因此工人运动的命运是同俄国整个社会运动的命运十分紧密地交織在一起的。

請看一看表明最近八年来工人罢工运动升降情形的曲綫罢！試再划上一条表明这几年俄国整个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低落情形的曲綫。这两条曲綫是完全一致的。整个解放运动同工人运动有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請看一看 1905 年以来的俄国罢工运动的統計材料。

年 代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单位千)
1905	13 995	2 863
1906	6 114	1 108
1907	3 573	740
1908	892	176
1909	340	64
1910	222	47
1911	466	105

1912 年約有 150 万人(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

难道上述統計材料还不能最清楚地說明，俄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是俄国整个全民解放斗争的最好的气压表嗎？

在最大的高涨时期（1905年），罢工人數將近300万人。在1906和1907两年，运动逐渐低落，但是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罢工人數平均有100万人。后来，运动开始急速下降，一落再落，一直到1910年；1911年是转变的一年。曲线开始上升了，虽然还不很显著。1912年是新的大高涨的一年。曲线扶摇直上，达到了1906年的水平，今年还显然保持着上升的情形，可能突破300万人的数字，打破世界纪录。

新的时期开始了。对于这一点现在不应该有任何怀疑。1913年初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工人群众已经从提出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进而提出共同的问题。最广大的群众现在已经不是仅仅集中注意我们俄国生活中的个别的混乱现象了。现在提出的是关于所有这些混乱现象的总和的问题，现在问题不在于许多次零星的改革，而在于一次根本的改革。

生活在教导人們。生气勃勃的斗争能够最完满地解答那些在不久以前还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在1912年之后，我们至少回顾一下我们关于“请愿运动”和“结社自由”的口号的争论吧。实际的经验说明了什么呢？

征集在最温和的请愿书上的工人的签名，就是征集几万人签名都没有办到。可是仅仅政治罢工就有100万人参加，这是事实。有人说，不要越过“结社自由”的口号，不然群众就会不了解我们，就会动员不起来，这些话原来是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人的空洞无味的议论。而朝气蓬勃的、实际存在的数百万群众正是在最普遍的、不折不扣的旧口号下动员起来了。只有这些口号才激起了群众的热情。现在令人十分信服地表明了：究竟谁真正同群众在一起，谁不要群众、反对群众。

群众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强大的运动会象清除毫无用处的腐败东西，把杜撰的、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方案一起清除掉，自己则永远一往直前地前进。

我們亲眼看到的规模壮阔的运动的歷史意义也就在这里。

載于1913年1月19日

“真理报”第15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新民主派

坦先生在“言論報”新年号的“雜談會”中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工人都應當特別注意的問題。這就是新民主派發展的問題。

坦先生寫道：“生活的河床又開始改道和消失，已經有一年或者一年多。河水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天知道是從哪兒地下的或者更遠的水源流出來的。三年來，一切都是寂靜的和空虛的。現在出現了人群，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從各個角落和荒僻的地方鑽出來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從下面來的農民出身的人。他們數不勝數。他們佔據了生活的中間領域，甚至還要霸占上層領域，尤其是在外省。技術人員、統計人員、農藝師、教員以及地方自治機關的各種職員，他們都很相似：面貌粗俗，身體魁梧，貌似笨拙。他們不易於發生反射作用，相反地，他們象貓兒一樣富有生命力……生活顯然又發展了一步，因為我們平民知識分子同他們比起來，就象貴族同我們比起來一樣。”

說得恰如其分，很正確，不過不應當忘記，不論舊平民知識分子或“農民出身的”新平民知識分子即民主派的知識分子和半知識分子，他們和貴族農奴主不同，都是資產階級。

但是資產階級有各種不同的階層，各有自己特有的不同的歷史條件。上層資產階級和富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律師、教授、記者和代表等等，幾乎總是本能地傾向於同普利什凱維奇分子聯盟。這個資產階級同他們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

相反地，農民資產階級和“農民出身的”新知識分子却同無權

的、被踐踏的、愚昧的、挨餓的農民群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由於自己的一切生活條件，對任何普利什凱維奇主義以及同它締結的任何聯盟都是敵視的。

這個人數更多、更接近千百萬人的生活的新民主派正在迅速地學習着、鞏固着、發展着。新民主派中的大部分人都具有模糊的反政府的情緒，他們是把自由派的垃圾當作精神食糧的。覺悟的工人現在肩負的偉大的重要任務，就是幫助這個民主派克服自由派的偏見。只有克服這種偏見，拋棄自由派的貧乏幻想，同自由派決裂，同工人攜起手來，俄國的新民主派才能為自由事業作出某種重大的貢獻。

載於1913年1月19日

“真理報”第15號

署名：特·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論民粹主义

阿·瓦·彼·¹³⁰先生在“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上写了一篇談論“当前”問題的“指导性的”文章，題目是“人民社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本身是极不严肃和毫无內容的。我們在自命为重要的民粹主义杂志的所謂“指导性的”文章中，已經很久沒有看到象这样无聊的文字堆砌，这样肆无忌惮的模稜两可的空話，这样調和混杂的观点(折衷主义的)了。

但是这篇文章的特点是，它接触到一個目前人人都注意的十分重要的問題，也就是关于民粹主义的分化的問題。民粹主义是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一套观念)。因此，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应当密切注意这一思想体系的演变。

—

民粹主义由来已久。人們公認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創始人。19世紀70年代的革命者“到民間去”(到农民中去)的时候，曾經是真正的民粹主义的繁荣时期。在19世紀80年代，瓦·沃·(沃龙佐夫)和尼古拉一逊¹³¹最严整地制訂了民粹派的經濟理論。在20世紀初，最完整地反映左派民粹派观点的是社会革命党人。

1905年的革命使人们看到了参加公开的群众性活动的俄国各种社会力量，也对民粹主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审查，确定了它的地位。农民民主派——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唯一的实际内容和社会意义。

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追求的不是消灭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权，而是由农奴主和资本家瓜分这些特权。反之，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农民不得不追求的，是消灭所有这些特权。

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土地社会化”、关于平均使用制等等的词句，都不过是说明农民追求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以及彻底消灭农奴主土地占有制的事实口头语。

1905年的革命彻底揭露了民粹主义的这种社会实质和它的阶级本质。群众运动，不论是以1905年的农民协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论是以1905年和1906年各个地方的农民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是通过头两届杜马的选举（成立“劳动”团）表现出来的，都是伟大的社会事实。这些事实向我们表明，千百万的农民行动起来，他们象打扫尘土似地扫掉了民粹派的似乎是社会主义的词句，并且揭示出一支核心力量，即拥有巨大的还没有消耗干净的后备力量的农民（资产阶级的）民主派。

谁要是没有从新的现代俄国的伟大时代的经验学会辨别民粹主义的实际内容和它的辞藻的外壳，谁就是毫无希望的人，不能被人重视的人，这个人只能当玩弄字眼的作家（象“俄国财富”杂志的阿·瓦·彼·那样），而不能当政治家。

我们在下一节里要仔细研究一下民粹主义的分化和这位作家。

二

1905年的經驗特別重要，正是因为它強迫人們根据群众运动审查了民粹派的理論。这一次审查馬上就引起了民粹主义的瓦解和民粹派理論的破产。

早在1905年12月的社会革命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人民社会党人”就开始脫离民粹派，而到1906年秋天就完全脫离了民粹派。

这些“人民社会党人”比我們的取消派先走了一步。正是他們唱出了“公开党”的歌兒，正是他們取消了彻底民主派的口号和发表了叛徒的言論（例如，彼舍霍諾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財富”杂志第8期上的文章）。这是一些农民立宪民主党人，第二届杜馬（民粹派，甚至社会革命党人都沒有抵制它）証明，大部分农民代表追随“俄国財富”杂志的机会主义者，小部分代表追随社会革命党人。第二届杜馬已經完全証实了早从民粹派的“自由日报”（1905年秋天和1906年春天）可以看出来的事实：社会革命党人不会成为別的，只会成为农民民主派的左翼，离开了这个左翼他們就一文不值。

民粹主义的分化日益明显地証实了这一点。在反革命猖獗的时期，这一分化过程进行得很快，左派民粹派“召回了”自己，离开了杜馬中的劳动团。旧的政党实际上已經取消了，新的政党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左派”民粹派也在大批地叛变（直到罗普申的可耻的著作“一匹瘦弱的馬”和“未曾有过的东西”）。他們中間有一部分（“創举派”）放弃了抵制。一部分傾向于馬克思主义（尼·苏汉諾夫，虽然他还有一大堆糊塗思想）。一部分傾向于无政府主

义。整个地說来，他們的瓦解情形要比社会民主党厉害得多，因为他們虽然有几个正式的中心，但是沒有一条明确的、坚定的、能够同頹废主义斗争的原則路綫。

請看，阿·瓦·彼·先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个这种思想上的頹废主义的范例。从前民粹派有过自己的理論。現在只剩下七拼八湊乱抓来的一些对馬克思主义的“保留意見”了。任何一个大胆的資产階級小报的无原則的小品文作者都会在阿·瓦·彼·先生的維護“人民”社会主义的文章上签名，而不冒任何危險，不受任何約束，不接受任何信仰。因为“人民”社会主义是最空洞的詞句，是用来迴避这个問題的；在世界各地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是哪一个階級或哪一个社会阶层。

只要举出阿·瓦·彼·先生的两个空談的例子就够了。

他写道：“……原来掌握了无产階級社会主义理論的政党，实际上也准备依靠其他的‘半无产階級’阶层，甚至要依靠‘資产階級’阶层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真值得一个中学四年級的学生出来反駁一下！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政党里既有半无产者，也有資产者……这是什么意思呢？阿·瓦·彼·先生得出結論說，就是可以不顧这一事实：全世界只有无产階級（1）进行着反对資本家階級的經常斗争；（2）是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支柱。

第二个例子：

卤莽的阿·瓦·彼·先生写道：“就以大学生为例，要知道他們是最道地的資产階級，可是他們中間的社会主义者，我不知道現在怎样，在不久前几乎占了一大半。”

难道这种說法不是举世无双的嗎？难道不值得一个最天真的

社会革命党人女中学生用来当作理由嗎？在1905--1907年之后，看不到几千万农民和几百万工人在一切政治发动的舞台上怎样彼此划清了界限，反而認為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青年学生都同情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个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当作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由！）！請注意，阿·瓦·彼·先生，要知道分寸……

觉悟工人应当执行对待民粹派的直截了当的、明确的政策。要无情地嘲笑似乎是社会主义的詞句，不許他們把彻底民主主义这个唯一重要的問題隱藏在这些詞句里面。

你說“人民”社会主义、平均使用制、土地社会化、合作制、劳动原則嗎？这些东西簡直不值一駁。实际生活和革命早已把这些东西从一切重大的政治問題的領域中清除出去了。你不过是想用这些空話把关于民主主义的重要問題掩盖起来罢了。你应当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你是不是忠于彻底民主派的口号？你是不是願意、是不是能够在明确規定的社会阶层的群众中进行經常的工作来实现这些口号？如果是，那末在反对民主派的一切敌人时，工人民主派是你的同盟者和朋友。如果不是，那就請你滾开，你不过是个空談家罢了。

載于1913年1月20日和22日

“真理报”第16和17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告社会民主党人¹³²

現在我們把彼得堡“光綫報”最近一號(1913年1月19日,第15號,總第101號)的社論全文轉載出來:

工人群众和地下組織

“五金工人工会的登記又被拒絕了。尽管工人已經准备作各种讓步,当局还是一口咬定全部条款都不能接受。是厂主协会(有一个时期報紙曾經报道,該协会坚决不許冶金工人成立新的工会)在这方面起了作用,还是当局本身决定不許这样的工会存在,这都不能改变問題的实质。彼得堡这一部分最先进的、文化水平最高的工人連根据社团暂行条例應該享有的一点最起碼的权利也被剝夺了!为了爭取現在被当局一揮手取消掉的这一点点权利,曾經花費了多少力量,牺牲了多少生命!

最奇怪的是广大工人群众对于权利被剝夺一事毫无反应。最近在合法組織橫遭迫害的影响下,在一部分工人中間,对‘地下組織’的同情心甚至又复活而且加强了。我們决沒有閉目不視这个我們認為令人痛心的事实。但是我們还没有养成崇拜自发势力的习惯,我們正尽力認清这一事实的意义。

目前关于‘地下組織’的議論,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想起了旧时的、現在看来完全被人忘掉的关于恐怖手段的爭論。当时有許多人为为了掩飾自己的无用,也曾‘崇拜过’恐怖手段。他們說,好在有一些英雄,我們可以随随便便地跟在他們后面慢慢走。現在也是这样。我們懶得考虑,懶得寻找新的办法,我們在等待地下組織給我們决定,那时我們再行动起来,而讓別人替我們負責。成功了固然很好,失敗了我們也可以把过錯推到別人身上。

我們并不否認有这样一种心理，它生根于我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完全是由于公开的运动受到严重的牺牲而产生的。这样一种不負責任的心理，一旦失敗就‘伪称不在場’的这样一种下意识的願望，也助长了又在工人群众某些阶层中复活的崇拜地下組織的心情。我們說崇拜地下組織，而不是說逃往地下組織，因为实际上在地下組織中往往只有少数几个人（群众在地下組織中是无事可做的），就是这几个人在指揮群众性的发动，可是他們并不对任何人負責。

有人說，但是一切‘合法机会’都已用尽，結果我們的合法組織几乎全被消灭了。正是一切机会都已用尽的說法是不正确的。其实，有一个主要机会还利用得很差，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工人階級要想取得任何的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曾經說过，应当有計劃地发动群众捍卫自己的組織。到目前为止，我們在这方面所做的，既缺乏計劃性，发动的群众也不够多。有几千人在結社自由的請願書上签了名，这同几十万工厂工人比起来是太少了。我們的工会、教育团体以及其他各种团体，只有几十个會員，很少有几百个會員的，如果同从事同一行业的、居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等等的大量工人比起来，他們簡直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且实际上真正关心工会并且在其中工作的人还要少些。

如果推举一部分优秀的工人知識分子担任合法組織中最危險的职务，那末，一旦这些先进战士被抓走，群众就很有可能垂头丧气，就会抛弃全部事业。这正是目前工人运动軟弱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懈地进行无穷无尽的工作。”

很难想象，在闡述我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迫切問題的文件中，能够有比这篇文章更全面、更确切、更有說服力的文件。“光綫报”第101号的社論，給整整一百号的“光綫报”以及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費·唐恩、弗·叶若夫、列維茨基、波特列索夫、馬尔托夫、馬尔丁諾夫等这些取消派分子五年来的全部宣传，作了一个十分出色的正确总结。

要想詳細地評論這篇社論，就得写上一本書，把各派馬克思主義者在1909--1912年的報刊上反對取消派的言論重復一遍。

我們現在只談幾點。在工人群眾中間，對地下組織的同情正在復活和加強，崇拜地下組織的心情正在復活。如果認為這件事實是令人痛心的，那他就是自由派，而不是社會民主派，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民主派分子。把地下組織同恐怖手段相提並論，就是駭人聽聞地嘲笑革命的群眾工作。只有地下組織才能提出和解決日益增長的革命中的各種問題，指導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並且正是通過這項工作來吸引群眾。

過去和現在參加地下組織的一向都是最覺悟、最優秀、最受群眾愛戴的先進工人。現在地下組織和群眾的聯繫，可能是而且也確實是比過去更廣泛、更密切了，這主要是由於群眾覺悟的提高，部分地也正是由於有“合法機會”。妄談公開黨是愚蠢的，卑鄙的。對我們社會民主黨支部說來，對它們的群眾工作說來，“合法機會”根本沒有用盡，而且也不可能“用盡”。

難道“光綫報”第101號的社論不會使全體社會民主黨人激動起來嗎？難道在社會民主黨內可以找到哪怕一個能夠容忍這種宣傳的“派別”嗎？

難道這篇總結性的社論還不能促進社會民主黨的統一這個迫切問題的解決嗎？

取消派的外交家被“光綫報”第101號徹底揭穿了。他們的假面具被撕破了。現在，只有偽君子才會談論同“光綫報”和“我們的曙光”雜誌的取消派集團統一的問題。

有些社會民主黨人由於某些原因，一直動搖不定，不肯明確地回答問題，轉彎抹角地容忍同“光綫報”“妥協”，用“統一”的詞句掩

盖联合“光綫报”的行为。現在是他們停止动摇，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同“光綫报”統一是不可能的，反对“光綫报”的統一却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而且也是迫切需要的。因为現在談的是“地下組織”的統一，是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統一，是它的革命群众工作的統一。

写于1913年1月22日(2月4日)

曾印成胶印版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

在阿捷夫之流中間

由于阿廖兴“事件”，民族主义的报刊都大肆叫嚣起来了。我的天呀！奥地利人侮辱了俄国，借口有間諜嫌疑，无辜地逮捕了一个俄国工程师，这真是对被逮捕的人的莫大侮辱！从此反对奥地利的“爱国主义”騒动鬧个沒完。

可是，現在真相已經大白——在这一事件上并没有什么奧妙，还是我們早已見慣的老一套。阿廖兴先生成了奥地利警察局的“工作人員”魏斯曼的牺牲品，魏斯曼的任务是跟踪在奥国的俄国間諜，每月領薪2 000 克朗(800 卢布)。

一个不懂德国話，而且显然不大懂事的俄国工程师，十分天真地上了这个領他去參觀兵工厂的奸細的当。

“新时报”以及我国其他黑帮派和政府派报纸，都在尽力维护俄国的阿捷夫之流。但是一旦知道阿捷夫替奥地利效劳的时候，这些心地善良的俄国人都“义憤”填膺了。

原来还不仅如此而已，魏斯曼以前是俄国的間諜和奸細。这个魏斯曼的謀生之道很值得注意。

他父亲是一个妓院老板。这个兒子經過这样的訓練后，成了俄国在奥地利的維也納的間諜，此外还監視俄国政治流亡者。魏斯曼从1901—1905年給俄国警察局服务，同时既是軍事間諜，又是政治特务。

后来魏斯曼因同俄国警察局吵翻了，就投效奥国警察局了。
事情很简单。

可怜的阿廖兴作了前俄国間諜的牺牲品。奥国采用这种“阴險的手段”，怎么会不使俄国的一切仆从报纸愤怒呢？

載于1913年1月25日

“真理报”第20号

署名：W.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资产階級和改良主义

“言論报”对于当前的罢工問題的議論，很值得工人注意。

自由派报纸引証了关于罢工运动的官方統計材料：

年 份	罢 工	工人(单位千)
1905	13 995	2 863
1906	6 114	1 108
1907	3 573	740
1908	892	176
1909	340	64
1910	222	47
1911	466	105
1912	1 918	683

我們順便指出，1912年的数字是显然縮小了的：政治罢工参加者总共才 511 000 人。实际上他們还要多一倍。我們再提醒一点，最远也不过是在 1912 年 5 月，“言論报”曾經否認我們工人运动的政治性質，并且断言整个运动仅仅具有經濟性質。不过，我們現在想談的是問題的另一方面。

我国的自由资产階級是怎样估計这一現象的呢？

“言論报”写道：“‘俄国公民’政治觉悟的”(为什么仅仅是觉悟的呢??)
“根本要求沒有得到滿足。”

“在任何地方，工人階級都是城市民主派中最活跃、最敏感的阶层……人民中最积极的阶层…… 在立宪条件下……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在由于对外关系复杂化而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那样一个生产部門里，是不会浪費(由于普梯洛夫罢工)几万个工作日的。”(該报第 19 号)

显然是资产階級的观点。“我們”要帝国主义政策，掠夺別国

的領土。罷工妨礙“我們”。由于“浪費了”勞動日，“我們”損失了剩餘價值。“我們”要求象歐洲那樣“正常地”剝削工人。

好極了，自由派先生！你們的願望是合法的，我們準備支持你們的要求……如果……如果它不是過了時的，毫無希望的！

“言論報”接着說：“普魯士的政界人士（應當說是普魯士地主）讓‘社會民主黨合法化’並不是出于同情自由。如果改良得及時，改良就會帶來應有的後果。”

我國資產階級的完備的改良主義就是這樣。它只是哀聲嘆氣，它想說服普利什凱維奇之流而不是得罪他們，同他們講和而不是排斥他們。任何一個能思考的人都一定清楚地知道，“社會民主黨合法化”這個口號，就其客觀意義（即不管個別集團的善良願望如何）來說，是空虛貧乏、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我們只指出一點。俾斯麥能夠實行改良，就是因為他越出了改良主義的範圍，大家都知道，他完成了一系列的“上層革命”，他從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掠奪了50億法郎，他可以給那些被大量黃金和空前未有的軍事勝利弄得如醉如癡的人民以普選權以及真正的法制。

自由派先生們，你們是不是認為，在俄國可以有類似的可能呢?? 為什麼你們甚至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實行地方自治（這就是“改良”!）的問題上，也宣稱俄國的改良是毫無希望的呢??

載于1913年1月29日

“真理報”第23號

署名：特·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論 公 开 党

“光綫报”是善于在知識分子中間“叫囂”的，而且讀它的工人愈少，它叫得愈厉害，現在它正在賣力地，好象在作一件莫大的好事似地繼續进行它的公开工人政党的宣传。

在該报的新年社論里，我們又讀到了那个老謊話，說什么在1912年，“俄国工人提出了爭取結社自由的問題以及爭取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存在的問題作为自己的当前口号和战斗旗帜”。

凡是真正接触过1912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并且仔細考察过这一运动的政治面貌的人都非常清楚，“光綫报”的取消派在这里撒了一个謊。工人作为当前口号和战斗旗帜提出来的另外的东西。这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例如在五月事变时期，当时各个派别的先进工人自己（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参加者中間还有少数民粹派）提出了另外的口号，举起了另外的“战斗旗帜”。

“光綫报”的知識分子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們硬把自己的信心不足，自己的孤陋寡聞，自己的机会主义立場强加在工人头上。这种情形是我們早已見慣了的，一点都不新鮮！在俄国，进行类似的歪曲宣传的人很容易逃脫懲罰，因为这种歪曲宣传享有在一定的場合“公开”出現的专利权。

但是“光綫报”的謊話毕竟是謊話。而且撒謊撒得越来越荒唐，因为“光綫报”接着又說：

“在 1913 年，在政治上發動工人群眾的中心口號，將正是這一口號……”

換句話說，“光綫報”的知識分子將違反已經提出了另外的口號的工人群眾的意志，將削減這個口號，把它弄得殘缺不全！真是各有所好，不過先生們，你們干的根本不是社會民主派的事業，而是自由派的事業。

讓讀者回憶一下前不久“光綫報”同“真理報”進行的關於公開黨的爭論吧。“真理報”問，為什麼連立憲民主黨人也沒有公開黨呢？^①於是費·唐·在“光綫報”上回答道：

“立憲民主黨人承認自己的願望是空想”，因為他們的黨章沒有被批准，而取消派曾經進行了“頑強的有計劃的工作，接連奪取到陣地”（見“光綫報”第 73 號）。

你們看：費·唐·避不回答問題！立憲民主黨人也進行了頑強的工作，也在合法刊物上以及許多合法團體中“奪取到陣地”。但是連立憲民主黨人也沒有公開的黨。

立憲民主黨人為什麼還在幻想和談論公開黨呢？因為他們的黨是反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的黨，這個黨同意在對自由派作某些小小的讓步的條件下，在對“和平的”公開的立憲民主黨作小小的讓步的條件下，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解。

這就是在六三政制時期發表的關於公開黨的言論的客觀意義，也就是不依善良願望和美麗詞句為轉移的意義。這些言論所表明的是：背叛徹底的民主派，鼓吹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解。

取消派鼓吹公開黨，他們所抱的目的 是什麼以及他們的企圖和指望是什麼，這些都不重要。這是主觀上的問題；大家都知道：

^① 見本卷第 427—429 頁。——編者注

地獄是由“善良”願望鋪設成的。重要的是，在六三政制时期，在自由派的政党也不公开等等的情况下鼓吹公开工人政党，具有怎样的客观意义。

取消派的关于公开党的言論的客观意义就是，背弃民主派的全民的、根本的条件和要求。

因此，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对取消派所鼓吹的那一套抱否定态度，因为“公开党”的問題，是一个根本問題，涉及工人阶级政党的存亡的問題。取消派鼓吹的那一套要彻底消灭的，正是真正工人政党的存在。

載于1913年1月30日

“真理报”第24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农民土地的轉移

土地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轉到另一个人手里就叫作土地轉移。直到現在，無論在法律中或者在“輿論”中（甚至在自由派的輿論中，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間），对我国农民还保持着一种农奴主的看法，認為农民土地的轉移是有害的，应当加以禁止或者限制。

在民主派看来，单是容忍这样一种想法，即認為可以禁止或者阻挠农民——一些成年人和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出卖自己的土地，就是极无耻地侮辱农民。只有在俄国这样的国家，才会对土地轉移保持这种态度，因为俄国的所有官吏和大批自由派分子还完全拿农奴主的旧眼光来看受监护的、愚昧的、沒有平等权利的“庄稼汉”。

从經濟的观点来看，对土地轉移的任何禁止和限制都有莫大的害处。在生活条件还勉强过得去的时候，农民决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如果在貧困或者其他情况（迁移、能劳动的人死亡等等）下不得不出卖时，任何法律也制止不住。人們会随时規避法律，禁止只有使出卖土地的条件更加恶化。

有一个符·奥波連斯基公爵，他显然是同意一般黑帮自由派对土地轉移的看法的，連他也不不得不在一月份的“俄国思想”杂志（这是自由派同黑帮的混合体、极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

上列举出种种证明限制土地转移的作法是愚蠢的和有害的 事实。禁止非农民购买份地。购买者就登记为农民！禁止一个人购买六口人以上的份地。购买者就借亲属等等的名义订立假的欺骗性的契约！禁止抵押份地。这种办法正好便利了投机者的勾当，而使中农更难获得土地！

只有农奴主和伪君子才会期望用限制土地转移的办法来“帮助”农民。觉悟的农民决不会从这里寻找出路。

载于1913年2月1日

“真理报”第26号

署名：特·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談 談 罷 工

“光綫報”发表了許多文章来反对群众性的罢工。

当然，我們不能在这里給“光綫報”以它应该得到的那样的駁斥。

我們只想就“光綫報”的宣传的性質，提出几点純理論性的意見。“光綫報”的撰稿人竭力引証西欧各国的例子，千百次地重复“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等字眼，从而暴露出他們完全不了解俄国1912年罢工的历史特点。

20世紀欧洲任何一个地方的罢工，过去和現在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象我們俄国目前这个时期的罢工所具有的那样的意义。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欧洲，深刻的民主改革时期早已完全結束，而在俄国，現在提上日程(从这个字的历史意义來說)的正是这种改革。

因此，俄国的經濟罢工以及更多的非經濟罢工都具有全民性質。而欧洲的罢工已經沒有这种全民性質(就国内民主改革的角度說)，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改革的先声。其次，俄国罢工同小农业生产者(农民)所处的地位的关系，也完全与西欧各国不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光綫報”的宣传正是要抹杀俄国1912年的經濟罢工和非經濟罢工的全民意义和民主意义。无产阶级不顧自由派的反民主情緒，以領導者(領袖)的姿态出現，这是

我国罢工最重要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正是“光綫报”的撰稿人所不了解的，而且从他们取消派的观点出发也不可能了解。

当然，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估计某一次罢工是不是恰当的问题；根本不是必须进行最有计划的准备，或者有时甚至必须用同类的行动来代替罢工的问题。这里谈的是取消派根本不了解整个罢工的意义，也正是由于罢工有这个意义，“结社自由”或“公开党”的口号就成为不适当的、不适于当前的情况的口号了。

取消派不是否定个别罢工，而是否定运动的整个性质，在这方面，凡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觉悟工人肯定的他们都否定。因此，工人过去和现在都对“光綫报”的宣传感到愤慨是合理的。

载于1913年2月2日

“真理报”第27号

署名：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俄罗斯人和黑人

讀者会这样想：这是多么奇怪的比較？怎么能把一个种族和一个民族相提并論呢？

是可以比較的。黑人摆脱奴隶制度最迟，他們身上直到現在还带有奴隶制度留下的极深的痕迹，甚至在先进国家也是如此，因为資本主义除了法律上的解放以外，不可能“容納”其他方面的解放，就是法律上的解放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关于俄罗斯人，历史写道：他們在 1861 年“差不多”算是摆脱了农奴制度。北美的黑人摆脱奴隶制度是在反对美国奴隶主的国内战争以后，大致上也是在这个时候。

比起俄国奴隶的解放来，美国奴隶的解放所走的是一条“改革的成分”比較少的道路。

因此，在过了半世紀以后的現在，在俄罗斯人身上留下的奴隶制度的痕迹比黑人多得多。如果我們不单是談痕迹，而且也談制度的話，那就会更确切些…… 但是我們在这篇短短的文章里，只能举出这方面的一个小小的例証——識字問題。大家知道，不識字是奴隶制度的痕迹之一。在一个受总督、普利什凱維奇这一流人压迫的国家里，大多数人民是不可能識字的。

——在俄国，不算 9 岁以下的兒童，文盲占 73%。

在美国的黑人当中，文盲占 44.5% (1900 年)。

文盲的百分比这样高，对文明的先进的国家美国来说是一种耻辱。并且誰都知道，美国黑人的一般状况是同文明国家不相称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使人们彻底解放，甚至也不可能使人们完全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白人当中文盲只占6%。如果我们把美国划分为从前的奴隶制地区（美国的“俄罗斯”）和非奴隶制地区（美国的非俄罗斯）；那末白人当中的文盲在前一地区占11—12%，在后一地区占4—6%！

在从前的奴隶制地区，白人当中的文盲百分比要高一倍。可见奴隶制不只是在黑人身上留下了痕迹！

黑人的状况对美国是一种耻辱！……

写于1913年1月底

1925年第一次载于

“红色田地”杂志第3期

署名：W.

按手稿刊印

一个发现

资产阶级社会是完全靠千百万人的雇佣劳动生存、维持的。没有雇佣劳动，不论地主的收入，或者资本家的利润以及丰衣足食生活的“派生”财源例如稿费、薪水等等，都是不可能有的。而把千百万人赶到雇佣大军中去的那种力量，就是饥饿。

这是人人皆知的老生常谈的事实。资产阶级公众对于这个事实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了。但是贫困与奢华同时存在的一些不能容忍的情况，——特别是威胁到资产者先生们的健康和安宁的时候！——有时也会迫使人有所“发现”。在每个大城市中，在任何一个偏僻的乡村里，有人会突然“发现”可怕的、令人呕心的、同人极不相称的肮脏、贫穷和生病而不就医的现象。有人“发现”了，“大”报纸向公众报道了，谈上一两天，又被忘掉了。饱汉不知饿汉饥……

不久以前，有一个姓柯兹洛夫斯基的医生，他在视察了罗日杰斯特沃区的 251 个分租的住宅以后，向彼得堡大众介绍了一个“发现”。

“阴暗潮湿的房間，悶人的空气，肮脏，睡在箱子上，地板上，可怕的拥挤（在 251 套住宅里住着 3 578 个人），墙壁上沾满了被打死的臭虫，真是一幅怕人的图画。”（“新时报”第 13236 号）

人民健康协会听了这个报告后，决定研究这个问题……发起

請願……請求調查……也就是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

这里有圣彼得堡市 1911 年的几个統計数字。有 16 960 个乞丐交給“調查和救济乞丐特別局”处理。其中有 1 761 人送交法院——以免打攪整洁的老爷們！——1 371 人遣返原籍（乡村已經“习惯了”同乞丐打交道），1 892 人留下来由特別局各机构救济。9 694 人获得自由。

特別局的人毕竟出了力，进行了“調查”，沒有白給他們薪水。

就在 1911 年，有 48 156 名粗工向市职业介紹所（莫斯科关卡外的）申請工作。有 6 076 人得到了工作。

“获得自由的人”（得不到“救济”的乞丐，找不到工作的粗工）在馬路上过夜，住在小客栈里、住在分租的住宅里……这就是为发现提供的資料。

截于 1913 年 2 月 5 日

“真理报”第 29 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英国工党代表大会

新历1月29—31日在倫敦召开了英国工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00名代表。

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战争的決議，又以相当大的多数通过了建議党的議会代表投票反对不給妇女选举权的一切选举改革草案的決議。

英国“工党”同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英国社会党”同时并存，似乎也是一个广泛的工人政党。它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和非社会主义的工会之間的一个折衷的东西。

这种折衷的东西是由英国历史的特点造成的，是由工人階級的貴族分离出去組成一些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派的工会的情况造成的。这些工会开始轉向社会主义，因此出現了許多模稜两可的糊塗原則。

例如在关于党的紀律問題上，通过了一項決議，违反党和議会党团的决定的要开除党籍。

于是展开了在任何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发生的爭論：這項決議是对付誰的？是对付自由派的，还是对付社会主义者的？

因为在議会的40名工人代表中，有27名非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維尔·梭恩在反对決議时說：13个社会主义者願意服从非社会主义者，受他們的約束。甚至拥护決議的独立工党黨員勃

魯斯·格累西尔也承認，大約有五六个这样的工人代表是保守党黨員。

決議被通过了。

要求各个党的机关不要仅仅張貼机会主义日报“每日公报”的決議，竟以 643 000 票对 398 000 票的多数被否决了。这里的票数是按各代表所代表的人数計算的。

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是非社会主义者和糟糕透頂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会上也听到明确的言論，說工人群众不滿意这样的党，工人群众要求代表們少玩弄立法工作，多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

載于 1913 年 2 月 8 日

“真理报”第 30 号

署名：勃·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立宪幻想的破灭

米留可夫先生在1907年6月3日以后高呼道：“謝天謝地，我們已經有宪法了。”自由资产阶级的首領用这种可笑的說法安慰自己，以掩飾自由资产阶级不相信人民，不願也不敢离开“立宪”道路的事实。

最值得注意的，正是在現在，由于同一个米留可夫先生或者他的循規蹈矩的官方自由派“言論报”承認了“社会运动开始高涨”（第26号），这些立宪幻想的破灭也越来越明显了。企图迴避令人不快的现实（和迴避令人不快的走向“立宪”的道路毫不相同的道路的必然性），企图用“立宪”的字眼安慰自己和別人，这就是这些幻想的基础。

請看自由派对目前形势的評論！

“杜馬的空氣很沉悶，因为沒有斗争。”（第25号）

先生們，誰叫你們說我們已經有宪法了呢！

“話都說尽了。現在需要的是行动，可是对行动沒有信心。因此就产生了冷淡态度。”（同上）

你們用对空話的信心安慰自己，而這些話主要是說給十月党人听的。現在你們承認了，你們是用这些空話掩飾对行动缺乏信心的事实。

自由派先生們，你們自己譴責了自己。

整個民主派，——特別是工人——對空話（立憲的空話）是不相信^①

寫于1913年1月底

第一次發表

按手稿刊印

^① ——本文手稿未全部保存下來。——編者注

感謝坦率

我們感謝黑幫報紙“新時報”發表了國家參議院右派首領科貝林斯基坦率的言論。我們也感謝這個“首領”。

科貝林斯基先生感嘆地說：“國家杜馬的代表往往暴露出對立法工作的無知和無能……只有小鋪老板才這樣制定法律。

……有人因為我們否決了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實行地方自治的法案而攻擊我們……國家杜馬根本沒有想到，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省，由於缺乏有文化的人材和人口稀少，一定會把我們開玩笑時所說的一個庄稼漢、一只鹿和一只熊選進地方自治局。

……成立象第三屆國家杜馬所籌劃的那樣的庄稼漢的地方自治局，這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

請問，國家參議院右派首領，也就是國家參議院首領這麼坦率，怎麼能不感謝一番呢？

我們不講自由派反對國家參議院的毫無內容的陳詞濫調，而是衷心替國家參議院向讀者推薦這種對問題的鮮明而正確的提法。

國家杜馬中的小鋪老板……，地方自治局中的庄稼漢、熊……，我們不能容忍小鋪老板和庄稼漢。這就是地主農奴主的老實話。

請注意：他，這個農奴主說得對，在國家杜馬中沒有“小鋪老板”，用覺悟的工人（而不是野蠻的地主）的話來說，就是沒有資產階級，就不會有多數。他，這個地主說得對，自治實際上就是農

民的自治(觉悟的工人喜欢用农民的一詞，而不喜欢用野蛮的地主用慣的“庄稼汉的”一詞)。农民就是多数。

国家参議院决不是偶然出現的政治机构，而是某个階級的机关，这就是科貝林斯基在他的正确的演說中所說的話。这个階級就是大地主，他們不能容忍“小鋪老板和庄稼汉”。

俄国自由主义的“小鋪老板”先生們，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先生們，还是向科貝林斯基学习学习怎样严肃地提出政治問題罢！

載于1913年2月12日

“真理报”第35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統一問題

科斯特羅馬工人的代表沙果夫給“真理報”的信（第22号，总第226号）非常清楚地指出，工人認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統一。工人选民团的其他許多代表的来信（“真理報”第21—28号）肯定了这种看法。工人自己应当“从下而上地”实现統一。取消派分子不应当反对地下組織，而应当亲自参加地下組織。

令人惊异的是，在这样明确、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問題以后，我們竟在“光綫報”第27号（总113号）上讀到托洛茨基华而不实的陈詞滥調。根本沒有一个字提到問題的实质！根本沒有列举确切的事实并且全面地分析这些事实的打算！根本沒有提到統一的实际条件！空洞的呼号，夸大的詞句，对沒有指出姓名的敌人的人傲慢无礼的攻击，郑重其事的保証，——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全部貨色。

先生們，这是沒有用的。你們象对待小孩子那样在“同工人”說話，你們一会儿用非常可怕的字眼（“小組习气的束縛”，“駭人听聞的論战”，“我党历史的封建农奴制时期”）来吓唬他們，一会儿又象劝导小孩子那样“劝导”他們，既不进行說服，也不講清問題。

工人既不会被你們吓倒，也不会听你們的劝导。他們自己会把“光綫報”拿来和“真理報”加以对比，例如，他們会讀一讀第101号“光綫報”的社論（“工人群众和地下組織”）——并且会断然摺弃托洛茨基的豪言壯語。

托洛茨基用加了着重号的詞句写道，“实际上社会民主党的各个部分解决关于地下組織这个臆想的原則問題的办法是完全一致的……”彼得堡工人根据經驗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俄国任何一个角落的工人，只要讀了“光綫报”的上述社論，馬上就会看出，托洛茨基在迴避事实。

我們可以讀到他这样的話：“硬說‘光綫报’的政治傾向和‘真理报’的政治傾向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是可笑的和荒謬的。”亲爱的作者，請相信我，工人不会被“荒謬的”和“可笑的”这些字眼吓倒，他們会要求你象对待成年人那样同他們談話，实际上就是說：請你說明一下这两种傾向！請你証明一下第101号“光綫报”的社論和社会民主党是“可以調和”的！

算了吧，不要再用“調和的”空話，即使是最甜蜜的空話来哄騙工人了。

托洛茨基写道，“我們有历史的派別，布尔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按成分來說，都是純粹知識分子的組織。”

这是在重复自由派的鬼話。事实上俄国的整个现实向工人提出了对待自由派和农民的态度問題。即使沒有任何知識分子，工人也不能迴避这个問題：跟着自由派走，还是領導农民反对自由派。

說这个分歧的根源是“知識分子”造成的，这是对自由派有利的說法。但是托洛茨基重复自由派的鬼話，只会使自己出丑。

載于1913年2月16日

“真理报”第39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民粹派內部和农村中的 景况如何?

“俄国财富”杂志使我们看到民粹派或劳动派巨流中的，或者俄国生活的巨流中的两个支流，它们也正是可以根据另一个更直接的政治知识的来源加以考察的两个支流。

例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馬中的爭論。可惜現在这两届杜馬的速記記錄已經禁止出售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些記錄中可以用来研究俄国农民和俄国劳动派的观点、意向的丰富政治材料，一部分已經被一切有教养的人掌握了，另一部分将来也会被他們所掌握。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結論是，知識分子劳动派（包括知識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农民劳动派是两个本質上不同的政治派別。

知識分子民粹派爱講調和的或“全人类的”詞句。这些詞句总令人感覺到他們是自由主义者。階級斗爭的观点和他們是根本格格不入的。他們是空談家。他們拖民主主义的农民倒退，使农民脱离反对他們的階級敌人的热烈的直接斗爭，而醉心于含糊不清、牽強附会、軟弱无力的似乎是社会主义的詞句。

在头两届杜馬中，农民民粹派是一团激昂情緒的烈火。他們充滿了采取直接的堅決行动的渴望。他們愚昧、沒有知識、幼稚，但是他們那么直截了当地、毫不調和地、切齒痛恨地反对自己的階

級敵人，使你們感覺到這是一支極嚴重的社會力量。

換句話說：知識分子民粹派是最壞的社會主義者和最不堅定的民主主義者。農民勞動派決不玩弄他們十分陌生的社會主義，但他們是“本能的”，真誠的，熱情有力的民主主義者。誰也不能預言，俄國農民民主派會不會取得勝利，因為這將由非常複雜的客觀條件決定。但是毫無疑問，勞動派農民只有拋棄民粹派知識分子給他們的運動帶來的一切傾向才可能取得勝利。在順利的歷史條件下，生氣勃勃的新生的真誠民主派是可能取得勝利的，而“社會主義的”詞句，民粹主義的空談永遠不可能取得勝利。

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俄國革命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我希望我將來能夠通過對民粹派在前兩屆杜馬的演說的詳盡分析，以及1905—1907年的其他政治材料，來論證這個結論。現在我想指出，民粹派主要的篇幅最多的機關刊物“俄國財富”雜誌的最近一期（1912年第12期）精彩地証實了這個結論。

這一期雜誌上的兩篇文章，顯然會給人一種特殊的印象。阿·瓦·彼·先生的文章（“人民社會主義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是“人民社會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典型的知識分子議論。

如果俄國農民群眾的力量一定要象阿·瓦·彼·之流的先生們的議論所“期望”地那樣行動，那末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事業就輸定了。因為詞句和空談不可能產生歷史性的行動。這種民粹主義是極端軟弱無力的。

在克留柯夫先生的文章“無火”中，引用了一個甜蜜的神甫的話，這個神甫談到了農民、農民生活以及農民心理，正象農民自己過去和現在所表現的那樣描寫了農民。如果這種描述是真實的，那末正是以農民為代表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肯定會有大規模

的历史性的行动，这种行动在随之而来的各种现象的比較有利的条件下，是很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为了說明这一点，我們要简单地介紹一下阿·瓦·彼·先生的“思想”，并且引証几段那个甜蜜的神甫描写俄国农民的談話。

阿·瓦·彼·先生捍卫民粹主义的原則，反对“箴言”杂志的作者苏汉諾夫，因为苏汉諾夫把民粹主义一系列的根性的理論前提交給馬克思主义，同时又鼓吹类似使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的主张。

阿·瓦·彼·先生不反对联合，但是不打算“交出”民粹主义的原則。于是阿·瓦·彼·先生这样一个无疑很有权威、很有名气的民粹主义者站出来捍卫民粹主义原則的純洁性和坚定性了，可是正是他的一番議論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他的立場是完全沒有希望的，这种民粹主义是绝对沒有生命力的。

苏汉諾夫先生曾經說到，只有无产階級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的階級。如果稍微認真地考虑一下，这当然意味着承認馬克思主义，而全盘否定民粹派的社会主义。

阿·瓦·彼·先生反駁苏汉諾夫先生，然而他的論据完全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都是一些保留意見、修正意見、疑問符号，再有就是对修正主义“不适当地宣揚”生活对理論的修正而正統派无故地对这种修正加以反駁这个論点的折衷意見。阿·瓦·彼·先生的这一番糊塗議論，和欧洲各国流行的“人道的”資产者反对階級斗争和階級社会主义的言論一模一样。

阿·瓦·彼·先生不敢否認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基本事实：世界上只有无产階級每日每时地进行反对資本的經常斗争，正是无产階級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支柱。阿·瓦·彼·先生不会不知

道，国家在政治方面愈自由，农民表现出来的尽管微弱的社会主义性就愈少。为了模糊问题，他一味玩弄欧洲资产阶级教授和机会主义者的思想片断，甚至没有打算提出哪怕是类似完整的、直截了当的、明确的社会理论的东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比阿·瓦·彼·先生的文章更枯燥乏味。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能证明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死亡。这种社会主义已经死了。阿·瓦·彼·先生的全部“思想”，你们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改革派的任何刊物中都可以找到。连驳斥这种思想都是没有意义的。

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它已经被1905年革命打死并由阿·瓦·彼·等先生埋葬了，它剩下的只是陈词滥调；可是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俄国农民民主派，也就是同1860年美国的民主派、18世纪末法国的民主派、19世纪前50年德国的民主派等等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还活着。

克留柯夫先生转述的甜蜜的神甫的关于农村的谈话，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顺便指出，克留柯夫的报道，也许比民主派的著名敌人路标派分子布尔加柯夫根据直接观察在“俄国思想”杂志（1912年第11期：“在选举中”）上写出来的还要明显，还要准确。

克留柯夫文章中的那个神甫在谈到俄国的僧侣时说道：“自卑和怯懦，这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但不同的是，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象现在这种非常沉着地、不声不响地脱离教会的现象。仿佛教会的生气消失了。我再说一遍：不单是知识分子离开了，人民也离开了……必须承认这一点。要知道，我已经农村当了两年神甫。”

甜蜜的神甫想起1905年的情形。当时这个神甫曾向农民解释过宣言。

他哭訴說：“我曾經希望人們醒悟、緊密聯合、博愛、戒酒、思想健康、朝氣勃勃、精力充沛……醒悟似乎是醒悟了，然而代替團結和聯合的却是敵對和內哄。农村首先触动的正是我，而且触动得很厉害。我認为，我是一心一意维护农村的……我对这些自由以及其他一切問題都作了說明。人們听得多么入神呵！我曾認为，已經不可能比我說出更多的东西了，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另一种議論流传到农村中来了。另一些解釋者把問題弄得一團糟，他們談到土地、平等、地主老爺。当然，庄稼汉馬上就了解并領会了这些話。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来对我說，他們以后不給我200卢布的薪水，只給100卢布了……

……但是，特別使我伤心的不是100卢布这件事，而是忽然之間构成农村新面貌的一切現象。真可以說人們是从各个方面努力使农村打开眼界，使它排除障碍，使它摆脱这种愚昧状态！說实在的，他們是成功了。失明的人一旦能看見一絲光亮，他就不再是瞎子了……即使他还没有完全复明。但是这种半复明状态只会使他認識到最痛苦的事情，看到最悶人的敵對現象……有时他也許会怀念自己一无所見的情形。这种敵對現象已在农村发展起来，現在整个空气中似乎充滿了这种敵對的气氛……刀槍、棍棒、縱火。明显的軟弱，不会被报复的尖酸刻薄的侮辱，內部的謾罵，毫无区别地仇恨一切，嫉妒一切較优裕安逸的有产者的生活。从前，当然也有嫉妒心存在，也有敵對、不幸、万恶的罪孽，但是人們听天由命，承認世俗的幸福是空虛的，相信死后的善报，并且从这里找到一种忍耐的力量。現在这种信仰已經不存在了。現在那里存在着这么一种信仰：我們是奴役者，他們是被奴役者。一切关于自由的解釋在农村的土壤上长成了各种毒草……現在請看这个新的土地法，——兄弟反对兄弟，兒子反对父亲，邻居反对邻居！敵對和混乱十分严重，农村会被这种气氛悶死，一定会悶死。”

我們給甜言蜜語的神甫（彻头彻尾的民粹派知識分子！）关于农村状况的出色的描写中的某些特別值得注意的字眼加了着重号。

这个神甫是“博愛”的拥护者，是“仇恨”的敌人。在这方面，他完全同意我們的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类似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正在不

断发挥的托尔斯泰的(也可以說基督教的)反动透頂的观点。这个神甫大概不反对幻想什么“土地社会化”，空談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意义、“土地占有标准”，但是一旦仇恨代替了“博爱”，他馬上就放下陣来，軟作一团，啼哭訴苦了。

口头上的、空談的“社会主义”(“人民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不論多少，欧洲每一个有知識的小市民都贊成。但一旦“仇恨”代替了“博爱”，就完結了。人道詞句的社会主义我們贊成；革命民主派我們反对。

实际上，甜蜜的神甫关于农村中“胡鬧行为”的老一套的說法，絲毫沒有什麼新东西。但是从他的話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鬧行为”只不过是农奴主提出的概念。“不会被报复的尖酸刻薄的侮辱”，这才是甜蜜的神甫肯定的事实。然而，这无疑是在离开“胡鬧行为”极远极远的行为。

馬克思主义者向来認为自己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是，摧毁馬尼洛夫精神、甜言蜜語、多情的超階級观点、同法国某一位观点最狹隘、最会投机取巧的“激进社会党人”的身分很相称的庸俗的“人民”社会主义。但是馬克思主义者向来認为取出民粹主义观点的民主主义核心也是自己必須完成的任务。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是腐烂发臭的尸体。如果克留柯夫文章中的甜蜜的神甫对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描写合乎实际情况，那末俄国农民民主派就是一支有生气的力量。而且，在普利什凱維奇之流还橫行霸道的时候，在还有 3 000 万人挨餓的时候，它也不可能不是一支有生气的力量。

有人对我们說什么“毫无区别地仇恨一切”。首先，这不完全

正确。看不见“区别”的是普利什凱維奇之流，是官僚，是好心腸的知識分子。其次，要知道，就是在俄国工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一定的“毫无区别地仇恨一切”的因素，例如19世紀60—80年代罢工时破坏机器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快就消失了。这不是主要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經失去耐心的人“带着白手套行动”是卑鄙的。

最主要的是，彻底同旧的、反动透頂的世界觀决裂，深刻領会关于“被奴役者”的学說，这个学說不是死人般的酣睡而是朝气蓬勃的生活的保証。

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包括它的最左的，都完全腐爛了。在自觉地同“博爱”、“忍耐”等的学說决裂的基础上，純洁、启发、喚醒、团结民主派的任务，是朝气蓬勃、有生命力的任务。甜蜜的神甫将要感到忧伤。我們則有充分理由为有广大的場所进行朝气蓬勃的工作而高兴。

載于1913年2月

“启蒙”杂志第2期

署名：弗·伊·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日益增长的矛盾

政論家的評論

一

不久前，立宪民主党代表召开了有該党地方活动家参加的例会。

果然不出人們所料，会上討論了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以下是自由派对这一形势的估計：

“注意到全国对根本法的需要，而另一方面，現在立法机关的制度以及目前政府当局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态度，使这种需要不能得到滿足，这两者之間日益增长的矛盾。”

这些話說得乱七八糟，正象早就被小猫玩弄过的一团綫。我們的自由派真不幸，他們竟不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但是請看仔細一点：自由派的不幸，与其說是在于无处說話，不如說是在于无話可說。不但全国的需要和“現在的制度”等等不可救葯之間的矛盾日益增长，而且全国的需要和自由主义的軟弱无力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增长。

自由派政治家先生們，全国的需要为什么不能得到滿足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答复是：現在立法机关的制度和目前政府当局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态度从中作梗。

結論就是：必須有另一种制度和政府当局的另一种态度。究

竟必須有什么，在下文分析了立宪民主党會議的“四个論点”之后，我們就可以看到。

但首先我們必須提出一个主要問題：为什么会有“現在的”“制度和态度”？怎样才能出現另一种制度和态度？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連想也沒有想过！他們在这个基本問題上默不作声，不外由于那种守旧的、亚洲式的庸俗观点，什么过去出主意的人不好，以后会有好的出主意的人之类的观点……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們，“現在的”一切和某一个階級的利益，例如和大地主階級的或者最富有的資產者的利益是不是有联系？“現在的”一切和一定的階級的利益是不是完全一致？不估計到各个階級間的相互关系而談論政治形势，就等于說空話，这不是很明显嗎？

真可悲！立宪民主党人除了空話，竟沒有別的东西可以用来掩盖他們的政策和全国的需要之間“日益增长的矛盾”。

二

我們所有的自由派分子，跟在他們后面的还有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都喜欢大談特談“欧化”俄国。这里一句小小的真話，是用来掩盖大大的謊話的。

一般說来，俄国无疑地正在欧化，也就是說正在按欧洲（現在必須撇开地理概念，把日本和中国也算进“欧洲”）的面貌改造自己。但是这种欧化，一般說来，从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高涨时期（1905年）进行，反动时期（1908—1911年）也在进行，警察局进行，馬尔柯夫类型的地主也在进行，他們正在“欧化”自己同民主派斗争的方式。

“欧化”一詞十分籠統，因此可以用来混淆事实，模糊重大的政治問題。

自由派希望俄国欧化。但是貴族联合会也力图用自己1906年11月9日(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使俄国欧化。

自由派希望俄国有欧洲式的宪法。但是欧洲各国已經制訂的宪法，是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資產階級、农民、工人之間长期艰苦的階級斗争的結果。自由派用来“羞辱”我国反动派的各国成文和不成文的宪法，只不过是斗争总结的记录，是新事物經過百般周折对旧事物取得一系列胜利和旧事物給予新事物一系列挫折后的总结的记录。

自由派竟希望我国出現一种总结，可是不要构成总结的正数和負数！自由派的綱領和策略就是：希望我国建立起欧洲式的制度，可是不要經過在欧洲建立了欧洲式制度的那种艰苦斗争！

因此，我們的科貝林斯基之流輕蔑狂妄地攻击了“小鋪老板”和“庄稼汉”，来回答自由派的願望和論据。科貝林斯基之流說，自由派先生們，你們想把你們还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取得的胜利記在紙上。

三

立宪民主党會議在策略問題上通过了四个論点。第一个論点是：

“整个反对派陣綫联合行动的策略，虽然是实现国家杜馬当前实际活动的必要条件，但是既不能保証为反对派的法律草案取得国家杜馬稳定的多数，也不能保証真正实现反对派借杜馬的中派之助而使国家杜馬通过的法律草案。”

把这段暗語譯成俄語，就是說：

自由派只有和十月党人一起才能成为国家杜馬的多数。这个多数是不稳定的，它的決議是无法實現的。

这样說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得出結論，把这些決議称为“必要的”、“当前的”、“实际的”(!??)活动，那就是自欺欺人。

如果立宪民主党人不仅仅在口头上想成为民主主义者，他們就应当对人民这样说：我們和十月党人一起投票否决右派，但是我們不会主张在第四届杜馬中进行立法工作，不会散布立宪幻想。

立宪民主党會議的第一个“論点”惊人地不合邏輯。第四届杜馬不稳定的多数通过实际上无法實現的法律草案，竟被称为“实际的”活动!! 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曾經好几百次地把这称为无聊的瑣事，这是正确的。

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从邏輯的观点来看是极端荒謬的，但是从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不妨回忆一下1907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关于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馬所說的話。他們說：在杜馬中有两个多数，一个是右派和十月党人的多数，一个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两者都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参看1913年“启蒙”杂志第1期第13頁）^①。

1913年2月的立宪民主党人會議確認了1907年以来我們在自己的正式決議中所說的是正确的。

立宪民主党人需要“整个反对派陣綫联合行动的策略……借杜馬的中派之助”，是因为他們也同十月党人一样，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他們有內在的血緣关系，因此他們自然都醉心于共同的

^① 見本卷第491—492頁。——編者注

“实际”活动，尽管这种活动现在毫无希望。

十月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总是抱怨，謾罵革命，謾罵政府、右派、国家参議院，——而在杜馬里他們仅仅有改革的願望，并且跟着政府走。

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抱怨得更厉害，謾罵革命，謾罵政府、右派、国家参議院和十月党人，——而在杜馬里他們仅仅有改革的願望，并且尽力使自己的反对派观点迁就十月党人。

四

立宪民主党會議的第二个論点是：

“只有实现以下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大大加强国家杜馬这一立法因素和政治因素：选举法的民主化（普选制），国家参議院的根本改革以及責任內閣。”

这里叙述的策略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話来表明：改良主义。

历史科学告訴我們，一般說来，某一政治制度的改良主义的变革和非改良主义的变革的差别在于：实行前一种变革，政权仍然留在以前的統治階級手中；实行后一种变革，政权从以前的階級手中轉到新的階級手中。立宪民主党人不了解历史变革的階級基础。从理論的角度来看，立宪民主党人的基本錯誤就在于此。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上述理論上的差别在于：是局部的东西有所改变而总的和基本的东西毫无改变，还是总的和基本的东西也改变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內，有过改良主义的资产階級，但也有过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资产階級。另一方面，工人階級从不認为通过改良就能够实现根本的变革，但是也决不拒絕在一

定条件下提出改良式的当前要求。

这就是說，問題在于立宪民主党人認為維持現在的統治階級即封建类型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統治地位，是无可爭議的。立宪民主党人仍然抱着御用反对派的观点，仍然坚持“謝天謝地，俄国已經有宪法了”的看法。

換句話說，立宪民主党人的“三个基本条件”，就是自由資產階級提出的由封建土地占有和資本 和睦地 瓜分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的条件。

十月党人也抱着这样的观点（“政府当局和全国調和”，这不知是十月党人的說法，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馬克拉柯夫的說法），同时十月党人提出了更“討好”土地占有的瓜分条件。

十月党人的大討好已經遭到破产。有什么根据指望立宪民主党人的小討好会有別的结果呢？从改良主义的觀點来看，十月党人要彻底得多，因为坚持改良主义观点的人必須考虑到改良是不是可行，而十月党人的“改良”是“可行”得多的。

結論只有一个：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和全国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在日益增长。

五

立宪民主党會議的第三个論点是：

“应当把准备这些条件作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基本任务，同时，同其他反对派集团以及中派共同进行的当前的立法活动如果可能实现的話，也应当加以利用，但是这种活动不得妨碍这些基本任务的实现。”（2月4日“言論报”第34号）

上述“論点”是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讓步，或者更确切地說，

是引誘民主派的釣餌；支持我們立憲民主黨人吧，因為我們是“民主派”，我們贊成普選制！

向左點完頭，馬上就急劇地向右轉；把第三個論點從暗語譯成俄語，就是說：我們立憲民主黨人承認同進步黨人以及十月黨人共同進行的當前的立法活動！

但是要知道，在第一個論點中不是已經承認這種“當前的”立法活動只能產生一些無法實現的法律草案嗎？立憲民主黨人有一個保留條件：“如果可能實現的話。”直截了當地說，就是我們要干些瑣事，可是這方面的責任要讓十月黨人來負！我們的立憲民主黨人真是一些愛開玩笑的人……

其次，十月黨人也好，進步黨人也好，都比立憲民主黨人更徹底地堅持改良主義的觀點，都不同意象普選制、國家參議院的根本改革等“過分”自由主義的要求。仍舊以民主派自居的立憲民主黨人怎么能宣布和這些人所共知的民主派的敵人共同進行當前的立法活動呢？

這裡立憲民主黨人也有一個保留條件：我們立憲民主黨人準備實現普選制，通過同十月黨人共同進行的活動來準備，而這種活動“不得妨礙”普選制的“實現”！

出路很簡單：我們宣布羅將柯的演說是“擁護憲制的”演說，我們投票贊成（不是象社會民主黨人那樣由於犯錯誤，而是出於信念）十月黨人的就內閣宣言提出的轉入下項議程的議案，因為這一切並不妨礙實現普選制的“準備”工作！！

這裡已經不能說立憲民主黨人是愛開玩笑的人了。這裡應該用另外的字眼……

歐洲各國背棄了民主派的反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繼續肯定地

說，它是在进行（在普魯士是同民族主义自由派共同进行，在法国是同一切进步派共同进行）实现“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

完全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这样的阶级由于自由主义而软弱无力，要它实行民主变革是毫无希望的，它敌视工人，背弃人民而投奔右派。

六

立宪民主党會議的最后一个即第四个論点是：

“會議認為，除了提出上述三个口号，同时提出采取更积极的議会斗争的策略手段問題，是适时的。”

仅仅是議会斗争嗎？仅仅提出問題嗎？

“更积极的議会斗争的策略手段”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天知道。立宪民主党會議似乎故意用最难理解的話来表达自己的論点。

立宪民主党人說什么更积极的手段，显然是想表現他們正在向左轉。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現罢了，因为从这里看不到任何具体的东西。

一般說来，哪些議会斗争的“手段”可以称为更积极的呢？

不投票贊成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轉入下項議程的議案。

不发表“政府当局和全国調和”的言論。

当右派和十月党人的多数通过反民主的措施时决不沉默。

不同意停止和縮小普遍性的、原則性的爭論。

我們建議每一个接触立宪民主党人的人不要忘记問問他們：他們是不是“提出了”更积极的手段的問題？既然他們打算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是怎样解决這個問題的？实际上他們是怎样采取“更

积极的手段”的？

国家正在向左轉。新的民主派已經出現在实际生活中。立宪民主党人裝飾門面的微乎其微的左傾，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意义，就是欺騙这个新的民主派，使它跟着自己走，冒充它的代表。

民主派的首要任务，就是不讓这种騙局得逞。要知道，即使立宪民主党人局部地領導了民主派分子，也必然会引起动摇、背叛、不战而败的可耻結局。誰不能从过去的沉痛教訓得出这个結論，誰就是什么也沒有学到。必須把这样的人当作民主派的敌人。

七

整个立宪民主党會議的決議是說明我国“中派”政治生活的值得注意的文件。通常，我們的报刊很少注意这样的文件，很少注意有組織的政党的可靠的正式的決議。人們不大喜欢“決議”，而喜欢訪問記和流言蜚語。

但是对待政治的严肃态度要求极仔細地分析各政党的決議，馬克思主义者将尽力之所能来进行这种分析。

我們曾把立宪民主党人称为“中派”。通常是把站在右派和反对派之間的十月党人称为中派的。

但是，不論从各政党的階級基础来看，还是从現代的一般政策的实质来看，在分析各政党的时候，都不能仅仅限制在杜馬范围之內，都不能单单把十月党人称为“中派”。

請看一看我国各政党的階級基础：右派和民族主义党人，总的來說，都是农奴主地主。他們主张保持并“加强”現在的制度。

在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那里，我們看到的是地主，無疑是比較資產階級化的地主，以及許多大資產階級。所有这

些政党都希望实行改良。它們形成了介于地主农奴主和民主派（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之間的現在的“中派”。

資產階級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派；对进步党人可以这么說；对立宪民主党人也可以这么說。当然，在日常政策的实际任务中，必須估計到这两个党的反对派立場，但是我們不应当因此而忽視这两个党和十月党人的階級血緣关系。

农奴主地主既单独地，也同資產階級上层勾結在一起地統治一切。农奴主反对改良。資產階級一般說來是贊成改良的，而且它仅限于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場。对于农民民主派，特别是对于工人民主派，就不能这样說了。

立宪民主党會議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是他們唯一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弄清楚这个策略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联系，这个策略的缺点，它和全国的需要之間的“日益增长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根本的血緣关系，弄清楚在立宪民主党人领导下民主派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

八

在第30号“莫斯科呼声报”上有一篇評論立宪民主党會議的編輯部的文章，題目是“以后怎么样？”。在我收到这份报纸时，我的短文已經写好了。

由于2月6日杜馬的表決（通过就卡索的說明提出的轉入下項議程的議案）¹³³而发表的这篇編輯部的文章十分重要，并且十分明确地闡述了立宪民主党人对待十月党人的态度問題，因此非常有必要再談談他們。

十月党人的正式机关报“莫斯科呼声报”，把立宪民主党會議（不知道为什么它把这次會議称为代表會議）說成是以米留可夫为首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对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莫斯科呼声报”这样說明立宪民主党人的決議：“立法活动只有在不妨碍这些基本任务”（即普选制、国家參議院的改革和責任內閣）“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利用。

简单地說，通过这个決議案无异是在实际实现的范围内拒絕一切立法活动，而立宪民主党反对派从此就具有一种公然不負責的性質。”

“莫斯科呼声报”由此得出結論說，唯一的办法就是解散杜馬，因为十月党人决不会采取立宪民主党人这种“不調和的”（別开玩笑！）立場，杜馬中根本沒有多数，只有“完全的絕望”……

历史就是这样記載的！

这里清楚地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极密切的血緣关系，以及他們“爭吵”的真实性質：小两口兒吵架……

我們已經知道，2月6日十月党人的正式机关报在莫斯科宣布，在2月4日以前召开的立宪民主党會議（2月4日“言論报”发表了关于會議的消息）以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完全瓦解了。

就在同一个2月6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圣彼得堡，在第四届杜馬中，以178票对153票共同通过了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就卡索的說明提出的轉入下項議程的議案——这个議案后来在复决时偶然被否决了！！

这不是很好嗎？

我們看到的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如何搞自己的政治“勾当”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老天在上，他們决沒有結成任何

“联盟”！可是他们为了欺骗公众，十分“巧妙地”分摊角色，甚至任何形式上的联盟都不可能使他们得到这样的“方便”。立宪民主党人看到，全国正在向左转，新的民主派已经出现，因此他们玩弄左倾把戏，通过自己的会议说出一些毫无意义、毫无内容而象是左倾的话。十月党人支持公众中这样一种情绪或印象，似乎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向左转；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莫斯科呼声报”的编辑部的文章中正式宣布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是不调和的，宣布通过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形成杜马中的多数是不可能的，攻击立宪民主党人左倾，叫嚷解散杜马等等。

实际上，他们在悄悄地和立宪民主党人谈条件，而且正是在自己最猛烈地攻击立宪民主党人左倾的时候，在共同的议案上同他们谈妥了！！

“狼既能果腹，羊又能保全。”民主派上了当，受了骗，被牵到立宪民主党那一群人中去了（要知道，立宪民主党人是这样的左派……请看，十月党人怎样骂他们左倾！），而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黑暗的杜马中的联盟保留下来了，巩固了，发展了。

因此我想叹口气说：唉，天呀！俄国的民主派究竟什么时候才会了解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这套简单的骗人把戏呢？要知道，欧洲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客采取种种方式玩弄的正是这一套把戏：他们在人民面前，为了选举而在正式的言论中大叫大嚷，赌咒发誓，说他们是民主派，是激进派（德国的“自由思想者”，英国的劳合-乔治之流），甚至是社会主义者（法国的激进社会党人）。而实际上，在自己真正的政策方面，他们却同极力反对民主的政府和政党，同各种色彩和各个民族的十月党人走在一起。

这是多么陈腐的老一套，可是立宪民主党人却那么无休无止

地、經常地重复这老一套！

九

“莫斯科呼声报”硬說，在选举前立宪民主党人

“和左派进行了激烈的論战，証明在现实条件范围内进行立法工作的必要性。这就使人有理由指望杜馬的中派和反对派可能取得協議。但是选举后，立宪民主党领导者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米留可夫提出的經代表會議通过的关于杜馬策略問題的決議，根本违反了选举时显然是为了爭取城市大資產階級的选票而說的一切。城市大資產階級未必肯支持采取現在代表會議提出的政綱的立宪民主党人。”

这真是一种典型的言論，簡直无法知道其中令人惊奇的是天真的狡猾还是天真的无知。

立宪民主党人的看法沒有任何改变。他們始終是以欺騙手段領導民主派的自由主义政党。1912年选举时，立宪民主党人在大資產階級面前表明了自己的“真”面目、生意人的“團結”、資產階級奴仆的“拘謹”。而在同一个时期，这些立宪民主党人却在民主主义的选民面前再三地說，他們是民主派，他們在杜馬中的策略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毫无重大差別。

立宪民主党政策的这两个方面是各文明国家的每个自由主义政党必不可缺的“服装上的附屬品”。当然，个别的党员往往选择一套作为自己的专业，有的玩弄民主，有的使“入迷的人”清醒，执行“真正的”資產階級政策。要知道，各国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的。例如，英国著名的自由党騙子劳合-乔治，在向人民演說时把自己描繪成十足的革命者，几乎是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这个部长在政策方面是跟着自己的領袖，和保守党人不相上下的阿斯奎斯走的。

“莫斯科呼声报”把米留可夫先生描繪成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代表，这只能引人发笑。事实上，米留可夫先生是玩弄正式的立宪民主党外交手腕，使立宪民主党的不民主的实质和民主的詞句調和起来的代表人物。

“莫斯科呼声报”写道：

“米留可夫先生的这个‘选举后的’新主张远沒有得到代表會議的一致通过。代表會議的相当一部分代表坚持和杜馬的中派妥协的策略，以便实现某些草案和文化改革。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表示，在討論各种法律草案时，党因應該妥协，竭力根据自由主义的精神通过这些草案，而决不應該使这些草案成为不可接受的。”因此就必须反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的紀律”，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绝对服从”米留可夫先生“专制意志”的規定。

一眼就可以看破的把戏。破綻百出。十月党人“刺激”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竭力把他們描繪成战敗者，挑逗他們去更坚决地反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但是十月党人的这个把戏（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不是同一个小家族的成員，这个把戏也就玩不成了），并没有消除一个不可反駁的事实，即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之間，我国自由党人劳合-乔治之流和阿斯奎斯之流之間有細微的差別。

請看“俄国評論报”。这个进步党人的机关刊物，鼓吹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調和的刊物，在大量地搜罗立宪民主党的正式黨員。曼司列夫、馬克拉柯夫、奧波連斯基、格烈迭斯庫尔和亚历山大罗夫都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漸地跟着“路标派的”首領司徒卢威跑过去的。这一伙人过去就想更加接近十月党人，这是毫無疑問的。情况只能是这样。但是，米留可夫正在使他們和采取打着民主主义招牌而具有十月党实质的政綱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調

和起来,同样也是毫無疑問的。

十

杜馬中各个政党就卡索的說明提出的轉入下項議程的議案引起了人們很大的兴趣。这些議案給我們进行政治分析提供了各个政党的代表所正式確認的实际材料。但是通常最缺少的正是对这种材料的分析。这种材料都隱藏在每天报刊評論或杜馬的一大堆速記記錄中。为了弄清楚各个政党的真正本質,很有必要談一談这种材料。

在通过不信任案的第二天,“言論报”的編輯部文章声明:“这样,俄国社会从国家杜馬那里得到了有权指望得到的东西。”(2月7日第37号)由此看来,似乎“社会”只应当知道杜馬是不是信任卡索先生,別的就沒有什么了!

这是不对的。人民和民主派应当知道不信任的原因,以便了解公認的政治上不正常現象产生的原因,而善于找到正常化的办法。仅仅由于“我們不信任”这句话就把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混淆在一起,这对这些重大問題說得太少了。

下面就是十月党人提出的轉入下項議程的議案:

“国家杜馬在轉入研究当前事务的时候……認為:(1)任何吸引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作法,都对俄国青年力量的精神发展有极大的害处,对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也有害处;(2)当局及时获悉中等学校中的不良現象后,必須采取預防措施,而不是坐待这些現象具有不正常的性質^①;(3)必須

^① 这一点是在1月25日的會議上加进去的。在2月1日的會議上,第二点被改成这样:“从这一具体事件可以看出,中等学校中对学生普遍采取形式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教师同家庭隔閡,因此必須确立爱惜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共同观点。”

坚决反对对学生使用1912年12月10日使用过的办法，即不通知学校校长，用警察措施来代替正常的教育影响；（4）迟迟不决定被开除学生的命运是违反教育原则的，希望善意地对待学生，立即消灭这种现象。”

这个議案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呢？

学校里談政治是有害的。学生是有过錯的。但是必須采取教育的方法来惩罚他們，而不应采取警察措施。我們对政府不滿的是它缺少“善意”和办事迟緩。

这是反民主主义的思想。这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場：讓旧政权的制度繼續存在，但在运用它时要温和一些。打吧，但是要适可而止，并且不要声张出来。

請看进步党人提出的議案：

“……杜馬发觉：（1）国民教育部获悉最近在圣彼得堡中等学校中发生的事件后，对自己的职责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沒有制止警察局侵入中等学校；（2）警官准許采取的措施是搜查学校，逮捕孩子并把孩子拘禁在警察局里，用不容許采取的方法审讯学生，决不能認为这些措施是正当的，尤其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维护国家的安全，而在于恢复中等学校中的秩序，可是国民教育部并未对此提出抗議；（3）国民教育部的整套办法旨在使学校和家庭隔阂，用死板的形式主义压制青年一代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从而为学校生活中不正常現象的产生創造了有利条件。在轉入研究当前事务的时候，杜馬認为国民教育部的說明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这一議案是在1月30日提出的，当时进步党人声明，如果十月党人加上不信任的字样，他們就投票支持十月党人。这次交易的结果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了。

能够进行这次交易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意見基本上一致。

进步党人也認为学校里談政治是不正常的，也要求“恢复秩序”（农奴制度的）。他們的也是御用的反对派的立場，他們反对的

不是旧政权的制度，而是运用这个制度的“漠不关心的、死板的”方法等等。皮罗哥夫在1860年也同意要打，但是他要求，不要漠不关心地打，不要死板地打。进步党人不反对目前社会人士“恢复秩序”，但劝他们做得“仁慈些”。在半世纪内我们有多么大的进步呵！

下面是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議案：

“杜馬听取教育大臣的說明后認為：（1）这个說明完全把教育观点和警察观点混淆起来了；（2）这个說明完全否定了学校和家庭借以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的一般基础；（3）該部的政策在学生中間引起了极大的不滿，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合理的憤慨，它本身就有利于造成一种过早地吸引青年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气氛，从而創造了本来應該防止的条件；（4）采取象对待国事犯那样的办法来对待学生，破坏了正在成长的一代最有才能的人的生活，使其中許多人成为牺牲品，造成对俄国未來的威胁。在轉入研究当前事务的时候，杜馬認為教育大臣的說明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这里也非常温和地、閃爍其詞地斥責了“过早地”吸引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作法。这是反民主主义的观点。十月党人也好，立宪民主党人也好，他們斥責警察措施，只是因为要求用預防措施来代替。制度不應該解散集会，而應該防止集会。显然，这样的改良只会粉飾制度本身，而不会改变制度。立宪民主党人說：我們不滿意国民教育部的政策。但是他們完全象十月党人一样，認為可以希望这种政策有所改变而不作某种重大变革。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政府的話比十月党人說得尖銳得多，政治上不开展的人听了这种尖銳的話，会看不出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在对問題的自由主义的、反民主主义的提法上是完全一致的。

杜馬应当認真地教导人民学习政治。誰向立宪民主党人学习政治，誰就会在思想上受到毒害，而不会得到提高。

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共同的議案上討价还价，而且談妥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們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一致的結果。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是最貧乏不过的：为了承認說明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也同意直接斥責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活动。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同意这样作，是因为他們自己坚决反对“过早地”吸引学生从事政治活动。

下面是劳动团提出的議案：

“国家杜馬注意到：（1）1912年12月9日曾对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采用蛮横的暴力，可耻地吸引密探局参与对中等学校学生的教育监督工作，这种作法會使社会震惊，但国民教育大臣卡索先生在說明中，却完全同意这种作法，而且幸灾乐祸地嘲笑社会輿論；（2）搜查和密探制度是联合內閣的全部政策特别是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全部政策的产物，它会导致彻底的毁灭，会使正在成长的一代在将来受到极大的波动。在轉入研究当前事务的时候，国家杜馬要求立即恢复12月9日全体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同时認为国民教育大臣卡索的說明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要求立即撤銷他的职务。”

严格說来，这个議案是激进自由派的議案，但其中沒有民主派所應該說的、不同于自由派的話。自由派可以承認吸引密探局参与教育监督工作是可耻的，但是民主派却应当說（而且应当教导人民懂得这一点），任何“监督”都无权侵犯成立小組和組織政治座談会的自由。自由派可以斥責“联合內閣的全部政策”，但是俄国民主派却应当闡明，有某些共同条件使任何一个部不得不实行實質上相同的政策。

劳动团提出的議案的民主主义只表現在它的語气上，表現在起草者的情緒上。不用說，情緒是政治上的一种征兆。但是要求議案有周密的思想而不仅有“高昂的”情緒，这并不算过分。

下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議案：

“国家杜馬听取了教育大臣的說明，从說明中看出：(1)决心反对青年学生通过自修来增长自己的見識和增进同志間的交往的很自然的可喜的意图；(2)替官僚的形式主义办法、密探和警察搜查制度辯护，这种办法和制度已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級学校中普遍采用，残害青年的心理和精神，残酷地扼杀独立思考和个性独立的一縷生机，使学生中間自杀流行。因此，国家杜馬認为这个說明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同时，国家杜馬在轉入研究当前事务时認为：(1)警察观点在国民教育事业中占統治地位，是同密探在全部俄国生活中占統治地位、同鎮压公民各种有組織的独立活动以及同他們的无权地位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2)只有根本改造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才能把公民从警察羈絆中解放出来，才能把学校从警察羈絆中解放出来。”

未必能說这个議案是毫无缺点的。不能不希望它表述得更通俗、更透彻些，不能不对它沒有指出从事政治活动的合理性这一点表示遺憾，等等。

但是我們对一切議案的批判，决不是針对着它的表述的細节，而純粹是針对着起草者的基本政治思想。民主派应当說出主要的东西：成立小組和組織座談会是很自然的可喜的事情。实质就在这里。用任何理由斥責吸引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即使斥責“过早地”吸引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都是虛伪和蒙昧主义的表现。民主派应当把問題从“联合內閣”提到国家制度的高度，民主派应当首先指出“同密探的統治地位”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指出同封建大地主階級在經濟生活中的統治地位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写于1913年2月6—9日(19—22日)

載于1913年3月和4月“启蒙”杂志
第3期和第4期

署名：弗·伊林

按杂志原文刊印

“土地规划”的某些結果

新土地政策的結果怎样？所有的工人都很自然地关心这个问题。政府的統計总是搞得很糟糕而且很有偏見，簡直不能相信它。毫無疑問，新的土地政策是資產階級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完全是在普利什凱維奇、馬尔柯夫之流那一伙老爷們，即旧式的农奴主掌握之下。在他們“掌握”之下，除了彻底失敗以外，是很难有其他結果的。

我們想談談最近一期“俄国思想”杂志(1918年第2期)上符·奧波連斯基先生的結論。这个杂志是黑帮立宪民主党的杂志。文章的作者也是反革命分子，即十分偏袒地主的証人。这个作者在薩馬拉省找到了一个“土地规划”取得“巨大”成就的县份(新烏晋斯克县)；分給大部分戶主的土地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然而，作者應該得出的結論仍旧是：

“……至于新的土地改革的直接后果……未必可以認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喜的…… 半无产者农民把大量份地賤价出售給富裕农民和包买主投机商人…… 地租上涨了…… 占有大块土地和占有村社的零散土地，在耕作能力上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 新法律……使經濟生活的条件和經濟生活的內容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了…… 現在农民的思想可能比上次革命高涨时活动得更厉害。”

农民的思想朝什么方向活动？关于这一点，还是別問“俄国

思想”杂志的这位自由派吧。他根本不谈地主土地上的农奴经济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这个自由派地主的结论是值得深思的。一切矛盾尖锐化了，剥削加重了，地租上涨了，经济的进步是微不足道的。农民的思想不是“可能”而是一定在活动着。

载于1913年2月23日

“真理报”第45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馬克思學說的历史命运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闡明了无产階級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創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自馬克思闡述这个學說以后，全世界的事变进程是不是已經証实了这个學說呢？

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學說，是在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問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學說作了完整的、系統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闡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第三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起。

我們来考察一下馬克思學說在每个时期的命运。

在第一个时期的初期，馬克思學說决不是占統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別或思潮之一而已。当时占統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与我国民粹派相似的社会主义派別：它們不懂历史运动的唯物基础，不会指出資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階級的作用和意义，而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什么“人民”、“正义”、“权利”等辞句来掩盖各种民主改革的資产階級实質。

1848年的革命，給了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囂、五花八門

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1848年6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活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开始转向现存秩序方面，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这一资产阶级改革的发展过程；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英勇，才使共和制度即最露骨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那种国家组织形式巩固起来。

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更混乱和不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向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二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

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辯証法就是如此。內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 机会主义 形态下复活起来。他們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說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們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說成是奴隶們为了换取几文錢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們怯懦地宣揚“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講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充当議會議員的社会党人中間，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識分子中間，他們有很多信徒。

三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贊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現出来了。繼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們現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轉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鏟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群众斗争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人，看見欧洲反資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現在我們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失望是多么近視，多么懦弱。

八亿人民的亚洲已經投入实现欧洲的理想斗争，从这个事实中所应吸取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气。

亚洲各国革命同样向我們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卑鄙无耻、民主

群众独立活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与任何资产阶级间的明显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义腐化最深的英国工人也动作起来了。就是在德国这个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地主国家里，政治危机也在迅速成熟。狂热的军备竞争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现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象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解体与无产阶级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载于1913年3月1日

“真理报”第50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 农民的小地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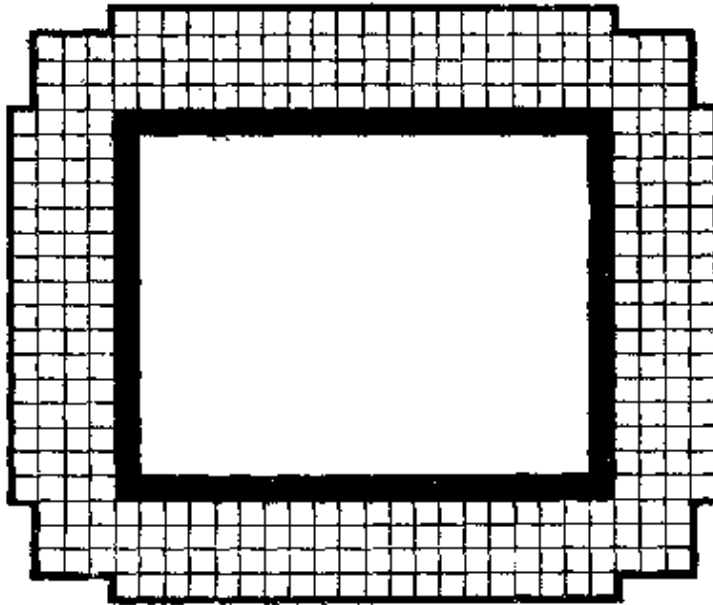
紀念 1861 年 2 月 19 日的日子刚过去，因此不妨談談目前欧俄土地的分配情形。

內务部公布了关于欧俄土地分配情形的最近的正式統計材料，这些材料是 1905 年的。

根据这个統計材料，拥有 500 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約有（以整数計算）3 万户，他們共占有土地約 7 000 万俄亩。

約 1 000 万貧苦农戶占有的土地也是这么多。

这就是說，每一个大地主所有的土地平均等于 330 个貧苦农



戶所有的土地，而每一个农戶約有 7 俄亩土地，每一个大地主約有 2 300 俄亩土地。

为了具体說明这一点，特在上面繪制了一个图表。

中間的空白大方块，表示一个大地主的地产。周围的小方格，表示小农的耕地。

总共有 324 个小方格，而空白方块的面积等于 320 个小方格。

載于 1913 年 3 月 2 日

“真理报”第 51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虛偽的論調

人們對米留可夫先生在国家杜馬中關於普選權問題的演說很感興趣，因為演說者談到了對民主派具有首要意義的一系列問題。

我國所有的報刊，包括自由派的報刊在內，日益習慣於這樣一種惡劣的無原則的做法：對杜馬的演說極力贊美（如“言論報”的利托夫策夫先生）或大罵一通就算了事，從來不分析這些演說的思想內容！

工人是不會相信資產階級的政客手腕的。工人想學習政治。為了滿足這種願望，我們來分析一下米留可夫先生的演說。

米留可夫先生經常對十月黨人說：“……不僅明確的義務沒有把你們和當局聯繫起來，甚至感激的心情也沒有把你們和當局聯繫起來，”

因為偽造選舉對你們也是不利的。

米留可夫先生，這個最有教養的立憲民主黨人、教授、編輯等等，十分認真地發揮了這個論點，甚至还說：

“……顯然，俄國沒有一個社會階層是支持政府現行政策的……”（“俄國報”第2236號）

這種說法是虛偽透頂的。同一個米留可夫先生後來又引証了法國人沙爾的話，這個法國人說得對，“任務的焦點”“是土地問題”。

沙爾說：“要搞出一個保守的第三屆杜馬，就必須使多數從農民手中轉到

地主手中…… 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贵族可以建立一个拥有 $\frac{5}{8}$ 票数的联盟（根据我国选举法选举国家杜馬代表时），少数则完全被压倒；农民、中等阶级和城市民主派被立法者邀请来是观察选举而不是进行选举的，是出席选举而不是参加选举的。”

反动分子沙尔说得真聪明、正确。我们要感谢米留可夫先生引証了这段有意思的话……这段话打破了米留可夫先生的空谈！在俄国，显然有一个社会“阶层”（地主阶级即封建主或农奴主阶级）是支持政府的政策的，并且通过阶级利益的关系“和当局”联系起来。什么通过“义务”和“感激的心情”联系起来都是废话，——博学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请记住这一点！

在下一篇文章中^①，我们要指出，这位博学的立宪民主党人怎样象猫儿围着热粥似地围着反动分子沙尔所正确指出的“任务的焦点”（即土地问题）转来转去。

截于1913年3月7日

“真理报”第55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① 見本卷第589—591頁。——編者注

“任务的焦点”

我們已經知道，米留可夫先生提到的那个法国反动分子沙尔正确地認為，“土地問題”是摆在俄国面前的“任务的焦点”^①。

米留可夫先生引証了这个聪明的反动分子的聪明話，可是根本不了解这句话的内容！

“……能不能使你們（即十月党人和政府：米留可夫先生在同他們談話！）亲手带到这里来的农民成为不独立的农民呢？要知道，他們在这个講台上談論土地問題，他們說的話也是第一屆和第二屆国家杜馬中的独立的农民所說的那一套。先生們，在俄国的生活中再沒有比俄国农民更独立、更坚定不移的分子了。”（左边有人鼓掌并喊道：对。）

显然，鼓掌叫好的全是一些虛伪的立宪民主党人，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农民在第三屆和第四屆国家杜馬中所說的并不完全是“那一套”，而是比在第一屆和第二屆国家杜馬中所說的更加軟弱无力；第二、在俄国的生活中有更独立、更坚定不移的分子。就是米留可夫先生本人也不不得不在自己的演說中承認，工人在爭取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做的“最多”。难道可以用其他尺度来衡量“独立”嗎？

^① 見本卷第587—588頁。——編者注

但是實質不在这里。實質在于，現在 13 万地主的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能不能調和起来？米留可夫先生“圍繞”這個問題“胡說八道”，避免作出答复。

“言論报”为頌揚巴·米留可夫而僱傭的斯·利托夫策夫先生写道，他的演說

“消除了对这个尖銳的、有爭論的問題的模糊看法。直到現在，許多人仍覺得普选权是某种怪物，是革命的頂峰。”

真是一个又一个空談的例証！

自由派空談家先生們，向反动分子沙尔学习学习吧！任务的焦点是土地問題。現在在这个問題上，13 万户地主的利益同 1 000 万户农民的利益能不能調和起来？能还是不能？

米留可夫先生，这就是普选权問題的“焦点”，可是你 腐蝕 人民的政治覺悟，用空話 掩盖 問題的這個實質，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清楚的實質。

如果你回答說：能，——那末我用你的話就能把你駁倒，因为你說农民在第三屆和第四屆国家杜馬中所說的，也是在第一屆和第二屆国家杜馬中所說的“那一套”（虽然說得比較軟弱无力）。

如果你回答說：不能，——那末你的关于現在俄国的普选权具有可調和的、非“片面的”性質的全部空話就破产了。

学究式地援引俾斯麦，純粹是幼稚行为，因为俾斯麦是在德国資產階級发展使地主的利益同一切富裕农民，甚至部分中农的利益已經調和起来的时候，才“賜予”普选权的。

有远見的讀者可能要問：从这里是不是應該得出結論說，在俄国不可能實現普选权？——我們要回答有远見的讀者，不对，从这

里只應該得出結論說，在俄國不可能實現改良主義的觀點。

載于1913年3月8日

“真理報”第56號

署名：弗·伊·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自由派粉飾农奴制的勾当

自由派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的領袖米留可夫先生，不久前在“言論报”的社論里写道：

“俄国的社会不平等（农奴制）比文明世界任何地方显得更加脆弱，形成得更加偶然。它毫无反抗地(!!!)一下子就讓了位。米柳亭和索洛維約夫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斯特罗加諾夫伯爵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就預言可能实现理想。”

所有的自由派历史学家以及部分的民粹派历史学家美化俄国的农奴制和农奴主的国家政权，这我們已經看慣了。但是象我們引証的話那么可耻的“妙論”，并不是所有的这类历史学家都說得出口的。

俄国的农奴制以及农奴主地主等級不是脆弱的和偶然形成的，而是“比文明世界任何地方”的“巩固”得多，坚硬得多，有力得多，权力大得多。它不是“毫无反抗地”，而是經過最激烈的反抗才讓出自己一小部分特权。自由派先生，莫非你要給我們指出一个“文明世界”中类似車尔尼雪夫斯基命运的例子？

米柳亭和索洛維約夫 本人 就是維護农奴主特权，主张为这些特权付出非常高的“贖金”的。米留可夫先生閉口不談这一点就是歪曲历史，因为历史証明农奴主的特权和无限权力在米柳亭及其同伙以后，在“他們的”农奴制改革以后的半世紀里是“富有生命

力”的。

为什么自由派历史学家要粉飾农奴制和农奴制改革呢？因为他們在实行这种改革的活动家身上看到了他們所喜爱的对农奴主的百般依順，看到了他們引以为快的民主派的畏縮态度，看到了和他們相似的勾結反动派的意图，看到了他們所熟悉的粉飾阶级斗争的勾当。

这里談的是遙远的过去的事情。然而当时的和现在的自由派（“自由派的外表，官僚的灵魂”¹³⁴）对阶级斗争的态度是同一性质的现象。

米留可夫先生一面替农奴制抹粉，一面美化自己，美化自己的党，美化自命为民主派以欺蒙头脑简单的人的整个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載于1913年3月9日

“真理报”第57号

署名：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

美国资本主义走在最前面。技术最发达，进步最快，这一切都使得古老的欧洲竭力追赶美国佬。但是，欧洲资产阶级从美国学到的不是民主制度，不是政治自由，不是共和国制度，而是剥削工人的最新方法。

目前在欧洲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俄国，人们谈得最起劲的是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的“制度”。不久以前，谢明诺夫先生在彼得堡交通运输工程师学院的礼堂里，作了关于这个制度的报告。泰罗本人把这个制度叫作“科学”制度，在欧洲人们正在热心地翻译和宣传他的著作。

这个“科学制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同一个工作日内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强迫最强壮最灵巧的工人工作；用特殊的时钟——以秒和几分之一秒为单位——记录下完成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的时间；研究出最经济而且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把技术最好的工人的工作情形拍摄成电影等等。

结果，在同样的9—10小时的工作中，他们就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无情地绞尽他所有的力量，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佣奴隶一点一滴的神经和筋肉的能力。他会早死吗？还有许多人在大门外面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

术的进步。

就拿泰罗著作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送去进一步加工的生铁的装车工作，在旧制度和新的“科学”制度下互相比较，其情况如下：

	旧制度	新制度
装车的工人人数	500	140
平均一个工人所装的 吨数(每吨等于61普特)	16	59
工人的平均工资	2 卢布 30 戈比	3 卢布 75 戈比
每装一吨生铁的厂主开支	14.4 戈比	6.4 戈比

资本的开支减少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利润增加了。资产阶级兴高采烈，对泰罗之流赞不绝口！

工人在开头的时候可以得到附加工资。可是几百个工人被解雇了。谁留下来，谁就要四倍紧张地工作，被沉重的工作搞垮身体。资本家绞尽工人所有的精力，再把他们赶出工厂。他们只雇用年轻力壮的工人。

他们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

载于1913年3月13日

“真理报”第60号

署名：W：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我們的“成就”

不論財政大臣在自己的預算說明中，或者所有的政府黨，都極力使自己和別人相信我國的預算很鞏固。這時，他們也列舉了工業方面的“成就”來證明，當然，近幾年來工業是上升了。

我們的工業以及俄國的整個國民經濟，過去和現在都是按資本主義方式發展的。這是不容爭辯的。這是無須證明的。但是，如果只是列舉有關“發展”的材料，自滿自足地夸耀“增加了百分之多少多少”，那就是閉眼不看這些材料暴露出來的俄國極端落后和貧困的狀況。

財政大臣高興地說，1908年，我國工廠工業產品的總產值是480 700萬盧布，而1911年大約是489 500萬盧布。

請大家看看，這些數字究竟有什麼意義。在美國，每10年要進行一次調查。要找到和我們相近的數字，就必須回到1860年去，可是那時美國還存在着黑奴制度。

美國加工工業的產品總值在1860年是377 100萬盧布，而在1870年已達到846 400萬盧布。1910年的數字更達到了4 184 400萬盧布，就是說，幾乎比俄國多8倍。俄國的人口是16 000萬，而美國的人口，1910年是9 200萬，1860年是3 100萬！

財政大臣高興地說，1911年，俄國每個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是251盧布一年，比1910年增加了8.2%（按全部工資總額計算）。

在美国,1910年每个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資是1036卢布,即比俄国工人的平均工資高3倍有余。1860年平均工資是576卢布,即比现在俄国工人的平均工資高1倍。

20世紀的俄国,实行六三“宪制”的俄国,竟不如奴隶制的美

国。

1908年,俄国一个工厂工人的年产值是1810卢布,而美国,1860年是2860卢布,1910年是6264卢布。

只要举出这几个数字就足以簡短地說明,什么是現代的資本主义,什么是压制現代資本主义发展并使广大农民群众处于悲惨境地的中世紀农奴制的压迫。

农民的貧困状况必然使国内市場十分狭小,使工人的处境每况愈下,这些工人在1911年挣的工資比奴隶制时代的美国工人还要少一半。但是,除了其他情况以外,世界市場的情况也要俄国选择一条道路:或者是被那些用另一种速度并在真正广闊的基础上发展資本主义的竞争者压倒,或者是摆脱农奴制的一切残余。

載于1913年3月14日

“真理报”第61号

署名: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妥协还是分裂？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意見分歧問題)

社会民主党的輿論对 7 个代表的信中透露出来的党团分裂的危險感到不安。工人非常关心这个問題，是理所当然的。必須把情况彻底弄清楚。

一方面是工人选民团的 6 个代表，正象大家所理解的那样，他們也就是俄国工人階級絕大多数的代表。另一方面是偶然以一票之差在党团內占多数的其他 7 个代表。

从表面上来看，引起爭論的是这个事实，就是：7 个代表要迫使其他 6 个代表作“光綫报”的撰稿人，主张“真理报”和“光綫报”合并。老实說，我們認為 7 个代表的这种要求是极不严肃的。可以用“多数票”强迫一个人在采取你不贊同的方針的報紙中工作嗎？（不用說，一切自重的編輯部自己也会拒絕这些用暴力拉来的非自願的“撰稿人”的。）可以一本正經地談論合并“真理报”和“光綫报”嗎？

当然不可以！我們坦率地声明，我們認為“真理报”如果放弃反对取消主义的斗爭，即在“光綫报”停止进行反对“地下組織”、反对政治罢工等取消主义的宣传鼓动以前，把“真理报”和“光綫报”合并起来，就是背叛无产階級的事业。严肃的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未必会相信，“真理报”和 6 个工人代表会单单因为滿足“光綫报”

的要求而决定自杀。根本谈不上这一点，如果 7 个代表不再搬出他们的根本不能接受、根本不能实现的“计划”，他们就是作了大大的好事。

然而，党团的意见分歧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每个人都感觉到，在关于强迫给“光复报”写稿的争论的外表下，还隐藏着另一个更严重更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就是，党团的各个部分对取消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可以设想：在这里工人首先有权要求 7 个代表直接地、确切地、明确地、肯定地说出，他们对取消主义采取什么态度。7 个代表应当象 6 个工人代表那样，公开地说出这一点。在第三届国家杜马党团内，绝大多数代表是孟什维克。但是他们对取消主义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现在 7 个代表对取消主义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自己提出了关于“光复报”即关于取消主义的问题。因此他们更加应该公开肯定地说明：他们对“光复报”反对地下组织（见“光复报”第 101 号以及其他各号）、反对政治罢工、反对工人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等宣传鼓动，采取什么态度。否则，在摆脱现状方面不可能前进一步。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有一个代表在杜马讲坛上发表类似第 101 号“光复报”上的文章的言论（同情“地下组织”的心情日益增长是“令人痛心的”事实等等），那末同这个代表决裂也是必不可免的。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挺身而出来说，这个发言人反映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意见，那他就是背叛了自己对工人阶级应负的责任。

我们的这种看法是不是正确？我们放心地把这个问题交给工人判断……

在党团的两个各占二分之一的部分之間存在着严重意見分歧的情况下，只有在双方一致努力求得妥协的条件下，才可能保持統一。讓偶然多得一票的多数“解决”綱領性問題，就会造成分裂。这是尽人皆知的。真正希望統一的人决不同意这样“解决”問題。

在目前党团成員的情况下，党团內是不是可能妥协呢？过去一向是可能的。例如，党团在第四届杜馬开始工作时宣讀的宣言。党团摺弃了取消主义的无理要求；这曾使两部分有了妥协的可能。如果有誠意，如果7个代表不制造分裂，那末在一切重大的政治問題上也将有妥协的可能。

宣言的例子說明了，为了避免分裂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而“民族文化自治”的例子說明了，为了避免分裂不应当采取什么行动。如果象契恒凱里同志那样提出这种要求，那就是要废除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以前取消派分子硬說这个要求“不违背”党綱，而現在甚至崩得分子也揭穿了他們，崩得分子（見第9号“时报”）正因为契恒凱里“离开了枯燥无味的民族問題理論所持的僵化的观点”才夸奖他的。以7票对6票废除党綱，就是制造分裂。这是每一个觉悟的工人所理解的。

总之，妥协或者分裂！問題就是这样摆着的。

我們主张什么？——妥协！

妥协是不是可能？——可能！

妥协是不是上策？——是的！

为了实现妥协，应该有什么要求呢？——不废除党綱，不誣蔑“地下組織”，始終忠于旧的旗帜！讀者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要求是很低的。

赞成 7 个代表同 6 个代表妥协，反对分裂！这就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应当提出的要求。

载于 1918 年 3 月 15 日

“真理报”第 62 号

署名：勃·勃·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节余現金”¹³⁵

政府方面的报纸，首先是善于阿諛奉承的“新时报”，极力贊揚我国政府和管理国家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請想一想吧：45 000 万卢布的“节余現金”！不是往外面送，而是往家里拿——請看，“我們”是怎样管理的。

因此，“新时报”这家黑帮地主和十月党商人的报纸得出結論說，有了这 45 000 万卢布的准备金，就是打仗也一点都不在乎了。

但是，請看一看財政大臣对 1913 年收支一覽表的說明吧；在这个說明中，除了自我夸耀（这种好話在說明中要多少有多少！）以外，能不能找到說明人所共知的“节余現金”的來源的 确切的材料呢？

我們翻开大臣先生的說明，在說明中（第 15 頁第 1 部分）可以看到，1908—1912 年这 5 年中，公債使国庫得到 33 950 万卢布。在同一时期內，公債还本付出了 25 210 万卢布。

这就是說，总共增加了 8 740 万卢布的公債。这就是“节余現金”的第一个“来源”。請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来源。

再往下看。大家知道，从 1908 年 10 月 1 日起，国家专卖的烧酒价格提到了最高限度，每桶由 8 卢布提高到 8 卢布 40 戈比（普通的，好的每桶由 11 卢布提高到 12 卢布）。

1908—1912 年这 5 年內，由于实行了这一“財政措施”，国家

专卖的烧酒的平均价格变为每桶 8 卢布 48 戈比了，也就是說比过去 4 年（1904—1907 年，每桶的价格是 8 卢布 6 戈比）整整贵了 42 戈比。

5 年內（1908—1912 年）国家共卖出 44 050 万桶 40 度含杂質的烧酒。每桶增加 42 戈比利潤，合起来就是 18 500 万卢布。

这就是“节余現金”的第二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是国营铁路在 4 年內（1908—1911 年）提供的“純利潤”是 5 300 万卢布，如果不算支付被国家用来投資的 225 000 万卢布的利息和还本的支出的話！！我們在 1912 年得到的这种利潤和 1911 年同样多，即 10 500 万卢布。5 年內我們得到的“利潤”共 15 800 万卢布。“不算”几十亿投資的利息和还本，很明显，这样的国家“經濟”倒很象国家魔术。我們要指出，确定 4 年（1908—1911 年）来为国家铁路投資支付利息和还本的支出是 39 760 万卢布的，不是某一个“左派記者”（老天在上！），而是国家稽核局自己决定的。1908—1912 年这 5 年內，这种支出共达 5 亿卢布！这是典型的掠夺經濟。

現在讓我們把“节余現金”的 3 个来源加在一起：

(1) 公債	8 740 万卢布
(2) 提高国家专卖含杂質烧酒价格	18 500 万卢布
(3) 国营铁路（不算用于支付利息和还本的 5 亿卢布）	15 800 万卢布
总計	43 040 万卢布

看来够了吧？指出一些更細微的“来源”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的农奴主地主是极出色的天才財政家，这不是很明显嗎？借錢，提高含杂質烧酒价格，“不算”为几十亿投資（用于“經營”的）

支付的利息和还本的支出——这不是天才嗎？

这不是我国預算“巩固”的証明嗎？

載于1913年3月15日

“真理报”第62号

署名：弗·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注 释

- 1 “俄国财富”是月刊，从1876年到1918年年中在彼得堡出版。从90年代初期，该杂志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机关刊物。1906年以后，“俄国财富”实际上成了“人民社会党人”的半立宪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正文第1页)
- 2 “同时代人”杂志是文学政治月刊，1911—1915年在彼得堡出版。集结在这个杂志周围的有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左派自由派。这个杂志同工人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列宁在1914年认定这个杂志的方向是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正文第1页)
- 3 “生活需要”杂志是周刊，1909—1912年在彼得堡出版。替这个杂志撰稿的有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列宁把这个杂志叫做“取消派—劳动派—路标派的”杂志。——(正文第2页)
- 4 指俄罗斯帝国刑法第129条，根据这条法律，凡公开发表反对沙皇政府的言论或传播反对沙皇政府的著作的人，应受到严厉惩办，直到流放边地做苦工。——(正文第3页)
- 5 罗—柯夫即尼·亚·罗日柯夫，历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孟什维克取消派。——(正文第4页)
- 6 “活的事业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公开周报，1912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6号。——(正文第4页)

- 7 列宁指1910年年底孟什維克取消派为反对秘密的党組織而建立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公开工人运动的倡导小組”。取消派放弃了革命的綱領和策略，力图消灭无产阶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他們把“倡导小組”看成是适应于斯托雷平制度的新的合法大党的支部。取消派在彼得堡、莫斯科、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康士坦丁諾夫卡（頓巴斯）等地建立了“倡导小組”。这是一些人数不多的知識分子的团体，同工人阶级毫无联系。他們反对工人的罢工斗争和革命的游行示威，在第四届杜馬选举时反对布尔什維克。“倡导小組”的中心是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以及取消派在俄国国内的合法机关刊物“我們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正文第4頁）
- 8 “我們的曙光”杂志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在“我們的曙光”杂志的周围，形成了俄国取消派的中心。——（正文第4頁）
- 9 法·維·布尔加林是19世紀前半期的反动記者和出版家，專門对当时的进步杂志和进步作家进行告密和誹謗；因告密亞·謝·普希金而出名。
維·彼·布勒宁是記者，反动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他对所有进步的社会派別和政治派別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列宁在这里是作为普通名詞来使用这两个名字，即指那些采用无耻的論战方法的人。——（正文第6頁）
- 10 «Vorwärts»（“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面刊載的誣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會議的文章是托洛茨基写的。——（正文第6頁）
- 11 指1912年1月在取消派（崩得、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拉脫維亞边区的社会民主党等組織的代表）會議上成立的組織委员会。組委会是召开取消派八月代表會議的正式机构。——（正文第6頁）
- 12 “真理报”（維也納的）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报纸，托洛茨基的派別机关报；1908—1912年在維也納出版。这个报纸以“无派別性”作掩飾，在所有根本的問題上采取取消派的立場，而且支持召回派和最后通牒

派。这个报纸得到了调和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帮助，他们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的暗藏的代理人，在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全会上，他们企图把这个报纸变为中央的机关报。1912年，托洛茨基和他的报纸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的组织者。——(正文第7页)

13 “护党报”是巴黎孟什维克和调和派集团的小报，从1912年4月到1914年2月在巴黎不定期出版。——(正文第8页)

14 列宁引的是亚·伊·赫尔岑的作品“终结和开始”(见“亚·伊·赫尔岑选集”1937年俄文版第349页)。——(正文第9页)

15 列宁引的是“致老友书”(第四封和第二封)。见“亚·伊·赫尔岑选集”1937年俄文版第385、379页。——(正文第11页)

16 “钟声”是政治性杂志，是在“我向人们召唤！”(«Vivos voco!»)的口号下出版的。该杂志从1857年到1865年4月在伦敦出版，从1865年到1868年12月在日内瓦出版，每月出一期或两期，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并由亚·伊·赫尔岑创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刊印。1868年该杂志用法文出版，但同时又印行俄文副刊。——(正文第12页)

17 “北极星”是文学政治文集，头三本文集由亚·伊·赫尔岑主编，后几本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于1855—1862年在伦敦自由俄国印刷所刊印。最后一本于1868年在日内瓦印行。总共出了8本。——(正文第12页)

18 “明星报”是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从1910年12月16日(29日)到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开始是每周1次，从1912年1月起每周2次，3月起每周3次)。为该报撰稿的有尼·尼·巴图林、克·斯·叶列梅也夫、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古·波列塔也夫、约·维·斯大林和阿·马·高尔基等人。孟什维克护党派(普列汉诺夫派)在1911年秋天以前也参加了“明星报”的工作。列宁(从国外)对该报进行了思想领导，他在“明星报”上发表了约30篇文章。

在列宁指导下公开出版的“明星报”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机关报，它坚决维护秘密党的纲领。“明星报”大量刊载了工人通讯，同工人们建立了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它的印数有时达到5—6万份。“明星报”经常遭到政府的迫害：69期中有30期被没收，8期被罚款。

“明星报”为布尔什维克的日报“真理报”的出版做了准备工作；它在“真理报”出版的那一天被政府封闭。——(正文第21页)

- 19 劳动派代表会议于1912年3月在彼得堡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些问题。列宁在“自由主义和民主派”一文中对这次会议的决议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510—518页)。——(正文第26页)

- 20 “路标”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一本文集，1909年春天在莫斯科出版，其中有尼·别尔嘉也夫、谢·布尔加柯夫、彼·司徒卢威、米·格尔申臧和其他反革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的文章。在论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里，“路标派”企图对包括维·格·别林斯基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的俄国人民优秀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加以诽谤；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怒火中”救了出来。文集号召知识分子去为专制政体服务。列宁把“路标”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的纲领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提并论，称该文集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一整套对民主派的反动诬蔑”(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120—128页)。——(正文第26页)

- 21 关于“新时报”见本卷第265—266页。

“光明报”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日报，从1882年到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

“莫斯科呼声报”是日报，大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党——十月党的机关报，从1906年到1915年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32页)

- 22 “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一文发表于“启蒙”杂志第5—7期。

“启蒙”杂志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从1911年12

月到1914年6月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个杂志是根据列宁的指示，为代替在莫斯科出版的遭到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杂志而创办起来的。列宁从国外领导“启蒙”杂志的工作：校閱稿件，定期同編委会委員通信。杂志刊登过列宁的下列著作：“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論民族自决权”等等。

“启蒙”的常任編輯是維·米·莫洛托夫；約·維·斯大林也参加了杂志的工作。文艺部的編輯是阿·馬·高尔基。参加編輯委员会的还有：馬·亞·薩維里也夫、米·斯·奧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札罗娃等人。杂志的发行数达5000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杂志被政府封闭。1917年秋天“启蒙”复刊，但是只出了一期(合刊)，其中刊載了列宁的著作：“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和“論修改党綱”。——(正文第41頁)

23 阿·奧·古什卡 和文中下面提到的阿·叶尔曼斯基，都是孟什维克取消派奧·阿·科甘的笔名。——(正文第41頁)

24 国家根本法 第87条 規定內閣在国家杜馬休会期間有权提出法案直接呈請沙皇批准。——(正文第47頁)

25 “言論报”(日报)是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906年2月在彼得堡創刊，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查封。——(正文第56頁)

26 “涅瓦明星报”是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于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至10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7号。“涅瓦明星报”最初与“明星报”同时出版，在“明星报”被查封或沒收的情况下就应当代替它；1912年4月22日(5月5日)以后，即代替被查封的“明星报”而繼續出版。該报发表了20篇列宁的論文。

在該报編輯部工作的有：維·米·莫洛托夫、米·斯·奧里明斯基、尼·尼·巴图林等人。——(正文第59頁)

27 尔·布·是尔·姆·布兰克，政論家，立宪民主党人。——(正文第65頁)

- 28 列宁指第三届国家杜馬和国家參議院代表团赴英期間巴·尼·米留可夫于1909年6月在倫敦市长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說。米留可夫表示立宪民主党人忠于沙皇专制制度，強調指出只要俄国的杜馬存在，“俄国的反对派就只能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正文第66頁)
- 29 “俄罗斯新闻”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和地方自治活动家从1863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的日报，这个报纸代表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从1905年起成为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十月革命后即被封閉。——(正文第72頁)
- 30 “涅瓦呼声报”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公开报纸，1912年5月至8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73頁)
- 31 指1906年11月9日(22日)斯托雷平頒布的关于农民退出村社的法令。——(正文第77頁)
- 32 列宁在“革命的高涨”一文发表以前，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組織巴黎支部4月26日(5月9日)的會議上，作关于国内情况和这种情况下党的策略的报告及5月31日(6月13日)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这一专题报告时，对新的革命高涨作了闡明，并对布尔什維克党在新情况下的任务作了規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組織巴黎支部的通告上刊印的报告綱要，是同本文的綱要一致的。——(正文第88頁)
- 33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的中央机关报，从1908年2月出到1917年1月，共出了58号。創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移到国外出版，起初移到巴黎，后来移到日内瓦。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机关报編輯部由布尔什維克、孟什維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組成。

“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載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評。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內为实行彻底的布尔什維克路綫进行了斗争。編輯部的一部分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对取消派采取了調和主义态度，企图阻撓列宁的路綫。担任編輯的孟什維克馬尔托夫和唐恩在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怠工，同时又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公开维护

取消主义。

由于列宁毫不妥协地同取消派进行斗争，馬尔托夫和唐恩于1911年6月退出了編輯部。从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編。——(正文第90頁)

34. “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是內务大臣馬卡罗夫在1912年4月11日(24日)國家杜馬的會議上回答社会民主党党团就連納枪杀事件提出的質問时所說的話。——(正文第95頁)

35. “未来报”(«L'Avenir»)是自由資產階級創辦的一種週報，1911年10月在巴黎創刊，1914年1月停刊；該報主編是弗·李·布尔采夫，用俄文出版(某些材料用法文刊印)。該報的撰稿人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文第99頁)

36. 列宁指的是取消派的組織委員會关于邀請波兰社会党“左派”出席八月代表會議的決定。

波兰社会党(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2年。波兰社会党把爭取独立的波兰当作它的基本綱領，在波兰工人中間进行分立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力图使波兰工人脱离同俄国工人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資本主义的斗争。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和右派，右派即沙文主义派或所謂“波兰社会党革命派”。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影响下，以及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許多普通工人黨員的影响下，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漸地摆脱了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大部分的波兰社会党“左派”都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場上并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合并后的党組成了波兰共产主义工党(1925年以前波兰共产党的名称)。

波兰社会党右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繼續实行民族沙文主义的政政策；它曾組織了波兰軍团为德奧帝国主义作战。

随着波兰資產階級国家的建立，波兰社会党右派又重新称为波兰社会党。波兰社会党执政后，竟把政权交給波兰資產階級，此后就不断地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支持侵略苏維埃国家、霸占烏克蘭西部和白

俄罗斯西部并在該地实行殖民地压迫的政策。在皮尔苏茨基实行法西斯政变后(1926年5月),波兰社会党表面上处于反政府党的地位,实际上是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且繼續进行了反苏宣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波兰社会党又分裂了。它的反动的、沙文主义的部分叫作«Wolność, równość i niepodległość»(“自由、平等、独立”),这一部分同法西斯分子合作,参加反动的倫敦波兰流亡“政府”。波兰社会党另一部分即左派,自称为“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該党在波兰工人党(1942年成立)的影响下,参加了反对希特勒占领者的統一战綫,进行了爭取波兰摆脱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采取了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立場。

1944年,在波兰东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后,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又采用了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并同波兰工人党一起参加了人民民主波兰的建設。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統一工人党。——(正文第104頁)

- 37 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编”1954年俄文第7版第1卷第203頁。——(正文第105頁)
- 38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是格·瓦·普列汉諾夫主編的不定期的机关刊物,从1905年3月到1912年4月間断地在日內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日志”曾在彼得格勒复刊,只出了一期。——(正文第106頁)
- 39 1912年2月,伊尔庫茨克省的代表孟什維克取消派特·奥·別洛烏索夫退出了第三屆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見列宁“論特·奥·別洛烏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67—471頁)。——(正文第106頁)
- 40 “政治上的嬰兒”这里指的是在国内外都有自己的小集团的布尔什維克調和派;“老練的外交家”是指托洛茨基的維也納“真理报”的取消派集团和崩得的领导人。——(正文第120頁)
- 41 列宁指的是1905年12月11日(24日)的国家杜馬选举法。根据这项法律,选民分为4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选民团(地主),城市选民

团(资产阶级), 农民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凡年满 25 岁的人才享有选举权。对于土地占有者选民团及城市选民团规定有财产资格, 农民选民团中只有家长才有选举权, 工人选民团中工龄半年以上的人才享有选举权。选举是不平等的。地主一票等于资本家 3 票, 农民 15 票, 工人 45 票。妇女、农业工人、粗工、手工业者、学生、军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在拥有 50 个男工人以上的工厂中做工的工人只有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权。1 000 工人以上的工厂, 每满 1 000 人只能选一位初选人。选举是多级的: 对地主和资本家是两级, 对工人是三级, 对农民是四级。——(正文第 128 页)

- 42 1907 年 6 月 3 日(16 日), 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颁布了新的杜马选举法。新的选举法使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人数大大增加, 使农民、工人及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人数减少好几倍。城市选民团分为两个: 大资产阶级属于第一城市选民团, 其他城市选民都属于第二选民团。根据新选举法的规定, 土地占有者选民团(地主)中每 230 个选民中产生一名复选人; 第一城市选民团中每 1 000 选民中产生一名; 第二城市选民团中每 15 000 选民中产生一名; 农民选民团中每 6 万选民产生一名; 工人选民团中每 125 000 选民产生一名。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科斯特罗马、哈尔科夫等 6 个工业省, 必须各选一个工人选民团的工人代表。六三选举法保证了地主同大资产阶级的黑帮联盟在第三、四两届国家杜马中完全占统治地位。——(正文第 128 页)

- 43 见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1936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2 册第 7—9 页。列宁在“19 世纪末的俄国土地问题”一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15 卷第 118—120 页)中对马克思的这些原理作了叙述和阐明。——(正文第 133 页)

- 44 “工人报”(«Gazeta Robotnicza»)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 1906 年 5—10 月出版, 1912 年复刊。1912 年波兰社会民主党分裂后, 成立了平行的党的委员会, 于是出现了两个华沙委员会, 两个都叫“工人报”的机关报: 一个是由华沙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办的, 一个是由克拉柯夫的反对派的华沙委员会办的。列宁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一文曾发表在克拉柯夫出版的“工人报”第15—16号。关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见列宁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本卷第473—478页）。——（正文第138页）

- 45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机关报，1908年2月至1911年12月在日内瓦出版，后来在巴黎出版。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评论，见列宁的“取消派的反党‘呼声’”一文（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153—161页）。——（正文第140页）
- 46 指取消派于1912年1月在俄国举行的会议，会上成立了负责召开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的組織委员会。——（正文第144页）
- 47 “答取消派”这篇短评是列宁为“真理报”写的，编辑部于1912年7月11日（24日）收到。——（正文第146页）
- 48 “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在彼得堡出版，是根据彼得堡工人的倡议在1912年4月创办的。

“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它是依靠工人自己捐款出版的。以报纸为中心，团结了广大的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家。仅在报纸出版的一年中就发表了11000多篇工人通讯。“真理报”的发行额平均每天4万份，个别的月份达到6万份。

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给报纸写文章，给编辑部发指示，并且把一批党的优秀的写作人才团结在报纸的周围。积极参加报纸工作的有：维·米·莫洛托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约·维·斯大林、米·伊·加里宁。编辑部的经常工作人员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古·波列塔也夫、克·恩·萨莫依洛娃、尼·尼·巴图林、安·伊·叶利扎罗娃、克·斯·叶列梅也夫等等。积极参加“真理报”工作的还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也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馬·康·穆拉诺夫、費·尼·萨莫依洛夫、尼·罗·沙果夫。

“真理报”经常遭到警察的迫害。在创办的第一年，它就被没收过41次，编辑们被审讯过36次，共坐牢47个月零15天。在两年零三个

月中，“真理报”被沙皇政府查封过8次，但查封后它又改用别的名称出版，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在1914年7月8日(2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报纸被查封了。

直到二月革命后，“真理报”才复刊。从1917年3月5日(18日)起，“真理报”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4月5日(18日)，列宁一从国外回来，就参加了编辑部并且领导了“真理报”的工作。1917年7月5日(18日)士官生和哥萨克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1917年7—10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多次更换名称继续出版，用过的名称有：“真理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从10月27日(11月9日)起又用原名“真理报”出版。——(正文第146页)

- 49 指的是：(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941年俄文版第131—14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80—191页)；(2)马克思“资本论”1953年俄文版第3卷第662—686页(见马克思“资本论”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1047—1062页)；(3)“剩余价值学说史”1936年俄文版第2卷第1册第192—202页(见“剩余价值学说史”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277—292页)。——(正文第156页)
- 50 指彼得堡面包师工会理事会的决议；这项决议提出了出版反取消派工人日报的要求。理事会对即将出版的“真理报”表示欢迎，并号召全体会员为该报捐款。关于这项决议的报道，发表在1912年4月8日(21日)“明星报”第27号上。——(正文第163页)
- 51 “浅言”杂志是倾向社会革命党的公开的文学政治月刊；191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170页)
- 52 指1912年夏葡萄牙保皇派为恢复君主制组织的暴乱，结果被镇压。——(正文第171页)
- 53 “半年工作总结”一文写于1912年7月上半月。列宁同“真理报”编辑部的关于发表本文的通信已保存下来。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列宁要

- 求把“半年工作的几点总结”分4次登在“真理报”的杂文栏内，并提出除书报检查机关的删改以外不得修改。本文是按列宁的建议而刊登在“真理报”上的。——(正文第176页)
- 54 列宁指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威胁，要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提出自己的工人选民团候选名单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候选名单。——(正文第186页)
- 55 “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创刊于堪萨斯州(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正文第190页)
- 56 “戈比报”(日报)是资产阶级的黄色报纸，1908年创刊于彼得堡，于1918年被查封。——(正文第191页)
- 57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是列宁在克拉柯夫写成的，1912年9月第一次在莱比锡用德文出版。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7月16—17日(29—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写的一封信。该信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通知的答复，执行委员会在通知中建议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的“中心”和“团体”的会议来讨论分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拨出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的经费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没有开成。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把一部分钱拨给了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从而支持了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寄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各省各州的中心，寄给在1912年9月举行的克姆尼茨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各个最重要报纸的编辑部。——(正文第192页)
- 58 “斯皮尔卡”(“联盟”)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成立于1904年底；它作为自治区域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中，它加入了孟什维克一边。在反动时期，“斯皮尔卡”瓦解了。1912年还有几个不大的分散的“斯皮尔卡”小组。在这一时期内，它的大部分成员都变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人。托洛茨基的

取消派“真理报”(維也納的)作为“斯皮尔卡”的机关报出版只是在1908年(头两号)。——(正文第196頁)

59 第二国际第九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本来預定在1913年秋天在維也納召开。但是,由于1912年爆发了巴尔干战争,便在1912年11月在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正文第206頁)

60 指1912年8月在維也納举行的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组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联盟的组织者是托洛茨基。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崩得的代表,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及侨居国外的各取消派团体即“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維也納“真理报”和“前进”集团的代表等等。从俄国国内派遣代表的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取消派的“倡导小组”以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的编辑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还有“斯皮尔卡”国外委员会的代表。絕大多数代表都是侨居国外的与俄国工人阶级毫无联系的人。

代表会议在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所有問題上都通过了取消派的反党决议,并且反对秘密党的存在。

由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八月联盟,在代表会议一开始就闹得分崩离析。取消派没有能够选出中央,只是组成了组织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的打击下,反党八月联盟很快就彻底瓦解了。——(正文第207頁)

61 手稿上没有标题。该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211頁)

62 “科学评论”(«La Revue Scientifique»)是一本杂志,1863年创刊于巴黎。——(正文第215頁)

63 列宁引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4年俄文第7版第1卷第159頁)。——(正文第220頁)

64 “陆海軍中的起义”一文发表在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工人报”第9号上。

“工人报”是布尔什維克的通俗报纸。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在巴黎出版。共出9期。孟什維克护党分子也参加了该报工作。“工人报”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是列宁。列宁在该报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1912年1月)指出,“工人报”坚定地彻底地捍卫了党和党的原则,并宣布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正文第224页)

- 65 “工人报”第9号上印的出版日期——8月12日(30日)是错的,正确的日期是7月30日(8月12日)。——(正文第227页)
- 6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举政纲”是列宁在布拉格代表会议闭幕不久在巴黎写的。选举政纲在俄国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印成传单。这份传单散发到18个地方,其中包括一些无产者集中的最大的中心。“社会民主党人报”根据国内版,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举政纲”转载在第26号附页上。这个政纲又由布尔什維克许多地方组织重印。在梯弗里斯,这个政纲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重印(政纲全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453—458页)。——(正文第228页)
- 67 斯·沃·,斯塔尼斯拉夫·沃尔斯基,是阿·沃·索柯洛夫的别名;召回派,“前进”集团的组织者之一。——(正文第230页)
- 68 尔·馬·,尔·馬尔托夫,是孟什維克领袖之一。——(正文第232页)
- 69 “给瑞士工人的信”是列宁由于下列事件写的:1912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苏黎世孟什維克取消派联合委员会给社会民主党组织«Die Eintracht»(“协约”)执行委员会和瑞士工会写了一封信,声明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苏黎世国外组织的唯一代表。7月27日(8月9日),在苏黎世,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的布尔什維克瑞士支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黎世、达沃斯、伯尔尼、洛桑和日内瓦的布尔什維克小组的代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下列决议:(1)关于党内状况;(2)关于国外形势和(3)关于对取消派委员会的信提出抗议的决议。后一决议和列宁证明布尔什維克苏黎世支部的权能的信,是用

德文写的,并以胶印版传单的形式发表。——(正文第236頁)

- 70 指財政部工业司1908年作的俄国工厂企业調查。調查結果的初步資料,发表在瓦·叶·瓦尔扎尔的“1909年年初的帝国工厂加工工业”一文中。此文載于1911年12月11日(24日)出版的“財政、工业和貿易通报”第50期。列宁利用了該文統計表的数字。——(正文第247頁)
- 71 指“工厂視察員1910年报告汇编”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37頁。——(正文第249頁)
- 72 数字材料,列宁摘自“工厂視察員1910年报告汇编”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15頁。——(正文第263頁)
- 73 “俄国报”是警察黑帮日报,1905—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1906年起,成为內务部的官方机关报。——(正文第279頁)
- 74 “取消派和‘統一’”一文与批判取消派对“真理报”提出的責难的专门一节,同时发表在“真理报”上。这一节是米·斯·奥里明斯基写的。——(正文第281頁)
- 75 “庶民报”是黑帮的日报,国家杜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289頁)
- 76 “俄国思想”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月刊,1880—191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出版。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列宁在这个时期称“俄国思想”为“黑帮思想”。——(正文第304頁)
- 77 列宁引的是涅克拉索夫的詩“誰在俄国生活得好”中的一段(見“尼·阿·涅克拉索夫选集”1947年俄文版第247頁,參看“在俄罗斯誰能快乐而自由”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57頁)。

正文下面引的四行詩,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詩“給寄給我‘不可能’一首詩的一位不相識的朋友”(見“尼·阿·涅克拉索夫选集”1947年俄文版第135—136頁)。——(正文第305頁)

- 78 “迎合卑鄙”是列宁从薩尔梯柯夫-謝德林的童話“一个自由主义者”中引来的(見“米·叶·薩尔梯柯夫-謝德林选集”1947年俄文版第554—557頁,參看“謝德林寓言选集”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版)。——(正文第 307 頁)

79 “俄罗斯通报”是政治和文学杂志，1856 年创刊，1906 年停刊。从 1856—1887 年在莫斯科出版，该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是米·尼·卡特柯夫。最初，该杂志倾向于自由派，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成为反动农奴主的刊物。卡特柯夫死后，“俄罗斯通报”于 1888—1896 年在彼得堡出版，1896—1902 年在莫斯科出版，1902—1906 年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 309 頁)

80 指下列事实：1908 年 11、12 月，大工业家古讓、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等和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曼努伊洛夫、基捷韦帖尔等人，在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当前问题”的秘密会议。

1910 年 10 月，第三届国家杜马的代表费·亚·戈洛文宣布辞职，不久他就积极参加了铁路租让企业的工作。

1912 年 3 月，第三届杜马的代表瓦·阿·马克拉柯夫不顾自己的代表身分，为塔吉也夫案件进行辩护；塔吉也夫是巴庫的大石油业主，由于虐待职员别布托夫工程师而被控告。——(正文第 313 頁)

8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5 卷第 73 頁和第 331 頁。——(正文第 324 頁)

82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 卷第 32 頁。——(正文第 336 頁)

83 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阿·阿·沃伊洛什尼科夫由于在 1911 年 12 月 2 日(15 日)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义务兵役章程的演讲，杜马的主席建议取消沃伊洛什尼科夫参加 5 次会议的权利。沃伊洛什尼科夫在同次会议上作了第二次发言以后，被停止参加会议的次数增到 15 次。立宪民主党人投票赞成主席的第一个建议。——(正文第 339 頁)

84 見亞·謝·格利波也多夫的“聰明誤”，“亞·謝·格利波也多夫全集”1945 年俄文版第 11 頁。——(正文第 342 頁)

85 米留可夫于 1912 年 9 月同外交大臣薩宗諾夫会晤，会晤时讨论了沙皇政府在巴尔干的政策。——(正文第 344 頁)

- 86 指的是馬克思 1871 年 4 月 12 日給路·庫格曼的信，信中对巴黎公社作了评价（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 年俄文版第 263 頁）。——（正文第 350 頁）
- 87 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德文第 1 版恩格斯的序言（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941 年俄文版第 9 頁）。——（正文第 352 頁）
- 88 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1954 年俄文第 7 版第 1 卷第 159 頁。——（正文第 369 頁）
- 89 “光線報”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公開日報，于 1912 年 9 月至 1913 年 7 月在彼得堡出版；該報是“靠資產階級朋友的錢”（列寧）維持的。——（正文第 405 頁）
- 90 所謂“奧地利”聯邦，是指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按民族劃分的組織機構。在 1897 年該黨的維也納代表大會上，統一的黨被取消了，代替它的是德意志、捷克、波蘭、小俄羅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 6 個民族的“社會民主黨小組”的聯邦。所有這些小組則由共同的代表大會和共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合起來。在 1899 年的勃留恩代表大會上，該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組為由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的執行委員會組成的聯邦機關。由於實行組織的聯邦制，奧地利的統一社會民主黨瓦解了。——（正文第 407 頁）
- 91 “關於工人代表的某些發言問題”的提綱，是第四屆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宣言的基礎。提綱的手稿未全部保留下來。在通過宣言之前，布爾什維克代表會同孟什維克的七人團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布爾什維克代表終於爭取到把布爾什維克綱領的各項基本要求列入宣言，但是孟什維克也爭取到使關於民族文化自治的一項要求得到通過。宣言會由馬林諾夫斯基（後來發現他是奸細）代表社會民主黨黨團在 1912 年 12 月 7 日（20 日）的杜馬會議上宣讀。馬林諾夫斯基在宣讀時略去了許多項，其中包括關於普選權的一項。由於發表了杜馬會議速記記錄和宣言原文，“真理報”編輯部會受到法庭審訊，報紙則被沒收。——（正文第 408 頁）

- 92 第二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非常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新历)在巴塞尔举行。在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举行了人数众多的反战游行示威和抗議战争的国际性群众大会。在代表大会的11月25日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宣言,号召工人利用无产阶级的組織和力量来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斗争。——(正文第411頁)
- 93 列宁是指庫托馬尔和阿尔加契監獄发生的政治犯騷动。騷动是由外貝加尔督軍于1912年夏末頒布的关于在尼布楚苦役監獄內对政治犯实行軍事条例的命令引起的。庫托馬尔監獄的政治犯用絕食15天和自杀来抗議这个命令。在阿尔加契監獄中,也发生了同样性質的事件。为了对此表示响应,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和里加的工人举行抗議罢工。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劳动团曾就侮辱政治犯問題向第四届杜馬提出質問。但多数票主张延期討論这个質問,后来也沒有再提出討論。——(正文第412頁)
- 94 指1908年5月10日(23日)提交第三届杜馬討論的农民代表(无党派和右派)的土地草案。草案規定强迫地主按市場平均价格出讓自己不耕种的土地。为了实行土地改革,建議成立由普遍投票选出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列宁在“第三届杜馬中土地問題的爭論”一文(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5卷第277—290頁)中对这个草案作了評价。——(正文第413頁)
- 95 “关于杜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們的宣言問題”的文件是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的草稿。文件由娜·康·克魯普斯卡娅轉抄,并于1912年11月13日(26日)从克拉柯夫送交杜馬的布尔什維克代表。宣言的草稿被沙皇警察截获,于1932年在警察司档案中發現。——(正文第415頁)
- 96 这次游行示威是在彼得堡各区和各企业的布尔什維克代表的倡議下組織起来的。在杜馬开幕的前几天,布尔什維克就在各企业中散发传单,号召工人組織11月15日(28日)的一日政治罢工并且到塔夫利达宮去示威。取消派在“光綫报”上反对游行示威。11月13日(26日),第四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召开了一次有彼得堡委员会、“真理报”編輯

部、取消派的领导中心組織委员会和取消派的报纸“光綫报”的代表参加的會議。在会上布尔什維克支持工人提出的在黑帮杜馬開幕的那天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建議；取消派坚决表示反对。会后，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报刊上发表了政治上錯誤的声明，說这个号召工人罢工的传单不是彼得堡任何一个有威信的社会民主党团体散发的。尽管取消派反对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犯了政治錯誤，在杜馬開幕那天还是有几万工人举行了罢工。在許多企业內都組織了短促的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作出了抵制“光綫报”的决定。

游行示威以后，杜馬的布尔什維克代表在工人集会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正文第 419 頁)

97 列宁指的是罗将柯在他当选为第四届杜馬主席后发表的演說。罗将柯在自己的演說中声明他要“坚定不移地忠实于”沙皇，并且宣布他是代議制的立宪制度的拥护者。——(正文第 419 頁)

98 列宁給斯大林的信于 1912 年 11 月 28 日 (12 月 11 日) 从克拉柯夫送到彼得堡。这封信是由娜·康·克魯普斯卡娅用化学方法轉抄的。在寄送时，信被警察司截获，在显影后用打字机打出。信的副本是在警察司的档案中發現的。在显影时，某些字沒有显出来，因此在信中有空白的地方。——(正文第 422 頁)

99 叶·約·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党员，被华沙市选为第四届杜馬的代表。布尔什維克坚决反接受亚格洛加入社会民主党党团，因为亚格洛被选入杜馬是依靠了资产階級和波兰社会党同崩得的联盟的支持。在第一次表决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发生了分裂：6 个代表(孟什維克)贊成接受亚格洛；6 个代表(布尔什維克)反对。伊尔庫茨克的代表右派孟什維克曼科夫到来后，孟什維克占了优势，亚格洛被接受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員。但是在布尔什維克代表的压力下，亚格洛在党团內部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在一切党内問題上，他只有发言权。——(正文第 422 頁)

100 “日报”是“真理报”的代号。——(正文第 422 頁)

101 文件原文中有空白的地方。委员会 是指第四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

的布尔什維克部分。——(正文第 422 頁)

- 102 信中缺了几个字。“波·”是布尔什維克尼·古·波列塔也夫,第三届国家杜馬的代表。取消派“馬·”大概是叶·馬耶夫斯基(維·阿·古托夫斯基的笔名),取消派报纸“光綫报”的工作人員。——(正文第 424 頁)

- 103 1912年10月5日(18日)召开了工人选民团初选人的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50个初选人;在代表大会选出的6个复选人中,有4个是布尔什維克。

沙皇政府害怕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选民团中取得胜利,竟取消了彼得堡21个企业的初选人的选举。为了回答这一点,布尔什維克的彼得堡委员会号召工人举行一天的政治罢工。参加罢工的达10万工人。政府不得不作了讓步,宣布举行补充选举。在举行补充选举的一切企业里,工人通过了斯大林写的“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10月17日(30日),“委托书”經新召开的省的选举会议通过,但是在第二次选举复选人时,不是按綱領进行投票的,因此,当选为复选人的是3个布尔什維克和3个取消派。为了确定工人选民团的杜馬代表候选人,布尔什維克向取消派建議抽签。取消派拒絕抽签。在省的复选人的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阿·叶·巴达也夫当选为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的代表。——(正文第 424 頁)

- 104 給斯大林的信是由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用化学方法插写在另一封信的行間的。信是在警察司書信检查的案卷中發現的。

瓦西里也夫是約·維·斯本林。——(正文第 425 頁)

- 105 1913年1月9日的传单是根据这封信的指示写成的,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委员会签署。——(正文第 425 頁)

- 106 指第四届杜馬代表右派孟什維克伊·恩·曼科夫。——(正文第 425 頁)

- 107 列宁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分。——(正文第 432 頁)

108 列宁指第二届国家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分。——(正文第 433 頁)

109 “进步派”代表大会于 1912 年 11 月 11—13 日 (24—26 日) 在彼得堡举行。代表大会討論了第四届杜馬党团的策略問題。代表大会通过了把“进步派”集团改組为政党的决定。新政党的綱領的基础是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

“进步党人”的机关刊物是“俄国評論报”，該报于 1912—1913 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 436 頁)

110 “言語报”(日刊)于 1904—1909 年在彼得堡出版。1905 年 11 月至 1906 年 7 月是十月党人的机关报,后来是被列宁称为“和平掠夺党”的“和平革新派”的君主立宪党的机关报。——(正文第 438 頁)

1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集,为了保密,称为“二月”會議,1912 年 12 月 26 日至 1913 年 1 月 1 日 (1913 年 1 月 8—14 日)在克拉柯夫举行。共有 14 人出席了會議,其中有中央委員和第四届国家杜馬中的布尔什維克代表,如:弗·伊·列宁、約·維·斯大林、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阿·叶·巴达也夫、尼·罗·沙果夫以及娜·康·克魯普斯卡婭、亞·安·特罗雅諾夫斯基、叶·費·罗茲米罗維奇等人。

召集會議的筹备工作是由弗·伊·列宁直接进行的。會議是由列宁主持的,他对許多問題都发了言,起草了各种決議和會議通报。

會議通过了关于工人运动各項最重要問題的決議,討論了地方代表关于党組織的状况的报告和关于“真理报”、“启蒙”杂志編輯部的工作問題。

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會議的決議,并出版了胶印本。2 月上半月,在巴黎出版了決議和“通报”的单行本。1913 年 4 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发出通知,建議各級党組織、中央委员会特派員、某些党的工作者在各委员会、党支部和小组里討論“二月”會議的決議。弗·伊·列宁在給阿·馬·高尔基的信中指出:會議“开得很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文第 441 頁)

112 指孟什維克代表阿·伊·契恒凱里在 1912 年 12 月 10 日 (23 日) 杜馬

會議上就政府宣言所作的發言。——(正文第 452 頁)

- 113 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的条文，是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对党綱第 8 条关于“各民族的自决权”提出的补充提案：“和建立保障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正文第 452 頁)
- 114 在 1912 年 12 月 15 日 (28 日) 的第四届杜馬會議上，在結束了关于政府宣言的討論之后，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劳动派和民族主义党人提出了轉入討論当前事务的議案。“进步党人”的議案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議案中說，确信政府会实现 1905 年 10 月 17 日的宣言。社会民主党人也投票贊成了这个議案。后来他們承認他們投贊成票是錯誤的。——(正文第 453 頁)
- 115 在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工作的決議的几个未公布的条文 (第 7、8、9 条) 中，會議建議布尔什維克代表爭取在党团內同孟什維克七人团处于平等的地位，从取消派的“光綫报”的撰稿人名单中撤銷自己的名字，团结起来进行党的工作。決議的这些条文沒有保留下来。——(正文第 453 頁)
- 116 列宁引用的是德国詩人格奥尔格·海尔維格 1864 年为統一德国工人协会而写的工人歌曲中的一句話。——(正文第 459 頁)
- 117 指的是載于 1913 年 1 月 12 日 (25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0 号上的来自里加和莫斯科的通訊。通訊报道了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情况。1912 年 10 月 29 日 (11 月 11 日)，里加工人組織了游行示威，抗議塞瓦斯托波尔海軍軍事法庭对“約翰·茲拉托烏斯特”装甲艦 10 名水兵的死刑判決，抗議庫托馬尔苦役監獄虐待政治犯的事件和已經在巴尔干开始了的战争。有 1 500 多工人沿里加街道游行，并且得到了居民的同情。10 月 30 日 (11 月 12 日) 在里加的許多大工厂里开始了政治罢工。10 月 26 日 (11 月 8 日) 莫斯科許多工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曾經試圖組織游行示威，但是警察把集合的工人趕散了。——(正文第 466 頁)
- 118 弗·阿·即孟什維克取消派弗·莫·阿波罗西莫夫，后来被揭穿是个奸細。

- 費·唐·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首領費·伊·唐恩。——(正文第470頁)
- 119 手稿上沒有標題。標題是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加的。——(正文第472頁)
- 120 奧古斯托夫斯基是孟什維克取消派謝·奧·策杰爾包姆的筆名。——(正文第477頁)
- 121 “關於布爾什維主義”一文是為尼·亞·魯巴金“書林概述”一書第2卷寫的。1913年1月12日(25日)列寧寄出這篇文章時，附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以“不作任何修改”作為刊印的條件。文章是全文發表的。——(正文第479頁)
- 122 列寧引的是捷·瓦·達威多夫“老驃騎兵之歌”一詩中的一句(見“捷·瓦·達威多夫詩歌全集”1933年俄文版第106頁)。——(正文第486頁)
- 123 列寧指的是“共產黨宣言”中的下述原理：“現代的國家政權只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68頁)。——(正文第486頁)
- 124 列寧親自翻譯的摘自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一段引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53頁)。——(正文第487頁)
- 125 “羅普申的心情”，列寧指反動年代在社會革命黨人知識分子中廣為流行並在羅普申(波·薩文柯夫)的文學作品中得到最明顯表現的反動思想和頹廢情緒。——(正文第492頁)
- 126 弗·爾一科是列寧的筆名。——(正文第503頁)
- 127 指的是里加和葉加特林諾達爾的第四屆國家杜馬選舉。在這兩個地方，立憲民主黨人和右派黑幫的各政黨共同投票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正文第506頁)
- 128 “創舉”(«L'Initiative»)是具有民粹派取消主義傾向的雜誌，由一群社會革命黨人主辦。僅僅1912年6月在巴黎出了一期。——(正文第

511 頁)

- 129 列寧指的是 1908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會議的決定和 1909 年 6 月“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會議的決議（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1954 年俄文第 7 版第 1 卷第 195—205、219—232 頁）。——（正文第 515 頁）
- 130 阿·瓦·彼·是阿·瓦·彼舍霍諾夫的筆名，他是“人民社會黨人”的首領之一。——（正文第 521 頁）
- 131 尼古拉—遜是尼·弗·丹尼爾遜的筆名，他是 19 世紀 80—90 年代自由主義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正文第 521 頁）
- 132 “告社會民主黨人”一文是僅供黨員閱讀的，曾在克拉柯夫用膠印版印成傳單。——（正文第 526 頁）
- 133 1912 年 12 月 14 日（27 日），44 個杜馬代表就彼得堡 34 個中學生在私立維特美爾中學開會被捕一事提出質問，人民教育大臣卡索在杜馬中作了說明。暗探局認為這些學生有參加秘密小組的嫌疑。杜馬舉行了五次會議討論這一質問。1913 年 2 月 6 日（19 日）以多數票通過了轉入討論當前事務的議案，認為沙皇大臣的說明不能令人滿意。——（正文第 569 頁）
- 134 弗·伊·列寧用的這兩句話，是根據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詩“搖籃曲”中的兩行詩改寫的，這兩行詩原來是：
 “你有官僚的外表
 壞蛋的靈魂……”
 （見“尼·阿·涅克拉索夫選集”1947 年俄文版第 4 頁）。——（正文第 593 頁）
- 135 本版“節余現金”一文中，在“國家魔法”一詞和“這是典型的掠奪經濟”這段話中間增補了 1941 年發現的一段話。第一次發表在 1913 年 3 月 15 日“真理報”第 62 號上以及刊在“列寧全集”第 2、3 版中的本文中都沒有這一段話。——（正文第 602 頁）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1912年4月—1913年3月)

1912

- 4月—6月下旬
(新历) 列宁住在巴黎。
- 4月22日(5月5日) 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真理报”创刊号出版。
- 4月25日(5月8日) 列宁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反党的取消派”、“纪念赫尔岑”，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上。
- 4月26日(5月9日)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会上，作关于连纳屠杀事件、俄国罢工以及由于这些事件而制定的党的策略的报告。
- 5月6日(19日) 列宁的“欧俄土地占有情况”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3号上。
- 5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 列宁的“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和14号上。
- 5月10日(23日) 列宁的“论俄国各政党”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5号上。
- 5月22日(6月4日) 列宁的“‘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和“关于选举前动员情况的几点总结”，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6号上。
- 5月31日(6月13日)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在阿尔卡查尔大厅举行的会议上，作题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

- 高涨”的講演。
- 列宁的“經濟罢工和政治罢工”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0号上。
- 6月3日(16日)** 列宁的“移民問題”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1号上。
- 6月4日(17日)** 列宁的“革命的高涨”、“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會議的口号和五月运动”、“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和“‘联合者’”,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7号上。
- 列宁在萊比錫做題为“論俄国的革命高涨”的講演。
- 6月下旬(新历)** 列宁从巴黎迁往克拉柯夫,以便同俄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加强对布尔什維克杜馬党团和“真理报”編輯部的领导。
- 6月10日(23日)** 列宁的“我們同自由派論战的性質和意义”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2号上。
- 6月17日(30日)** 列宁的“資本主义和‘議會’”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3号上。
- 6月21日(7月4日)** 列宁到克拉柯夫,住在茲韦日涅茨大街第218号住宅。
- 6月24日(7月7日)** 列宁的“选举和反对派”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4号上。
- 6月底** 列宁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一文。該文发表在7月3日(16日)《Gazeta Robotnicza》(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分裂派”的机关报)第15—16号上。
- 7月1日(14日)** 列宁的“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和“斯托雷平的土地綱領和民粹派的土地綱領的比較”,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5号上。

- 7月6日(19日) 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揭露托洛茨基是卑鄙的骗子和造谣中伤分子。
- 7月8日(21日)以前 列宁给“真理报”编辑部写“答取消派”的短评,要求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同取消派进行更坚决的斗争。
- 7月11日(24日) 列宁写信给“涅瓦明星报”编辑部,严厉斥责编辑部怕同取消派进行论战。
- 7月12日(25日) 列宁的“在瑞士”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63号上。
- 7月12—15日(25—28日) 列宁写“半年工作总结”一文,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并指明发表的顺序。该文登在7月29日和31日(8月11日和13日)、8月1日和2日(14日和15日)的“真理报”第78、79、80和81号上。
- 7月15日(28日) 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7号上。
列宁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和“俄国的‘言论自由’”,发表在“真理报”第66号上。
- 7月17日(30日) 列宁就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为了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采取一致行动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中心”、组织和派别的会议的问题,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回信。这封信是“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的主要内容。
- 7月19日(8月1日) 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要求编辑部对专辟一栏,登载有关反对取消派的第四届杜马选举的稿件问题,表示态度。
列宁写信给阿·马·高尔基,告诉他俄国革命的高涨和工人日报“真理报”的出版。
- 7月20日(8月2日) 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指出在第四届杜马选举

- 以前,必須同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展开論战”。
- 列宁的“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費”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0号上。
- 7月22日和29日(8月4日和11日)** 列宁的“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18、19号上。
- 7月25日(8月7日)** 列宁的“自由派和教权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4号上。
- 7月26日(8月8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5号上。
- 7月28日(8月10日)** 列宁的“自由派的进攻”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7号上。
- 7月30日(8月12日)** 列宁的“陆海軍中的起义”、“第四届杜馬选举的前夜”和“‘結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嗎?”,发表在“工人报”第9号上。
- 7月31日(8月13日)** 列宁的“一些原則問題”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79号上。
- 7月底—8月初** 列宁写的“給瑞士工人的信”,在苏黎世用胶印版印成德文单頁。
- 8月5日(18日)** 列宁的“最后一个汽門”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0号上。
- 8月8日(21日)** 列宁的“小小的考証”和“俄国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发表在“真理报”第85号上。
- 8月9日(22日)** 列宁的“罢工斗争和工資”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86号上。
- 8月11日和12日(24日和25日)** 列宁的“莫斯科省工厂的工作日”、“在英国”和“俄国的生产积聚”,发表在“真理报”第88、89号上。

- 8月12日(25日)** 列宁的“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1号上。
- 8月18日(31日)** 列宁的“飞黄腾达之路”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4号上。
列宁写信给“社会主义国际局书记处”,对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写给社会主义国际局的通知波兰社会民主党已经分裂的信,提出抗议。
- 8月19日(9月1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2号上。
- 8月21日(9月3日)** 列宁的“蹩脚的辩解”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6号上。
- 8月22日(9月4日)** 列宁在克拉柯夫,迁到留博米尔大街第47号住宅。
- 8月24日(9月6日)** 列宁的“取消派和‘统一’”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99号上。
- 8月26日(9月8日)** 列宁的“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3号上。
- 8月29日(9月11日)** 列宁的“工人和‘真理报’”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3号上。
- 8月30日(9月12日)** 列宁的“从前和现在”和“国际法官代表大会”,发表在“真理报”第104号上。
- 8月31日(9月13日)** 列宁的“在瑞士”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5号上。
- 8月底** 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写序和跋。
- 9月2日和9日(15日和22日)** 列宁的“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4、25号上。
- 9月5日(18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派的一致”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09号上。

- 9月15日(28日) 列宁的“論恩·斯·波梁斯基來信”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18号上。
- 9月16日(29日) 列宁的“論政治路綫”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6号上。
- 9月18日(10月1日) 列宁的“美国工人的胜利”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0号上。
- 9月28日(10月11日) 列宁的“意土战争的結局”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29号上。
- 9月下半月 列宁写信給阿·馬·高尔基,談到第四届杜馬选举的进程,并請他为“真理报”撰稿。
-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現狀”小册子,用德文在萊比錫出版。
- 10月4日(17日) 列宁的“孤注一擲”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4号上。
- 列宁写信給阿·馬·高尔基,請他經常为“真理报”撰稿。
- 10月5日(18日) 列宁的“选举中的僧侶和僧侶气的选举”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27号上。
- 10月6日(19日) 列宁的“米留可夫先生的‘立場’”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6号上。
- 10月13日(26日) 列宁写信給“真理报”編輯部,要求向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初选人代表大会更坚决地闡明布尔什維克的选举綱領,公布布尔什維克复选人候选人的全部名单,要“真理报”为杜馬选举出专号。
- 10月16日(29日) 列宁的“彼得堡工人代表”和“巴尔干人民和欧洲外交”,发表在“真理报”第144号上。
- 10月18日(31日) 列宁的“論狐狸和鷄窩”和“可耻的決議”,发表在“真理

- 报”第 146 号上。
- 10月19日(11月1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 147 号上。
- 10月21日(11月3日) 列宁的“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 149 号上。
- 10月24日(11月6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 151 号上。
- 10月28日(11月10日) 列宁的“战争的惨状”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 155 号上。
- 10月 列宁写“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 1913 年第 4 期上。
- 列宁写“两种乌托邦”一文。
- 10月下半月—11月初 列宁把约·维·斯大林草拟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印刷所,并强调保存这份文件的极端重要性。
- 11月初 列宁写“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提纲,作为制定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的依据。
- 11月4日(17日) 列宁的“地道的俄国习气”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 160 号上。
- 11月5日(18日) 列宁的“改良派的纲领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8—29 号上。
- 11月7日(20日) 列宁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胜利的社会意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 162 号上。
- 11月8日(21日) 列宁的“新生的中国”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 163 号上。

- 11月9日(22日) 列宁的“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64号上。
- 11月11日(24日) 列宁把約·維·斯大林写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工人代表的委托书”轉給“真理报”編輯部,并建議把这份委托书用大号字登在“真理报”的显著地位。
- 11月13日(26日) 列宁把他写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草案寄給第四届杜馬布尔什維克代表。
- 11月下旬 列宁写“关于11月15日事件問題(沒有发表的演說)”一文。
- 11月23日(12月6日) 列宁写信給約·維·斯大林,談到为1月9日周年紀念,准备举行一天罢工、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的問題,以及第四届杜馬的布尔什維克代表同取消派斗争的任务問題。
- 11月28日(12月11日) 列宁把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調查表轉給彼得堡“启蒙”杂志編輯部的布尔什維克代表。
- 列宁写信給約·維·斯大林,并附有第四届杜馬的布尔什維克代表关于接納亞格洛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对杜馬開幕那天的罢工的态度問題的決議草案。
- 11月29日(12月12日) 列宁的“改良主义病”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80号上。
- 11月30日(12月13日) 列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貧困化”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81号上。
- 11月 列宁主持中央委员会會議,討論“真理报”編輯部的經費紧张問題。
- 列宁写“我們党的‘迫切問題’。‘取消派’問題和‘民族’問題”一文。該文第一次載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和洛茲委员会1913年8月出版的《Pismo

- Dyskusyjne» (“爭論專頁”)創刊号上。
- 12月12日(25日)** 列宁的“工人階級及其‘議會’代表團”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91号上。
- 12月15日(28日)** 列宁的“民族主义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調和’”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94号上。
- 12月22日(1913年1月4日)** 列宁的“民族主义自由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00号上。
- 12月** 列宁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二月”會議写“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統一”的提綱。
- 12月26—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 列宁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二月”會議。会上通过了列宁草拟的下列決議: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秘密組織的建設;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关于秘密書刊;关于保險运动;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統一;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組織。
- 会上,列宁提出了改进“真理报”編輯部工作的一系列措施。
- 列宁主持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会上討論了第四屆杜馬布尔什維克党团工作的一些問題。

1 9 1 3

- 1月初** 列宁修改決議,写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二月”會議的“通报”。
- 1月1日(14日)** 列宁的“1912年英国的工人运动”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号上。
- 1月6日(19日)** 列宁写“写晚了总比不写强”一文,发表在1月11日(24

- 日)“真理报”第8号上。
- 1月12日(25日)** 列宁的“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上。
- 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要求改组编辑部。
- 列宁把“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寄给尼·亚·鲁巴金，准备编入他的“书林概述”一书第2卷。
- 1月15日(28日)** 列宁的“彭加勒当选的意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1号上。
- 1月17日(30日)** 列宁的“坦率”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3号上。
- 1月18日(31日)** 列宁的“布利安内閣”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4号上。
- 1月下半月** 列宁安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二月”会议的“通报”和决议的出版工作。
- 1月19日(2月1日)** 列宁的“生活在教导人们”和“新民主派”，发表在“真理报”第15号上。
- 1月20日和22日
(2月2日和4日)** 列宁的“论民粹主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16、17号上。
- 1月22日(2月4日)** 列宁写反对取消派的“告社会民主党人”；1913年1月在克拉柯夫印成胶印版单页分发。
- 1月25日(2月7日)** 列宁的“在阿捷夫之流中间”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0号上。
- 1月29日(2月11日)** 列宁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3号上。
- 1月30日(2月12日)** 列宁的“论公开党”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4号上。

- 1月** 列宁写信給阿·馬·高尔基，談到在莫斯科創办合法布尔什維克报纸的計劃以及“启蒙”杂志增加篇幅的問題；并把“二月”會議的決議寄給他。
- 列宁把第四届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在政府預算問題上的发言材料寄給“真理报”編輯部。
- 列宁的“选举总结”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1期上。
- 1月底** 列宁写“俄罗斯人和黑人”一文。
- 2月初** 列宁写“立宪幻想的破灭”一文。
- 2月1日(14日)以前** 列宁写信給阿·叶·巴达也夫，严厉批評“真理报”編輯部在第24号上发表亚·波格丹諾夫的信。
- 2月1日(14日)** 列宁的“农民土地的轉移”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6号上。
- 2月2日(15日)** 列宁的“談談罢工”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7号上。
- 2月5日(18日)** 列宁的“一个发现”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29号上。
- 2月6日(19日)** 列宁的“英国工党代表大会”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30号上。
- 2月6—9日(19—22日)** 列宁写“日益增長的矛盾。政論家的評論”一文，批評立宪民主党會議的決議，登在“启蒙”杂志第3、4期上。
- 2月8日(21日)** 列宁写信給“真理报”編輯部，对該报的工作改进表示祝賀，并指示要为紀念卡·馬克思逝世30周年出专刊。
- 2月12日(25日)** 列宁的“感謝坦率”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35号上。
- 2月16日(3月1日)** 列宁的“統一問題”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39号上。
- 2月23日(3月8日)** 列宁的“‘土地规划’的某些結果”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45号上。

- 2月 列宁的“民粹派内部和农村中的景况如何？”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2期上。
- 3月1日(14日) 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0号上。
- 3月2日(15日) 列宁的“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1号上。
- 3月7日(20日) 列宁的“虚伪的论调”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5号上。
- 3月8日(21日) 列宁的“‘任务的焦点’”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6号上。
- 3月9日(22日) 列宁的“自由派粉饰农奴制的勾当”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57号上。
- 3月10—13日(23—26日) 列宁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拉柯夫举行的会议。
- 3月13日(26日) 列宁的“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60号上。
- 3月14日(27日) 列宁的“我们的‘成就’”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61号上。
- 3月15日(28日) 列宁的“妥协还是分裂？（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意见分歧问题）”和“‘节余现金’”，发表在“真理报”第62号上。
-